

地 缘 看 世 界

—— 战 国



第 三 册

温骏轩 / 著

地 缘 看 世 界

战 国

第 三 册

温
骏
轩
著



整理说明

本书整理自天涯社区帖子——地缘看世界。帖子由“鄙视抢沙发”（天涯 ID，笔名为温骏轩）所发。整理的目的是使文章内容能够更方便快捷的阅读，整理成 PDF 格式供电子阅读使用。版权属于原作者（温骏轩）所有，禁止用于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用途，仅适用于个人的学习和收藏。如打印成纸质的话，亦须遵循这一原则来进行。纸质打印量大的话（前提是只能用于学习，不商用），由于涉及版权、法律等问题，需取得作者本人的同意方可进行。

书中文字及地图基本来源于原贴子，其中有部分地图（图片）为自制和来源于网络。来源于网络上其他人的地图（图片）版权亦属原作者所有，在此对原作者深表敬意。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告之，会立即删除或做其他妥善处理。

关于自制图部分，因文章有些内容没有配图，或者所配的原图没能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如比例尺精度小），所以额外补充了少量地图。因水平和能力有限，仅作为参考。书中地图仅用于网上的学习（制图有专门统一规范的要求），因应理解文章内容而制作。并未经过权威机构的核勘审查，所以地图没有等同于正规出版物的法律效力，切忌上纲上线。如存在任何问题，也可指出进行修改或者删除，以减少因扩散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本册为战国部分的内容，基本沿袭贴子的写作顺序进行整理安排，其中有一处地方作了调整。原贴中在分析到关于四川盆地部分的蜀国时，对都江堰工程的结构作了解读。有的朋友对这部分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所以作者在后面写到秦国的郑国渠时，又重新写新的内容（修正原来的部分）。现将对都江堰工程重写的这部分内容放置至蜀国部分的内容中。当然重写的这部分内容较之前少（因前面部分已大致交待清楚）。之前的那部分放到书末尾处，以让大家对这部分内容有个更清楚的认识。

最后，因时间和能力有限，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存在些问题和错漏之处，如有发现可指出，以进行修改，以能够得到完善。在此，对沙发一直以来的付出和分享表示感谢，也感谢沙希达在文字校正上给予的帮助。

清风

内容提要

本册为地缘看世界系列中的战国部分，其分析始于三家分晋，终于秦完成六国统一，时间跨度为 200 多年。战国是继春秋之后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由分封制向郡县制发展演变的过渡阶段，其间各国为增强国力和竞争力而进行的各种变法和改革对后世的中央之国造成了深远影响。了解战国史，对于理解战国之后的中国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战国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七国的并立和争雄，其中七国分别为齐、楚、秦、魏、燕、赵、韩。七国围绕着兼并与统一的目标进行的博弈也贯穿了这一时期，直至秦灭六国，完成天下统一。本书大体也是以战国七雄的博弈为主线，以地理结构为基础，从客观角度深入解读，揭露出各国盛衰兴亡背后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不同于传统的人文史观（很多历史书籍是以历史人物的生平为主线串联起历史事件），本书是从地缘视角的角度来书写的。历史的发展依存于现有的地理结构，而地理结构对历史的发展也有影响，在不了解每个地区地理结构的情况下，对很多历史事件的理解就像雾里看花，所以书中对地理结构的着笔会比较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本书又并非纯粹的历史类的书，从里面众多的地缘结构图，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书中主要重点分析了各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军事博弈，以及各国的对外地缘扩张。在各国之间的地缘关系中，理清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或者说地缘平衡线，是重要的内容。唯有如此，才了解各国国土的大小和扩张边界，对后面发生的历史也比较清楚它的背景。军事博弈也就是战争层面的对抗了，也并不是每一场战争（战役）都会解读，只有那些能够影响地缘格局的才会进入视线中。书中主要列举了燕攻齐之战、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阨与之战，以及长平之战等几场重要战役。地缘扩张，则是各国为扩张战略纵深而对外进行的渗透和兼并。如赵国灭掉中山国和向河套平原渗透；秦国灭掉蜀国和巴国占据四川盆地等。这一部分内容也占据较多的篇幅。

关于对各板块地理结构的解读，因春秋之时已对这些国家的核心区作过解读，所以在这一部分中主要集中在各国所扩张的边缘地区。如燕国在燕山以北的辽河平原、朝鲜半岛，以及太行山中的控制区；赵国在以大同盆地为中心的晋北地区，以及河套平原的控制区；秦国所渗透的汉中平原和四川盆地；以及楚国扩张方向的安康盆地、上庸之地、长江三峡、武陵山区、云贵高原等。

除了对这些新的地理单元的地理结构的解读以外，各大地理单元之间交通线的分析也是重点所在。对这些交通线的解读，有助于理解其间的城邑和关卡的战略价值，以及战争中各方的进退路线和争夺重点。在书中解读的交通线中，主要包括有太行八陉（军都陉、蒲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以及未列入其中的羊肠坂道）、辽西古道（平冈道、卢龙道、无终道）、秦岭古道（战国部分只解读四条：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武关道）。除了这些山脉中的交通线以外，还列举了如雁门关、宁武关、倒马关、

紫荆关、杀虎口，以及乌江、沅江等沟通两个地理单元的独立的关卡和河谷通道。

总之书中以一个新的角度来解读战国，并且这些分析的要素具有客观性，能够在较少受到主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把握历史的走向和总结背后的规律。并且难为可贵的是配有大量的精美地图（且地图还原了当时的地理结构，如标出早已消失的大陆泽等），对理解文章内容的帮助非常大。

清风

地缘认知的三个层面

看了下日子，这篇文章发表之时，正好应是《地缘看世界》一贴开写的九周年纪念日，《谁在世界中心》一书出版也有了一年了。九年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在时政研究中，“地缘”一词似乎有变成一个热词的倾向。

以“地缘看世界”和“谁在世界中心”两个名称的选用来说，四年前策划书籍出版时，最起码出版方对于“地缘”一词的使用是很没有信心的。如果放在今天出版，也许“地缘看世界”本身就有机会成为一个系列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的合作我见过最严谨和最用心的出版方，并没有去选择一个泛娱乐化的书名。“谁在世界中心”这个书名，还是很好的体现了那本书在地缘政治层面的主要观点。只不过，就像我一直在说的：“地理”不等于“地缘”，“地缘”亦不等于“地缘政治”。最起码我希望，在写了那么多年后，一些基本认知能够得到厘清。我在行文常常会提到一片土地的属性，并将之称为“地缘属性”。地缘属性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物理环境、人文 / 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政治环境的变化又是最容易被关注到的。

一片土地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又可能会属于哪个国家，通常是地缘政治爱好者所最热衷于推演的方向。我们可以将之认定为是“第一层面”的地缘认知。从这个角度说，过往大多数“地缘政治”研究，以及9年前所写的“新世界岛论”（并成为《谁在世界中心》书名的来源），都算是在满足这种“第一层面”的需求。

在国家和领土问题还普遍存在的今天，将“地缘”研究用来满足当下的政治需求并非没有价值，问题只在于，这种大开大合的浅层次推演，虽不是地缘研究的全部，但却又是最有市场的。而当大家不再满足于土地归属层面的推演后，宗教、种族、民族等人文层面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成为下一个被关注点。这种地缘认知，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升级到“第二层面”。

比如西班牙人对美洲的殖民，就极大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地缘属性”，关注这片土地的民族、宗教等属性变化，比单纯的关注南美各国的国境线变化，要更加的有意义。建立这种认知之后，更可以将关注点由现实政治博弈，上升到关注人类命运的层面。在中国试图推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当代，这一层面的地缘认知显得尤为有现实意义。

不幸的是，当地缘研究推进到这第二层面后，并不能保证就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尤其是这种决定是由政治家做出后。比如在亚洲中部干旱地带对河流上游水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所导致的下游生态恶化；另一个更为难以把握的后果，则是将“第二层面”地缘认知，直接用来为“第一层面”地缘认识服务。

在这方面，纳粹德国基于对地缘政治研究的这种片面理解，所引发的在种族、领土扩张等方面的极端做法，是最恶劣的案例之一。这场发生在 70 多年前的悲剧，甚至使得地缘政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视为邪恶政治家的“理论工具”，以至于几乎从学术领域消失。

也许“地缘政治”这个概念在今后的历史中还是会阶段性的背负污名，然而最起码就我个人一直以来的认定来说，“地缘”视角的本质，是在探索“人与环境”如何相处。它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大方向的选择上做出相对正确的抉择。就像我一直认定，中国国家地理是我最合适的合作者（反过来也同样是），时间最终也证明了这点一样。至于政治，只是它服务的一个方向，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向。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只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

这种将“地缘”视角运用在普通人，特别是自己人生抉择上的认知，就是我所认定的“第三层面”的地缘认知。即使你暂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视角能够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何帮助也没关系，我会尽力将那些大家平时未曾关注到的地缘因素通过一篇篇解读展现在大家面前。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认知这个世界的方法（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在这样的地缘认知下我们终将会发现，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做所为，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改变你可以改变的，适应你不能改变的”。

温骏轩

2018 年 7 月 12 日

目 录

第一章 三晋在山西高原的势力范围·····	1
第一节 三家分晋局面形成的历史背景·····	1
第二节 三晋在山西高原的扩张区·····	2
第三节 上党高地北部的地理结构·····	6
第四节 上党高地南部的地理结构·····	8
第二章 韩魏两国在南阳之地的地缘关系·····	12
第一节 晋国获得南阳之地的历史背景·····	12
第二节 晋国征服戎狄获得軹关陘控制权·····	14
第三节 太行陘和孟门陘在上党的路线·····	16
第四节 魏国东西部国土进行沟通的路径·····	19
第三章 魏国和赵国在河内的地缘关系·····	22
第一节 魏国和赵国以漳水为地缘分割线·····	22
第二节 中牟邑位处漳水以南的林州盆地·····	24
第三节 中牟邑经羊肠坂道沟通上党·····	27
第四节 邯郸经滏口陘沟通上党和晋阳·····	31
第四章 赵国和中山国在河北平原的地缘关系·····	35
第一节 赵国和中山国以大陆泽北端为地缘分割线·····	35
第二节 赵国希望从中山国夺取井陘·····	38
第三节 井陘在太行山脉中的路线·····	40
第四节 魏国为争夺井陘攻打中山国·····	43
第五章 赵国从晋北征服中山国的通道·····	48
第一节 赵武灵王继位时面临的形势·····	48
第二节 赵国经楼烦关和雁门关渗透大同盆地·····	49
第三节 赵国吞并蔚县盆地中的代国·····	53
第四节 赵国从飞狐峪渗透涞源盆地·····	56
第五节 涞源盆地沟通华北平原的通道·····	59
第六章 燕国与赵齐两国的地缘分割线·····	64
第一节 燕国和赵国以南易水为界·····	64
第二节 燕国和齐国以滹沱河下游为界·····	67

第三节 战国时齐国地缘结构的变化	70
第四节 齐国趁燕国内乱攻入蓟城	72
第七章 宋国在战国时与邻国的分界线	74
第一节 宋国能保持良好局面的原因	74
第二节 宋国与邻国以河流为分界线	75
第三节 宋国建立符离塞作为南部防线	78
第八章 齐魏两国爆发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81
第一节 齐国与三晋分割河济平原	81
第二节 齐魏两国爆发桂陵之战的历史背景	85
第三节 桂陵之战中几个关键地点的位置	87
第四节 齐军在卫国和宋国支持下深入魏国	89
第五节 齐军在桂陵伏击魏军	92
第六节 齐国与魏国爆发马陵之战	93
第七节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影响	97
第九章 齐国攻灭宋国后引发五国伐齐	99
第一节 齐国灭宋后成为各国攻击目标	99
第二节 齐国在五大地理单元设立五都	101
第三节 各国在攻齐战役中的土地收获	104
第四节 燕国无法攻下即墨和莒邑	108
第五节 楚国进占沂沐河谷与齐国复国成功	111
第十章 燕国向辽河平原扩张	114
第一节 燕国向外扩张的背景	114
第二节 辽河平原的自然条件适合农耕	115
第三节 西拉木伦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变迁	117
第四节 燕国构筑长城保护下辽河平原	121
第十一章 燕国向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扩张	126
第一节 渔猎民族占据下辽河平原后的扩张方向	126
第二节 燕国向平壤平原扩张时受箕子朝鲜的阻碍	129
第三节 燕国构筑长城保护朝鲜半岛的控制区	132
第四节 箕子朝鲜最后的命运	136
第十二章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的扩张战略	144
第一节 日本控制东北后向蒙古渗透	144
第二节 日本控制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目的	149
第三节 日本为保持地缘优势进占热河省	151

第四节 中国凭借战略纵深抵御日本的侵略	153
第十三章 辽西古道在燕山山脉中的走向	155
第一节 大凌河和老哈河为北出燕山提供通道	155
第二节 卢龙道和无终道穿行燕山的路线	158
第三节 平冈道经古北口穿越燕山山脉	160
第十四章 燕国在边缘地区设立塞上五郡	163
第一节 燕国在怀密盆地区设立渔阳郡	163
第二节 燕国设立的右北平郡的地理范围	165
第三节 燕国在燕山以北设立辽东郡和辽西郡	168
第四节 燕国在太行山控制区设立上谷郡	170
第五节 燕国将控制线推进至张家口盆地区	173
第十五章 赵国在晋北和河套设立北三郡	177
第一节 赵国设立代郡并渗透张家口盆地区	177
第二节 赵国设立雁门郡的战略目的	180
第三节 赵国经杀虎口渗透至河套平原	182
第四节 赵国征服河套平原并设立云中郡	187
第五节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环境	190
第六节 秦赵两国以鄂尔多斯高原为缓冲地	193
第十六章 韩魏两国与楚国在中原的博弈	196
第一节 中原的地缘概念及地理范围	196
第二节 魏韩分别控制崤函通道和洛阳盆地	198
第三节 晋国将陆浑戎部署到伊河和洛河中游	200
第四节 晋楚两国围绕陆浑戎进行的博弈	202
第五节 韩国和魏国渗透入中原腹地	205
第六节 韩魏与楚国在中原缺乏地缘分割线	207
第七节 魏国在中原腹地开挖鸿沟	210
第十七章 秦国和魏国争夺河西之地	214
第一节 魏国夺取河西之地后向南北推进	214
第二节 魏国控制陕北高原	215
第三节 秦献公对魏国发起少梁之战	218
第四节 秦国完成收复河西之地	220
第五节 秦国拓展新空间的方向	222
第十八章 蜀国以川西平原为核心区	224
第一节 四川盆地的地理结构	224

第二节 蜀人和秦人治理川西平原的水患	227
第三节 都江堰工程的结构和原理	232
第四节 川西高原和川中丘陵的地理特征	236
第十九章 巴国以川东丘陵为核心区	239
第一节 山地和河流对巴人的重要性	239
第二节 南宋在合川钓鱼城对抗蒙古人	241
第三节 长江和嘉陵江在巴国的地位	244
第二十章 巴国和楚国争夺长江三峡和盐泉	248
第一节 巴国和楚国在鱼复和夷陵设军事据点	248
第二节 楚国向长江三峡和周边山地渗透	251
第三节 巴国控制区中分布的盐泉产地	254
第四节 楚国溯江而上夺取巴国盐泉和城邑	256
第二十一章 秦国攻灭巴蜀向四川盆地扩张	259
第一节 蜀国渗透至汉中盆地并封建苴国	259
第二节 秦国渗透入汉中盆地获得据点	261
第三节 苴国联结巴国和秦国来对抗蜀国	265
第四节 秦国伐蜀与由陇西入蜀的通道	267
第五节 关中地区可经由陈仓道入蜀	270
第六节 汉中盆地的重要性与褒斜道的路线	271
第七节 秦军入川攻灭苴巴蜀三国	274
第二十二章 秦国和楚国争夺汉水谷地	276
第一节 汉水谷地的地理结构	276
第二节 楚国灭掉庸国后设立上庸县	278
第三节 秦国控制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	282
第二十三章 秦国和楚国在丹江通道的博弈	286
第一节 秦楚两国因商於之地关系交恶	286
第二节 秦楚在丹江通道建立的城邑关卡	287
第三节 秦楚爆发丹阳之战和蓝田之战	291
第四节 秦国与楚国和解后攻击韩国	295
第五节 秦武王在洛邑举鼎时身亡	297
第二十四章 楚国攻灭越国引发的影响	299
第一节 楚国应形势变化而吞并越国	299
第二节 三楚的概念和划分范围	301
第三节 楚国在垂沙之战败于韩魏和齐国	303

第二十五章 楚国向武陵山区扩张	306
第一节 武陵山区的地理结构	306
第二节 楚国与武陵山区部族的关系	309
第三节 武陵山区澧沅资三水的特点	310
第二十六章 楚国向云贵高原扩张	314
第一节 楚国重点经营云南高原	314
第二节 楚国渗透云贵高原的意图和时机	317
第三节 楚国进入贵州高原的路线	319
第四节 夜郎国核心区的区位优势	322
第五节 庄𪚭率楚军进入云南滇池一带	324
第二十七章 秦国攻取黔中郡后交换楚国土地	329
第一节 秦国从三条线路攻楚的难度对比	329
第二节 秦军溯乌江而上攻取楚国黔中郡	330
第三节 秦国交换楚国上庸和汉北地	333
第四节 庄𪚭远征军无法完成入川目标	336
第二十八章 白起率秦军攻占楚国核心区	339
第一节 秦军从汉江通道攻入江汉平原	339
第二节 秦军攻占两湖平原及巫郡和黔中郡	341
第三节 楚国迁都寿春后进行战略调整	342
第二十九章 秦国在中原进行越地进攻	344
第一节 秦国以中心开花战术在中原扩张	344
第二节 赵国成为秦国主要对手的原因	345
第三节 秦国进攻太原盆地和中原	348
第四节 秦国与赵国交换土地出现意外	350
第三十章 秦国与赵国爆发阙与之战	353
第一节 秦国意图切断赵国的交通线	353
第二节 秦军进攻赵国交通要地阙与	355
第三节 赵军在武安邑被攻后驰援阙与	357
第四节 秦国在战后进行的战略调整	361
第三十一章 秦国与赵国爆发长平之战	365
第一节 秦国将上党高地列为主攻目标	365
第二节 秦军进攻韩国南阳之地和上党郡	367
第三节 战国时晋城盆地的地缘结构	370
第四节 秦军和赵军进入长平战区的战术通道	373

第五节 赵军和秦军隔丹水构筑防线对垒	377
第六节 廉颇在分水岭上构筑百里石长城	379
第三十二章 秦军在长平之战中围歼赵军	384
第一节 赵军主动进攻丹水西岸的秦军	384
第二节 秦军出奇兵突袭故关和长平关	386
第三节 秦军切断赵军的后勤补给线	388
第四节 秦军绕至马鞍壑并从南阳动员人力	391
第五节 秦军坑杀突围失败且粮尽而降的赵军	393
第三十三章 秦军围攻邯郸并被魏楚援军击退	396
第一节 赵国拒割让土地引起秦军进攻邯郸	396
第二节 信陵君和春申君领军解邯郸之围	397
第三节 信陵君率魏楚联军追击秦军	399
第三十四章 信陵君率五国联军击退秦军	401
第一节 秦国进攻韩魏并灭亡东西二周	401
第二节 魏国决定领导诸国合纵抗秦	402
第三节 联军击败秦军并追至函谷关	403
第四节 韩国派人入秦修郑国渠	405
第五节 郑国渠在后世的泥沙沉积问题	408
第三十五章 秦国击败五国联军后发兵攻赵	410
第一节 赵国挫败燕国入侵后领导诸国抗秦	410
第二节 联军攻入关中后在秦军反击下败退	411
第三节 蒙骜和成蛟率秦军分兵进攻赵国	413
第四节 王翦攻克阨与并将赵国势力逐出上党	416
第三十六章 李牧二却秦军与赵国的灭亡	418
第一节 赵国调李牧边防军南下回援邯郸	418
第二节 李牧在宜安之战中击败秦军	420
第三节 李牧在番吾再次击败秦军	423
第四节 秦国趁赵国天灾之年出兵灭赵	425
第五节 楚魏忙于争斗无暇援助赵国	427
第六节 赵国放弃退守滹沱河以北的方案	428
第三十七章 秦国攻占燕国核心区和灭魏国	431
第一节 荆轲以恒嶠首级和督亢之地为礼入秦	431
第二节 秦国为报复荆轲刺秦攻燕并灭魏	433
第三十八章 秦国攻灭楚国和燕代齐三国	436

第一节 李信率秦军攻入楚国淮北	436
第二节 秦军从淮南北上平叛时败于楚军	438
第三节 王翦率秦军在蕲地消灭楚军主力	441
第四节 秦军破寿春后追歼楚国残余势力	443
第五节 秦军攻灭燕代两国和齐国	445

第一章 三晋在山西高原的势力范围

第一节 三家分晋局面形成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但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基本都知道“战国七雄”的概念。而战国时代的这七个强国中，魏、赵、韩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如果你再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对于“晋国六卿”这个概念也应当不会陌生。因为在晋国最终被三大家族分裂之前，晋国的国政长时间是被六大家族所掌控的。而晋国之所以会形成六大家族的格局，始于那位老来称霸的“晋文公”，他所创立的“六卿”制，为日后晋国内部分裂的地缘格局埋下了隐患。其实这也不能怪晋文公，六卿制度设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分权。只不过晋国的地缘格局实在有些复杂，这些卿族世家最后都独立出了自己的一片空间也实属无奈。

“晋国六卿”一开始只是个政治概念，至于是谁任职这些高位，其实是不固定的。只不过华夏族也好，中央之国也罢，实际都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而当这些单个家庭繁衍到一定程度时，就形成了庞大的家族。这些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亦希望他们所获得的利益，能够因由血缘的关系而传承下去。这种情况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改观，比如我们经常能够在一些地方中看到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共事于同一个政府部门的情况。并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庸碌之辈，但他们能够获得比旁人更多、更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机会”。

晋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演变为“六大家族”了。这六大家族分别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而这六大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晋文公所创的是“六卿”制度，就满足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着残酷的博弈。事实上这种政治博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记载政治斗争的历史，也是众多历史爱好者及影视剧编导们所热衷的题材，一般而言这并不会成为我们所感兴趣的话题。之所以在这里要提到“晋国六卿”的概念，是因为在周王朝没有完全覆灭之时，或者说中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之前，“封建”制度仍然是政治主流。而相比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封建制度下的政治斗争，很容易连带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因为就像诸侯们从王室那里分封到土地一样，卿族大夫们也从各自的君主（或称“公室”）那里分封到土地。你在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直接影响了你家族的生存空间。

对于晋国内部繁杂的政治斗争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深入研究一下。基本的脉络是六卿变四卿，即中行氏、范氏先被灭，然后是魏、赵、韩三家联手攻灭了智氏。关于春秋战国时代应该从什么时候分界，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之前我们也分析过，正式的分法应该从魏、赵、韩三国的诸侯地位，被王室承认那年算起（公元前403年），

否则所谓的“战国七雄”就无从谈起。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官方”的任命，并不总是和现实合拍的。在群雄并起的年代里，各政治力量往往都是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后，再去关注面子的问题。那些在春秋中称霸的诸侯们也只会真的形成称霸的局面后，才会去会盟诸侯，并谋求王室的承认。只有那位以“仁义”为上的宋襄公才会去尝试在自己的实力尚未达到之时，便去走会盟的形式，希望大家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结果当然是自取其辱。

因此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看，魏、赵、韩三家在联手攻灭智氏之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的局面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智氏和之前的中行氏、范氏一样，在失败之后失去的不仅仅是政治地位，更是土地。没有人会坐以待毙的，因此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体现出来的，而结果则是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了公元前437年，晋国公室最后的土地也被三家瓜分干净了。只不过暂时谁也不愿意承担灭晋之祀的罪名，还是为晋国的公室保留了“絳”、“曲沃”两座城邑，并且公室反过来要奉三家为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三家分晋基本算是完成了。如果将这一年看成是战国时代的实际开启年，也算合理。

我曾经非常想还原出“晋国六卿”以及“三家分晋”之初的地缘格局，但后来发现，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在当时，国家的形式还是以点为主，即以控制城邑为主，点与点之间暂时还没有条件连成一片。而这些家族在晋国所受封的城邑，经历过上百年的积累过程，并不一定会局限于某一个地理单元。也就是说，他们所控制的土地是犬牙交错的。即使是在六卿演变成为三大家族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很难用一条国境线，准确的划出魏、赵、韩的地理分割线。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缘格局，显然是不符合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律的。如果没有稳定的联成一片国土，谁都不会感到真正的安全。因此三晋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就是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这个磨合的过程，既有战争，也有和平的交换。根据自身在三家分晋之初所占据的地缘位置，魏赵韩三家也或主动，或被动的确定了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或者说是将哪个地理单元，划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第二节 三晋在山西高原的扩张区

鉴于三晋最后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山西高原的范围，因此我们会分片解读三晋是如何分别分割这些大的地理单元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魏、赵、韩三国是如何瓜分晋国在山西高原的土地。前面说过，如果要想将三晋在分立之初所占据的城邑完整的标示出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三个国家的初都处，以及他们在战国后期所形成的地缘格局，可以看出他们的主要扩张方向。

正如所有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一样，适合耕种的平原地区永远都是争夺的重点。因此在三家分晋之后，三个曾经的盟友都选择了自认为最有利自己发展



三晋主要扩张区示意图（山西高原）

展自己的空间。不过有一个问题是，临汾——运城两大盆地虽然分割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但实际上这两个地理单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在春秋部分关于晋国的章节中已经解读过了。也就是说，既然晋国最终将临汾——运城两盆地融为一体，并成为晋国的核心区，那么理论上存在的两个山头，实际上被合为一座天王山了（也就是“河东之地”）。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韩、魏两国势必有一家要被挤出河东之地。

纵观先秦的历史，并非所有的地缘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就好像大家所熟知的“一山不容二虎”这句俗语，其实还有一句少有人知的后话，叫作“除非一公和一母”一样。只可惜韩魏两国都是经历过晋国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而生存下来的强者，并没有一方愿意像当年的“申戎”一样，仅仅满足于把持周王室的选后权，并以此为前提甘为对方所驱使。最终的结果是魏国获得了河东之地的控制权，而韩国则被迫将他们的政治中心迁往别处。

如果晋国不是三分天下，而是由韩魏两国平分秋色的话，那么韩国人很可能会向北占据太原盆地，并将晋北的忻定盆地、大同盆地作为扩张的方向。不过可惜的是，

的城邑作为都城。其中魏国的政治中心设在运城盆地的东部，与他们在中条山南部的初封地——魏地，隔中条山相望。在假途伐虢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魏国的这块初封地是因为晋国吞并了一个叫“魏”的小国而得到的；而韩国的先祖得到他们的初封地，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这片因韩原大战而闻名的土地，之前也是属于一个名叫“韩”的小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多么的怀旧，这些国名在转换为地名后，又被它的新主人重新变为国名。

韩国在独立之后的新都城设立在临汾盆地的中部，叫作“平阳”，与位于临汾盆地西部的韩原遥相呼应。如此看来，韩国似乎对临汾盆地情有独钟，而魏国则更应该在运城盆地拓展自己的空间。

那三个盆地已经被赵国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赵国的先祖赵夙与魏国的先祖毕万是同时受封的。时间都是在曲沃代翼之后，晋国大举吞并河东诸侯之时。将吞并的土地奖赏给有功之臣，是分封制的一种体现。赵人所得到的土地就在韩原附近，那里原来属于一个叫“耿”的小国。不过与魏韩两国有所不同的是，赵人并没以“耿”作为自己的国号；更为重要的是，赵氏子孙也没有将临汾——运城两盆地所构成的河东之地，作为自己的扩张方向。而是选择做一个开拓者，将目光锁定在山西高原的北部。

如果说韩国最终退出了河东之地是因为魏国压力的话，那么赵国则是在六卿尚存之时，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扩张方向。那位真正为赵国的独立奠定了基础的赵简子，在公元 497 年之前所筑的晋阳城就在现在的太原一带，而筑此城的目的就是为了远离政治博弈的主战场：临汾——运城盆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晋阳邑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晋阳在太原盆地的北端，或者说是处在忻定盆地与太原盆地的相接之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左右逢源，将忻定盆地与太原盆地融合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赵氏的这个选择，无疑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而晋阳城在筑成后不久，也帮助赵氏族人们经受了两次大的战役。一次是公元前 497 年，中行氏、范氏联手赵氏在邯郸的小宗（邯郸氏，又是一个想做大家长的“曲沃桓叔”），对晋阳城发起的进攻。这次战役的最终结果是赵氏联合了智、魏、韩三家，反过来灭掉了中行氏和范氏，而赵氏内部的大小宗之争自然也平息了。这次战役除了让晋国的政治舞台上少了两个竞争对手之外，也让赵国在今后的地缘整合中，将重点放在让自己在太行山两侧的土地连成一片（否则赵国孤悬于河北平原上的领地就算不被人吞并，也很有可能再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晋阳城所面临的第二次考验，和第一次如出一辙。这一次是智氏联合魏、韩两氏，欲灭赵氏。后来发生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赵国反过来策动魏、韩两氏共同灭了智氏，而晋国的政治洗牌也就此终结。接下来的事，就是魏、赵、韩三国如何将瓜分得来的土地和重新组合了，以让三国的控制区能够最大限度的连成一片。对于晋阳城的位置还需要说明一下，主要是百度百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对于一些认定百度为权威的人，可能会有所误会。赵人所筑的晋阳城位置在现在太原市的西南。或者说现在太原市的主城区是在汾水的东侧，而赵人所筑古晋阳城在汾水的西侧（现在的太原市晋源区一带，著名的晋祠就在这一区域）。

不过也有人认为晋阳是在现在的永济市一带，也就是运城盆地的西南部（如果你在百度百科中寻找答案，就会找到这样的结果），所依据的理由是秦国在与魏国的战争中，从魏国手中夺取了一个“晋阳”邑（公元前 319 年）。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古典时期，一名多地的现象很普遍。赵国初都的晋阳城的确是在太原西南部，否则秦人决不会直到公元前 246 年才攻克晋阳。更为重要的是，赵人如果不将政治中心移至山西北部，他们在北方的扩张行动将无所支撑（政治中



晋阳城位置图



山西地形图

心总是要放在最需要集中人力物力的地方的)。

如果我们将山西高原由南至北按照地缘关系作一个划分的话，我们首先可以将临汾——运城两盆地视作一个战略区。按照方位来看，这个战略区属于“晋南”。在华夏族以黄河下游作为扩张对象时，晋南地区是中央之国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也是山西高原的地缘核心。而当华夏族开始向北扩张后，山西高原中部的另外两个盆地：太原盆地、忻定盆地，又可以划分一个战略区，即为“晋中”。这两个盆地之间的关系与临汾——运城盆地类似，而当年赵人将政治中心设在二者的连接处，更是让晋中地区能够以一个整体形象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

至于恒山山脉以北的大同盆地，或者说晋北地区，由于向北与蒙古高原之间没有连续的山脉作为切割线，向南又有横贯太行——吕梁山脉的恒山山脉作为屏障，因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大同盆地成为了农牧混合区。尤其是在华夏文明趋于保守的时期，帝国的统治者更愿意将更易于防守的恒山山脉作为主要的防线。当然，大同盆地最终还是成为了华夏核心圈的一部分。而最先做出这种尝试的，正是赵国。鉴于赵国在北方的扩张暂时还不至于与另外两个邻居发生冲突，我们还是先将目光转向山西高原的南部。因为在魏、赵两国瓜分完临汾、运

城、太原、忻定、大同，这五大盆地后，还有一片虽不丰腴，战略位置却极为重要的地区，没有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上党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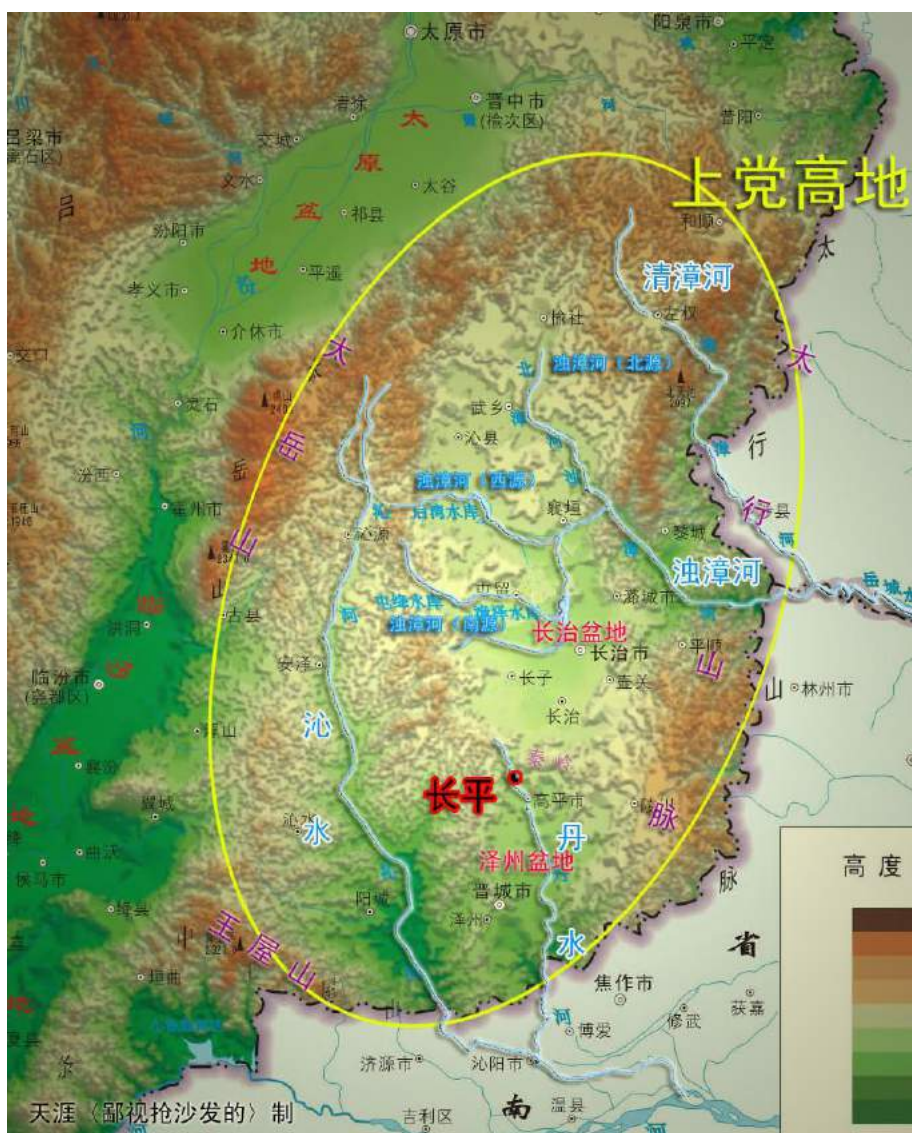
第三节 上党高地北部的地理结构

说“上党”的话，先来解释一下“上党”这个概念。如果你对先秦的历史略有所知的话，一般都会知道“上党”，因为秦赵“长平之战”就是发生在“上党”。相信即使由西方人来书写古代战争史的话，坑杀了40万赵卒的长平之战也会占据一席之地。而“上党”之名最初则是来源于它的地势。当我们沿太行——吕梁山脉之间在山西高原上穿行后，就会发现，除了呈线性排列的运城、临汾、太原、忻定、大同五大盆地之外，在山西高原的东南部还有一块地区，我们没有分析到。这块地区的特点就是群山环绕，整体地势较高，先秦之人甚至视其为“天下之脊”（相当于现在青藏高原“世界屋脊”的地位了），喻其“与天为党”，因此取名为“上党”。

上党的西部是太岳山脉，这条山脉和它南北延伸的余脉将上党地区与临汾——太原盆地切割开来；而它的东面，就是太行山的主脉了。如果能够穿越太行山，我们将进入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至于说上党地区南部的分割线，则是王屋山。在我们整体观察山西高原的地形时，我们会看到，中条山脉与太行山脉之间，有一段不算太长，但海拔甚高的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将二者联系起来，而黄河正好也在此有个向北的弯曲，与之呈平行状态，这段山脉就是王屋山。有的时候它会被认为是太行山主脉的一部分。不过最起码在那位意志力坚强的愚公看来，王屋、太行两山还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山体。在上党的北面，太岳山脉与太行山脉之间仍然是有一些连续的山体相连，只不过这部分山体没有被整体命名罢了。

按照一般的规律，上党高地这块被太行——太岳——王屋等山脉包围的地区，应该是一块拥有巨大潜力的大型盆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所谓“上党盆地”的体量差不多可以等同于其他几大盆地之和了。在这种情况下，“上党”将更有可能成为山西高原的地缘中心。可惜的是，目前我们还只能将这片群山环绕的地区称之为“上党高地”，而不是上党盆地，或上党平原。因为地球之下的力量和河流的冲刷，还没有将上述这些山脉延伸至上党高地的山地修理平整。也就是说，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翻越大山进入上党地区后，都仍将面对大片的山地。在古人看来，穿越这片高地的难度，并不比我们使用现代交通工具穿越青藏高原的难度低。

说实话，就整个上党高地的地理结构而言，并不是一块特别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地区。因此上党最为出名的农产品是一种生长于山地之中的药材——党参。从药名我们也可以看出，党参最初为人类所利用，即是在上党地区。当然，上党高地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平整之地。这些山脉在向中心点延伸之后，总会在它们的最低点处相会，而流淌在这些山脉之间的河流，也有机会在上党高地的中间淤积出一些较



上党高地地理结构图

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北部的“漳河”流域（古称漳水）；另一块则是南部的“沁河”流域（古称沁水）。我们先来说说漳河。从体量上来看，漳河流域的面积要更大些。漳水在下游的河北平原之上，也发挥了重要的地缘作用。而漳水在整个上党地区的上游水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河流，而是呈伞状分布。主要的源头有两支，北支叫作“清漳水”，走向是沿着上党高地的东北部山地流过，然后在穿越太行山脉之前，与南支汇合成为“漳水”并流入华北平原，最终注入黄河（古）。

清漳水由于基本都是在山地中穿行，因此受关注度并不如它南面的兄弟高。因为与清漳水不同的是，漳水的南支——浊漳水则孕育出了上党高地的地缘中心——长治盆地。顾名思义，长治盆地的得名是因为设立于它上面的行政中心是“长治市”，而在唐代，这一地区曾经被叫作“潞州”。其实每一个王朝统治者都有权利按他的意思为一个行政区命名。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长治盆地会成为上党高地的地缘中心。

为平整的土地。

我们知道，平原的诞生一般都是与河流有着密切关系的。在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时，那些发源于高山之上的河流，就已经不断的将山地之上的土壤向低海拔地区输送，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冲积平原；而当人类开始生存在这些平原之上时，这些河流又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水源。因此在研究任何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理单元时，我们都要观察它的河流分布情况。

如果以河流来划分整个上党高地的话，可以由北至南划



长治市与晋城市行政区

成为地缘中心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长治地区有较为平整的土地，充足的水源，可以为人类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提供地理基础。长治盆地之所以有相对平整的地形，同浊漳水是分不开的。与清漳水孤独的在山地中流淌有所不同，浊漳水在长治盆地中由北至南又分为了三支，即为北、西、南三源。长治盆地也正是在这三个支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浊漳水也因此成为了长治的母亲河。

由于长治盆地是上党高地中体量最大的盆地，因此它有时也被称之为“上党盆地”。不过如果让长治地区独享“上党”之名，相信最起码有一个地区会跳出来反对，那就是位于长治之南的“晋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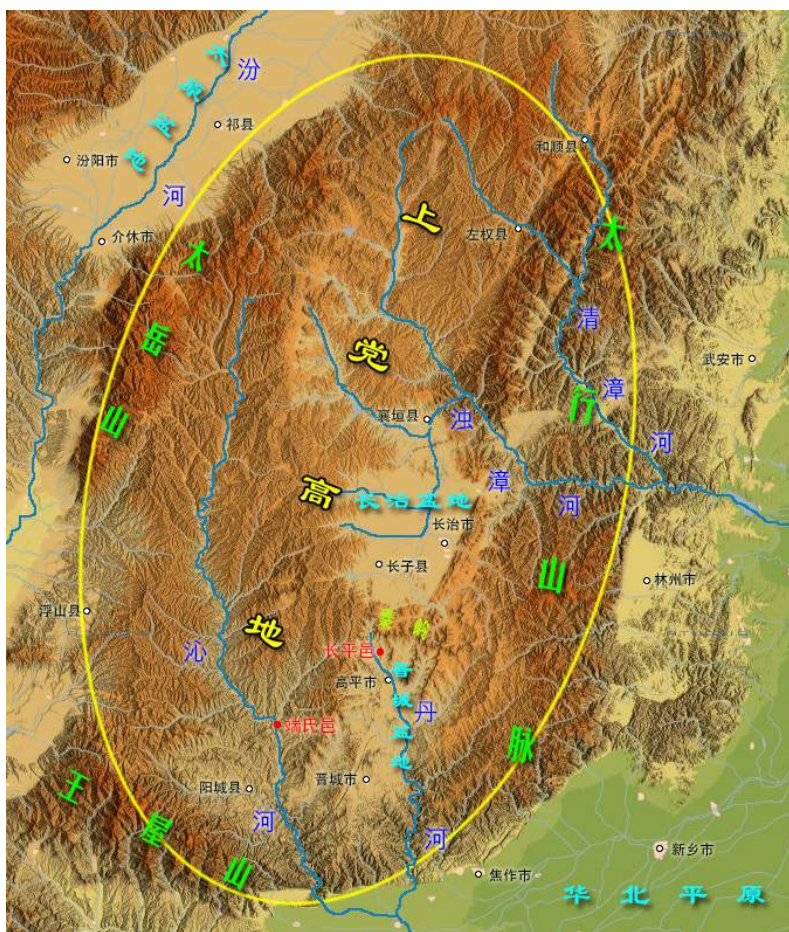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从山西的行政区划中看出些端倪，尽管说行政区的设立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地理结构来划分，但地理结构及由此而引发的地缘文化的差异，无疑是行政区划的重要参照。如果单从行政划分来看，整个上党高地，大部分是由北部的长治地区和南部的晋城地区所占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行政划分的地缘基础是什么。

第四节 上党高地南部的地理结构

清、浊两条漳水虽然覆盖了上党高地大约 $\frac{3}{5}$ 的地区，但它们并不是上党高地的全部水系。也就是说上党高地还有 $\frac{2}{5}$ 的土地，是由其它的河流滋润的。如果按照这些河流在上党高地的分布情况来看，流经上党高地南部（也就是晋城地区）的河流主要有两条：丹河和沁河。当然，按照早期的命名方法，它们是被称之为“丹水”和“沁水”的。

实际上丹、沁两水是属于同一水系，因为它们在向南穿越太行——王屋两山之间，进入河北平原后合二为一了。而由于沁水的水量更大些，因此合流之后的下游河水仍然被称之为“沁水”，并注入黄河。从这个角度看，丹水也就被划为了沁河的支流。不过如果参照漳水的情况，合流之前的沁水与丹水，更应该被看作沁水的两个共同

支流。或许将之命名为西沁水、东沁水更易于我们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怎么命名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只要大家理解上党盆地的北部是漳水的上游水系覆盖，而南部是由沁水的上游水系贯穿就行了。



上党高地地理结构图

与清、浊两漳水有所不同的是，沁、丹两水在南北贯穿南上党高地时，对周边土地的影响并没有出现极端的差异。也就是说两条河水在上党高地中，都冲刷出了一片谷地。只不过相比之下，丹水所处的盆地体量要更大些，因此也就成为了南上党的地缘中心。

晋城市就是设立在丹水谷地之中的，所以这片谷地也被称之为“晋城盆地”。在晋城市的东北侧有一个县叫作“泽州”。在唐朝前后的历史中，泽州之名也是这片盆地的行政名称，因此晋城盆地也被叫作“泽州盆地”，丹水也被叫作“泽水”。据说改名叫丹水，是因为秦军在丹水之侧屠杀了四十余万赵军，河水都被染红了。其实这个传说未必准确，但长平之战的地点的确是在丹水的源头处。我个人一直不太相信四十万赵军是被活埋的，因为秦军的战功是以首级论的。在商鞅所设立的“二十等军功爵位制”中，只需斩获敌军“甲士”首级一个，即可有房一处，地一顷，外加仆人一个。四十万颗人头，意味着多大财富是不言而喻的。

既然长治、晋城是南北相连的两个盆地，那么它们当中应当有一片山地，作为地理分割线。如果我们在《上党高地地理结构图》上寻找的话，就会在丹水的源头处找到一条小山岭。这条体量很小的山岭就是二者的分水岭，北面则是浊漳水流域的“长治盆地”，南面则是丹水流域的“晋城盆地”（图上标注为“泽州盆地”）。而这条小山岭的南侧，就是长平之战的发生地点。由于这条小山岭的体量过小，我们在现有的地图上很难找到它的官方名称。但由于它曾经在长平之战中为秦军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些史料中也被称之为“秦岭”。非常巧合的是，在渭



上党高地南部地理结构图



唐代河东道地图

河南侧的秦岭中，也发源了一条丹水。那条现在被称之为“丹江”的河流更为知名，因为它是连接渭河平原与南阳盆地的重要通道（丹江通道在之前曾经分析过）。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沁水谷地。这片谷地的行政中心现在是阳城县，辖于晋城市。其实在战国时期沁水地区的地缘中心在阳城县东北方向的“端氏”（目前为镇级单位）。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阳城地区当时还是一片湖泽，阳城县址所在地在先秦时曾经叫“濩泽”。我们知道，凡是叫泽的地方最早都是湿地，不过这些湿地一旦被开发为耕地后，往往就会成为该地区新的地缘中心（云梦泽完全消失后诞生的“武汉”三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关于“端氏”，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在魏、赵、韩三家彻底瓜分完晋国的土地后（也就是绛都、曲沃那点地了），晋国最后的君主最终被迁至端氏。无论如何，直接杀掉一个君主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将这些末代君主放在一个四面封闭，而又没有太大潜力的地方等死，是最好的选择。当年越王勾践就曾经给吴王夫差同样的选择，只不过这位曾经的

霸主选择了将他的生命留在了吴都，这种结局虽然有些凄凉，但亦不失为一个英雄的选择。晋国公室被迁往端氏的时间是公元前369年。二十年后，晋国的末代君主“晋静公”在赵韩两国的战争中还是被等不及的韩国人所杀，晋国从此绝祀。

我们可以将阳城附近的沁水流域称之为“阳城盆地”，并与长治、晋城两盆地并列为上党三大盆地，或者说是广义的“上党盆地”。不过说实话，沁河谷地其实还是以山地为主，那些错落分布的山地使得沁河两岸（上党高地部分）基本没有大

片连贯的平原。因此南上党的地缘中心一直是位置和地理结构都相对较好的晋城盆地。

其实即使是地理条件相对最好的长治盆地，也无法与山西高原上其他几个大型盆地相比。特别是无论 you 从哪个方向进入上党高地的地缘中心：长治——晋城地区时，都需要穿越大片的山地。不过上党高地更大的价值在它的位置，当你想从太原——临汾——运城三个地缘位置最为重要的盆地，越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时，上党高地都是必经之路。这些道路一共有五条，除掉南北两条道路是沿着上党高地的外缘前进之外，有三条是直接经过上党高地。如果晋国和之后的三晋不想向华北平原乃至中原扩张的话，也许他们会选择放弃上党高地，但当他们将东进作为战略方向后，上党高地就成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巨大障碍了。

正是由于上党高地具有如此之高的战略价值，加上又有几块盆地作为地缘支撑，因此在魏、赵两国将西、北部几个条件较好的盆地定为势力范围后，韩国则将上党高地作为了自己在山西高原的主要根据地。因此韩国在三家分晋之初，得到了上党高地的大部分城邑。只可惜由于上党高地的枢纽作用对于魏、赵两国同样重要，所以韩国希望独占上党高地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而这其中又以赵国的反对最为强烈，因此在《三晋主要扩张区示意图》中，上党高地也被列为“韩赵争夺区”。

上党高地的战略作用主要是在“路”上，因此在分析完上党高地的基本地理结构后，我们会着重把上党高地的主要路径，特别是穿越太行山的路径解读一下。其实研究地缘结构的重点，即在“山、水、原（平原）、路”之上。因山而有水，因水而有原，要想连接这些平原又需要有路，而这些道路往往又与河流紧密相连。理清了这些地理关系，我们就可以无视地图上那些不断变化的行政名称了。因为在地理结构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今人和古人的选择并不会有质的分别。

不过要想解读道路，我们首先要清楚这些道路通往何方。对于上党高地的道路而言，它们的终点是河北平原。因此我们接下来需要先关注一下河北平原在战国前期的地缘结构。或者说最起码要看一下魏、赵、韩三国，是如何瓜分晋国在河北平原上的土地的。

第二章 韩魏两国在南阳之地的地缘关系

第一节 晋国获得南阳之地的历史背景

要想知道三晋是如何瓜分晋国在河北平原的遗产，那还得先了解一下晋国得到这些土地的背景。在春秋晋文公称霸部分中，我们其实对这个问题提过一下，即晋文公是通过帮周王室平定内乱，而获封了河内、阳樊的土地。这其中的河内指的是以朝歌（河南淇县）为中心的卫国故地，如果再往前算的话，就是商朝的核心地区，即王畿所在。对于这片土地，我们在春秋卫国部分也已经多有描述，现在我们的目光要放在“阳樊”身上了。因为如果要划分地理单元的话，所谓“阳樊”是属于另外一个地理单元了。而这个地理单元，就是我们要解读的晋之“南阳”地。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河北平原的地形，就会发现，由于黄河（河水）在先秦之时的河道走的是北线，因此整个河北平原的形状并不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饱满，而是像一个牛角形的漏斗。无论是站在洛阳盆地的东周王室，还是通过崤函通道进入华北平原的晋国，他们最先接触到的都是这个漏斗在黄河北岸的尖上。从地理格局的角度看，这块与洛阳盆地隔河相望，呈不规则三角形的土地，正好处在太行山的南部，黄河的北部。按照“山南水北”为阳的命名方法，这是块彻彻底底的阳地。由于相对山西高原来说，这块土地是在南面，因此晋国人也就把这一地区称之为“南阳”之地。

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南阳”。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它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专有名称。即使是在我们的文中，这个城市所处的地理单元也是被命名为“南阳盆地”。但在先秦时期，由于地缘分割，诸侯林立，每一个政治体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所获得的土地命名。特别是当他们所遵循的是同一命名规则时，重名也就不可避免了。就像“南阳”这个名称一样，每个国家都可以把它南面属性为阳的土地命名为南阳。如果是在东面，也可以叫“东阳”。就像齐国在灭了“莱国”之后，就在其土地上设立了个“东阳”邑一样（因为莱国在临淄的东面）。

关于先秦这些诸侯们命名所造成的误会，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在这里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重点。之所以要解读一下“南阳”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标签来命名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这个地理单元。而在晋以及它的继承者三晋看来，“南阳”是最为合适的标签了。

如果结合现在的行政区划，为晋国的“南阳”之地划定一个大致范围的话，它应当与河南省的济源、焦作、新乡三个地区相对应。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阳樊”，是一个姬姓的小诸侯国，位于济源市的西南，也叫阳邑。其实南阳之地不仅是晋国渗透入河北平原的桥头堡，对于处在洛阳盆地的洛邑来说，也更为重要（当然，如

果以王室为中心命名的话，就不是“南阳”了）。

因此当年周王室在朝歌一带封建了“卫”这个大国后，实际上是将这片土地视为了自己的缓冲区。不仅直接在上面控制土地，还分封了一些小型的嫡系诸侯。与那些大国相比，这些小国基本上就是以城邑为中心，控制四周耕地的城市国家，自身很难对王室构成威胁。而晋国之所以指名向王室索要（表面是王室嘉奖）阳邑，是因为在此之前，阳樊的国君曾经公开叛周。晋国此举，最起码从表面上看有为王室分忧的想法，就像卫国已经被戎狄们赶走了，受封他们的故地也绝不会让晋国在道义上受到丝毫损失一样。从这个角度看，阳樊只不过是个由头罢了。晋国地缘扩张的目的，绝不仅仅在此一城一地，取得整个南阳之地的控制权，才是晋国东进战略的第一步。



晋之南阳示意图

以晋国的实力而言，无论是东周王室，还是那些小国，退出南阳之地都是迟早的事。可以提供佐证的是，晋国在迅速吞并阳樊之后，又对它旁边的“原国”下手了（现在济源市西）。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个“晋文公示信伐原”的典故，大致的意思就是晋文公伐原之前，为自己定了个十日之期，结果十天时间到了，原国还没攻下（不过再打几天就肯定攻下了），但晋文公为了示信于诸侯，决定主动退兵。尔后原人觉得这个老大不错，就主动投降了。这个故事在古时候经常被当作“以德服人”的典范，并由此将晋文公的形象树立得“高大全”。不过秀才们却忘记了一点，原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并没有主动去招惹晋人。晋人这么做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抢劫时，将刀收起，然后温情地让大家把钱交出来罢了。

晋国和晋文公的道德问题自有文人们去关心，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利益才是最

重要的。因此晋文公无论采取哪种手段为晋国扩张土地，都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晋国为王室平乱，灭阳樊、原国都是在同一年（公元前 635 年）。这似乎让人感觉到，晋国有点急不可耐。当然，对于一个 62 岁才继承君位，在位只有 9 年的国君来说，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为国家做点贡献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晋国急于将南阳之地收入囊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战略因素，就是晋国需要一条不必绕经崤山——洛阳盆地，就可以进入华北平原的快速通道。而这条通道的终点就是在现在的济源市西侧，也就是阳邑、原国所在地。这条快速通道就是太行八陉第一陉——轵关陉。

第二节 晋国征服戎狄获得轵关陉控制权

说到晋国对东进的渴望，在之前的“假途伐虢”一役中就已经显露无疑了。但问题是，这条道路最初其实并不是为山西高原进入河北平原设计的，而是一条为渭河平原东进中原开拓的通道。虽说晋国通过控制崤函通道（主要是取得了“陕地”，也就是南虢故地的控制权）成功的阻止了秦国东进的脚步，并逼迫秦穆公不得不以“称霸西戎”聊以自慰。但对于身在临汾——运城盆地的晋国来说，这条通道实际上有点绕圈子。且不说崤道有多么的凶险，单是需要两次渡河才能进入河北平原，就够让人头疼的了。

如果我们只看平面地图，会很容易发现，临汾——运城盆地与南阳之地及整个河北平原之间的直线距离，比绕经崤函通道要短得多，而且不用渡过黄河。只不过当我们把平面地图换成地形图的话，就会发现如果晋人想走捷径的话，他们最大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跨越巍巍太行山。应该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需要，再艰险的地方，人也能开辟出道路。太行山脉固然是难以逾越，但史前的造山运动，也为它留下了许多东西向的峡谷（横谷），这些峡谷除了为注入河北平原的河流提供通道以外，也为人类翻越太行山提供了可能。

只不过这些峡谷往往都是海拔上千米的断层岩壁，如果不用人力加以开凿，是无法通行的。不过对于晋人来说，暂时还不用为工程问题而烦恼，因为已经有“天神”帮忙将太行、王屋两山稍稍向北搬移了一点，使得王屋山与中条山脉之间让出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就是我们所要解读的“轵关陉”，而在传说中感动天神的人就是那位“愚公”。

“愚公移山”的故事，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故事了。太行——王屋两山当然不会真是天神帮忙搬动的，但这个故事的流传，却反映了山西高原南部的族群是多么渴望有一条直通河北平原的通道。我们很容易在地形图上看到这条快速通道的存在，毕竟中条——王屋两山之间的这条分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晋人来说，他们当然不用真的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或者是祈求天神帮助移



晋之南阳示意图

山开路。但当年晋文公要想带领晋军通过这条通道，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问题并非出在道路本身上，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身上。因为按照我们的划分，这还可以算是一条战略通道，即它的宽度可以保证生活于其中的族群有自给能力。只不过在通道的最东西两头，王屋——中条两山之间的距离又接近了。换句话说，你可以在

这条通道中建立城邑等聚落区，而不是仅仅构筑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当然，轹关道的这种两头窄，中间宽的地理格局，也使得在两头设立关隘成为可能性。在战国时期，通道的东头最窄处，被构筑了一道叫“轹关”的关隘，这条通道也因此被称之为轹关道。至于说这条道路的腹地，晋人在取得控制权后也建立了一个叫“垣”的城邑，现在你仍然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垣曲”的县级市，以及东西向分布的一系列乡镇。

在晋文公之前，轹关道中的这些山地当然还是被那些戎狄所控制的。对于那些戎狄，史家们当然不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记录他们的情况。我们更多的只能从他们与诸侯们的接触中，了解他们的情况。就轹关道中那些戎狄的情况，在晋国的历史中最少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晋献公曾派太子申生去征讨一支叫“东山皋落氏”的戎狄。而这支戎狄的居住地就是在轹关道上，现在我们在垣曲县城东侧还能找到“皋落乡”。

另一次则与晋文公有关了。我们前面说了，晋文公之所以能为晋国谋得河内、阳樊之地（只是一个正式授权罢了，真没有，晋国也一样要东进），是因为他们在秦国之前先到达洛邑，抢得了头功。而晋国之所以能在秦人到达之前就解决战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千辛万苦而打通的“崤函通道”，而是选择了轹关道这条快速通道到了南阳之地，然后渡过黄河到达洛邑。只不过这并不代表晋人就已经取得了轹关道的控制权，因为晋文公采用了一个非常“和谐”的手段来快速通过轹关道。这个手段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百试百灵，就是“行贿”。行贿的对象则被史家们记录为“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也许他们和那个“东山皋落氏”是一族的，反正史家们对于这些边缘民族的处理总是很随意的，我们永远无法搞清他们的命名规律。

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是几支不同的戎狄部落。因为之前晋献公之所以

要去征讨“东山皋落氏”，是受到了他新纳的美人“骊姬”的怂恿，理由当然是这支讨厌而又凶悍的戎狄经常袭扰晋人。而据有些史学研究者的推断，这位骊姬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所谓“丽土之戎”。就像那些华夏诸侯们经常相互攻伐一样，生活在一起的各戎狄部落也并非铁板一块。这位引发了“骊姬之乱”，并间接导致晋文公上台的美人，借晋人之手灭掉自己的仇家倒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上面这些内容，更应该是那些狗血的导演编剧感兴趣的话题。对我们而言，只需要知道最起码在晋文公继位之初，轹关道还不是在晋人的掌控之中就足够了。不过在晋人将轹关道东出口处的阳樊、原国给灭了后，轹关道中的戎狄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轹关道中求生了，等待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被融合或者迁移。一般认为晋国在城濮之战中，使用的就是轹关道。

不过我个人对晋国是否在城濮之战前就取得了轹关道的控制权表示怀疑（史书中没有记载了）。因为晋国灭原和灭阳樊之后的第三年，城濮之战就爆发了，晋人的注意力也一直是在河、济一带。这么短的时间，要想把这些为患晋国多年的戎狄消灭掉，的确时间上有点紧。当然，对于势力正盛，已经进入南阳之地的晋人来说，这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暂时不能武力征服，在城濮之战前，“银弹”或许能够再助晋人安全地通过轹关道。假使历史真的如此，那么之前的那张《城濮之战晋军行军路线图》的西段就要做些修改了。

通过上述这些内容，相信我们已经对于轹关道的战略地位有些直观的认识了。接下来我们将要分析，轹关道以及南阳之地在三家分晋之后处于谁的控制之下。到时另外两条重要的太行通道：太行陉和孟门陉（白陉）也将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第三节 太行陉和孟门陉在上党的路线

如果上党高地真的是一片不毛之地的话，那么晋人很可能在取得轹关陉的控制权后就满足了。因为这条快速通道足以满足晋人进入河北平原，入主中原的愿望了。问题是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上党高地虽然山高地贫，却也有长治、晋城两个盆地适合人类大规模聚居。而周边的那些山地，虽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有难度，但在那些小型的河谷中，却也活跃着不少戎狄部落。即使晋人看不上这些土地，这些戎狄们也会不断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河东之地、河北平原袭扰。

仅从南阳之地这个地理单元来看，就存在两条通往上党高地的路径。如果加上上党高地与中条山之间的轹关陉，就是三条路径，也就是太行八陉中的“南三陉”。对于晋人来说，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将上党高地收归晋国所有。由于晋国通过军事手段这根大棒与“和戎政策”这根胡萝卜，耗费了上百年的时间，基本控制了上党高地，因此，到三家分晋之时，魏赵韩三国已经可以将整个上党高地作为遗产分配了。而南三陉的控制权就不仅仅是确保南阳之地不受侵扰的问题了，除了在北方扩张的

赵国以外，魏韩两国都需要这些路径来连接自己在河北平原以及中原的土地。

对于魏韩两国而言，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在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都拥有大片的土地（在后面会分析魏韩两国在中原的地缘格局）。而如果想从魏国控制的河东之地和韩国为主的上党高地进入中原的话，南阳之地都是必经之地。也就是说，无论是谁完全掌握了这块土地，都势必会对另一国造成分割。因此魏韩两国之间的地缘矛盾，始终是围绕着南阳之地而进行的。在分析两国在南阳之地的博弈情况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那两条翻越太行山的路径到底是什么走向。

如果从大的地理格局来看，两条独立的山脉之间往往都存在着天然的路径，就像中条山与王屋山之间有轵关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致呈东西向的王屋山，与太行山之间也应该有通道才对。不过问题是，王屋山与太行山之间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如果不是王屋山走向与太行山脉有异，又有足够的高度来显示自己存在的话，我们甚至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分割线。事实上王屋山在很多时候也的确是被看作太行山脉主脉的一部分。如果要在二者之间寻找通道的话，那两条流经两山之间的沁水、丹水倒是不错的选择。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那样，沿着河流走，不仅不会犯方向性错误，也不必为水源发愁。

最终受到垂青的是丹水，这并非是说沁水两岸就一定不能修筑出道路。除了轵关陁以外，其余穿越太行山的通道，都需要在峡谷中穿行。很多道路都不得不开凿在石壁之上，而古人又不像我们一样，可以利用地球积累数千万年的资源。所有的工作都要依靠人力来做，因此一般会选取地缘价值更大的地方来修路。我们在上党高地一节也分析过了，相比沁水河谷来说，丹水两侧的晋城盆地，地理条件要好得多，是南上党地区的地缘中心。因此将之与南阳之地连接起来，会更有价值。至于说沁水河谷（或者说阳城盆地），自有与晋城盆地横向连接的道路，这条道路最终还将通往临汾盆地的“翼”都，以和晋国的政治中心相连。这条直接穿越太行山，将晋城盆地与南阳之地连接起来的通道被称之为“太行陁”，在太行八陁中排名第二。

太行陁其实并不是一条道路。这一点并不奇怪，人类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在同一区域对修建道路的路线做稍许调整。就像现在的许多道路其实就是沿着古代的驿道在修建，但又不一定会完全重合一样。而太行陁在穿越太行山脉分水岭的时候，其实也分成了两路，一路沿丹水前行被称之为“丹道”；另一路则在丹道的西侧，由于道路曲折，被称之为“羊肠坂道”，我们一般形容曲折的小路为“羊肠小路”就是来源于此。两条道路在穿越太行山，进入晋城盆地之后又合为一条了。因此后人将筑关的地点选定在太行山的北侧，而非分水岭处，所筑之关就叫“太行关”，后改称“天井关”。

并不能十分确定当时分得晋城盆地的韩国有没有在太行陁中筑关，抑或是选择丹道还是羊肠坂道作为进入南阳之地的道路（秦汉以后，肯定是以羊肠坂道为主）。但无论选择哪条支路进入河北平原，都会先到达丹水西岸，并最终行至沁、丹两水

相会之处。因此在这里构筑个城邑，以作战略控制就非常有必要了。这个城邑被称之为“野王”，也成为韩国所控制的“南阳之地”的地缘中心（大致位置就在现在的沁阳市）。



晋之南阳示意图

在三家分晋之后，“野王”及其以西地区基本都在韩国的控制之下。而魏国则占据了垣邑，控制了轹关道的腹地。这意味着，轹关陁的东出口及太行陁的全部，都在韩国的控制之下。魏国在河东、华北平原的土地实际上被韩国切割为两部分了。轹关陁和太行陁分别沟通不同的地理单元，前者是中原通往河东之地的快速通道，后者则是上党高地南入洛阳盆地以及中原的最佳通道。应该说，韩国通过控制沁阳以西的南阳之地，掌握了东西交通的枢纽。其实韩国在三家分晋之初，就将主要的方向定位于华北平原了。这固然是与魏国在河东的强势地位有关，但在韩国人自己看来，也许是棋高一着了。毕竟是否得中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与韩国人相比，魏国主要占据的是沁阳以东部分的南阳之地，而现在的焦作市以东至新乡部分则为卫国控制区。而由于韩国所控制的南阳之地实际上分割了魏国的国土，因此双方在此的博弈始终贯穿于战国时期。那么魏国所控制的区域中，是否还有穿越太行山的通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南阳之地的东头，还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就是南三陁的最后一条——孟门陁（也叫“白陁”）。与轹关陁、太行陁相比，你很难在现有的地图找到孟门陁的位置。因为这条路径在现在并没有成为沟通上党地区与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前两条都有国道和省级公路），而只在其旁修建了一条县级公路（叫黑毛沟公路，这个等级的公路，在一般的地图上是不显示的）。

孟门陁的基本路线是沿着一条叫“磨河”的河水前行的，在沿磨河峡谷北向穿

越太行山后，在到达晋城盆地东北部的陵川县后，再西向进入晋城盆地。至此，你可以西向穿过丹、沁两水最终到达临汾盆地；也可以北向迅速进入长治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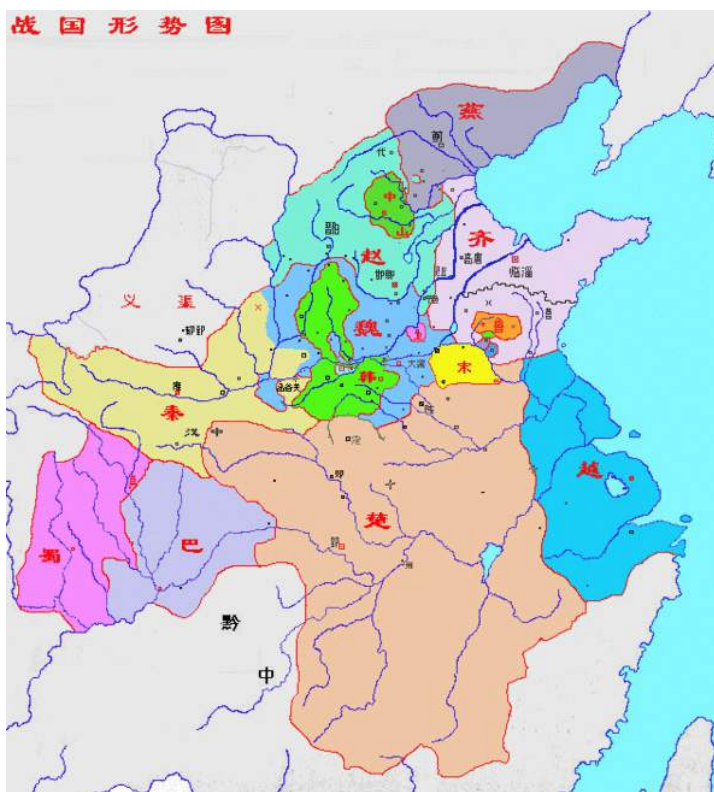
第四节 魏国东西部国土进行沟通的路径

关于魏国是如何沟通他们东西两块国土的，一直是一个困扰大家的难题。我们在很多的民间历史地图中，看到魏国的疆土呈“n”字型将韩国的国土包围在内。或者说是沿着上党高地的东北部向西北方向为魏国延伸了一条狭窄的国土至太原盆地，然后沿着太原盆地的东南部再延伸一条国土与临汾盆地相连。之所以会有很多研究战国历史的方家会画出这么一条怪异的曲线，可能是因为史书中记载魏国曾经分别与赵韩两国易地。在与赵国的交易中，魏国所换出的是榆次和阳邑两地（分别在现在的晋中市，太谷县）；而与韩国的交易中，则让韩国额外得到了高都、获泽两邑（现在的高都市，阳城县境内）。

魏国换给赵国的两邑位于太原盆地的西边缘；而换给韩国的两邑，则分别位于晋城盆地和阳城盆地之中。这很容易让人将其连成一片，并再从太原盆地向南与临汾盆地相连。这看似为魏国找到了一条连接东西国土的通道，但如果让政治家或军事家来选择的话，是很难将自己的国土安全系于这样漫长的山地通道中的。而仅凭这几个城邑，也很难将魏国的国土连成一片。事实上这几个城邑，对于魏国来说，

应该是深入对方腹地的“飞地”，因此它们最后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交换的筹码。

其实我们在三家分晋开篇已经分析过了，对于魏、赵、韩三国来说，在独立之初都存在犬牙交错的地缘情况。而后基于大家的卡位情况，分别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为了整合自己的势力范围，就需要交换出对方所需要的筹码。这种筹码可能是三家分晋之初，从另几家瓜分而来的土地；也有可能是在战争中从对方腹地中所侵占，而无法长期控制的土地。河东之地、太原盆地及其以北地区、上党高地，就是魏、赵、韩三国为自己确立的势力范



战国形势图

围。

魏国与赵国达成地缘平衡很好理解，因为大家的扩张方向暂时还不会有冲突之处（都是东西向）。而魏国之所以没有费力去与韩国人争夺上党高地的控制权，是因为对于魏国人来说，最为便捷的东西大通道就是轵关陁。如果我们观察一下魏国的初都“安邑”（今夏县），就会发现，从安邑出发，无论是南向越过中条山，从茅津渡渡河进入崤道；还是东向进入轵关陁都非常的方便。特别是轵关陁，魏国通过它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中原，与他们在中原的另一个都城“大梁”（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沟通。魏国在三家分晋之初就已经分得了轵关陁的腹地，唯一的障碍无非就是韩国所占据的南阳之地罢了。

而如果魏国人希望从华北平原通过孟门陁，经长治盆地进入太原盆地然后再进入临汾、运城盆地的话，实际上还是要穿越韩国甚至赵国的控制区，并且道路要艰险漫长得多。因此魏国才有所谓送出他们在上党高地的据点，以希望在韩之“南阳之地”打通一条通道。而基于实力的对比，即使魏国没有在韩国的南阳之地获得道路的所有权，其实也不会影响他们的通行权的。魏韩两国呈“X”型交叉的国土，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一种共生的生存状态。至于赵国，则更有机会将自己的国土连成一片，只不过这并非代表赵国就可以绕过魏韩两国，相反韩赵两国、魏赵两国在上党高地及河北平原进行了长期的地缘博弈。

晋文公当年向王室讨封的两块土地分别是阳樊、河内。前者我们已经解读过了，对应的其实是整个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土地，也就是所谓晋国的“南阳之地”。这块土地由于对于魏韩两国都非常重要，因此韩魏两国的控制区在其中犬牙交错。这其中占得先机的是韩国，其控制了沁阳及其以西地区。而经过战国前期的地缘博弈之后，魏国在将其在上党高地上的两个城邑“送”给韩国后，取得了轵关陁所对应的南阳之地的控制权。

如果按现有的行政区划看，就是济源地区及其以东的沿黄河北岸一线，被交换给了魏国（在战国时期，由于济源地区控制了轵关陁的出口，因此在上面所构筑的城邑被称之为“轵邑”）。在交出轵邑后，韩国的国土实际上是被魏国切割的。也就是说韩国在上党高地上的国土在与黄河以南的国土沟通时，实际上是要穿越魏国的控制区。而韩国人之所以愿意做这笔交易，是因为可以额外获得魏国在上党高地上的两个据点（高都、获泽）。之所以说这两个城邑是送给韩国的，是因为韩国还从魏国在河济平原的控制区中，为他们在南阳之地所失去的土地获得了补偿。

能够控制整个上党高地，尤其是长治、晋城、阳城三个盆地，是韩国一直想做到的。在魏国交出在上党高地的城邑后，韩国实际上也基本控制了这三个盆地，唯一对此表示不满的就只有赵国了。因为赵国也需要部分的上党高地，以保持它国土的完整性。

当然，韩国也没有完全放弃南阳之地。因为尽管韩国人并不担心魏国会不给他通行权（就像当年他们也让魏国通行一样），但如果不在南阳之地，特别是太行陁

的出口处保留一块土地的话，韩国所占据的上党高地是很容易被孤立的（封堵住山口并不需要多少兵力）。因此控制太行陉出口的“野王”（沁阳）还是掌握在韩国手中。由于“野王”邑的所有权牵扯到韩国的核心利益，如果其他国家企图控制它，势必会引起韩国的强烈反弹，除非你有足够的实力吞并韩国。因此这项任务最终没有由魏国，而是由吞并六国的秦国来完成。

第三章 魏国和赵国在河内的地缘关系

第一节 魏国和赵国以漳水为地缘分割线

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河内”地又是什么情况。关于“河内”这个地缘概念，最早指的是以朝歌（商朝都城，现河南淇县）为中心，北至安阳，南至新乡的这一区域。也就是商王室的直接控制区和后来卫国的核心区。再后来魏国人将他们在河北平原所控制的土地都称之为“河内”。现在这个概念甚至被扩展为整个河北平原的名称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古人的地理概念经常是比较混乱的，这也让很多喜欢在故纸堆中寻找依据的人感到头疼。关于河内的概念到底到怎么算，没有必要去深究。我们只需知道，从地理单元的划分来看，我们所要分析的这片区域是位于南阳之地的北侧，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南部）就行了。在这一区域中，已经没有韩国什么事了，魏赵两国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要分析魏赵两国在河北平原的势力范围，有两个城邑相信可以作为大家所熟知的地标，一个是邯郸，另一个就是“邺”。前者之所以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邯郸”之名一直叫了两千多年，直到现在仍然是河北省的重要城市。而在战国时期，邯郸城则是以赵国都城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实邯郸城在三家分晋之前，就已经是赵氏在华北平原的重要据点了。公元前497年，据此的赵氏小宗“邯郸氏”，曾经联合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进攻晋阳城的赵氏大宗（赵简子赵鞅）。战争的结果是，赵氏联合了智、魏、韩三家反过来灭掉了范氏、中行氏，并清理了门户。

而“邺”的名气则要到三国时才达到顶峰，对《三国演义》多少有些了解的应该都知道曹操筑铜雀台的事。这座被传为准备“锁二乔”的高台，就是筑于“邺”城。不过在“邺”地筑城，曹操肯定不是第一个，因为在战国时期，魏国就已经在此筑城了。而邺之所以能够名留青史，除了曹操以外，那位在战国初期，被魏国派驻于“邺”城的“西门豹”也做出了卓越贡献。而“西门豹治邺”的故事，相信我们在小学课本中就已经熟读过了。

现在“邺”城故址属于河北省临漳县所辖，位置在漳河以北。不过在战国时期，它却是在漳水以南。迁移的并非城邑的绝对位置，而是漳水的河道。在平原地区流淌的河流都是这样的，总是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地改道。而这条由上党高地中“清”、“浊”两水共同汇集而成的“漳水”，就是赵、魏两国在河北平原之上的地缘分割线。也就是说，“邺”城是魏国的边邑，在如此重要的地区，肯定是要派驻一位铁腕人物才能压得住阵角，那几位巫婆、长老被丢到漳水里去喂鱼也是活该倒霉了。当然，西门豹治邺的成功绝不是仅仅破除封建迷信这么简单。他对于漳河南岸的魏国土地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开挖了十二条水渠，使得农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为魏国稳定



魏赵地缘关系示意图（河北平原）

了边境。

对于像漳水这样大流量的河流来说，从来都是让人又爱又恨的。爱它，是因为需要依靠它来灌溉农田；恨它，是因为总是要防备洪水的侵扰。而能够更好控制河流的族群，就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当年因治水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大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之间的土地兼并越来越厉害，各地理单元往往能够独立控制在一个政治体手中，这也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可能。除了挖渠以灌溉农田以外，筑坝以防洪水侵袭也成为常态。并不十分清楚，魏国有没有在漳水南岸筑堤，但赵国肯定是在漳水北岸构筑了堤坝的。而

这些防水用的大堤，不久之后又将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了。

当战国列强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时，原有的以城邑为重心，控制国土的战略已经不适合地缘结构的变化了。各诸侯国之间都开始不得不控制道路，以保证自己的国土免受敌国的进攻。理论上，如果你所处的地理单元是群山环绕的话，那么你在那些穿行于山谷的要道中构筑一道关隘就可以了（比如函谷关）。不过有时候，你并不能保证那些常用的道路周边，有没有可能开辟出新的道路（我们经常会在战争故事中，听到某支军队在一个采药的山民带领下，从小路抄了敌军后路的案例），因此依托地形构筑一道连续的城墙就成为最保险的防御方案了。这种防御体系，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长城”。

在我们的印象中，长城一般都是修建于山脉的分水岭上（很大程度是因为八达岭长城已经成为长城的代言）。的确，依托山势构筑长城是最为常见的方式。这种类型的长城，不仅能够全面切断敌军的进攻路线，更能够成为各个隘口驻军的交通线。问题是当诸侯们也希望用长城来进行保卫它们在华北平原之上的国土时，他们就不可能指望借助山势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有将目光投向另一种显著的地理特征——河流。

河流作为大平原地区的地缘分割线是很好理解的，毕竟这些河流的存在影响了河流两岸的地缘沟通，为两岸出现不同的地缘文化和政治体提供了可能（河流越宽，越难渡，这种影响就越明显）。而正如你无法全面考虑到山脉中小路的存在一样，

在常用的渡口以外，也存在一些可供临时使用的渡口（如枯水期不能使用，丰水期可以渡）。因此沿着起地缘分割线的大江大河构筑长城，成为华北平原诸侯们的共识。

当华北平原上的诸侯们觉得光凭河流无法保证自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先前为防洪水而沿河岸所筑的堤坝便是“天然”的长城。只要再稍加改造（如加个有防水性质的城门，在堤上筑敌楼等等），就可以达到防御作用。而且这种临水的长城，与那些城墙外有护城河的城邑，具有同等的防御力。并不十分确定是谁先想到这个一物多用的点子的，不过燕、齐、赵、魏等国都曾经用过这种方法来打造自己的防御体系。只不过河流的分割作用毕竟要远低于山脉，而华北平原作为一个大的地理单元，最终被统一在一个政治体之内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秦国吞并六国之后，这些纵横于华北平原之上的“河堤长城”也都被拆除了。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能够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长城，就是那些蜿蜒于农牧分界线上，大多依山而建的长城了。

赵国沿漳水一线构筑长城，已经是战国中期的事情了（赵肃侯时期，约公元前333年）。而在此之前，魏赵二国在河北平原虽然大致已经以漳水为地缘分割线，但赵国却有一块特殊的土地延伸到漳水之南，让魏国如鲠在喉。最终魏国不得不以放弃在太原盆地的据点为代价，换得了这块土地的控制权。这片土地就是我们要分析的对象——中牟。

第二节 中牟邑位处漳水以南的林州盆地

“中牟”这个地名，对于河南的人来说应该不会陌生，这是位于郑州和开封两市中间的一个县级单位。在“郑汴（开封）一体化”的过程中，中牟在中原的地缘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过我们这节所说的“中牟”并不在“河南”，而是在“河北”。这里所说的“河南”、“河北”并不是现有的行政概念，而是一个真正的方位划分（即黄河之南、之北）。因为无论是按现在黄河的走向，还是先秦的河水流向，“中牟”都是在河北平原之上的。

之所以要将“中牟”单独拉出来解读，主要是因为赵国在从太原盆地的“晋阳”，迁都河北平原的“邯郸”之前，曾经还有一个都城就是“中牟”。而相比于赵国的其他两个都城，中牟的名气要小得多，以至于直到现在关于它的具体位置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可以从史料中分析出中牟的大致位置，即位于邯郸的南面，是伸入魏地的一块突出部，另外旁边有山，谓之“牟山”。按照这样一个方位，以及古代某些文人的推理，现在有专家推断赵都“中牟”的位置应当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面（这也是你在网上可以找到的标准答案）。大家也可以在诸多的民间战国地图中（中前期），看到赵魏两国在河北平原交界处，赵国有一个突出部在魏国境内，这个突出部画的就是“中牟”。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是否有优越的防御力是必须优先考虑的。如果不能

将都城建于自己的腹地当中，那么是否有足够好的地形可以依靠就更为重要了。就中牟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当初赵国得到中牟，是因为在四家联手消灭范氏，中行氏之后，所瓜分得的范氏土地。而赵国失去对中牟的控制权，则是在公元前 361 年“魏赵易地”之后。也就是说在长达 130 多年的时间内，赵国都一直能够保有对中牟的控制权。

当我们从防御的角度仔细观察鹤壁（西）位置的话，就会发现，赵人如果在这里建都的话，即使能够西靠太行山，但他们在面对东、南两个方向的魏国控制区时，是基本没有防御能力的。另外如果在鹤壁地区建都，赵国如何将中牟与邯郸及其以北地区连接起来也是一个大问题。并不是说在三晋当中，不存在深入对方腹地的飞地，相反，这在战国初期魏赵韩三国是很正常的事。但如果在处于对方完全包围的飞地中建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问题。

其实我们只要将视线从鹤壁市西面再稍稍向西转移一点，并结合地形图，就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理单元——林州盆地。而这个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小型盆地，才是真正的“中牟”所在。顾名思义，林州盆地现在的行政中心是叫“林州”市，而再往前推一点时间，是叫“林县”。相信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林县之名都不会

感到陌生，因为那条著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就是由林县人开凿出来的。而我之所以说这个盆地比较特别，是因为它的地理结构。

一般而言，山脉两侧的海拔都是逐级下降的，也就是呈坡状过渡到平原。而位于林州的这一段太行山主脉在分水岭的东侧却陡然开始下沉，在形成一块平原之后，再继续向东延续它的山势。也就是说，林州地区实际上可以看作太行山中的一块盆地（在中条山中也有块，



魏赵地缘关系示意图（河北平原）

不过规模比较小，就是虞国所在的“虞原”）。而由于林州盆地位于太行山的东麓，因此它东侧的山势要远低于西侧。这种地理结构使得林州盆地与河北平原乃至中原的沟通，要较之山西高原的交流通畅许多（所以现在隶属于河南，而不是山西）。而盆地的构造，又让占据它的政治体，能够依托山势建立足够坚固的防御体系。

赵国迁都中牟是在公元前 425 年。应该说，像所有的诸侯一样，赵国也非常希

望在华北平原开拓自己的领地。因此赵氏才会在瓜分范氏土地时拿“中牟”邑。而赵氏抢占中牟的另一个原因是，是因为他们在漳水以北已经有了邯郸这个据点。如果顺利的话，赵氏可以以邯郸——中牟为据点，向漳水以南的平原地带推进，最终将所有的卫国故地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赵国固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也必须考虑到其他两家的存在。如果赵国真的做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三晋之中的魏国，在河北平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战国前期，占据了河东之地的魏国，才更像是晋国的继承人，实力不仅在三晋之中居首，在整个战国诸雄中也是最强的国家。即使不考虑实力对比，按照公平原则瓜分晋国旧地，魏国也不可能不分得自己的份额，因此漳水以南的河北平原，是魏国所圈定的势力范围。

对于赵国来说，在战国初期定都中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战略防御方面的考虑。因为即使不考虑魏国向北扩张的欲望，滹沱河流域的鲜虞人（中山国及其附属部族）也是赵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在这种情况下，邯郸城的防御力就不如中牟了。不过赵国最后还是将都城迁往了邯郸（公元前 386 年），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魏国已经稳定了他们在漳水以南的控制区，而韩国也已经在上党高地取得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牟实际上已经接近处于“O”形包围之中，仅凭有限的通道与赵国的其他地区相连；二是中山国已经被魏国所灭（后面会有解读）。而赵国的判断是，魏国无法长期越过赵国来保有对中山国故地的控制，也就是说中山国的遗产最终还是要由赵国来接收。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山国在赵国迁都后不久（公元前 380 年前后）复国了。而后已经不复当年之勇的中山国，最终还是亡于赵人之手。

既然中牟向四周已经没有扩张的余地了，那么赵国将都城迁往更有扩张潜力（还可向河济平原扩张），也经营更久的邯郸也就实属必然了。进攻与防御永远都是一对矛盾体，就像明朝的永乐皇帝将都城迁于北京，固然是有利于向北扩张，并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稳定北部边境。但就都城本身的安全而言，始终是减少了安全系数的。30 多年以后，赵国人也的确得到了教训，邯郸城被魏国攻陷（公元前 353 年，赵人被迫向北退守信都，即今邢台）。

两年之后，魏国虽然迫于各方的压力将邯郸还给了赵国，并重新与赵人达成联盟。但都城被攻破的情景还是让赵人深深地为邯郸城的防御力而担忧，而他们所想到的办法就是筑“长城”。公元前 333 年，沿漳水一线，以河堤为基础的“赵南长城”为赵国南境的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也正式将魏赵两国的地缘分割线定位于漳水。这条地缘分割线现在甚至大致成为河南河北两省的行政分割线。只不过河北省的范围要更向南一点，将整个漳河两岸包含在内了。不过如果当年河北省的领导们知道了曹操墓被划到了安阳（河南），他们一定后悔没有在分割平原省的时候，再多前进一步。

其实邯郸城被魏国攻破，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缘原因，就是在此之前，赵国的旧都“中牟”已经被交换给了魏国（公元前 361 年）。鉴于中牟已经深陷魏韩国两国

的包围之中，没有战略纵深可言，这种交换是可以理解的。而赵国所得到的土地我们在韩魏易地一节已经提过了，就是魏国在太原盆地东边缘的两个城邑——榆次和阳邑（现晋中、太谷）。这笔交易对于魏赵双方来说都是合适的，赵国因此稳定了他们在太原盆地的控制权；而魏国消除了漳水以南地区的地缘隐患。只是如果中牟不被交换给魏国的话，魏军在必须考虑侧翼安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攻入邯郸就成问题了。只能说，无论是中牟被交换给魏国，还是魏国最终不得不退出邯郸，都意味着在两个同等实力的国家之间，必要的地缘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节 中牟邑经羊肠坂道沟通上党

既然中牟和邯郸都先后成为赵国的都城，那么有一个问题是它们所必须面对的，那就是如何与赵国在山西高原北部的大本营进行沟通。要知道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中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交通便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它必须要有合适的通道与旧地相连，除非你愿意完全放弃以前的土地。而中牟所处的林州盆地和邯郸城，也的确都控制了一条通往山西高原的道路，只不过这两条道路都必须通过上党高地。所以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赵国一直不肯让韩国独霸上党高地；而韩国在秦军的进攻之下，第一个想到将自己控制下的“上党郡”交给赵国。

这两条通往上党高地的道路，一条就是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滏口陉（邯郸）；另一条则长期为人所忽视，名曰“羊肠坂道”（中牟）。需要注意的是，这条羊肠坂道并不是孟门陉中的羊肠坂道，而是修筑于“太行大峡谷”中（林州盆地西侧的太行山主脉之中）。但如果比较地形的话，后者显然更为形象。接下来的部分我们说说这两条道路是什么走向，又是如何左右了赵国的地缘格局。

我们先来说说中牟所在的林州盆地的交通问题。既然我们将之称为盆地，那么它的基本地形就是四面环山的了。之前我们也说了，林州盆地西面为太行山主脉，其他三面则是太行山东麓的延伸，因此相对而言，林州盆地与河北平原的交通要便利得多。这也使得赵国最终还是沿山势在面向魏国的一面，修筑了长城。鉴于秦代之后，长城修筑的重点都在北方，这些诸侯割据所修建的长城就再也没有得到维护了，因此已经很难找寻到它们的遗迹。而我们所引以为傲的“万里长城”，如果不是历代不断有人重修，也早已淡出我们的视线。只不过为了显示中国人的力量，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让很多外国人误以为八达岭上那段长城，就是当年秦始皇所修建的。

相比于那些“河堤长城”，修建于山脉之上的长城还是容易保留下些遗迹的，林州盆地的边缘也的确发现了一些长城的遗迹。如果对于发现这些历史记忆有兴趣的话，不妨按照我在图上所画的那个黄圈去尝试一下，这也算是地缘研究所带来的乐趣之一吧。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想从林州盆地出发前往邯郸的话，应该是先向东到达现在的安阳地区，然后向北渡过漳水到达邯郸。不过魏国占据了漳水以南的平原，

并且与赵国发生激烈的地缘矛盾之后，中牟与邯郸的交通就没有那么顺畅了。赵人很有可能需要向北从那些山体中穿越漳水（甚至浊、清两水），然后经滏口陉东出“滏口”进入邯郸。这种走法显然是非常艰险的，不过比之两千多年后的林州人民需要在山崖上凿开一条水渠，将浊漳水引入林州盆地，赵人的工作还算是轻松的。



太行山羊肠坂道

不管怎么说，林州盆地通往河北平原的道路还算通畅，亦有多种选择。但对于赵人来说，他们还需要有一条通道横穿太行山脉的分水岭进入上党地区，否则中牟的地缘价值将大打折扣。很不幸的是，林州盆地西侧的这一段太行山山体是南太行山中海拔最高的一段（海拔2000米以上），因此无论是对于赵人，还是以后想从林州盆地西入上

党高地的人来说，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唯一可供开辟道路的地点，在这段山体的中间。那里有一连串的峡谷，如五指峡、龙泉峡、红豆峡等。对于我们来说，不用为弄清这些峡谷的名称而烦恼，因为这些东西向连接林州盆地与长治盆地的峡谷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太行大峡谷。如果大家想领略一下太行山的险，这是一条有代表性的路线。

沿太行大峡谷一线目前已经开通了公路，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乘车游览，不过对于古人来说，这条要经行一系列峡谷的路线实在是太过艰险了，因此这条道路也被称之为“羊肠坂道”（也被用来特指其中一段最难行走的道路）。至于赵人在经由这条道路往来于东西两地时，碰到过多大困难，只能凭我们想象了。但数百年后，那位将政治中心建立在“邺城”的曹丞相，在经由这条“羊肠坂道”时，却留下了自己的感慨¹。这些感慨被记录为文字，名曰《苦寒行》，从这些字句中可以来体会一下丞相当时的心情。在这里只贴出前面几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

1 东汉建安十年（205），高干投降曹操后又复叛（当时被曹操任命为并州刺史），并拿下上党太守后派兵占据天险关隘——壶关口，企图自立。建安十年（205）冬，曹操先派出乐进、李典率军进剿高干，不下。建安十一年，曹操亲率大军出邺城，过羊肠坂进攻壶关。先是几攻不克，后来用诈降计，进行里应外合，才夺下壶关口。

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能让一代枭雄叫苦不迭，这条“羊肠坂道”之艰难可想而知了。

曹操当年之所以选择从太行大峡谷进入上党，一是因为从邺城出发，这是最近的路线；二是因为这条路线可以直插长治盆地乃至整个上党地区的地缘中心，也就是现在的长治市所在地。而曹操当时的征伐对象（高干，袁绍的外甥），也正是盘踞于此。如果你从其他的道路进攻的话，都必须先攻占其他关隘，不能达到一战定胜负的效果。



羊肠坂道示意图

任何一条有重要价值的战术通道，军事家们都会在合适的点上构筑防御体系，羊肠坂道也不例外。在长治市的东侧有一个山口，是经由羊肠坂道进入长治盆地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将长治盆地比作一个壶的话，那么这个山口就像是一个壶口¹。通过它就能够与河北平原沟通，所以这个山口被命名为“壶口”，构筑关隘之后自然也就叫做“壶关”²

了（现在那里有个村子叫“壶口村”，想找壶关，千万别找到壶关县城去了）。其实在太行大峡谷中的任何一个峡谷，都可以筑关守道。但对于一个军事要塞来说，更需要的是得到快速的后勤支援。因此在路口的两端进入平原地区的最后一个路口筑关，是能够获得最佳防御力的方案（函谷关后来被弃，移于潼关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由于中牟——太行大峡谷——壶关——长治的这条“羊肠坂道”，必须经由长治盆地，再北上进入太原盆地。因此长治盆地始终是赵韩两国争夺的焦点，双方所占据的城邑也可以说是犬牙交错，也经常易主。在魏国准备将自己在上党高地的控制区交给韩国时，赵国最为忧虑的就是韩国在上党高地取得了绝对优势，自己的通道被韩国所控制，因此是极力阻止。而关于韩赵两国在上党高地的博弈，一直贯穿于两国历史。直到长平之战前，韩国迫于秦国的压力，将所控制的上党地区全数交

1 亦有说法为因古壶关口山形似壶（以两峰夹峙而中虚，壮如壶口），且在此置关，故名壶关。《文献通考》“壶关，以山形似壶，尝置关。”《读史方舆纪要》：“壶关山，在长治县东南十三里，延袤数百里，东接相州，崖径仄险，形如壶口。……亦谓之崞口。”

2 壶关：亦名壶关口，在山西长治市东南方向十六里郊区老顶山镇壶口村。

给赵国才算结束。

赵韩两国在上党高地的博弈，史书中记载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一时期，一个城邑归属于韩国。但在另一个时期又显示为赵国的城邑，至于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中间是否有过反复就不得而知了。但通过地缘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赵国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长治盆地，对于晋城、阳城地区（以及韩国腹地的其他土地），即使攻入也会迅速回军，或当作筹码与韩国交换自己需要的土地。最典型的例子是赵国曾经在公元前370年攻取一块郑地（郑国的土地，但郑国在五年前刚被韩国所灭，所以是韩国的土地了），最终被用来换取了长治盆地的“长子邑”（长治市西南的长子县，也是长平之战中赵军的重要据点）。在有些文章中，赵人所换取的这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城邑，被认定为是韩王的“长子”被送往赵国为人质，只能说是望文生义了。



魏赵地缘关系示意图（河北平原）

而是直接向再北向插入太行大峡谷（羊肠坂道），然后再西过壶关进入长治盆地（这两条路线都是在现在的陵川县转向）。相比于前者，后者所要遇到的困难显然要大得多，在日常交往中也没有什么必要。唯一的战术作用就是可以避开经过晋城盆地腹地，直击长治盆地。也许的确在某一历史事件中，出于军事的需要，有军队走过孟门陁——太行大峡谷——壶关的路线，但以林州——长治为起始的“羊肠坂道”的确是一条有别于太行八陁的太行通道。

关于通往壶关的羊肠坂道就分析到这了，对于赵国来说，这道路曾经是他们沟通长治盆地的重要通道。不过在他们放弃中牟之后，邯郸西侧的“滏口陁”就成为赵国最为重要的东西通道了。

由于经由太行大峡谷的羊肠坂道过于艰险，因此在古典时期，除了林州盆地的居民以外，河北平原之上的居民很少使用这条通道（军事用途除外）。这也造成了它不太为人所知，没有被列入“太行八陁”之列。而后世的一些研究者在发现太行大峡谷能够通行之后，曾经试图将之归入孟门陁。即认为孟门陁在向北穿越太行山之后，没有向西进入晋城盆地与太行陁会合，再一起北入长治盆地；

第四节 邯郸经滏口陉沟通上党和晋阳

邯郸西侧那条通往长治盆地的道路叫做滏口陉。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条路径在河北平原的起点叫做“滏口”。也就是说如果你自东向西行走的话，进入“滏口”就算进入山地了。滏口之所以叫做“滏口”则是因为一条河流——滏水，现在叫滏阳河。这条河流位于邯郸城的南面，自滏口所在的滏山向东北方向流淌注入古黄河。

滏水对于邯郸城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水源和切入太行山脉的道路，更在于它可以为邯郸城的南翼提供安全保障。在赵国决定将漳水堤防改建为长城时，他们也在滏水岸边也做了同样的事。有了内外两道长城的保护，想再从南面攻入邯郸城就不那么容易了。否则后来的秦军也不至于在取得了南阳之地后，还是将对赵作战的重心放在对上党高地的争夺上。鉴于滏水（滏阳河）对邯郸是如此重要，它作为邯郸母亲河是当之无愧的。



魏赵地缘关系示意图（河北平原）

可能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漳水——浊漳水一线没有成为古人修筑道路的基础。其实我们看下地形图就清楚了，太行山主脉在漳水——浊漳水一线比其他地方都要宽（向东突出部分成为林州盆地的北沿），而滏口陉所处的位置，正好处于一个断层上。在经过滏口向西行走时，所要经过的山地要低矮得多，通行的难度也要小得多。既然有更容易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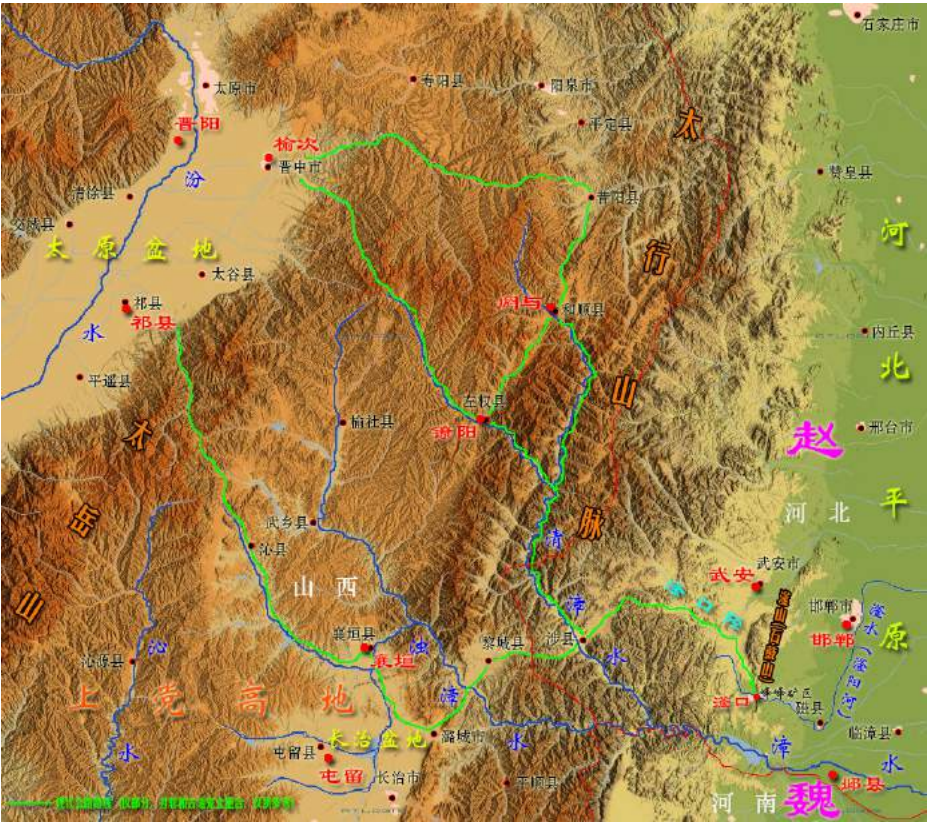
当然不用去费力开发、维护另一条相邻的通道了。

如果我们要在现在的地图上找寻滏口陉的大致位置，邯郸——长治的邯长铁路、邯长高速，309国道都是不错的参照。特别是邯长铁路，就是拐经滏口进入滏口陉的（公路都拉直了，也就是没有绕经滏口）。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太行八陉，大多都是以它们在河北平原的出口而命名的（如轵关、滏口、孟门隘都是这种情况），而他们在穿行太行山主脉时，可能存在两条甚至两条以上的道路，但大致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因此在那些出口处的平原地带，都会成为建筑城邑的首选之地。

如果可以的话，赵人通过滏口陉可以直插长治盆地的腹地：长治市——长子县一带。不过对于赵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长治盆地，打通与晋阳城的交通线。因此当那位赵国的奠基人“赵襄子”在长治盆地最先所选择的据点，是位于盆地的

北侧，所构筑的城邑叫做“襄垣”（公元前 455 年）。这个以赵襄子之名为标签的城邑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即现在的“襄垣县”。

如果按照赵人的想法，他们一定是非常想向南渗透，全面控制长治盆地的。因为在太原盆地与赵国控制的河北平原之间，有这样一个盆地作为连接点的话，赵国东西两块国土就有希望无缝对接了。即使上党高地东、北部边缘的交通线上有韩魏两国的城邑，也逃脱不了被交换或者吞并的命运。问题是，赵国人的这种想法需要面对韩国人的反对。对于韩国人来说，长治盆地绝不仅仅是交通线上的中继站，而是他们在山西高原存在的重要标志。既然上党高地以外的盆地都被魏赵两国瓜分了，韩国人就更没有理由放弃上党高地腹地这几块算不上丰腴的盆地了。



邯鄲至晉陽交通線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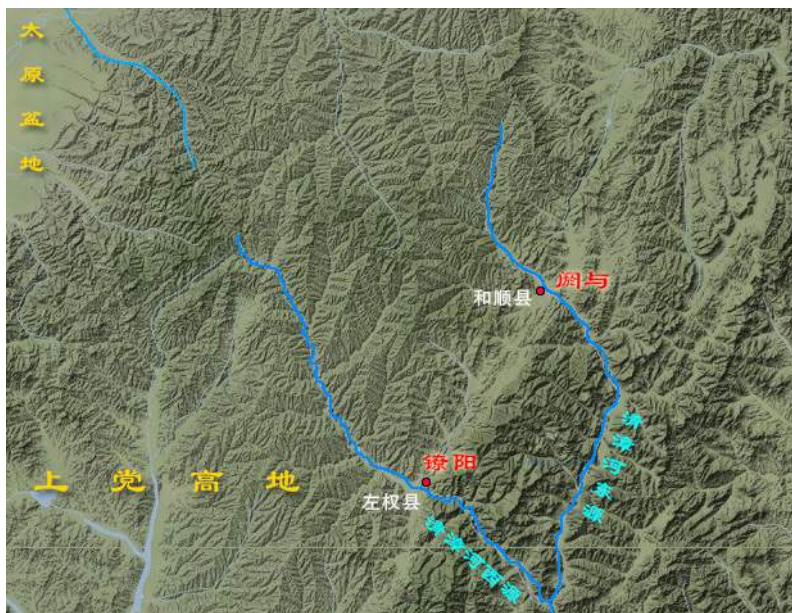
应该说在大部分时期，韩国人在上党高地的这三个盆地，还是能够占据相当优势的。这种优势的取得，除了他们自身重视以外，与魏国人的暗中支持也有关。魏国人后来之所以要把自己在上党高地上的城邑“送”给韩国，除了希望取得轵关陘所对应的南阳之地的控制权外，亦是希望韩国人能够在上党高地上牵制赵国，甚至

切断赵国的交通线（对于魏国来说，有轵关陘足矣）。这样的话，魏国在河北平原上就有可能对赵国取得优势。所以说三晋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合作与对抗同时存在，怎样才能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需要反复斟酌的。

在公元前 376 年，魏、赵、韩三国将晋国公室最后的那点土地都分完时（基本上也就是翼城所在的那个反“C”型地区），韩国首先设立了属于自己的上党郡。而韩国人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向另外两国宣布自己在上党高地的野心。而韩国的上党郡，郡治就在那个赵襄子所筑的“襄垣”邑。也就是说，韩国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基本取得了对长治盆地的控制权。而赵、魏两国在韩国之后，也分别成立了自

己的“上党郡”。只不过魏国人的所谓“上党郡”，并不代表他们对上党有野心，那只是一个可以用来交换的筹码。至于赵国嘛，为了自己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他们注定要为上党高地（主要是长治盆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可以说魏、韩两国在上党高地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让双方都有所收益。最起码韩国借此巩固了他们在上党高地的优势地位；而魏国则在战国前期对赵国取得了压倒性优势。魏国人甚至在公元前 406 年，向赵国借道攻灭了中山国。而赵国如果不能取得中山国所处的滹沱河流域，以及长治盆地的控制权的话，他们东西两块国土将面临着被全面分割的命运。不过赵国在最危险的时候，也还是可以保有另一条交通线的。那就是当赵人出潞口到达清漳水时，不再继续向西穿越浊漳水进入长治盆地，而是沿清漳水干流河谷向北，在太行山主脉中穿行，然后再沿着清漳水的西源（很多河流上游都有两条主要源流，清漳水也是）向西北方向切割长治盆地北部的山地，最终进入太原盆地北部，到达晋阳城。



辽阳邑位置图

如果你想控制这条路线的话，那么在清漳水（西源）自西向东进入太行山主脉之前，构筑一个城邑是最为可行的方案。当年晋国也的确在那里构筑了一个叫做“辽阳”的城邑；后来可能是这个“辽”字太生僻了，汉朝以后又改名为“遼阳”、“輶阳”等。隋朝以后就简化为“遼州”了，行政级别为县的时候就叫“遼县”（现在都是简化字，叫“辽县”）。

这个名字一直用到 1942 年，那年有一个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在日军的扫荡当中不幸牺牲，他的名字叫做“左权”。为了纪念这位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方面所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八路军参谋长），辽县被改称为“左权县”。

其实从左权县成为八路军的根据地，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条穿行于山地之中的路线并不是主要的交通线。但当长治盆地为竞争者所控制的时候，它的战略价值就显示出来了。在战国时期，韩国人最早曾经短暂控制过“辽阳”邑。不过在大部分时候，赵国人都是“辽阳”邑的主人，并借此保有他们的这条生命线。也许韩国人以长治盆地为基础，可以试图切断赵国的这条交通线。不过与赵国人相比，他们对于长治盆地北部的这些山地也并没有什么地缘优势（大家都要走长距离的山路，才

能到达“獠阳”邑)。再说韩国人的目标还是那些相对富庶的盆地，没有必要为了魏国人把事情做绝。因此直到大家真正的敌人“秦人”到来之后，赵国的这条生命线才最终被切断。

鉴于无论是羊肠坂道，还是滏口陉，都必须通过上党高地才能进入太原盆地。而赵国在上党高地又没有绝对优势，因此赵国需要在上党高地以北，再控制新的东西通道才能保证自己的战略安全。这个时候，那个一直让赵国人视为“眼中钉”的中山国，就成为赵国最想灭掉的国家了。中山国的存在之所以会让赵国耿耿于怀，除了这些戎狄占据了大片平原以外，更在于他们控制了两条穿行于太行山中的东西通道，它们分别是“井陉”和“飞狐陉”。而关于赵国与中山国的恩仇，以及这两条道路的具体结构，则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方向。

第四章 赵国和中山国在河北平原的地缘关系

第一节 赵国和中山国以大陆泽北端为地缘分割线

我们来分析一下赵国和中山国之间的地缘关系。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顺序，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山国南部与赵国北部的博弈情况。虽然说三晋的关系非常紧密，互相之间的博弈也很复杂，但如果让赵人选择谁才是他们最大敌人的话，他们肯定会选择“中山国”。我想大家小时候都听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印象中小学课文里也有这个故事（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因为大部分时候，这个故事是用来教育儿童的，因此其中的“人物”被简化为东郭先生、猎人和狼，以及一个以智者形象出现的“老农”。而实际上，这个故事是有很深的地缘背景的，其中所涉及到的国家，就是我们的主角“中山国”和“赵国”。

在最初的版本中，那位猎人就是与智、魏、韩三家共同解了第一次晋阳之围，并反手灭了范氏、中行氏的赵简子（他的儿子赵襄子又在第二次晋阳之围中，联手魏、韩，灭了智氏，两父子共同开创了赵国的基业）。而故事中的狼，全名叫做“中山狼”，将那些戎狄蛮夷比作禽兽，赵人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如果了解中山国历史的话，往往会惊叹于这些白狄（鲜虞）的韧性。在大国林立的战国时代（包括春秋末），中山国能够以边缘民族的身份几起几落，在晋国，以及后来的赵、魏、燕三国的包围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但如果从赵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山国这种时附时叛的态度，就是十足的小人了。因此赵人才会编排出“中山狼”的故事，以发泄自己的恨意。而那位东郭先生其实是一位墨者，也就是墨家的弟子。墨家的思想就是“兼爱”，倡导诸侯之间“非攻”，简单点说就是希望大家别打了。

应该说，墨者并不是简单的来跟大家讲道理，他们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具体的做法就是哪个诸侯被攻打了，他就去帮人家守城，让你战而无功。墨者的这种做法，当然并不能改变战国的地缘格局，但也的确给那些喜欢攻伐的大国造成了一定麻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表明中山国擅长守城的技巧有没有受益于墨者；但《吕氏春秋》中，的确记录了墨者在中山国国王面前辩论的场景。因此赵人将对中山国战事的不利因素，归结于墨者的加入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故事最开始除了发泄对中山国的不满以外，其实就是用来讽刺墨者的“兼爱”思想。在以华夏正统自居的赵人看来，再怎么“兼爱”也不能兼到这些戎狄身上。

好了，现在回到地缘的话题上来。河北平原在战国前期的地缘格局，其实和春秋初期很像。燕国还是在最北面遥望中原战事；南阳之地则由韩魏两家取代了王室和那些小诸侯。至于王室在河北平原中部为了抵制戎狄而设立的两个诸侯国——卫、邢两国，其国土则由魏、赵两国继承了下来。应该说当年卫国的实力是要强于邢国的，

王室的重视程度也更高。因此卫邢两国的地缘分割线并不在漳水，赵国的国都邯郸是属于卫国的控制区；而邢国则是以现在的邢台市为中心。

在取得了邢国故地，以及部分卫国北方国土后（卫国早已经迁至河济平原），赵国在河北平原实际上形成了一南一北两个中心。南部的国都邯郸是政治中心，主要用来对抗强大的魏国。而北方的“邢”邑（邢台）则是副中心，主要用来防御中山国的袭扰。在魏国攻取邯郸后，赵国曾经被迫北迁至“邢”，并授予其“信都”之名，以作陪都。这种双中心的地缘格局，也保证了赵国最终将控制区恢复至漳水北岸。不过对于“邢”邑来说，无论是当初邢侯在此立国，还是赵国以此为“信都”，始终都是处于华狄（戎）交战的最前沿。而之所以会保持这样的地缘格局，则和一个古泽有关，它就是——大陆泽。



赵——中山国地缘关系示意图

关于大陆泽的情况，我们在春秋有关邢国一节中已经略做交代了。而我们现在

则要比比较精确地来描述一下这个古泽的结构，以观察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来长期维持双方的地缘平衡。其实大陆泽这个古泽，曾经多次在之前的地图上出现。不过当时的重点并不在大陆泽，因此只是大致标明了它的位置。就大陆泽而言，很多时候是和黄河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黄河曾经多次流经大陆泽，但这并不代表大陆泽就是因黄河而形成的。实际上大陆泽是由发源于太行山脉的众多河流汇聚而成的。这些河流号称“九河”（其实只是概数，真实数量只多不少），我们之前分析过的滹沱河和滏阳河都曾经对大陆泽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而河流之所以在此汇聚，则是因为这一区域的地势较低。

有一种说法是，当年大禹曾经主持疏导了这些河流，并让它们与黄河的干流汇集在一起，向东北方向流入渤海湾。因此这一时期的黄河也被称之为“禹贡黄河”。直至邢、卫两国被戎狄们赶到河济平原之上时，黄河都是穿大陆泽而过，并将众多源自太行山脉的河流带入大海。不过邢、卫两国迁走后不久（30 多年吧），到了公元前 602 年，黄河的主流改道向南，这一次改变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

黄河的这次改道并不代表之前的河床就不会流入河水了，在人类还不能用堤坝将黄河河道固定死时，黄河下游出现分支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会在众多历史地图上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有两条河水分别流入渤海湾。其实即使原来的“禹贡黄河”河河道不再流入黄河水，这条水道也还是有充足的水源的。那些之前为大陆泽提供补给的众多河流依旧汇入大陆泽，然后再依原路汇入黄河。只不过脱离了黄河的河北平原北部水系后来自成了一个系统，也就是“海河水系”。而大陆泽以下的那些水道，也没有浪费，成为古卫水的河道。

之所以要做这些分析，是想告诉大家，河北平原在战国时期的地理结构与春秋时期并没有太大变化。事实上黄河的所谓改道，基本上都是侵夺其他河流的河道，也就是说黄河水流向哪里，更多的是让那条河道变宽，水流变大。当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带来了超量的泥沙，淤高了河床，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黄河就要改一次道。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说，黄河以及其他河流所带来的泥水，填平了华北平原的低洼处，为华夏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土地。就像大陆泽最终的命运就和那些上古名泽一样，水面不断缩小、分裂，最终变成了耕地（直到明朝才算最终消亡）。由于在秦国统一六国后，在大陆泽一带设立了“巨鹿郡”，因此这个古泽后来也被叫做“巨鹿泽”。

如果要探究大陆泽的位置，则是位于现在的“邢台市”东面，位于整个邢台地区的中部。具体则涉及隆尧县、巨鹿县、任县、平乡县、南和县、宁晋县六个县（需要注意的是，古巨鹿郡治不是在现在的巨鹿县，那时巨鹿县还在水里。古巨鹿是在大陆泽南端的平乡县的西南）。结合史料和当地的地理情况，我们可以在图上大致标出大陆泽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古泽的面积并不总是固定的，随着季节的变化，水面面积也会发生改变，但大致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关于大陆泽究竟覆盖了现在的哪些县乡，我想河北的人可能会更感兴趣些。对于河北以外的人来说，只需要关心大陆泽及其附属河流，对华北平原北部的切割作用就行了。实际上这点在图上是显而易见的。大陆泽及其南部的黄河河道，与太行山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而黄河在流经大陆泽后即向东偏北方向拐去，最终注入渤海。这使得大陆泽以北的河北平原，东西纵深要远宽于大陆泽以西地区。这也让春秋时期的邢国和战国时期的赵国，只能选择在大陆泽的北部与太行山之间，建立防御面相对较小的防线（那些自西向东流入大陆泽的河流，也为这套防御体系增加了筹码）。而戎狄与华夏的地缘分割线，也就长期稳定在大陆泽的北端了。

第二节 赵国希望从中山国夺取井陘

赵人之所以迫切地希望收服邢地以北的戎狄，除了希望拓展生存空间以外（那么好的地，怎么能被戎狄所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赵人需要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交通线，以将他们的东西国土连接起来。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了，由于韩国人对于上党高地的野心，以及魏国的暗中搅局，那两条经由上党到达太原盆地的道路（潞口陉、羊肠坂道）总是不能让人感到放心。而当赵人把视线投向中山国和他的那些鲜虞同胞后，就会发现，在那些戎狄们所占据的土地上正好有一条直通太原盆地的快速通道，这条通道就是太行八陉第五陉——井陘。

关于中山国的来源，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大致来说，这些戎狄在太行山以西是自西向东迁徙，而当他们越过太行山之后，则开始向南部渗透了。并非说白狄们不想向北方渗透，只不过燕人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而向南直至滹沱河流域，一直都是戎狄们的天下。应该说白狄到来之后，并不太可能将之前的边缘部族都挤压出去，而是应该通过技术手段，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戎狄们的领袖，因此鲜虞部落联盟成为这些戎狄的新标签。而曾经穿越太原——忻定盆地的白狄部，显然在与晋人的“亲密接触”中学习了华夏国家的组织结构，并依样建立了“中山国”。因此即使中山国人尚不能洗清戎狄的身份，但诸侯们已经将之视为一个正式的诸侯了。

中山国和他的兄弟部落并非没有向东渗透，不过他们的优势更多的是在山地上，这种地缘特征甚至表现在为城邑选址上。因此我们会看到中山国的每一座城邑中都必须有山（所以叫中山国）。有鉴于此，中山国更愿意沿着太行山向南扩张。只不过他们在向南扩张时，终究是会碰到已经在邯郸立足的赵人的，双方在河北平原中部开辟第二战场在所难免。

如果单看地理结构，滹沱河其实是一条很不错的地缘分割线。这条有“小黄河”之称的河流，宽度和流量都足以让双方都感到安全。不过自从邢卫两国被戎狄们赶出河北平原后，戎狄们就在河北平原上占据了优势，势力范围也早就越过滹沱河向

南延伸了。即使经过晋国和他下面那几大家族上百年的努力，戎狄们依旧还是能够控制住滹沱河的南北两岸。在战国初期，赵人在这个方向的作为，并不比当年的邢人做得更好，赵国仍然不得不接受大陆泽北沿作为双方地缘分割线的现实。

事实上在晋国以及分裂后的三晋越来越强大后，河北平原上的戎狄已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了。或者说只有以中山国这样具有国家形势的政治体来取代当初松散的部落联盟，方能保有他们传统的势力范围。而在这种时候，中山国仍然不愿意主动退至滹沱河以北据险以自守，就不是故土难离能够解释的了（对于边缘民族来说，迁徙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一切，都与一条道路有关，那就是“井陉”。

让我们先抛开历史背景，来观察一下“井陉”的地理位置。从大的地理结构来看，这条位于滹沱河南部的道路，正处在上党高地北部的山地与忻定盆地南沿的系舟山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从这里通过太行山的话，既不用经过那有着“天下之脊”之称的“上党高地”；也不用穿越太行山脉中忻定盆地东边缘的系舟山、五台山脉（这些向西延伸的太行山支脉，无疑加宽了太行山脉的东西纵深，让穿越其间的难度成倍增加。）



赵——中山国地缘关系示意图

中穿行的。能够自由地通过井陉在太行山两侧游走，也正是戎狄们能够长时间保有滹沱河南侧平原控制权的重要原因。不过在赵人将太原——忻定盆地圈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断努力时，井陉对于赵国的战略意义也就越来越大了。特别是赵人将山西高原上的地缘中心设在晋阳城后，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有这样一条快速通道跨越太行山。

其实大家也不必对“井陉”感到陌生。事实上早在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而半推半就地决定以铁路取代以前的官道，以作为帝国的主要交通线时，井陉就成为当时的“正太铁路”的修建基础（1887年开建）。所谓的“太”就是太原，大致

如果从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的地缘关系来看，井陉的位置和太原——忻定两盆地的相接处基本处在同一平行线上。而在晋人从河东之地向北扩张之前，这两个盆地一直都是戎狄的天下。也就是说，当初侵扰邢国的戎狄，主要就是从这条道路在滹沱河的上下游平原



正太铁路沿线主要站点线路图（1907年）



正定县和石家庄位置图

正定城的延伸，并由“正定”来享有这个荣誉。只是有了滹沱河的切割，石家庄终究还是独立发展为一个城市了。

等同于赵都“晋阳”城；而“正”则是指的“正定县”。这条铁路后来又向两端延伸，并与南北向的京汉铁路相交，成为中国最早的东西大动脉。而这个十字相交的汇合点，也成就了一个叫“石家庄”的小村落，现在它已经成为河北省的省会。

其实这个荣誉想来应该是由“正定”县（清雍正以前叫“真定”）享有的，只不过以当时的技术要想修建跨越“滹沱河”的桥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正太铁路”的东起点，没有选在滹沱河北的正定城，而是移至河南岸的“石家庄”。如果没有滹沱河的存在，这个新兴的交通枢纽应该会作为

第三节 井陉在太行山脉中的路线

依照之前所探索出的规律，我们知道，在从石家庄地区出发后，我们需要先找到一个山口，然后再通过这个山口进入穿行太行山主脉的道路。而石家庄西面的这个山口就叫做“井陉口”，通行于其中的道路就是“井陉”。井陉在穿过“井陉口”后，道路并没有马上变得难行，因为在山口的西侧，太行山东麓有一个小型盆地。这个盆地足以形成一定的自给能力，也就是说可以作为重要的前进基地（相对于山西高原）或缓冲地（相对于河北平原）。因此秦统一六国后，也在这里置县，这个县就叫做“井陉县”（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而这个小盆地自然也就叫做“井陉盆地”。

虽然并不清楚中山国和之后的赵国，在这里设的城邑叫什么名字，但秦朝的郡县都是在六国的基础上设立的，其中大部分的名字都是延用之前，因此中山国也好，赵国也罢，肯定也是将此作为重要的据点。其实抛开那些故纸堆里的地名，单看地理结构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受那些繁杂的地名影响，直接看清问题的本质。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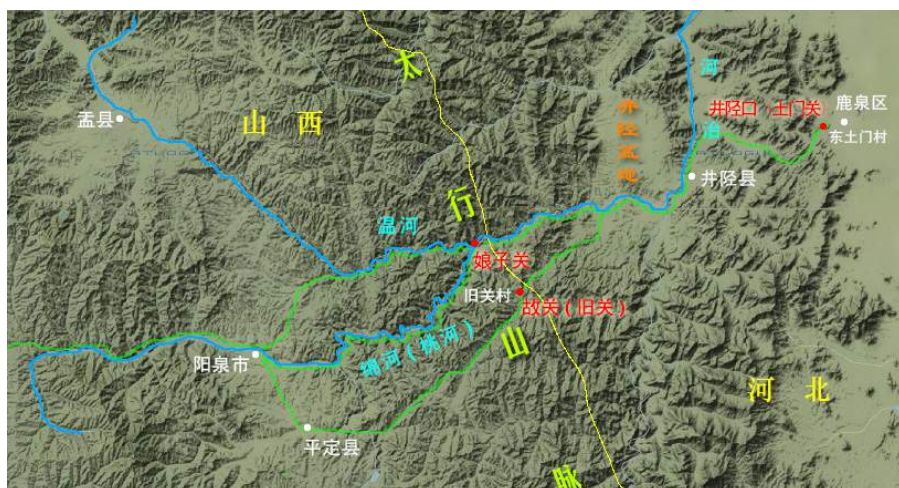
者说凭借自己的直觉就能够观察出，哪里有可能是战略要地。数百年后，韩信就曾经在井陉盆地创造过一个著名的战例——背水之战。我们常说的成语“背水一战”就是从这里来的。至于战役的细节，待到楚汉相争时，自然会有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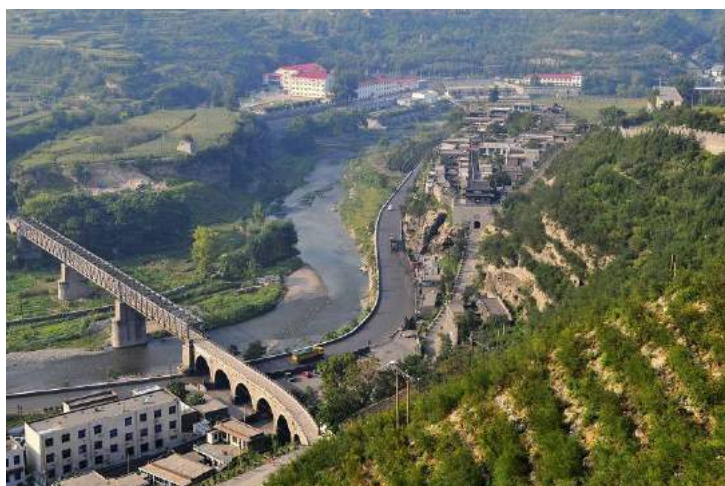
太行八陉之井陉示意图

像井陉这样重要的通道，军事家们是绝不会忽视的。也就是说，在这条通道的某一处构筑关隘是必然的选择。如果以井陉盆地为中心的话，那么在盆地的两头都可以选点筑关。让河北平原上的政治力量来选择的话，在井陉盆地东侧的山地与平原相交的“井陉口”筑关，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选择。这里所筑的关叫做“土门关”，也叫做“东土门关”。如果你去探寻关隘旧址的话，在那里还能找到东、西两个土门村。之所以在土门关前面要加个“东”字，并非因为它在东土门村，而是在井陉盆地的西侧，后来还筑了一个关，叫做“故关”（旧关），因方位在西，所以也叫“西故关”。

参看太行八陉之井陉示意图，我们会发现，在井陉盆地以西的路线中，实际上是分了三条支路的。而“故关”所在的位置是在最南边的道路上。这条路线现在也成为“太旧高速”的选址（太原——旧关）。其实很多高速公路的选址都并非在古典时期的主要通道上，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高速公路都是近二十年修的，而之前的主要道路往往都已经修建了普通公路了；二是很多几千年来所使用的道路并非距离最短的。比如穿越陇山——秦岭之间的渭河，穿越太行山脉的滹沱河，都是连接两端的最佳选择，但由于河谷落差大，都没能成为古典时期的官道。而现在，由于工程技术的发展，这些“捷径”都成为高速公路的选址。



井陘与娘子关位置图



娘子关

的“百团大战”中，娘子关也成为八路军袭扰日军交通线的重要地点。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正太铁路就是选择了井陘（中线）作为筑路基础。不过在当年中山国最先构筑这个关隘时，这里肯定不叫娘子关。因为娘子关之名是源于李世民的妹妹“平阳公主”。这位巾帼英雄曾经率领一支军队，为李氏家族的根据地——太原，镇守

通过故关的“井陘”南线，在古典时期并非主要的道路，在历史上也几经废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条路线没有贯穿始终的河流。对于长途旅行的人来说，能够随时获得淡水补充是非常重要的。而井陘的北线和中线都是沿

河而行的。只不过北线所沿的河流叫做“温河”，中线所沿的河流叫做“绵河”。其实这两条河流属于同一水系，在它们相交并流入井陘盆地后，又被叫做“冶河”（最后流入了滹沱河）。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要想控制这两条支线，应该首先会想到在温、绵两河相交之处设立关隘。这样的话就可以以一关而控二路。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和古代军事家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个点上的确有一道非常著名的关隘——娘子关。

鉴于井陘正好位于太行山脉的中间，并且是连接山西高原地缘中心——太原的快速通道，因此娘子关一直被视为山西高原的东大门。娘子关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成为重要的战场，在抗日战争

东大门。因此这个关隘也就被命名为“娘子关”。基于娘子关战略地位的重要，它也成为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的地缘分割点，河北、山西两省的边界也在此。

中山国当年在此防守赵人时，这里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事实上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山国必须控制井陉，否则赵人很容易将之逼退到滹沱河以北。这样的话，中山国的地缘形势将变得更加孤立。如果从当时的地缘格局上来说，争夺井陉的战争应当只会发生在赵、中山两国之间。但实际上，在战国初期，魏国竟然也对井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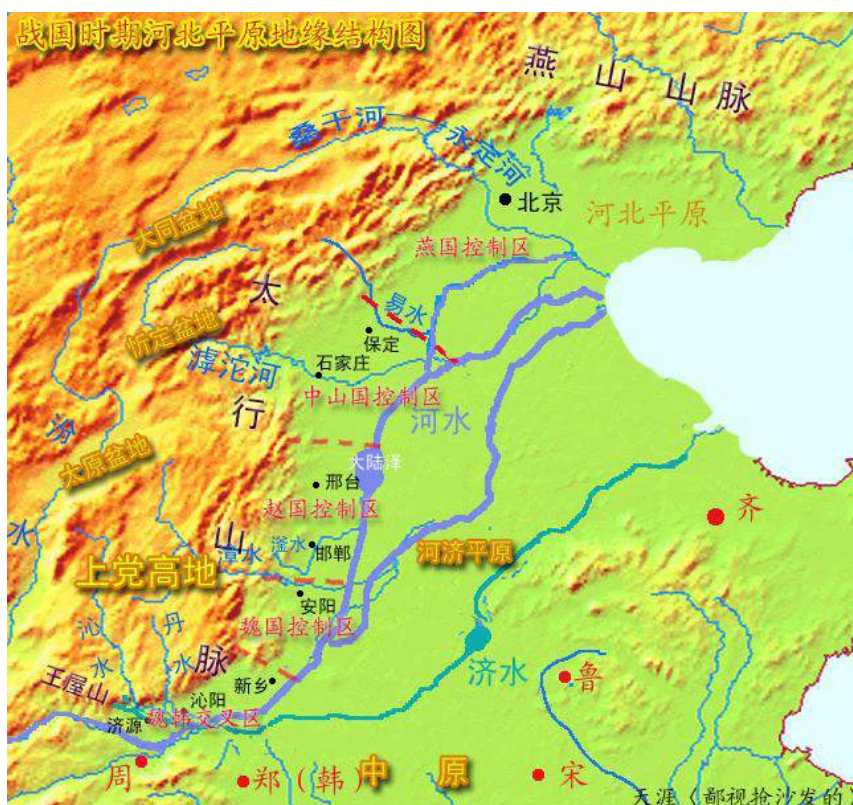
第四节 魏国为争夺井陉攻打中山国

魏国攻灭中山国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08——前406年。在魏国攻灭中山国之后不久，魏、赵、韩三国的诸侯身份就被王室正式承认了（公元前403年）。其实承不承认，都不是很重要。50年前，魏、赵、韩三家分掉智氏的土地后，实际上就已经拉开战国的序幕了。而魏国之所以会想到去攻灭中山国，首先当然是基于实力。在继承了河东、河间的大部分晋国遗产后，魏国的地缘实力与当年晋国称霸之时已经差不多了。问题是有了这个实力，却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要打中山国。事实上无论是在西线，还是东线，魏国都有更多地区可以拓展空间。或者说渭河平原上的秦国、河济平原上的卫国，甚至对河济平原、中原积极渗透的齐国和楚国，都是更直接的对手（魏国后来也的确在不断的与这些对手博弈）。而魏国却偏偏把最初的目标定位在中山国，却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魏国之所以对中山国抱有浓厚的兴趣，除了想扩大在河北平原上的土地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想控制一条穿越太行山脉的通道。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魏国所渴望的快速通道——轵关陉，出口还掌握在韩国人手中。而基于实力的对比，想从赵国人手中夺得羊肠坂道（壶关）和滏口陉，是非常困难的（魏国虽强，但与赵国还是同一数量级）。而那个被大家视为戎狄的中山国，却控制着两条重要的太行通道，这就不得不让魏国人妒忌。对于他们来说，那条位于五台山脉和恒山山脉的道路（飞狐陉），并不会是最终的目标。即使控制了，魏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再一次穿越赵国的势力范围去与河东之地相连。魏国的目标实际上是锁定在“井陉”之上。

对于魏国来说，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向赵国借道。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赵国当时同意借道，是因为赵国人认为，魏国人即使打下了中山国，也不可能长期遥控这块“飞地”，最终还是由赵国人来收拾残局的；而如果魏国人战败了，赵国人当然更愿意看到南北两个对头都被削弱了，这样最终得利的还是赵国。

魏国人当然不会不知道赵国同意借道背后的算盘。对于他们来说，也有自己的战略规划。魏国的战略是，在控制中山国后，一方面向东，绕过赵国核心地区邯郸——



战国时期河北平原地缘结构图

邢台，在黄河与济水之间（包括河水的两条支路之间）控制足够的土地，然后向南渗透；而他们在漳水以南的大本营也进入河济平原向北扩张，最终连成一片，将赵国在河北平原的土地包围在当中。而在另一线，魏国由河东地区向北进入太原盆地，然后沿着上党高地的西北边缘，向东北方面渗透，控制城邑，直至与井陉相连。

应该说魏国在这种战略是非常冒险的，首先是必须在河济平原上打

通一条战略通道。而河济平原也是赵、齐甚至燕国的拓展方向（卫国可以无视）。在这样的平原地带，想稳定的保有一条南北向的战略通道，是非常困难的。而魏国在山西高原之中的北进战略，所碰到的对手倒还单纯，就是赵国。尽管赵国已将太原盆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在最初的时候，魏国其实在太原盆地中还是分得城邑的。而赵国将晋阳定为政治中心，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作为晋国在山西高原最早的扩张方向，太原盆地的地缘结构比晋阳以北的忻定盆地要复杂（各大家族的封地都可能有）。晋阳城筑在太原盆地的北缘，可以让赵国的都城不至于被其他家族的领地包围起来。

应该说，在最初的时候，魏国人有可能打通了这条交通线（河东和太原盆地——井陉——河济平原——河内）。因为最起码太原盆地东边缘，晋阳城东南方向的榆次（现晋中市榆次区）、阳邑（太谷县）两邑，成为魏国的控制区。而经过三年的战争，中山国也被魏国所灭。至于在河济平原，那本来就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争夺区。谁是霸主，谁的实力更强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份额。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在有些战国地图上，魏国的国土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弧形，或者说“n”字形。而这个“n”形的两个脚，就是魏国在河东以及华北平原上的土地，顶端那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井陉”。

实际上，无论魏国的这种战略构思能否实现，魏国都很难获得成功。因为除非魏国能够下一步一鼓作气拿下赵国，否则如此漫长而又狭窄的战略通道，是很容易

被对手切断的。而在魏国的战略构思中，应该有顺势拿下整个太原盆地，以及邯郸——邢台地区的计划。但能够实现这第二步计划的前提是，魏国能够顺利地消化掉中山国。只是要想彻底控制这个戎狄所组成的国家，却并不是件易事。



赵——中山国地缘关系示意图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如果不考虑到控制“井陉”，中山国的防线建立在滹沱河一线是最为有利的。而事实上中山国虽然在竭力控制滹沱河以南地区（石家庄地区），但活动中心还是在滹沱河以北。在魏国决定攻击中山国之前，中山国决定离开太行山的边缘，向东扩张，并在现在的河北省定州市构筑了都城“顾”。而在此之前，中山国的主要城邑都是在太行山的边缘，也正是凭借这些城中有山的城邑（中山国旧都“中人城”就在现在的唐县境内，靠近太行山），中山国才顶住了晋人（包括赵氏等世家大夫）多年的征伐。即使被攻破，也能退入太行山中保存实力，并最终收复失地。

也许凭借魏国的实力，中山国即使还是将主力收缩在靠近太行山的区域，魏国也能够取胜。但中山国将都城迁移至“顾”这样一个纯粹的平原地带，无疑加速了灭亡。在这种地形中，中山国的防守优势被大大削弱了。其实中山国的这种情况，和二战初期的苏联有些相似。当时苏军在开战之初，之所以损失惨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部署是按照进攻德国的目的组织的。可惜的是德国人先发制人，由于不能以准备好的进攻姿态来防御，苏军的惨败也就在所难免了。中山国当时也是这样的，在他们最大的敌人——晋国陷入分裂后，中山国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因此也有意向平原地区扩张，以占据更多平整的土地。既然已经选择按华夏的方式组织国家，那么生产方式自然也要向农业转变了。

问题是魏国的动作的确够快，在中山国迁都至“顾”后（公元前414年），就立即感觉到机会来了。而中山国人应当完全没有料到是魏国会对他们发起攻击，对

于中山国人来说，他们更加熟悉的对手是赵人。即使是在晋国没有被瓜分之前，赵氏家族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敌人。现在，他们只能在一个新的尚未适应的环境中，去迎战一个陌生的敌人，中山国的胜算自然要小很多了。不过魏国人也没有笑到最后，因为他们固然会在平原地区占据优势，但当中山国的部族收缩至太行山的边缘时，魏国就没有太大办法了。也许占据一个国家的都城，并控制他们主要的耕地，可以称得上是把一个国家给灭了。但只要中山国还有足够的人力活动在那些山地之中，魏国就不可能稳定地占有中山国的国土。

假如中山国的国土和魏国的核心区紧密相连，那么魏国完全有可能将太行山中的戎狄们困死。问题是魏国没有这样的条件，即使能够向东绕过赵国，打通战略通道，占据中山国的魏军也无法稳定的获得魏国河内地区的支援。而中山国后来的故事有点像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在公元前 380 年复国成功。这一次，中山国吸取了教训，将都城重新迁回到靠近太行山的地区，在滹沱河北依山傍水地建立了新都“灵寿”（现河北平山县三汲乡）。如果说越国当年能够复国成功，是因为吴国的战略失误，为他们保留并扩大了在平原地区的国土的话，那么中山国得以从山地中绝地反击，则是得到了赵国的暗中支持。对于赵国来说，让魏国安稳地消化掉中山国，比让中山国与之为敌更加危险。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谁都能看出来，魏国消化完中山国后，下一步就是将赵人挤出华北平原了。

无论是当年的诸侯相争，还是现在的国际形势，都遵循着一个原则——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赵国和中山国这两个永恒的对手，在面对更为强大的敌人时，也可能形成战略联盟。不过在魏人退回到漳水以南后，赵国和中山国的关系又迅速恢复到了原点。对于赵人来说，他们在暗中支持中山国复国之后，又迅速的被中山国视为敌人，不满的心情可想而知。写个故事，将之比喻成反复无常的“狼”（中山狼），也算是一种发泄吧。

不过事情总归还是要通过战争方式来解决。在中山国复国后没几年，赵国就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公元前 377、376 年）。而中山国的应对方法，一如后来赵国对抗魏国，魏国对抗秦国一样，就是沿边境构筑长城。就赵国来说，他们在南线的作战应该会顺利些，但在中山国放弃滹沱河以南的土地，退守滹沱河北岸后，赵国的南线进攻就变得不那么顺利了。现在还没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表明中山国有没有在滹沱河北岸构筑“河堤长城”（已发现的都是建筑在太行山上的，河堤长城是非常难保留的）。不过在经历过魏国的灭国之耻后，中山国肯定会加强滹沱河防线的防守的，就像赵国被魏国攻破邯郸后（后归还），决心构筑长城加强漳水——滏水防线一样。因此赵人对于中山国的战争仍然进行得异常艰难，始终无法从南线越过滹沱河占领中山国腹地。

既然南线走不通，赵国很自然地将视线转移到北线了。在那里，赵国已经控制了忻定盆地。也就是说，赵国可以通过当年白狄迁移的路线，从恒山——五台山脉

的中间穿行而过，进入中山国的北部，由北向南攻击中山国。事实上赵国也正是按照这样的路线，在公元前 296 年，最终吞并了中山国。而这条攻击路线的打通，并非只涉及赵、中山两国。燕国和另一个戎狄小国“代国”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后面分析的方向，到时候，伟大的“赵武灵王”也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第五章 赵国从晋北征服中山国的通道

第一节 赵武灵王继位时面临的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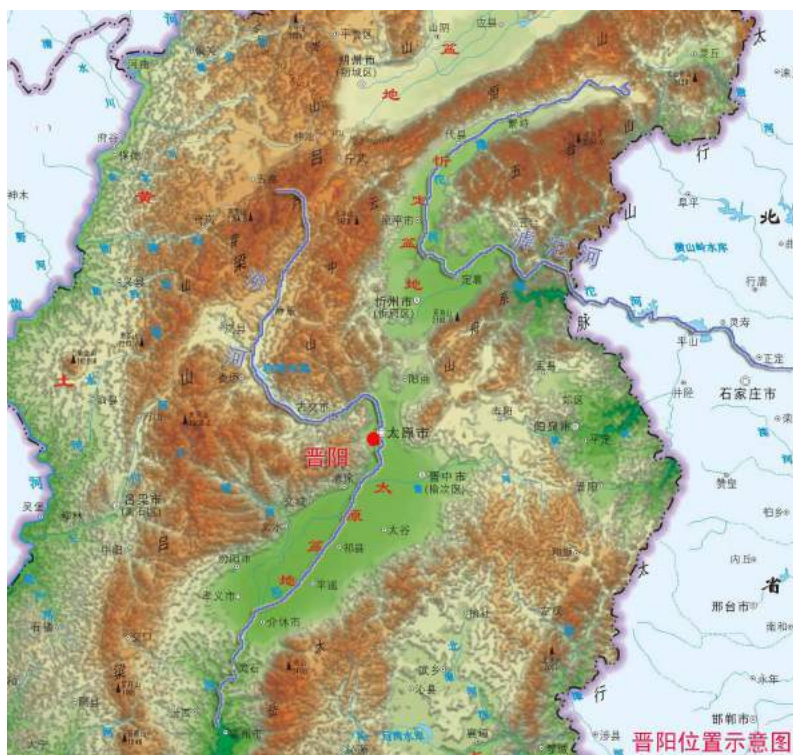
在解读完中山国与赵国在井陉一带的地缘关系后，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华北平原的北部，去看一下那里的地缘结构了。不过在解读赵国如何从北线进击中山国之前，我们还需要将视线再转回山西高原，去看看赵国在彻底解决中山国之前，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在赵国的历史上，赵简子和赵襄子两父子无疑是贡献最大的。如果没有他们两次解了晋阳之围，并反手与其他家族联手灭了范、中行、智三家，也就没有位列战国七雄的赵国了，甚至也都不会有三家分晋的格局出现。不过祖宗打下来的基业再好，后世如果没有正确的战略眼光、与时俱进的规划和新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地缘扩张的方向）的话，最终也还是逃不脱被人吞并的下场。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迁后的郑国。在郑氏三公为新“郑国”打下良好的基础后，郑国的地缘结构就再也没有发生新的变化。坐任其他边缘国家坐大而没有应对的方法，最终被韩国所灭。

好在赵国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他们向山西高原北部扩张过程中，又有一个伟大的君主诞生了，他就是以“胡服骑射”而名垂青史的“赵武灵王”。由于赵国在三家分晋时的地缘定位（太原盆地及以北），使其一开始是远离地缘政治中心的。如果不是在河北平原获得了一块土地，赵国在山西高原北部的扩张，并不会引起其他诸侯国太大的注意。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在中原占据主导地位，才是最值得伤神的。赵武灵王是在公元前326年继位的，那时候，战国前期的第一强国——魏国，已经在东征西讨中失去了当初的霸气；而秦国则开始步入上升期。整个中央之国暂时陷入了一种平衡，即谁也没有能力独自单挑其他几国的联盟。

也就是在赵武灵王继位后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五国相王”。也就是“魏、赵、韩、燕、中山”五个国家组成战略联盟，相互承认对方为王。如果观察这五个国家的地缘结构，会发现他们恰好是瓜分河北平原的五个国家。而这其中的地缘背景，是秦、齐两国相继称王，而魏国为了挽回自己下滑的实力，便拉拢另外几个河北平原国家共同称王，以对抗秦、齐两国。至于楚国，早就自立为王了。这个长江流域的蛮夷，一直都是孤立于北方诸侯之外的。“五国相王”只是战国时期，众多合纵连横方案中的一种组合。事实上战国时期的这种组合，从来就没有稳定地存在过。各诸侯国都是各怀鬼胎，勾心斗角，随时都会有新的组合诞生。

只不过以赵国的地缘实力，很难凭借在河北平原的那块基地在争霸中原中有大的作为，也很少成为这种组合的领导者。因此赵武灵王最终也像当年赵简子筑晋阳城一样，暂时将视线从地缘博弈的中心转移，投向山西高原的北部，去从那些戎狄



晋阳位置示意图

身上吸取力量了。

当年赵国将国都定于太原盆地与忻定盆地相汇的“晋阳”城，就喻示着赵国将晋阳城南北两端的太原盆地、忻定盆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而在消化掉这两个盆地后，赵国在山西高原北部的扩张方向出现了分歧。

因为摆在赵人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条是沿着白狄东迁的方向，东出忻定盆地，进入华北平原，最终从北部开始吞并中山国；另一条则是越过恒山山脉向北部的

大同盆地扩张，继续将那些戎狄赶到更远的地方去。事实上对于赵国来说，能够东出忻定盆地，吞并中山国，一直是长久以来的目标。即使在赵武灵王刚继位时，能够在华北平原北部拓展空间，也是首选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赵国开始借机插手燕国内政，甚至曾经鼓动中山国进攻燕国。为的都是自己能在乱局中在燕——中山两国之间撕开一道缺口，让赵国从北线进入华北平原成为可能。

问题是，无论中山国有没有看穿赵国的想法，中山国都没有被削弱，反而向北侵夺了数百里的土地，也就是说中山国的地缘实力得到增强，赵国想正面攻破其都城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这个时候，赵武灵王决定将视线投向更远的北方，去看看恒山山脉背后的大同盆地是否存在新的发展空间。而此时的大同盆地，除了世代居住于此的戎狄外，也有不少因受晋人（包括三晋）挤压，从南部几个盆地以及山地中迁移过去的戎狄。这些混居于大同盆地的戎狄，也一如他们在华北平原的亲戚一样，产生了一个政治体——代国。

第二节 赵国经楼烦关和雁门关渗透大同盆地

当赵国决心越过恒山山脉向大同盆地扩张时，他们首先需要有合适的道路。沿着河流开辟道路是最常见的方法，问题是恒山南北的宽度虽然不算太宽，山脉南麓也有一些流入滹沱河的小河（都很短），但却并没有横穿整个恒山山脉的河流。如果赵人希望顺着河流从忻定盆地渗透入大同盆地，是没有地理条件的。不过如果赵

人肯向西翻越“云中山”（忻定盆地西侧的山脉），到达到云中山与吕梁山之间的谷地，倒是有一条河流向东北方向，从恒山山脉的西头绕过，进入大同盆地。

这条河流在战国时代被称之为“治水”。而现在，它在大同盆地西部的部分被叫做“恢水”。在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地标“朔州”，在此北流的“恢水”与其他河流合流后，转向东滋润了整个大同盆地。而这条河流最终还穿越了太行山脉，流入了华北平原。至于这条河流现在的名字，则有两个：太行山以西部分被叫做“桑干河”，流入华北平原的部分则被叫做“永定河”。



宁武—雁门—平型三关示意图

如果让赵人选择的话，向西翻越云中山，再向北沿治水进入大同盆地，其实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反正都要翻山，还不如想办法在恒山山脉中开辟道路，向北直接进入大同盆地。不过你觉得这条道路费力，并不代表那些习惯在高原山地中活动的戎狄不会由此进攻忻定盆地的侧翼。事实上如果戎狄们愿意的话，他们甚至可以沿着吕梁山——云中山之间的谷地，进入太原盆地。而戎狄们之所以可以绕过赵人所控制的忻定盆地，直击太原盆地，则是因为另一条河流的存在，这条河流就是“汾水”。

如果说汾水是太原——临汾盆地的母亲河的话，那么桑干河就是大同盆地的母

亲河了。虽然说这两条河流的流向不同，但它们最初的部分却共同分享吕梁山——云中山之间的谷地。也就是说如果从蒙古高原或大同盆地南下的戎狄，无法攻破赵人在恒山山脉所设定的防线时，他们很可能会沿着治水（恢河部分）南进，在到达治水源头后，这些游牧民族只需要再往前走一点点，就可以看到从吕梁山上流下来的汾水。而剩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的，渴望进入农耕区打草谷的骑兵们，可以沿汾水顺流而下，进入太原盆地的北端，至此整个汾河两岸的平原都展现在他们的前面了。

当然，戎狄们沿汾水上游进入太原盆地时，他们首先会面对赵人在山西高原的地缘中心“晋阳”城。在经历过两次围攻之后，晋阳城的坚固已经是毋庸置疑了（建于此，部分原因就是为第一时间，对汾水方向的进攻做出反应）。不过让自己的政治中心那么容易暴露在敌人面前，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绕过恒山山脉的戎狄们还有可能从侧翼攻击忻定盆地。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吕梁——云中谷地的北端，治水河边构筑一道关隘，以阻止敌人的进攻。

当年赵人筑在谷地北端的关隘，叫做“楼烦关”。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赵人看到楼房就烦；而是因为在赵国北扩之前，大同盆地的西部（朔州地区），以及吕梁——云中谷地，是由一个叫“楼烦”的戎狄部落所控制。事实上刚才所分析的地缘博弈，并不只是赵人才会面对的。在整个古典时期，大同盆地都经常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进攻山西高原乃至华北平原的跳板。因此控制吕梁——云中谷地的战争，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基本的地缘形式并没有变化，所变化的只是不同的地名罢了。就像晋阳演变为太原后，仍然是山西高原的地缘中心一样（战国时期还只是北部的地缘中心）。楼烦关现在的名字是在明朝被定格的，被叫做“宁武关”，而它周边所发展出来的城镇（关隘在和平时期，可是商业枢纽），则被命名为“宁武县”。

应该说，赵人和后来的华夏政权在桑干河源头部分构筑关隘，主要是出于防御的目的。对于已经控制忻定盆地的赵人来说，需要的是一条直接穿越恒山山脉的道路。虽然说没有现成的河谷可以利用，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就像太行山脉那样的艰险，先民们也还是能开辟出“太行八陉”来一样。和太行山脉一样，恒山山脉们也还是有一些狭窄的沟峪。这些沟峪虽然不能汇集成大河，不过以其为基础，还是可以走出一条道路来的。反正没有很现成的道路，那么自然要选择山脉的最窄处穿行了。而这个穿越恒山山脉的点，最终被选择在五台山脉的西北方向，“C”型的滹沱河即将拐第一个弯的地方。现在那里所设立的行政单位叫“代县”，名字是明代时期定的。在战国时期，赵国划之为“雁门郡”，而它所扼守的关隘后来也就被称之为雁门关了。

雁门关之名，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在吕氏春秋所称的“天下九塞”中，“雁门”被称之为天下九塞之首（书中称之为“句注”山，也叫“雁门山”，道路是从雁门山下通过的，另一侧的山头则被叫做“夏屋”山；如果大家在史书中看到这些名称，其实指的都是雁门关）。赵人在控制了雁门关的道路后，就等于开启了通往大同盆地的门户了。而赵人后来也的确在大同盆地，及至更其北部的蒙古高原开疆扩土。



宁武关—雁门关示意图



雁门关

而赵人之所以要在这一地区耗费大量精力，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土地那么简单。

事实上赵国人在大同盆地所面对的戎狄，和他们横扫忻定——太原盆地时所面对的敌人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些戎狄的机动性要强得多。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大同盆地位于山西高原诸盆地的最北端，与蒙古高原相接。而大同盆地北部并没有如恒山山脉这样的连续山脉，作为屏障。也就是说，那些活跃于蒙古高原，以游牧为生的边缘民族，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大同盆地。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赵人之前所要面对的敌人，更多的是习惯于山地作战的步兵；而现在则要面对强大的骑兵了。

其实自商朝以来，马就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军事物资。只

不过马最初并非由华夏民族所驯服的，而是由蒙古高原上的那些游牧民族传入的。马最初被利用，并非用来骑行，而是用来拉车的。因此从商人开始，一直到战国中期，马拉战车都是最主要的战争武器。一个国家拥有多少战车甚至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所谓战国七雄，都是要有“万乘之国”的实力的。不过从对马的使用上来看，华夏族始终是一个山寨的角色。也就是说华夏族可能会将战车的威力改进得非常强大，但在原创性上，却比不上那些草原民族。

这种区别在战国时期就显露无疑。因为相比于还在以战车衡量军事实力的华夏诸侯们，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已经开始直接骑乘马匹，并发展出一套更为有效的战术了。由于大同盆地是蒙古高原最容易进入的平原地区，因此赵人最先承受这种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赵人也是可以最快学习这种先进技术的。接下来的事，大家都应当耳熟能详了，这个历史使命落在了“赵武灵王”身上，“胡服骑射”成为赵国的国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图

所谓“胡服”，指的就是“窄袖短袄”的衣着。如果你是坐在四四方方的战车上，宽袍大袖的穿着，并不会影响战斗效果，相反，还会增加军威；但如果你准备直接骑在马上，那还是紧凑一点的穿戴会更合适（可以想象一下坐汽车的人和骑摩托车的人的穿着区别）。而“骑射”，说得通俗点就是“骑马射箭”。如果以马代步，固然可以增强军队的机动性，但只有再辅以弓箭这种远程武器，战力才可以发挥到最大。并非是说华夏族在之前就不懂得使用弓箭了，“骑射”指的是在快速运动的马上射箭。这种将机动性和远程攻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战术，两千年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最成功的军事手段。

至于说像《三国演义》里所描述的马战，在马镫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是无法成为主要战术的（真要打，是骑到面前下马对打）。所以赵武灵王和那些游牧民族才将全部注意力放在“骑”、“射”两点之上。对于赵国来说，能够从南下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习更为先进的战术手段，只是赵人在大同盆地收获土地的一个副产品。只不过这个副产品又反过来增加了赵国的实力，让他们在战国后期成为对抗秦国的主要力量。不过赵人最初决定越过恒山山脉，却并非为了大同盆地的土地和学习更先进的战术，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是让赵人寝食难安的中山国。

只不过为了这个目的，赵武灵王需要横穿整个大同盆地，先行控制代国的核心地区“蔚县盆地”。在那里，一支叫“代”的戎人建了一座都城，叫做“代王城”。而从地理位置来看，代国和代王城看似游离于赵——中山地缘博弈之外，但实际上却对于双方的地缘形势起着胜负手的作用。

第三节 赵国吞并蔚县盆地中的代国

我们可以在《赵——燕——中山国地缘关系图》上，观察一下蔚县盆地的位置。如果说楼烦关所在的吕梁——云中谷地是在恒山山脉西头的话，那么蔚县盆地则是在恒山山脉的东头，太行山主脉的西侧。如果考虑到赵人已经在恒山山脉西头与中间控制了两条通往大同盆地的道路（吕梁——云中谷地与雁门关），那么也许在恒山

山脉的东头，赵人也会有新的收获。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赵人来说，蔚县盆地的战略地位绝不比前两者低。

我们经常说，那些大地理单元边缘的小盆地，往往能起到枢纽的作用，或者说谁能够控制它，就能够取得某条战略通道的控制权。之前的井陘盆地与林州盆地，包括中条山中的虞原（虞国所在地），都具备这类特点。而位于大同盆地东侧，太行山西侧的蔚县盆地无疑也应该归入此类。在赵国成为独立的诸侯之前，“代”这支戎狄部落就已经控制了蔚县盆地，并以此为中心，向西、北方向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大同盆地的东部，以及张家口地区（也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型盆地，分析燕国时会解读到的）。

至于说赵人吞并代国的过程，最起码可以追溯到赵简子时期。《史记·赵世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赵简子希望在几个儿子中选取继承人，于是就出了一道考题，以观察儿子中谁更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这道题是“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意思就是说我的“宝符”（也就是君主发号施令的信物，相当于后世的传国玉玺）藏在了常山上，你们谁先取到了，就有赏赐。儿子们当然知道这个“宝符”代表着什么，于是争先恐后地跑到常山上去寻找，结果却都一无所获。最终只有庶出的赵襄子对赵简子说他找到了宝符，并最终成为赵氏的继承人。

赵襄子当然没有真的在常山上找到什么宝符，他不过是用一句话点破了这个问题的玄机，这句话就是“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所谓“常山”，我们在白狄东迁的部分已经解读过了，就是太行山东麓的古恒山，也就是“中山国”人心目中的圣山（司马迁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将恒山改为常山了）。换句话说，常山所代指的就是“中山国”。而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是在问，谁能找到消灭中山国的策略，谁就是我的继承人。赵襄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看破了这层含义，也找到了消灭中山国的战略方向。那就是先取中山国北面的“代国”（中国古代，以北为上，所以说“上临代”），然后就可以消灭中山国了。

赵简子在赵襄子的建议下，确立了先取代，后灭中山的战略后，也的确开始积极地谋划吞并代国的方案。他最初所使用的方法其实并不算特别，那就是与代国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代王为后。而赵襄子继位后，则开始正式对代国下手了。赵襄子所采用的手段算不上光明磊落，他把那位代王姐夫引到雁门相会，然后让一个厨师把代王给砸死了。而赵襄子的姐姐绝对称得上烈女，在知道自己弟弟杀了自己的丈夫之后，便自杀身亡了（虽说我并不认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那些“红颜”是左右政局的关键，但并不妨碍我对其中一些人的品德表示敬意）。

一般认为，赵襄子谋杀代王后，代国的土地就完全归属赵国了。而赵襄子也的确将自己的一个哥哥分封于此。但其实赵国对于代国乃至整个大同盆地的消化过程，持续了上百年。就像当年秦穆公称霸西戎，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让渭河平原周边的戎狄臣服，但秦国真的吞并融合这些戎狄之地，却也是到了战国中后期一样（那个

同样被秦人以“美人计”吞并的义渠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赵国完全将大同盆地以及蔚县盆地归为直属领土，正是在百年以后的赵武灵王时期。在后面我们会分析到，赵武灵王用一道长城，向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宣示了自己的边境在哪里。

不管在赵武灵王之前，赵国对于代人及其土地的控制方式如何，真正将代国完全吞并（设立代郡，归为直属地），并以此为基础消灭中山国的就是赵武灵王。而此时的赵国，已经由东西两块的局面，变成为以恒山山脉为地缘分割线的南北格局了。秦并六国时，在赵国的南部核心区（包括太原、忻定盆地，以及华北平原的土地）被秦军所占之后，赵国所残存的贵族甚至退至恒山以北，建立了一个新的“代国”，以做最后的抵抗。当然，这个新“代国”最终还是无法抵抗历史的洪流，对于气吞八方的秦人来说，只不过是多了一场战役罢了。既然赵国的奠基人赵简子、赵襄子父子，以及赵国的末代贵族们，都如此看中代国的土地，那么我们就从地缘的角度，好好审视一下代国的地缘位置。这其中的重点，当然就是代王城所处的蔚县盆地了。



赵——燕——中山国地缘关系图

第四节 赵国从飞狐峪渗透涞源盆地

“蔚县盆地”的命名，是因为这个小地理单元的腹地现在是由“蔚县”所管辖（在盆地的西缘还有“广灵县”）。当年代人所建的代王城就是在现在蔚县县城的东北部（现在那里有个代王城镇，中国人是非常念旧的，那些古典时期的著名地标，大多在现在都有同名的行政单位。比如平型关边上就有“平型关村”，雁门关边上就有“雁门关镇”。不过对于秦以后的历史来说，蔚县也好，代王城也罢，都不是这个地理单元的主标签。蔚县盆地的战略地位在大部分时期是因一条著名的隘口——飞狐口而出现在军事家的脑海中的。

飞狐口的位置就在现在的蔚县县城南面，也就是蔚县盆地的南缘。而飞狐口之所以战略地位重要，则是因为它所连接的“飞狐峪”是可以通往太行山脉的腹地。因此，在很多人看来，飞狐峪就是太行八陉中的第六陉——飞狐陉。其实这样理解也可以，但不全对。因为当我们从蔚县盆地穿越飞狐峪后，并不能到达河北平原。也就是说当年赵人如果从代王城经飞狐峪穿越太行山的话，他们并不能马上到达中山国在河北平原的核心区，还需要有其他的道路相接才能够完成赵人的战略意图。

如果赵国是沿着当年白狄的迁移路线，穿越太行山的话，那么他们在穿越平型关所在的那道山梁后，会先到达灵丘盆地。这里也是穿越太行山之前的最后一块有自给能力的战略要地。在白狄东迁中一节中，我们已经解读过了。赵武灵王选择此地作为自己的归葬地，足以说明灵丘盆地的战略地位。不过灵丘盆地并不是这次太行山之旅的最后补给地，因为在太行山盆地的腹地还有一个小型盆地作为中继站，它就是“涞源盆地”。

江湖规矩，涞源盆地的得名自然是因为它现在归属一个叫“涞源”的县所管辖。而“涞源”县名称的由来，则是因为它是一条叫涞水的河流的源头地。至于涞水是什么样的河流，地缘地位如何，我们等到走出太行山之后就会清楚的。能够在穿越太行山的行程中，找到一个小型的盆地作为战略基地，应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仅此一点，控制涞源盆地的意义，就不会低于占据灵丘盆地。而涞源盆地的战略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能够为灵丘方向出击的赵人提供前进基地，更在于它还能够北连蔚县盆地。而涞源——蔚县盆地之间的主要通道，就是“飞狐峪”。

当赵国得以掌控蔚县盆地时，战略平衡的天平实际上就已经倒向赵国一方了。最起码能够从灵丘、蔚县两个方向出击的赵人，凭借强于中山国的实力，已经能够将涞源盆地这个前进基地掌握在手中了。而全面控制蔚县、涞源、灵丘三个盆地对于赵人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赵人决定将胡服骑射作为国策，并修筑长城（公元前306——前300年）以保卫北方边境后，大同盆地本身对于赵国来说，已经不再是需要分散大量精力来反复征讨的“生地”了。那些不臣服的戎狄们，都已经被隔离至长城以外的蒙古高原了。而在长城完工之前，赵人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基地来训练



蔚县——灵丘——涞源盆地地缘关系示意图

他们的新式骑兵。而这个基地就在蔚县、灵丘、涞源这三个呈品字型排列的盆地之间，只不过它的海拔有点高，以至于今天我们称之为“空中草原”。

“空中草原”的位置是非常特别的。它是在蔚县——涞源——灵丘三个盆地之间的山地之上，海拔达到 2000 多米。之所以会在山顶形成这样一片平整的草原，是因为这是一块有 36 平方公里的平顶山。

到达这块片空中草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从经由飞狐峪然后向西盘山而上。当年代国之所以能够控制飞狐峪，有空中草原这个中继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对于赵国来说，空中草原有点类似于“关山草原”之于秦人，不仅能够提供牧场，亦能控制战略要道。只不过秦人借此发迹的“关山草原”，草场面积有 35 万亩（空中草原折合 5 万余亩）。能够为秦人提供的战马资源要多出数倍。不过对于赵人来说，有这样一个易守难攻，战略地位显著的军事基地，就已经足够了。至于马匹的来源，与游牧区无限接近的赵人并不用发愁。

可以想象一下，当赵武灵王所训练的新式骑兵，以强大的机动性从空中草原经飞狐峪南下，穿越涞源盆地进入华北平原后，对以步兵为主的中山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压力。也许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山国可以摸索出对付轻骑兵的方法，但一开始的恐慌是在所难免的。当然，赵国最终得以消灭中山国，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但军事技术的改革无疑打破了中山国勉强维持的战略平衡。类似的事情，在当年商人凭借强大的战车和青铜武器赶走夏人，成为天下共主时就发生过一次。而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人以鸦片贸易为由，打开中央之国封闭的大门时，又发生了一次。尽管任何一项技术最终都会被共享，但并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政治体都能够看到了。很不幸的是，一直是赵国眼中钉的中山国，也再也没有机会从赵人那里学习新技术了（赵灭中山国发生在公元前 296 年，而胡服骑射的推行是在公元



飞狐峪



蔚县空中草原

前 307 年，十年时间完成了赵人两百年来不曾完成的任务）。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一是古人对于两个地理单元之间的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路线。就像飞狐峪一样，在它的东面还有一条“大峪口沟”，也曾经成为连接蔚县盆地的通道（现在也是主要公路的修筑基础），二者在空中草原以东合为一路了。也许有人要问，有没有可能两条道路，甚至更多的道路同时使用。答案是肯定的，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就像现在一样，古人走过的路我们基本都修通了，古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也修过去了。但在依靠人力开路的古典时期，在复杂的山地

中，先人们往往只会开辟一条道路作为大路（或说官道）。这一方面易于防御（还有收税）；另一方面也是能力所限。至于其他可能的路径，如果长期没有人行走和维护的话，很快就会由于水患、泥石流等原因损坏。即使没有这些自然灾害，迅速成长起来的灌木也会阻塞道路。因此，当你的对手决定对你展开军事行动时，他们一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大部分时候防守好常用的道路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尽管当年诱杀代王的地点是在雁门，赵人很可能在随后是穿越雁门，沿恒山山脉北沿进入蔚县盆地。但最晚在赵人控制蔚县盆地后，便会在蔚县盆地的西侧与灵丘盆地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现在也就是连接现在广灵县与灵丘县之间的公路。以这条路线将蔚县盆地与忻定盆地沟通的好处在于，在大同盆地还不断受到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袭扰时，赵人可以从自己的核心区安全地到达

蔚县盆地。连接广灵与灵丘的道路，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伏击战。最近的战例是在1938年，八路军曾在这条路线上伏击日军，战报称歼灭了500日军。对于以游击战为主的八路军来说，可以称上是不小的胜利了。

很多人会觉得三晋部分比较精彩，其实不是我写得好，而是太行山两侧的地理结构足够复杂，因此而演绎出来的地缘博弈也足够精彩。尤其是在中央之国的核心格局开始完成的战国时期，而要想了解清楚这看似复杂的地缘格局，其实也并不难。在太行山以西，我们需要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山脉，以及因山脉分割而成的盆地上。那大大小小超过十个的盆地型地理单元，让我们很容易找到控制他们的战略要点在哪里。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所取得的战果，大部分就是在山西高原诸盆地之间的连接点，以及那些连接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诸盆地之间，以太行八陉为基础的道路（比如平型关大捷、响堂铺战斗等）。在这种地形中打伏击，正是红色军队的特长。也正因为如此，那位山西高原的土皇帝才会愿意让八路军在山西高原活动（可以参看《亮剑》）。毕竟如果日本人全面控制山西，利益最先受损的是阎锡山。而山西高原这复杂的地形，也的确迟滞了日本的进攻，让他们无法向中国的西北方向继续渗透。当然，如果日本控制了蒙古高原，那么形势将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至于说华北平原，我们的关注重点则是河流了。不过相比于山脉来说，河流的阻隔作用要低得多。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华北平原上的那些河流也不断成为乱世诸国的分割线，但还是很容易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的。尤其是到了近代，技术的发展已经让军队可以迅速在河上铺设桥梁了。而这种大平原，无论是对于武器落后的正规军的抵抗，还是游击战都是很困难的。对于红色军队来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在靠近太行山东麓的地区活动，一如当年的中山国一样；而在完全的平原地区，就只能靠在地下挖掘地道，人为地制造复杂地形，以显示自己的军事存在了。

当然，河流在平原之上也并非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做到这点的前提是需要很大的决心。一如当年用晋水围攻晋阳城的智氏一样，这种以水为兵的战法前提是你无需考虑普通民众的伤亡。而在华北平原，那水量极大，河床却是悬于地上的黄河，是最容易成为“水兵”的。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在日本向黄河以南快速推进的时候，花园口的大堤还是被炸开了。而从军事角度看，日本也的确无法去控制黄泛区。只不过当年决定这样做的人，虽然不是这类军事决定的始作俑者，但在越发重视生存权利的今天，注定是无法抹去的污点。

第五节 涞源盆地沟通华北平原的通道

当赵人从忻定盆地经灵丘盆地进入涞源盆地，或者从大同盆地经蔚县盆地到达涞源盆地后，他们还需要有合适的道路走完剩下的太行山之旅。而从涞源盆地进入华北平原的道路也有两条，所到达的也恰恰是两个地缘板块，北边那个地缘板块被

命名为“燕”，南边那个就是“赵”了。“燕赵”两个字经常被连用，并且作为河北省的地缘标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燕赵两个地缘板块是如何划分的。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身为华夏后裔的我们，要无视“中山国”那些戎狄的存在。

涑源盆地通往华北平原有两条道路，分别一南一东，而这两条道路的形成则与两条河流有关。南线道路所倚仗的那条河流叫做唐河，我们可以称之为“唐河道”；东线的那条则在拒马河边，我们暂且称之为“拒马道”。当年白狄进入华北平原主要走的是唐河道。在他们南出涑源盆地后，首先会看到古恒山，在眺望这座有着地标性质的圣山后，白狄们沿唐河河谷南下，最终到达现在的河北省唐县。鉴于这条以唐河为参照的道路对于中山国的重要性，决定在平原地区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戎狄们，首先在涑源盆地南面进入唐河河谷的位置设置关隘，以阻止晋人（赵人）利用这条道路尾随而来。这个要塞当时叫做“鵕之塞”，意思是只有鵕鹰才能飞过去的要塞。

在赵灭中山后，赵人称之为“鸿上关”，这个“鸿”也就是大雁。鹰也好，大雁也好，总之对于没有翅膀的人来说，这绝不是一条好路。到了明朝，要塞的标签又变了，这次改的名字倒是跟鸟没什么关系了，改和马有关了，新的关名叫做“倒马关”。顾名思义，就是马到了这就摔倒。两千多年了，这条路依然还是难于上青天。对于生活在山地中的白狄来说，他们会更适应在这种类型的道路上行走。不过只在险要处建立一座关隘是不够的，特别是赵人控制了涑源盆地后。因此中山国最初所建立的城邑，就设在唐河通道进入平原的地方，以为战略支撑。为了保险起见，中山国在这个点上所建的城邑最少有两座，一座叫做“中人城（邑）”，一座叫做“左人城（邑）”（都在现在唐县境内）。也许还有一座“右人城”，不过没有记录。

中人城是中山国最早的政治中心。当年晋国还未分裂时，中人城就曾经被攻破过一次。那时的中山国其实还没有正式立国，被称作“鲜虞部落联盟”更为合适。作为联盟主力的白狄族，主要控制涑源盆地——滹沱河之间的区域。而滹沱河以南，控制井陉的任务则主要交给联盟中的另外两个戎狄部族。这两个部族一支叫做“肥”，一支叫做“鼓”。前者现在的位置在石头家庄东面的藁城市；后者则在石家庄南部的宁晋县（也就是大陆泽的北端）。有时他们也会被称作“肥国”、“鼓国”，以让观者知道这两个字其实是地缘标签，其实他们还算不上是正式的国家。

中人城之所以被晋人所破，并不在于“鵕之塞”不够坚固，而在于中山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借道给晋人，去攻灭肥、鼓两国（公元前 530 年）。这类把戏当年晋国曾经在“假虞伐虢”中曾经用过一次。如果白狄们熟知历史的话，应该会有所警觉。不过以虞国姬姓诸侯的身份，尚受不了厚利的诱惑，出卖了兄弟，对那些戎狄，又怎能提更多的要求呢。后来的事情，大家不用读史也可以想象到了。晋人在征服肥、鼓两族后不久，就对中山国下手了。只不过这次他们不用去硬碰白狄的唐河防线了。在白狄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到来时，晋国的军队已经从南线越过滹沱河攻到了

中人城的南面，中人城最终的陷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公元前 529 年）。

白狄在退入太行山中后，一如他们后来被魏所灭时所做的那样，在 20 多年后卷土重来，大败晋军，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前 507 年）。只不过在这之后，白狄们也意识到，那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很容易被人所利用，因此他们决定以华夏族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大败晋军后的第二年，中山国正式立国，中人城也正式成为中山国的第一个都城。



赵——燕——中山国地缘关系图

在了解完“唐河道”对中山国的重要性后，我们再来看看东线的“拒马道”。要解读拒马道的话，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拒马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拒马河这个名字可能会感到陌生。其实它是华北平原北部的一条重要河流，也是北京的五大河流之一（还是唯一一条从不断流的河流）。它的发源地就在“涿源盆地”西侧的山地上，在流入华北平原后，经过涿水县，在安新县境内流入白洋淀。

在拒马河流经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涿源”、“涿水”的地名，那么是不是说，这一带曾经有一条叫做“涿水”的河流呢？事实也的确如此，现在的拒马河，也就是古“涿水”。而涿水所注入的白洋淀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片水域上面曾经发生过不少耳熟能详的革命故事。其实白洋淀这个点，在先秦时期是涿水与黄河的一条支路——“山经河”的交汇处。一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那样，在华夏族尚

没有筑坝将黄河河道完全固定住之前，黄河的下游河道总是喜欢在华北平原任意驰骋。在战国时期，它已经分出三条支流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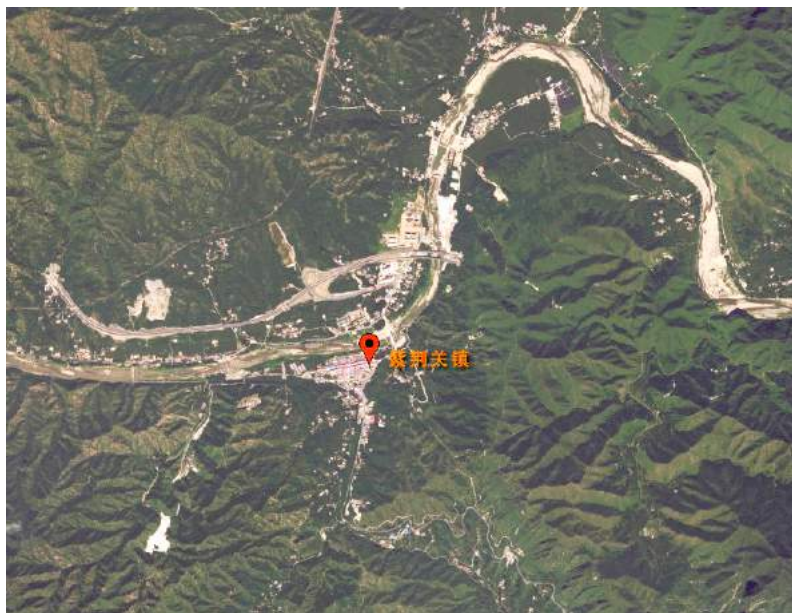
了解华北平原上主要河流的走向，有利于我们为诸侯们划定势力范围。毕竟水量巨大的河流，地缘分割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不过涑水的干流并没有成为我们走出太行山的终极选择；因为涑水在东出涑源盆地后，在即将流入华北平原时，突然转而向北跑到太行山腹地去转了一圈，再流入华北平原，如果再顺着它走，我们将多走许多的山路。涑水的这个转折发生在一个叫“紫荆岭”的山岭旁边，因此剩下的行程由紫荆岭南侧的另一条河流完成，我们将顺着这条新的河流南行一段路程后，再拐向东进入华北平原。如果现在走的话，我们在平原之上所碰到的第一个城市叫做“易县”。这条完成最后使命的河流，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它就是“易水”。



倒马关和紫荆关位置图

这条易水现在也叫“北易水”，这是因为它的南面还有中易水、南易水。而这些易水其实都是拒马河的支流。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易水的“易”字，就代表着它比那条“拒马”的河流，要更容易行走（没有正式的记录有这样解释，只是一

种猜测)。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经易水穿过紫荆岭，再沿拒马河进入涞源盆地、山西高原，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特别是当华北平原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都转移到燕国故地后，拒马道更是取代了唐河道，成为主要的官道。鉴于它的重要性，太行八陉中也为它留了一个位置。在这个排行榜中，拒马道被叫做“蒲阴陉”。而蒲阴陉更为知名的标签是“紫荆关”。因为华北平原的军事家们选择在两河交替的紫荆岭上构筑关隘，以防备来自太行山西侧的攻击。



紫荆关镇位置图

不管这条沿涞水——易水而行的重要通道叫做拒马道，还是蒲阴陉或者紫荆关。它的地缘重要性，都已经在两千多年前体现出来了。在最初的时候，中山国曾经控制住了北易水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易县一带）。这样做的理由就是为了防备晋国或者之后的赵国，在控制涞源盆地后，从紫荆关进入华北平原；如果这样的话，中山国苦心经营的唐河防线，威力将大打折扣。在公元前

457年，那个即将为赵、魏、韩三家所灭的智氏，曾经在此上演他们的高潮之作——进攻中山国。

对于希望在华北平原扩张的晋国来说，中山国早已成为眼中钉了。虽然这项战略任务最后由赵国继承了，但在晋国还没有分裂前，六卿中的老大——智氏，自然要出头解决这件事（其实主要是在为自己，一般来说，谁打下来的谁占）。而中山国在智氏的这次攻击中，所丧失的要塞叫做“穷鱼之丘”，单从名字来看，这是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具体地点就是在现在易县的西北部，易水河畔的山地一带，也就是说智氏所争夺的就是蒲阴陉的控制权。

至于说智氏有没有保住这个战果，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智氏下一步的重点是灭赵氏，而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即使智氏不亡，他们也很难保住对蒲阴陉的控制权的。因为除了那个总也打不死的中山国外，易水的北面还有一个实力更强的诸侯在积蓄力量，试图扩张。这个诸侯国就是当年召公始封，在春秋时期默默无闻的“燕国”。

第六章 燕国与赵齐两国的地缘分割线

第一节 燕国和赵国以南易水为界

关于燕国，虽然这个身世显赫的诸侯国在春秋时期几近默默无闻，但它在战国的历史却是很值得大书特书。因为燕国在公元前 300 年曾经越过燕山山脉向北拓地千里，而燕国为了保有这些边缘地区所做的努力，也开启了燕山南北长达二千年的博弈史。不过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将目光投得那么远，因为在燕国决定向北扩张之前，它首先要在河北平原打造一条防线，以保护自己的后方不受侵扰，而这条防线就是“燕南长城”。

我们先来看看，那些太行通道的组成方式，有没有对燕赵两国分割河北地区造成影响。通过之前对于以“涞源盆地”为中心呈十字交叉状，连接灵丘——忻定盆地（灵丘道）、蔚县——大同盆地（飞狐道），以及河北平原（唐河道、拒马道）的四条道路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在太行山北部的几条重要通道的地理结构。实际上这四条道路又可以演变成数种组合，因此你很难用一个统一的名称来为之命名。就像“飞狐陁”这个标签一样，如果说最有资格享有这个名称的，当然是经由飞狐峪连接蔚县——涞源盆地的那条“飞狐道”，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沿着这条道南行的话，只能到达涞源盆地，并不能算穿越了整个太行山脉。事实上，古人更喜欢用河北平原的出口来为这些道路命名。因此沿拒马道穿紫荆关而过的这条道路，又被单独列入了“太行八陁”之列，被命名为“蒲阴陁”。

之所以会有上述问题的产生，一是因为“涞源盆地”周边的地缘结构足够复杂，以至于当初排定“太行八陁”的人，也无法用清晰的方式来解读清楚；二是因为在秦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蔚县盆地南部的“飞狐道”一直是游牧民族进入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之一；而从华北平原北部进入大同、忻定盆地，又多走紫荆关所在的“拒马道”（特别是在北京地区的战略地位提升后）。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太行八陁”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标签，大家倒也不必拘泥于“八”这个数。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清楚了这些道路的基本结构，并可以用之来解读非常多的历史事件。至于说“飞狐陁”这个名字嘛，倒可以用来代指所有经过“涞源盆地”的道路。而涞源盆地在“飞狐陁”中的枢纽地位，倒不是因为我的分析，至少在历史上，涞源县曾经被叫做“飞狐县”。只是不知道金庸老先生在写“雪山飞狐”时，有没有受到“飞狐陁”的启发。

既然经由涞源盆地进入华北平原有两条道路，也就是到达现在唐县一带的唐河道与到达现在易县一带的拒马道（蒲阴陁），那么这两条道路的控制权在谁手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对于燕国来说，蒲阴陁的位置正位于其核心区的西部，因此即使不能控制涞源盆地，也必须在紫荆关一带构筑防线，才能保护自己侧翼的安全。

应该说，在最初的时候，燕国应当还是能够控制住蒲阴陔东部地区的（也就是北易水一带）。因此当白狄开始东迁时，他们选择了由唐河道进入河北平原，并将自己最初的政治中心定于唐河道的出口处（中人城）。

不过白狄和他们所组成的鲜虞联盟（包括后来的政治体“中山国”）在稳定下来之后，与周边诸侯的地缘博弈就在所难免了。在中山国与燕国的博弈中，中山国曾经多次扩张至北易水地区。而在赵灭中山之前，中山国还曾经乘燕国内乱向北扩地数百里，从燕国手中夺取了北易水地区的控制权。不过这也是中山国最后的辉煌了，燕国在秦、赵、魏等国的干涉下，又重新稳定了政局，收复了失地。并且也在这个过程中，燕国产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燕昭王”，后面我们将会解读这位燕王是如何差点把东方大国——齐国给灭掉的。



燕南长城示意图

至于说中山国的命运，在与燕国的这场战争中消耗了太多实力，以至于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旋即成为中山国的终结者。实际上，如果你比较喜欢关注政治斗争的话，这段历史的背景倒是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在中山国与燕国的这场博弈中，赵国其实是个间接操纵者（中山攻燕是有赵国暗中支持的，而燕昭王又是赵武灵王迎立的）。而赵武灵王的最终目的，当然是想从这两个对手的相争中得利。而赵国灭掉中山国之后，燕国在南线的地缘格局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蒲阴陔的出口及北易水地区仍然掌握在燕国手中，而赵国则满足于取得了唐河道的控制权。

提到燕国的话，大家一般都会联想到北京。的确，战国时期的燕国都城就在现

在北京城的西南部，不过这并不是当年召公最初受封的地方。当年西周初期，这些诸侯受封的地区其实都只是一个点，后来的地盘是经过很多努力从那些边缘民族手中夺取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诸侯都能够顺理成章的从那些戎狄蛮夷手中“接收”土地，反被对方灭掉的其实也不少，只不过我们最终看到的都是成功者罢了。

燕国最初受封的地方现在算是北京的郊区，也就是北京城西南方向的房山县一带，现在叫“房山区”了。而那时的北京城，是由一个叫“蓟”的戎狄小国所控制的。在燕国灭了“蓟”国之后，他们将都城迁到了“蓟”。而这个选择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到今天），蓟地都是燕山南麓的地缘中心，甚至数次成为整个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而燕国的初都处也没有被放弃，被立为“中都”，新的都城也相应地被称之为“上都”。既然燕国的初都处没有被称之为“下都”，而是“中都”，那么从逻辑上分析，自然也还会有一个“下都”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保证北易水地区，以及蒲阴陁的安全，燕国将易水之阳的“武阳”邑（现易县南）升格为“下都”，以为紫荆关一带的燕国军队作战略支撑。这种选择，一如在唐河通道出口处建“中人城”的中山国一样。

燕国对于北易水的重视，使得他们一直到秦国人到来之前，都能够稳定的保有对蒲阴陁的控制权。当年燕太子丹和众门客送别荆轲的地方，正是在北易水河畔，燕下都的西郊。在高渐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声中，荆轲沿北易水经蒲阴陁进入山西高原，最终渡过黄河到达渭河平原上的咸阳，进行了那场著名的“刺秦”行动。既然蒲阴陁与唐河道分别对于燕、赵（包括之前的中山国）两国都非常重要，那么将两国的地缘分割线放在北易水或者唐河，都不可能让某一方满意。也就是说，双方的地缘平衡线最好是在北易水与唐河中间。这条地缘平衡线最终还是被双方找到了，它就是——南易水。

跟北易水一样，南易水也是涑水（拒马河）的一条支流，因此你也可以认为，燕国实际上是控制了整个拒马河流域。不过你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南易水了，因为这条分割燕赵的河流，现在叫做“瀑河”。对于燕国来说，南部的边境其实是最为脆弱的，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从实力对比来看，无论是之前的鲜虞中山国，还是之后的赵国，对于燕国的地缘压力，其实都要远大于西、北山地上的那些戎狄。因此燕国沿南易水的北岸筑起了长城。跟其他蜿蜒于平原之上的长城一样，这也是条河堤长城，并且很有可能是最早的长城。鉴于燕南长城主要是沿南易水修建的，因此也被称之为“易水长城”。

不过对于燕国来说，光依靠易水打造防线是不够的，因为到了战国后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不光是那些小国，连郑、鲁、宋这些中等国家也都逃脱不了被兼并的命运。失去了这些中、小诸侯的缓冲，大国之间的对抗也变得越来越直接了。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各国都热衷于修筑长城的一个直接原因。从燕国的角度来说，易水长城固然能够让他们在面对赵国时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但除非

易水能够一直向东延伸到海，否则燕国在东南方向还需要找到一条新的河流作为屏障，而在这个方向，赵国已经不是主要的防御对象了。那个以山东半岛为核心地区的齐国，早已完成了它北面河济平原的整合工作，正在越过黄河向华北平原的北部继续渗透，而这种渗透将直接影响到燕国的地缘利益。

第二节 燕国和齐国以滹沱河下游为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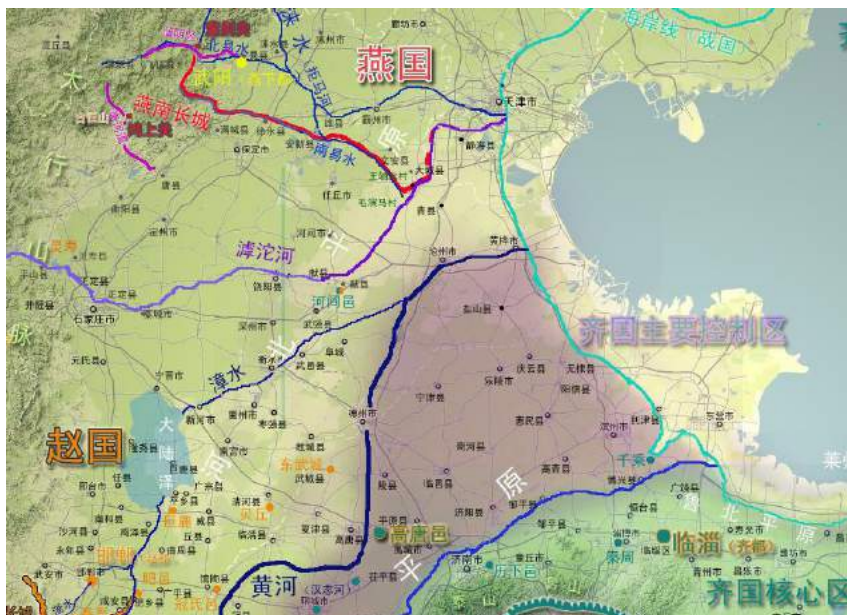
说到燕齐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当年周人初定天下，最为倚重的就是周公、召公、太公这三公。而召公、太公所封建的燕、齐两国，为王室所拱卫的正是北、东两个方向。在平定那些不臣服于华夏的边缘民族时，齐、燕两国其实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特别是对于燕人来说，即使是邢卫两国还在河北平原，那些滹沱河两岸的戎狄也阻隔了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而在邢卫两国被赶出河北平原后，燕人的这种孤独感就更强了。

当燕人碰到困难时，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山东半岛的齐人了。这点在当年齐桓公称霸时，就得到了体现。燕人和邢卫两国一样，都遭到了戎狄猛烈的攻击。与邢卫两国有所不同的是，燕人还是保住了他们在燕山南麓的核心区（邢卫两国都被迫迁至河间平原了）；而与邢卫两国相同的是，三国都得到了齐国的支援。当然，齐国这样做也并非在做义工，保住这三个诸侯，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继续与戎狄对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华夏诸侯中建立齐国的威望（对于霸主来说，有维护国际形势稳定的责任）。

在这次援燕行动中，齐桓公将齐燕之间一些新开拓的土地送给了燕国，以显示齐国的霸主风范。一如他让邢、卫两国在自己的边缘重新建国一样。齐国的这种做法，在春秋时并不鲜见。因为在春秋之时，复杂的地缘形势使得没有哪个诸侯国有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想法和实力，唯一真的想挑战周王室权威的就是楚国了。不过楚人那时候也无非是想与王室共同分享“王”的称号，亦无法将目标定在兼并所有华夏诸侯上。这种“称霸”的思维到了战国中后期，就已经成为历史了。在剩下的那些诸侯心中，其实都已经感觉到，天下重归一统是大势所趋了。因此诸侯们对于土地及人口的渴望愈发强烈，谁都不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兼并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之下，燕齐两国的地缘矛盾也变得愈发尖锐了。

如果从实力上来说，燕国肯定是要弱于齐国的。可以说，自从太公被分封到那块东夷的核心区后，齐人的大国地位就从来没有被动摇过。而齐国如果想在中原地区有所作为的话，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楚国（同样来自长江流域的吴、越也曾经让齐人印象深刻）。这个巨无霸型的长江霸主，任谁碰到都会感到头疼。因此齐国最终沿泰沂山脉——五莲山脉修建了“齐长城”，以抵御来自南方的威胁。而在齐国的北部，齐国人却没有沿黄河或者济水修建河堤长城。这一方面是因为河济之间“九

河”纵横，并且这些河流的水量都比较大，看似能够为齐国的北疆提供很好的缓冲；另一方面则是缘于齐燕两国的实力对比了。在齐国人看来，燕国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等级之上，并没有必要将人力物力花在防卫燕国的进攻之上。不过，齐国人很快就要为这种轻敌行为付出代价了。



齐国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后期）

来说并不陌生，它就是那条中山国的母亲河——滹沱河。我们之前曾经分析过，黄河下游河道在华北平原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在先秦时期，它的变化是集中在济水以北地区。在公元前 602 年，黄河的干流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改道，从经大陆泽流入渤海湾的“禹贡黄河”向南迁移（经沧州地区入海）。不过这次迁移还没有侵夺济水的河道，只不过是离济水更近了。

黄河的这次改道，并不代表它就不会走之前的河道了。事实上这条母亲河的性格变化无常，它甚至会在两条河道之间变化出新的支路来。这也是齐国对于北部边境比较放心的重要原因。在这样地理条件不稳定的区域，你即使打得进来，也未必站得住，更无法以此为依托，进攻齐国在济水以南的核心地区（中间还有河济平原作为缓冲）。问题是，到了战国后期，华北平原各国都掌握了构筑堤岸的技术，甚至将这些堤岸演变成了“河堤长城”。这种军民两用的做法，无疑更是加大了诸侯们筑堤的热情。而黄河在这个时候，也基本稳定在新线之上了。

如果从燕国的角度来看，能够将势力范围扩张至黄河北岸，当然是再好不过了。问题是相比于其他诸侯来说，燕国的资格虽老，但从实力上而言，还是一个“最佳新人”。因此当燕国也想向南扩张时，齐国早就开始越过黄河，向北渗透了。在这种情况下，燕国只有再寻找一条新的河流护卫它的核心地区。滹沱河下游之所以成为燕人的选择，是因为在战国后期，由于黄河已经确定改道了，滹沱河也拥有了自

齐国人固然有自大的资本，而对于燕国来说，则需要将东南方向的安全落实在实实在在的地理特征之上了。在华北平原之上，你唯一可以依托防御的地理形态就是“河流”（也包括大型湖泊）。因此燕国在南易水的东面，又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可以依靠的河流。这条河流从理论上应当西连易水，东到大海。最终接受这个光荣任务的河流，对于我们

已独立的入海通道,或者说成为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同样享有这份待遇的还有漳水,不过漳水在汇入大海前还是黄河相交了,上游是独立了)。

如果滹沱河下流的流向和它刚出太行山时一样,都是朝正东方向,燕国很可能渗透不到滹沱河的北岸。不过滹沱河在独立之后,并没有再按照原有的方向东流入海,而是在当年入黄河的河口处(现在河北献县一带)拐向东北,从现在的天津市一带入海。对燕国更为有利的是,东流的南易水实际上成为滹沱河的支流。也就是说,燕人在沿南易水北岸构筑长城之后,他们可以再沿滹沱河下游往东北方向继续构筑防线(拐点在现在的河北省大城县一带)。而这种相对紧密的防御结构,能够有利地保卫燕国的核心地区。基于滹沱河有“小黄河”之称,水量在当时足够大,河道也足够宽,因此燕国可能并没有在滹沱河下游构筑连续的长城(现在发现的燕南长城,都是在南易水北岸)。当然,即使燕南长城没有延伸到海,也并不代表燕国没有在滹沱河一线部署连续的军事据点,只不过是滹沱河水分担了大部分的防守压力罢了(齐国攻击燕国,主要还是从南易水一线进行的)。



齐国地缘关系示意图 (战国中后期)

由于华北平原北部的河道变化较多，当年滹沱河下游的这段河道已经被叫做“子牙河”了。应该说，南易水——滹沱河以北的平原地区，是燕国必须保卫的核心地区。而这条防线以南的地区，地缘形势依然复杂。中山国、齐国、赵国、甚至魏国都曾经在此展开博弈。而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齐国基本还是能够控制滹沱河——黄河一线的区域。问题是燕国这个对手虽然实力较弱，但也有爆发的时候，而燕国爆发的那一刻，却差点让一直轻视它的齐国差点灭国。

第三节 战国时齐国地缘结构的变化

我们接下来所要解读的是齐燕之间的地缘博弈。如果希望了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没有比“乐毅破齐之战”来得更生动的了。在这场战役中，齐国差点就被燕国灭亡了。而燕国虽然最终功败垂成，但也由此奠定了自己一流强国的地位。而齐国虽然复国成功，却从此由盛转衰，坐由秦人完成一统天下的进程。既然燕、齐两国是接下来的主角，那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战国中期，齐国的地缘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即将发生的燕齐大战又有何影响。

实际上，很多关注春秋战国史的人，会有一种感觉，齐国在春秋战国之时的地缘结构似乎没有大的变化。不像晋国（包括后来的三晋），从山西高原南部开始，统一了整个山西高原，并将河北平原大部纳为己有；三晋中的魏、韩两国甚至成为中原的主角；而在以后我们也会分析到，秦人除了在他们的传统地带——渭河流域（包括上游、支流的那几个高原）一统江湖外，还成功地向南发展，将汉中、四川盆地据为自己的大后方；至于说楚人，变化也不可谓不明显，最起码他们成功的逼迫越人退回了杭州湾以南，成为江淮的主人（不过楚人的大后方也失于秦人之手了）；即使是燕人，他们也突破了太行山——燕山的阻隔，拓地千里。

这样比较下来，齐人的地缘结构变化，似乎算不上新鲜。因为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战国，齐人还是在三个方向谋求突破：一是北面的河济平原；二是西南面的泗水中游地区；第三就是被泰沂山脉所合围而成的“鲁中山地丘陵地区”，在这个方向，鲁国一直是齐国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从结果上来看，齐人数百年的经营还是比较成功的。在河济平原，春秋中期所形成的汉志黄河与济水之间的新“河济平原”，大部分已经成为齐国稳定的外围地区了。只在泰山西南部的那块三角地区，齐国与魏赵两国还处在胶着状态。基于河济平原的东部是从河北平原进入中原地区跳板，魏、赵两国不愿看到齐国独霸整个河济平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泰沂山脉腹地，齐国也有突出的进展。在这个方向，齐长城已经不再是齐鲁的地缘分割线了。鲁国的控制区被压缩至蒙山——尼山——泗水上游一线。而泗水中游（微山湖及以南至徐州一线），以及当年吴王夫差所挖的“深沟”（菏水），成为齐国进入中原地区的所需跨越的最后障碍。至于说南线，齐国暂时没打算真的

将控制区延伸至淮河。对于齐人来说，那些江淮的蛮夷是最让人头痛的。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这个方向也不及在中原扩张更为诱人。从战略角度来看，齐国如果想从南线进入中原的话，首先要取得的是沂沭河谷的控制权；其次齐人需要将五莲山脉以东至连云港方向收为己有。在春秋部分我们已经知道了，前者的控制者为那个东夷大国“莒国”，而后者则是越国的北进基地。

最终齐人还是完成了这个战略构想。只不过莒国是被楚人先灭的（公元前 431 年），而后齐人凭借地缘优势又将楚人挤出了沂沭河谷；而越人在陷于内乱后，也放弃了他们的这个突出部，退回到了连云港以南地区。不过越人在整理好内部矛盾后，倒是很想再现勾践当年之勇的，因此在公元前 312 年也决定参加中原各国的“合纵连横”游戏，与魏国联手进攻齐国。只是齐国成功的游说，让越人先将楚国成为率先攻击的对象，以先成为江淮的霸主。实际上从越人的角度看，这种选择并不算错误，最起码当年吴国就是这样做的，而楚人也确实时刻在想着统一整个江淮地区。



齐国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后期）

无论越人当年是怎么想的，此时战国诸侯的综合实力已经远超前春秋之时了。这主要是因为那种层层封建的组织形式，逐渐被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所取代，而这种改变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至于说越国，他们甚至还处在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因此越人败

于楚人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即使越国不向楚国主动进攻，楚国的东进也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最终连云港——徐州一线成为齐——楚两国的接触区了。

现在我们可以为齐国大致划出控制区的范围了。齐国的核心区还是在泰沂——五莲山脉以北，济水以西地区。这个主体为山东半岛核心区的地理单元，可以使齐国拥有“四塞之地”的美誉。而在这个核心区的外围，齐国与其他主要诸侯，也基本确立了黄河（汉志河）——大野泽——泗水一线的地缘控制线。站在齐国的角度

看，如果无意去淮河流域招惹那些蛮夷的话，河北平原和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就应该是下一步的扩张方向了。如果齐国的扩张方向是在河北平原的话，那么和齐人发生地缘矛盾的就应该是燕赵两国了。由于在战国中期，黄河已经固定经汉志河流入渤海，而滹沱河和漳水这两条横切河北平原的重要河流，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河道东入大海（漳水在快入海时，还是与汉志河相交了，而漳水在出大陆泽之后，呈东西走向，因此也被称之为“横水”，现在的衡水市就是得名于此），因此也可以说，燕南长城与漳水（横水）之间的这片区域，成为华北平原北部地缘博弈的主战场。只不过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燕、赵、齐三国地缘博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罢了。由于这块区域实际上是位于禹贡——汉志河道之间，因此它的地缘标签叫做“河间”。

对于齐国来说，如果要想在华北平原北部更进一步深入的话，那么他们首先要占据河间地区。问题是，如果齐国在占据河间地区之后，再想前进的话就很困难了。在北部，燕国已经据南易水——滹沱河下游构筑了河堤长城，向其他诸侯宣布了自己的核心利益区；而在西部，在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灭掉中山国后，赵国在“河间”地区的西部的扩张已经达到了顶峰。如果齐人想从这个方向扩张的话，那些半胡化的轻骑兵绝不比那些楚蛮好对付。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无论齐国向哪个方向扩张，都会碰到必须解决的困难的。

第四节 齐国趁燕国内乱攻入蓟城

对于齐国来说，它最大的优势是地缘结构一直比较稳定。即使是在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之后，齐国的地缘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改变更像是后来宋朝的黄袍加身，将柴氏之“周”，平稳过渡为赵氏之“宋”一样。只不过田氏在取代姜姓成为国君之后，太过珍惜“齐”国这块金字招牌了，以至于连国号都没有变。说到这里，要多提一下，田氏的祖先是陈国的公子，当年为了避祸来到齐国（前672年）。经过将近300年的经营，最终反客为主，成为齐国的主人。

这个过程也告诉我们，就个人而言，出生在什么样的地理单元，并不会成为影响我们人生道路的主要问题，就像中南海里坐着的并不一定是北京人一样。地缘研究的意义更在于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从人的角度看，一个王朝的更迭会造成统治阶层的大换血，为精英阶层输送新的血液；而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也势必会造成土地的重新分配，缓和社会矛盾。也就是说，齐国的这次易主，其实对于齐国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

当齐国稳定住河济平原，向河间地区渗入时，西面的赵国还在与中山国处在胶着状态，暂时还无法对齐国构成威胁。但齐国也没有想过去趟这池浑水，毕竟三晋与中山国打了这么多年，齐国这个“外人”还不如坐山观虎斗；如果西线暂时不作他想的话，那么就需要在北面的燕国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了，只不过要想攻破易水

长城，始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政治家来说，机会往往出现在对手内乱之时，而在公元前 314 年，齐国的机会终于来了，而这次机会的到来，居然也跟“江山易主”有关。

如果说晋国的分裂和齐国的易主，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类似故事的话，那么燕国这次“江山易主”事件的起因，就有点与众不同了。因为当时的燕国的第三十八代国君燕王“哙”居然决定主动将王位禅让给他的丞相。这在以大禹开创以血缘关系传承统治权的时代之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不管这位燕王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看了最近那些大师仙人的表演，我深信这位燕王是“自愿”的），这种做法势必会引起燕国的内乱，因为这意味着旧贵族要交出他们的既得利益，整个燕国的组织结构要重新洗一遍。并不是说，这种改朝换代不可以，田氏在齐国就取得了成功。只不过田氏的成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和三晋的做法如出一辙。即先做大自己，架空公室，然后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而那位丞相则将主要目标放在搞掂燕王身上，至于他在国内的势力还远没有达到架空公室的程度，这就造成了双方的对立，以至于战争。

燕国的这场内乱，并不仅仅牵扯进了内部的贵族，也让其他诸侯有了介入的机会。赵国正是以此为契机，先挑动中山国进攻燕国，然后借中山国战线拉长之机，灭了中山国。而正在谋求北进的齐国也看到了机会，开始直接进攻燕国了。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与现实情况，齐国的攻燕行动获得了成功，齐国人仅用了 50 天时间就占领了燕都蓟城。问题是，在诸侯林立的时代，对一个国家的战争取得胜利是一回事，要想完全占领一个国家又是一回事。因为将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完全吞并，意味着你的实力将超出其他对手一大截，这势必会打破旧有的地缘平衡。因此在看到齐国有灭燕的危险之后，燕国开始得到其他诸侯的支援，向齐国共同施加压力。而齐国最终也撤出了燕国，暂时满足于占据河间地区。

这种攻入一国国都，在其他诸侯的干预下又不得不撤出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常见的，所维系的都是一种地缘平衡罢了（也为那些善言之士找到了发挥的机会）。齐国也不必有什么遗憾，因为不久以后，齐国也会成为这种思维的受益者。当齐国暂时冻结他们在北方的行动之后，齐人需要再寻找新的扩张方向。将那个已经基本处于齐国包围之中的鲁国吞并掉，固然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也更能提升齐国东方霸主的地位。但鲁国之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除了泰沂山脉为它的防守提供了屏障之外，更重要的是，鲁国的存在是防止齐国坐大的重要保证。因此齐国如果想完全吞并鲁国，受到其他诸侯干预的情况，甚至要大于他们灭掉燕国。

鲁国的存在，让齐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原地区无法直接接触，也使得齐人在大部分时期只能以河济平原为主要扩张方向。不过当齐人将防线渗透至大野泽——泗水一线，并取得了沂沭河谷的控制权后，齐国已经能够从南北两线绕过鲁国，直接向中原渗透了。而在那里，他们将遇到的是另一个二流强国——宋国。

第七章 宋国在战国时与邻国的分界线

第一节 宋国能保持良好局面的原因

说到“宋”这个国家，虽然我们在春秋之时也经常涉及，但其实并没有对它的地缘结构做过详细解读。宋国最“辉煌”的时候，当然是在那个“仁义”的宋襄公时代。不管这个颇有仁者风范的君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但宋国在那时也的确风光过。当我们将时光转移到战国中期时，我们会发现，相比于其他几个老牌二流强国，宋国还算混得不错。

最起码在它的西面，那个死对头“郑”国，在公元前 375 年就被韩国灭了；北边那个最好的卫国，也早已名存实亡了。卫人在河济平原的土地只剩下个都城“濮阳”用来祭祀先人了。至于说东面的鲁国，早就对扩张不抱有幻想了。能够保住都城曲阜周边那一亩三分地，为周礼传承薪火就不错了。而宋国的地缘实力似乎并未见削弱，最起码在战国七雄相继称王之后，宋国也耐不住性子，开始称王（公元前 318 年）了。如果和其他“王”国相比，宋国和中山国的实力差不多，都是自认为有“五千乘”的实力（大国是“万乘之国”）。以这种实力，勉强过把“王”瘾倒也不错，但要想在地缘博弈中占得先机就太困难了。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以宋国这种四战之地的位置，为什么反而在郑、卫、鲁、宋四个中部二流强国中混得最好，特别是与最先被灭掉的郑国相比。宋、郑两国的地缘位置是比较类似的，一东一西，占据了中原地带的两端，而灭国时间却相差了 90 年（宋国是在公元前 286 年为齐国所灭）。实际上，90 年的时间放在历史中并不是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宋、郑两国被那些边缘大国所灭，是迟早的事，谁先谁后并不会质的区别。不过郑国亡在前头，也还是有地缘方面的原因的。因为郑国的位置正处在中原的西部，无论是秦人还是晋人，如果想进入中原争霸，都会将目标首先对准它。另一方面，从南阳盆地出“方城夏道”向中原渗透的楚人，也是郑国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说，郑国的位置处在几方博弈的焦点，承受的压力也最大，以至于当晋国分裂为三个同等实力的强国时，率先被东进的三晋所灭。

而处在中原东端的宋国，所承受的压力就要小得多了。无论是渭河平原的秦人，还是山西高原的晋人（包括后来的三晋），或者说江汉平原的楚人，核心区都离宋国较远。齐国的核心区算是离宋国比较近的了，不过齐宋之间要想发生直接的地缘博弈，得先想办法跨过鲁、莒两国。因此与诸大国的核心区相隔较远，没有处在地缘博弈的焦点上，为宋国的生存赢得了时间。

如果我们跳出地缘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为宋国的中兴找到些许理由。因为在公元前 350 多年时，宋国也发生了和晋、齐、燕类似的事情，也就

是说出现了君位易主的事情。不过宋国这次上位的“权臣”（或说家族）“戴氏”（名喜，字“子罕”），与宋国的国君算是远亲，往上数 400 多年，是春秋之时“宋戴公”的后代。不管这种隔了数百年的亲缘关系已经出了多少服，在重视祖先崇拜的中央之国看来，还可以算是同宗。

因此这起被后人称之为“戴氏代宋”的事件，被史家定性为“曲沃代翼”一类的内部矛盾处理了，也就没有“田氏代齐”那般出名了。不管这件事怎么定性，贵族阶层和土地的重新洗牌都是在所难免的了。而这种变化，虽然从战略上看，无法改变一个国家的地缘条件，但在战术上却经常可以让一个国家焕发出新的活力，宋国的称“王”也可以算是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了。

不过宋国称“王”也就意味着它的末日即将到来了。这其中的原因倒不是在于宋国称不称王，而在于战国中期各路诸侯纷纷称王。这意味着地缘博弈的指导思维，已经从“称霸”转向“称王”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称王称霸”一词，以比喻那些强势的人或者团体，但其实“霸”与“王”是存在着质的区别的，前者所谋求的是在体系中的独大；而后者所追求的则是将整个体系归于一家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诸国相继称王之后，天下重归一统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宋国称不称王已经不重要了，最后过一把“王”瘾，也算对得起宋人商王族的出身了。

其实宋国的命运有点像 1897 年成立的“大韩帝国”。虽然这只是日本用来将朝鲜半岛从中国隔离出来，然后吞并的手段，并且只存在了 13 年（日本人等不了太长时间，1910 年正式吞并“大韩帝国”），不过却着实让半岛人过了一把“皇帝”瘾，并且为现在的“大韩民国”找到了一个更为“高贵”的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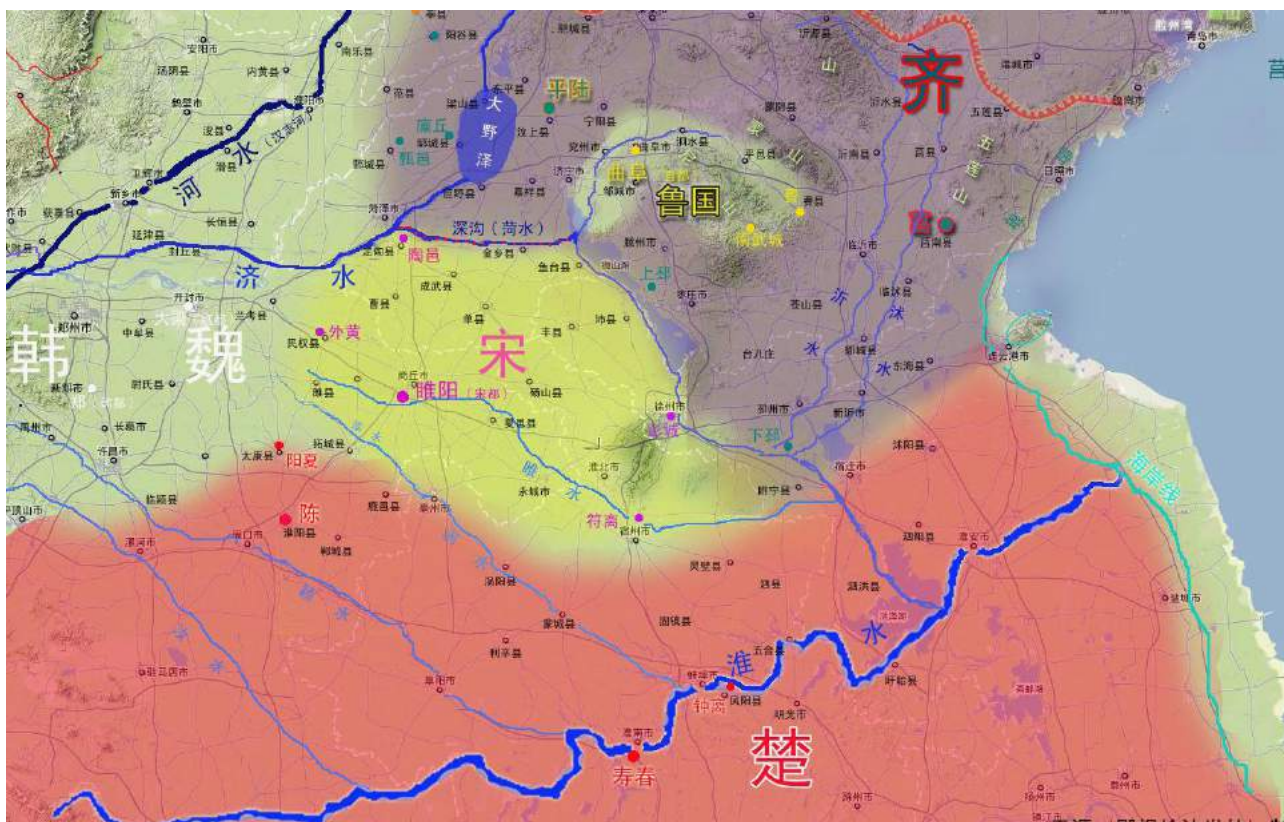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宋国与邻国以河流为分界线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宋国在中兴之后的核心控制区了。诚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宋国的中心是在它的国都“睢阳”，也就是现在的商丘市西南（睢阳区）。正如中央之国的每一个地缘板块都有一条母亲河一样，宋人的核心地区也是在一条河流之侧，这条河流叫做“睢水”，是泗水的一条支流。不用过多解释，大家也应该清楚，所谓“睢阳”就是建于“睢水”之北了。不过古睢水现在已经没有了，处在那条变化无常的黄河的势力范围内，想独善其身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虽说睢水已经没有了，但是在“睢阳”的南北两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睢县”与“睢宁县”两个地名，前者位于睢水的上游，后者则位于睢水汇入泗水的地方。而宋国的核心地区基本就是围绕着睢水东西两侧拓展的。当宋国向北扩张时，我们很容易为它与其他诸侯找到一条地缘分割线，那就是济水，以及当年吴王夫差所挖，用以沟通济、泗两水的“深沟”（菏水）。在春秋时期，宋国的北部，济水的南岸

则是被另一个诸侯小国“曹国”所控制。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曹国也曾经和其南北的“宋”、“卫”两国一样，成为晋楚争霸的棋子。

宋国灭曹是在公元前 487 年，那时正是地处东南的吴国最威风的时期。三年以后（前 484 年），吴王夫差就正式挺进中原，开挖“深沟”，与晋国争霸于济水之侧的“黄池”。吴国如昙花一现的辉煌，我们在吴越部分已经唏嘘过了。虽说吴国和之后的越国都放弃了在中原的努力，但深沟或者说荷水的存在，却直接提升了济——荷相交地区的地缘价值。而在这个纵横交错的交通枢纽地区，宋人在曹国故地所建立的城邑——陶，则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央之国的地缘中心。这种枢纽地位，并非一定要在战争时期才能得到体现。正如长城上那些构筑在交通要道上的关隘一样，商业价值才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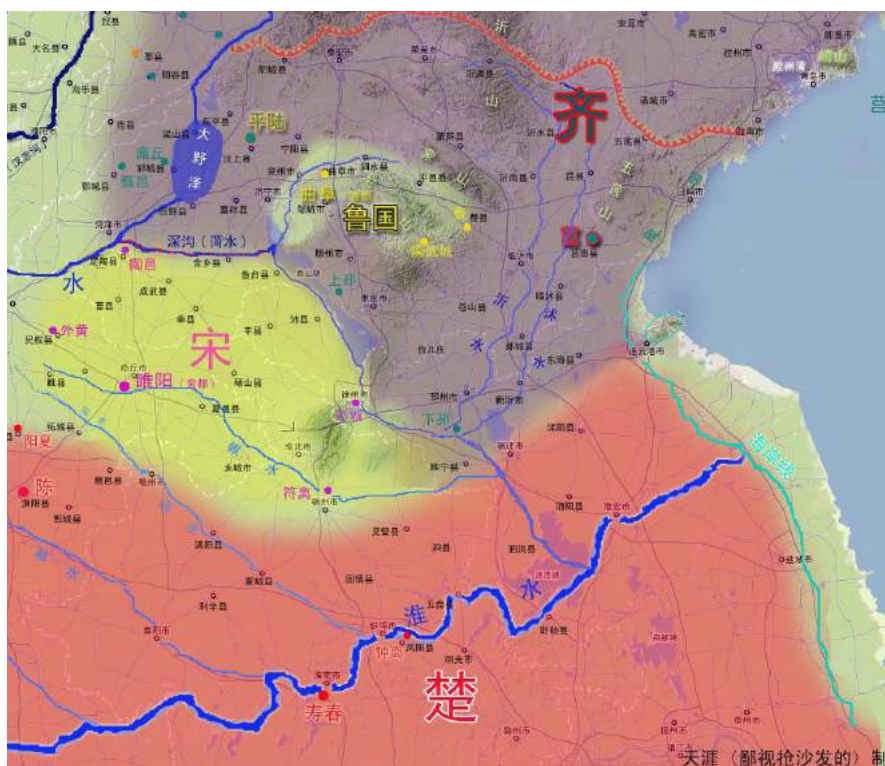


齐——宋——楚地缘关系示意图

最先发现“陶”邑商业价值的人，并非宋人，而是一个楚国人。其实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商业奇才越国人，因为正是有了他的帮助，越王勾践才能够最终反败为胜，灭吴称霸。从正式的记录上来看，他的名字叫做“范蠡”，而如果从商业角度来审视他的话，“陶朱公”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财富的代言人了。关于范蠡这个人，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卧薪尝胆”的故事中是一个重要的配角，还因为传说他与故事中的女主角“西施”最终私奔了。这个故事的产生，当然是寄托了大家的美好愿望，正如我也希望李师师真的和燕青有个美好结局一样。不过让

我去考证这对郎才女貌的璧人到底有没有个大团圆结局，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到底有没有“西施”这个人，都存在很大疑问。但范蠡最后归隐，并富甲一方的地方，却是有据可查的，那就是陶邑。

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归隐的地点，除了看中“陶”邑的商业潜力外，更是因为心中清楚，灭吴之后的越国，无论是否吸取吴国的教训，都无力再向中原渗透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必担心重新落在勾践的手中了。尽管“陶”邑的地缘价值在今天已经远不如当年了，但“陶”这个名字还是得以保留至今，现在那一带被叫做“定陶”市。有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加上宋国所处的大平原地区耕种条件极优，宋国的地缘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虽然没有险关要塞拱卫四周，但可以用实力（包括人力、经济）来拉平这种地缘劣势，这一点倒是和一千多年后的宋朝非常相似。至于这种补偿方式能平衡多久，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齐——宋——楚地缘关系示意图

虽说宋国的地缘位置是典型的“四战之地”，也并不意味着宋人不能为自己找一条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地理特征，作为与其他诸侯的地缘分割线。在华北平原上，宋人所能够做到的，和河北平原上的几个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所能够指望的也就是河流了。从北部来看，济水——菏水自然是可以为宋国划定一条明显的分割线；而在西部，当年宋襄公的成名之作“泓

水之战”中的泓水，是宋人所设定的主要防线。我们在前面曾经解读过，所谓“泓水”实际上是淮河的一条主要支流“涡水”（现在叫涡河）上游的一条源流。无论是哪个诸侯，如果从西面渡过了泓——涡防线，宋人就只能在睢水之侧与之作最后抵抗了。

至于说宋国东侧的防线，则更为明显了，作为山东丘陵与中原地区的分割线——泗水，是宋人向东扩张的极限。在春秋及战国前期，整个泗水流域（包括沂、沭、睢这些支流）存在着许多小国。而这些小国，则是分布在泗水两侧的二流强国——鲁、宋的争夺对象。他们一起在战国初期，甚至曾经通过会盟组成过一个“泗上十二诸侯”

的地缘政治集团。当然，这种政治集团更适合作为地缘标签，其实是没有多大政治作用的。至于说“泗上十二诸侯”到底包含哪些诸侯，现在还没有定论。只不过这些泗水国家，最终的命运都是相同的，就是被那些大国所吞并。作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宋、鲁，只是比别人支撑得更久而已。

就泗水国家的组成而言，大部分都在泗水以东，比如我们在春秋部分已经分析过的鲁、莒、费，还有一些名气不大的邾、薛、滕、郯等国。有兴趣的可以去考证一下他们的位置，都是在泗水与泰沂山脉之间。也就是说，靠山面水的位置，增强了这些小国的生命力。而在泗水以西，一马平川的地形，使得宋国最终还是渗透至泗水的西侧，以泗水（主要是现在成为微山湖的那一段）为自己与山东丘陵诸国的地缘分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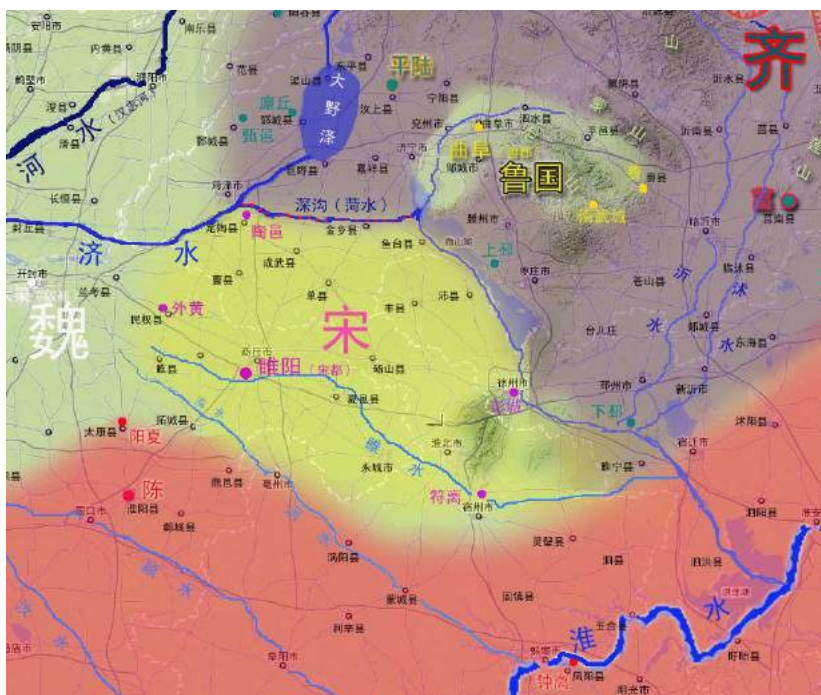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宋国的大致形状了，济、菏、泓、渦、泗诸水为宋国的北、西、东三面划出了一个大致核心控制范围。而宋人接下去做的就是，在南部再找一条河流，作为自己的南方防线。如果从地理的角度看，那条位列四渎，独流入海的“淮水”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了。不过早在泓水之战时，我们就说过了，那个江淮的霸主“楚国”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第三节 宋国建立符离塞作为南部防线

从支流的分布区域来看，淮河和黄河下游有些类似，即支流都只存在于干流一侧。流入黄河的支流，都是在西侧，大都是发源于太行山——燕山一线的河流。当然，现在黄河已经走夺济入海路线了，并且由堤坝围成了地上悬河，整个下游可以说无任何支流可言了（之前的支流，都独立或合力注入了渤海，成为“海河水系”）。

而淮河的支流则全部存在于北侧，比如发源于伏牛山脉的汝、颍两水，以及发源于泰沂山脉的泗、沂、沭三水（沂沭两水先入泗水，再入淮水）。在这种情况下，沿淮水向东扩张的楚人，很自然地也会沿着这些支流向北渗透。而这种溯河而上的渗透方式，使得中原地区，乃至中原西侧的洛阳盆地，东侧的山东丘陵地区，都成为楚人的渗透方向。也正是由于淮河支流的南北走向，楚人与中原诸国之间甚至很难有明显的地缘分割线。大家所凭借的更多的是自己后方的地缘实力，谁的实力大，谁就能够更进一步。相对而言，已经横贯东西的楚国，综合实力要强于条块分割的华北平原诸国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楚国以一国之力，能够占据一半以上淮、济之间的平原地带。

对于宋人来说，他们在泓——渦一线的防线并不是那么可靠，很多时候睢水本身才是宋人的主要防线。而在睢水即将流入泗水的时候，宋人却意外地找到了一点可以依托的山地。如果我们在地图上顺着睢水或泗水南流的方向向下看时，会在江苏的徐州至安徽的宿州一线发现一条丘陵带，并且恰好位于睢——泗两水之间。这



齐——宋——楚地缘关系示意图

名，是因为这里曾经挖出一位楚王的陵墓，里面有四千多件兵马俑。不过狮子山中埋葬的“楚王”，其实是汉朝所分封的。当年汉高祖定天下之后，其实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战国后期的地缘格局，只不过那些夹杂在郡县之中的诸侯国，基本都是分封给刘姓子弟了（汉初那几个异姓王的下场，相信大家都清楚的）。

在划分“天下九州”的理想格局中，泗水以东流域，包括沂沭两水所流经地区，都被归入徐州的范围。而所谓的“徐州”之名，其实也是在泗水上下不断地变化。战国时期的“徐州”之名，并不是归属于现在的徐州市。现在的徐州市一带，当时叫做“彭城”。由于彭城一带正好处在山东丘陵与淮河平原的交汇处，又有些山地可以依托，因此在秦汉以后，成为淮河流域东部的地缘中心。

在宋国还没有被齐国吞并之前，彭城地区是为宋国所控制的。而在这条连接泗、睢两水的丘陵带南端，宋人则依山傍水建立了另一个要塞——“符离”塞（现在的宿州市北）。依托这条丘陵带与睢水建立的防线，宋国得以在南线抵挡住了楚的渗透。在宋国自认为有半个强国的实力并称王之后，他们甚至向南扩张，侵占了楚国在淮河以北的部分土地。诚如我们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样，楚国在这一带的控制力是最为薄弱的，尤其是他们还在对付、整合越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视线移向彭城的东南方向时，就会发现，源自山东丘陵的沂、沭两水也在这一带与泗水合流。如果楚人希望进入沂沭河谷，甚至进入山东半岛腹地的话，这个三水合流处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略要点。而这个战略重地，在春秋之时是由一个叫“邳”的泗上小国所占。在最初的时候，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邳国选择了依附于楚国。而在齐国从楚人手中夺取莒地之后，也顺势取得“邳”国控制权。

条大致呈南北向的丘陵带，实际是弧状的“泰沂山脉”的南部延伸。如果我们将这条丘陵带与整个泰沂山脉看成一个“？”的话，那么这条丘陵带就是问号下面的那个点，而它与主体之间的分割线就是泗水。

这条丘陵带并没有一个整体的名字。不过它的北端在现在徐州市境内的部分山体名气比较大，特别是徐州市东南侧一座海拔61米，被称为“狮子山”的一座小山峰。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曾经挖出一位楚王的陵墓，里面有四千多件兵马俑。不过狮子山中埋葬的“楚王”，其实是汉朝所分封的。当年汉高祖定天下之后，其实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战国后期的地缘格局，只不过那些夹杂在郡县之中的诸侯国，基本都是分封给刘姓子弟了（汉初那几个异姓王的下场，相信大家都清楚的）。

这个战略要点的归属成为齐国能否控制整个沂沭流域的关键，也成为齐国能否与楚国达成新的地缘平衡的标志。

最终的结果是，在公元前 339 年，邳国在齐楚两国的双重压力下，迁到泗水中游，即现在的微山县东，枣庄、滕州之间，故地由齐国占据。当然，这类泗上小国的最终命运只有一个，就是被完全吞并。由于邳国曾经两地建国，因此后来据此所建的城邑依其在泗水的位置，分作“上邳”和“下邳”（在现在的睢宁县北古邳镇）。而齐国在“下邳”所封建的大臣，很多人应该也有印象；记得中学课本里有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古文，为齐国筑守南疆的这位重臣，正是邹忌。

邹忌所规劝的这位齐王叫做“齐威王”，他即位时，距离田氏代齐已经 30 年了（公元前 356 年——公元 386 年）。按照一般规律，这个时候，新的体系已经趋于成熟稳定，在解决完内部矛盾后可以向外扩张了。而齐威王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公元前 334 年，率先在诸侯中称王后，齐国开始向传统的扩张方向——河济平原推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至于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则要放到后面解读了。可以透露的是，除了邹忌以外，齐威王还重用了两位“名人”，其中一个叫做田忌，一个叫做孙臧。

第八章 齐魏两国爆发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第一节 齐国与三晋分割河济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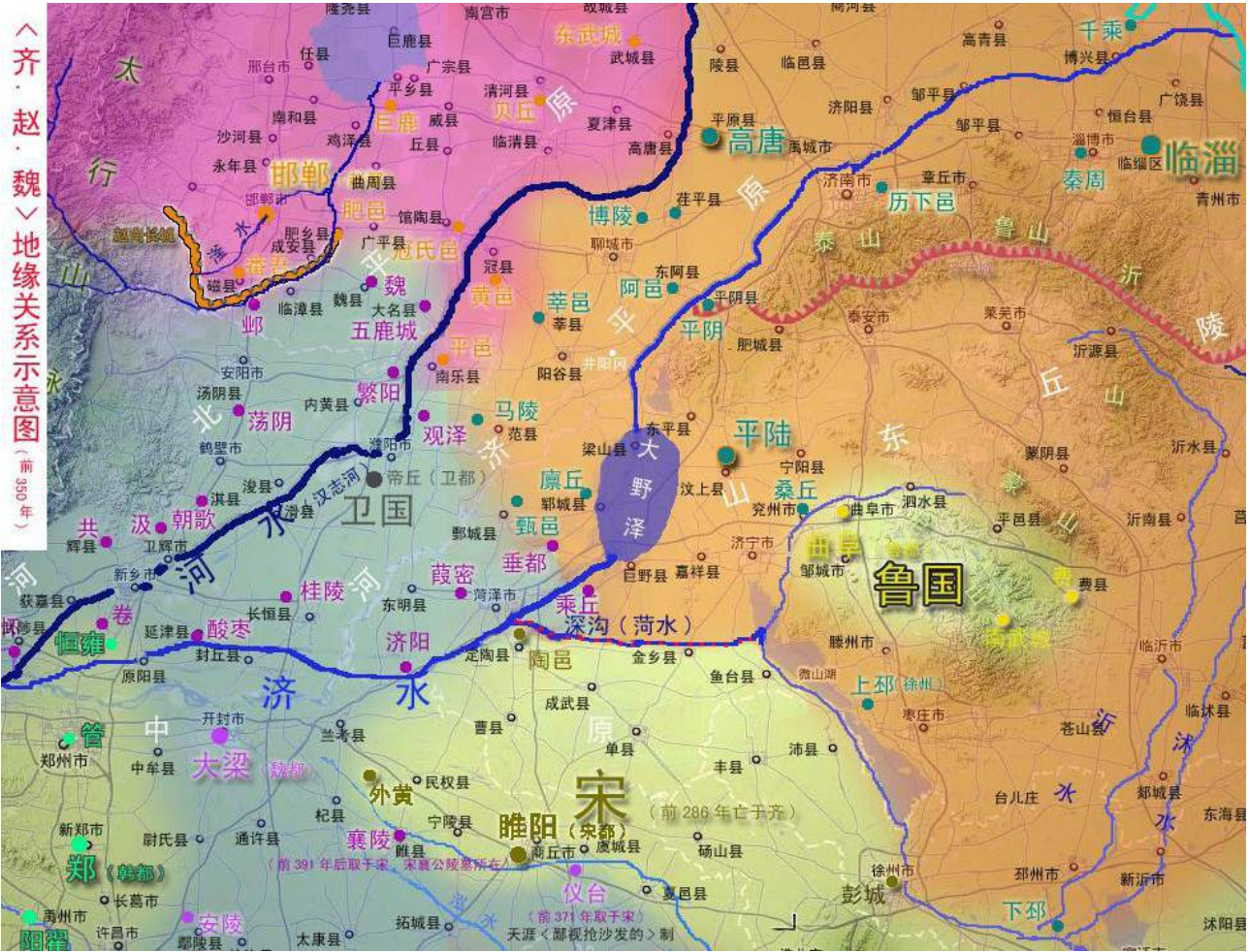
分析过齐国在战国中期的地缘结构后，我们知道，齐国在北部的稳定控制区，是河济平原的西部（泰山以西部分）。纵观河济平原的轮廓，我们会发现，济水在流至泰山北部时受到泰沂山脉的阻挡，在与支流蓄积而成大野泽后拐至泰山北麓，然后再继续东流。而黄河（汉志河）在与济水同向而流到了济水这个拐点的北侧时，也拐了个弯再继续向西北方向流入渤海。只不过黄河这个弯拐的方向与济水正好相反。这就使得河、济两水在泰山西北侧离得特别近，也将本应该成三角形的河济平原，切割为一个不太标准的葫芦形。而这个头西尾东的“葫芦”，下部（西部）正处在齐国核心区的北部，地缘关系也更为紧密。而这个“葫芦”的上部（东部），则注定要成为齐国与华北平原诸侯博弈的焦点。

如果要为战国诸侯们论资排辈的话，齐国的资历以及实力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了。虽说当日姜太公打下来的江山已经易主为“田氏”，但齐国这个地缘标签的含金量却丝毫没有降低。包括齐国与其他国家的地缘关系而言，也没有大的变化。齐人在河济平原的主要对手也还是来自山西高原的“晋人”，只不过当年的劲敌“晋国”已经分裂为三个同级别的敌人了。而这其中，继承了晋国核心遗产的魏国，则是齐国最大的敌人。其实魏国并不仅仅是齐国的劲敌，可以说战国前期，魏国挟晋国之余威东征西讨，已经成为战国诸侯中的最强者，几乎打遍了所有对手。即使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人，也在魏国面前吃尽了苦头。因此齐国如果想在华北平原有所作为的话，首先就必须与魏国PK。

宋鲁两国如果想扩张的话，这个“葫芦头”（可称之为“西河济平原”）的位置，倒是首选区域。事实上他们在春秋之时也的确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不过现在是战国了，二流国家的首要目标是保住自己国都周边的区域，这种四战之地的舞台，还是大国们在唱主角。其实说到河济平原，就不得不提到卫、邢两国。当年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将被戎狄挤出河北平原的卫、邢两国安排到了河济平原。其中邢国的位置就在这个“葫芦头”的东部（现在山东聊城一带），靠近腰部的位置，而卫国则是在西部（河南滑县一带）。如果说齐国自己的控制区是在泰山以东的葫芦底（可称之为“东河济平原”）的话，那么将卫、邢两国安排在此，目的就是为齐国缓冲来自河北平原的地缘压力。

从当日齐桓公的设想来看，当然是不错的。不过任谁被放在“西河济平原”这个四战之地，都不免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在晋文公获得王室授权，“合法”的进入河北平原后，齐国和邢卫两国所要面对敌人，就不再是那些南下的戎狄了。而

在接下来晋国称霸的过程中，卫、邢两国也必须在晋国和齐国之间做出选择了。选择的结果是符合双方的地缘位置的，位于西部的卫国选择了倒向晋国；而与齐国相连的邢国，则留在了齐国的联盟中。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后，卫、邢两国之间进行了一场战争，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这其实应当算是一场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战争的后果是邢国被卫国所灭（635年），或者更应该被认为是晋国取得了胜利。3年以后，同样有意北上争霸的楚国也开始向西河济平原渗透了，处在博弈中心的卫国又转而倒向了实力看似更强的楚国。以至于晋、楚两国在卫国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场决战，这场战役就是我们在春秋部分分析过的晋文公称霸之战——“城濮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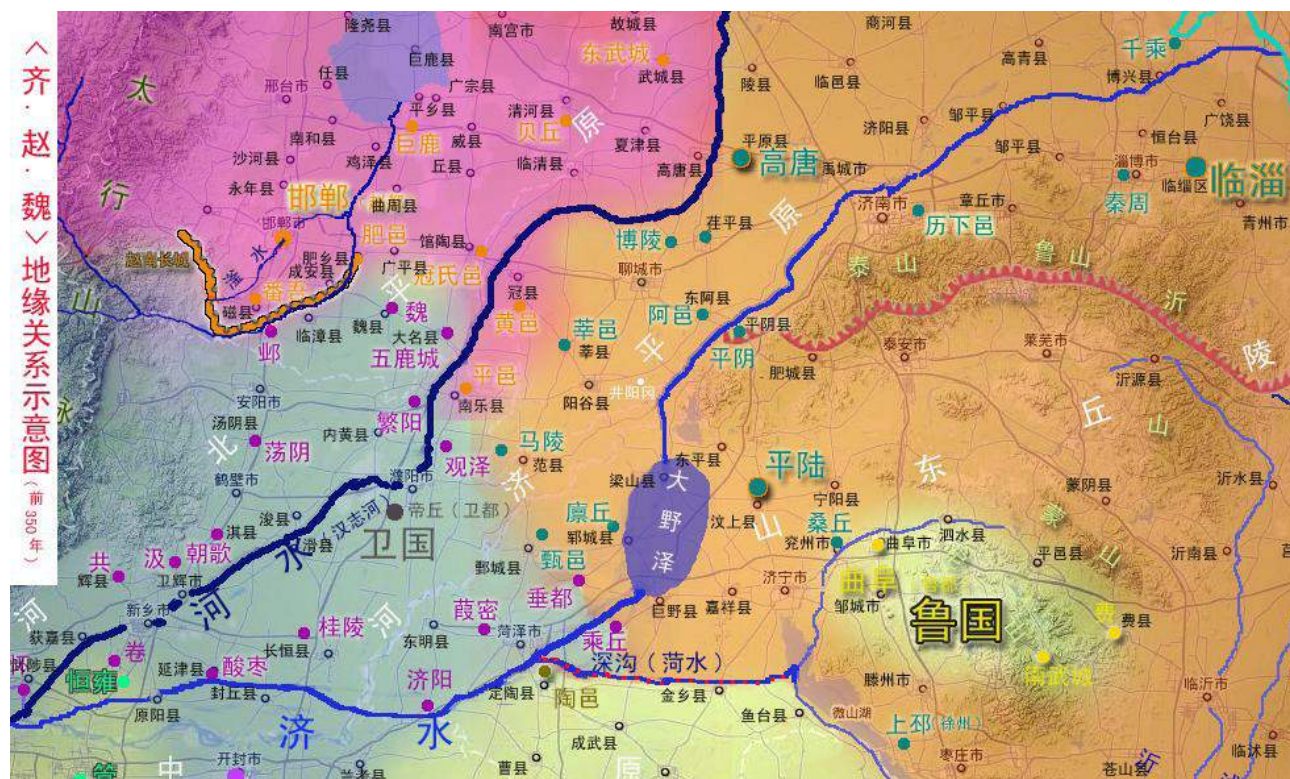


齐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

卫国灭邢之后，邢地自然是归卫人所有；而在晋国清理门户，称霸中原后，卫国独占整个西河济平原的梦想自然也就很快破灭了。不过晋国也没有笑到最后，齐国的核心区离这个葫芦头的距离始终是优于晋国的。即使是在晋国和后来的三晋提升了河北平原的地缘地位，齐国也不可能坐视晋人独占西河济平原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在战国时期，齐国的控制线已经推进到大野泽西侧，接近济、荷相交的菏泽了。换句话说就是当日的邢国故地，现在成了齐国的直接控制区了。齐国之所以能够东

进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国已经守不住泰沂山脉这条齐鲁地缘分割线了。当齐长城不再是齐国的外围防线时，齐国自然可以通过泰沂山脉的腹地，越过大野泽一线的济水，为齐国在西河济平原的扩张区提供支撑。

为了确保齐国在河济平原的优势地位，齐国在那个河、济两水距离最近的区域，也就是东、西河济平原的结合部设立了一个军事重镇——高唐邑。而在鲁国龟缩至尼、蒙山一线后，在泰沂山脉的腹地，齐国也设立了一个同样级别的军事重镇——平陆邑。这两个军事重镇的存在，稳定了齐国在西河济平原突出部的战略安全（至于说这两个城邑在整个齐国地缘结构中的地位如何，我们在后面会分析到。）；而齐国沿济水两岸齐头并进的渗透方式，也让齐国的西进显得更为稳健。



齐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

在齐国向西河济平原渗透时，作为晋国继承人的三晋自然也不会放弃这块土地。且不说当日晋国已经渗透至此，单是三晋稳固住在河北平原的优势地位后，再南进中原时，就必须越过这块三角形的西河济平原。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如果执意要把头伸得太长，是很容易被河北平原上的三晋切断的。基于实力和地缘位置的关系，主要继承了河内之地的魏国，成为三晋中在西河济平原扩张的主力。而博弈的结果，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邢卫主导西河济平原的时期。也就是说魏国基本控制了卫国当年在河济平原的领土。至于说那个没落贵族——卫国，他们就只剩下最后定都的“濮阳”了（原来也叫“帝丘”）。关于卫国为什么一直没有被灭，一直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没有一个定论。如果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解释，风暴中心往往却是最平静的（所谓“风

暴眼”);如果让哲学家说的话,那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不管怎么说,即使是在近现代,也会有一些生存在大国夹缝之中看似没有生存理由的小国存在。有时候大国之间竞争,也需要有些小国来做一些中立的事情的(比如瑞士)。

不管怎么说,卫国在先秦的名声还算不错(除了把同宗的邢国灭了的那一次),被称之为“君子之国”。不过一般群众对君子都不太感兴趣,所以那个好男色,与后世同有此好的汉哀帝共同创造了“分桃断袖”¹这句成语的“卫灵公”;以及他那曾经勾引孔圣人的夫人——南子,似乎更为世人所熟悉。当然,卫国的名声并不会为这对夫妇所连累,因为它还出过其他先秦史上的重要人物。文有“商鞅”(原来叫“卫鞅”),武有吴起;政治家则有那位商人出身的“吕不韦”)。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国家,让它留下一座都城,对诸侯们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而灭了它,风险却也不小(感觉有点像以色列,国家虽小,也在四战之地,犹太人却遍布全球,因此可以影响大国的决策,来为自己的母国保有一线生机)。

基于卫国在战国中期以后只剩下濮阳城了,且处在魏国的包围之中(估计帮助魏国走向富强的“吴起”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基本可以无视它的存在了。而三晋中的另两个领衔主演——赵国和韩国,却不好无视了。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赵国无论是在山西高原,还是华北平原,都是力主向北发展的。因此当赵国将地缘扩张的重心移向华北平原后,大陆泽以北的中山国才是赵国重点攻击的方向。而当赵国也向东面自然渗透时,与赵国在华北平原的核心区所平行的东河济平原,将会是赵人的渗透方向。不过这一地区,齐国人自春秋之时就已经开始经营了。他们甚至早已越过汉志河,向那几条黄河故道之间的河间地区渗透了。而东河济平原之于赵国,又不像西河济平原之于魏国那样重要(魏国需要它连接自己在河北平原以及中原的土地),因此赵国基本的定位,就是将齐人赶出河间地区,以让汉志黄河成为齐赵之间的地缘分割线。

不过赵国对东河济平原的兴趣不大,并不代表赵人对西河济平原没有一点兴趣。毕竟入主中原是每一个诸侯的梦想。如果我们为河北平原上的赵魏两国划定边界的话,那么邯郸之南的那段漳水则是一个明显的地缘分割线,赵国后来在此修建了“赵南长城”。而漳水在摆脱禹贡黄河之后,并没有就此一直向东,而是沿着禹贡河道的方向(并不是一条河道)北流入大陆泽,然后再东流的。如果让赵国就此完全以漳水作为魏赵两国的地缘分割线,将意味着赵人要放弃大片漳水、河水之间的土地。而对于这样的结果,赵人肯定是不愿意的。更何况如果魏国寄希望于完全以漳水作为二者的地缘分割线,也无法在赵、齐两国的夹击之下,保有漳、河之间的那条突出地带(魏国重点拓展的方向在西线的渭河平原,以及东线的中原地带。向北部渗

1 断袖指西汉汉哀帝在起身上朝时,睡在旁边的董贤却压住了他的一个衣袖,哀帝不忍叫醒董贤,于是割断了被董贤压住的袖子:分桃指卫灵公与弥子瑕的故事。弥子瑕吃到一个很甜的桃子后,把这个没吃完的桃子给了国君。

透的想法，在灭中山国那次失败的尝试后就不作他想了）。

因此我们会看到，魏、赵两国在河北平原的地缘分割线，大致还是沿着漳水刚出太行山时的走向（东西），一直到黄河，或者说是与“赵南长城”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地缘格局意味着，赵国在河北平原的控制区与西河济平原也有接触。而赵国的地缘中心——邯郸城，与西河济平原北部的直线距离也很近。最终赵国还是在西河济平原沿黄河一线取得了一条南北向的突出部（据点是黄邑、平邑，从魏国手中夺取的），相当于在齐、魏两国的地缘博弈中横插了一刀，也成为西河济平原地缘舞台上的一员。不过赵国的南进战略也基本至此为止了，一直到赵国为秦国所灭，中原对于赵人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至于说韩国，基于他们在中原的西侧和河北平原的南部都有领土，而且是韩国最为重要的核心区，因此韩国人也希望能够在西河济平原上插上一脚。当然，以韩国的位置和实力而言，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河济相交的那个角。而韩国也的确在济水北岸，河济相交处有一个立足点（“恒雍”邑，现在河南省原阳县北）。虽然赵、韩两国分别在两端渗透入了西河济平原，但齐、魏两国才是西河济平原竞争的主角。接下来我们就将看看这两个国家，是如何将西河济平原作为地缘博弈的战场的。

第二节 齐魏两国爆发桂陵之战的历史背景

如果我们要为战国划定前中后三个时期的话，那么不管战国时代究竟从何时开始算，到了公元前350年前后，都意味着进入了战国中期。之所以要这样说，当然不是简单地把战国的总时间除以三，然后平均分配。断代的标准是要有影响地缘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地缘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公元前356年，第四代田氏之齐的君主继位了。而在这位齐国国君继位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战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使得战国时代进入了第二阶段。

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徐州相王”（公元前334年）。从此以后，这位本应该被称为“齐威公”的齐国君主就变成“齐威王”了。关于“徐州相王”，以及随后的“五国相王”，说穿了就是大家都抛开最后的面子，开始称“王”，并且真正开始以兼并为目的发动战争了。不过政治标签的改变，总是最后才发生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是什么导致了这么多“王国”的出现。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场政治变化的主角是齐魏两国。而如果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主角则是在徐州相王中加冕的齐宣王和魏惠王，因此也可以说是这两个在位时间分别为36年和40年的君主，共同将战国时代引领进了第二阶段。

战国前期或者说第一阶段的特点，就是魏国东征西讨，独领风骚。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一是因为魏国继承了晋国的核心遗产；二是因为分裂后的三晋虽然之间也是摩擦不断，但尚处在分家后的蜜月期，原则上还是能够达成战略同盟。不

过到了公元前 350 年前后，中央之国的地缘形势发生了变化了。在此之前，魏国虽然凭借晋国留下来的丰厚遗产，以及强势的战术（可以参看“魏武卒”的词条），在西线重新占据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在东线又切入了中原腹地，并且在大梁（今开封市）设立了新都；甚至还曾经北伐中山国，并取得成功。但这种两面甚至四面为敌的战略，终不能支撑太久。与此同时，西线的秦国和东线的齐国，都开始发挥自己的边缘优势，准备从两线挑战魏国的霸主地位了。

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秦国崛起的机会，是落在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秦孝公（公元前 361——公元前 338 年在位），另一个则是商鞅。至于说秦国是怎么做的，我们在战国的最后部分会有详细的解读。而解读时期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大秦帝国》电视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演绎的）。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在东线，看看齐国是怎么做的。而在古典时期，地缘博弈的最后结果，通常都是通过战争来体现的。这一时期的战争有很多，其中很多又是互相关联的。不过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有两场：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而这两场战役的主角都是齐、魏，配角则是三晋中的另外两个成员：韩、赵。

桂陵之战发生在齐威王继位后的第三年（公元前 353 年），可能很多人对桂陵之战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不过提到“围魏救赵”的典故，相信就耳熟能详了。所谓“桂陵之战”，实际上就是齐国为了救援被魏国围困的赵国，而实施的一场伏击战。其实战役的思路，仅从“围魏救赵”这句成语的字面意义，我们也能够了解齐国的战术了。桂陵之战和 12 年后发生的马陵之战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是因为这里面存在的戏剧性因素。即两个由同一个师傅（谜一样的“鬼谷子”）带出来的徒弟：庞涓和孙臆，将魏齐两国的地缘博弈演绎成了一场“兄弟”恩仇录。如果再为这个故事加上一个两人都爱慕的“小师妹”的话，那么即使是八流的编剧，也能写出一部狗血的电视剧了。不过，我们虽然要感谢庞、孙二人为战国历史的普及所做出的贡献，但还是要将重点放在其中的地缘因素上。

齐魏之间发生地缘博弈，并没有什么让人奇怪的。向东扩张的魏国，与向西渗透的齐国，如果不发生点事情倒是不正常的了。只不过两场战役的起因都不是因为两国发生了直接的地缘碰撞，而是因为魏国与赵、韩两个兄弟之国翻脸了。而这两次三晋的内部矛盾都是由魏国挑起的，分别是魏国在公元前 354 年围困邯郸（赵都）、公元前 342 年进攻新郑（韩都）。三晋的决裂并不算意外，三国之间犬牙交错的地缘形势，任谁都不会感到舒服，而由魏国率先发难则是实力使然。先对付赵国，根本原因则是因为魏国那次以失败告终的吞并中山国的远征。因为谁都看得出，无论赵国是否在暗中捣乱，魏国退出中山国，最后的受益者都是赵国。这次魏国决定不再实施蛙跳战术，而是步步为营，先占领赵国在河北的土地，再吞并中山国，最终统一整个河北平原。

当赵国受到魏国攻击时，他们还没有沿漳水一线修筑长城，因此实力占优的魏

军很快包围了邯郸城。在赵人被围困一年之后，支撑不下决定寻找外援了。而他们这时最能指望的，就是在魏国东侧的齐国了。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齐、魏两国的主要接触区是在西河济平原。这两个国家基本平分了三角形的“四战之地”。如果齐、魏两国发生直接战争的话，西河济平原注定会成为主战场。不过如果齐国想直接救援赵国的话，他们其实可以向西越过黄河直接进入赵国境内的。从齐国在河济平原的军事重镇“高唐”邑到赵都邯郸，距离并不算太远。不过齐军还是决定进攻魏国后方，以间接救援赵国。这种战术当然是很成功的，否则“围魏救赵”也不会成为经典战术。既然齐军选择了进攻魏国，那么双方的地缘接触区——西河济平原自然就成为战争爆发的焦点。而齐军所攻击的地点，则是一个叫做“平陵”的魏国城邑。

第三节 桂陵之战中几个关键地点的位置

说起西河济平原，以及诸侯们在这一地区的地缘博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菏水了。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了，菏——济两水相交处，可以称得上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军事目的，想成为中原之主，都必须控制这个点。由于菏水并没有穿济水而过，而仅仅是连通了济水（因为济水在西面与黄河相交了，所以黄河水系可以通过济水与菏水，乃至淮河水系相通），因此菏——济之间是呈“T”字交叉的。运用我们在小学学到的数学知识，我们也应当知道，这种组合方式会分割出三个区域，以共同拱卫这个交点。

在分析宋国的地缘结构时，我们已经说了，菏、济之南的这个点叫做“陶”邑，之前是由曹国控制的，后来则归属了宋国。而与“陶”隔菏水相望这个夹角，则是由一个叫“乘丘”的城邑所控。至于济水之北这个点，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平陵”了（网上有些文章解读平陵是在定陶之北也对，不过与陶邑是隔济水相望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在现在的菏泽市一带）。在魏国东扩之前，平陵和乘丘甚至魏国的新都“大梁”都是被楚国所占。在晋国忙于内部重组时，楚国在中原地区算得上是独霸一方了。他们甚至已经渗透至河济平原以及泰沂山脉腹地。平陵、乘丘甚至莒国都曾经是楚人的战利品。这些城邑所处的地理单元，毕竟已经远离楚国的核心区。楚人很难长期控制这些突出部。因此与莒地地缘关系更紧密的齐国从楚人手中夺取了莒地，而东进的魏国，则在西河济平原和中原的核心区将楚人赶回了淮北。

对于任何一个想入主中原的诸侯来说，菏、济相交的这个点，都是一个战略要地。而对于齐国来说，当他们控制了西河济平原的东部，并在与鲁国的地缘博弈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将防线推至泗水一线时，齐人已经无限接近这个战略要点了。也正因为如此，齐国所选择的救赵方式是攻击“平陵”。假如最终攻击得手的话，那么菏水以西的乘丘将成为一块完全与魏国无地理联系的飞地。那么这块魏国从楚国手中

所接收的突出部，自然也就没有理由不归于齐国了。其实从齐国的想法来看，与其说是通过围攻魏邑“平陵”来救赵，不如说是齐国借魏赵战事胶着之机，趁火打劫。不过既然有救赵这块牌子挡着，齐威王和孙臏也没有理由不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上。



齐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

“信都”）。不过对于齐国来说，如果魏国真的完全占据了赵国在河北平原上的土地，那么魏国的地缘实力将得到很大提升。而当时魏、齐之间的实力对比，本来就是魏国占强。即使让齐国占据几个边邑，魏国反过手来也很快可以将齐人赶回去。实力增强的魏国，甚至可能反手将齐国挤出西河济平原。因此从齐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不能坐视赵国退出河北平原的。那么来看看齐军是怎么做的？桂陵之战又牵扯到怎样复杂的地缘格局？

关于齐、魏之间的这场“桂陵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甚至庞涓有没有参与，一直都是争议不断。《史记》、《战国策》、《孙臏兵法》的说法都各有不同。其中一致的内容是，魏国派军围困了赵都“邯郸”，然后齐国派遣了一支部队偷袭魏都“大梁”，而后在“桂陵”伏击了轻兵回援的魏军，并大获全胜。这也就是所谓的“围魏救赵”。一般作为一个经典故事，也就简述这个过程，最多再点出上述三个关键地点就行了。不过我们所希望了解的就要深入一些了。第一步，我们需要知道这三个地点，都分别处于什么样的地缘位置。

首先是邯郸，这个赵国都城的位置应当是十分明确的。即使没有我们之前的分析，大家也应当知道它的位置，因为它的名字两千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从划分

既然齐国的攻魏行动其实是“以我为主”，有自己的战略目标，那么邯郸城的生死就不是考虑的重点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齐军隔靴搔痒的进攻“平陵”之后，魏军主力并没有回救，而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邯郸城。而赵国的公室则被迫北迁到邢地（今邢台），将其作为战时的陪都（命名为

地理单元的角度来看，无论黄河怎么流，邯郸城都是处在河北平原中部偏南的位置。而魏都“大梁”，基本就是现在开封的位置了。不过想去开封看魏都遗风的朋友肯定会失望的，因为你肯定在开封城内外找不到任何魏人的遗迹了。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处在中原之中的开封城，在历史上虽然多次为都，但也多次为黄河所淹。每发一次大水，旧有的城址建筑就基本上被黄河所带的泥沙所覆盖，之后回来的人又在被淤高的地面上重新建城。两千多年前的的大梁城，已经被压在好几层的城址之下了。至于说开封城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我们在分析魏、韩在中原的地缘结构时，会着重分析的。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开封城，北面是黄河，但在先秦时，黄河走的是“汉志河”道，大梁城的北面是济水（这段济水河道与现在夺济入海的黄河并不重合，位置再偏北一些）。也就是说，大梁城是处在河、济之南，是标准的中原腹地。当魏军想从河北平原的邯郸城，快速回师地处中原的大梁城时，他们就必须穿越西河济平原。如果不想经过这块四战之地的话，魏军就只能向东绕行至河、济相交点的西侧，南渡黄河到虎牢之东，然后再沿济水南岸到达“大梁”城。这种走法一是绕远，二是要经过韩国的控制区。倒不是说韩国会伏击魏军，只是完全没有这种必要罢了。因为魏国既然在河北平原和中原都控制有土地，他们当然没有理由不在河济平原布局，为自己打通一条战略通道。

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西河济平原的西半部已经大部为魏国所控制了。因此对于齐军来说，料定回援的魏军会直接穿越河济平原到达大梁，并不需要特别的智慧。由于邯郸城与大梁城基本上处于同一经度，因此魏军的回国路线大体会呈一条南北向的直线。只不过由于渡口和道路的选择，并不会就是一条笔直的道路罢了。齐军所选定的伏击地点——桂陵（现河南省长垣市西北）就是在河济平原之上。如果观察桂陵的位置，是处在邯郸与大梁之间连线偏东的位置。属于理论直线与实际道路之间的正常误差范围内（至于为什么在看似一马平川的河济平原上会出现这种偏差，我们在马陵之战中会有解读）。

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齐军所选定的伏击点在哪，因为当你料定了对方的行军路线后，自然能够找到合适的地点进行伏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齐军是如何到达桂陵，并在对方不知晓的情况下设立伏击圈的（要知道“桂陵”所处的位置，是处于魏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另一个问题是佯攻大梁城的齐军，是如何快速穿插至大梁城下的。而两个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另外两个没落贵族——卫国和宋国站出来说话了。

第四节 齐军在卫国和宋国支持下深入魏国

我们知道，在最初的时候，卫国才是西河济平原的控制者。而后来，这个没落贵族在晋国以及晋国的第一继承人——魏国的挤压之下，已经逐渐缩小了自己的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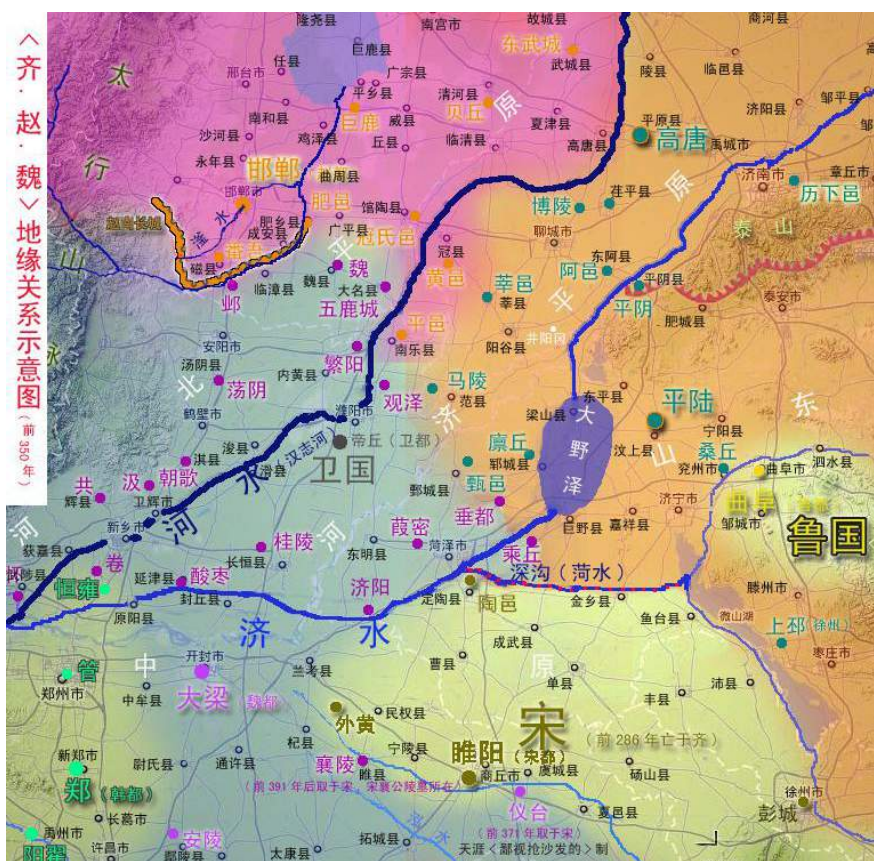
制区，或者说是向黄河之南的卫都——濮阳一带收缩了。到了战国后期，卫国甚至只剩下都城濮阳了。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在桂陵之战发生时，卫国在都城之外还剩下哪些控制区。但魏国已经对卫国形成了包围之势是可以肯定的，就像鲁国事实上也处在齐国的包围之中一样。

无论卫、鲁两国当年是否风光过，处在这样一个地缘位置任谁都不会感到舒服。积极的与包围它以外的其他大国结盟，以图避免被完全吞并的命运都是必然的选择。而在齐、魏之间发生战争时，卫国自然选择站在齐国一边。就像如果有其他国家进攻齐国本土的话，鲁国人一定会加入反齐联盟一样。因此所谓的“桂陵之战”，只是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关联战役中的一场罢了。魏军在和齐军对抗的同时，也在与卫国作战。无论处在濮阳西南部的“桂陵”是属于谁的实际控制区，这种胶着混战的状态都为齐军提供了机会（没有类似长城的严密防线，要想在那些城邑中穿插并不是件难事）。

如果从距离上来看，在桂陵设伏的齐军，应当是从进攻平陵的齐军中分出来的。不过这支齐军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魏国在西河济平原的控制区并不稳定，齐军的确具备条件伏击回师的魏军。如果实施这套作战方案的是魏国，而攻击的对象是从燕国回师临淄的齐军的话，就没那么容易成功了。因为齐军如果从燕国撤回的话，他们所经过的是东河济平原的腹地，齐国在此的强力控制使得孤军深入的魏军，基本没有机会在齐人的眼皮底下设伏。当齐军有机会切断魏军的归国路线时，摆在齐军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齐军怎么能够一路无障碍地跑到大梁城下。而这次轻装奇袭的军队，真的有能力攻破大梁城，并且让之前淡定的魏军主力回师大梁吗？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齐、魏之间的地缘格局就会发现，即使齐军能够乘西河济平原一片混战之机，在其中穿行自如，而他们要想兵临大梁城下时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渡过济水。你很难想象作为大梁城北部屏障的济水，魏军不在渡口上布置兵力。换句话说，如果齐军希望从河济平原南渡济水，直击大梁城的北侧时，魏国很容易将他们挡在济水北岸。大梁城也不会受到真正的威胁。这样的话，齐军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地攻击平陵，以图将自己的实际控制线推进到荷、济之交界处。而如果战争只是在河济平原上胶着的话，对于魏国来说，只是隔靴搔痒，并不至于让他们放弃在河北平原即将到手的肥肉。

现在齐国需要有新的盟友了，以帮助齐军从济水以外的地方推进至大梁城下。这个盟友的地理位置应该接近魏国在中原的控制区，并且要与魏国有无法调和的地缘矛盾。其实第二点是多余的，因为在那种乱世，两个相邻的国家一定会有地缘矛盾的，更何况是在没有明显地缘分割线的中原地带。这个国家很容易找到，并且和齐国暂时没有直接的地缘矛盾，它就是那个自视有“五千乘”实力的宋国。作为中原地区的东部大国，宋国与任何想在中原有所作为的诸侯都有可能发生地缘关系。最早的时候，东进的郑国可以说是它最大的敌人。双方的地缘分割线，基本上就在



齐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

双方的中间线上。大梁城所处的位置，是双方的争夺区。

不过中原国家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当那些边缘大国整合和稳定好自己核心区后，便纷纷到中原来试水。如果说晋人的主要开拓方向还在河北、河济两平原，齐国由于泗东诸国（包括鲁、莒等国）的存在，暂时还无法真正在中原立足的话，那么已经基本控制了淮河南北的楚人，则是中原国家最大的敌人了。在春秋后期，楚人已经在

郑、宋两国之间撕开了一个口子，甚至已经渗透入了河济平原。而之后所发生的事，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三晋又将楚人赶了出来。楚人向中原及河济平原拓展的突出部，基本为魏国所占据了。

既然魏国人插了进来，宋国西线的敌人也就由楚国变成魏国了。在魏国定都大梁后，他们也开始一如楚人所做的那样，越过了宋人所希望建立的泓水——涡水防线，进逼宋人的核心区——睢水流域。而在桂陵之战之前，魏国已经在睢水西岸占据了宋人两个重要的城邑，一个叫做襄陵，一个叫做仪台。前者的位置在现在的睢县，后者则是在商丘市的东南侧（虞城县的西南侧，很多方家认为，“仪台”是在睢水的东侧，不过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睢水的西侧，即宋国还是能够保有睢水防线）。魏国的这种做法，等于让宋国的都城睢阳直接处在第一线，基本没有缓冲的余地了。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宋国人在南线泗水西岸的彭城（现在的徐州市）建立了新都。当然，这并不代表之前的都城睢阳就被放弃了。事实上在战国时期，双都城是非常常见的。在这两个都城中，可能最终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侧重于某一个都城。但只要不是一方被攻破，另一个都城在它所属板块中还是处于地缘中心的位置。宋国在自己疆土的南方建立新都，一方面当然是为睢阳城作备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是为了应对楚国的地缘压力。因为沿泗水而上，也一直是楚人想做的。提升彭城的政治地位，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增强防御力量（如果有部分贵族生活在此，彭城

被轻易放弃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对于宋国来说，迁都也好，双都也罢，都只是一种被动的防御。如果有可能的话，宋国当然还是希望能够让魏人远离自己的都城。在魏国还是很强大时，要想完成这个心愿就必须借助外力了，而这个机会就在齐国围魏救赵时出现了。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共同的理想让齐、宋两国走到了一起。

第五节 齐军在桂陵伏击魏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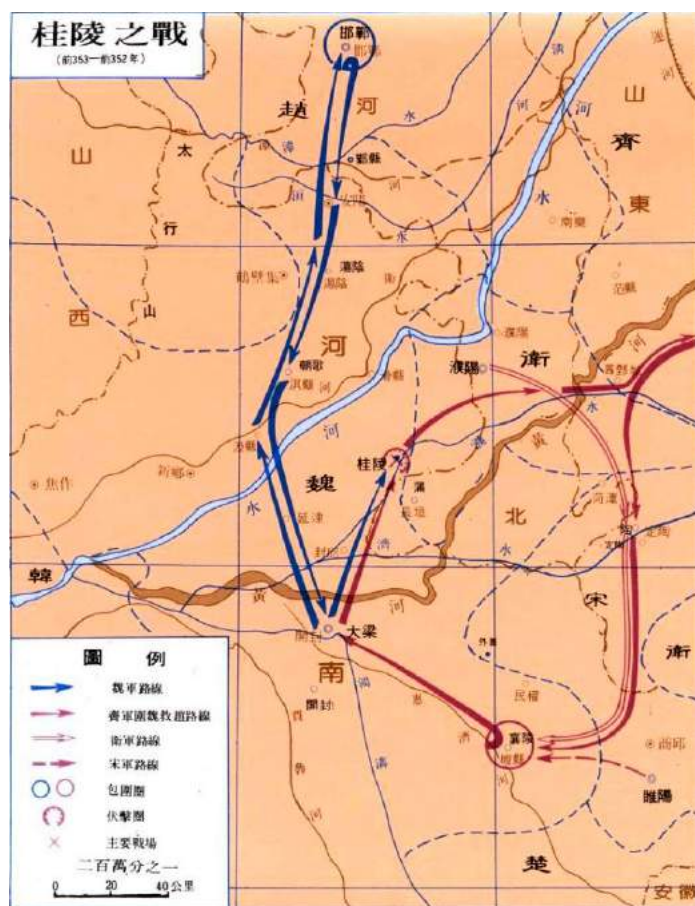
关于“桂陵之战”有争议的地方在于齐国最初发动攻击的地点是地处河济平原的“平陵”，还是睢水西侧的“襄陵”（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有的人认为这两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地方。不过现在一般都认为，这两个点都是齐军攻击的对象。如果从地缘格局上来看，这种可能性的确是最大的。齐国联合卫国在河济平原发动的战役，可以说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攻取那个战略重地“平陵”，另一个则是寻机切断魏军的归国路线。

当然，因为孙臆在有回忆录性质的《孙臆兵法》（“禽庞涓”篇）中说，攻平陵本来就是佯攻，甚至一开始就选了两个最弱的将领去送死。其实从战役计划的制定来看，无论《孙臆兵法》是孙臆本人，还是他的“粉丝”写的，这种说法都有粉饰的意思在里面。对于一个优秀的参谋来说，在制定计划时更多的是有多种方案。在第一方案无法执行时，就需要有第二方案替补而上，而攻击平陵可以说就是第一方案。如果取胜了，齐国的控制线将向西推进，并让齐国在西河济平原的地缘博弈中取得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再乘胜追击，争取控制整个西河济平原，这不仅能够为自己步步为营的延伸控制区，更能迫使孤军在外的魏军回救本土。

而一旦攻击平陵的计划不顺利，齐军就必须选择另一个攻击点，以逼迫魏军回援了（在平陵失败，可以被说成是故意示弱于魏军）。这个第二方案实际上是和第一方案一起实施的，即齐宋两军一起攻击被魏国所占的襄陵。对于宋国来说，攻取襄陵的理由实在太充分了。一方面是因为襄陵位于睢水上游，是宋国应对魏国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则是，这里是宋人心目中的一代“仁”主——宋襄公的陵墓所在。无论宋襄公在后世的评价如何，也无论那个霸主的含金量如何，他毕竟曾经让宋人风光过。

因此宋人夺回襄陵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齐军来说，帮助宋国夺回襄陵，并不是其目的所在。这只是让宋人无条件的倒向齐国的一个手段。对于制定战术的孙臆来说，围攻襄陵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东侧接近魏都大梁。当齐军借帮助宋国夺回襄陵之由进入宋国时，济水已经不能成为大梁城的天险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清楚了。在攻击平陵的战事未取得预定效果后，在河济平原的齐、卫两军的战术重点就已经变成如何牵制住在河济平原的魏军，以让齐国主力



桂陵之战示意图

在桂陵设伏。而与此同时，围攻襄陵的齐军突然派出一支机动部队（以战车为主）快速行进到大梁城下，以对魏国都城造成直接威胁。如果参照晋阳城三年不破，邯郸城被围攻一年才被攻破的案例，齐军想攻破大梁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齐、宋两国从侧翼攻击魏国防御力较弱的东部，并且可以很快机动至大梁城下的能力，不可能不让身在魏都的贵族们感到担心。更何况魏国在河北平原的战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邯郸城在魏军围攻了一年之后，终于被攻破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北伐赵国的魏军主力不回援都城的话，是存在很大政治风险的（被君主认为尾大不掉是很危险的），或者说魏军和都城里的贵族们都不能冒这个风险。

当魏军开始轻骑回援时，齐国的伏击战就有机会上演了。最终，齐国虽然没有如愿取得平陵，宋国也暂时没有拿回襄陵，但齐国救赵的战略目标却达到了。魏军回援的主力在桂陵让齐军全歼（孙臏的说法是抓住了庞涓），随后魏国被迫退出了邯郸城，与赵国签订漳水之盟，表面上恢复了“哥俩好”的关系。

桂陵之战的胜利，对于华北平原的地缘格局有着重大影响，一是避免了魏国继续做大；二则保全了赵国，并继续在北线牵制魏国；三是提升了齐国的战略地位，让齐国有信心直接参与在中原的争霸了。当然，魏国的这次失败，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地缘结构，也还没有从本质上削弱魏国的实力。而齐国在一击成功后，也还没有实力在桂陵一带建立自己的据点。双方还需要有一场新的战争来让双方达成新的地缘平衡，这场更具标志性的战役就是马陵之战。

第六节 齐国与魏国爆发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是在桂陵之战发生十二年后爆发的（公元前 342 年）。事情的起因和桂陵之战如出一辙，也是魏国又发动“侵略战争”了，只不过这次的对象换成了韩国。可能有人认为魏、韩两国似乎关系不错，并对魏国很少攻打韩国感到奇怪。这



马陵之战示意图

种看法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由于两国犬牙交错的地缘格局，两国之间的依存度的确比其他国家要高些；但这并不代表魏国就没有动过灭韩的心，特别是魏国在北线一统河北平原的企图失败后，魏国人开始图谋中原西端的“郑地”了。之所以称这一区域为“郑地”，是因为这一区域本来是由东迁后的新郑国所控制，只不过后来被东进的韩国所占，郑国也随之灭亡了。在韩国灭了郑国之后，它的都城也就迁到那个当年由“郑氏三公”千挑万选而筑就的新郑城了。

韩国的国力在战国七雄中是属于较弱的，这与它自身的地缘结构有关。防御性好的国土，土地质量不够好（上党高地）；土地质量好的，防御力又差了些，总是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中原“郑地”）。因此韩国的生存，依赖“术”的思想比较严重。这个“术”的含义，既有技术，也有战术。说穿了就是抱着人定胜天的理想，希望靠对地缘关系施加影响来改变自己的地缘劣势。这种“以术补略”的方法，在历史上经常为人所诟病，但如果处在韩国的地缘位置上看，这也是最好的选择了（可以参考下泰国的例子，当然，朝鲜半岛上的另一个“韩国”，如果能明白这点，自己的处境会好很多）。因此，如果你想进攻韩国的话，会经常发现你不是和一个人在战斗，而这一次为韩国出头的则是齐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齐国人愿意出头，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诉求。当年的“桂陵之战”的确让魏国吃了个大亏，也维持了华北平原的地缘均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场伏击战还不足以让齐国从魏国手中抢到老大的位置。因此齐国人需要积蓄力量，寻找机会再与魏国打一次。鉴于齐军的战斗力暂时还是无法超过“魏武卒”，所以正面对战的战术还是不可取的，需要有合适的战术来辅助。只是这一次的办法，从表面上看和桂陵之战并无二致，依旧是“围魏救赵”（现在应该叫“围魏救韩”了）。不过鉴于齐、魏、韩三国的地缘关系是呈线性排列，而非像齐、魏、赵三国那样呈三角形排列，像桂陵之战那样的围点打援的战术就不适用了。

因为即使齐国再一次借道宋国快速插到了大梁城的东侧，他们也绝无可能在韩

都新郑与大梁之间设伏。而进攻新郑的魏军则可以在齐军偷袭之后迅速回军（新郑现在为郑州辖，而郑州已经和大梁城的继承者“开封”开始一体化的进程了，即“郑汴一体化”）。因此，齐军如果不希望与魏军正面对抗的话，他们在魏军回师大梁后，所能做的就只有后撤。不过无论是出于救韩的目的，还是出于与魏国争霸的想法，齐军都需要与魏军展开一次决战，否则魏国在赶走齐军之后很可能会回师继续攻韩。这是因为魏国这次的战术目标并不是齐国，逼退齐军便已经达到目的了（齐军如果跑回核心区，魏国也暂时没实力攻进去）。对于魏国来说，征服韩国的战略意义远大于与齐军 PK。一旦拿下韩国就可以让魏国有希望从南线将国土连成一片。而在这个过程中所要遇到的难度，远低于灭齐。

有鉴于此，齐军在佯攻大梁之后还要做的，就是诱使回援的魏国主力紧随其后，进入齐军的伏击圈。当然，如果齐国人有信心在魏国境内，特别是大梁城下解决战斗，当然就不用这么费事了。不过孤军深入的齐军，如果把战斗变成持久战的话，即使有宋国的支援，在尚属强大的魏国面前也是没什么胜算的。要将魏军引入包围圈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上一次的失败一定还让魏军记忆犹新，除非齐国人有办法让魏国人感觉到，他们的战力根本经受不住一场接触战。

为齐军出谋划策的还是孙臏，所采用的诱敌战术就是著名的“减灶”。也就是随着撤退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军灶的数量，以让魏军误以为齐军兵败如山倒，士兵大批逃亡。在有机会“痛打落水狗”时，很少有人能够把持得住自己。因此最终魏军还是掉入了齐军的伏击圈并全军覆没，这也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一般而言，大家都比较关心孙臏的同门师兄弟——庞涓到底有没有被乱箭射死（本来也没有什么

异议的，不过在 30 多年前出土的《孙臏兵法》中，说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已经被俘了。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将俘获的对方将领放回去，也是一种惯例。只是我们所关心的，则是“马陵”究竟在哪里。

就像很多名胜古迹一样，马陵的归属也有不同的声



齐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



马陵山与马陵古道

音。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在山东莘县境内，范县县城东北部。如果从齐、魏之间的地缘关系上来看，这个点倒是在齐军的回撤路线上的。也正好处在齐、魏两国在河济平原上的地缘分割线上。齐军的行军路线应当是从大梁城东撤入宋国境内，然后北渡济水，向齐国境内靠近，并最终在进入齐境时，于马陵设伏大败魏军。如果看行政地图的话，在河南濮阳东部的省界上，山东部分正好是个角状突出部，而马陵就在这个突出部中。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马陵之战的胜利，最终影响了齐豫两省的划界。不过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马陵现在的行政归属，而是马陵为什么能够成为伏击地点。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大平原地区可以说处处是路，就算你能够判断出我会走约定俗成的大路，但也无法隐藏伏兵。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清楚河济平原在当时的地理结构了。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河济平原”已经不能称之为河济平原了，因为济水都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这块土地的位置并不会有变化，只是不再被单独切割出来罢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变化掉的不仅仅是济水，也有河济平原的地理结构。如果我们观察河济平原的位置，就会发现它正处在泰沂山脉之侧。也就是说，泰沂山脉当初在这一区域还是会有一些断续的延伸，只不过海拔和密度都比较低罢了。而冲积平原的形成，则是因为穿行于其间的河流不断地将上游地区的泥沙带入，以淤平其中的低洼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河济平原，相对高差已经很小了（对于河济平原乃至大部分的华北平原而言，那条一碗水半碗沙的黄河就是最大的“功臣”了）。

但在先秦之时，那些低矮的丘陵还是随处可见的。假如我们仔细分析河济平原，乃至中原地区的先秦古地名时，就会发现有很多带“丘”，带“陵”的地名（“陵”最早指的也就是小山包，只不过帝王们大都喜欢在坟上堆个土包，久而久之“陵”反倒成了帝王墓的标签了），这都是表明这一地点的地貌在当时有些起伏的。如果从高度上来说，这些海拔很低的起伏对通行的影响障碍也很难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问题是，在土地尚未充分开发的年代，这些温度适宜，水源充分的土地，往往为灌木、森林所覆盖，因此通行于其中的道路也是需要开辟和维护的。换句话说，齐军可以选择在通行于两个山包之间的道路伏击魏军。而那些高低错落

的树木，以及与道路形成高差的山丘，都是最好的掩护。因此马陵也好，桂陵也罢，除了位于魏军的行军路线上以外，地形有利于伏击，才是它们从整条路线中脱颖而出根本原因。

现在如果我们想在河济平原一带寻找“陵”、“丘”一类的地貌，已经比较困难了，不过在济水以北（现在应该说是黄河了），离泰山比较近的地方，还是能够看到点山丘的。在“马陵”故地的东北有个“阳谷县”，阳谷县境内的东北角有个“景阳冈”。这个“冈”就不用我多说了，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传说中武松打虎的地方。虽说北宋时期到底有没有武松这个人，又或者他有没有打过虎，都还是个问题。不过当年施耐庵既然把武松打虎的地点，设定在阳谷县，也正说明在元末明初时，这里的丘陵地貌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那里还有景阳冈，只不过相对高度肯定比当年低了）。

第七节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影响

在解读完桂陵、马陵之战的战术问题后（军事地缘范畴），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两场战役对于战国的整体地缘结构有什么影响。在这部分开始之时，我就说过了，战国的第一阶段，算是魏国独大，或是魏国独立对抗东、西诸国的时期。而到了第二阶段，魏国在东西两侧的地缘压力之下，已经无力称霸了。这其中具有转折性的战役，就包括齐魏之间的这两场战役。除了这两场战役以外，魏国在西线同秦国的战争中，也开始战略性后撤（在秦国部分会具体分析）。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魏国在这一时期同时在东、西两线遭遇失败，并非偶然。因为从中央之国的整体地缘结构来看，魏国是典型的四战之地。虽然最初凭借晋国丰厚的遗产，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感觉，但终究难以持久（有点类似于当年的郑国）。在战国诸国通过兼并、内部整合重新达成均势后，魏国四面受敌的地缘劣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而齐、秦两国作为东、西两端的大国，也是地缘结构相对最稳定的国家，成为魏国霸业的终结者也是大势所趋。至于说那些战役本身，又或领导者是谁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魏国感觉到已经无力称霸时，它首先想到的是和自己争霸中原最大的敌人——齐国达成联盟。因此魏国承认了齐国具有“王”的地位。当然齐国也清楚自己没有独立称王的实力，因此也承认魏国为王国（双方的第一代大王分别是“齐宣王”和“魏惠王”）。双方达成此意向的地点就在泗水东岸的“下邳”，也就是当时的所谓“徐州”。由于这次政治会议的中心内容是齐、魏两国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国地位，因此也被称之为“徐州相王”。需要说明的是“徐州”这个概念，根据“天下九州”的划分标准，所谓理想当中的徐州主要包括泗水流域。而在徐州真正成为行政单位后，它的治所所在地，往往也就被称之为“徐州”城了。只不过这些城邑意义上的“徐州”都是在泗水两侧罢了（三国时期的徐州，已经转移到下邳了，而现在的徐州市，

则是当年的彭城)。

我们之前也说过，下邳（徐州）这个地方，最初是由邳国（也有说薛国，或说邳薛同族）控制的。这些带有部落性质的东夷小国，最终都成为大国兼并的对象了。而“徐州相王”时，下邳已经为齐国所直接控制了。魏国选择在此与齐国达成称“王”的共识，实际上是认可齐国的实力已经反超魏国了。既然已经无力打败这个对手，和最大的敌人结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徐州相王是发生在公元前 334 年，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时间点是战国第二阶段的开始。从表面看来，齐国像是有从魏国手中接过霸主地位的迹象。但这个时期，各主要诸侯都已经通过兼并周边的小国增强了实力，齐国也很难形成独霸的局面。因此在徐州相王后不久，魏国又与赵、韩、中山、燕四国搞了个“五国相王”（宋国也跟进了），目的就是把水搅混。既然大家都是“王”了，也就无所谓谁大谁小了，一场混战重新开始了。

尽管在五国相王之后，战国的格局开始真正形成，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平衡阶段，但齐国在两败魏国后所取得的优势地位，还是很明显的。对于这一点，最先表示不满的就是楚国了。要知道，之前除了正统的周王以外，也就是以楚国为首的长江三国（楚、吴、越）敢于称王。而现在齐、魏两国的称王，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改变，而是有可能的扩张野心。因此楚国率先向齐国发难，攻入了徐州，而这一次他们选择的盟友是赵国。并非说赵国对齐国有多少图谋，只是楚人需要他们牵制魏国（魏齐刚达成同盟），而赵国也希望借机向魏国施压，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其实楚国的这次攻齐之战，只是战国中期各种乱战中的一场。就战国中期的地缘关系而言，“合纵连横”是一大特色。所谓合纵，本意指的是华北平原诸国由北至南结盟；而连横则是渭河平原到山东半岛之间的联盟。只不过在战国诸国中，结盟组合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仅限于南北或东西的联盟。这些所谓的“联盟”基本都不能长久，或者说是为了对付某一国家所临时达成的。因此很多时候今天是盟友，明天就是敌人。所以说“合纵连横”的基本特征并不在组合的形式上，而是处理地缘关系的态度上。这个基本特征就是“择交”，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阶段性地选择盟友。

战国中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宋、中山两个“王国”实力较弱以外，其他大国虽然实力有所差异，但都算处在同一数量级中（谁也没有绝对实力吞掉另一个“万乘之国”），所谓“合纵连横”的目的，就是防止有哪一方的实力突然得到增强，并且这种增强足以打破已经形成的地缘平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枪打出头鸟，谁如果做了出头鸟，谁就会成为其他几国共同的敌人。很不幸的是，率先称王的齐国，也率先成为这只出头鸟。

第九章 齐国攻灭宋国后引发五国伐齐

第一节 齐国灭宋后成为各国攻击目标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战国历史在进入第二阶段以后，中央之国的地缘形势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第二阶段开始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实力还是比较接近的，包括像中山、宋这样的五千乘“半强国”也能够有机会与一流强国一争高下。不过，在各国争相称王之后，诸侯们之间的差距也开始显现出来了。这其中，居于天下之中的魏国，相比之前自然是衰弱了。而魏国在东、西两线的主要敌人——齐、秦两国则终于发挥它们“四塞之地”的优势，开始有希望甩开其他诸强，联手进入超级大国的行列了。

秦人的崛起要碰到什么样的障碍，我们在秦晋“崤之战”一节中就已经清楚了。从当年秦国受封在渭河平原立国时起，晋人就是他们东进的最大敌人，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敌人。而秦晋两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则一直是围绕着河西、河东两地而纠缠不休的。谁一旦越过黄河，将这两个地理单元据为己有，谁就掌握了二者之间的主动权。在魏国占据河西之地时，战略优势自然也就被魏国所掌握了。而现在，秦人则不仅将魏国赶出了河西之地，更是将魏国挤出了河东。

虽然在魏国退出河东之前，秦人曾经多次攻入河东（包括春秋之时），但由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基本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就退了出来。也就是说，以渭河平原PK临汾——运城盆地，并无优势可言。相反，无论是晋国也好，魏国也罢，由于拥有在华北平原的纵深，却往往能够稳定的占据河西之地。因此秦人要想在与山西高原的地缘博弈中扭转战局，就必须也找到自己的战略纵深。而在后面，我们会分析到，秦人的这个战略纵深就是秦岭——大巴山脉以南的“蜀”地，或者说就是四川盆地的核心地区。

关于秦人是如何拓展它们的战略纵深，我们会有专门的章节来分析。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就是秦人在做这些事情时，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地理方面的，或者说受客观环境的影响比较多。而在地缘政治方面，秦人则没有太多的顾虑。唯一可能对他们的南进战略表示异议的，就是楚国。不过楚人要想进入天府之国，还必须越过“巴”人这道障碍，因此他们对于控制有地缘优势的江淮地区兴趣更浓。与西方的秦人相比，齐国虽然通过两场战争对魏国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如果不能把这种优势转换为土地的话，这种优势的取得，更多是一种对比的结果，而非实实在在的提升。因此齐国也希望开拓出新的战略纵深。只不过与秦人相比，齐国的扩张方向——华北平原，并不存在太大的地理障碍。他们的麻烦，恰恰是秦人所不太需要考虑的“地缘政治”。

就像当初魏国想打破华北平原的地缘均势，会遇到齐、赵、韩等国的干涉一样。齐国要想有大的动作，也会受到同等待遇。齐国北上攻燕后又不得不撤出，就是一例。不过对于齐国来说，攻燕的行动并不算失败，只不过是没改变齐国的地缘结构罢了，因此齐国还需要重新调整方向。也许把鲁国灭了，是个好想法。不过鲁人已经被压缩到尼、蒙两山之侧的狭小地带，再逼下去，已经很难有高回报了，在地缘结构上也很难有质的飞跃（特别是齐国已经将防线推到泗水东岸时）。至于说沿泗水南下与楚人在淮河流域争雄，对于齐人来说，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中央之国的正统诸侯们看来，淮河流域只是一块化外之地。如果要花力气去渗透的话，还不如在天下之中的“中原”做同样的投入。而齐人也的确在中原做出了大的动作。

齐人在中原所做的大动作就是把宋国给灭了。而在齐国灭宋之前，秦国曾经做了一件和“徐州相王”类似的事，就是邀请齐国共同称帝，号称东、西二帝（公元前 288 年，当时秦国的大王是“秦昭王”，齐国则是“齐闵王”）。问题是秦、齐两国虽然在诸侯之中有脱颖而出的迹象，但并没有与其他诸侯拉开距离，特别是当其他几国有可能联合起来时。因此第二年，齐、秦两国都被迫去除了帝号，在政治上与其他几国保持一致了。称“帝”的失败，对于秦国的影响是暂时决定在函谷关西侧观望一下形势。而对于齐国来说，称“帝”的经历，无疑又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因此齐人在发动了三次对宋战争后，终于在公元前 286 年灭掉了宋国。

关于齐国为什么要灭宋，一直是战国“合纵连横”之中的经典案例。简单点说，就是苏秦为了保住燕国（对他有知遇之恩），挑拨齐国与其他诸侯的关系，以转移矛盾，而进攻宋国据说就是这个阴谋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实，纵横家的活动固然让战国的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各国所做出选择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地缘形势。也就是说，这些决定并不是被“忽悠”的，那些纵横家们更多的只是顺势而为罢了。就像齐国为什么要灭宋一样，对于齐国来说，“宋”这个占据半壁中原的二流国家，是最有价值的战略纵深，所遇到的直接抵抗也是最小的。如果齐人在自己强盛的时期没有抓住机会扩张自己的战略纵深，那么他们此时的地缘形势和春秋之时比，并没有质的飞跃。

齐、秦两国先后撤销帝号，只是一种政治策略罢了，并不代表他们就会停止扩张步伐。从这个角度看，地缘形势更复杂的齐国，只不过是先动手而已。问题是秦人当初占了“蜀”地（公元前 316 年），可以作为自己的战略后方；而齐人占了“宋”地，却等于将自己的前线推进到了一个“四战之地”。事实上，虽然战国之时，诸侯们之间的兼并行为十分频繁，但那大多是一些城邦小国，并不会对战国的地缘格局造成大的影响。而在战国中后期，中山、宋等称过“王”的二流强国相继被兼并，对地缘格局的影响就很大了。

与齐国吞并宋国相比，赵国对于中山国的吞并，也有着很重要的地缘影响力。这一方面使得赵国的实力得以跃升为三晋之首，也让赵国成为战国后期抵抗秦国东

进的主力。不过这两次兼并行为的地缘影响力还是有区别的，一是因为实力的变化不同。赵国在吞并中山国之前，在诸强之中实力是比较靠后的，这与他们所占据的区域的地缘形势复杂（戎狄比较多），农业条件相对一般（纬度较高）有关。即使吞并了中山国，也只是让他的实力由中下升到中上，并没有机会成为出头鸟。而齐国的情况就不同了，齐国本身的地缘实力就很靠前，如果再消化了宋国这片膏腴之地，那齐国就可以独霸中原了，而这正是其他诸侯所不想看到的。

齐、赵之间的另一个差别就是：宋国与中山国的地缘位置不同。中山国位于华北平原北部，与其主要发生地缘关系的就是赵、燕两国。也就是说，如果燕国没有意见，其他诸侯在中山国基本没有地缘利益。而赵灭中山的地缘背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正值燕国内乱，中山国乘机进攻燕国，夺了燕国几百里的土地。因此对于燕国来说，赵灭中山其实算是帮了一个大忙，自然不会反对了（其实中山攻燕，有赵国暗中鼓动的因素）；与中山国相比，位处四方诸侯都想染指的中原腹地的宋国，地缘位置就要敏感得多了。不仅魏、楚两国与其有直接的地缘关系，甚至其他诸侯也不愿意齐国独自坐大。现在齐国打破了这种地缘平衡，自然也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第二节 齐国在五大地理单元设立五都

既然齐国犯了众怒，那么一场新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次联合行动的主导者是刚被齐国攻打过的燕国，而三晋与秦国则是联盟的另外四个成员。如果说燕国与魏、赵两国，与齐国都有直接的地缘关系，联合攻齐情有可原，那么秦、韩两国则似乎没有必要趟这池浑水了。韩国的参加，其实也很好理解，既然三晋中的另外两家都参战了，韩国肯定也不好保持中立的。更何况韩国的生存之道，就是与其他强国绑定在一起。而秦国的参加，则是希望在中原获得一块前进的基地，这个基地就是宋国的“陶”邑。秦国的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大胆（就像当年打郑国一样），不过如果齐国被打败了，秦国就很有可能独自称大了。到那个时候，凭借秦国在关西强大的地缘实力，东进中原是迟早的事。先在中原腹地插入一颗钉子，也算是遥相呼应（前提是秦国的东进要快，时间久了，飞地是很难保住的）。

秦国的参与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攻赵行动的破产。因为在魏国丢失河东之地后，秦国在山西高原的对手主要就是赵国了。而吞并中山国之后的赵国，实力已经跃升为三晋之首。受其实力提升影响最大的，就是意图东进的秦国了。因此秦国在自称“西帝”时，是希望联合齐国，并拉上其他几个诸侯联合瓜分赵国。只不过，以赵国偏安一隅的地缘位置，不足以让其他诸侯动心罢了。齐国在自去帝号后，反而与其他几国联手进攻函谷关，逼迫秦国也放弃了帝号。既然自己暂时无法东进，那么在山东诸国乱战一团时，乘机取利就成为另一种选择了。

与五国组成同盟合力攻齐相比，战国七雄中的另外一强——楚国，这时候的立

场则要超脱许多。其实位于江淮的楚国，一直有些游离于核心地缘圈之外。或者说是因为地缘位置的原因，与河济诸侯之间的地缘关系不太紧密。直接参与“合纵连横”的次数也较少。不过这次所牵扯到的“宋”地和齐国，却是和楚国一直有地缘矛盾的。宋国在被灭之前，甚至向南侵夺了部分楚国在淮北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现在自然也就被齐国所继承了。因此，仅仅是出于夺回失地的原因，楚国也要出一份力。不过楚国并没有加入联盟一方，而是在表面上选择了支援齐国（无论齐国胜负，楚国都有机会在淮北取得进展）。

现在，除了齐国以外，战国七雄中的另外六个成员都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向齐国及中原进发了。而齐国到底有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次挑战呢？为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齐国在自己国土上的战略布局，而这其中的要点就是“五都”布局。我们就来看看，齐国在战略防御上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工作。在战国合纵连横的背景之下，五打一甚至六打一的情况并不鲜见，只不过到了后期，这个“一”被固定为秦国了。为了应对这种全方位的威胁，各国在防御上都做足了充足的准备，修筑长城就是一例。就齐国而言，沿泰沂——五莲山脉一线修筑的西到济水，东到黄海的齐长城；以及西北方向的河、济两水是护卫其核心地区的主要防线。不过光有天险和长城并不足以让齐人感到放心，特别是当齐国的稳定控制区已经超出核心区范围后。为了确保国土的安全，齐国人还可以做的就是依各地理单元的分布状况，设立相应的地缘中心，以互为犄角，遥相呼应。

我们来看看，齐国的主要控制区都包含哪些地理单元，又相应的设置了哪些地缘中心。首先是核心区内，也就是齐长城以北，济水以东部分。这部分土地大体上包含两个地理单元。一部分是“鲁中山地丘陵”（包括泰沂、五莲山脉）以北的平原地带，如果要再细分的话，齐人最初立都的鲁北平原，以及从“莱”夷手中夺取的胶莱平原都是属于齐国的核心农耕区，也是整个齐国最为核心的地理单元。对于这么核心的地理单元，齐国人当然也要用最核心的地缘中心来控制了。因此齐都“临淄”所具体辐射的，就是这片“核心农耕区”。核心区内的另一个地理单元，就是占据胶东半岛主体的“胶东丘陵区”了。这里也是莱夷的最后栖身地。如果处在中原腹地，相信胶东丘陵区会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但它现在是处在齐国的大后方，即使残余的莱夷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成为齐国的内部矛盾了。

对于齐国来说，胶东丘陵所提供的主要是农产品以外的物资，比如盐、铁。再有就是提供了优良的港口，让齐国额外拥有了海上的地缘优势。对于这片地理复杂，又有些海洋、资源优势的地理单元，齐国也需要设立一个副中心来加强控制，特别是其间还有非我族类的“莱”夷存在时。将这个地缘中心的位置选择在胶东半岛的顶点附近，并不是个好方案。胶东丘陵在很大程度上会隔绝这个副中心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最好的选择，是在胶东丘陵与胶莱平原的交汇处。这样既可以保持与核心农业区的紧密联系，又可以东控胶东丘陵。这个点就是将

要在齐国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即墨”邑。需要说明的是，齐国的“即墨”和现在的“即墨”市，并不在同一地点。前者比后者的位置更靠近中心；后者则背靠崂山和大海，位置较为边缘，并不适合成为农耕文明的地缘中心。



齐国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后期）

除了上述两个核心地区以外，我们知道，齐国在河济平原、沂沭河谷、泰沂山脉腹地（鲁中山地丘陵区的核心地区）都已经扩张出稳定的外围地区了。如果齐国希望稳定的控制上述三个区域的话，就必须也要在这三个地区设立三个副中心。而齐国也的确在这三个地区设立了三个重要的城邑。首先来看看河济平原，齐国在这一地区的副中心，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有过交代，就是“高唐”邑。如果全景的观察“高唐”邑的位置，就会发现它正处在东、西“河济平原”的交汇处，并且靠近黄河。也就是说不仅是整个河济平原的地缘中心，亦能为齐国向河北平原的扩张提供有力的支撑。

我们再来看看沂沭河谷，这个地缘中心的选择就不用齐国人操心了。当年莒国人千挑万选，并倚之立国数百年的都城“莒”邑，就是最好的选择。齐国人选择将

副中心设在此，不仅有利于控制莒国故地，更能辐射整个沂沭河谷，将楚人挡在“下邳”之南的区域。至于说泰沂山脉的腹地，那里原来可是鲁国的势力范围。如果齐国能够将鲁国完全吞并，那么“曲阜”城肯定就会是这个地理单元的地缘中心了。不过鲁国虽然已经衰弱了，但齐国暂时还没有精力与鲁国决战；因此齐国最终是选择在汶水的下游，曲阜的西北方向，设立了“平陆”邑（汶水下游的“汶上县”北），以稳定齐国在这一区域的控制区。

临淄、即墨、高唐、莒、平陆这五个城邑，在齐国的行政架构中被称之为“五都”，也成为齐国控制上述五大地理单元的重要保障。不过这个“都”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首都的意义。更应该被定位为各地理单元的“地缘中心”，就像现在的台湾岛一样，从北至南也确立了五个城市作为地缘中心。不知道当初提出这种想法的人，是否是从齐国的历史中得到了灵感，反正台湾岛上的这五个地缘中心，现在也被称之为“五都”。由于在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因此齐国的“五都”都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看，五都之分，更像是现在的军区划分，或者说整个齐国被划分为五大军区了。不过现在的军区并不涉及行政权，而齐国的“五都”是有军政合一性质的。从这点上看，又像是后世的“藩镇”。

不管齐国的“五都”应该怎么被定性，齐国依地缘结构所设立的这五个地缘中心，其布局是非常合理的。也保证了齐国不至于因为都城的陷落，而一战亡国。至于说在秦国兼吞并六国之前，齐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就是那个被齐人所轻视的小兄弟“燕国”；而燕国和他的盟友们将如何开展他们的破齐之战，则是下一步分析的方向了。

第三节 各国在攻齐战役中的土地收获

如果说到诸侯国中谁与齐国的矛盾最激烈，不久前刚刚被齐国占过全境的燕国可以说得上是最苦大仇深的了。其实从齐国的角度来说，又何尝不知道，吞并了宋国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对于齐国来说，最现实，也是风险最小的扩张方案，就是先由东河济平原北上，跨过河间之地吞并燕国，然后再由北、东两面夹击赵国，最终消化整个河北平原。现在，齐国暂时将宋国作为了主攻方向，并不代表将来就会放弃向北扩张的企图，特别是齐国人已经基本占据河间之地，将边境线推进到燕南长城（东端）一线时。

有鉴于此，燕国在破齐之后，并没有满足于以战胜国的姿态与对方签订和平协议，而是希望完全吞并掉齐国。燕国的这种想法也不能说是离经叛道，毕竟战国时期的战争指导思想，已经由将对手“打服”，变为“兼并”了。而刚刚被赵、齐两国吞并的中山、宋两国就是现成的例子。但以燕国的实力，想要吞并齐国这样的一流强国，还是过于大胆了。即使不考虑齐国内部的想法，其他的诸侯其实也肯定不愿意这种



齐国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后期）

处。整个中央之国的地缘格局，又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首先退兵的是韩、秦两国。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与齐国没有直接的地缘矛盾。不过相比韩国陪太子读书的角色而言，如日中天的秦国，这次参战可是有自己的战略目的。这个战略目标就是“陶”邑。不过秦国所求的可不仅仅是原先荷、济之南的那个“陶邑”，而是希望控制整个荷——济之交的交汇点，换句话说，秦国所希望的是全方位的控制这个战略要点。

荷、济之交的这个战略要点，在宋国被灭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完全被宋国所控制了，或者说宋国已经将“陶”的概念覆盖到了整个荷、济相交的地区，因为在宋国称王之后，曾经进入过一个兴盛期。在这期间，宋国从魏、楚两国手中都夺取了部分土地，向北渗透进了河济平原（所谓“河东九城”），向南则越过彭城——钟离防线，向淮河推进（所谓楚国的“淮北地”），甚至连东面的齐国，也曾经被宋国蚕食。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很大程度是因为魏、楚两国在西线不得不承受秦国巨大压力。这个时期的秦国已经占据了魏国的河东之地，失去了河东之地的魏国，已经彻底进入衰弱期了；而楚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数败于秦军之后，连大王（楚怀王）都已经被秦国所扣留了。而在秦国取陶邑之后，楚国人也很快也在秦国的重压之下，失去了江汉平原这个根据地，并被迫迁都于淮河流域（公元

局面出现的。因为无论是燕吞并了齐，还是齐吞并了燕，燕齐一体化的结果都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的诞生。

不过，让燕国这条蛇去从根本上破坏一下齐国的地缘结构，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对于山东诸国来说，齐国比秦国的威胁要更为直接。因此当燕国决心以灭齐为目的继续战争时，其他的诸侯就先退了回去，坐观燕、齐两国的缠斗。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参战的诸侯大都也已从齐国身上讨得了好

前 279 年，屈原也就是在那时投的江）。

不管荷——济之交的这个战略要点，在秦人到来之前，是由宋国整合好的，还是由齐国整合好的。反正秦国在这次联合破齐之战中达到了目的，全面控制了这个要点。不过这个时间点离秦国统一中央之国尚有差不多 60 年，秦国控制这块飞地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即使是没有外部的压力，这块飞地也很容易与关西的秦国本土产生离心力。落实在“人”身上，就是控制这块飞地的贵族，会不可避免地会与秦国中央政权互相猜忌。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可以搜索“魏冉”这个名字。这个权倾一时的秦国相国，就是秦国东进的主导者，也是控制陶邑的人，其结果就是被视为尾大不掉而夺权（公元前 266 年），最终忧死于陶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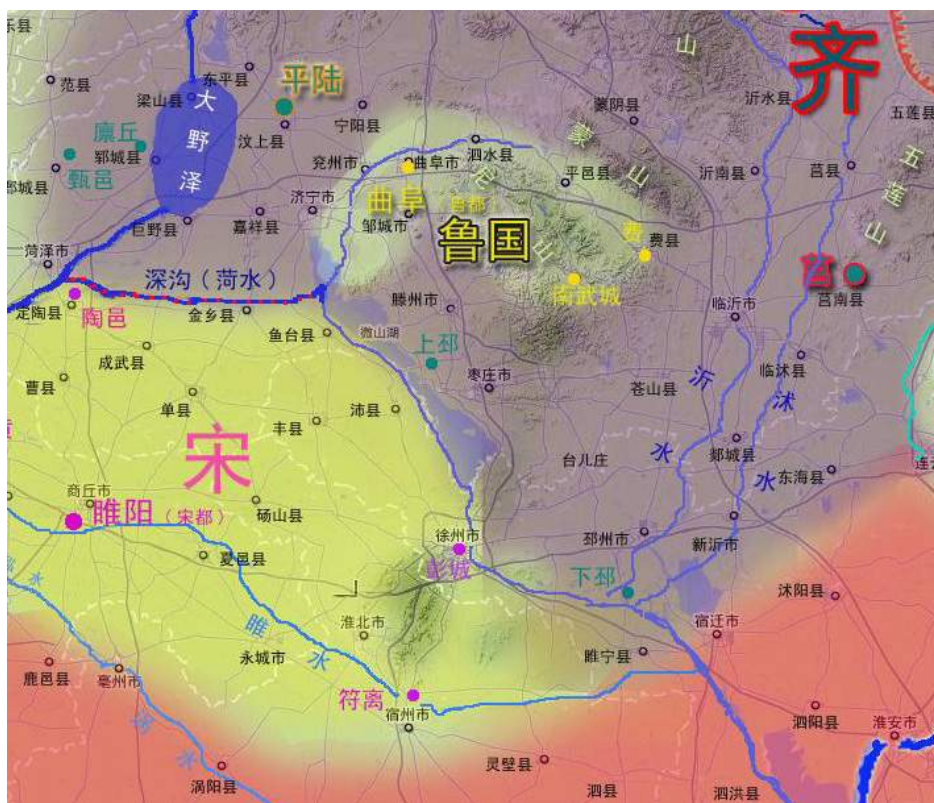


齐国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后期）

对于秦国占据陶邑，最为不满的肯定就是魏国了。因为从地缘位置来看，魏国是最应该也最有能力从齐国手中接收这块土地的。虽说魏国在这次联合作战中也将宋国南部的大片领土并入魏境，将其东面防线推进到泗水西侧。但被秦国控制了以“陶”为中心的战略要地（秦国凭此等于同时切入了河济平原、中原、鲁中山地丘陵三个地理单元），魏国扩张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因此魏国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希望从秦人手中“夺回”荷——济

之交的控制权。最终在秦人占据陶邑差不多 30 年后，魏国终于拔除了这颗眼中钉。而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人，在历史上也很出名，其位列战国“四大公子”，他就是以“窃符救赵”而闻名于世的“信陵君”。

除了秦、魏两国以外，与齐国在北线地缘关系密切的赵国，也有自己的收获。让赵国去参与瓜分原来宋国的土地是不现实的，毕竟他们没有秦国这样的实力和野心。赵人的目标是将齐国赶回黄河以南，以确保自己在河北平原的安全。也就是说，赵国希望能够向东最大限度向“河间之地”渗透。当然，赵国人完全占据河间之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次战争的主导者——燕国，也需要通过这片土地进攻齐国的核心区。因此赵国所做的就是将靠近自己一侧的齐国在黄河以北的突出部，纳入自己的控制区。其中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占据了齐国在河北平原的桥头堡“河间”邑（在



齐——宋——楚地缘关系示意图

现在献县以南，也就是当初“山经河”与“禹贡河”两条黄河支流的分流处，其东部主要为燕齐博弈区，西部则以齐赵之间的地缘矛盾为主）。

可以说，燕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四个盟友，除韩国以外，都在土地上有所收获。不过在这次破齐之战中，有实际收获的并不止上述几国，那个一直被齐国压迫的鲁国，也有自己的收获。

我们知道，齐鲁之间的地缘矛盾可以说是贯穿于整个东周史，属于不可调和型。以鲁国的弱势地位而言，所能做的就是其他大国攻齐时，乘机助上一臂之力，以让自己窘迫的生存空间得以舒展一些。这次，鲁国的收获就是泗水之东的“上邳”，也就是齐、魏两国当初相王的“徐州”。从战略上来看，鲁国没有向北试图恢复他们在齐长城以南的控制区，而是向南攻击至泗水之滨，其最终目的是希望突破齐国所形成的包围圈。因为即使鲁国有能力向北突破至齐长城附近，也还是处在齐国的包围当中，并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缘形势。不过鲁国的这种战略选择，对于它自己来说，固然是正确的，但处在大国角力的战场上，并没有太大意义。无论它如何努力，都注定会成为大国的兼并对象。而这个终结者，就是下一个将要出场的“楚国”。

楚国人在这次战争中的角色其实是很讨巧的，表面上楚国并没有加入其他五国的联盟，而是支持齐国。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如果齐国最终抵抗住了五国的联合进攻，那么楚国则可以从齐国手中获取酬劳，而这很可能是宋国南部的部分土地；而如果齐国败了，那么楚国则可以从南线沿沂沭河谷向北进发，在瓜分齐国的行动中占据沂沭河谷。从地缘位置上来看，楚人完全有时间和能力得到这片土地。由于楚人救齐并非出于真心，而是有自己的目的，因此楚国并没有与五国联军发生正面冲突。而五国联军也无意于与楚国真正为敌，毕竟打败了齐国，有大片可以瓜分的土地。即使楚国要在南线分一杯羹，也暂时不会与其他诸侯的要求发生交集。这种表面援齐，

实则中立的态度，让楚国可以从容地向北恢复他们曾经的控制区。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取回”被宋国所占的“淮北地”。对于这一点，齐国和五国联盟都没有什么意见。对于齐国来说，这本来就是宋国侵占楚国的土地，齐国只能算是借花献佛罢了；而对于五国联盟而言，楚人做的也还算有分寸，并没有窥视宋国旧有的核心区。

楚人没有向宋国的核心区伸手，可以说是吸取了齐国的教训，即暂时不要搅进中原这池浑水（特别是他们在西线正在承受秦国巨大压力的时候）。但这并不代表楚国就不想将防线再向北推进了，最起码曾经被楚国占据过的沂沭河谷，就是楚国与江淮蛮夷传统的扩张方向。而在这个方向，齐国可以说是唯一的对手。现在，齐国的核心区都已经朝不保夕了，楚国以保齐为名，进占沂沭河谷，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第四节 燕国无法攻下即墨和莒邑

我们先把楚国是如何乘人之危，蚕食齐国的事情放在一边，来看下破齐之战的主角——燕国是怎么做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场战役的主角应该是“乐毅”。而乐毅之所以成为战国名将，也正是凭此一战成名。正如人分左右一样，在一项重大决策面前，也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的。就燕国而言，究竟想通过这次破齐之战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与其他几国联手大败齐国之后，满足于将齐国赶回黄河以南，或者说是将防线推进到河济平原的北沿；二是乘胜追击，一举吞并齐国。

如果衡量燕国与齐国的整体实力，第一种意见是最为现实的，也是诸侯相争中所经常用到的策略。不过这场战役的主将乐毅却是持第二种意见的。如果在战争之前，乐毅明确地提出他的战略目标，相信会被很多人认为是痴人说梦。问题是在战争开始后，战役进行得异常顺利。燕军很快就在东河济平原大败齐军，而其他几国也从另外几面夹击齐国得手。齐军的残余的主力不得不退回至国都临淄，以做困兽之斗。在这种情况下，乐毅提出乘胜追击，完全灭了齐国，虽说有些冒险，但如果成功了的话，却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燕国在中央之国的地缘实力。而如果留下了齐国，燕国再想寻求到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齐国在战后只保有它的核心区以及东河济平原，在整体地缘实力上仍然是超过燕国的。也就是说，如果燕、齐两国重新进入相持状态的话，齐国仍然会掌握战略主动权。如果站在燕王的角度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燕军的势头正盛，没有理由不放手让乐毅尝试一下。其实要是燕国独自与齐国作战，燕国甚至很难攻破齐国的黄河防线。不过这次是五国共同攻齐，因此魏、秦等国联军可以从西河济平原侧击齐国，以配合燕军的渡河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的黄河防线就形同虚设了（在之前的历史中，齐国所受到的直接攻击，基本都是从西河

济平原发起的)。

当乐毅决心将“破齐”转为“灭齐”之后，突破济水防线就不再是问题了。因为齐军的主力都已经在河济平原损失得差不多了（由于战场是在济水以西，歼灭齐军主力的战斗也被称之为“济西之战”）。而退入齐国核心平原区的齐军，也很快败于追击而来的燕军之手，齐国的国都临淄也被燕军所占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燕军的进军路线，就会发现燕军对齐国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在控制了齐国的核心平原区后，不仅分兵向齐国所控制的其他几个地理单元进军，还回师西河济平原，以扫平齐国在河济平原上残存的据点。

燕军的这次破齐之战，最初可以媲美于德国的闪击苏联，很快齐国的五都中有三都都陷于燕军之手了。也就是说，除了齐国的核心平原区以外，齐国所控制下的河济平原、泰沂山脉腹地也都为燕国所占。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三个地理单元都位于齐国的西半部，也是最先与五国联军接战的地区，先失于敌手也属自然。不过燕军虽然在最初的进攻当中取得德军闪击苏联的成果，但齐国强大的战略纵深，也让燕军遇到了和德军同样的问题，就是无法一鼓作气将齐国完全吞并。在取得了最初胜利之后，战役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而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苦战德军相对应的是，燕军也在即墨和莒两个战略重地面前，与齐国最后的力量进入了相持状态。

一般而言，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告诉我们，燕国在破齐之战中，一鼓作气占据了齐国七十多座城邑仅用了6个月时间，而面对齐国最后仅仅剩下的“即墨”与“莒”两座城邑，而燕军却在长达三年之久的时间内毫无进展。这不得不让我们产生怀疑，难道这两座城池真的那么难以攻破吗？事实上产生怀疑的不仅仅是两千年之后的我们，当时的燕王也同样有这种疑虑。毕竟大部分人对于以燕国之力，能否完全控制齐国存有疑虑。而如果乐毅决心在完全占据齐国之后，以齐国核心区这个“四塞之地”为基础，拥兵以自立的话，那么反过来受害的就是燕国了。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并非不可能出现。只不过乐毅最终被燕王成功的换掉，而齐国则随之反击成功，因此燕王的决定被当成了“用人不疑”的反面教材。如果我们不去猜测乐毅当时是否有自立的企图，而单从地缘结构上来分析，就会发现，燕军无法快速占据即墨、莒两城，并非偶然。首先在分析齐国“五都”的时候，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所谓的即墨、莒邑并不单纯是两个城邑，而是在所属的地理单元中处于地缘中心的位置。前者是胶东丘陵区，后者则是沂沭河谷。也就是说，这两个城邑，在战前本身就积累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城防工事也较其他城邑会更为坚固。另外以燕军的兵力，并不可能对这两座城邑形成“O”形包围（德军围斯大林格勒都做不到），甚至无法控制所有的交通线。这两个地缘中心，完全可以从它们各自所属的地理单元中获得补给。

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两个地理单元的地理结构与河济平原、齐国的核心

平原区不同，起伏的山地丘陵使得燕军最多只够有力量控制一些城邑和主要交通线（跟抗日战争中，日军在山西高原的情况类似）。换句话说，燕军所没有控制的并非即墨和莒两座城邑，而是胶东丘陵和沂沭河谷两个地理单元。其实如果单从地理结构上而言，齐国在泰沂山脉腹地的控制区，也有机会与燕军展开持久战的。不过那一地区正处在前线，加之又有鲁国这个永恒的对手以为内应，因此齐国在那一地区的副中心“平陆”在第一波攻击中就被放弃了。

从燕国的角度来看，并非没有考虑到攻击胶东丘陵和沂沭河谷所要遇到的难度。因此燕军也并非简单的由西至东逐次攻击至即墨、莒两地。在北线，燕军沿胶东半岛的北沿东进，先将齐国在沿海的据点收入囊中（由于那里是莱夷的最后生存地，因此也被称之为“东莱”），然后再回师向西，包夹“即墨”城；而在南线，乐毅也同样派出了一路燕军，越过齐长城的最东端，进入了五莲山脉与黄河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然后向西穿越五莲山脉与正面进攻莒邑的齐军形成包夹之势。



齐国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后期）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五莲山脉与黄海之间，北起齐长城，南至连云港的这条狭长地带，在越国称霸部分中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一地区。这条介于山海之间的走廊形地区，是当年越国深入山东半岛的突出部，也是从南线侧击沂沭河谷，直击齐国核心区的战略通道。而后来所争议不休的“琅琊”的地望，也都是位于这条走廊之中。实际的情况是，所谓“琅琊”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所覆盖的区域本身就有所不同。

简单地说，作为齐国在东南角的边邑“琅琊”，随着齐国逐渐向南渗透至连云港一带，其所覆盖的范围也在扩大。也就是说从齐长城一直到连云港的这条沿海走廊，在战国后期直至秦统一中国后，都属于“琅琊”这个概念的覆盖范围。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条沿海走廊命名为“琅琊走廊”。

如果从战术上来看，燕国希望通过控制胶东半岛的沿海地区以及琅琊走廊，来夹击即墨与莒邑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从战略上来看，燕国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胶东丘陵和沂沭河谷。这也就是乐毅为什么后来希望采取怀柔政策，以软化齐人抵抗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做法对于远在燕国坐等消息的燕王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成为乐毅有意拥兵自立的重要“证据”。实际上，无论出于自立，还是为燕国吞并齐国的目的，如果燕军能够一战而控制整个齐国的话，乐毅都没有理由在这两地进行持久战。正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虽然齐国最后的据点是即墨与莒邑，但两国真正博弈的地点却只是在即墨。而莒邑之所以没有成为燕国攻击的重点，则是在于楚国的介入。

第五节 楚国进占沂沭河谷与齐国复国成功

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了，楚国之所以介入这场战争，除了想拿回被宋国所占的淮北地以外，更想做到的就是向沂沭河谷渗透，以控制山东半岛南部的整个沿海地区。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直接的做法就是乘齐军与五国联军混战之时进攻莒邑。不过楚人的做法要更聪明一些，就是假意对齐国施以援手。这样的话，就顺理成章地进入沂沭河谷，特别是实际控制了莒邑。

从齐国的角度来看，孤悬于胶东半岛的即墨与可以得到楚国直接援助的莒邑相比，后者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更安全一点，也更应该成为齐国反攻的基地。事实上因为楚人的存在，沂沭河谷在乐毅的战略思想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为了燕国，还是自己，齐长城以北的齐国核心区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能凭险以自守的。至于说沂沭河谷，即使楚人不插手，燕国将来为了消化齐国的核心区，亦有可能将之让给楚国，以换取南线的安全（就像当年越国继承吴国在泗、淮流域的扩张区后所做的那样）。

基于上述原因，齐王（齐闵王）在国都被攻破之后，逃到了莒邑。或者说，就是将莒邑作为了战时的陪都。由于选择莒邑，而不是即墨，是基于这里能够得到楚人的直接支援，因此落难的齐闵王甚至将前来“支援”的楚将立为国相。这种做法等于将齐国的命运交付给了楚国（更有可能的是，在楚人的要挟之下做出的决定）。而楚人当然也不是什么活雷锋，在与燕国达成默契之后，齐王很快被他的楚国宰相所杀，沂沭河谷也重新落入了楚国的控制之中（因为当初莒国本来就是被楚国所灭的，所以对于楚国来说，也算是收复失地）。

楚国在杀掉齐闵王之后，并没有正式宣布占据莒邑（在燕齐两国还在胶着之时，没有必要出这个头），因此莒邑还是以齐国最后据点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不过在齐国复国之后，齐人已经没有力量从楚人手中夺回沂沭河谷乃至琅琊走廊的控制权了。而楚国在重新控制沂沭河谷后，如果再想扩张的话，无非是有两个方向，一是越过齐长城进攻齐国；二是向西攻击鲁国。前者的难度显然要高于后者。因此在 20 多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256 年，鲁国这个最后的贵族为楚国所灭。鲁国的国君也被迁往“莒”邑，渡过余生。



齐国以火牛阵复国

正是因为莒邑在齐国的战斗序列中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也因为即墨城对于燕国占据整个齐国核心区也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燕齐两国最后博弈的战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即墨而进行的。如果从战术的角度看，齐国的最后翻盘是具有戏剧性的。因为几百头被烧

着尾巴的牛，似乎决定了燕齐两国的命运。不过如果从地缘背景的角度来看，田单和他的“火牛”们只是抓住了机遇罢了。因为无论是齐并燕，还是燕吞齐，都不是其他诸侯所愿意看到的。因此燕国最后的灭齐行动，非但不会像开战之初那样得到其他诸侯的帮助，那些之前的盟友反而会暗中支持齐国复国。即使燕国攻下了即墨，那些不希望燕国独大的诸侯，也会选择一个齐国贵族作为齐国王室的继承人进行复国战争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齐国的地缘基础足够雄厚。除了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以外，与周同寿的历史也足以让齐国民众从心理上抗拒燕国的统治（当年齐国侵燕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决定了燕国在与齐国进入持久战之后，胜利的天平逐渐向齐国倾斜。而在“火牛”的协助之下，燕军败退的速度甚至比他们当年攻取七十余座齐国城邑时还要快，齐国也最终复国成功。不过在经历过乐毅破齐之战后，齐国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他们在黄河以北的外围控制区，而沂沭河谷也被楚人所控制。至于宋国的土地，齐国更是不敢再做他想。换句话说，齐国已经丧失了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从此偏安一隅，无意再进入中原争霸了。齐国的这次失败，不仅意味着齐国的衰弱，也意味着秦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从此，战国历史从“诸国乱战”

的第二阶段，进入到了秦国以“一敌六”的第三阶段，中央之国开始真正朝着大一统的目标前进了。

对于燕国来说，虽然没有达到吞齐的战略目的，但能够将齐国这个一流强国打到差点灭国，也奠定了燕国一流强国的地位。不过如果燕国仅仅是靠祖上传下来的燕山以南的那些土地，还是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这种单一的地缘结构也难以支撑燕国进入一流强国的序列，因此燕国也需要找到方向来扩张自己的战略纵深。和赵人一样，北面那些为戎狄所占据的土地成为燕国新的扩张方向。

第十章 燕国向辽河平原扩张

第一节 燕国向外扩张的背景

通过对齐国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战国诸侯们在东部的地缘关系了。现在我们需要将视线移向北方，去看看燕国是如果向东北地区扩张的。当然，燕国的扩张方向并不止在北方，西面也是渗透目标之一。在那里，太行八陲的最后一径“军都陲”就将浮出水面。只不过东北是燕国在唱独角戏（前提是无视那些戎狄），而军都陲以西部分，燕赵两国将共同应对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

解读燕赵两国在北方的扩张，实际上也是在解读中央帝国在今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是如何确认其核心区北面边界的。而如果要这条地缘平衡线展现在世人面前，“长城”是最重要的标签。相信这部分也会让很多人感兴趣，特别有些人觉得之前的地缘博弈都是属于“内战”，这种发生在长城之外的战争才是“外战”。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解虽有一定道理，但放在现在却有些不合时宜了（好在现在不是扣帽子的年代）。燕国正式向西、北两个方向扩张，始于公元前 300 年。那时的燕国所面临的形势是：因为燕王哙“禅让”所造成的内乱已经平息，而齐国在侵燕之后，迫于压力退了回去。那位后来任用乐毅，破齐成功的燕昭王（公元前 311 年继位）已经稳定了燕国的形势，正在寻求扩张的方向。

燕国之所以要急于扩张，是缘于当时的地缘形势。在各路诸侯纷纷称王时，也意味着诸侯之间的兼并将会愈演愈烈。如果燕国还是这么单一的地缘结构，则只能是和宋、中山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甚至连韩国都比不上（韩国人还有上党高地的存在，还能够策应他们在中原的核心区）。或者说，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大国吞并的对象，齐国人仅用 50 天占领燕国全境（公元前 314 年）就是一个警告。即使不考虑齐国人，已经对中山国发起总攻，吞并中山只在旦夕之间的赵国，也会成为燕国最大的敌人。能够控制整个河北平原中北部，对于将北方视为战略扩张方向的赵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诱惑。

因此燕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么坐守祖先打下来的燕山以南的那点基业，要么向外扩张自己的战略纵深，以让自己真正跻身于大国行列。如果不想去趟赵、中山两国那池浑水的话，沿东南方向，向山东半岛渗透当然是一种选择，后来燕国也的确这样尝试过了。不过燕国仅仅只依靠现有的地缘潜力，即使齐国陷入孤立的境地，燕昭王和乐毅也是很难破齐成功的。因此在燕国有能力破齐之前，他们也如赵人那样，将扩张的方向投向那些戎狄之地。

燕国兼并戎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召公被分封于此，就是为了对抗来自北方的戎狄。而燕国最早被分封的地点，也只是在现在燕国的西南部。正是通过数百

年不断向北渗透，才将华北平原北部的戎狄赶了出去。只不过当燕国将易水以北，太行山以西，燕山以南的土地悉数收入囊中后，再向前进一步的话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横亘于北方的燕山山脉（包括西侧的部分太行山脉）不仅为燕国的后方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燕国的进一步扩张制造了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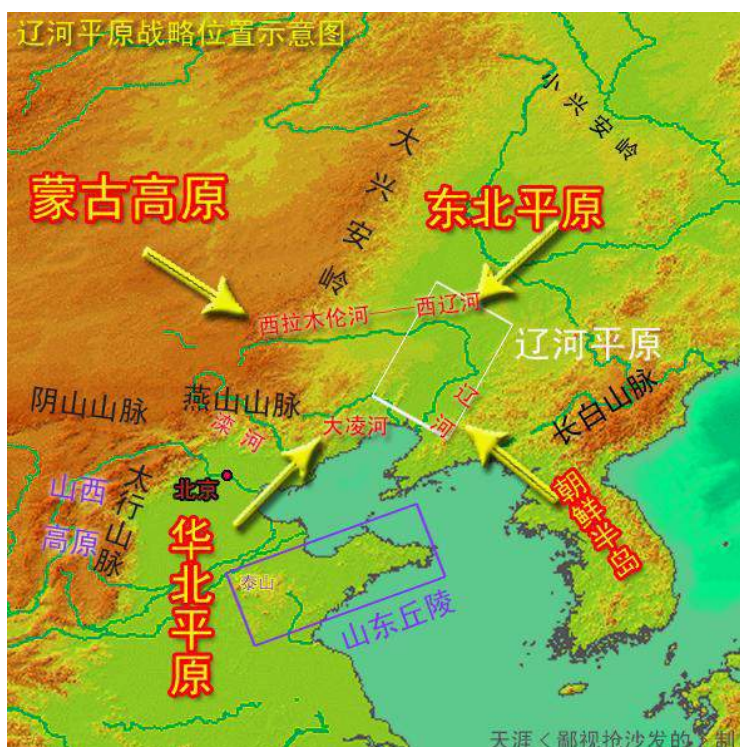
当燕国希望越过燕山、太行山脉扩张自己的战略纵深时，有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秦开”，如果从对燕国的贡献来看，秦开的贡献甚至要大于名气更大的乐毅。因为正是秦开在西、北方向的作战，才扩大了燕国的国土，丰富了燕国的地缘层次，才有后来乐毅的破齐之战。即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开将农耕民族的控制线向北推移的做法，其意义也要远高于乐毅战胜了齐国。说到“秦开”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不过说到他的孙子，知名度就要大上许多了。只是这个名声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因为他的孙子叫做“秦舞阳”，也就是那个陪荆轲刺秦，被吓得差点尿裤子的那位。如果曾经有秦姓的人因为秦舞阳这事上学时被同学耻笑的话，那秦开绝对可以为秦氏家族挽回颜面了。

其实秦舞阳当初也并不是胆小之辈，名将之后也是有些勇气的，十二岁就敢杀人。不过比起秦开来说，确是差了一大截。因为秦开曾经长期在戎狄那里为质，凭借自己的才能非但没受什么苦，反而取得了对方的信任，了解了那些戎狄之地的地缘结构。这些因素未必是燕国改写历史的关键点，没有秦开，燕国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指挥燕国的北伐（长期与戎狄博弈的燕国，并不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只不过秦开的经历，让他成为抓住历史机遇的人。所以我常说，并非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不在于他能否改变周边的环境，而在于他能不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就燕国和秦开而言，向西突破太行山脉和向北越过燕山山脉都是一种选择。不过如果准备把主攻方向放在西面的话，将会与势头正盛的赵国发生正面冲突。而燕国暂时还不想，也不能去硬碰这些战国诸侯。因此燕国的主要扩张方向被定在了燕山以北。而当燕国寻找到合适的通道越过燕山后，他们将面对一块极具战略价值和地缘潜力的土地——辽河平原。

第二节 辽河平原的自然条件适合农耕

关于辽河平原的情况，记得在前面部分曾经简略的说过，那是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博弈的主战场之一。如果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这也是一块典型的“四战之地”。从地理结构来看，“辽河平原”四周主要有四大地理单元，分别是北面的东北平原（其实辽河平原也算是东北平原的一部分），西部的蒙古高原，南面的华北平原，以及东面的朝鲜半岛。在西、南、东这三个方向，辽河平原与这几大地理单元的地缘分割线，分别是大兴安岭、燕山山脉、长白山脉。蒙古高原、华北平原、



辽河平原战略位置示意图

朝鲜半岛的地缘势力也正是从这三条山脉之间的接缝处进入这个“四战之地”的。

当然，如果一方在辽河平原占据了优势地位，那他们也同样会通过这些战略通道向那几个地理单元渗透的。相比于西、南、东方向有明显的山脉作为地缘分界线，辽河平原与其北部的东北平原就没有明显的分割线了，因此从地理单元的划分上来看，辽河平原也通常被视为东北平原的南部（北部的主体为松嫩平原，即松花江、嫩江冲积平原）。不过就辽河平原的地缘位置来看，地缘关系显然要比它的北方兄弟

要复杂得多。这一点也反映在现在辽宁省的地缘文化上（辽河平原的主体在辽宁），或者辽宁省的地缘文化要更丰富些。以至于不止一次听到来自黑龙江和吉林的朋友说到，自己所在的地区才是真正的东北。

上述分析只是客观的指出辽河平原在地缘文化上的独特性，并无意于卷入地域之争。也正是由于辽河平原在整体上与松嫩平原直至更北部地区地缘关系紧密，在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和技术原因，未能开发成农业区时，渔猎民族成为辽河平原的主人。而那些广泛分布于山水之间的原始森林，就是这些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又能忍受低温的民族们的生存基础。

如果燕山以北一直不适合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话，那么燕国并不会将之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因为扩张和占领都是要讲究成本的，原始的渔猎方式并不足以提升燕国的地缘实力，反而要分散较多的资源以应对那些穿行于森林之中的边缘部落。从土地的平整度和淡水的来源来看，辽河平原倒是一个有潜力的农业区（森林不是问题，一把火就能解决了）。问题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除了土地的平整度、淡水的来源（包括河流和降雨量）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温度。后者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一直到今天人类都无法从大环境上改变这一点。至于说能不能通过人为干涉，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对气候实施影响，则是当下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话题。

对于燕人来说，他们肯定没有想过要通过影响气候来帮助他们向北扩张。不过地球上的温度并不总是恒定的，总是在周期性的变化。通过考古我们知道辽河流域

在五、六千年前这个阶段，曾经诞生过伟大的“红山文化”，这个文明的属性也是农业文明。也就是说，在五、六千年以前，辽河流域还是属于适合原始农业生产的“暖温带”。只不过红山文明的主体并非在辽河平原，而是在它西侧的辽西丘陵之上，或者说是辽河的上游地区。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沿海平原海侵还十分严重，海水的反复入侵，使得那些山地边缘的丘陵地带才是最安全的。

战国中后期的气候与之前相比，气温有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比红山文化时期，还是要低些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出差不多两度。可不要小看了这两度，它只是一个平均气温，温度变化主要影响的是无霜期长短（也就是说冬天气温的变化不大，主要是靠温暖季节的温度变化来拉动平均值的）。据说环保主义者之所以要全球性地普及低碳概念，也正是认为地球表面温度在数十年后会升高两度，而这两度会让南北极的冰融化，并淹没大部分沿海平原。是否真有这么可怕，倒是可以通过考察 5000 多年前的气候来得出结论。

从气候的角度来看，当燕国整合好了华北平原北部，并且出于来自南方的地缘压力，准备冒险越过燕山山脉去开辟新的生存空间时，他们所面临的并非是最好的时期。不过温度低点也有低点的好处，最起码海侵的现象不会有当初那么严重。燕国可以在辽河平原开拓出更多平整的土地。当然，也正是基于此，燕国也没有像当年的“红山文明”那样，将势力范围拓展到辽河流域的北缘。燕人的控制区，主要还是辽河流域的南部。至于燕国在北方与那些边缘民族的地缘分割线在哪，燕国所控制的辽河平原又是哪一部分，这其中是否又有其他的地缘因素，则是我们后面的分析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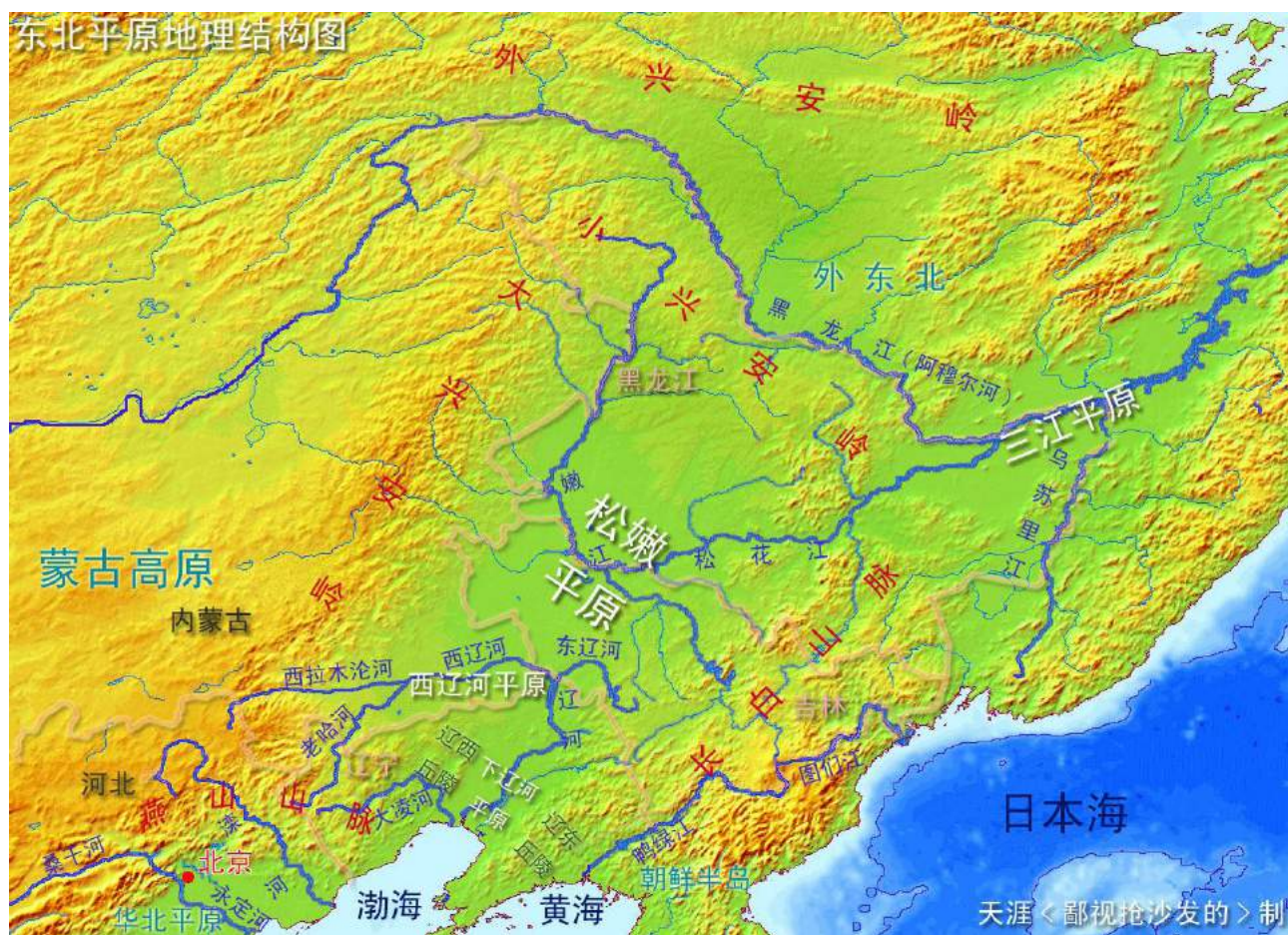
第三节 西拉木伦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变迁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看，燕山以北的平原地带都被统称为“东北平原”。但正如华北平原可以依几条重要的河流被切割为数个半独立的地理单元一样，“东北平原”的内部也是存在差异的，而区别这些差异的地理基础就是那几条横亘于其间的大河，以及与各自支流所形成的水系。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松花江——嫩江”水系（嫩江可以被看作是松花江的北源）和辽河水系。从平原划分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东北平原”大体上是由北部的“松嫩平原”，以及南部的“辽河平原”所组成。前者主要由黑、吉两省占据；而后者最为肥美的土地则是辽宁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结构来看，东北平原是一个由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燕山山脉、长白山脉合围而成的，呈现一个倒三角形并且具有很强封闭性的地理单元。

事实上这个地理单元受行政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一般还会加入小兴安岭东侧，长白山脉北端的“三江平原”。对于三江平原，我们在中俄边境部分已经分析过了。这片由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江合流，所共同冲积而成的三角形平原，实际

上是由中俄两国所共有的。而它的大规模开发则要到那个如火如荼的政治年代了，在此之前，“北大荒”是它的地理标签。

也就是说，在整个古典时期，松嫩平原和辽河平原才是东北渔猎民族与燕山以南的华夏农耕民族进行地缘博弈的基础。而在松嫩平原与辽河平原之中，位置靠南的“辽河平原”，则是四方博弈的焦点。无论是谁想在这场博弈中取得优势，都必须控制“辽河平原”。我们前面已经从大的地理格局上分析过了“辽河平原”的地缘位置，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四战之地。首先，活跃于松嫩平原（在未开发之前，是属于森林覆盖区）的渔猎民族，基本可以无障碍地进入辽河平原。由于气候的原因，那些在南方温暖气候作用下，能够发挥重要地缘切割作用的河流，在这里很难起到同样的作用（结冰后就不具备防御功能了）。



东北平原地理结构图

其次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可以从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之间的缺口进入辽河平原。也正是由于这个缺口的存在，地缘背景更具有相通性的森林渔猎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往往要先在辽河的上游地区达成同盟后，再共同应对燕山以南强大无比的农耕民族。在这里，辽河的西源：西拉木伦河——西辽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条发源于蒙古高原，穿行于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之间的河流，引导着游牧民族进入这



科尔沁地区的草原与沙地

片枢纽地区，也为他们攻击华北平原提供了一条新的路线。

与绝大多数大河上游有不同的分支一样，辽河的上游也分为东、西两源，被分别命名为东辽河和西辽河。其中西辽河是主源，所冲积出来的“西辽河平原”也是北“辽河平原”的主体。但西辽河其实又有两个名字，其西段被重新命名为“西拉木伦河”。这种情况一般代表着同一条河流的不同部分，所孕育出的地缘文化也有所差别。在河流的上下游部分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源头的高地民族和下游的低地民族，都认为自己有权利为流经自己领地的河流命名。

不过“西拉木伦河”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它不仅包括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高原部分，

还包括了大兴安岭东侧的部分丘陵、平原地带。换句话说就是“西辽河平原”内的部分河段，也被命名为这个带有游牧民族气息的名字。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主要是这里正处于草原游牧民族向东渗透的前线，也就是说蒙古高原之上的游牧民族，经过长期的地缘博弈也在“辽河平原”这个四战之地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为放牧，因此最早覆盖西拉木伦河流域（包括山地、丘陵和部分平原）的森林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农耕民族同样也没有将之变身为农业区，草原是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生态特征。当古典时期最后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占据此地时，这条为蒙古族滋养草场的河流被正式命名为“西拉木伦河”（蒙古语“黄色的河流”）。而对蒙古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蒙古族内部又被划分为不同的部落。而占据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部族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子孙——科尔沁部，所以这片草原的正式名称被命名为“科尔沁草原”（也正因为此，现在内蒙古的管辖范围，得以从南面渗入东北平原）。

农耕民族并非没有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没有留下过足迹，当年的“红山文明”正是兴盛于此。只是当古典时期的农耕民族再渗透至此时，却很难在此立足了。当你

需要同时面对来自两个方向的地缘压力，而对手又分别是那些“野蛮”的渔猎和游牧民族时，退出这片接触区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不过 5000 多年前“红山文明”的消失，却并非由于受到游牧、渔猎民族的压力。在不能凭借马匹而拥有强大机动性之前，这两个边缘民族是很难对生产力更高，人口密度更大的农耕民族构成实质威胁的。造成红山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气候。



西拉木伦河

处在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接触点上，游牧民族并非唯一从蒙古高原东进的入侵者。那些反复无常的气流往往更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的地貌。因此对气候要求更高的耕地，让位于生存能力更强的“草原”也就不足为奇了。气候对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农耕民族，只

不过农耕民族的依赖性更强，更容易退出罢了。虽说在古典时期，游牧民族似乎在此占据了上风，但如果你现在想要去“科尔沁草原”领略上面蓝天白云，下面“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肯定会感到失望的。因为现在的“科尔沁草原”又更换了标签，被命名为更酷的“科尔沁沙地”了。

所谓的沙地，和沙漠还是有区别的，可以理解为沙漠进行时，或正在向完全黄沙一片的“沙漠”无人区转变。科尔沁草原的沙化¹，从表面看是过度放牧的结果。就像有些地方的耕地消退，被认为是过渡耕种的结果一样。其实这并非根本原因，因为所谓的“过度”现象，在人类还没有主动保护环境意识之前，就存在于地球的各个角落。只不过有些地区“过度”后，可以自然恢复（比如你在南方多雨地区烧了座山，用不了多少年，植被就会自然恢复）；而有些地区的生态结构则比较脆弱，即使没有人类干涉，也可能会发生自然变化。而在人类过度开发后，这种变化会变得更快速了。

就西拉木伦河流域而言，处在蒙古高原下风口的位置，它的生态演变就是一个

1 19 世纪后期，因滥垦沙质草地，砍伐森林，赤峰以北而今已成沙地。由于对草原的不合理利用，甸子地不断缩小，坨子地扩大，沙化面积急剧增加，最终形成了大片沙地。其中科尔沁草原北部通辽市扎鲁特旗和霍林河市境内仍有一处保留完整的原始草原，其北依大兴安岭，西连锡林郭勒草原，地貌特征既有浅山丘陵，疏林草地，又有冲击平原和山地平台，以及无数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宛如玉带游动其间。

典型的例子。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大同盆地，在那里，大同盆地也正是因为缺乏连续的山脉作为屏障来抵御蒙古高原恶劣的气候影响，而变得生态脆弱。雪上加霜的是，大同盆地地下居然还发现了煤，为了取得煤这个“火”之源，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一的地下水资源，也正在快速的流失。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环境影响，估计把大同盆地的煤卖完了，也不一定能修补好。

第四节 燕国构筑长城保护下辽河平原

说到“辽河平原”，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北部，以西辽河为核心的平原地带，我们可以称之为“西辽河平原”（包括所谓“西拉木伦河”东段的部分低地）。当然，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被沙化的那部分土地已经很难归入我们心目中本该是绿色的“平原”概念了。不管土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所说的平原并非单指可以作为耕地的平整土地，而是包括所有相对高度差较为平缓的土地。这其中既包括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原盆地，也包括被黄沙、泥泽覆盖的低地。只不过出于农耕民族的愿望，希望这些平整的土地都能变为耕地罢了。

辽河平原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南部，被称之为“下辽河平原”。顾名思义，这一地区主要是由辽河下游所滋养的。如果说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西辽河平原主要是来自松嫩平原的渔猎民族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博弈的主战场的话，那么“下辽河平原”则主要是来自华北平原的华夏农耕民族与东北渔猎民族争夺的地区了。当然，如果游牧、渔猎两大边缘民族能够在西辽河流域达成共识的话，他们往往也会共同对下辽河平原渗透。

就“下辽河平原”的地理结构而言，比较有利于那些马上民族的，是其所在地区与西辽河平原乃至整个东北平原的主体，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特别是在冬季结冰之后，那些以骑射为本的边缘民族很容易由北至南攻入农耕民族所占据的“下辽河平原”。而相比于那些马上民族可以任意在下辽河平原驰骋而言，华北平原的华夏族要想进入下辽河平原却要困难许多。

现在如果我们想从河北平原进入东北平原的话，沿燕山山脉东麓，渤海西侧的那条狭长沿海平原北上，是最为便捷也最为通畅的线路。这条介于山、海之间的战略通道由于北端位于辽河以西，因此也被称之为“辽西走廊”，而它南端的关口，就被命名为“山海关”。即使是单纯对比接触面，通过辽西走廊与下辽河平原保持联系的华夏族，也远比不上东北渔猎民族（也包括进入西辽河平原的游牧民族）进入下辽河平原来得容易。这种地理优势的差异，使得华夏民族如果希望经营下辽河平原的话，往往要花费成倍的资源。好在就资源而言，农耕民族要远强于那些边缘民族；因此在历史上中原政权曾多次成功渗入下辽河平原。

其实对于战国时期的燕人而言，他们甚至无法通过辽西走廊向下辽河平原乃至

整个东北平原渗透。因为温度的原因，当时的海平面要比现在高。虽说不至于让中央之国的轮廓发生大的变化，但海水要想淹没这条狭长的伴海通道，却再容易不过了。因此燕国如果想渗透入东北平原的话，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燕山山脉之中寻找合适的道路。这和当年晋人准备向华北平原渗透时，所要考虑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身处华北平原之中的燕国，之前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打通那些艰险的山地通道。



辽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而燕人之所以战国后期迎难而上，则是看到了华北平原已经被瓜分完毕，仅凭燕国现有的战略纵深，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扩张，而是生存的问题了。和燕人在同一时期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秦人，二者都很好地解决了道路和战略纵深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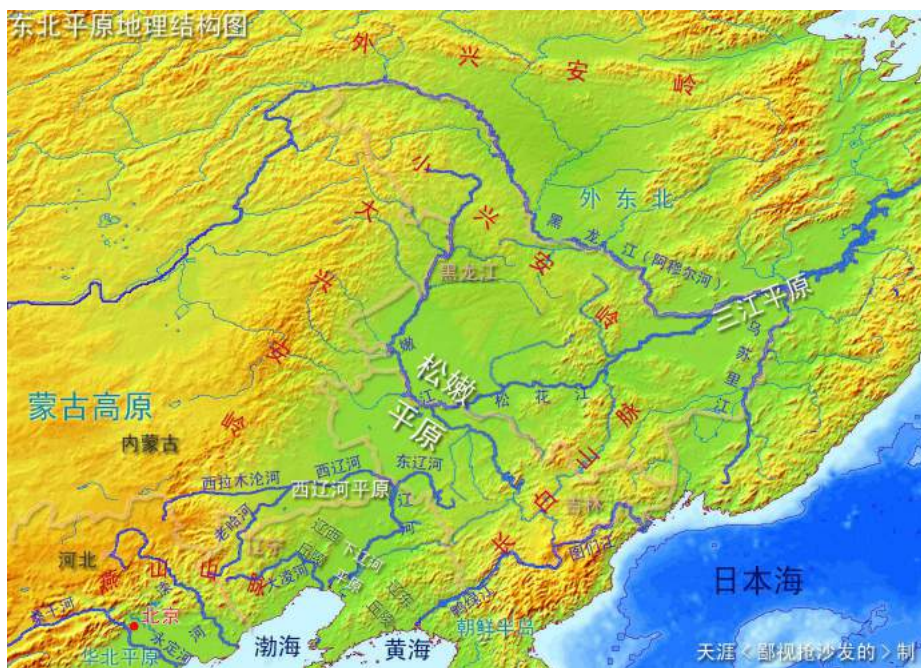
题。只不过前者借此跻身为七雄之列，而后者则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罢了。秦人是怎么做的，是战国部分的收尾之作，而燕人是如何打通燕山通道，又是如何经营的，则是我们后面要分析的方向。关于燕人是如何在燕山中行走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再高的山脉，人也是有办法越过去的。对于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国家或者族群来说，如何能够长期占据新获得的土地，才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农耕民族要想在一块地区立足，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一地区是否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活动。从土地的平整度及淡水的供应来说，下辽河平原显然是合格的。

最为不利的因素应该是气候。基于纬度的原因，燕山以北地区已经由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暖温带，向中温带转变了。而这个转变的过渡区，就是辽河平原。也就是说，如果地球整体温度高一些，辽河平原的气候就有可能成为暖温带；而如果反过来，那么辛苦播下的种子，可能在无霜期结束之前，还没有成熟。就气候而言，下辽河平原对于农耕民族还是有诸多有利条件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位于整个东北平原的南端，纬度最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南接渤海，能够从海洋中接收湿润的气流。除去这两点，还有一个地理方面的原因，使得农耕民族能够多次成功渗入“下辽河平原”。

对于燕山以南的农耕民族为什么能够多次成功渗透入辽河平原，可能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见解，也都有一定道理。现在我们就来具体解读一下。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下辽河平原的气候和土地条件是东北平原中，最适合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地理单元，这一点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应该是最为重要的，否则不仅不能为自己的核心区提供战略支持，反而要耗费其他地区的资源(所以国土并不是越大越好，关键要有用)。因此扩张的原动力，就是要有资源可以利用。

当燕国人越过燕山山脉，并击退盘踞于此的边缘民族后，接下来要做的除了运用已经成熟的农业技术，将下辽河平原开发为耕地以外，更为重要的便是如何保证自身安全的问题了。在燕人还在华北平原之时，尽管燕山山脉本身成为燕人北扩的最大障碍，但也反过来保证了燕国北境的安全。有了燕山在北线作为屏障，燕国才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南线之上，并参与中央之国内部的地缘博弈。现在燕国人需要寻找到一条新的防线，以将那些不甘心失败的戎狄隔离在下辽河平原之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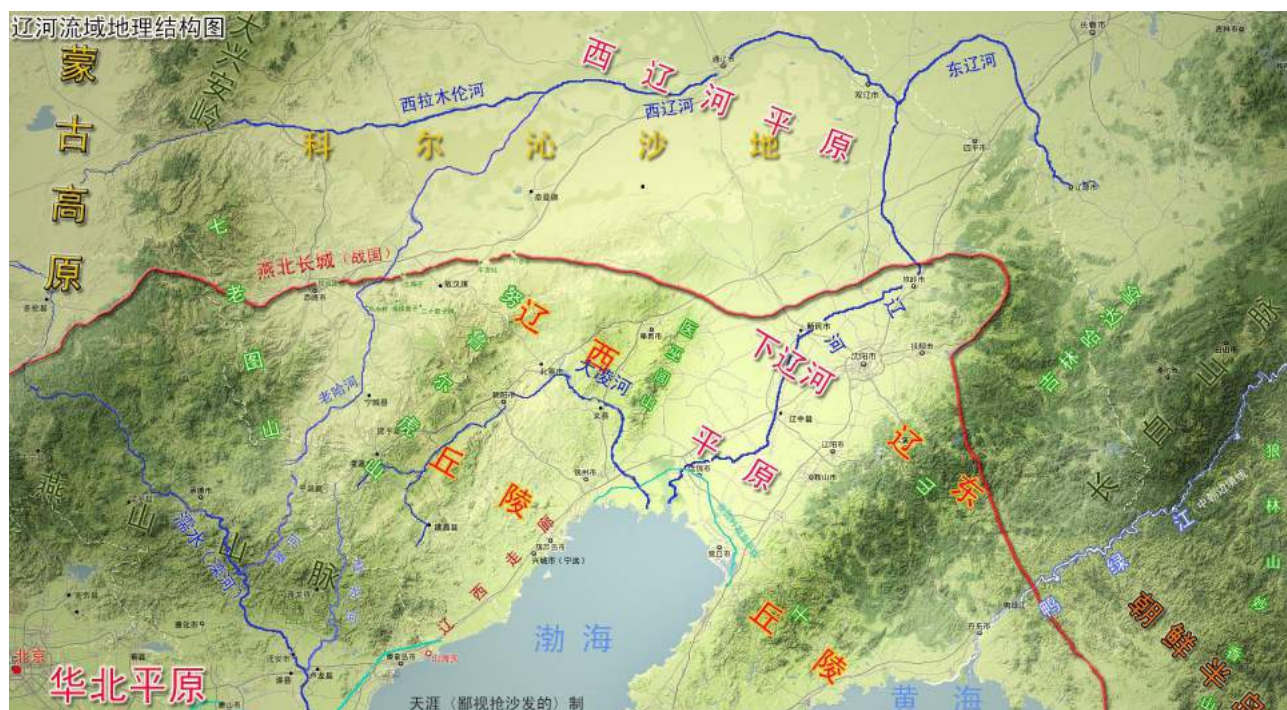
东北平原地理结构图

就东北平原本身的地理结构而言，希望寻找一条东西向的山脉以为依托是没有什么希望的。除非燕人有能力将防线推进至小兴安岭，将整个东北平原纳为自己的控制区。而在整个古典时期，核心区内的农耕民族都无法做到这点，更别说力量薄弱的燕国了。

不过燕国如果仅仅是想控制“下辽河平原”，成功的机会还是挺大的。我们之前分析整个东北平原的地理结构时说过，整个东北平原大致是呈一个向下收窄的倒三角形，而下辽河平原就是这个倒三角的尖。也就是说，如果燕国仅仅是想守住这个“尖”的话，它的防御面并不算宽。

事实上“下辽河平原”两侧的地理结构，比想象中更有利于燕国构筑防线。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下辽河平原与北部的东北平原主体之间，其实是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也就是说下辽河平原的形态，其实不太像是一个自然过渡的三角形的角，而更像是在一个倒梯形下面的块状凸起。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地理结构，是因为下辽河平原处在燕山山脉与长白山脉的结合部。前者自西向东延伸，并在下

辽河平原的西侧形成了一片丘陵地带，叫做“辽西丘陵”（努鲁尔虎山与医巫闾山一带）；而大致呈南北状的长白山脉，则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至辽东半岛。相比于长白山主脉而言，延伸至辽东半岛的这部分支脉则要平缓一些了，或者说已经呈现为丘陵地貌了，因此也被称之为“辽东丘陵”（主体为“千山山脉”）。



辽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从结果来看，燕山山脉延伸出的“辽西丘陵”和长白山脉延伸出的“辽东丘陵”，虽然压缩了“下辽河平原”的东西纵深，但也进一步收窄了燕国的防御面。而燕人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在辽西、辽东两片丘陵的北端，用人力修筑一条防线。一方面加强这些丘陵的防御力，另一方面则是重点保卫二者之间的结合部。而这条防线就是“燕北长城”的一部分。燕人在下辽河平原北部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在其后的古典时期，每当中原政权向东北平原强力渗透时，他们实际控制线的北端，基本也就是以此为基础；或者说下辽河平原是农耕民族在东北方向稳定渗透的极限。

之所以会有这种结果，当然不是出于向燕人致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每当中原政权想向北进一步扩张，进入西辽河平原的话，脱离了东西两大丘陵保护的作战部队和屯垦大军，一定会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那些习惯机动作战的马上民族来说，这种感觉肯定是好极了，但让习惯于打阵地战和防御战的中原战士呆在这种数面受敌的地方，其难度可想而知。也许花费成倍的力量再构筑几道长城（有一种类型的长城就是在平地上构筑，然后在前面挖条壕沟，以增加高差）可以暂时隔绝那些边缘民族。但问题是这种基本没有依托的长城，即使能够抵挡住那些边缘民族的进攻，也无法改变下辽河平原以北的气候。即使不考虑纬度的问题，

有了燕山山脉在西侧的庇护，生活在下辽河平原之上的人，环境也会比生活在西辽河流域的人要感觉舒适一些。毕竟大兴安岭——燕山山脉之间的那个结合处，渗透进来的除了游牧骑兵外，还有蒙古高原的寒风。

既然向北扩张已经没有意义了，并且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燕人也就满足于将他们的北部防线建于辽东——辽西丘陵之间了。事实证明，农耕民族在能够依托有自给能力的地理单元构筑长城时，防御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筑到蒙古高原腹地，就没有生存能力了）。最起码燕人还是比较成功地阻止了北方的威胁。不过燕人虽然停止他北进的步伐，却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扩张的方向了。既然辽河平原是个“四战之地”，那当然也意味着占据优势的一方，可以有三个方向进行扩张了。现在燕北长城的构筑，虽然让燕国无意于深入东北平原腹地和蒙古高原，但还有一个纬度更低，且与下辽河平原相通的地理单元可供选择，那就是“朝鲜半岛”。而这个半封闭的地理单元，就是燕国下一步的渗透目标了。

第十一章 燕国向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扩张

第一节 渔猎民族占据下辽河平原后的扩张方向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长白山脉”是指横亘在整个东北地区东北部山地的合称。其北部直抵三江平原（最北的山地为“完达山”），南部则贯穿辽东半岛，与渤海相接（最南的山体为“千山山脉”）。由于长白山脉很好的庇护了东北平原的东部边境，因此很多时候它往往被认为是东北平原与朝鲜半岛的地理分割线。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长白山脉主脉在向南伸展至现在的中朝边境中部时，并没有单纯的向西南方向的辽东半岛延伸，而是同时也向东南方向的朝鲜半岛延伸。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北部的山体，与长白山脉可以看作一个整体。

当我们抛开政治因素，将视角扩展到朝鲜半岛时，这片覆盖整个东北亚大陆东北角的山地，整体上呈现为一个“人”字形，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山地是它的两个分支。其实如果从高度上来判定这片山地的主脉在哪的话，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盖马高原为核心的朝鲜北部山体，比中国境内的山体（平均海拔800米）更有资格成为整片山地的脊梁。这也许会让某些人感到不爽，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看，低海拔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生存空间。而朝鲜半岛东北部过高的海拔，使得整个朝鲜半岛北部的可耕种土地严重不足，这也成为现在朝鲜面临粮食危机的主要地理原因。

也正是因为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山体过高，密度过大，使得在古典时期，即使是从松嫩平原出发的渔猎民族，在对朝鲜半岛展开渗透时，也要绕经辽河平原，再越过海拔较低的辽东丘陵，从鸭绿江下游渡江进入朝鲜半岛。这条路线也是最为可行的路线。而对于从南线华北平原出发的华夏农耕民族来说，就更没有理由去碰朝鲜半岛东北部那些高山了。沿下辽河平原——辽东半岛南缘的沿海走廊，进入朝鲜半岛的西部低地的路线，除了地势平缓以外，亦不会在气候上让这些来自华北平原的族群感到不适（华北平原北部、辽东半岛南部与朝鲜半岛西北部处在同一纬度区间，并且海拔一致）。

如果朝鲜半岛拥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与整个中央之国对抗。也许双方现在的地缘分割线会建立在长白山主脉——辽东丘陵（千山山脉为主脉）一线之上。问题是以朝鲜半岛的战略纵深而言，他们甚至无力与东北平原的渔猎民族单独对抗。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会发现，基本上看不到以朝鲜半岛为起点，向东北平原渗透的案例。除非他们能够从海路与东亚大陆上的华夏族达成联盟。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高句丽”。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来看，高句丽其实是典型的由东北渔猎民族升级而成的政权。

由于燕山山脉的阻隔，华夏民族对于下辽河平原的控制一直是不稳定的。或者说下辽河平原的控制权一直是在东北渔猎民族和华夏农耕民族的手中交替。其中最近的例子就是明末后金政权与明朝中央政府在此进行的激烈博弈。



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地缘关系图

高句丽政权是最早成功进入下辽河平原的东北渔猎民族。当然，这个“最早”是相对的，因为在华夏民族进入下辽河平原之前，这里本来就是属于渔猎民族的领地。只不过高句丽族在与下辽河平原的华夏族（战国直至汉唐）不断接触中，率先从华夏民族身上吸收了先进的经验（包括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在诸东北渔猎民族中脱颖而出，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之上。从这个意义上看，高句丽实际上是整个东北渔猎民族的代表，和中山国的诞生过程具有相似性。

以高句丽为代表的东北渔猎民族在占据了辽河平原之后，最有诱惑的选择当然是越过燕山山脉，进入华北平原。只不过以东北平原的地缘潜力，是很难直接与整个中央之国的核心区相对抗的。因此在做到这一步后，东北渔猎民族政权所做的往往是先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势力范围。基于实力的对比，对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往是采用联盟的方式，而对于狭长的朝鲜半岛，武力征服是最为常见的方法。如果能够将蒙古高原、东北平原、朝鲜半岛这三块地缘势力整合好，这些北方边缘

民族就拥有了和华夏民族平等对抗的能力。基于这种计算方式，熟悉历史的人可以在历史上寻找到很多案例，其中很多已经渗透到了华北平原。而最为成功的，当然还是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满洲政权了。



高句丽地图（南北朝时期）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北渔猎民族在占据了“下辽河平原”这个枢纽地区之后，并不一定会去改变这一地区的农业属性。因为农业生产所激发的地缘潜力，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因此下辽河平原不仅会成为南进的桥头堡，也会成为渔猎政权们主要的粮食来源，并使得渔猎政权有实力按照华夏民族的组织形式稳定下来。这点与华夏民族如果想在对抗蒙古高原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先占据几个能够成为优良牧场的地理单元（比如河套）异曲同工。当然，无论是渔猎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清楚，即使占据了下辽河平原，也还是无法与整个中央之国的核心区相对抗，他们所拥有的优势，是在于他们本

身的生产方式能够提供比农耕民族素质和比例更高的军事力量。

因此就组织结构而言，这些马上民族更愿意利用自身的优势，去控制足够数量的农业人口，以为他们经营这些耕地（从华夏民族掠夺人口，很大程度就是为此）。就像古典时期末期的满洲政权，一方面通过围猎等准军事行动保持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旗人从事农业生产一样。清朝作为“封建”制度下的顶峰之作，无论是在控制中央之国行政方式上，还是扬长避短，稳固满洲政权的统治地位上，都有足够长的历史作为参考。

从高句丽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对中央之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在长达700年的历史中，他们一直在为融合朝鲜半岛而努力，并且未能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达成真正的联盟。而其之所以在历史上拥有这么大的名气，除了现在朝鲜半岛上的族群希望攀附上这个与他们地缘属性有明显区别的族群以外，更在于这是第一个统一了整个东北平原地缘力量的政权，并以此为基础，占据了下辽河平原这个枢纽地区。而在此之前，华夏民族已经凭借强大的地缘实力，将势力渗透入下辽河平原，

乃至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战国后期至东汉末年）。在此之后，华夏民族除了要应对来自蒙古高原的地缘压力以外，也要重视来自东北平原的攻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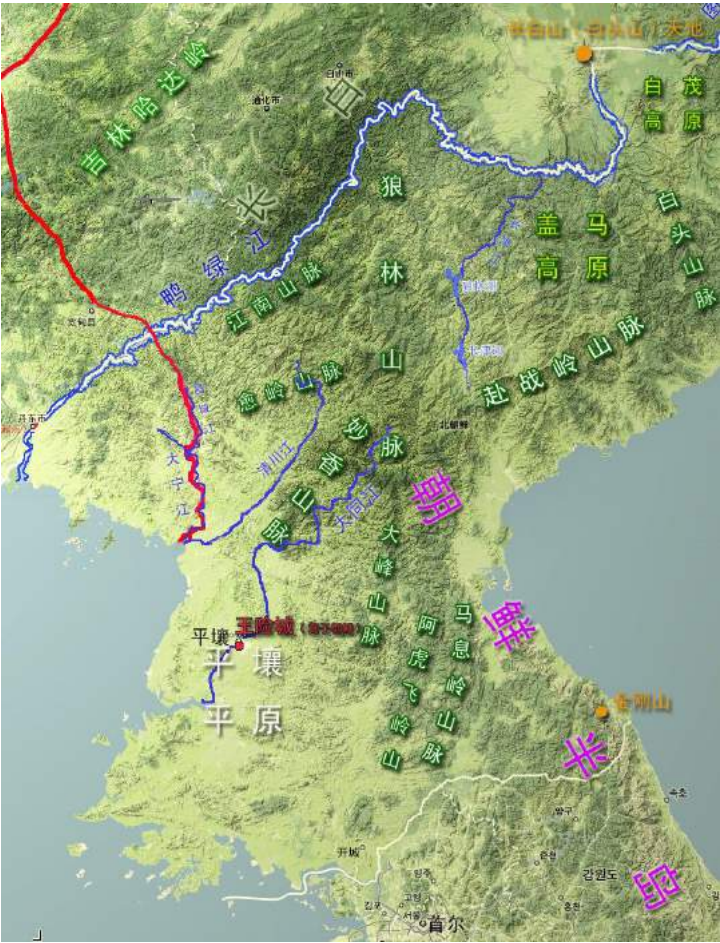
第二节 燕国向平壤平原扩张时受箕子朝鲜的阻碍

在燕人率先成为进入下辽河平原的华夏族以后，辽东半岛的丘陵地带很自然地也成为燕人的控制区。不过辽东半岛以丘陵地形为主，沿海地区又受到海浸困扰，因此燕人在越过辽东半岛之后，更希望能够向朝鲜半岛渗透。虽然朝鲜半岛的东北部为山地密集区，但地势向南延伸到朝鲜半岛的西部，也就是黄海之滨时，已经趋于平缓了。在那些发源于东北部山地的河流共同努力下，那些低缓的丘陵之间已经填充出成片的冲积平原了。而这其中，大同江的作用是最大的。

如果要为现在的朝鲜找一条母亲河的话，那就是大同江了。能够成为母亲河的必要条件就是它的下游地区可以提供足够面积的冲积平原，而这片平原在它所处的地缘单位中居于核心地位。从这点上看，大同江是最有能力成为朝鲜半岛北部的母亲河。如果我们去观察朝鲜半岛北部的轮廓就会发现，它的西侧靠近黄海的这一面

有一个三角形的凸起。构成这个三角地带骨架的是那些从东北山地漫延过来的丘陵，而填充于其间的平原，则主要是大同江水系的作用了。这个整体呈三角形的平原——丘陵地带，成为朝鲜半岛北部最具地缘潜力的地区，也当然地成为半岛北部的地缘核心。

燕人如果想在朝鲜半岛有所作为的话，战略目标就是占据这个地缘核心区了。至于说东北部的那些山地，并不能激起农耕民族的兴趣。在古典时期，如果你占据了一个地区的核心平原，也可以被认为是控制了周边的山地。虽然这些平原政权甚至不会有兴趣向那里象征性地派驻官吏（除非有交通要道）。而如果生活在山地之中的边缘民族，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话，他们往往也



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地缘结构图

可以接受这种名义上的领导。毕竟很多生活必需品,需要与平原地区的居民进行交换。基于上述理由,如果中原政权控制了整个大同江下游地区的话,那些历史地图的作者也可以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将整个朝鲜半岛北部都划为某个朝代的国土。虽然以现在的国境规则去定义古典时期的复杂地缘关系,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平壤平原位置图

对于大同江下游所处的这片三角地带,并非只有现在的我们才会知晓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它一直是半岛北部的地缘核心。而在这期间,到达此地的族群都选择了在这片三角地带的北部建立自己的政治中心。做出这个选择,一是因为大同江干流在这片三角地带的北部(南部是以载宁江为主的大同江支流冲积而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半岛的地缘压力主要来源于北方,也就是辽东半岛方向。必须将主要的资源集中在北线,以保有自己的战争潜力。否则无论是华夏族,还是东北渔猎民族,都有可能快速突破大同江防线。换句话说,以大同江下游地区的战略纵深而言,都没有

搞逐级抵抗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在第一时间摆出决战的态势。

大同江之侧的这个政治中心,现在叫做“平壤”,也就是朝鲜的首都。因此这片平原与丘陵相间,面积和平整度甚至还不如“下辽河平原”的地理单元,也被叫做“平壤平原”。事实上“平壤”这个名字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并非为现在的朝鲜所创。不过在燕人进入朝鲜半岛之时,它的地缘标签是“王险城”。而既然称之为“城”,当然也就意味着已经有成熟的政权先于燕人一步盘踞于此了。这个政权以及所属的族群,我们并不陌生,也就是当年不愿归附周王朝的商族遗民所建立的“箕子朝鲜”。

有很多人为周人有那么超前的意识,将燕国封建在华北平原北部感到困惑。实际上,燕国封建在此的战略目地,很大程度就是为了防止商人再度进入华北平原。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燕人需要将整个燕山以南地区纳为已有,并以燕山山脉为天然防线。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足以保证周王朝的地缘安全了。也正因为如此,燕人在将燕山以南地区整合完毕以后,长期没有北进的想法。直到战国后期迫于南线的

地缘压力，希望向燕山以北寻找新的战略纵深时，才开始向燕山以北进行渗透。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当年箕子没有选择以下辽河平原为据点，而是绕过辽东半岛进入了朝鲜半岛。这当然还是与下辽河平原的敏感位置有关，选择在这样一个枢纽地区立足，即使暂时感受不到华北平原的地缘压力，沿西辽河方向东进的游牧民族和东北平原腹地的渔猎民族，也不会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因此，朝鲜半岛北部的平壤平原成为商人安居的世外桃源。箕子和他的子孙们也的确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数百年之久，直到有一天，燕人出现在了他们的家门口。

关于箕子朝鲜是否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朝鲜半岛北部，现在有不同的意见。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箕子建国的地方应该是在“辽西”，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下辽河平原”；还有一种说法是应该先建立在燕山南麓，后来才迁往燕山以北。这几种意见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一个部族的迁移本身就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周人的势力还未到达燕山南麓时，箕子先在华北平原北部落脚也是有可能的。其后随着燕国的北进，这些商朝遗民再越过燕山山脉，进入下辽河平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不过如果箕子和他的族人不是一步到位地到达平壤平原的话，他们在下辽河平原也应该不是迫于燕人的压力再进行迁移的。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以下辽河平原对北线敞开式的地理结构，那些窥视农耕民族财富的边缘民族，是不会让他们得到安宁的。因此，无论箕子朝鲜是什么时候落脚朝鲜半岛的，当燕人进入下辽河平原时，是没有成熟的政权组织来阻止他们的扩张的。而当燕人越过鸭绿江，试图进入平壤平原时，真正的挑战就来到了。如果燕国能够集中全部力量对平壤平原进行突破，他们应当还是有很大的胜算的。不过燕人之所以要向北方扩张，就是希望以这些边缘之地来支援他们在华北平原的核心区。也就是说，燕国需要的是从燕山以北抽血，而不是输血来扩张国土。因此，燕国甚至不可能集中下辽河平原的资源来对付平壤平原。

如果盘踞于平壤平原之上的仍然是那些处于“原始”状态的渔猎民族，也许燕人很容易用武力或者羁縻的手段收服他们。问题是曾经入主中原的商族，这时也已经是成熟的农业民族了。他们所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并不比燕人落后，并且平壤平原的纬度甚至比燕国的都城还要低一点。也就是说，平壤平原的地缘潜力已经被充分开发了。

对付这样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战争形势将很可能会变成持久战（农业社会对于土地的依赖是非常深的，一般不会轻言放弃，而渔猎、游牧民族的生产特点决定了，他们并不过分依赖某一块土地）。另一个可能会拉长战争时间的因素，其实也是因为农业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那就是城邑的建立。为了保卫那些辛苦开耕出来的土地，农业民族用城墙来保卫自己定居点的欲望是最为强烈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华夏族作为世界上最纯粹的农业民族，也成为最会筑城的民族，长城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西方那种城，更多的是一种“堡”）。就直接继承了商朝成熟文化的箕子朝鲜而言，

他们构筑在平壤平原北部的都城，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防御力。

第三节 燕国构筑长城保护朝鲜半岛的控制区

当燕人无法像横扫下辽河平原、辽东丘陵那样迅速控制平壤平原时，他们也必须建立一条防线来保住自己的突出部了。而这条防线的核心，当然就是长城了。燕人在鸭绿江以南修筑的长城，并不为大家所熟知。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史记中记载，燕长城是东起“襄平”（今辽阳市）。这个“襄平”邑的地缘作用，我们后面分析燕国“塞上五郡”时会作解读。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它是在辽东丘陵的西缘就行了。

如果燕国仅仅是为了对抗来自西辽河平原的地缘压力，将长城修筑到辽东平原，的确就可以了。不过实际上燕国的势力已经越过辽东半岛，进入朝鲜半岛了。因此燕国北方防御体系的起点，并不是在辽东丘陵的西缘，而是在平壤平原的北侧，也就是大同江以北地区。至于说史记中记载的燕长城起于“襄平”，与燕国在朝鲜半岛构筑防御体系，并不矛盾。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长城应当是一个连续的防御体系，如果朝鲜半岛上的防御体系是单独存在的，没有与辽东丘陵相连，将之排除在燕北长城之外也是可以的。

事实上以司马迁治史的严谨，他的确实地考察过许多地理单元，不过像朝鲜半岛这种不与中央之国核心区发生直接地缘冲突的地区，是不在考察范围内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他记载燕长城的记录，放在《史记·匈奴列传》里就可以看出。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直接威胁，才是汉帝国所必须面对的。因此在燕人所筑的防御体系中，辽东丘陵以西部分才是被关注的重点。

对于司马迁为什么忽略了燕国在朝鲜半岛北部筑长城的原因，上述说法只是一种推论。如果燕人在朝鲜半岛北部所构筑的防御体系，只是以点（城邑）的方式存在，就说明司马迁并没有忽视这片帝国的突出部。当然，无论燕国是以“线”的形式还是以“点”的形式在平壤平原以北地区构筑防线，都不影响燕国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形态。不过在26年前（1984年），我们的“同志加兄弟”国家——朝鲜，还是在他们境内发现了一条长达120公里的长城遗迹，而这条长城的修筑方位，正是在大同江以北。具体的位置则是沿着另一条通过“大同江口”入海的河流——大宁江一线修筑的。

由于地球人都知道的原因，我们无法实地考察这条被朝鲜称之为“大宁江长城”的长城遗址。并且由于整个银河系都知道的原因，这条长城的修筑者也被归为了那个伟大的帝国“高句丽”，为半岛民族抵御华夏政权入侵的证据。这也就是这段长城不为我们所熟知的第二个原因。但即使不去具体考察“大宁江长城”的建筑风格是否与中国境内的燕长城相一致，仅从其走向上来看，它的防御面也是在东面，或

者说应该是所谓的“华夏入侵者”用来稳定他们的突出部的。

在《辽东——朝鲜半岛地缘关系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同江以北还有两条从朝鲜半岛东北部山地下来，并独流入海的河流，一条是“清川江”，另一条是“大宁江”。如果占据大同江下游（平壤平原）的地缘力量希望构筑外围防线的话，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是沿清川江一线布防。即使是在大宁江下游开始抵抗的话，也只需在平原地带构筑连续的工事就可以了，而平原东北部的那些山地，本身就不适合习惯于平原作战的华夏族通过，即使要防止燕国和后来其他华夏族军队的奇袭，也只需控制那些险要的山道路口就可以了。在这里，地缘优势是属于主场作战的本土族群的。



燕北长城示意图（朝鲜半岛内）

而如果让进入朝鲜半岛的华夏族来选择构筑防御体系的话，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一方面山地的优势在于对方，迫使这些渗入者必须要在那些山地上也构筑连续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这条贯穿平原山地的防御体系，又最好能够与自己原有的防御体系对接，或者最大限度地靠近。因此对于燕人来说，

河道走向与鸭绿江斜交

的“大宁江”，比基本上与鸭绿江平行的“清川江”更适合修筑长城。前者整体上与海岸低地更为接近，更容易得到支援，也足以保卫沿海的战略通道。更为重要的是，溯江而上修筑的长城，可以顺势连通鸭绿江，甚至越过鸭绿江、辽东丘陵，与燕北长城的主体相接；而如果是沿清川江修筑长城的话，虽然可能对朝鲜半岛做出一个完美的切割，但切割出来的大部分土地，都是那些直到现在也养活不了多少人口的山地。更别说如何去维护那部分远离战略补给线的防御工事了。

因此所谓的“大宁江长城”肯定是进入朝鲜半岛的华夏族所修建的。至于说“高句丽”，他们对抗中原政权的战术其实并不是以长城为依托的，而是充分地利用了那些山地打持久战。也就是说，这些更加适应在山地、森林之中作战的边缘民族，会事先在山地之中构筑很多城堡，然后储备上足够的物资。当他们在平原地区无法抵抗中原政权的进攻时（高句丽时代，他们所面对的是整个中央之国的力量，无法在平原地区进行持久战），他们会选择退入这些山地城堡，然后袭扰对方在平原地

区的据点，最终逼迫对手退出朝鲜半岛。这种战术其实也是山地民族用来对抗更为强大的平原政权最有效的战术。在那个自称“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进攻青藏高原边缘的“大小金川”时，那些构筑于山地之上的“碉楼”，就让清帝国的军队吃尽了苦头。



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地缘关系图

如果结合史料和长城走向来看，大宁江长城最早的修筑者无疑应该是燕人。只是实地考察的话，只有看将来朝鲜有没有可能开放了。不过要想让他们认同这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你的证据有多充分。至于说这条长城最终与鸭绿江的交汇点，并不是在“虎山”。所谓“虎山长城”，是修筑在现在的丹东市东，鸭绿江中国一侧的。而燕人和后来的秦人所修筑长城的地点要更靠北，如果你对这部分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地图上顺着“大宁江”和它上游的支流“昌城江”溯江北上（“大

宁江长城”就是沿着这两条江修筑的，而不是完全沿大宁江修筑的）划一条弧线，到达昌城江源头后再顺势画到鸭绿江。在这条弧线与鸭绿江的交叉点的中国一侧，你会找到一个叫“宽甸”的县级城市，而这里才是燕长城的外围控制线。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城墙，而是一套综合的防御体系，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同一地区修筑数道防御工事。因此千万不要将我图上所划的红线导入全球定位系统，然后进行精确的探查。只能说当年的防御体系，是在这条红线周边修筑的。至于说，更细的定位，自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士去做。我们所能做的，更多的是从战略上推断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可以顺带提下丹东的“虎山长城”。这里现在已经取代山海关，成为明长城的东起点了。从当时的地缘博弈情况来看，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为明帝国在将防线收缩至山海关一线之前，与满洲八旗在下辽河平原、辽东一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山海关长城只是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罢了（结果还被吴三桂给“让”了出来），而在外围还有不止一道防线，不过具体的情况，要到分析明朝时来解读了。



虎山长城



高句丽城堡遗址

有些无厘头的是，当“虎山长城”被确立为明长城的起点后，也被三八线以南的某些民间历史学家归入了所谓的“高句丽长城”，并提出抗议。这种说法其实不值一驳，先且不论这条长城的走向是否符合当时的地缘结构，单就那青砖包面的长城形态，就不是高句丽时代所有的。虽然从宣传的角度看，我们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让西方人感觉当年秦始皇所修建的样子就是八达岭长城那个样子。但实际上，这种大规模用砖结构包筑墙体的做法是始于明朝的。那时候高句丽已经亡国七八百年了。所谓的高句丽“千里长城”，和我们所理解中的长城是不一样的，具体的走向也是众说纷纭。但不太可能是建立于辽河平原之上的河堤长城，这种长城的形式是在大平原地区无山可依时才会采取的次级方案。并且以高句丽的实力，如果是和中原王朝在大平原上 PK，无异于自寻死路。

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沿辽河一线修筑“长城”，并将主要兵力集中于此，与隋、唐军队展开决战，是很不理智的。事实上高句丽的防御体系，是依托山势所

修建的山地城堡。这些山地城堡主要分布在辽东丘陵和朝鲜东北部山地（靠近沿海通道一侧）之中。而渊盖苏文花 16 年时间所监制的，也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长城，而是一种依托山地控制山谷道路的城堡体系。或者说是将之前散布的山堡系统化，并修筑交通线以互为沟通。也正是依托这些易守难攻的据点，并不断对渗透入平原地带的中原大军进行袭扰，隋唐大军才未能彻底地将东北平原乃至朝鲜半岛纳入帝

国版图（就算是这些山堡被攻破了，退入山林之中的渔猎部族也会进行同样的游击战）。

也正因为如此，唐帝国在高句丽故地所设的安东都护府（公元 668 年），八年之后就退出了朝鲜半岛，迁向辽河平原。又过了十几年，在另一支活动于西辽河流域，兼具游牧、渔猎特色的边缘部族——“契丹”的连续攻击之下，彻底退出了燕山以北的突出部（公元 714 年）。从这个角度看，一直被很多人认为属于弱势帝国的“明”帝国，在东北平原及朝鲜半岛所扩张的势力范围及稳定度，反而要高于看似气势如虹的唐朝。

第四节 箕子朝鲜最后的命运

现在我们回到燕国的话题上来。对于燕国来说，虽然将长城跨过了鸭绿江，但实际上只能说是取得了一个战术突出部。如果他们不能最终取得真正有地缘潜力的平壤平原，又或者他的大后方出了问题的话，这个不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突出部，是很容易丧失的。要是上天给燕国“再借五百年”的话，相信燕国还是能够吞并箕子朝鲜，占据平壤平原的。问题是燕国北扩之时（公元前 300 年）已经是战国中后期了，而这一时期，整个中央之国的内部正在上演着愈演愈烈的地缘博弈。

燕国也不得不陷入这场以“合纵连横”为名的政治斗争中去。因此燕国在北方扩地千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向南与山东半岛连成一片，而非是在朝鲜半岛倾力一战。至于说这随后发生的破齐之战，其过程和对地缘结构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在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在这场标志性的战争之后，战国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所有诸侯的注意力，都被那个强大的秦国所吸引了，而燕国也没有精力去对付箕子朝鲜了。当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以秦国的实力如果想拿下平壤平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过这个短命的王朝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吞并箕子朝鲜的战略任务要由他的“继承者”西汉来完成。不过直接导致箕子朝鲜亡国的，却还是燕人。

在楚汉相争之时，那些战国遗老遗少们，其实纷纷从名义上恢复了当初为秦所灭的各路诸侯。而在刘邦重新统一中央之国后，这种重新回到封建割据时代的做法，当然是不被认同的。于是就有一个人叫做“卫满”的燕人，想起了平壤平原这块世外桃源。而那时的箕子朝鲜也是衰弱不堪。自从燕人进入朝鲜半岛之后，这些商族遗民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了。为对抗这些西部“入侵者”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而以平壤平原的地缘潜力来看，这种付出无疑是很难恢复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箕子朝鲜的统治者很清楚重新统一之后的中央帝国，下一步肯定会将之定为扩张目标。而这一次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幸运了（燕国的力量不足，秦朝又命短，且内乱不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即使是预料到自己的最终结果，在结果到来之前，也还是会存有一线希望的，并渴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箕子朝鲜的这根救命稻草就是“卫

满”，或者说是以其为代表的，不愿意为汉帝国所统治的六国移民。出于地缘上的关系，这些移民主要是来自于齐、燕两国故地。也许这些新来的移民可以补偿箕子朝鲜在长期战争中所损失的人口，并增强平壤平原的实力。但当这些新移民的势力足以挑战箕子朝鲜旧有的势力，特别是箕子的后人将王国的西北边境交给卫满和他的部众时，国门大开的箕子朝鲜就不可避免地要改朝换代了。

最终，在燕人渗入朝鲜半岛百年之后，燕人终于成为平壤平原的主人。只不过这时已经没有燕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割据的“卫氏朝鲜”（公元前 194 年换代成功）。而这个新成立的“卫氏朝鲜”也许更具有活力，但也并无法提升平壤平原的地缘潜力。公元前 109 年，那位以武功著称的汉武帝，以辽东、山东两半岛为基地，水陆并进攻灭了卫氏朝鲜，最终在帝国时代，将中央之国的势力范围覆盖到了平壤平原。

也许有人有疑问，燕国有没有想过从海路攻击朝鲜半岛？如果考虑到燕国的地缘结构，其实燕国并非没有从海路向朝鲜半岛渗透的途径。因为从表面上看，东临渤海的燕国应该也是个海洋国家，但实际上，燕国的核心区冲积平原并没有沿海山地。黄河北流所带来的泥沙，一方面在扩大燕国名义土地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让燕国核心区的沿海地区成为滩涂地，更没有合适的海港（现在的天津港，是靠不断的吹沙而成的人工港）。既然没有合适的海港，也就谈不上有以海谋生的渔民和海商，以及发展什么航海能力了。唯一存在渡海作战可能性的是在山东半岛上的齐国，山东半岛边缘多山的地形，为齐国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水手。问题是齐国与朝鲜半岛在陆地上没有接触面，即使有能力和想法渡海作战，也无法长期占据这块“飞地”，更何况齐国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中原争霸上。

只有一种情况能够让齐国的海上力量在朝鲜半岛发挥作用，那就是燕国和齐国融合为一个国家。而对于这个结果，燕、齐两国都曾经以自己为中心作过努力，只不过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成功完成这项任务的是汉帝国，在那个时候，不仅是燕、齐两地，整个中央之国的核心区都被融为一体了。因此由辽东、山东两个半岛海陆并进，攻击平壤平原成为后来中原王朝向朝鲜半岛强力渗透的固定模式。

萨尔浒之战后沈阳取代辽阳地位的背景

其实从大的战略位置上来说，辽阳、沈阳是差不多的，也符合这些地缘优势的。要是当年努尔哈赤定都的是辽阳，那么现在关外第一城应该就是辽阳了。有时候一个枢纽的具体选择，也就是一念之差（大的地缘背景不会有误差）。比如当年如果不是因为修建平汉铁路（京广线的北段）时，依照当时的条件，郑县（现在的河南省会郑州）境内的河段更适合修筑黄河大桥的话（而不是传统的中心开封），那么现在河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应该还是开封，而不是平地而起的郑州了。

至于努尔哈赤为什么选择了浑河，而不是太子河，做张图来解读下好了。本来明亡清兴的这段历史，在我的计划中是和春秋战国、三国这两个时间段同级的重点。不过真要按历史顺序来写的话，也不知到什么时候了。偶尔就某个重要的地缘标签提前作个解读，也可以丰富下帖子的层次。

明亡清兴的这段历史，最近几年特别红，相信关心的朋友也很多。正好前面有朋友提到后金建都的问题，也就简单解读一下，顺便换下脑子。刚才做了张《清·前三都地缘结构示意图》，大家可以先看着。先提示一下，这个问题的地缘背景，和明亡清兴的转折点——萨尔浒之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希望简单解读之后，对大家再看《明朝那些事儿》，以及听阎崇年讲课时，稍微有点概念。就我自己而言，当年就是因为在这次明史热中，被那些方家的连珠妙语弄得晕头转向，才萌发了自己研究地缘背景的兴趣（算是被逼的，因为根本查不到能用的资料，最多也就是线描的简图，加点中国画式的山脉示意）。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地理、历史两方面着手。首先来看看大的地理结构，在战国阶段解读燕国时，对这一地区的地理结构作过一次粗略的解读。其中有一张图是《辽河流域地理结构图》，正好可以拿出来参考。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沈阳和辽阳的东面，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北接海拔更高的长白山脉，南穿辽东半岛。这条山脉的地理名称就叫作“千山山脉”。而千山所分割的地理单元，就是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两大核心板块“下辽河平原”，以及“朝鲜半岛北部沿海平原”。前者基本上是中原政权强盛时，所能在东北方向直接控制的最顶端的地缘板块；而后者在大部分时候，是由独立状态的朝鲜半岛本地政权（如箕子朝鲜、高丽等）所覆盖。

在明帝国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之地后，千山山脉两端的情况也是如此。基于我们分析过的地缘背景，明帝国和二千多年前燕国的控制状态，并没有质的变化。唯一显著不同的是，明朝并没有谋求在朝鲜半岛北部获得一个突出部，以期对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渗透，而是满足于维持朝鲜半岛的藩属地位，将鸭绿江作为两国的国境线。并不能说明帝国的国力和进取心就比当年的燕国要差，只不过是两千多年的历史，让明朝的政治家们找到了一个控制朝鲜半岛的性价比最高的方式罢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越南。换句话说，即使是在丛林法则更为适用的古典时期，政治家们也不会像现在的网络暴民那样，动辄喊打喊杀，用灭国屠民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控制力。

既然明朝和朝鲜的地缘关系已经稳定下来了，那么作为东北地区土著居民的代表，女真人又主要活动在那里呢？可以说除掉下辽河平原的东北地区，都是女真人的活动区域。而在明帝国建立之后，女真诸部中位置最靠南的“建州女真”，也逐渐将自己的核心区从长白山脉南迁至千山山脉。

在明帝国强盛的时期，与中原政权关系密切的建州女真，可以成为帝国间接控制更边远地区和部族的得力助手。而在帝国衰弱之时，最有机会窥伺下辽河平原这块战略要地的，也正是这些与明帝国关系密切的女真部落（主要分布于千山山脉）。

关于女真部落的内部整合，以及明帝国在这当中是怎么处理的，写起来就是一个大部头了。在前几年的明史热中，已经有诸多科班和草根出身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过这段历史了。概括的讲，和当年成吉思汗整合蒙古诸部一样，努尔哈赤的贡献就是把建州女真诸部整合到了一起，并由此而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的渔猎民族，以和明帝国分庭抗礼。这些被纳入统一管理的女真诸部，也被重新打造了一个族名“满洲”（后来也成为了东北地区的地理标签）。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之后，为自己建立的政权名称就是“后金”。既然已经国家化了，那么势必要为这个国家寻找一个都城。鉴于“下辽河平原”这时还属于明帝国的直接控制区，初生的后金政权，依旧只能将自己的都城放在千山山脉之中。这个都城的位置，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在成为后金都城之前，它的名字叫作“赫图阿拉”。而在公元1616年，后金政权成立之后，这个升级为都城的城堡，被称之为“兴京”。

对于新生的后金政权来说，他们下一步的战略目标，一定是攻取千山西侧的下辽河平原。如果没有这块核心平原为之提供农业基础的话，满洲人即使在政权组织上进化得再高级，也依旧无法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正常国家。这种战略态势，对于早已视女真人为心腹大患的明帝国来说，当然不会不知道。因此帝国随之所作出的反应，就是集中强大的军力，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包括动员朝鲜的军力由千山山脉的东侧发动进攻）进攻后金政权的核心区。而这次战役的最终决战地，在历史上非常著名，叫作“萨尔浒”，战役的名称也因此而被叫作“萨尔浒之战”。

在后金政权崛起之前，明帝国在山海关以东地区所设立的边镇叫作“辽东镇”，而辽东镇的镇城，也就是地缘中心就在现在的“辽阳市”，其所在位置，正是在千山山脉与下辽河平原的交汇之处。所依托的河流叫作“太子河”。太子河之所以得名，正是来自于当年谋刺秦王未果的“燕太子丹”。当日的燕国为秦所迫，被迫将逃亡于此的太子丹斩首献秦，却也未未能挽回灭国的命运。

我们经常提到的“下辽河平原”，其起到主干作用的自然是由东、西两条辽河汇集而成的“辽河”了。不过从地理划分上来看，太子河却并不能算是辽河的支流，它所汇入的是一条完全发源于千山山脉的，且独流入海的河流“大辽河”（由营口入海）¹。大辽河与辽河的入海口靠得非常近，共同冲积而成了渤海湾北部的“辽河三角洲”。也许有一天三角洲平原越来越大，下辽河可能会在入海之前先与辽河汇集在一起，成为辽河的支流，就像珠三角平原上的东、西两江一样。只不过是像类似的这种结构是合流入海，还是独流入海，并不会影响整个板块以统一的形象出现在地缘舞台上。基于东北渔猎民族在山地之上的优势，两千多年以来，下辽河平原的控制要点大都不是依辽河而建，而是在东部靠近山地的地方。这样做，固然也是遵循“依山傍水”筑城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为了随时警戒这些边缘民族。

¹ 浑河、太子河原来都是辽河的支流，辽河干流在营口入海，清末的时候开挖一条“双台子河”，所以辽河又分出一部分顺着双台子河在现在的盘锦入海。1958年又将浑河太子河水系和辽河干流水系彻底分开，前者从营口入海，称“大辽河”，辽河干流则从盘锦的双台子河入海。

在进攻赫图阿拉城的计划当中，明军的指挥部并不是设于之前的地缘中心“辽阳”，而是北移到了现在的“沈阳”。基于防御日益强大的女真人的需要，在辽阳以北沿千山山脉设立了一系列的卫城，而这些卫城之间又构筑了许多次一级的山堡（所谓“城”、“堡”的差别就在于此，“堡”是“城”的下一级军事点）。沈阳这个点，当时的防御级别就是卫城，行政名称叫作“沈阳中卫”，再往北，就是现在铁岭市的“铁岭卫”了。

之所以会把进攻后金的指挥中心放在“沈阳”，是因为沈阳和赫图阿拉城都依附于同一条河流，这条河流现在被叫作“浑河”，当时则被叫作“沈河”。构筑于沈河之阳（北）的“沈阳”也正因此而得名。如果要进攻位于浑河上游的后金都城，浑河河谷自然是最佳的进攻路线。因此明军才会把指挥部设在了沈阳城，并以浑河河谷作为主力的攻击路线。需要说明的是，大辽河正是由浑河和太子河汇集而成的。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当年燕太子丹身死之处，不是在太子河，而是在浑河。如果问我，我也没有穿越回去过，无法给出真实答案。只不过这种抢注历史名人的现象，希望不是因为沈阳现在的政治地位而起的。



清·前三都地缘结构图

在中国传统的战术中，似乎很喜欢四路出击、四面包抄这种看起来很完美的战术。我们在听评书时，也常常能够听到评书表演艺术家们口中的古代将领神采飞扬地在部署各路兵力，最后往往还

要给个最不安份的将领分配一个“四路接应使”一类的机动职。在明朝进攻新生后金政权的这次战役中，也依然是这个套路。不就过千山山脉的地形，以及赫图阿拉的位置来说，浑河河谷显然会是主攻方向。基于女真人在山地之中的优势，女真人完全可以依据地形优势，用较小的兵力防御住其他三路的进攻，并将主要兵力放在浑河河谷的正面，与明军展开决战。其实在这种复杂的山地之中，技术上是无法真正完成合围的（不像平原地区的围城）。明朝军队这种虚张声势的四路出击，更多的只是一种恫吓，或者说为自己壮胆罢了。真要是希望在战术上有所建树的话，倒不如在正面吸引对手注意力的时候，依靠周密的前期情报工作，以奇兵由赫图阿拉城的侧后方进行突袭。很明显的是，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军并没有被明军这种虚张声势所吓倒。他们很容易地判断出，明军的主力一定会沿着浑河河谷进军，只要想办法打跨了明军主力，另外三路明军自然会不攻自破。

一条河流的延伸规律总是由高向低流淌的，就好像我们常说的“水往低处流”一样。而我们常说，高地民族最起码在防守上会更有优势。这就是因为由低地向高地进攻时，你必须“人往高处走”，越往后面，你面临的环境就会越复杂（也越有利于土著居民）。一般情况下，在河流的上游地区，山地的海拔和密度都是最高的；到了中游地区，就转为丘陵地貌，河谷平原的发育情况也相对较好了。及至下游地区，就能够看到大片冲积平原了。就沈阳的位置而言，则是位于浑河下游平原地带的东缘，而赫图阿拉城，据守的就是浑河上游的山地了。在这二者之间的中游地区，势必也会有一个战略要点据守在河流的中游。而这个战略要点，就是现在的抚顺市，而在当时，抚顺市的东面就是明军所构筑的“抚顺关”。

构筑在浑河中游河谷制高点上的“抚顺关”，是明军用来控制浑河河谷，并防止女真人顺河而下攻击下游平原地区的战略要点。不过抚顺关并不是明军在浑河河谷，最靠近赫图阿拉的据点。就浑河中游的地形而言，抚顺及其以东的中游河谷地区，河谷的宽度还是不小的。除了现在成为抚顺城区的那部分外，靠近上游的部分现在被围蓄成为了一个名字很有东北特色的水库“大伙房水库”。只是在旅游业可以拉动 GDP 的今天，这个略带乡土气息的名字，终究是入不了开发者的法眼的，因此以大伙房水库为核心的地区，被与更具知名度的“萨尔浒之战”拉上了关系，被命名为“萨尔浒风景区”。在双方决战之前，包括抚顺关和大伙房水库在内的整个浑河中游河谷地区，都是在明军的覆盖之下的。

所谓的“萨尔浒”，其实是一座山名，具体的位置就在大伙房水库的东南部。而大伙房水库的东点，也是浑河上游和中游的分割点。像其他河流一样，浑河上游也有多个源头，目前被认定为正源的是沿中游河谷直线向东，直至清原县的那段，而由新宾县发源的，由萨尔浒山边上汇入的这段源头，被单独命名为“苏子河”。其实谁是不是正源，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意义，大家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行了。

萨尔浒山也是明朝军队控制的最东点，也是他们即将沿着苏子河河谷，向上游的赫图阿拉城进军的起点。刚才我们也说了，基于对地形和对手的了解，女真人认定沿浑河——苏子河一线的明军才是明军主力的所在。因此他们所做的，也是集中兵力在这一线与明军展开决战。也就是说，从战术上看，明军虚张声势的四路出击非但没有转移女真人的注意力，反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至于女真人，他们可以选择放明军入苏子河谷，并与之决战于赫图阿拉城下。不过努尔哈赤的选择是御敌

于国门之外，集中兵力在萨尔浒山与明军展开决战。

从完美的战术角度看，女真人的这种战法并不能算是上策，如果认定自己属于弱势方的话，一般做出的选择是利用有利地形对来犯之敌进行伏击战。而努尔哈赤之所以在判断出对手主力在萨尔浒之后，敢于正面迎击。实在是因为当时明军的战斗力已经完全被女真人看穿。精于骑射和熟悉山地、丛林作战的女真人，相信只要凭借强势的第一波攻击，就能够在心理上彻底瓦解对手的防线。这场战役的细节之处，已经有很多正史野史的专家从各个角度分析过了，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查找。于我们这节内容而言，苏子河一线的几个战略要点：赫图阿拉、萨尔浒、抚顺关、沈阳的位置关系，才是我们解读的重点。

就努尔哈赤的战略规划而言，成立后金政权之前的任务，就是统一女真诸部。而在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并成立后金政权之后，国家化的女真人在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从明朝手中夺取下辽河平原，进而控制整个东北地区了。在萨尔浒之战大胜之后，八旗军乘胜追击，很快就攻取了整个下辽河平原。由此，明朝与后金政权博弈的焦点地区，也南移到了锦州——山海关一线的“辽西走廊”之上。而这条由华北平原通往东北地区的沿海平原，也成为了一代名将“袁崇焕”施展才能的地缘舞台。

在得到下辽河平原这块风水宝地之后，后金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将都城由千山山脉之中迁移下来，进驻这块战略枢纽。不出意外的，之前明帝国在辽东的地缘中心“辽阳”，也成为后金政权营建新都“东都”的所在地。只不过与明朝的“辽东镇”城有所不同的是，努尔哈赤选择了在太子河以北（那段河道是南北向的，其实是以东了，大方向是北）重新营造新都。这当然可以用之前的房屋设施不足以直接转为宫室来解释，但在实际操作中，那些新生政权将前朝宫舍尽毁，兴建新宫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果明朝的辽东镇城在“风水”上适合女真人建都的话，相信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毁旧建新。事实上努尔哈赤之所以选择在太子河北营建“东都”，还是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和明军的防御对象正好相反，后金政权所防御的是来自于南面的明朝军队的反扑。所以同样希望利用河流天然防御力，来为自己增加安全系数的努尔哈赤，选择了与旧辽东镇城隔河而居。

从明亡清兴这段历史来看，努尔哈赤无疑是最关键的人物。正是他对女真诸部的整合，以及用八旗整合军制，成立国家化的后金政权，为清朝取代明朝，成为中央之国最后一个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要说努尔哈赤在有生之年，就认定自己能够成了中央之国的主人，却不尽然。就努尔哈赤个人的政治抱负而言，能够占据整个东北地区，与明帝国并立应该算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了。之所以会有这种“保守”的想法，很大程度是因为渔猎文化为主的努尔哈赤和他的女真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来管理数量更大的，以汉族为主的农民。简单地将这些农民变身为奴隶或者掠夺的对象，并以农业生产的产品来维系渔猎文化的本质，只会让女真人在下辽河平原这种农业区的统治，变得更为艰难。在这方面，当年同样没有找到合适平衡方式的蒙古人所创立的短命的元朝政权，就是典型案例。以女真人的人口基数的地缘优势而言，即使他们有能力用强力的方式控制下辽河平原的汉族农民，但在思考面对人口数量更为庞大，地理更为宽广的中原之地时，也不得不萌生退意。

基于无法对明帝国取而代之的战略判断，努尔哈赤再来审视太子河畔的“东京”时，就会觉得安全系数不够了。相比之下，能够与自己的根据地“兴京”（赫图阿拉）对接的沈阳城，会让努尔哈赤感觉到更加安全。即使有一天“下辽河平原”在明军的反攻之下，成为了双方的拉锯之地，身

处浑河之畔的政权核心，也很快可以退入赫图阿拉。最起码，在心理上，曾经为后金战胜辽东明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萨尔浒山”，能够为努尔哈赤的心中再增加一份安全砝码。对于这块扼守苏子河口的福地，努尔哈赤甚至动过迁都于此的念头（迁都辽阳之前）。

最终的事实验证了，辽西走廊这条山海之间的狭长通道，的确不是那么好突破的。在迁都沈阳（公元 1625 年）后的第二年，强悍的八旗军队就在锦州城下遭遇重创，努尔哈赤本人也为袁崇焕的火炮所伤，于当年不治身亡。尽管我们的人本历史中，将明军在这一阶段成功抵抗的功绩，大都记在了袁督师的头上。但客观地从地形上看，辽西走廊这段狭窄的山海通道，其防守压力要远低于与千山山脉全面对接的下辽河平原。

满足于统治东北地区后金政权，之所以能够变身为一个中原王朝“清朝”，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的政治才能功不可没。最起码他会从一个国家政权的角度考虑，怎么样去适应农耕文化，以及让被征服的汉族军、民，成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些调整，相比于汉族人口少的可怜的满洲人，最终入主中原，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主人。

第十二章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的扩张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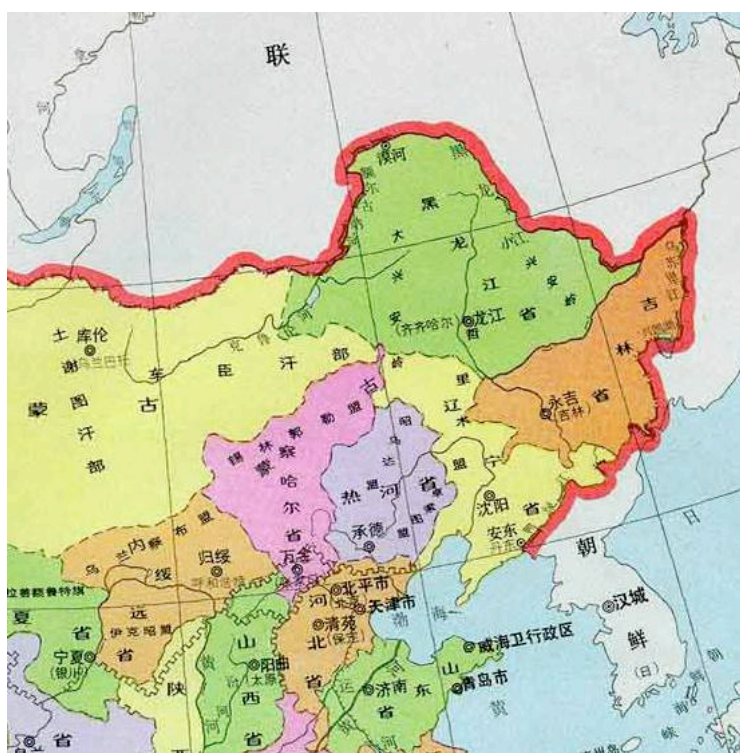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日本控制东北后向蒙古渗透

说到日本对东亚大陆的渗透，我们在国际部分其实就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先在朝鲜半岛登陆，稳定后再向满、蒙渗透。在控制东北地区和蒙古高原之后，再南下中央之国的核心地区，最终成为中央之国的新主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已经分别在1895年和1905年击败了清、俄两个在东北亚的竞争对手，取得了朝鲜半岛的实际控制权（1910年正式吞并）。第一步成功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满洲”了。

关于东北当时的形势和所发生的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我想“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了。概括的讲，就是中央之国在东北地区的代表“东北军”，被迫退出了东北地区，日本又如当初先策动朝鲜独立，成立“大韩帝国”一样，在东北地区扶植了“满洲国”。而这个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也就是日本公开以武力进攻东北军。对于这段历史，我们的印象中就是“东三省”沦陷，也就是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成为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问题是，行政区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反映真实的地理结构（虽然地理结构的划分，是行政区划的重要参照）。因此我们需要淡化行政因素，从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看看，日本当时通过“满洲国”究竟控制了哪些地区。

首先日本所控制的东北地区，并不仅限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东北三省的行政范围内。在那张《东北平原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日本只控制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东三省”的管辖范围，那么它的东面倒不会有太大问题。在这个方向，日本所控制的朝鲜半岛可以和东北地区连成一片。分割东北平原和朝鲜半岛的长白山脉，已经不需要再承担主要防御任务了。而如果我们视线转向东部以外，则会发现大问题。因为在现有的行政区划中，大兴安岭基本上被划入了内蒙古境内。也就是说，如果日本止步于大兴安岭的东麓，它们的东北地区是无法构筑起有效的防线的。或者说，整个“满洲国”的地缘独立性要大打折扣。这一点日本人当然是不愿意看到的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找一下民国的地图，就会发现黑、吉、辽三省其实是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大兴安岭，甚至于黑龙江省的西北角已经跨过大兴安岭的北端，渗透至蒙古高原了。这种行政区划当然可以成为日本成立“满洲国”的参考，但对于一个战略家来说，行政区划本身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你的控制区必须处在一个安全的地理环境中，否则战略上的缺陷会很快让你的战术胜利变得无足轻重。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当年的行政区划怎么划，军事家们都不会去特别关注。对于企图长



中华民国地图局部（1936 年）

期经营东北地区的日本人来说，他们需要控制住整条大兴安岭以西部分和北面的小兴安岭，以及东面的长白山脉，以此共同合围出一个完整的、在战略上占据主动的“满洲国”来。

如果大兴安岭西侧是俄国人的话，日本其实是很难将满洲国的“国境线”推进到大兴安岭西麓的，分水岭有可能是双方所能达成的地缘平衡线。不过俄国人的时间刚好够把外蒙古地区用同样的方法从中央之国独立出去，尚未触及到外兴安岭这条天然的地缘分割线。因此日本对手暂时只有分裂中的中央之国，自然

有足够的实力将整条大兴安岭变为自己的西部防线。以当时的地缘实力对比，中央之国的东北军只是处在配角的地位，东北地区地缘博弈的主角是俄、日两国。正如我在分析古典时期的地缘博弈时，往往会“无视”一些有史可查的边缘“小国”（部落）一样。这样说可能会有损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另外关于张学良抑或蒋提出的“不抵抗”政策，一直是为人所诟病的。不过却很少有人设想过，如果东北军当时强烈抵抗的话，东北会不会丢。纵观当时的地缘形势，这种结果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抵抗就没有必要了，只是就博弈的结果而言罢了。我们一直在说，辽河流域是四战之地，由于满洲人的入关，东北渔猎民族作为一支地缘力量，实际上已经消亡了。而蒙古高原随着技术的发展，本身自己的地缘力量也已经处在龙套地位了。其地缘优势，需要通过其他的地缘板块提供支持才能够发挥，而在 20 世纪初，这个支持是由东欧平原的俄国人来提供的。

而朝鲜半岛由于受自身的地缘潜力所限，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以其为基地，影响东亚大陆地缘格局的案例。不过在 20 世纪初，朝鲜半岛得以与日本列岛合为一体，并在东亚地缘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以传统的大陆观点来看，即使是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合体，实际上也是无法在东亚，甚至东北亚唱主角的。问题是，在大航海时代以后，海洋的地缘潜力已经被充分发掘出来了，而最具海洋气质的东亚国家——日本，又自然地成为亚洲海权力量的代言人。因此日——朝联合体所蕴含的地缘力量，就不单是用国土面积来衡量的了。

换句话说，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都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外援来提升它们的地缘潜

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之国虽然凭借地缘优势，在东北平原抢位成功，却等于陷入了日、俄两大力量的包夹之下。更为致命的是，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当时处于分裂状态。东北地区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与日、俄相抗衡。在这种弱势地位下保持独立性的前提是，充分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让两个或数个主要对手互相牵制（所谓“以夷制夷”）。如果大家仔细去研究张氏父子在东北的故事，就会发现很多这方面的案例。而日本后来之所以能够独霸东北成功，并非是因为与东北军甚至整个中央之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是基于俄国的注意力暂时已经转回欧洲了。

日俄战争、一战、欧洲对红色政权的干涉、二战之前欧洲紧张的地缘形势，都让日本逐渐压倒了俄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在这种地缘形势下，张氏父子本身的决定与做法，已经不重要了。不过当日本的势力越过大兴安岭，并实际渗入蒙古高原之后，它们与在蒙古高原做同样打算的俄国人之间的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如果从地缘博弈的角度看，日本人显然是这场战役的发起者。因为按照日本战略，蒙古高原是他们控制东北地区之后的下一个目标。也许日本应该在经营“满洲”一段时间后，再向俄国人发起挑战。就像他们用了差不多三十年消化朝鲜半岛，并同时向满洲渗透之后，才发起最终的挑战一样。这种步步为营的做法，其实是最为稳妥的。不过前期所取得的胜利，让日本的少壮派觉得可以加快这个历史进程。特别是俄国人的大部分注意力，不得不被吸引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时。



诺门罕战役遗址位置图（一）

另一个让日本人有信心主动发起攻击的理由是，在 20 世纪初的那场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为日本人所带来的战略成果就是，日本在对朝鲜半岛以及东北地区的吞并过程中，可以无视俄国在远东的存在。如果按照当时欧亚大陆的地缘形势来看，日本的确有再一次攻击俄国的理由。而战争的地点，就是

选择在“满洲国”西北角上突入蒙古高原的那个突出部中。以这个突出部为基础，进而图谋整个蒙古高原，是日本战略规划。这个爆发战争的点叫做“诺门罕”，这场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诺门罕战役”。

诺门罕战役的结果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日本军队完败于朱可夫元帅所率领的苏联红军，也就此打消了日本企图控制整个蒙古地区的想法。当然，俄国人这时



诺门罕战役遗址位置图（二）



诺门罕战役中的苏军

的主要地缘压力还是在西线，因此也没有乘胜追击，去拔除日本人在蒙古高原北线的这个突出部。在随后的6年当中，俄国向西，日本向南，北亚与东北亚之间的地缘博弈也暂时告一段落了。

现在研究这场战役的人，一般都将日本的失败归结于军事装备和战术使用之上，也就是日本的武器装备无法面对俄国人的机械化兵团。这当然是日本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过日本陆军后来在中南半岛的作战中，面对技术实力与苏联处于同一数量级的美英联军，却取得了骄人战果，却似乎在说明日本的战术和装备，在面对欧洲军队时并非处于劣势。其实武器装备和战术固然是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但更比这为重要的却是地理结构（也包括气候因素）。

日本能够在当年的日俄战争（辽东半岛一线为主战场）和后来征服中南半岛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辽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地形中多山地丘陵。而日本本土的多山地形，使得日本陆军很适应在这类地形中作战，并且演练出适合复杂地形作战的战术（比如重视射击的精度）；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海洋大国的日本，在半岛型地形中占有很大的优势。当你的对手三面都处在你的包围之中时，撤退或投降往往成了唯一的选择。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诺门罕”地区的地形¹。即使不去寻找大比例的地图，我们也能够在图上看到，诺门罕地区已经深入蒙古高原了。这种适合游牧民族驰骋，地势平缓的地形，同样也适合于机械化兵团的作战。而失去了山地保护的日本陆军，

1 战役主要发生在今天中国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诺门罕布尔德地区，以及今蒙古国哈拉哈河下游两岸。



诺门罕战役中的日军

在面对苏联红军强大的炮火以及机动性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强大的海军对于深入内陆的蒙古高原也是帮不上一点忙的。就日本的优势而言，攻击海参崴以北的外东北地区，胜利的机会要大上许多。但任何战争都是要有战略目的，就算日本夺取了外东北，那一地区对于日本征服整个中央之国也没什么帮助。也许多了海参崴这个港口对于日本海军

来说有点用处，但已经控制了朝鲜半岛，并在辽东、山东半岛登陆成功的日本来说，这个港口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如果日俄双方爆发全面战争，那么日本肯定还是会抢占外东北的。但在诺门罕战役之后，双方更愿意“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去做更为重要的事。这种暂时的地缘平衡，当然并不代表谁都认为“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只不过对于日本来说，已经认清了自己的劣势所在，因此在随后的几年中，依托东北平原边缘的那些山地修筑了许多连片的防御工事，以期让战争发生在自己占据优势的地区（让俄国人进入东北平原的话，在地势平坦的平原上，日本人还是会重复他们在蒙古高原上的失败）。只不过在西线取得胜利的俄国人，与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的日本人，在1945年的实力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因此日本苦心准备的山地防御战也就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了。

从战术的角度看，没能占据蒙古高原，日本通过内蒙古地区当然也可以侧击华北，但有战略上的短板。如果要想灭亡中国，仅仅占据华北是不够的。控制整个蒙古高原的意义，在于可以对中国的西北地区造成足够的地缘压力。进而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向南渗透。而外蒙古独立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造成如果日本以内蒙古作为战略重点的话，即使成功了，战略突出部也过长。以这条狭长地带为基础攻击中国西北部的话，胜算是很低的，特别是西北的地形要远比华北平原复杂。更何况被俄国人所控制的蒙古高原，真的会一直处在中立状态吗？

因此日本其实并没有按照最早的战略构想，从蒙古高原南下进攻中国的西北地区。而是利用自己优势的海军力量沿海岸线南下，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开辟第二战场，这样做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挥作用的江淮防线也就失去了战略价值，长江以南地区再也无法利用纵横的河流来抵抗入侵者的铁蹄了。而对

于中国来说，也是第一次要面对陆地机动性和水上力量都要强于自己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山地则成为最可依靠的天然防御体系（重庆也因此取代成都成为中央政权的避难所）。上述内容，只是从地缘的角度在解读日本为什么没有在西、北两线有更大的突破的原因。其实日本之所以希望控制蒙古高原，最终还是为了占据中央之国的核心地区。因此在西线没有取得预定成果之后，突破燕山山脉成为日本在占据东北后的主要战略方向。

第二节 日本控制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目的

如果从占据东北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分析的“下辽河平原”，当然是日本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战略重点了。基于下辽河平原的地缘位置，以及地缘潜力，它也是张作霖父子控制区中的核心地区。而这个核心点就是位于“下辽河平原”东侧，辽东丘陵西侧的“奉天”，所谓“奉系军阀”之说也正是来源于此。“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辽宁省当时也被叫做奉天省），也是当年满洲人入关之前的都城。

在燕国控制下辽河平原时，他们设立的地缘中心并不是在沈阳，而是在沈阳南面的“辽阳”。就地缘中心的选择而言，每一个时代都有可能有所差别的，但“下辽河平原”这个地理单元的重要性，在两千多年当中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将沈阳作为攻击地点，也算得上是“掏心”战术了。支持日本这样做的地缘原因是：日本已经完全占据了朝鲜半岛，并在辽东半岛南端登陆成功。有了这两个地缘支撑点，即使与东北军展开全面战争，日本也有信心迅速控制“下辽河平原”。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事情的发展过于顺利。而占据了下辽河平原这块东北平原的核心地区后，日本等于切断了东北平原北部与华北平原的直接联系。如果俄国人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像支持外蒙古那样，为黑龙江以南直至辽河流域的东北抗日力量提供战略支撑。但问题是俄国人现在还不愿与日本人正面为敌，让那些游击作战的东北抗日力量在失败后退入俄国境内休整一下，是俄国人对“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主要贡献了。

现在对于日本人来说，在强力控制了“下辽河平原”之后，位于下辽河平原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辽东半岛”也很自然地被完全纳入了控制范围。事实上，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日本人就已经控制了辽东半岛的南端，从清政府手中“租借”了这个拥有旅顺港的战略要地（现在大连市一带）。后来在击败了俄国人的挑战之后，日本将这里称作“关东州”。所谓的“关东”，指的就是山海关以东地区。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地形图的话，会发现整个东北地区，其实都在山海关所处的经度线以东。因此中国老百姓当时才会有“闯关东”之说，而日本在东北地区首先取得

的桥头堡也因此而叫做“关东州”（关东军也是来源于此）。



伪满洲国地理结构图

如果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日本在陆地上的渗透路线，和当年的北亚、东北亚边缘民族如出一辙的。所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岛国，需要先控制朝鲜半岛作为登陆点，而无论是出于控制朝鲜半岛目的，还是从西方率先学习海权理论的作用，日本都将建立的强大海军作为重中之重。基于日本的地缘特点，除了在陆地上按照北亚游牧民族、东北亚渔猎民族的南侵路线布局外，海路成为日本向东亚大陆渗透的另一个战略方向。而朝鲜半岛南部的辽东、胶东两个半岛更是日本直接攻击中央之国腹地的跳板。如果按照日本的想法，在控制了辽东半岛之后，当然还要控制胶东半岛。控制了这两个半岛，整个渤海湾都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也等于从海路封堵了华北平原的地缘中心，即曾经的帝国中心——北京。

只是日本在胶东半岛的渗透并不算顺利。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国这块肥肉，各路强国都想咬一口（谓之“利益均沾”）。而胶东半岛，已经被德国人划为势力范围，

正式的文件当然也是与清政府签订的“租界”协议了。不过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在一战爆发之后，出于对胶东半岛的渴望，日本加入了后来取得胜利的一方。其实日本人当时也没有能力判断出谁会取胜，但在欧洲一片混战之时，是占据胶东半岛的最佳时期。即使是德国人最终取得了胜利，日本也一定不会轻易吐出这块肥肉的。当然，日本人后来赌对了，也“顺理成章”地接收了德国在胶东半岛的利益，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港口。只是日本人没有想到，中国这次也站对了队，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在巴黎和会上。后来的事情，中学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只是不管“热血青年”们如何呐喊，代表们又如何拒绝签字，积弱的中国是无法阻止日本控制胶东半岛的。

基于海洋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在扶植“满洲国”时，日本并没有将自己在辽东半岛南端的“关东州”划给这个傀儡政权，而是仍然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过日本人在把“满洲国”的海洋潜力握在自己手上的同时，也还是为“满洲国”的陆地面积做出了新的贡献。为了保证“满洲国”成为一个有强大地缘防御力的“四塞之地”，光有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从西、北、东三面防卫还是不够的，南面的燕山山脉也必须纳入这片“王道乐土”才行。这样的话，即使日本暂时无法向华北平原渗透，控制了燕山山脉的“满洲国”，也足以让双方博弈的地缘优势掌握在日本一方。而要做到这一点，东三省以外的第四省——“热河省”就将成为新的博弈焦点。而中日地缘博弈的第二轮“长城抗战”也将拉开序幕。

第三节 日本为保持地缘优势进占热河省

关于热河省的地缘特点，其实与我们所要分析的“辽西古道”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我们也将穿越在两个时空当中，来解读燕人和日本人是如何从不同方向穿越燕山山脉，又是如何控制这条重要的地缘分割线的。说到“东北”、“东三省”、“满洲国”这三个概念，大家一般会认为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其实这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满洲国所包含的范围是“东四省”，而不是我们传统概念中的“东三省”，这个多出来的省份就是“热河省”。

如果从地缘划分的角度来看，黑、吉、辽三省的主体都是属于一个大的地缘板块——东北平原。而当年满人入主中原后，禁止汉人进入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用挖沟植柳的办法设定了一个禁区线，这也就是所谓的“柳条边”。这条分割线的南点就是“山海关”。也就是说，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东北平原以及辽东半岛都是处在一个封闭状态。直到十九世纪末，迫于各方压力，山海关以北（也可以说以东）地区才开始向内地开放。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的人口开始大批填充入东北地区，这也就是所谓的“闯关东”，而进入蒙古高原的人口就是“走西口”了。基于地缘上的原因，与蒙古高原地缘关系密切的山西省，成为“走西口”的人口主要来源地。而可以水陆并进的山东人，则成为闯关东的主体。

由于汉族向东北平原的渗透不是渐进式，而是属于开闸式的进入。因此整个东北平原以及辽东半岛的地缘文化，可以说是在同一时间段建立起来的，这也造成了整个东北地区形成了同一种的地缘文化。事实上这种类型同的地缘文化，并不能完全反应东北地区的地缘结构。那个四战之地的辽河平原（特别是下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完全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地缘文化。也就是说，如果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是由东北渔猎民族建立的，并将山海关以北圈为禁地的话，那么依照自然渗透的原则，下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应该在古典时期先形成自己的地缘文化。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理解的话，就是辽宁省的地缘文化特点，会与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地缘文化有较大差别。



热河省行政地形图

热河省。

热河省的范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到明朝修筑在燕山南麓的长城，向东则止于辽西走廊，西界基本与北京处在同一经度之上。也就是说整个燕山山脉，包括它周边所延伸出来的大部分丘陵地带（包括大部分的“辽西丘陵”），都是归属于热河省所辖。从地缘格局的角度来看，当初划出这个山地省份（1914年），就是为在华北平原作缓冲的。你也可以这样认为，刚刚进入共和时代的中央之国，对保有那些边缘地区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而在中央之国重新统一，并完全将东北地区融为核心区后，这个夹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之间以为缓冲的省份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

在海洋的地缘影响力愈来愈重要的今天，处于渤海湾边缘的“下辽河平原”与辽东半岛更会加速脱离东北文化圈，并最终与环渤海的京津地区、山东半岛形成新的“环渤海文化区”。上述分析，只是针对目前我们所理解的东北地区，或东北文化所做的一个解读。而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三省作为统一的地缘概念，还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不过对于日本来说，仅仅据有东三省还是不够的。如果他们想保有对华北平原的战略优势，还必须将燕山山脉也划入控制区。现在看到的燕山山脉主体是被河北省所辖，但在当时，这条山脉主要是被划入一个消失了的省份——热河省。

所辖地区也被分给了内蒙古、辽宁、河北这几个临近的省份（大部分区域，即燕山山脉的主体被划入了河北省）。

既然热河省的单独划出，是为华北——东北两大平原作缓冲的，那么这个缓冲地落在谁手上，地缘优势也就被谁掌控了。从当初划定热河省的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肯定是希望这块缓冲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已经控制了东北地区的日本人，自然希望能够控制热河省，以将满洲国打造成为一个四塞之地。并随时对华北平原保持威慑力。而1933年发生在燕山南麓的“长城抗战”，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地缘战略。其结果则是，中国军队的大刀出了名，而热河则被划入了伪“满洲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历史资料中，提到东北沦陷，会有“东四省”概念的原因。不过对于从东三省退入关内的东北军民来说，东三省才是他们思念的家乡，也更愿意强化这个地缘概念。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满洲国在成立之后，将所控制的“东四省”重新划定为了14个省份，两个特别市和一个特别区，以壮声势。因此在《伪满洲国地理结构图》中，用红虚线所标示出的热河省，与民国初年所划定的热河省略有差别。主要是将燕山山脉北、东的丘陵地带划走了，主体上并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在长城抗战之后，燕山山脉也好，热河省也罢，都已经开始为“满洲国”拱卫南疆了。

第四节 中国凭借战略纵深抵御日本的侵略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在历史上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之国所遭受的入侵都是单纯的由北向南推进的。秦岭——大巴山与江、淮所组成的东西向“山水防线”，往往才是双方博弈的焦点。而日本一方面由于在东北地区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却没有如愿控制蒙古高原。日本拥有的强大海洋实力，使得中国这一次所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东面。而当时的中国在第三级地形中基本没有优势可言（特别是在东北、华北两大平原之上）。

山西高原——云贵高原一线所形成的南北纵轴，则成为中国抵抗外敌入侵的新轴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假使中国再一次遭受全面入侵，压力应该还是来源于东线。如果我们在地图上为中国划出新旧两条战略防线，就会发现，无论攻击从哪个方向而来，四川盆地都是大后方。所以生活在巴蜀的人也不必为自己不临海而感到遗憾，你们那里可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其实西藏高原也不错，从地理结构而言，甚至可以作为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不过考虑到那高海拔会影响人的舒适度，真有天灾人祸的话，到四川盆地就可以了）。

这就是战略纵深的重要性，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像中国这样的面积和这么丰富的地理格局，以日本的实力即使有机会在华北、西北、东南同时开辟主战场，仗也不是八年就能够打完的。说到底，还是日本的地缘实力不够，想一口吃下中国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一点，日本战略家和政治家心里是清楚的，只不过少

壮派的军人太过于迷信自己的军力了。

就拿现在的国际关系来说，虽然我认为印度有资格成为一个副极，但印度的战略纵深和过于简单的地理格局，决定了它没有机会成为一流国家。从潜力而言，与中国并不在同一等级之上。至于说空天技术的发展，会不会对传统的地缘格局造成影响。我的观点是会有一些改变，但没有质的变化。除非有一天，人类能够建立有自给能力的外太空基地。否则你的技术再高，如果没有足够的地面保护，也上不了天（可以试想一下，美国和日本都拥有同等的空天作战技术，谁的抗打击能力更强）。需要说明的是，战略纵深和多样性的地理格局，并不是只在军事上发挥作用。在发展经济上同样起着基础作用，而经济的发达与否，又会影响军事技术水平。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华北平原在丧失了燕山山脉的保护之后，民国政府即使拥有燕山南麓的那道长城，也无法阻挡日军南下了。因此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将日本图谋华北平原的野心暴露无疑。如果蒋认为东北地区甚至燕山山脉，尚属可以缓冲的边缘地带的话，那么再无视日本渗入华北平原这个核心区中的核心，就再也说过不去了。所以抗日战争的全面暴发，被锁定在 1937 年 7 月 7 日。

纵观历史，如果燕山山脉本身不能为华夏民族所控制，那些边缘民族进入华北平原是迟早的事。在古典时期最后一次发生这种事，是在满清入关之前。不过当时驻守燕山南麓的明朝军队，并没有如 300 年后的西北军那样，打一场血性的“长城抗战”，而是由大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主动放弃了明帝国的这最后一道防线。八旗铁骑在穿过山海关之后，开始了征服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过程。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燕山以东，渤海以西的这条沿海平原，也就是“辽西走廊”是唯一沟通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通道，而山海关就是这条通道的唯一钥匙。

不过实际情况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辽西走廊”虽然是古典时期后期，沟通华北——东北两大平原的主要通道，并且路况也最好。但在古典时期前期，由于海侵的缘故，如果你想在这两大地理单元中穿行，就必须从燕山山脉中找到合适的道路。而战国时期的燕国，虽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些燕山中的道路，但却可以称得上是华夏族中的先行者。因此在纪念完抗日战争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两千年前，去看看燕国是如何在燕山山脉中布局的。

第十三章 辽西古道在燕山山脉中的走向

第一节 大凌河和老哈河为北出燕山提供通道

说到穿行于燕山之间的道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行八陉”。的确，如果将绕过燕山山脉的“辽西走廊”比作与山西高原隔河相望的“崤函通道”的话，那么燕山中的这些道路无论是在地理结构上，还是战略作用上，确实和“太行八陉”很类似。只不过前者为华北平原沟通东北平原，而后者则是以山西高原为连接方向的。如果我们从华北平原出发，通过穿越燕山的话，就会首先到达“辽西”地区（这时所说的辽西，指的是辽河以西地区），因此这些着道路也被称之为“辽西古道”。

如果你有野外生存经验的话，应该会有人告诉你，在迷路的时候可以顺着河流行走。这样一方面可以随时补充干净的淡水，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你指引方向。因此要想找到“辽西古道”的通行规律，我们也可以先关注一下那些穿行于燕山山脉中的河流是如何分布的。首先我们来看一条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河流——滦河。对于华北平原北部来说，滦河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战国时期的名字叫做“濡水”。如果我们俯视它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它的发源地位于燕山山脉的西北部，然后在蒙古高原绕了个弯后再向东南方向穿越了燕山山脉中最宽阔的部分，再进入了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最后在离燕山山脉东南角不远的地方流入了渤海。

如果参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滦河的下游属于河北境内的唐山地区，因此也被唐山人民称之为“母亲河”。就水量而言，滦河也算得上是一条大河，以至于唐山西南部的直辖市“天津”，在淡水资源不够时，想到了“引滦入津”的方案。对于现在的华北平原而言，淡水资源无疑是宝贵和稀缺的资源。不过在两千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想得最多的，却是如何把那些多余的水排出去。而河流本身在开辟道路上所发挥的作用，在技术水平低下的古典时期，却比现在重要许多。从这个角度看，滦河本身也应该为燕国的扩张之路发挥过重要作用。

不过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道路的可通行度有时候是和水量成反比的。像陇山——秦岭之间的渭河和穿越太行山脉的滹沱河都没有成为古人旅途的选择。这其中河流的水量过大，以至于在多雨季节经常淹没河谷两岸的天然道路固然是一个原因。更为重要是，这几条河流在山地中的河谷落差都比较大，长度也比较长。如果一定要沿河行走的话，当然也是有办法的，也就是在难以通行的河谷悬崖上搭建“栈道”。不过如果有更好选择的话，谁也不愿意下这么大工夫的。

其实就算燕人和后来的中原王朝有办法沿着滦河开辟道路，他们最终到达的也是蒙古高原，而非我们现在所分析的重点——辽河流域。在蒙古高原方向，会有另一条河流为燕人指引方向，也是我们后面的解读方向。只是我们现在的内容，还是

在关注燕人是如何进入东北地区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燕山山脉中寻找其他河流，看看它们的河谷有没有机会为燕人提供合适的道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条带有强烈的燕山烙印的河流的话，那么“大凌河”是足以承担这个荣誉的。除了在东向入海之时，跨越了那条狭窄的沿海平原（辽西走廊）外，大凌河的绝大部分都是穿行于燕山山脉（包括周边延伸出来的丘陵地带）之中。

如果从流淌的方向上来看，大凌河是发源于燕山主脉，然后向东穿越“辽西丘陵”南部，在遇到“辽西丘陵”东缘的“医巫闾山”时，向南进入下辽河平原的南端，并最终流入渤海。大凌河的这种“几”字型的走向，让我们可以选择从它的源头处出发，先沿着它的上游河道东北向行走，然后在它拐弯向东进入“辽西丘陵”之前做出选择。或是继续北向到达西辽河平原（这里已经是丘陵地帶了，即使不顺着河谷走也能找到合适的道路）；或是继续沿着大凌河谷东行，并最终进入下辽河平原。基于“下辽河平原”的重要性，后者往往是第一选择。辽西很多重要的城邑，也是沿着这条支路修筑的。



辽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大凌河河谷不仅是走出燕山山脉，进入辽河平原的重要战略通道。其横穿辽西丘陵南部的走向，也让大凌河本身成为一条重要防线。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构筑于下辽河平原以北的长城不足以抵挡北方的入侵者时，整个下辽河平原也就等于落入了对手手中。而在入侵者准备翻越燕山，进入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华北平原时，如果能守住沿大凌河一线构筑的防线，最起码能够抵挡住敌人以“下辽河平原”为基地的直接攻击。

关于燕国是如果运用这条防线的，由于历史太过久远，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实例了（但在燕国的战略部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大凌河防线的重视度）。不过如果你比较关注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的话，就会看到，当满洲八旗占据下辽河平原并在沈阳建立“后金”政权后，明朝是如何耗费巨资在大凌河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的。当然，这道防线后来也丢了。而以山海关为起点，构筑于燕山南麓的第三道防线（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段长城），在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壮举之下，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真实原因，肯定不只是为陈圆圆这么简单，不过这已经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内了）。

就燕山南北的地缘结构而言，从战国到明朝末年的这两千多年当中，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而燕国和明帝国所拥有的技术水平，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明朝军队本来已经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迹象了）。因此燕国当年在燕山南北所构筑的防线，其实与明朝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燕国的最大敌人——秦国，是从燕山以南发起攻击的。因此包括大凌河防线在内的这三道防线，最终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大凌河在通行和防御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在整个燕山山脉的地缘结构中，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地理特征。不过仅从通行的角度来看，大凌河河谷并非走出燕山山脉的唯一通道。除了它以外，还有一条名字怪异的河流“老哈河”，同样可以将我们带出燕山山脉。

与大凌河东向切割燕山山脉（实际上是“辽西丘陵”）不同的是，同样发源于燕山山脉腹地的“老哈河”是一条北流的河流。不过如果老哈河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并按照这个方向一直走的话，有可能要流到北冰洋才能与海洋亲密接触了。这种情况当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了，因此老哈河的命运还是成为其他河流的支流。而接收老哈河的那条河流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连接东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西拉木伦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沿着老哈河向北走，可以先到达“西拉木伦河”，然后再往东走过“西辽河”，在东、西辽河合流为“辽河”后，再南向沿辽河进入下辽河平原。这些河流的名字看起来让问题变得很复杂，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条河流，具体的走向在地图上一看也就清楚了。

如果你想领略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流域的草原（沙地）风光的话，那么舍弃大凌河河谷那条更便捷的通道，走老哈河河谷这条路线去下辽河平原，也算是一种选择。不过如果你只是想快速通过燕山山脉，进入下辽河平原的话，那么老哈河河谷就不会成为选项了。事实上走老哈河河谷的意义在于，你可以快速插到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的接口处（东侧）。到了这里后，你既可以侧击进攻下辽河平原的渔猎民族，也可以西进蒙古高原，或是由此切断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这条战略通道。基于去农耕区打草谷的共同理想，这两大族群往往更容易结成同盟。不过在历史上，老哈河河谷往往会成为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入侵华北中原的另一条通道，特别是他们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占据优势时。后来的满洲八旗在跨越大凌河攻击明帝国时，

往往会让他们的盟友通过老哈河河谷策应他们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沿燕山南麓所修建的那道长城，就成为帝国首都最后的防线。

通过对老哈河和大凌河的分析，我想大家已经清楚了辽西古道出燕山部分的走向了。不过要想利用这两条河流，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们都是发源于燕山山脉腹地，然后流入辽河流域的河流，并没有与华北平原发生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在到达这两条河流之前，燕人和那些后来者仍然需要再借助一些同样发源于燕山山脉腹地，但却南向流入华北平原的河流，以走完“辽西古道”的前半部。

第二节 卢龙道和无终道穿行燕山的路线

如果说到从燕山山脉南流入华北平原的河流，那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滦河了。虽然我们之前分析过，要想沿着滦河穿越整条燕山山脉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利用其中的一段，也就是先顺着滦河水上行，然后在离老哈河或大凌河位置最近的地段开辟一条较短的道路，进入其中的一条河谷走出燕山。不过当我们仔细观察滦河与老哈河、大凌河的位置关系后，就会失望地发现，滦河的干流与这两条河流之间的距离还是有点远。如果我们想大部分时间都沿着河谷行走的话，还需要在它们之间找到另一条河流来过渡。



喜峰口（已被潘家口水库淹没）

最终，燕山道路的开拓者们还是找到了一条合适的河流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条叫做“瀑河”的河流，源头与老哈河源头相邻，然后在西南向即将注入华北平原时，与滦河合流。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滦河的一条支流。当燕人从华北平原上行至瀑、滦两河合流的区域时，就可以借助瀑河到达老哈河谷，并最终进入辽河平原了。从军事的角度看，这个合流处，肯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隘所在地。它最近的名字是

叫做“喜峰口”¹（相信了解抗战史的人对这个长城关口都不会陌生）。而这个要塞更为古老的名字则是“卢龙塞”，因此这条“辽西古道”也被称之为卢龙道。



辽西古道示意图（战国）

在辽西走廊未能成行之前，经喜峰口的卢龙道是进出燕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历史上经常有将卢龙塞与太行山北端的居庸塞（军都陁）并称为燕地北、西两大门户的说法。不过正如军都陁不是跨越太行山脉的唯一路径一样，卢龙塞也不是唯一一条“辽西古道”。在它的东侧，滦河还有另一条叫做“青龙河”的支流帮助连通了大凌河，以让我们可以从华北平原直接到达“下辽河平原”。与瀑河相比，青龙河除了走向上有所不同以外，它与滦河的交汇点是在华北平原，而不是在燕山之中，这也是另一个差别。

这种差别所造就的后果就是，控制青龙河谷的山口关隘，不是在燕山之中，而是更加靠南，或者说处在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到一系列山口，如冷口、刘家口、界岭口等，这些山口可以让行人从华北平原切入青龙河谷。这条借助青龙河——大凌河进入下辽河平原的道路，最初的使用者是一个叫做“无终”的小国（现北京西北方向，燕山南麓的“蓟县”所在地），而无终国的命运和其他华北平原北部的边缘小国一样，最终为燕国所吞并。只不过先行者总

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修建潘家口水库，喜峰口关口低洼被库区水淹没。喜峰口交通要道的地位也就随之彻底消失。

是有些值得纪念的地方，因此这条辽西古道也被称之为“无终道”。

卢龙道与无终道，为燕人打通了两条通往西辽河和下辽河地区的交通线。应该说，已经足以完成燕人北进的战略任务了。更为重要的是，老哈河的上游和大凌河的西源其实距离也不算远，可以找到一条合适的山谷将之连接起来。也就是说这两个大致平行的道路，其实可以被连接成“H”形，这就让我们在燕山山脉中的旅程更加具有多样性了（你可以从青龙河谷出发，切入老哈河；也可以沿瀑河，走到大凌河）。

虽然卢龙道与无终道已经能够完成穿越燕山山脉的战略任务了，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它们的入口处都有点偏东。而燕国的政治中心则是靠近太行山，也就是在华北平原的西北角。虽然说从燕都“蓟”城出发，沿燕山南麓向东出发，进入这两条通道，应该不会有太大麻烦。但作为一个政治中心来说，能够控制两条以上方向的战略通道，才更能体现出它地缘中心的价值。

第三节 平冈道经古北口穿越燕山山脉

对于燕国人来说，他们其实并不需要去做道路开辟的工作，因为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的边缘小国（部落），已经做过这些开拓的事情了。而燕国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吞并这些小国之后，选择一个最有枢纽价值的点作为自己的地缘中心。而“蓟”城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份荣誉，也正是因为之前位居于此的“蓟国”，有这样的潜质。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燕国的都城，“蓟”的位置都是明确的，也就是在现在北京市的西南角。换句话说，它在华北平原北部的枢纽位置，在两千多年当中都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在古典时期后期，成为整个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能够造就“蓟”这种重要地缘地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周边有两条重要的通道。一条就是西北方向经南口，过居庸塞进入山西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军都陉”；另一条则是我们下面所要解读的第三条辽西古道“平冈道”了。

如果从地形上来看，燕国人由都城出发，从东北方向切入平冈道时，可以先走一段较为平坦的道路。因为华北平原在这里有一条狭长的突起部伸入燕山山脉之中。而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个突出部三面环山，对于燕都和后来的北京城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缓冲作用。在北方边缘民族南侵时，可以作为一个有自给能力的军事重镇，而不仅仅是一个关口来进行防御战。也正是由于这个突入燕山的突出部对北京城的北线防御相当重要，因此在行政上双方的关系也是很紧密的。目前管辖此地的“密云县”也是北京的郊县之一。当然，由于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已经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密云“京师锁钥”的地位也就大大下降了。

不过它还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中央之国的首都做贡献，那就是为北京提供淡水资源。在密云地区的中部，东西向地散布了一些丘陵，这让这条狭长平原带的北部事实上呈现为盆地状态。而这块位于燕山脚下的小盆地（被叫做“燕落盆地”），

在经过人为改造之后，成为北京城重要的饮用水源基地——“密云水库”。关于密云地区在燕国时期的地缘定位，在全部分析完“辽西古道”的结构之后，就会分析到。而那条体现它价值的辽西古道——平冈道的入口，位置就在这个三面环山地区的北端。它的名字就叫“古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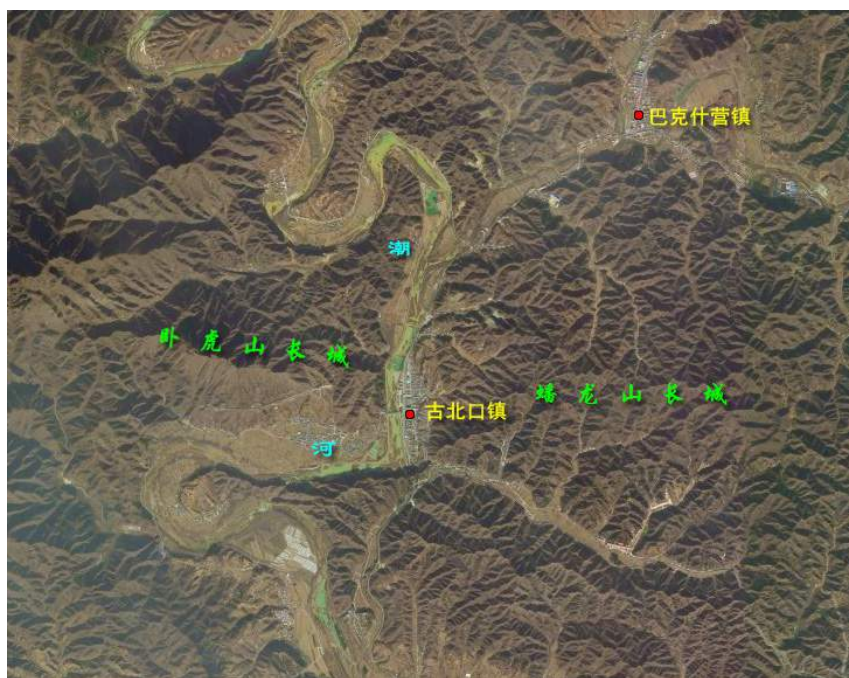


辽西古道示意图 (战国)

平冈道在经由“古北口”进入燕山腹地后，并没有向北延伸，而是拐向东北方向，在到达滦河西岸时，东向穿越滦河，切入老哈河谷的南端，最终与卢龙道合二为一。而“平冈”之名，正是源于当年在建筑在老哈河畔的一个军事重镇“平冈”。如果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平冈的位置正处在现在河北与内蒙古的交界处。如果从地理结构上看，沿老哈河谷过了平冈这个点，就等于走出了燕山山脉的主脉，进入了“辽西丘陵”地带，属于两个地理单元的交汇点，自然也就成为战略要点。

如果从穿越燕山的功能来看，古北口可以看作是平冈道的南起点，这一地区也是两条发源于燕山腹地的河流——潮河和白河的交汇地，它们也是现在密云水库的主要水源。不过潮、白两河南北向的河谷，基本没有成为平冈道的通行基础。平冈道的大部分道路，是借助一条连贯曲折前行的山谷，横切入老哈河谷的。这其中也有些小型河流阶段性的流过这条山谷，也就是说，在无法凭借一条河流完成你的前半段路程时，你必须不断地在一些河流中穿行，其中还包括横渡滦河。

如果从出入口来看，平冈、卢龙、无终这三条“辽西古道”，其实是一个“南三北二”基本格局，即南面有三处基本的入口（潮、白河口的“古北口”；滦、瀑



古北口（镇）卫星图

河口的“喜峰口”，以及“冷口”等进入青龙河谷的山口）；而在这组古道的北边，通往西辽河的老哈河谷和通往辽河下游的大凌河谷，是两个基本出口。当然，后世以这三条道路为基础，又变化出了一些其他的走法，包括从不同的山口切入这三条道路。但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你打算越过燕山山脉而不是走辽西走廊的话，都无法绕过这条基本路径。

至于说那条山、海之间的“辽西走廊”，燕人肯定还是没办法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秦始皇东巡到辽西走廊南端的“秦皇岛”时，就可以认定自己所开创的帝国，在东面已经到达极限了。而沿辽西走廊通行的“伴海道”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要等到辽、金时期了。不过那时候的海岸还不算稳定，并不能全天候地保证通行。能够全天候通行，并且成为沟通东北、华北两大平原的主要通道，则要到明朝了（所以辽西走廊北端的锦州城，始建于辽代；而南端的山海关，则是明朝建的）。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燕山以及燕山以北的地理结构了，下一步我们需要清楚，燕国在这一地区的布局如何。

第十四章 燕国在边缘地区设立塞上五郡

第一节 燕国在怀密盆地区设立渔阳郡

正如齐国用“五都”之制控制其所覆盖的五个地理单元一样，燕国在控制这些土地后，也将这些边缘土地做了分类，并设置了相应的机构以为控制，这就是燕国的“塞上五郡”。所谓“塞上五郡”指的是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即使你只关心秦以后的历史，应该也经常会在历史类书籍中看到这些郡名，因为作为华夏帝国第一阶段的秦、汉两朝，很大程度上还是继承了战国时代的地缘规划，那些当初为各诸侯国所设立的郡县有很多都被保留下来了，特别是在边缘地区。而燕国所设立的五郡，除了西北方向的上谷郡以外，其他四郡都在燕山南北。

对于燕国的塞上五郡究竟是如何划分的，一直以来不是很明确。这一方面是因为燕国所留下来的资料很少；另一方面则是受到现代划分行政区域思维的影响，即希望为各行政单位之间寻找到一条明确的分割线。其实对于古人来说，除了地缘潜力巨大的平原地区以外，对于山地的控制，往往仅限于分布于交通线上的点。也就是说，以控制交通线为目的。至于说交通线以外的山地，只要不对交通线的安全造成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族群是否归于自己管理并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希望对燕山、太行山这些山脉依照行政规则作一个准确的切割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古人和我们来说，了解这些山脉中究竟有哪些道路，以及道路两头的地理单元为谁所控制就足够了。就燕山南北的情况而言，比太行山两侧要简单得多，因为在这里燕国并没有华夏族的竞争者。因此我们也可以认定整条山脉都为燕国所控制，以让燕国的名义国土看起来更大些。当然，依照惯例我们还是“无视”了那些边缘部族的存在，即使它在史书中也被冠以一个“子”爵级的国名（“子”这个级别，是专门送给那些非华夏级别的边缘小国）。

我们先来看看燕山南麓的情况，如果从大的地理格局来看，燕山以南就是“华北平原”。不过如果我们把地图放大，仔细观察燕山南北的边缘，就会发现这其中还是存在一些半独立的、缓冲性质的小地理单元的。其实有这种结构是很正常的。对于一条大型山脉而言，它在向平原地区过渡时，总是会有一个逐渐走低的过程。也就是先走低为丘陵区，然后才是大平原地区。而这些由山脉延伸出来的丘陵，很多时候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有长有短的。这就形成了一些全封闭或半封闭性质的“盆地”地带。在分析太行山两侧的地理结构时，我们就看到了诸如“林州盆地”、“井陉盆地”这样的地理单元。

而这些丘陵与平原相杂的盆地区，往往也会成为军事防御特征明显的独立地缘板块，特别是当它处在一条重要交通线的一端时。就燕山南麓的地理结构而言，整

体是呈现为锯齿状，或者说波浪状。这就为一些盆地型地理单元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如果由西向东划分的话，燕山南麓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盆地区。参照它们现有的行政区划，这三个盆地区分别是“怀密盆地区”、“遵化——于桥盆地区”、“迁安盆地区”。在这三个盆地区的东侧，还有一个位于燕山山脉与渤海之间的地理单元，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辽西走廊”。不过对于燕人来说，这个地理单元暂时还不存在（此时由于海浸还不能通行），并不需要为控制它而设置单独的行政单位。



燕山南麓地缘结构图



怀密盆地区示意图

现在，摆在燕国核心区北面的就是这三个盆地区了。之所以用“盆地区”而不是“盆地”来概括这三个地理单元，是因为在这几块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丘陵并不是很规律的散布在外围，其中有可能切割出一些更为细小的盆地。率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怀密盆地区”。对于这个盆地区，我们在分析平冈道时已经大致

说过了。作为一条延伸入燕山山脉的平原带，它中部有一些东西向的丘陵将之切割为两部分。北部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盆地区了，这个小盆地的地理学名称叫做“燕落盆地”，其核心部分是由潮、白两河冲积出来的平原。不过现在为了首都人民有足够的淡水可用，燕落盆地已经变成了“密云水库”。“怀密盆地区”的南部，是一个半开放的地理结构，即它针对华北平原的一面，再也没有丘陵作切割了。目前

整个盆地区，由附属北京的密云县¹、怀柔区所辖。而当年燕国为了控制这片缓冲地，则设置了“渔阳郡”，郡治“渔阳”就在燕落盆地之南，即现在的密云县城与怀柔之间。如果从交通的角度来看，渔阳郡的设置，就是为了控制平冈道的南出口——古北口。



北京密云水库

其实如果放在中央之国的腹地，燕山南麓的这些地理单元，应该不需要做这么细的解读的。但由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里一直都是华夏民族在华北平原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且北京地区也长期作为帝国的首都。因此无论是在真实的历史，还是资料当中，都会经常涉及一些燕山南麓的地缘名词。而这些名词有时候是以行政单位的面目出现的，如“渔阳郡”；有时又是以道路的形式记载的，如“平冈道”；而“古北口”这样的山口、关隘名，也是常见的标注形式。在详细解读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从不同角度解读的地缘标签，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地理单元。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信对大家读史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 燕国设立的右北平郡的地理范围

如果说设置渔阳郡，是为了控制“辽西古道”的南入口，那么对于燕人来说，这还不够。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辽西古道有三条，或者说它的南入口有三个。除了平冈道以外，经喜峰口上行的“卢龙道”，以及沿青龙河谷北行的“无终道”，也是需要单独划分出一个战略区以为控制。在燕山南麓与这两条道相对应的地理单元是“遵化——于桥盆地区”（卢龙道）；以及“迁安盆地区”（无终道）。前者其实还可以细分为两个盆地，即北部由现在的河北省遵化市所管辖的“遵化盆地”；后者则是由现在的天津市蓟县所辖，不过盆地的主体已经为水库所覆盖，只是没有像“密云水库”那样以县名命名，而是被称之为“于桥水库”，因此这个盆地也被

¹ 1958年10月，密云县从河北划归北京市管辖，2015年11月，撤销密云县，设立密云区。

称之为“于桥盆地”（县城所在地，就在水库或者说盆地的西南角）。

整个“遵化——于桥盆地”，在春秋之时是被一个叫“无终”的小国所控，都城“无终”城也就在现在的蓟县城一带。在燕人控制这一地区以后，无终城成为燕国新设立的“右北平”郡郡治所在。中国文字的魅力在于，即使是隔了两千多年，我们依然能够从字面上感觉到先人们命名的规律。相对于身处燕都，希望向北扩张的燕国贵族而言，扫平生活于“右、北”方位的“遵化——于桥盆地”的边缘部落，才能够打开北进的大门，因此燕国在此设立的郡名为“右北平”。至于说“渔阳”之名，则是因为它在“渔水”之北，所谓渔水，也就是潮白河之中的“白河”。



燕山南麓地缘结构图

对于京、津两个直辖市在北部与河北的划界感到迷惑不解的人，其实可以从上述内容中找到答案。其实一般情况下，一个城市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更易开发的平原地区（最早是为了种地、盖厂房，现在则是为了卖房子了），对于山地丘陵的兴趣并不是特别浓厚。不过京津两个直辖市，却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屈尊”从河北省划来了密云、蓟县两个半境为山地丘陵所覆盖的县。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先进带后进，帮助山区脱贫，也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1949年以后，东北地区已经成为核心区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那两县所掌握的水资源。

只不过因为地理条件所限，密云水库选址在燕落盆地，因此整个“怀密盆地区”都划归北京所辖（1958年划过来，1960年建的水库）；而行政权力没有北京大的天津，则是在1973年得到了蓟县。好处则是，于桥盆地在之前已经变身为“于桥水库”，并且不用费力稍带上北部的“遵化盆地”了。在后面分析到上谷郡的地缘结构时，

我们还将看到，对水资源需求更大，行政权力也更大的首都“北京”，是如何让河北省再“让”出部分水资源丰富的盆地区的。

如果单纯的以地理单元为划分依据，那么在“遵化——于桥盆地”东侧的“迁安盆地”，燕人似乎也应该也设置一个郡级的管理机构。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主要是因为，虽然迁安盆地以南的沿海地带已经成陆，但在成陆之初并不稳定，或者说属于经常为海水所侵的滩涂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进入迁安盆地，走“无终道”进入下辽河平原的话，还是要先经过无终国所控的“遵化——于桥盆地”。所以燕国的“右北平郡”直接覆盖了这两个盆地区，并控制了卢龙道和无终道的南入口。



燕·三都五郡示意图

也正因为“无终道”进入华北平原的入口，为无终城所控制，所以这条位置偏东的辽西古道的起点，才被认为是在于桥盆地西南角的“无终”城，并被命名为“无终道”。不过这并不代表迁安盆地在燕人到来之前，就没有生存独立于此的族群了。如果从地理结构而言，这个以河北省迁安市为标签命名的盆地区，比它西面的两个邻居要更大，也更像一个完整的盆地。而那条水量颇大的滦河从燕山上下来后，也正是贯穿于整个盆地之中，并南流入海的。因此在燕人到来之前，迁安盆地其实也生存了一些独立的边缘部族，如孤竹部、令支部等。当然，你也可以叫它“孤竹国”，虽然他们并不是正式意义上的诸侯国。这些边缘族群的生活足迹，在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也同样能找到。基于他们的位置，无终道和卢龙道应该为他们穿行于燕山山

脉之中提供了帮助。

现在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渔阳郡”和“右北平郡”的地缘结构了。这两个郡的设置，就是为了覆盖燕山南麓与华北平原相交的那条丘陵地带，也就是我之前所划分的三大盆地区。在两千多年以后，这条拱卫华北平原北部的防线依然存在，只不过由于辽西走廊的成陆，防线更加向东延伸了。而明帝国与燕国在控制这条防线的方法上，也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将整体防线交由一个军事重镇“蓟州镇”管理罢了。

对于华北平原的北部而言，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北部的燕山和西部的太行山都是防御的重点。无论是燕国还是后来的诸多华夏帝国，都必须在此应对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入侵者，防御级别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而到了清中叶以后，中央之国的地缘威胁则转向了东面，那些由海路而来的东洋人、西洋人根本无需经过那些山地，就有可能对帝国首都造成了威胁。因此在帝都的东南部，为帝国控制南北漕运而建立的卫城——天津卫（明永乐年间筑城），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注意力被转向东部，以防备那些由海路而来的殖民者对京都的袭扰。天津对于中央之国的地缘重要性，也因此超越了燕山一线那些风光了两千多年的军事重镇，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1949年以后，随着和平的到来，天津的地缘地位也受到了影响，一度被划入河北省（1958年），并成为河北省会。不过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央之国在必须同时面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威胁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提升了天津的行政级别，使其能够以一个直辖市的身份，调动更多的资源拱卫北京的东大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华北平原北部能够出现两个相邻的直辖市的原因（京城总是比别的区域更重要的）。

第三节 燕国在燕山以北设立辽东郡和辽西郡

我们知道，燕国在燕山南北一共设置了四个郡级单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郡其实都是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的，因此是否有足够的防御力和自给能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燕山山脉边缘的丘陵地带成为这些军镇的所在地。而控制了这些丘陵地带，也就等于控制了那几条穿行于燕山山脉的“辽西古道”。既然燕山以南的丘陵区设置了“渔阳郡”和“右北平郡”，那么另外两个郡自然就在燕山以北了，它们就是辽西郡和辽东郡。

如果从“辽西”和“辽东”这两个名字来看，辽河应当是这两个军镇的分割线。不过如果这样划分的话，下辽河平原就被一分为二了。如果说是两兄弟分财产，这种分法倒也合理，毕竟下辽河平原的土地是最为平整和肥沃的。不过如果从防御的角度来看，最好还是将同一个地理单元归于同一个机构管辖下。

事实上辽西郡的管辖区域是在“辽西丘陵”。如果从山脉的角度来看，就是燕

山主脉以北的七老图山——医巫闾山一带的那些丘陵地带；如果从河流的角度来看，老哈河（燕长城以南）和大凌河流域，都是辽西郡的覆盖区域。当然，控制这些丘陵、河流的目的，除了开发它的农业潜力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全面控制“辽西古道”的北出口。而这其中，能够直通下辽河平原的“大凌河”河谷，又是辽西丘陵的地缘中心，因此辽西郡的郡治“阳乐”邑就设在了大凌河的中游（现在的辽宁义县西），以重点扼守这条重要的河谷通道。



燕·三都五郡示意图

既然辽西丘陵已经分配给了“辽西郡”，那么下辽河平原自然就由“辽东郡”负责管理了。在燕人到来之前，下辽河平原和整个西辽河地区，其实是被那些蒙古高原渗透过来的游牧民族所占。这些活跃于大兴安岭两侧的游牧民族，史称“东胡”。而在燕人得到下辽河平原之后，那些退守西辽河流域和蒙古高原的“东胡”，以及那些原本就居住在松嫩平原的渔猎民族，仍然从北线给予了燕国以巨大压力。而辽东郡的设置除了精耕下辽河平原的土地之外，那段位于辽东、辽西两大丘陵之间的长城，更是它的防区。

如果燕人在朝鲜半岛上能够更进一步，占据平壤平原的话，那么燕人应该会单独在朝鲜半岛设置一个郡（就像后来的汉朝那样）。又或朝鲜半岛方向在东线能够给予燕人巨大压力的话，也许燕人会考虑在辽东丘陵单独设置一个郡作为第一道防线（就像辽西丘陵上的“辽西郡”一样）。问题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因此辽东丘陵和燕人在朝鲜半岛的突出部，也都成为“辽西郡”的辖地。虽然下辽河平原

的土地是辽东郡的管理重点，但作为地缘中心的“郡治”，能够依山傍水才能够具有最高等级的防御力。因此辽东郡的郡治被选择驻在了背靠辽东丘陵的“襄平”邑，也就是现在的辽阳市。

至此，燕国依靠分列燕山南北的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四郡，完成了对华北平原北部那些新开拓土地的控制，并为燕国的核心区建立了数道防线。尽管在后世，这些郡的区域及郡治有所调整，但在地理结构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这些调整的范围仍然是在上述框架之内。因此我们已经清楚了燕国在北线的防御体系，这套防御体系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在发挥作用。至于说南线，燕南长城的结构和作用，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而燕国核心区的东面，燕人就暂时就不用烦恼了，无论是尚未开化的东洋人、西洋人，还是已经具备了航海能力的齐人，都无法在那些滩涂地上登陆。现在对于燕人来说，应该考虑一下西线的安全了。

第四节 燕国在太行山控制区设立上谷郡

如果说为燕国核心区的北线提供保护的是燕山山脉，那么核心区西线的安全，就需要依托那条南北向的太行山脉了。在之前分析燕、赵、中山的地缘关系时，我们已经知道了，太行八陉之一的“蒲阴陉”是进入燕国核心区的重要通道，燕国也因此将这条通道东侧的“武阳”邑升格为“下都”（现河北易县）。不过“蒲阴陉”并不是进入燕国核心区的唯一通道，在燕国国都蓟城的西北还有一条道路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条道路就是太行八陉的最后一陉：军都陉。

我们在三晋部分已经分析过太行八陉中的前七陉了，按照正常的顺序应该将最后，也是位置最北的一陉“军都陉”分析完了，再分析燕国以及燕山的地缘结构的。不过作为太行八陉的最后一陉，军都陉其实是位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交界处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就是两条山脉的分割线。因此先将燕山山脉分析透，再回过头来解读这个两山交汇处，会更容易理解它的重要性。

对于“军都陉”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不过提到八达岭长城、居庸关，相信没听过的人就在少数了。其实这几个带有军事色彩的地缘标签，指的是同一区域。也就是由华北平原北部，西北向切入山西高原北部的战略要点。或者说是变换了多套马甲的北京城在西北方向的门户。如果沿河而上寻找道路的话，那么穿越这个接合部流入华北平原，并被北京人民视为母亲河的“永定河”，应该是最有希望指引行人前行的。只是正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有些水量和峡谷落差太大的河谷，并不一定适合开辟道路，因此军都陉并不是在永定河畔。

不过能不能沿河行走，并不是穿越山脉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你选择开路的地区，应该是山脉宽度最窄的地方（也就是厚度小），这样既可以减少开辟道路工程量，也可以减轻旅途的辛苦度。而两条山脉的接合部，往往就是山势最弱的地区，

也最具备通行条件（永定河谷实际上走的还是太行山脉的北端，在山中流淌的距离过长）。至于说没有河谷依靠，是不是就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挖山开路，倒也未必。因为除了大河河谷以外，山脉之中更多的是一些没有蓄水量的山谷，找到距离最短，结构最稳定的山谷后（也许是一条，也许是相互连接的几条），只要勤加维护，足可以满足原始的通行条件。因此我们的解读重点，并不在于军都陉是如何穿越燕山——太行山脉的接合部的（位置在永定河谷的东侧）。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在军都陉的西侧是什么样的地理结构，而由此引发的地缘博弈，又是如何影响华北平原的。

如果从地理结构来看，穿越军都陉后，就是属于山西高原的地界了。按照山西高原的结构划分，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应该大同盆地。不过大同盆地固然是山西高原五大主要盆地中位置最北的一个，但过了军都陉后并不代表马上就能到达它的核心地区。就像如果从忻定盆地出发，东入华北平原时，要先过灵丘盆地、涞源盆地这些小级别的次生盆地一样，军都陉的西侧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盆地区。而最靠近华北平原的盆地区就是“怀延盆地区”。



燕山南麓地缘结构图

所谓“怀延盆地区”，也可以叫做“怀来——延庆盆地”。顾名思义，怀来县和延庆县是这个盆地中两个主要的行政单位。不过这个盆地区其实又可以细分为几个半封闭的小盆地，除了怀、延两县所处的“怀来盆地”和“延庆盆地”以外，最少还可以分离出一个同样以县为名的盆地——“涿鹿盆地”。之所以解读这些看似繁琐的细节，并非是在上地理课，而是因为“怀延盆地”本身的地缘重要性，以及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防御作用，让我们不得不对它多看两眼。

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看做是一条连续的山脉的话，那么也可以认为“怀延盆地区”其实是位于这条山脉的腹地。这种地理结构，一方面使得我们的山地旅行，难度被大大降低（有了盆地的存在，边缘的山体就不会太宽了）；另一方面也让盆地本身成为一个有自给能力的战略要地。为了控制这个体量不算太小，又有农业开发潜力（现在有三个县在里面）的盆地；更为

了拱卫华北平原北部的安全，历代中原王朝都将“怀延盆地区”视为战略重地，并建立高等级的军政机构加以管理，而最先这样做的就是燕国。



怀延盆地区示意图

燕国在怀延盆地区所设立的军政机构，就是燕国“塞上五郡”中的最后一郡——上谷郡，也是唯一与太行山脉发生地缘关系的军事重镇。不过怀延盆地区虽然是“上谷郡”的核心区，但却并不是这个重要战略区的全部。因为在西出“怀延盆地区”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盆地区——张家口盆地区，这个盆地区也有一部分被划入了上谷郡的管辖范围。因此

我们在附图中，会看到燕北长城在走到这个方位时，并非是沿着怀延盆地的西缘修筑的，而是南北向的从中间将“张家口盆地区”切割开。虽然我们后面会分析到，所谓的“张家口盆地区”，其实也可以分割为几个半封闭的小盆地，但对于防御者来说，最为理想的状态当然还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外围构筑防线（山势更高），以让自己能够完整获得它的地缘潜力。

要想了解燕国在取得“怀延盆地区”的控制权后，为什么还要再向西更进一步渗透，就需要先将目光重新转回到河流上了。而这条河流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永定河”。不过这条深受北京人民喜爱的“母亲河”，“血统”并不简单。它的干流和上游支流水系，更是直接影响了蒙古高原——山西高原——华北平原这三大地缘板块之间的地缘关系，并成就了上谷郡略显怪异的地缘结构。

如果我们现在观察“怀延盆地区”的话，会看到一个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上，也显示得出的大型水库——官厅水库（主要是在怀来和延庆之间的区域）。而这个名字“贵气”十足的水库，其诞生的历程一如密云水库和于桥水库一样，都是为了向京津地区调水。而为之提供输水渠道的，就是永定河。也就是说，官厅水库实际上蓄的就是永定河的水。为了保障首都人民的用水，河北省在一如既往地做着贡献（还曾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河北在自己用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是紧急向北京调水两亿方，只不过这次用来输血的是滹沱河水系的水）。

虽然说现在官厅水库的水都是北京在用，但是在一开始，还是给河北省留了点余粮的。也就是说，水库的水是双方各用一半（后来首都人民不够用了，就都拿去了）。于是就造成了现在怀延盆地怪异的地缘分割法，即西面的怀来县留给了河北



怀来县官厅水库

（旧县城都被淹了），东面的延庆县则归了北京。而库区的大部分水域是在河北境内，北京只在东面占了个角。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引水的道理和东海抽油一样，重要的不是在谁脚下，而是有没有口子抽。只是现在，河北的水已经不够北京用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又开始发挥作用了。在“南水北调”的大旗下，湖北丹江口水库的水也开始北上支援中央了。说到这里，也许怀来县的人就要郁闷了，要是当年北京的刀再切远一点，自己也就成为北京户口了。历代的首都迁移，多与水有关，不是水多了淹掉了旧都；就是水少了不够用。也许以中国的体量，真该考虑搞几个功能型的首都了，最起码北京就不要再争经济中心这个位置了。

根据怀延盆地区的位置，我们很容易看得出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这个盆地所防御的地缘威胁并非是单方面的，而是来源于大同盆地和蒙古高原两个方向。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怀延盆地区西侧的地理结构，就会发现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地理板块，即西北方向的张家口盆地区，西面的大同盆地，以及西南方向的蔚县盆地。其中蔚县盆地的地理结构及战略地位，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这是一个连通南北、有枢纽作用的地理单元。至于它是如何发挥这种连接作用的，我们后面会分析到。

第五节 燕国将控制线推进至张家口盆地区

如果单从地理格局来看，当我们在怀延盆地区暂时休息后，再继续向西行走的话，大同盆地和张家口盆地区都是主要的方向。要是进入大同盆地腹地的话，我们的行进方向自然是山西高原南部那些如珍珠链式的盆地带了；而如果我们西北向到达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的话，那么最终的目的地，就会是蒙古高原。

事实上，如果将怀延盆地区视作是太行山脉腹地的一个地理单元的话，那么张家口盆地区就等于是被东北方向的燕山山脉、东南方向的太行山脉，以及西北方向的阴山山脉共同包围而成的一个地理单元。而阴山山脉正是蒙古高原与南部诸地理单元的地理分割线。从这个角度看，张家口盆地的战略地位，是要高于怀延盆地的。

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枢纽位置，地缘博弈之激烈可想而知，所以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并不能稳定的控制张家口盆地区的全部。

将“张家口盆地区”与“怀延盆地区”串联起来的是一条叫做“洋河”的河流，通行的道路也是依河谷而建的。需要说明的是，洋河在盆地西侧的几个源头，不仅仅有通向蒙古高原的，也有连通大同盆地的。因此如果你想从山西高原走西口的话，可以沿河流直接从大同盆地进入张家口盆地区的西部而不是先绕道东部，然后从西、北两个方向进入蒙古高原。至于说洋河的归宿，则是在怀延盆地的腹地，也就是现在的“官厅水库”。换句话说，它是永定河的上游水源。



燕·上谷郡地缘位置示意图

不过洋河并不是永定河的唯一水源，在它的南面有一条更为著名的河流在为官厅水库和永定河供水，它就是桑干河。关于桑干河的情况，我们之前也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实际上可以将之与永定河视为一条河流，只不过前者指的是山西高原部分，而后者则主要涵盖流入华北平原的下游水系。在战国时期，它们也的确是以同一条河流的面目出现的（那时叫“治水”）。从这个角度看，洋河算是治水的一条主要支流了。怎么定义一条河流的干、支流，应该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喜欢做的事情（现在还看到有三地争嘉陵江的源头）。我们只需关注这些彼此相同，属于同一水系的河流，发挥了什么样的地缘作用就行了。

当我们从怀延盆地区出发，希望沿桑干河直接进入大同盆地东端的时候，会发现大同盆地和怀延盆地之间的山体，较之张家口和怀延盆地区之间的山体要宽得多。也就是说穿越这部分山体的难度，要远大于沿洋河进入张家口盆地区。而从张家口盆地的东端，进入大同盆地的东北角就简单得多了，在这里分割两大盆地的丘陵之间的联系是很松散的。因此如果我们想从怀延盆地区进入大同盆地的话，最为经济便捷的方案，就是先沿洋河进入张家口盆地区的东端，然后再西南向地进入大同盆地。

由这种依地理结构而做出的调整，对地缘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体现在具体的战略上就是，如果中原王朝希望从军都陉出发，连通大同盆地乃至整个山西高原的话，就不能满足于只控制怀延盆地区，而是需要更进一步。最起码要将控制线推进到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以保证怀延——大同两盆地的交通畅通。也正是因为如此，位于张家口盆地区东端的次生盆地——宣化盆地，比之怀延盆地区西端的次生盆地——涿鹿盆地，战略地位要更高。



张家口盆地区示意图

由于宣化盆地处在这张“人”字型交通网的核心，所以在大部分的古典时期，宣化也一直是张家口盆地区的地缘中心，这种情况一直到古典时期末期才得到改变。当时核心区的人口压力已经大到无法承担的地步。与东北平原一样，同样也被满洲封禁的蒙古高原也不得不向核心区开放了。而与蒙古高原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山西高原，则成为这次人口

迁移的主要迁出地。只不过比之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因此与闯关东的主体为山东农民有所不同的是，走西口中最为著名的是山西的商人，数量也没有前者多（所以不要认为华夏民族只会墨守成规，“因时而动，因地制宜”是我们这个务实民族的本色）。

鉴于张家口盆地区遮盖了山西高原的东北部，因此它所控制的那些山口也成为走西口的重要通道（另一处是“杀虎口”，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的）。不过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从大同盆地腹地经张家口盆地区进入蒙古高原的话，并不需要绕到其东部的宣化盆地。因此位于盆地区腹地的张家口地区，逐渐显示出它的地缘优势来了，并因此而成为这个盆地区新的地缘中心。这种地缘优势在现在的体现就是：宣化县的核心区，成为张家口市的一个区（宣化区），虽然它离张家口市的

主城区相隔甚远。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为什么燕国一定要将自己的防线推进到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而在战国后期的地缘博弈中，燕国也的确由此路线进攻过赵国所设的“代郡”。所谓的“代”，我们知道核心区是在蔚县盆地，其覆盖范围包括大同盆地的东部。如果从战略目标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控制大同盆地东北角的突出部，并最终得到蔚县盆地会是燕国第一阶段战略目的。而如果燕国得到蔚县盆地的话，就可以南出飞狐峪入涞源盆地，进而切断赵国北线连通东西国土的重要通道。问题是战略计划制定的正确，并不代表你一定就有实力实施。燕国后来的攻赵战役，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反而在秦赵两国的共同攻击下，丢失了军都陉以西的绝大部分土地（上谷三十六城，丢了三十城）。

如果要解读张家口盆地区、怀延盆地区、大同盆地、蔚县盆地这几个地理单元之间的地缘关系，最为经典的案例并非发生在战国时期，而是在两千多年后的明朝中期。它就是差点改变大明帝国国运的“土木堡之变”。

第十五章 赵国在晋北和河套设立北三郡

第一节 赵国设立代郡并渗透张家口盆地区

前面我们解读了燕国的上谷郡。应该说，燕国在西北方向的开拓，主要还是基于防御的需求，毕竟怀延盆地——军都陁一线是游牧民族入侵华北平原最为直接的线路。当然，要是充足的时间和相对弱小的对手，燕人也并非不愿意沿着洋河和桑干河开疆拓土。只是对于已经习惯在平原生活的燕人来说，如果想在高原地区有一番作为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因此上谷郡以西的区域，成为来自山西高原的赵人与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博弈的主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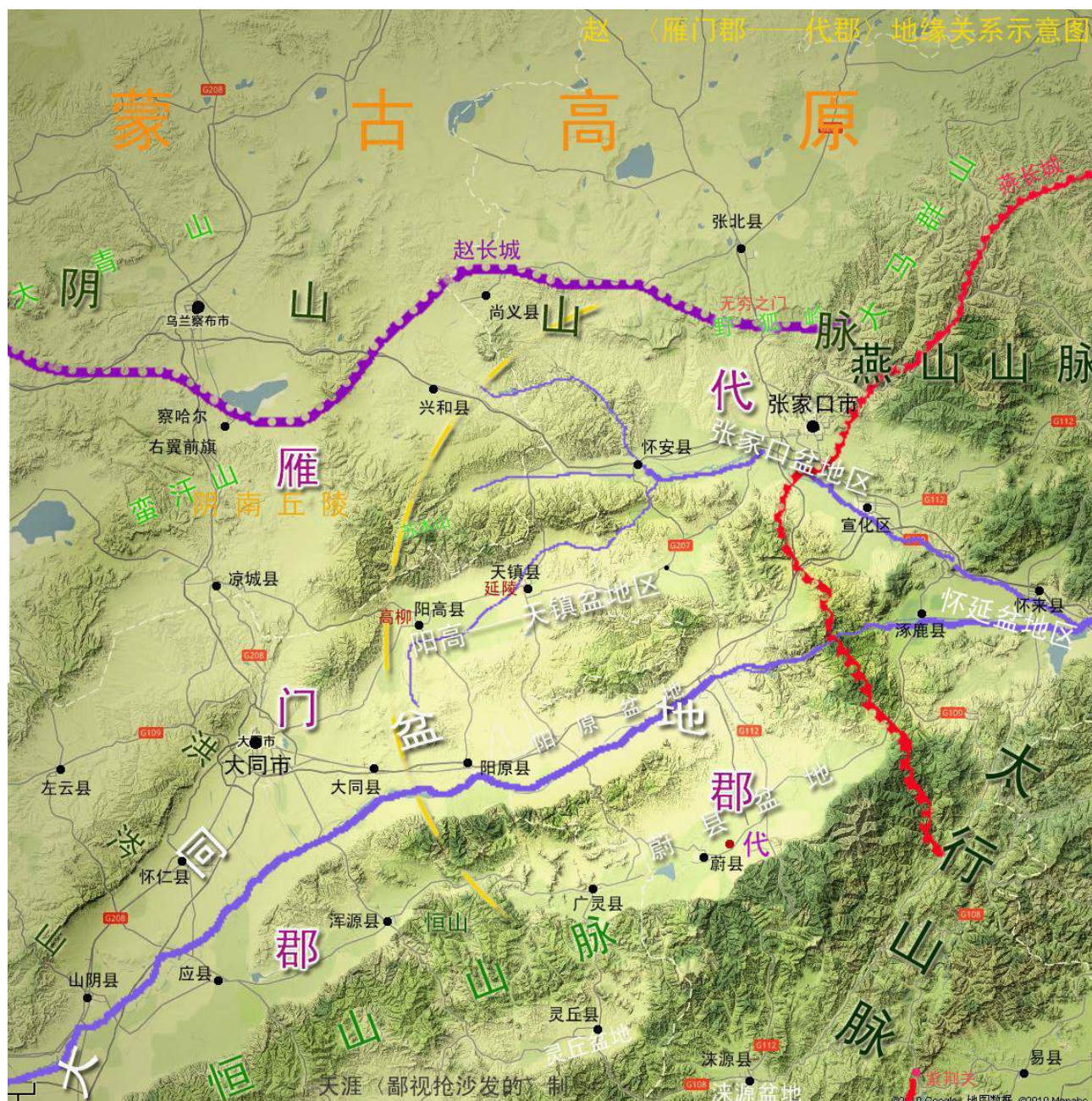
就“郡”这个概念而言，在秦人将之正式定为一级行政单位之前，在战国时其实是诸侯们设在边地的一种军政合一的单位（后来也有在核心区内推广的）。在中央之国的北部边境，由于扩张到农牧（渔猎）分割线，因此燕国沿燕山一线设置了“塞上五郡”，其影响力一直持续了上千年。而在燕山以西，在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的接触区，赵国也同样设置了三个郡级机构，以护卫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它们就是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合称为赵国的“北三郡”。而其中与燕国的上谷郡相邻的，就是“代郡”。对于“代郡”，我们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赵武灵王灭代一节中，我们已经清楚了“代”这个地缘概念的由来，也知道了它的核心区是在蔚县盆地。不过无论是之前的“代国”，还是后来的“代郡”，其覆盖范围并不止于蔚县盆地。

如果我们从蔚县盆地出发，向北走的话，最先进入的地理单元是大同盆地的东北角。尽管一般理解中的“盆地”应该是一个近似于圆形的，四面高、中间低的盆形区域。但在真实的环境中，却很少有盆地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更多的是呈现不规则，甚至有明显条状突出部的状态（比如忻定盆地）。而大同盆地就是这样一个不规则的盆地，它最为明显的突出部，就是在它的东北方向，也就是蔚县盆地的北部。这块条状突出部，目前所设立的县级行政机构为河北省阳原县，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分单独称之为“阳原盆地”。其实所谓的“阳原盆地”与“大同盆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山体进行分割。之所以将这个突出部单独剥离出来，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它的状态。事实上“大同盆地”更全面的名称就是“大同——阳原盆地”。

当我们北向穿越呈东西条状的阳原盆地后，我们会进入另一个条状的盆地区——“阳高——天镇盆地区”。如果我们从整体来观察的话，会发现“阳高——天镇盆地区”、阳原盆地与大同盆地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像手掌和两根伸出的手指的关系。只不过“阳高——天镇盆地”与大同盆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山体分割，因此得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地理单元。按照我们的命名原则，这个独立的盆地区里面的县级行政单位，自然是“天镇县”和“阳高县”。而在“阳高——天镇盆地”东北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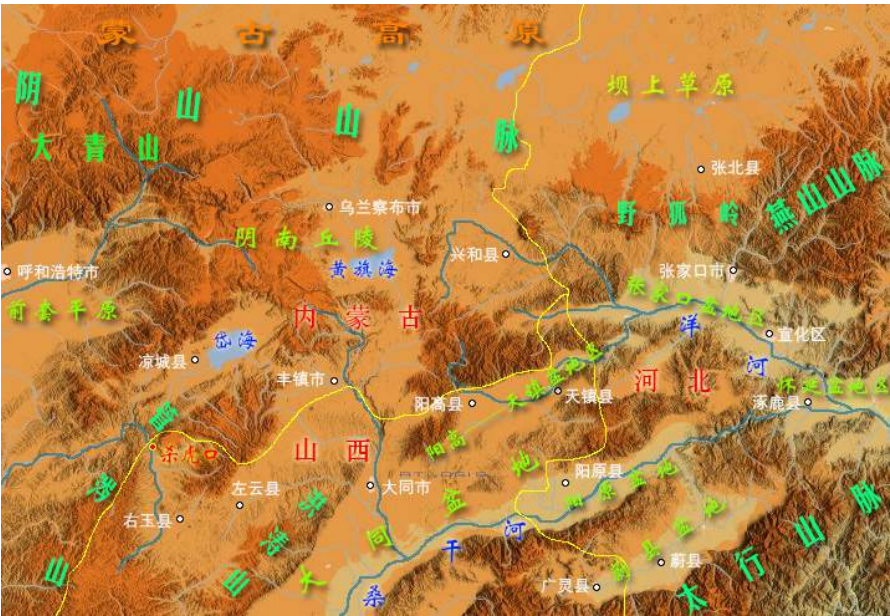
的就是“张家口盆地区”了。

至此我们应该清楚燕国“上谷郡”以西地区的地理结构了。不算“张家口盆地区”的话，南北排列的“阳高——天镇盆地区”、阳原盆地、蔚县盆地整体呈一个中文的“目”字形。这个目字形的盆地，就是赵国“代郡”的主要管辖地区。对于军事家而言，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都会有它的战略地位。就蔚县盆地而言，它的战略作用就是南出“飞狐峪”，沟通忻定盆地与华北平原的跳板——涿源盆地；而阳原盆地则是沟通大同盆地腹地与怀延盆地区的战略通道；至于说你想从大同盆地腹地，东北方向直线切入张家口盆地腹地，再北向进入蒙古高原的话，“阳高——天镇盆地区”就是必经之路。



赵雁门郡——代郡地缘关系示意图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代郡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范来自华北平原的地缘威胁。坐实了这个区域，即使中山国或燕国控制了涞源盆地和怀延盆地，他们也很难再前进一步。而如果赵人想东进的话，代郡也是必须先控制的桥头堡。至于说赵国的主要敌人，或者说战略扩张方向，我们都知道是中山国。因此代郡的郡治被设在了“蔚县盆地”的“代”邑（代王城）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中央之国统一之后，蔚县盆地的战略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那时的主要地缘矛盾已经变成华夏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了。而这个时候，张家口盆地区北侧的阴山一线，则成为争夺的焦点。



山西北部地形图（一）

青山三个部分。

而阴山山脉的东段，也就是与山西高原对应的这一段，山势则非常的凌乱，乱到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签来为这段山体命名。这些整体排列无序的山体，一部分就成为了“张家口盆地区”的北沿。这也是为什么习惯于燕山山脉保护的燕国人，在占据了“张家口盆地区”的东端(宣化盆地为主)后,没能再向西再多进一步的原因。再进一步，就意味着将处在游牧民族和赵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了。

至于赵国有没有占据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现在还有争议。一种说法认为，赵长城已经修到了张家口北部（张北县南部），也就是以阴山东脉作为与游牧民族的分割线了。另一种说法比较保守，认为张家口盆地区与“阳高——天镇盆地区”之间的山体，应该是赵国在这个方位的北疆，这倒与明朝外长城的走向是一致的（也就是现在山西与内蒙古的边界线）。从地理格局上来看，由于得不到纵深更宽的燕山山脉保护，张家口及其以西地区，的确是非常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的。历代中原王朝都在这一地区构筑多重防御工事，但都不能稳定据有。事实上，由于燕山

如果可以的话，张家口盆地区的北沿应该是华夏民族建立第一道防线的地方。只是就这个盆地区而言，能够得到燕山山脉主脉保护的东部，其防御力显然要高于它的西部。这是因为阴山山脉整体呈断续状态，即使是其黄河以北的主体部分，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被分割为狼山、阴山、大

山脉主脉与阴山山脉主体之间没有连续贯通的山体，整个大同盆地的地缘结构都不能算很稳定。为此，后来的明帝国在山势走向非常清晰的恒山山脉又构筑了一道内长城，为的就是在大同盆地失守后，能够据忻定盆地以自守。

这样看来，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颇有点四战之地的味道，谁能站得住，要取决于谁更强大。而赵国在强盛时期，应该还是有可能占据了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毕竟当时的赵国对游牧民族还是占有优势的。不过即使赵国人的相对实力再强，他们也没有兴趣向蒙古高原前进一步。就赵国人而言，他们当然没有能力像我们一样，分析出“等量雨线”、“暖温带”、“农牧分割线”这些概念来。但再多的理论也不及直观感受，在赵国人眼里，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就是一块“无穷之地”，也就是没有边际的未知世界。而出入这个无穷之地的大门——无穷之门，就在现在的张家口市与张北县之间。这里有条山岭叫做野狐岭，是蒙古高原和张家口盆地的地理分割线，也可以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博弈的第一线。

“无穷之门”不仅是赵人防御游牧民族的第一线，在两千年后，也成为走西口的山西人去蒙古高原淘金的重要通道。不过所谓的“无穷之地”只是农耕民族的看法。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张家口盆地以北的这片土地，可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好地方（“敕勒川”指的就是这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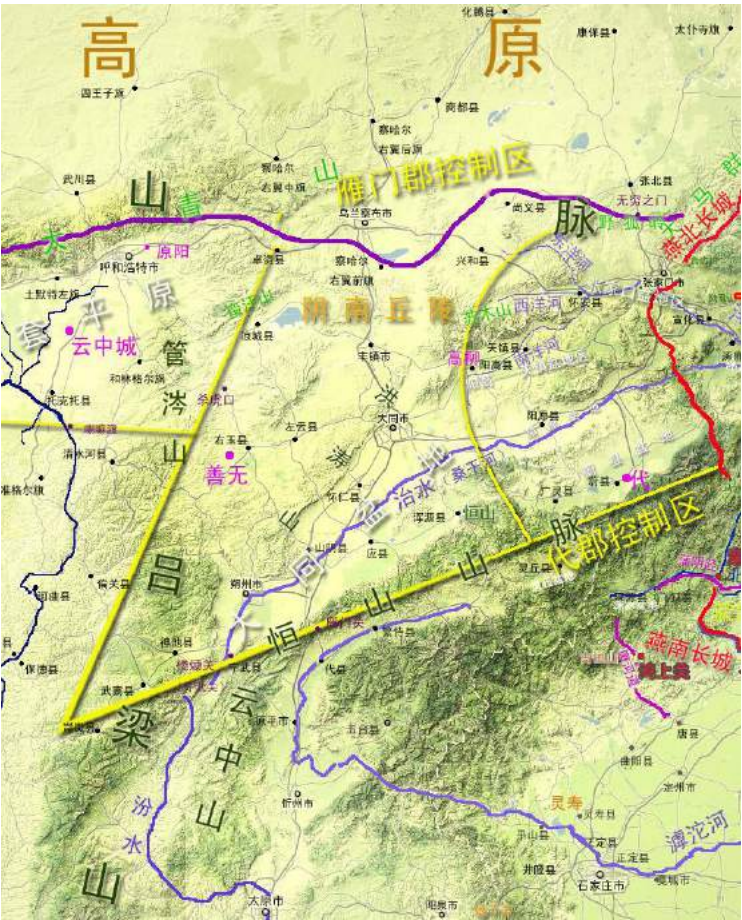
第二节 赵国设立雁门郡的战略目的

在代郡为赵国管理了蔚县盆地以北那些呈条状分割的盆地以后，大同盆地的核心地区被划入了雁门郡的管辖范围。如果说代郡可以通过“飞狐道”，控制赵国东西国土北部交通线的话，那么“雁门郡”的保护对象就是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了。而保护的重点，自然是那些交通要道了。

总的来说，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太原盆地沟通的通道有两条。这两条交通线上所设立的关隘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就是“雁门关”和“楼烦关”（宁武关）。如果你想从忻定盆地直接进入大同盆地的话，那么位于恒山山脉之中的“雁门关”就是必经之路；而如果你不介意多走点山路的话，那么西面还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先进入吕梁——云中山脉之间的谷地，北出“楼烦关”绕过恒山山脉的西端进入大同盆地。对于这条通道的地理结构，我们在赵国灭代一节已经分析过了。吕梁——云中谷地实际上是为汾水和桑干河的上游所共用的。也就是说，你既可以从忻定盆地进入谷地，然后沿桑干河北入大同盆地；也可以从太原盆地出发，绕过忻定盆地直接进入大同盆地。

控制了雁门、楼烦两个关口，赵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就不会遭受那些游牧民族的侵扰了。不过虽然从大的方向来说，那些游牧民族都是来自蒙古高原，但在具体的进攻路线上，却还是有不同的选择；因此我们还必须了解，赵人在走出大同盆

地后，还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如果我们观察现在大同盆地的地理结构，会发现它的地缘中心——“大同市”是在北部，即大同盆地的北出口处。这一点很好理解，就是为了集中力量防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如果大同这个点丢了，即使那些草原骑兵不继续向南劫掠整个大同盆地，也可以向东绕过设在张家口盆地西、北的第一道防线，经阳原侧击宣化盆地和怀延盆地。



赵北三郡地缘关系图

构筑过多道长城防线，但这些没有险峻山势和大河依托的“草原长城”，不仅在外表上无法和八达岭长城相提并论，在防御的功能上更是乏善可陈。也正因为如此，在经过长期博弈后，大同不仅成为大同盆地的地缘中心，更成为整个阴山山脉——恒山山脉之间的地缘中心（这个中心地位，最迟在西汉就已经确立了。当时叫“平城”，为代国的都城。而代国的封地覆盖了云中、雁门、代三郡）。不过在战国时期，赵人却并没有把雁门郡的郡治放在大同这个点上，而是放在大同盆地西侧一个叫“善无”的城邑中。

要想清楚赵人为什么这样做，就要了解一下游牧、农耕文化各有什么优势，以及赵人扩张的动机了。首先农耕文明的优势在于，这种生产方式能够在单位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一亩耕地，现在可以养活一口人；而现在的蒙古草原，30 亩草原

当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越过阴山一线之后，并不会马上到达大同盆地，在此之前他们还必须穿越一片杂乱无章的丘陵地带。这些位于阴山南麓的丘陵，我们可以称之为“阴南丘陵”。而这些处在农牧分割线上的丘陵地带，其整体气候环境虽然要好于阴山以北地区，但阴山山脉在这个方位的断续存在，既不能保证它的气候稳定，也不能保证它的地缘安全。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一地区，看到乌兰察布、察哈尔右翼前旗，这些出自蒙古文化的地名；也能够找到丰镇市、尚义县、凉城县、义和县，这样属于汉文化体系的地名。

由于阴南丘陵地理结构不适合防御，也使得包括赵国在内的历代华夏政权，虽然也曾经在此

才能养一只羊），自然也就拥有更大的地缘潜力。而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的优势则在于：一是拥有强大的机动性；二是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全民皆兵的组织结构，并且游牧的生产方式可以很好地提升单兵素质。

问题是战国时期的中央之国，由于诸侯之间的战争不断，其政权和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是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或者说也是处在全民皆兵的状态（否则以当时的人口，动辄数十万兵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拥有农耕文明背景的“先军主义”，一旦动员起来是非常可怕的。足以提供数倍于游牧民族的兵员和后勤保障（所谓“耕战”的精髓就在于此）。因此即使赵国和其他诸侯不试图北进的话，当时的游牧民族也还不至于影响中央之国内部的地缘博弈。从这个角度看，赵国和燕国之所以要向北扩张，并非因为受不了那些游牧民族的压力，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以支持他们在中央之国内部的战争。只不过当他们合力进逼到农牧分割线时，就没有动力再向北扩张了。

而这个时候，那些被迫放弃水草丰美土地的牧民们（能种粮食的地方，更能长草），在看着他们的邻居们丰衣足食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饥荒之年南下打打草谷，进行一下“再分配”也就成为人之常情了。在这种地缘背景下，华夏政权所修筑的长城，只是为了消极地进行一下防御，以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并不代表他们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了逆转。就赵国的情况而言，在拥有农耕技术以及全民动员的组织形式之外，还额外地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这样的话，游牧民族相对于农耕民族的另一个优势，也被抵消了。因此赵国在战国后期与秦国对抗时，其实并没有在北线承受同等的压力。有了阴南丘陵这个缓冲带，以及构筑于它南北的两道防线，赵国足以保证那些大型农耕区的安全了。

不过赵国在大同盆地以北地区还是部署了强大的兵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除了那些“食之无肉，弃之不舍”的阴南丘陵以外，真正需要赵人与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土地，并非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上那些“无穷之地”，而是在阴南丘陵的西面。在这个方向，阴山山脉与黄河之间，还有两块极具开发潜力的土地，直接暴露在蒙古高原的面前。而这两个地理单元，就是被合称为“河套平原”的“前套平原”和“西套平原”。至于雁门郡看似偏西的地缘中心，也正是为了支持赵国在河套平原的扩张而设定的。

第三节 赵国经杀虎口渗透至河套平原

虽然我们经常为外蒙古独立出去而感到扼腕，但在古典时期的华夏文明眼中，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去控制这些不毛之地。而这些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也并非就一定适合放牧。因为无论是人工培育的粮食作物，还是自然生长的牧草，都需要有水量充足的土地。如果不是农耕文明所拥有的强大力量，那些草原民族也绝不介意把华

北平原上的那些良田变为草场的，就像他们之中最为成功的族群——蒙古人所做的那样。



杀虎口位置图

削弱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而两次拐弯后水流趋缓的黄河，则使得这片土地不用靠天吃饭，随时拥有充足的水源。更为重要的是，阴山山脉与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为河套平原的诞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否则像晋陕大峡谷那样的线性结构，无论是长草还是种地，都没有什么潜力。从这个角度看，河套平原也可以被称之为“河套盆地”。

如果赵人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的话，其实并不用先跑到大同，再横切阴南丘陵。他们有更为直接的、近乎直线的线路可供选择。当赵人从吕梁——云中谷地，穿过楼烦关进入大同盆地的西南角时，他们除了可以向盆地的东、南两侧前进以外，还可以继续北上。在这个方向，他们马上会进入一条新的战略通道，由两条次一级的山脉——管涔山和洪涛山所包夹而成的谷地。从方位上来看，这两条已呈丘陵地貌的山脉，正好与吕梁、云中两条山脉相对应；而从地理结构而上看，他们应该是体量更大的吕梁山脉在大同盆地以北地区的延伸。

这样做虽然保住了游牧民族原有的优势，却无法挖掘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地缘潜力，更无法供给原有的人口密度。而在蒙古人之后，渔猎出身的满洲人就聪明了许多，只是将那些良田据为己有，并没有去改变他们的使用性质（所以清朝有 260 多年的国运，元朝只有不到百年）。仔细观察蒙古高原的地理结构，我们会发现这片看似广袤的高原，大部分为戈壁沙漠所覆盖，真正优良的草场并不多。而这其中靠近农牧分割线的地区，自然条件是相对最好的。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不是被华夏政权逼得没办法，游牧民族是不愿意越过蒙古高原中心的戈壁沙漠跑到外蒙古地区的。

在蒙古高原南沿的那些优良草场中，河套平原无疑是最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在这里，由狼山、阴山、大青山所构成的阴山山脉主脉，削弱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而两次拐弯后水流趋缓的黄河，则使得这片土地不用靠天吃饭，随时拥有充足的水源。更为重要的是，阴山山脉与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为河套平原的诞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否则像晋陕大峡谷那样的线性结构，无论是长草还是种地，都没有什么潜力。从这个角度看，河套平原也可以被称之为“河套盆地”。



杀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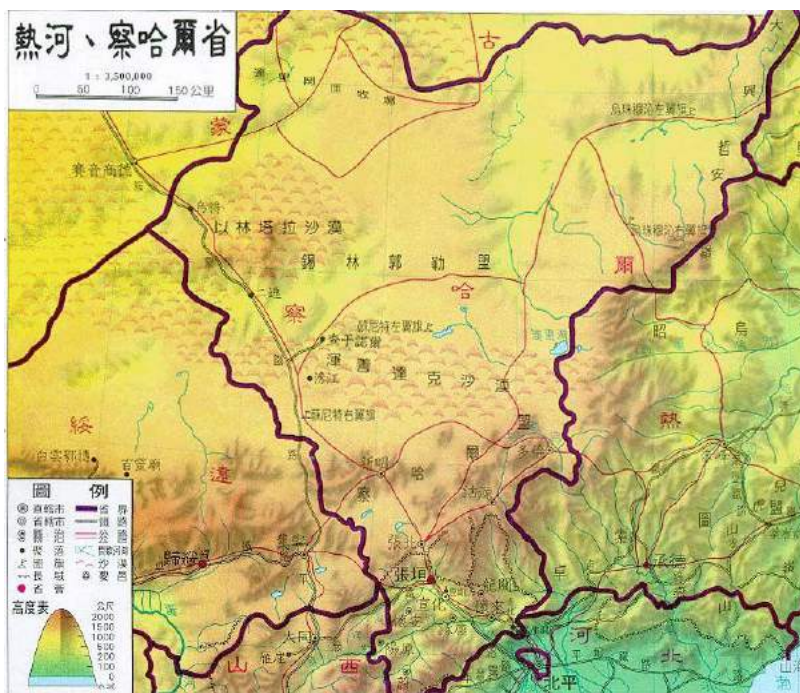
怎么为山脉结构定性，是地理学家所感兴趣的话题。古人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无论是北出楼烦关还是雁门关，管涔山——洪涛山谷地都可以让我们无限接近河套平原。当然，谷地本身并不是扩张的终点。接下来所要做就是在西侧的管涔山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山口，以先行进入位置更靠东侧的前套平原。而赵人所走过的这个山口，在两千多年后山西人背井离乡的“走西口”当中，也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山口就是“杀虎口”。

从宏观的角度看，从杀虎口向西北方向进入前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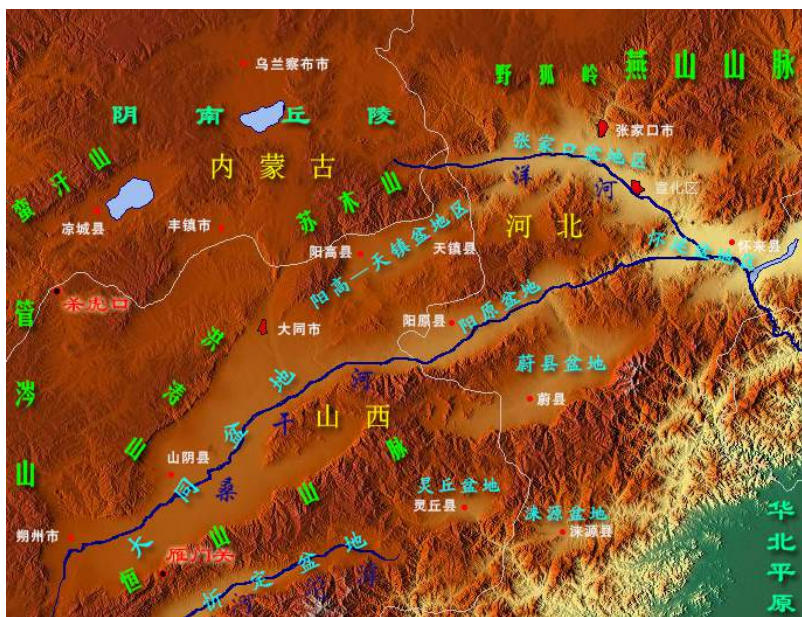
原的路线，正好是位于吕梁山脉和阴山山脉这两条大型山脉呈“丁”字形走势相接处。在这里，阴山南麓所延伸出来的丘陵带叫做“蛮汗山”，而作为吕梁山脉北延丘陵的代表，就是刚才提到的“管涔山”。对于赵人来说，过了杀虎口，再走一段山路进入河套平原的话，就等于进入了一片新大陆。而为了支援对这片新大陆的开发，雁门郡的郡治“善无”城，也被设在了杀虎口的南面，也就是现在山西省“右玉县”县城的南面（这个点是右玉县的旧县址）。

不过就地理条件而言，管涔山——洪涛山谷地的情况肯定较大同盆地要差很多（现在这里面的两个县级行政单位，除了右玉县以外，还有在它东面的“左云县”）。因此后来控制这条重要通道的战略任务，被交给了位于大同盆地西北角的“朔州”市（也就是汉之“马邑”）。将地缘中心设在朔州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够有充分的自给能力，更能南控楼烦、雁门两个关口，这样的话，即使威胁来自于东、北两个方向，这个战略区也可以快速作出反应（朔州市也因此成为大同盆地的第二大城市）。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战国后期，赵国的代郡和雁门郡究竟是什么样的地缘结构，又承担了什么样的战略任务了。应该说，由于恒山山脉以北地区的地理结构复杂，加之赵国并没有完全整合好这一地区（燕国在张家口盆地还有突出部），因此在后世，赵之“代郡”和“雁门郡”所覆盖的区域都不断地在进行调整。最起码从地缘关系



察哈尔省地图



山西北部地形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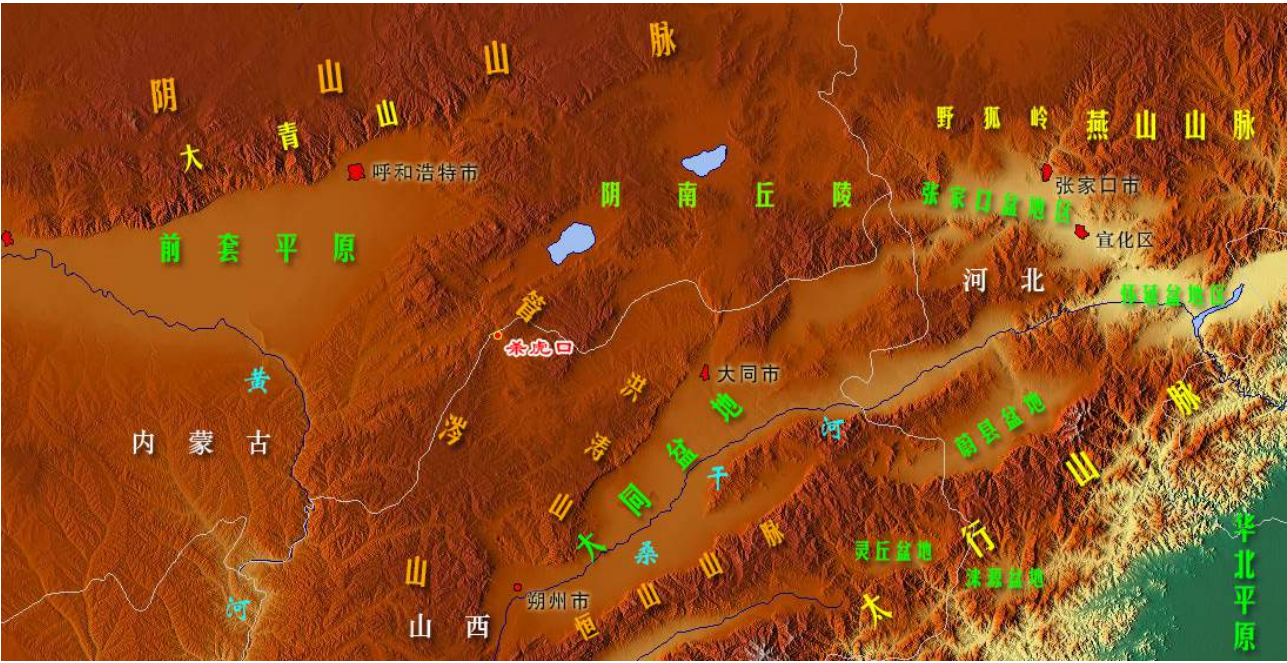
上来说，张家口盆地与怀延盆地的关系，较之与蔚县盆地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应该属于一个地缘板块（后来秦国也的确将之全数划入新的“上谷郡”）。

而如果从后来农牧博弈的地缘关系来看，当年赵国的“代郡”和燕国的“上谷郡”，最主要的地缘价值就是为华北平原北部的战略安全提供保障。或者说是为军都陞和蒲阴陞这两条太行通道提供外围缓冲（就像燕国在燕山以北的辽西郡一样）。这层地缘关系，我们从两千多年后，民国政府所设立的“察哈尔省”就能看出。基本上就是把代郡和上谷郡所管辖的那几个盆地合在了一起（阳原——天镇盆地除外），再加上燕山以北直至外蒙的那部分蒙古高原（为了能够直接控制外蒙这块不稳定的“边缘地区”，内蒙古人民就暂时没法自治了）。

和同为“塞北四省”的热河省一样，1949年以后察

哈尔省的历史使命也结束了。只不过它与蒙古高原、山西高原、华北平原的地缘关系都非常紧密，所包含的地理单元也较热河省更为复杂，因此河北、山西、内蒙古都成为察哈尔省的继承者。其中由南至北切割出张家口盆地、怀延盆地、阳原盆地、蔚县盆地的主体，成为河北省的一部分，继续为国都北京的安全做出贡献。至于说“阳高——天镇盆地”，既然不能把山西人开发的张家口地区划入山西的管辖范围，那么最起码也要让山西保留一条直通张家口盆地的通道才行，所以山西省的东北角出现了一个突出部（分出塞北四省时，就划给了山西）。

现在我们回到雁门郡的话题上来。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赵人所设的雁门郡，其地缘重心是偏向于西侧的河套平原。而赵人在以雁门郡为依托，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取了“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后，也设置了一个新的郡——云中郡。只不过虽然赵人出于夺取河套平原的目的，将与游牧民族博弈的重点放在了西面，却并不代表游牧民族只会从那一个方向进来。实际上对于这些拥有强大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来说，阴南丘陵和张家口盆地都是很好的突破口（赵国后来没有机会面对更为强大的游牧集团了）。因此我们也说过了，大同盆地北部的“大同”成为北部防线的地缘中心。



山西北部地形图（三）

由于大同盆地所遭受的地缘威胁来自于西、北两个方向，因此也就造成了大同盆地的南北两部分，需要承担不同的防御任务。即北部的大同地区主要是防止游牧民族从阴南丘陵、张家口盆地向南侵扰；而南部的朔州地区则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从西面，即河套地区向山西高原发起攻击。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同盆地现在存在大同、朔州两个地区级别城市的地缘背景（山西高原的其他盆地就没有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一个主要的盆地对应一个地区）。事实上在赵国之后，随着草原游牧民族的逐渐强大，后世的华夏政权也愈发意识到将整个大同盆地划为一个战略区有些过于笼统。所以最迟在唐朝，大同盆地就已经被拆分为两部分，即南部以朔州为中心的“朔州”，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云州”。

在历史上，杀虎口的战略地位其实是要高于张家口的，这是因为河套平原是游牧民族最为肥美的草场，也是他们向中央之国核心区进攻的主要跳板。而对于华夏民族来说，河套平原也是他们愿意倾力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取的最有价值的一块土地。

倒不一定是说它的农业潜力有多大，而是这条由阴山拱卫，黄河水滋润的盆地能够提供优质的马场。得到了它，华夏民族就拥有了与游牧民族对等的机动性。



唐代河东道北部行政区划图

其实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之后，人畜才能生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河套地区所拥有的丰富水资源是用来养马还是种地，并不是最重要的。在 100 多年前的那场民族大迁移当中，由山西而起，以内、外蒙古方向的迁徙行动，被统称为“走西口”。而事实上，当时真正所称的“走西口”，其第一目的地并不是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而是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蒙、汉之间的贸易

也主要是在前套平原进行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内蒙古的两大主要城市：呼和浩特和包头都是在前套平原，其中包头可以说就是由于山西商人的开发而兴起的中心城市。

有鉴于此，狭义的“走西口”应该指的是西北方向出杀虎口，而如果你是从东北方向，出张家口进入蒙古高原的话，那就叫“走东口”了。不过由于走西口的山西商人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现在“走西口”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山西高原这次移民潮的代名词了。因此无论你是从阴山丘陵还是张家口盆地进入蒙古高原，都可以被称为“走西口”了。

河套平原成为农、牧民族争夺的焦点，从“杀虎口”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个重要山口最初的名字应该是“杀胡口”，只不过被老百姓误传为更易懂上口的“杀虎口”了（就像“崤陵关”成了“雁翎关”一样）。要说历史上山西境内，包括吕梁山一代还是有许多老虎的。近些年也有一些科研人员希望在此找到老虎的踪迹。不过依现在的环境来看，除了“周老虎”这种新的老虎亚种以外，估计是连虎毛也难找到了。

第四节 赵国征服河套平原并设立云中郡

现在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河套平原的地理结构了。一般我们所说的“河套”，指的就是“河套平原”，不过准确意义上的“河套”，应该指的是黄河那个“几”字形弯所围就的地区。不过如果这样认定的话，主体在黄河外围的河套平原，就不

会被包含在内了。其实讨论这些地理概念看似没有多大意义，但却有助于我们找到河套地区的地理重点。事实上纵观整个河套地区，起地理分割作用的并非是黄河本身，而是围绕在黄河这个“几”字形弯周围的贺兰——阴山——吕梁山脉。也正是在这三条外围山脉和河套之内的“鄂尔多斯高原”、“陕北高原”的共同作用之下，黄河这个大转折的形状，才得以万年不变。被基本固定住的河道也不至于像它在华北平原那样变化多端，不断地影响中央之国内部的地缘结构。



河套地区地理结构图

安静下来的黄河水，得以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作为河套地区的大动脉，为之输送养分。如果我们以黄河为中心解构河套地区的话，可以先按照它的走向分块观察它的结构。首先在河套地区的西侧，贺兰山脉一如阴山山脉那样，与鄂尔多斯高原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也造就了一片和“前套”、“后套”平原相类似的盆地型结构的冲积平原。由于它的方位在西，因此也被称之为“西套平原”（因为现在属宁夏，也被叫做“宁夏平原”或“银川平原”），有时亦被包含在广义的“河套平原”之内。不过如果从地缘关系上来看，西套平原与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联系并不紧密，更具有独立性，因此在历史上也一直是以单一地缘板块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以西套平原为根据地影响中央之国地缘结构的，最著名的莫过于“西夏”了，

其文化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战国时期，华夏诸侯的势力却尚未到达西套平原，这其中的地缘原因，后面我们会分析到。而在河套地区的北侧，就是我们这节的主角，也就是狭义的“河套平原”。如果阴山山脉在这一带走势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必费心将之分为“前套”和“后套”两个板块了。不过造物主永远不会按照标准的几何形状来塑造山形水势的。整体呈断续状的阴山山脉，即使是在黄河以外的主脉，也可以明显地被分为：狼山——阴山——大青山三部分。这其中狼山与阴山之间的分割最为明显，后者的西南角甚至已经伸至黄河的北岸了。阴山的这种走势所造成的地缘后果就是，整体上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被东西分割成前套、后套两个部分了。



赵·北三郡地缘关系图

如果我们要为切割前套、后套两个地理单元的那段山体单独命名的话，它的地理名称叫做“大桦背山”。这段位于现在包头市西侧的山体与阴山主体之间的谷地，也成为沟通前、后套平原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沿河道路被水淹没的情况下。而包头市这个点，自然也就成为连接前、后套平原甚至蒙古高原的枢纽（所以山西商人要开发这里）。当赵人从大同盆地出发，穿过杀虎口进入河套平原之后，他们首先需要消化的是前套平原。如果以管涔山——大青山——黄河为前套地区边缘主要的地理特征的话，那么赵国为管理河套平原而设立的“云中郡”，其郡治“云中”城大致就在这个三角形地区的中心偏东的方位，为的就是与雁门郡隔杀虎口遥相呼应。

不过河套平原的东北角其实才是防御的重点，因为游牧民族如果从北面进入阴南丘陵这个防御上的薄弱环节之后，可以很方便地沿大青山南麓西入前套平原（管

涔山到此走势已尽，无法为云中郡的东侧提供保护了）。即使赵人对蒙古高原没兴趣，也必须防止游牧民族在这个方位的反攻倒算。因此赵人在河套平原最大的城邑，并不是云中城，而是在前套平原东北角的“原阳”城。两千多年以来，无论往来于此的是军人还是商人，这个位置的战略地位依然重要，只不过后世新建的呼和浩特城，与赵人的“原阳”城相比，位置向西南方向移动了一点罢了。

赵人征服河套平原的时间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那时的赵国无论从实力，还是技术上都有机会将游牧民族从河套平原赶出去了。而当时赵人所要面对的游牧民族，已经被正式定名为“匈奴”了（“匈奴”之名肯定是华夏族对这支已经坐大的游牧民族的称呼，反正在华夏民族眼中，即使不为这些天生反骨的边缘民族加上个兽类的标签，也要打上“奴”的印记）。不过赵人进入河套平原之后，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秦人，已经将魏国逐出了山西高原。而仍在这片高原上耕耘的赵人，自然也就成为阻挡秦人西进的主力。因此赵人虽然继续西进，并控制了后套平原，但也无力稳定的消化这块突出部。或者说赵人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其实主要就集中在对后套平原的争夺上。

等到秦国一统天下后，军力空前强大的秦帝国为了更好地控制后套平原，则在这里切割出了新的郡级机构——九原郡。只不过生如夏花的大秦帝国，在高潮过后便迅速分崩离析，自然也就无法控制河套平原了。而后来的汉帝国直到武帝时期，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重新夺回了河套平原。如果从赵国的角度来看，向西沿黄河延伸的河套平原，的确是一个与山西高原地缘联系薄弱的突出部。由于缺乏足够的接触面，这类突出部在承受较大压力后，往往很容易被放弃（想想平壤平原）。单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同时开发河套之内的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高原，以让云中郡拥有稳定的后方。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赵国并不是唯一有条件这样做的，身处渭河平原的秦人也同样有机会北上，逼近河套平原。但最终的结果是，无论是秦、赵，还是后世的华夏政权，最多只能将河套南部，黄河以西的陕北高原消化掉，而对于占据黄河内侧大部分土地的鄂尔多斯高原却束手无策，放任这片面积比宁夏还大的土地游离在华夏核心区之外。那么鄂尔多斯高原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成为华夏政权望而却步的“魔鬼三角区”呢？

第五节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环境

单从“鄂尔多斯”这个名字来看，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块属于游牧民族的土地。如果从纬度上来看，鄂尔多斯高原与山西高原中的太原盆地——大同盆地一线，是属于同一纬度。而高原西、北两侧分布有西套、后套、前套三条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的平原带。这样看来，被黄河环绕的鄂尔多斯高原应该是很有条件成为农业文

明区的，但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即使是在自然环境远胜于今天的战国时期，华夏诸侯们也没有企图向鄂尔多斯高原移民过。而正是因为鄂尔多斯这片农耕民族眼中的“不毛之地”的存在，河套平原这条本很有机会被华夏民族消化的土地，也变成了一块“亚飞地”，并长期为游牧民族所占据。



陕北高原



鄂尔多斯高原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水”。水资源在河套内诸地理单元内的分布状况，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如果我们观察河套内部的水系分布状况，就会发现，南部的陇东高原、陕北高原都有相对密集、分布均匀的河流存在。其中陇东高原的河流基本属于泾河水系；陕北高原的情况稍显复杂，其西部属于洛水水系，而东部那块呈三角状，插入鄂尔多斯高原与黄河之间的土地，则拥有数条独流入河（黄河）的河流，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所熟知的“延河水”（延安的母亲河）。

整个陕北高原的形态，相信“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们，已经从无数革命教育片中熟悉了。基本形态就是被

那些河流切割成壑状，而那些呈西北——东南流向的河流，在为沿河居民提供水源的同时，也不断地把陕北高原的黄土送入黄河，去“支援”华北平原的居民。要是不考虑黄河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认定陕北高原是吕梁山脉西侧山地的延伸。这种认定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河西的陕北高原与河东的吕梁山地，拥有相似的地缘文化。并且由于这种纵向切割的艰难，黄河在了陕北高原与吕梁山脉之间未能形成类似河套平原那样的冲积平原，而是造成了“晋陕大峡谷”这样的地形。

河流对于陕北高原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沿河地带可以有机会成为农耕民族的聚落区；另一方面却也将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大量带走。当然，这笔账并不能算在延河和它的邻居身上。根本原因还是高原上的植被条件不好，蒙古高原带来的风沙和人类的过度开发，都是影响陕北高原植被的重要因素（“成也萧何，败也

萧何”，陕北高原那么厚的黄土层，也是从蒙古高原刮来的）。

与陕北高原的沟壑纵横相比，鄂尔多斯高原就显得要平缓许多。不过这种平缓，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腹地没有什么河流。鄂尔多斯高原所拥有的那些常年有水的河流，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边缘地带。这些河流在为陇东、陕北高原以及河套平原（包括西套）这些河套边缘地区提供水源的同时，却没能滋润鄂尔多斯高原的腹地。腹地所有的一些小河，大都为时断时流的季节河，根本无法支撑农业生产（在地图上可以看见的一些湖泊，由于没有足够的淡水补给，90% 都是咸水湖）。缺水加上来自蒙古高原的风沙吹蚀，使得鄂尔多斯高原的土壤条件也很差，从发育程度上而言，大部分地区属于“初育土”。顾名思义，也就是处在“石——土”转换阶段的土壤。



河套地区地理结构图

鄂尔多斯高原地表水资源的缺乏，不仅使得对水资源要求很高的农耕文明在上面无法扎根，也使得对水资源要求相对较低的游牧民族，亦无法在其腹地找到高质量的草场（对于大部分植物生长而言，水多了总比水少好）。因此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他们控制鄂尔多斯高原的方法都是争夺前套、后套、西套这三个大“河套平原”。谁控制了这三个平原，就可以声称自己控制了鄂尔多斯高原，乃至整个河套地区。反之，就算对手没有进驻鄂尔多斯高原，你把控制线划过去也是自欺欺人。就像有些“历史学家”习惯在绘制古地图时，把某一个朝代的北国边境一直划到北冰洋一样。

当然，如果华夏民族在控制了几个河套平原之后，还是会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寻找几个条件相对较好的点来建立行政机构的。不过这种设置完全是为了保障河套平原与南部的陇东、陕北高原的交通，基本属于没有自给能力的兵站性质。一旦河套平原有失，这些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的据点，会马上被放弃的。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稳定据有河套平原之后，他们也会去鄂尔多斯高原放牧。前提是那里还能长草，相信在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植被状况要比现在好得多，牧民们在那里的生活也比现在要滋润。

现在如果你去那里旅游的话，会发现高原的大部分表面，已经被黄沙所覆盖了，一如曾经的科尔沁草原变身为“科尔沁沙地”一样，西北部最严重，已经沙漠化了，叫“库布齐沙漠”；南部靠近陇东、陕北高原还好点，沙地草场相间，叫“毛素乌沙地”。

第六节 秦赵两国以鄂尔多斯高原为缓冲地

如果从华夏民族的角度来控制河套地区的话，则大同盆地是西进前、后套平原的支撑点。就战国时期的情况而言，赵国在西出大同盆地控制前、后套平原之后，再溯黄河而上，向西套平原渗透就非常困难了。这么漫长的补给线，是赵国的地缘实力所难以支撑的。而相比而言，渭河平原上的秦人如果想控制西套平原的话，区位优势则会明显许多，前提是秦人能够先控制陇东高原。至于当时占据陇东高原的边缘民族，我们在秦霸西戎一节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个让秦国用王太后施展美计的“义渠戎”。

不过秦国灭掉义渠戎已经是公元前 272 年，再过 50 年秦国就要完成统一大业了。如果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连在一起的话，相信秦人一定会一鼓作气地拿下这片水草丰美之地的。问题是，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之间插入了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角，这就大大增加了秦人北伐的难度。秦人当然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技术条件来分析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结构，但他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片土地不能为他们北上的军队补充淡水。因此这片被秦人称之为“旱海”的土地，成为秦人征服西套平原的障碍。

对于秦人来说，如果确实觉得有吞并“西套平原”的必要，还是有能力完成这

次远征的。问题是吞并义渠戎之时的秦人，已经开始了东扩的步伐（吞并义渠戎是为了不让后院起火）。而西套平原并不是东扩的必经之路，即使要防御游牧民族自西套平原发起的侵扰，在陇东高原北沿建一道长城也就够了。从获得战略补给地的角度来看，秦人倒也存在北据西套平原的动机，不过那时候秦人已经控制并开发了“蜀”地这个大粮仓，已经足以支撑他们在东部的战争了。至于说西套平原所能提供的“马”资源，对于养马出身的秦人来说，尚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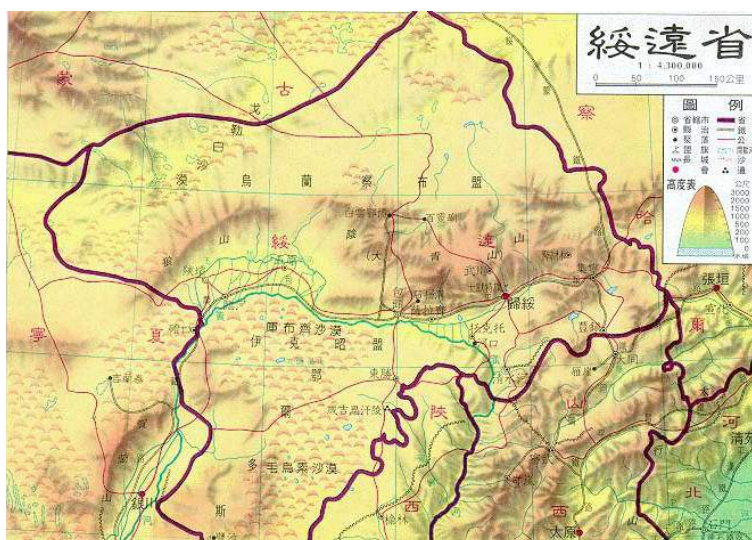
鉴于上述原因，秦、赵两国暂时都没有对西套平原有什么想法。鄂尔多斯高原也就成了两国在河套地区的缓冲地。对于秦人来说，要想穿越鄂尔多斯高原这片“不毛之地”的难度固然很大，但赵人和游牧民族要想由此南下，也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秦人和后世的华夏政权，沿陇东、陕北的那些河谷通道两侧构筑了有层次的防御体系后（可以参见现在那些县城的位置），渭河平原的北部安全级别被大大的提高了。

梦想永远是支持人类前进的动力，尽管从北部进攻秦国的难度太大。但伟大的赵武灵王在南胜魏国，东并中山，西收河套平原后，还是亲自南下考察了穿越鄂尔多斯高原、陕北高原攻击渭河平原的路线；只不过计划尚未实施时，赵武灵王就被急于抢班夺权的儿子给饿死了。不过计划没有实施，对赵武灵王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不至于让他以一场失败的战争来结束自己辉煌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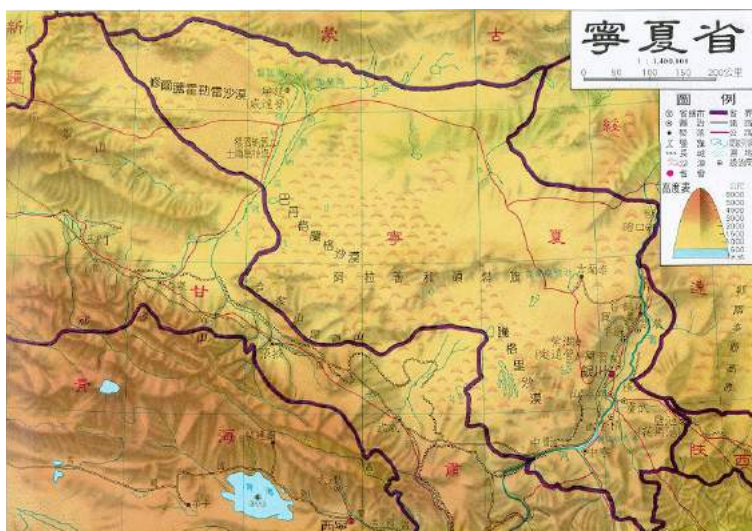
与赵武灵王有同样梦想的是更伟大的秦始皇。不过作为中央之国的新主人，始皇陛下所能集中的人力物力是前人所无法达到的。对于强大的秦帝国而言，难度并不在于能不能够通过一次战争赶走河套平原之上的匈奴人，而是在于怎样让自己的核心区，也就是渭河平原与它们连接起来，以让河套地区长久的为中央之国所控制（控制了河套，匈奴人就失去了前进的跳板）。想要在鄂尔多斯高原移民固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在那片高原上修建几条可以快速通过的道路，以缩短河套平原与渭河平原的交通时间，倒是有可能的。于是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秦人所建筑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在秦国统一中央之国后诞生了。

在我们以后的内容中，将要进入战国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说秦国将要开始展开它的统一战争了（“秦直道”的具体结构，统一之后予以解读）。鉴于整个河套地区对于中央之国西北地区地缘安全的重要性，在民国政府所建制的塞外四省中，河套地区的大部分，也就是前套平原、后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成为绥远省的主要组成部分（阴南丘陵也被划入）。为了应对外蒙古的分裂倾向，与河套地区相对应的那部分“蒙古高原”（现属于内蒙古），也成为了绥远省的一部分（和察哈尔一样）。所谓“绥远”，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当时是绥远省的省会。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当年山西人的“走西口”，以呼和浩特、包头为中心的前套平原可能还是一片纯粹的游牧区。而如果作为内蒙古中部的地缘核心——前套平原，没有足够多的汉族人口进入的话，在民国之初，内蒙古地区也很可能会定性为难以控制的边缘地区了。只是这种结果的出现，我们并不需要感谢开



民国绥远省地图



民国宁夏省地图

放边禁的清政府，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的封禁，拥有强大人口基数的汉族农民，早就自然渗透入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了。

在绥远省的西面，还有塞北四省的最后一个省——宁夏省。这个省的设立，是为了控制河西走廊以北，河套地区以西的内蒙古高原，只不过就像绥远省需要前套平原这个地缘核心一样，宁夏省也需要西套平原这个地缘核心（否则去掉了人口相对密集的西套平原，剩下那些草原沙漠根本无力支撑起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因此西套平原一如它在古典时期的地缘定位那样，带上其西部的部分蒙古高原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板块。

在建国以后，绥远省和宁夏省都被撤销了。前者基本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而宁夏省在剥离了蒙古高原部分之后（这部分也交给了内蒙

古），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虽然去掉了蒙古高原部分，但却向南面的陇东高原延伸了部分土地，把位于高原北沿的“固原”地区给划进去了（原属甘肃）。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甘肃的轮廓线显得非常怪异，其陇东高原部分（现在主要归属“庆阳”地区管辖）像是一块飞地存在于宁、陕之间。

第十六章 韩魏两国与楚国在中原的博弈

第一节 中原的地缘概念及地理范围

现在我们回到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在正式进入战国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秦国以一敌六，最终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期间）之前，我们还需要对“中原”这个概念做一个相对明确的划定，以了解秦人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在每个方向所面对的对手究竟是谁。看过前面内容的朋友应该会注意到，我们还没有具体交待过韩、魏两国在黄河以南的控制区究竟是如何划分的。那么在解读“中原”这个地缘概念之后，韩、魏两国在中原控制区的地缘结构，以及与周边诸侯的地缘关系，都会得到解答。

“中原”二字，相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地缘概念了。不过著名归著名，对于“中原”这个概念，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地区，一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比较偷懒的办法，是用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界定这个“天下之中”的位置。也就是说，认定河南省所包含的区域可以等同于“中原”。这种看法倒也是有一定道理，毕竟就中国的行政区划而言，由于经过漫长的历史磨合，大部分行政规划的形成还是符合地缘规律的。或者说拥有相似地缘文化的区域，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在一个行政范围内的。

一般而言，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往往更容易成为一个特点鲜明的地缘文化区。比如四川盆地虽然内部还可以细分，但在外面的人看来，其地缘文化的整体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而从地理条件而言，“中原”地区是处于华北平原的腹地。由于过于平坦的地形、地貌，因此并不利于形成自己的地缘文化特点。不过长期成为地缘中心的经历，弥补了地理结构上的不足。最终还是让中原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文化区。而由于地形的原因，让我们为中原这个地缘概念划分一条比较明确的地缘分割线，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如果以河南省现有的行政区域为基础，分析中原地区所涉及的地理单元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边缘区在历史上最少涉及到五个地缘概念，即：河洛、南阳、淮上、河济、河间。而在“中原”的东侧，还有一个未被划入河南省范围的地缘概念——泗上。这六个地缘板块共同构成了“中原外围地区”，它们所围就的区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原腹地”，也就是真正的“天下之中”。在“中原腹地”和它的外围地区之外，就是有资格参与逐鹿中原游戏的六个地理特征鲜明的地缘板块。即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山东丘陵、江东平原、江汉平原。而这六个地缘板块相互竞争时，谁能够控制邻近自己的“中原外围地区”，谁就能够在中原腹地争夺战中占据主动优势。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解读一下中原的六个外围地缘板块的特点。首先是“河洛”。从地理结构来看，“河洛”地区指的就是洛水、伊水，及二水相对应的那段黄河合

力打造的“洛阳盆地”。从地理关系上而言，如果从渭河平原、山西高原（黄土高原的主体）沿黄河以南进入中原腹地的话，河洛地区是二者之间的连接点。也正因为如此，在古典时期前期，也就是黄土高原占据主要地缘优势时，洛阳盆地反而比中原腹地更有资格成为中央之国的地缘中心。

如果从“河洛”地区北渡黄河的话，就是所谓的“河内”地区。从地理结构上而言，由漳水、河水（先秦时期）、山西高原所夹成的那条牛角形的区域，都是属于这个地缘概念的范围。在战国时期，韩、魏两国分别控制了河内地区的南北。而河内地区也正是山西高原进入中原腹地的跳板。在河内地区的东侧，是西“河济平原”，对于这个地缘板块，我们在分析齐国的地缘结构时，已经解读过了。在诸侯博弈的年代，来自河北平原的三晋和来自山东丘陵的齐国，是西“河济平原”博弈的主角。



中原地缘概念示意图

当我们为中原地区寻找东部边缘时，可以看到一条几乎湮没的历史名水“泗水”。这条发源于山东丘陵，最终流入淮河的河流，在战国时期曾经在此成立过“泗上十二诸侯”这样的地缘集团，因此它的地缘标签可以称之为“泗上”。而所谓泗上地区最有利的争夺者，则分别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江淮地区”和“山东丘陵”的地缘力量。

泗水其实是淮河最靠东面的一条主要支流。而淮河干流两侧向来是长江诸侯们的天下。不过北方诸侯也并非不能在淮河流域有所作为，因为从济水到淮河之间的

地区大部分都为淮河的支流所覆盖，因此中原腹地的概念也包括部分淮河支流的上游地区。当北方诸侯凭借在河、济两水的优势占据中原腹地后，那些江淮的蛮夷也会顺着这些淮河支流而上逐鹿中原。而这些支流的下游地区，就是我们所说的“淮上”的概念（泗水流域单独划为“泗上”）。

河内、河济、泗上、淮上，四个地缘概念其实都处在华北平原之上。也正是因为大平原的地理特点，使得这四个地缘概念的划分的主要依据为“水”。而“河洛”、“南阳”两个地缘概念，虽然也与河流有很大的关系，但盆地形的构造，让它们的地缘识别度要高得多。前者的核心区为洛阳盆地；后者则可以与“南阳盆地”划等号。

从地缘结构上看，对于中原腹地来说，最为重要的两个外围地理单元就是“洛阳盆地”和“南阳盆地”。因为这两个盆地是渭河平原和江汉平原进入中原腹地的跳板。而仅以春秋战国时代为参考，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这两个平原（渭河平原和江汉平原）而建立的“秦”、“楚”两国是诸侯当中最有攻击力的国家。在秦国东进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盆地区是如何与山西高原之上的“上党高地”，共同成为秦国统一中央之国时必须逾越的三座天王山。

关于上党高地，在三晋部分我们已经花过很多笔墨分析了。至于说南阳盆地，自从“汉阳诸姬”被楚人征服后，一直到战国中期，楚人在这里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而洛阳盆地，传统上应该是东周王室的优势地区，不过到了战国时期，王室已经衰弱到连一般诸侯都比不了的境地了。尽管还保有着天子的名头和王城，但整个洛阳盆地及其边缘山地必须寻求新的保护者了。从地缘关系和实力的角度来看，从山西高原走出来的三晋，是最有机会控制洛阳盆地的。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如此，只不过代表三晋控制洛阳盆地的，并非实力占优的魏、赵两国。而是惯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韩国。

第二节 魏韩分别控制崤函通道和洛阳盆地

我们知道，如果秦人要入主中原的话，最为直接的通道就是沿着黄河南岸，经崤函通道、洛阳盆地直抵中原腹地。当然，也还有其他两种选择，那就是从北线进入山西高原，然后穿越河内地区入主中原；或者由南线通过“丹江通道”穿越秦岭，夺取南阳盆地，然后过方城夏道进入中原腹地。事实上强大的秦国，后来也正是三管齐下完成了它的统一大业。

不过对于秦人来说，“崤函通道——洛阳盆地”这条中间线路，始终是一条快速通道。早在春秋之时，秦人就已经尝试过打通这条捷径了，只不过“崤之战”的结果，让秦人就此沉默了三百年。因为通过这一战，秦人清楚的意识到，除非他们能够完全控制山西高原的核心地区：临汾——运城盆地，否则崤函通道的控制权，始终是在一河之隔的晋人手中。

也许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强大的国家分裂后就必将走向衰弱。从这点来看，当晋国分裂为三晋之后，已经称霸西戎的秦国，应该很有机会再续他们的中原梦了。不过三晋也许是个例外，因为当年晋国所扩张的土地实在太大了，所包含的地理单元也足够多，所以分裂后的晋国，反倒成就了三个同级别的战国强国。对于三晋在山西高原本部的势力分布情况，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魏国成为晋国核心区的继承者。根据我们刚才所说过的原则，占据了临汾——运城盆地（河东）的魏国，也顺理成章地接收了黄河南岸的崤函通道，包括战略支撑点“陕”地的所有权。换句话说，从华山一直到崤山，包括南北两条崤道，都是由魏国所控制的。

如果秦人要想打通崤函通道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魏人手中夺取河东地区。只是在最初的时候，魏国就像当年的晋国一样，不仅稳定地占据了河东地区，甚至还从秦人手中夺取了洛河——黄河之间的河西地区，将桥头堡建立在了渭河平原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秦人要想打通崤函通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韩魏地缘关系图（公元前350年）

如果说魏国就是当年晋国翻版的话，那么它应该还有兴趣成为洛阳盆地的保护者。因为当年控制了“陕”地和河内地区，对洛阳盆地形成半包围态势的晋国，就长期充当了这个角色。问题是魏国毕竟只是三晋之一，尽管分得了最优质的那份遗产，但毕竟还要考虑其他两个兄弟之国的利益。因此洛阳盆地的控制权被分配给了韩国人。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韩国人也的确比魏国人更有资格管理洛阳盆地。因为控制河东之地的魏国人，固然对控制崤函通道有地缘优势，但如果他们想以河东为基地，控制洛阳盆地的话，就会发现，仅仅依靠两条艰险的崤道是很难做到这点的。相比之下，控制了黄河以北的那部分河内地区（也就是韩之“南阳”），与洛阳盆地隔河相望的韩国人，更容易与王室打交道。在进行地缘分割时，山地的作用一般

是要强于河流的。也正因为如此，崤山成为韩、魏两国在黄河之南的分割线（西部）。由于南、北崤道的存在，韩国人要想控制洛阳盆地，就必须在崤山与洛阳盆地核心区之间，布置南北两个战略基地，以控制这两条战略通道。如果从三晋联合应对秦国的角度看，这样做相当于在崤山以东部署了第二道防线。

这两个为洛阳盆地把守西大门的战略基地，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北边那个叫做“澠池”。之所以出名，很大程度是因为“完璧归赵”这个故事。这个发生在战国第三阶段的典故（公元前 279 年）所透露出的地缘信息是，秦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河东地区和崤函通道，并将洛阳盆地的西大门变成了自己的桥头堡（澠池当时为秦国占据，所以赵王才犹豫要不要去）。南边的那个战略基地叫做“宜阳”，建立在洛水北岸。因为无论是魏人还是秦人，从南崤道走出来后，不管通过哪条河流南行，最终都要沿着洛水的东北方向行走才能进入洛阳盆地。而“宜阳”邑正是设立在洛水通道的中间位置。如果从现在的名气来看，能够与英雄、美玉联系在一起的“澠池”显然要大于宜阳。但在当时，“宜阳”的地缘位置却更加重要，因为它是韩国退出河东地区后的第一个都城（退出是相对的，还是有点飞地的）。

从逻辑上来看，宜阳高于澠池的地缘地位，并非因为它是都城，而是因为它的位置重要，所以成为都城。单纯的从与洛阳盆地的地缘关系上来看，澠池和宜阳并没有质的区别。两地与洛邑的直线距离相类似。如果再比较与崤山之间的距离，处在北崤道延伸线上的澠池反而更有优势（南崤道到宜阳还要绕个圈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宜阳”的政治地位呢？

第三节 晋国将陆浑戎部署到伊河和洛河中游

要想知道“宜阳”还有什么战略作用，我们就必须再来审视一下伊、洛两条河流。我们知道，如果从水系的角度来看，洛阳盆地中的核心平原区实际上是由伊、洛两河的下游，加上黄河冲积而成的。而这种冲积平原是农耕文明的最爱，也最有机会成为文明的中心。与其他平原地形的地理单元相比，处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交汇处的洛阳盆地，所孕育出的“河洛文化”，更成为整个华夏文明的源头。

其实不光是华夏族喜欢冲积平原，那些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的戎狄们也喜欢平原地区。只不过戎狄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平原的地缘潜力，因此也就无法与精耕细作的农耕民族在平原上展开竞争了。除非戎狄们愿意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定居下来变身为农民，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边缘民族这样做了。但如果真这样做了，他们也就不再是戎狄了，而变成华夏的一部分了。

愿意融入华夏的边缘民族，毕竟不是全部。那些希望保有自己文化的戎狄们，在竞争平原失败后，往往会溯河而上，到达河流的中、上游地区。这些山间河谷的生活环境，固然没有下游的平原地区舒适，但相对更适合原始状态的边缘民族生存，

也能够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淡水补给。更为重要的是，戎狄们可以时不时地顺流而下，去经济发达的下游地区打打草谷，均均贫富，为自己单调的物质生活增添些色彩。

在平王东迁之时，伊、洛两河的上游地区就已经有不少戎人部落了。这些被称之为“伊洛之戎”的边缘民族，就经常会去洛阳盆地转转，让王室头痛一番。在晋国和其他诸侯的勤王任务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应对伊、洛两河中、上游地区的戎人。对于绝大部分的边缘部落来说，他们与华夏诸侯们的摩擦其实是不带政治目的，或者说单纯的只是为农业区丰富的物资所吸引。问题是，一个族群是否卷入政治漩涡，有时候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特别是当你活动的区域，处在两大地缘力量的接触区时。而伊、洛两河的上游地区，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区域。

最终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并非伊、洛两河原产的戎狄部落。所谓“原产”当然也是相对的，指的是在平王东迁之前，就已经长期在此生活的伊、洛之戎。这个曾经对诸侯争霸产生过影响的边缘部落，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陆浑戎”。陆浑戎正式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是在公元前 638 年。那年秦穆公在与晋惠公的较量当中，终于占了上风，报了“崤之战”惨败之仇（在秦晋争霸一节中写过了）。不过当时的秦国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东进已经是不现实的想法了。因此整合渭河平原及其周边高地，成为秦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秦霸西戎”。而对于那些盘踞在渭河流域的戎人，秦人处理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驱逐出境。陆浑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赶出渭河流域的。

与秦国对待戎人的方式相比，晋国这时所采取的“民族政策”就要“和谐”得多。尽管距离晋国的“和戎”政策出台还有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但晋国还是将陆浑戎安排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伊阙以南的伊、洛河谷之中。晋人之所以愿意帮秦人善后，当然不是在做义工了。对于周王室和他所册封的诸侯来说，让一些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戎狄部落为自己所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鉴于秦人当时刚刚进入华夏序列不久，晋人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显得太成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最初的战俘往往是用来祭祀而被杀掉，之后才发展到将之转换为“奴隶”，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一样。

如果做得好的话，戎狄们甚至有机会“转正”为正式的诸侯，从此进入华夏的行列。就像当年为王室牧马的秦人那样。当然，戎狄们想为王室和诸侯们效忠的话，养马只是其中一种途径。更多的时候，他们所发挥的是军事作用。这种军事作用既有战术上的，即为所依附的对象提供雇佣军，如参与某次战役；也有战略上的，包括将整个族群部署在一些战略要地之上。通常这些战略要地都是华夏民族觉得潜力不大，但又必须加以防范的区域。或者说主要指的就是那些对平原地区构成直接威胁的山地当中。

刚才我们也说了，伊、洛之戎们是王室安全的重要威胁。而已经控制了崤函通道、

河内地区的晋国，当仁不让地要承担起保护王室的责任，这也是称霸所必须做的表面文章。在这种背景之下，让一支对自己心存感激的戎人去与伊、洛河谷中土著的戎人部落竞争，不失为一个“以戎制戎”的好办法。其实让伊、洛两河的中游地区掌控在自己手中，对于晋人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战略作用，那就是牵制楚人。我们知道，在晋人进入河北平原的南部，也就是河内地区以后，他们下一步目标势必是向中原腹地渗透。而与此同时，从南阳盆地出击的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中原腹地的西侧，伏牛山的东麓往往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地区。

在晋、楚两国博弈的过程中，夹在中间的郑国往往被迫成为一颗棋子，不得不在双方之间周旋。除了郑国以外，伊洛河谷中的“陆浑戎”也对晋楚之间的博弈有过重要的影响。

第四节 晋楚两国围绕陆浑戎进行的博弈

为了解“陆浑戎”为什么能够替晋国牵制楚人，我们要先观察一下洛阳盆地与中原腹地的地缘关系。所谓的“盆地”，狭义的概念是指盆地底部的平原地区，而广义的概念则包括平原周边的山地。如果为广义的盆地分级的话，那么可以由高至低分为外围山体、坡地、平原三级地形，而这三级地形往往对应着河流的上、中、下游地区。就“陆浑戎”而言，他们所占据的区域主要就是洛阳盆地的第二级地形。其中心区域就是伊阙南边的伊河河谷。至今我们还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个以“陆浑”命名的水库。

如果陆浑戎也想参与到中原争霸当中去的话，向北经过伊阙进入洛阳盆地腹地，然后再出虎牢关，沿济水南岸东进固然是一种选择。不过这种走法就算不考虑绕道的原因，王室和有心护卫王室的诸侯们也不会让他们这样做的。其实陆浑戎如果想东入中原的话，并不需要这样绕着圈走。因为洛阳盆地的外围山体，并非是一条环形的高大山脉，而是由一系列呈“伞”状排列的条状山体所构成的。从地理关系上看，这些如手指形状的山体，是伏牛山脉的北部延伸；而整体呈手掌状的伏牛山脉又是秦岭的最东端部分。我们可以形象地将整个秦岭看作一条手臂，伏牛山脉就是手臂前面的手掌，那些围就洛阳盆地的小山体就是手掌上的手指。

既然是“手指”，那也就意味着它们之间有缝隙。而如果陆浑戎想东进的话，洛阳盆地东、南侧的嵩山、箕山、崆峒山（现名“西泰山”）之间，理论上就应该存在两条谷地作为战略通道。嵩山、箕山、崆峒山三山，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最北边的嵩山了。所谓名山名水，一般比较知名的山都会有名水相伴。而嵩山之南也的确有一条上古名水——“洧水”流出。洧水在上古的名气是来源于黄帝，据说当年黄帝进入中原以后，就是活动于此的。

黄帝的事实在有点太久远了。尽管从地缘的角度看，这一带的确应当是黄帝入

主中原的第一站，但由于没有文字、考古方面的直接证据，无法成为信史的一部分。不过当年东迁的郑国以郁水流域为中心区域，却是确认无疑的。因为郑国的新都“新郑”便是在洧水之阳。由于这里实在是块风水宝地，数次迁都的韩国最终也定都于此，所以现在的新郑市才有“郑韩故里”之说。不过韩国人要想从宜阳渗透到新郑，还有一段路要走。至于怎么走，我们一会就会分析到。

韩魏地缘关系图 (公元前 350 年)

现在颍水算是淮河的第一支流了，不过在先秦时，它南面的汝水才是真正的老大。与汝水对应的山体，是伏牛山脉东北角的“崆峒山”。汝水正是发源于崆峒山北，然后转折向东南方向，穿过箕山——崆峒山之间的谷地，进入中原腹地，并最终注入淮河。说到崆峒山，现在的人们大多会想到六盘山脉上的那座“崆峒山”（甘肃），其实上古时期的崆峒山，以及后来的道教名山，最初指的就是汝水之源的这座“崆峒山”。看过《封神榜》的人应该对“广成子”这个神仙有印象。这位广成子也是道家所认定的始祖，修行地正在于此。不过现在汝水之南的这座崆峒山，已经改名叫“西泰山”了，倒是可惜这文化资源了。

在到达宜阳这个点后，向东横渡洛、伊两水，然后再从嵩、箕、崆峒三山之间的谷地进入平原地带，也是一种选择。只不过由于山体和河流走向的问题，这个方向的道路不太好走罢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不能控制伊、洛两水下游的平原地区的话，这条通道战略安全其实是没有保障的。就像晋国和后来的魏国，虽然不一定能够清除干净崤函通道附近的戎狄，但随时出击，切断这条交通线的能力还是随时保有的（崤之战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春秋之时，诸侯之间的兼并还未达到白热化程度，对于周边山地上的边缘部落，也多是采取间接控制的手段，即你不生事，我也不费力去打你。在很多时候，这些戎狄还会被华夏诸侯们所利用。陆浑戎被晋国安排到伊、洛两水的中上游，正是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晋人稳定洛阳盆地的局势，以让晋国可以专心致志地参与中原争霸。

就陆浑戎的战略作用来说，并不只是防御性的，前面我们也说了，从伊洛河谷可以东南向直接进入中原腹地。而从地缘格局上来看，陆浑戎如果这样做的话，事实上最受影响的是楚人。因为对从南阳盆地出来的楚人来说，沿伏牛山、洛阳盆地东麓北上河、济流域的路线，就随时可能受到攻击。而晋人把听命于自己的陆浑戎安排于此，正是为了从侧翼对试图北上的楚人施加压力。

实际上如果陆浑戎站在晋国一边，参与晋楚争霸的话，那么洛阳盆地东侧的郑国，所承受来自南面的压力，也会大大减少。而以“事大”为生存法则的郑国，随之而来的政治选择就会是倒向更占优势的晋国。有鉴于此，如果楚人希望北上争霸的话，首先就要让伊、洛河谷的戎人倒向自己，以此来保证自己前行线路的安全。最终完成这个设想的，就是那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只不过他在进入伊、洛河谷打服陆浑戎后，并没有马上转入中原争霸。因为到达洛水之畔的楚人发现，东周的王室就在眼前了。

如果是晋国之类的华夏诸侯，在有机会进入洛阳盆地时，想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如何“奉天子以令诸侯”，并不会取而代之以的想法。不过对于本来就自居蛮夷的楚人来说，早就自立为王，在政治地位上将自己等同于周王室了。因此在无限接近“洛邑”之后，楚庄王才会生出取而代之以的想法。随后所发生的事，也造就了一句著名的成语“问鼎中原”。

对于楚庄王“问鼎”于周王室的结果，习惯于将成败得失寄托于某位英雄人物身上的“文史”学家们，一般认为是一位叫“满”的王室成员起了关键作用。认为是这位王孙一番义正辞严的说辞，让楚人知难而退了。事实上，促使楚人放弃这个“斩首计划”的根本原因，还是考虑到周王朝的组织结构。在周王朝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之下，整个王国实际上是被分割成为互相独立的，以诸侯为标签的地缘板块。这种制度之下的王室，更多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罢了。如果它自身所直接控制的土地够大，实力够强，那么倒是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间接管理下面的诸侯；反之像东周王室这样的地缘实力，基本已经变为一个象征了。

也就是说，楚人即使灭周王室，他们最多也只能得到洛阳盆地，并无法让其他的诸侯就此臣服于楚国。而这样做的政治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此之前，楚人虽然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尚可以让一些务实的华夏诸侯加入自己的联盟，与晋、齐等大国争霸中原。但如果把东周王室干掉的话，那些华夏诸侯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就此放弃自己“高贵”的出身，臣服于一个蛮夷之国的。为了自己的华夏身份，他们一定会联合起来对付楚国。这样的话，楚国的实力再强，也无法以一敌众。因此楚国最终并没有真的对周王室下手，而是按照传统的游戏规则，东入中原开始了争霸的历程。而征服陆浑戎之后，在楚人强大的压力之下，郑国也开始倒向了楚国。最终继晋文公之后，楚庄王成为春秋的第三个霸主。

失去对伊、洛河谷的控制，晋人也就等于失去了攻击楚人核心区的能力。因为当年依附于晋人的陆浑戎，既然可以在楚人北上时，袭扰他们的攻击线路，那么现在选择唯楚国马首是瞻的陆浑戎，也同样可以在晋人南下时，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对于晋人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灭掉陆浑戎，将伊洛河谷掌握在自己手中（光打服不行，晋人走了后，又有可能倒向楚人）。

晋灭陆浑戎之战是在公元前 525 年。要想完全灭掉这些山地之中的戎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熟悉地形的他们，即使不能依地形阻击晋人的进攻，也可以分散躲进山中，坐等晋人退兵。因此晋人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进入伊、洛谷地。这个理由倒是现成，而又是冠冕堂皇的——祭祀洛水和涂山。在解读洛阳龙门（伊阙）和大禹治水的关系时，我们曾经说过了，伊阙以南的伊水河谷，就是洪水之源，也就是大禹治水功成之处。而大禹治水之后大会诸侯的“涂山”也正是在此（最起码晋人是这样认为的）。至于说洛水，对于周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晋人借祭祀之名渡过洛水之后，丧失了警觉性的陆浑戎也就难逃覆灭的命运了。贵族们的逃亡方向，自然是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的楚国；而死里逃生的普通部众，则选择了更为自然的逃亡线路——顺着伊河向北逃亡。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到达伊阙，就被早有防备的周人所尽数俘获了。

第五节 韩国和魏国渗透入中原腹地

在晋国分裂为三晋之后，晋国在伊、洛河谷的控制区也被韩国所继承了。这时的韩国当然没有实力去挑战楚国了，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洛阳盆地东侧，中原腹地西侧的“郑国”。对于领地内缺乏大平原的韩国来说，郑国所占据的那些中原腹地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都城设在洛阳盆地西南大门的“宜阳”，而不是西北方向的“滏池”只是第一步。因为从宜阳的位置来说，不仅能够进入洛阳盆地腹地，更可以沿着当年陆浑戎袭扰中原的路线，绕到郑国的后方去。

为了完成吞并郑国的计划，韩国其实很早就在做规划了。在韩、魏、赵三国商

定瓜分晋国土地时，韩国就着重提出要分得虎牢之地。经过长期的博弈，这个洛阳盆地与中原腹地交流的东大门，控制权已经由郑国转到晋国了。而韩国希望得到这个战略要点，当然不是为了防备郑国从中原发起的进攻，而是为了从北线对郑国施压。

对于已经习惯了墙头草定位的郑国来说，如果在北方经受晋国或者三晋压力过大的话，他们很自然的选择是向南面的楚国寻求保护。而为了防止楚国对韩国的支援，韩国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从伊河河谷穿越嵩、箕二山袭扰一下那么简单了。韩国需要实实在在地在郑国南面钉上一颗钉子，以从地缘上割断郑、楚两国的直接联系。因此在公元前408年，韩国伐郑，攻取了颍河之阳的“洧邑”，并将之改名为“阳翟”（现在的禹州），定为韩国的新都。

韩国将阳翟定为新都，首先当然是为了入主中原的需要。毕竟韩国下一步，需要以郑国为目标，开拓中原的土地了。有了阳翟这个突出部，韩国实际上对郑国形成了一个“C型包围”（而且郑国还无险可守）。如果郑国东侧的诸侯再成为韩国的盟友的话，那么郑国被灭就是迟早的事了。要想做到这一点，三晋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魏国就必须粉墨登场了。

按说郑国的位置不错，作为三晋中实力最强的魏国也应当会动心的。只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魏国的实力再强，也没有达到后来秦国那样，以“一敌六”的程度。真要是想好处占尽的话，只可能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尤其是你想独霸的是中原这块是非之地时。因此不能说韩、魏之间就一定有什么协议，但最终两个兄弟之国，根据自己国土的地缘形态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即韩国将目标锁定在中原腹地西部的“郑国”身上；而魏国则利用他们在西河济平原的优势，由郑、宋两国之间切入中原腹地。

在春秋之初，郑、宋两国在中原腹地的势力范围还是相互连接的。他们之间的地缘分割点大致也就是在两国之间，也就是现在开封那个点上。只不过郑、宋两国的好日子还没有过多久，那些觉醒的边缘地区就开始轮番到中原来争霸了。因此郑、宋两国虽然一东一西地保住了自己的独立，但中间的接触地带被撕开一道口子就再所难免了。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春秋之时最有机会在中原腹地获得实际领土的大国就是楚国了。因为这个江淮地区的霸主，在沿淮河的那些支流北上争霸时，并不会遇到其他大国的正面阻击。而其他几个边缘大国中，秦国由于晋国的原因，并无力向华北平原渗透；而齐国要想西进的话，就得先搞掂鲁国这块硬骨头，然后从宋国身上割肉。由于泰沂山脉的存在，齐国的主要扩张方向被锁定在河济平原之上，即先稳定地占有东河济平原，然后再控制西河济平原，最终渗透入中原腹地。

与齐国相比，晋国扩张至中原腹地的过程也差不多是这样三步走，即先得到河北平原（河内地区），然后控制西河济平原，再渗透入中原腹地。只不过控制了河内地区，并成了洛阳盆地保护者的晋国，即使不争夺西河济平原，也有机会直接切

入中原腹地，直接面对郑国。从这个角度看，晋国渗透入中原腹地的机会要大于齐国。

后来的博弈结果也是这样，凭借地缘优势，楚国切入了宋、郑两国之间，甚至越过济水，渗透入了西河济平原。而晋、齐两国在分别搞掂了河内地区以及东河济平原后，也先在西河济平原与其他两国交火了。相比之下，一直没有控制住鲁国的齐国，尚没有能力把手伸入中原腹地。所以为华夏诸侯反击楚国的重任就落在了地缘形态更占优势的晋国肩上（相对于进入中原的难度来说）。

最终将楚国挤压回淮上地区的，已经不是春秋之时的晋国，而是分家后各自壮大的三晋了。如果将三晋放在一起来看，所控制的土地和地缘实力无疑比当初的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包括外围地区的中原地区，三晋也已经彻底控制了河内地区和洛阳盆地（包括伊、洛河中上游山地），并在西河济平原与中原腹地接壤的部分占据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三晋中与中原地区有直接地缘关系的韩、魏两国，再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将中原腹地作为争霸的战场，而是希望实实在在地将这片肥沃的土地纳为自己的国土。

从进攻的方向来说，韩国所主要应对的是实力相对较弱的郑国。经过春秋无义战的洗礼，吞并这样的同族兄弟已经不会让大家感到不安了，而魏国则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这两场战争结束后，韩、魏两国的地缘结构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韩国迁都新郑，将这个郑国都城变为了韩国新都（前 375 年）。而魏国则在济水之南，现在的开封境内，建立它的新都“大梁”城（前 361 年）。

就韩国从阳翟迁都新郑而言，并没有什么让人奇怪的。因为从分家那天起，韩国人就盯上了郑国这块风水宝地了。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新郑作为都城的优势很明显，一方面可以向西通过嵩、箕两山之间的谷地与洛阳盆地无缝对接；另一方面比较阳翟而言，新郑与韩国在河、济以北的国土更近，更便于控制北部领土；即使是相对于淮上地区，新郑也有一定优势，那条流经新郑的洧水，可以通过颍河直入淮河。对于韩国来说，如果想兼顾分属几个地理单元的国土，新郑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如果韩国准备向南扩张的话，那么那个处在前线的旧都“阳翟”可能会更有价值，这样做可以便于韩国集中力量对付楚国。问题是以韩国的实力，有正面挑战楚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种冲锋在前的事，还是让晋国核心区的主要继承者——魏国来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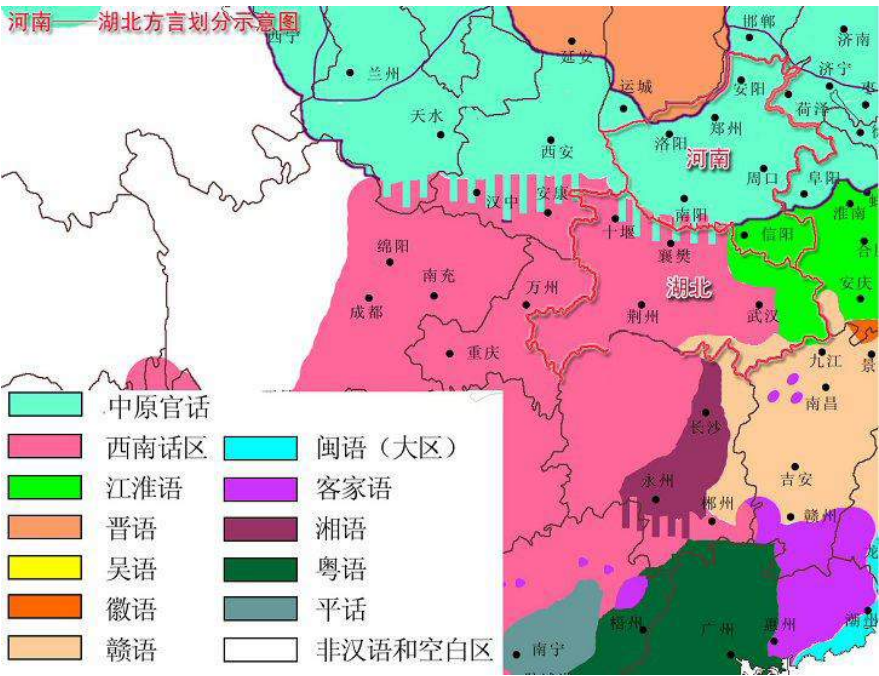
第六节 韩魏与楚国在中原缺乏地缘分割线

如果从韩国之间各地理单元互为支撑的角度来看，魏国在中原腹地的突出部，南线与韩国的控制区保持平行是最为安全和稳定的。也就是说，韩、魏两国的南部控制线，应当与箕山南麓大致保持同一纬度。这样的话，即使楚国向北反击，韩、魏两国也可以从洛阳盆地东南方向出击，沿颍水侧击楚国的进攻路线。而反过来，

如果魏国试图将控制线压过伏牛山脉的话，那么地缘优势就在楚国一方了。因为楚国在固守淮上的时候，同样也可以东出“方城夏道”侧击魏国的进攻路线。因此伏牛山主脉以东所对应的中原地区，成为楚、魏两国地缘博弈的焦点地区。

实际上，要想为楚国和北方诸侯们找到一条清晰的地缘分割线，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原腹地的地势太平，没有足以让双方达成地缘平衡的山脉丘陵。河流本来是划分势力范围的另一类明显的地理特征。但无论是以魏国为首的北方诸侯将势力范围推进到淮水，还是楚国将控制区推进到济水，都是难以做到的。除非他们中的一方，能够将洛阳盆地和南阳盆地同时完全控制在手。否则任何一方突出到对方控制的盆地辐射范围内，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战略安全。

也就是说，从地理结构上来看，洛阳盆地和南阳盆地对于中原腹地的安全至关重要。也可以说，无论是谁在成为天下共主后，最好能够将洛阳盆地、南阳盆地和中原腹地作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板块来管理。对于这一点，周人其实早就意识到了，因此他们在控制住中原腹地后，还要在南阳盆地一带设立“汉阳诸姬”这个诸侯集团。只不过由于周王朝的组织结构问题，这些承担拱卫中原安全的嫡系诸侯们，后来都被楚人各个击破了。



河南湖北方言划分示意图

从古人对于“天下九州”理想状态的划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认识。在《吕氏春秋》对于豫州这个地缘概念的划定中，黄河之南、汉水之阳就是豫州的领地。而在后世的地缘博弈中，对于南阳盆地到底是应该归为江汉平原（荆州）的势力范围，还是按照理想状态与洛阳盆地、中原腹地融为一体，一直是件纠缠不清的事情。如果按照先秦时期的地缘格局来延续的话，由于楚人长达数百年的管理，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地缘关系无疑会更近。因此在汉朝的行政架构中，南阳盆地并未归于豫州管理，而是被划给了荆州。

不过在长期的地缘博弈中，黄河文明相对于长江文明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因此就南阳盆地地缘文化归属的问题，后来也出现了逆转。体现在语言文化上就是，

南阳盆地的语言类型与中原腹地相一致，属于中原官话区；而江汉平原则属于西南官话区。体现在行政划分上就是，南阳盆地与洛阳盆地一样，都成为河南省的一部分。

既然没有明显的地缘分割线，那么也就意味着北方诸侯们与楚国之间的地缘博弈，往往呈胶着状态。谁能够在中原腹地中多占据些份额，就要取决于它的后方有多少纵深了。在地缘格局错综复杂的春秋之世，北方诸侯们往往并不能集合起优势的力量与江淮的霸主相对抗。因此刚进入战国时代时，楚人在中原腹地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甚至已经将实际控制区延伸到了河济平原。不过到了战国第一阶段，江淮的地缘格局固然还没有质的变化（只是由楚、吴分治，变为了楚、越分治），但北方诸侯们的整合工作却已经初见端倪了。这也意味着，楚国在对中原的争夺中，将要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了。



战国中期中原地区地缘结构图

作为战国第一阶段的霸主，魏国在黄土高原以及华北平原的扩张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在西线，他们从秦人手中夺取了洛水以东的“河西”之地；在北线，魏国甚至越过了赵国灭掉了中山国；而在东线，魏国则成功地切入了中原腹地。而基于中原腹地的地缘结构缺乏稳定性，为了防止楚国的反扑，魏国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

地将楚国往淮河方向挤压。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楚国退入南阳盆地，然后魏国占据了济、淮之间大片土地，并与楚国隔方城夏道展开第二阶段的博弈。

问题是，如果魏国和它的盟友们只是沿着中原腹地的西侧南进，试图直接攻击楚人控制下的南阳盆地的话，是很困难的。虽然分割南阳盆地与中原腹地的，只是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一些断续丘陵，中间存在着多条难以防守的战略通道（所谓夏道）。但早在春秋之时，楚国就依托这些丘陵修筑了自己的长城（所谓方城）。无论魏国能否攻破楚国这条长城，方城的存在都会让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这个时候，楚国可以利用他们在淮河中游地区的据点攻击魏国的侧后方。而即使是方城的外围都被魏国封锁了，楚人也可以通过信阳通道直接对淮河流域的控制区进行支援。这样的话，魏国在南阳盆地东侧所获得的突出部，就很可能陷入楚国的“U”型包围之中，战略后撤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魏国想先行攻击楚国在淮上地区的腹地，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这两个地缘板块，同样会对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进行支援。有鉴于此，魏国唯有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对南阳盆地和淮上地区平行推进，才能避免被三面包围的局面出现。

第七节 魏国在中原腹地开挖鸿沟

为了加强自己在中原腹地的地缘优势，也为了直接对淮河流域施加压力，魏国在入主中原后立即着手开挖了沟通河水与淮水的“鸿沟”。沟通河、淮两水的工作，魏国并不是先行者。当年如日中天的吴国，就曾经通过开挖“深沟”，连接泗、济两水，进而连通河、淮两水了。不过无论是当年的吴国，还是它的继承者——越国，他们如果想通过水路进攻中原腹地的话，都必须溯河而上。而这种地缘劣势，在进入相持阶段后就会显露无疑。因此，后来的越人还是甘心地做他们的东南霸王，并没有再直接卷入争夺中原的战争中去。至于那条已经开挖而成的深沟，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反而成为中原地区的财富之源，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战争。

就魏国而言，如果也想控制深沟的话，就得先把宋国给灭了。只不过宋国虽然没有高大山脉作为屏障，但由于所控制的土地都为大平原地区，地缘实力并不弱。并且以魏国为首的三晋，并无法像控制洛阳盆地那样控制山东丘陵，也就无法像包围、吞并郑国那样瓜分宋国了。其实如果魏国希望灭掉宋国的话，就算齐、鲁两国不施以援手，经过长期战争洗礼的宋国，也会第一时间向楚国求助的。而楚国自然也不希望整个中原腹地被魏、韩所垄断。因此魏国如果想真的成为中原霸主的话，除了向东蚕食宋国的土地外，还是需要回过头来打败楚国这个竞争对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鸿沟的挖掘工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地缘背景之下展开的。

如果说深沟是利用了泗水这条淮河支流来完成沟通淮、济工程的话，那么魏国

也需要找一条合适的淮河支流来降低鸿沟的工程量。而如果顺着魏都大梁往南找的话，颍水则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在我们的印象中，像吴、越一类的江南诸侯，应该会更精于水利工程。但事实上，由西部族群所主导的中原治水工程，早在禹时代就开始了。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魏国人，懂得如何合理利用水势，并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奇怪。

魏国人通过控制河流而取得在华北平原的地缘优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初那个破除封建迷信的邺城令“西门豹”，就通过治理漳水而稳定了魏国在河内地区的控制权。而对于漳水的治理，对魏国人来说只是小试牛刀罢了。他们做的另一项工程，甚至对整个华北平原的地缘格局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给黄河筑堤。

我们知道，黄河在战国之前一直都处在自然漫游的状态。在春秋后期，这条反复无常的母亲河甚至同时出现了禹贡河、山经河、汉志河三条河道。如果没有人为干预的话，黄河的下游很可能还会继续寻找新的河道出海，这无疑让华北平原诸国陷入了不稳定状态。因此，魏国人首先想到了沿控制区内的黄河主要河道——“汉志河”一线筑堤，以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洪水侵扰。这种做法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有了这些堤岸，黄河就很难再在魏国境内改道了。问题是，早在禹时代，先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哪怕你只是从侧面堵。因为黄河的水量并不是因为堤坝的建立而减少，魏国人筑堤让自己不再受洪水侵扰，那么魏国下游地区自然就成了泄洪区（所谓“以邻为壑”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了。

如果我们顺着汉志河道东行的话，就会到达赵、齐两国的境内。魏国的筑堤行为损害最严重的也正是这两个国家的利益。让他们去挖掉魏国的堤防当然是不现实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自己境内也沿着黄河修筑堤防，将黄河水礼送入海。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黄河下游就此被固定在汉志河道上了，禹贡、山经两条黄河河道也就成为了“黄河故道”。

如果黄河只是水量反复无常的话，那么黄河下游国家“齐心协力”地修筑堤防，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因为各国的堤防都离主河道有一定距离，为洪水留出缓冲区。问题是黄河是一条含沙量极高的河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些堤岸与河床之间的高度差就会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不断加高的堤防再也无法承受洪水的压力，新的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史当中，黄河的治理工作能够持续的成为历代王朝的重点工程，其重要性甚至要高于对于长城体系的维护。

有了如此丰富的治水经验，魏国人要想开挖一条新的运河并非难事。他们甚至没有选择连接离大梁城更近的济水，而是先由河济之交处，直接引黄河水入大梁城。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魏国丧失了河济平原的控制区，也可以让自己控制下的河内、中原地区的国土，通过这条运河连接起来。而向南连接颍水的工程，也可以通过洧水以东的一条小型河流作为接力，最终达到连接颍水乃至淮河的战略任务。这项工程完工后，魏国可以通过顺流的优势，快速地将大梁以及河内地区的人力、物资，

运至前线，以加强对楚国所控制的淮上地区的压力。

魏国所开挖的鸿沟，主线是经由现在的淮阳（春秋之时的陈国），然后在沈丘县境内与颍水相接的。实际上在鸿沟开挖后，魏国在大部分时间内并不能控制鸿沟的全线。这一方面是由于楚国的强力反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魏国在其他几个方向，尤其是西线上都在承受着巨大压力，并不可能集中所有力量对楚国进行攻击。但即使不能通过鸿沟直达淮河，魏国也可以通过这条水上交通线，保持对淮上地区的压力，巩固自己在韩、宋之间的国土安全。



战国中期中原地区地缘结构图

鸿沟的开挖，也就此奠定了大梁城（后来的开封）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有了这条新运河，在魏、楚两国没有战争的时候，双方的商业沟通也变得更为顺畅了。事实上鸿沟的开挖，对于河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与江淮中游地区的交流，都起到了枢纽作用。在此之前，虽然有深沟这条水上交通线，但其过于靠东的位置，并不能带动整个中央之国的交流。只是单从沟通河、淮的角度看，即使是一定要保证大梁城的枢纽地位，鸿沟的

线路选择也并不是最经济的；最起码在大梁城的东南方向就可以找到泓水——涡水，以及睢水——泗水这两条线路来沟通淮河。因此在后来魏国从齐国手中“接收”了宋国腹地后，这些新的运河工程也动工了（并不止于这两条线路），这些以大梁城为枢纽，沟通淮河的运河工程，后来都被概括为“鸿沟”了。也就是说，广义的“鸿沟”其实不止是一条运河，而是覆盖整个中原腹地的运河系统。而魏国也正是通过这个人工水网，来控制它在中原腹地的国土的。

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修筑运河这类交通线，利弊也是并存的。简单地说，如果你的实力够强，当然可以通过这些交通线去扩张你的势力范围；而如果你的实力下降了的话，那么这些费尽千辛万苦打通的交通线，就有可能被对手所利用了。

如果魏、楚两国一直这样相持下去，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特别是在魏国整体的地缘结构不足以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只是历史并没有给魏、楚两国决出胜负的机会，因为它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已经开始崛起，魏、楚两国都将面临丧失自己根基之地的危险了。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魏国。

第十七章 秦国和魏国争夺河西之地

第一节 魏国夺取河西之地后向南北推进

既然魏国成为了河东之地的主人，那么它与秦国之间的地缘关系，也就大致可以参照当年秦晋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在魏国继承了晋国的核心区后，秦国的地缘结构其实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除了渭河平原和那些羁縻管理的山地部落以外，秦人尚没有能够找到新的战略腹地。也就是说，如果让这个时候的魏、秦两国 PK 的话，很有可能还是当年“秦晋争霸”局面的翻版，后来的历史（战国第一阶段）也的确如此。秦国除了无法突破崤函通道以外，在魏国的进攻之下，还丢失了洛水以东的“河西之地”。

相比于洛水，那段呈南北走向的黄河（时称“西河”），当然更适合成为秦、魏（晋）两国的地缘分割线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当初秦国还在渭河平原的西头打天下时，晋国就已经占据河西之地了，但这并不妨碍秦国人认定河西之地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更何况从秦、魏两国的博弈关系来看，秦国也的确有理由认为魏国是入侵者。因为当年秦人通过几次深入河东的战役，已经从晋国手中拿回河西之地了。而魏国在强盛之后，又从秦人手中将其夺走了。这样看来，魏国不是入侵者，谁是入侵者？因此双方就河西之地的归属，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在这场战争中，洛水下游，渭河平原的东部当然会是主战场。

其实这部分渭河平原在当时更应该叫做“渭洛平原”，因为这块相对平整的土地，是由这两条大河共同冲积而成的。更何况战国时期的“西河”，比现在的位置要靠西（一部分陕西省的土地，在山西境内，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洛水当时不是经由渭水，而是独流入黄河的。对于魏国来说，仅仅控制洛水——河水之间的这片三角状（河洛三角区）的平原地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河西之地的战略安全。魏国最少还需要控制两块区域，一块就是洛水以南，直至渭水、秦岭（华山部分）的区域；另一部分则是陕北高原（特别是南部）。

控制洛水——华山一线很好理解，因为这样做相当于封堵住了崤函通道的入口（与后世守潼关的道理是一样的）。尽管这个口子即使开了，有过“崤之战”经验教训的秦人也未必敢孤军深入，但能够将防线突入渭河平原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在控制了河洛三角区之后，魏国人如果想再向南进一步的话，并不是件难事。而能够与河洛三角区以及其他魏国控制区无缝对接的地理优势，也让魏国在最初的战争中取得了华山以北地区的控制权。魏国的这种做法所造就的地缘后果就是，其在河西地区所修筑的长城不是由洛、渭两水，而是由秦岭北麓开始向北延伸的。

第二节 魏国控制陕北高原

其实对于魏国来说，能不能够固守河西，除了建长城以外，陕北高原这片看似没有太大价值的土地，也是一块势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回顾历史，当年和陇东高原的“犬戎”一起联手，搞得周王室东迁的“申戎”，就是从陕北高原上下来的。而在春秋之时，秦穆公从晋人手中夺回河西之地后，那些高原之上的戎狄就成为秦国的整合对象。在进行过一系列战争之后，秦国算是完成了对西部和西北部两个方向山地部落的征服。不过这种征服并没有在地缘格局上造成重大改变。因为秦国对于这些山地部落，基本上还是采取“羁縻”这种间接管理的手段来控制的。

在“秦霸西戎”的过程中，或者说是在春秋中期以后，盘踞在陇东高原上的主要族群是“义渠戎”，至于说这支戎人和这个地缘板块的命运，我们在秦霸西戎一节中已经交待过了，在战国末期被秦国施展“美人计”而完全吞并了。而在陕北高原这个方向，白狄则成为秦国挤压的对象。不过相比义渠戎，白狄后来的历史则要辉煌得多。因为东迁后的他们，有机会以中山国的面目参与到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之上。



秦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前期）

白狄的东迁路线，我们在中山国一节中也已经分析过了。他们跨越黄河的地方，就是在晋陕大峡谷中段那个著名的孟门渡一带，而建立在这个渡口之上的关口，就叫做“孟门关”（在黄河东岸）。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这条渡河路线就是在陕北的“吴堡县”和晋西的“柳林县”之间。两千多年后，当经过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选定陕北作为新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在稳住阵脚之后决定开始扩张时，东征山西高原的这支红色军队正是由此渡过黄河，与日军、晋绥军、国军展开博弈的。而深受大家喜爱的《亮剑》中所展现的故事情节，也正是在此地缘背景下展开的。

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地缘上来看，红色政权选择这条连接陕北高原与吕梁山区的战略通道，作为战略突破口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而与此同时，西渡黄河试图在西套平原、陇西高原、河西走廊打出一片天地的“西路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白狄和红色政权经由孟门这条战略通道都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而在秦、魏、赵三国之间争夺黄土高原控制权的过程中，孟门两岸也成为地缘博弈的主战场。最初在陕北、吕梁这两块高地上占据优势的是三晋中的“大哥”和“二哥”，即魏、赵两国。而三晋之所以能做到这点，究其根源还是当年晋国打下的底。相比于秦人的称“霸”西戎，晋人的“和”戎政策在地缘渗透能力上要显得更强，也有效得多（山地和平原在互相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平等竞争的话，生产力更强的平原文明会更容易在人口和文化上占据上风）。

如果从防御的角度来看，黄河和太行山这两条山西高原天然的地缘分割线，是山西高原的安全保障。也就是说，要是晋人仅仅满足偏安于山西高原之上，日子应该也会过得不错，就像两千多年后的阎锡山一样。问题是晋人和三晋所要面对的地缘形势，比之20世纪初还是要简单一些的。最起码来自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地缘力量（放在军阀混战年代，就是桂系和蒋的国民政府了），还无法直接影响到山西高原。因此晋国在春秋之时得以占据明显的地缘优势，并在黄河以西、南以及太行山以东都得以成功地扩张。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当年的晋国即使退出了河西之地，也并未放弃对陕北高原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们还有“孟门”这条战略通道可以绕过秦人进入陕北高原时。只不过对于占据陕北高原之上的白狄，晋人也采取了“和”的政策。至于说白狄东迁后，晋国或者秦国有没有选择马上填补他们的空缺，我们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对于秦人来说，他们的重点还是在于开发渭河平原。如果陕北高原上没有力量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倒也不会急着去占据那些狭小的河谷；而晋国这个巨无霸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内部那几大家族之间的博弈，大家的重点还在于争夺那些地缘潜力巨大的平原地区。

也许在白狄东迁之后，陕北高原真的出现过一段真空期。不过到了战国时期，陕北高原就再也无法游离在地缘政治舞台之外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以晋国继承者自据的魏国（魏国人甚至在官方文件中，以“晋”自称），又开始挑起了秦晋之争。而那位与孙武并称为“孙吴”的战国第一军事天才吴起和他所训练的魏武卒，在为魏国夺取河西之地之后，也顺势向北，沿洛水东岸切入陕北高原。

魏国控制陕北高原，一方面当然是为了预防控制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民族向南渗透（当时被叫做“林胡”）；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防止秦国由陇东高原渗透入陕北高原，对他们的河西之地构成威胁。只不过对陕北高原有兴趣的并非只有秦人和那些胡人，同样来自山西高原的赵人，也对晋人的这条传统渗透路线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从魏、赵双方的地缘结构上来看，赵人向陕北高原渗透应该还更有

优势。因为那个重要的，位于黄河东岸的孟门关口一带，是赵人的控制区，当时被称之为“蔺”地。说到“蔺”这个字，如果从它的使用频率上来看，绝对可以被归入生僻字的行列。不过由于“蔺相如”这位赵国上卿的存在，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认出这个“蔺”字来。而蔺相如的原籍，或者说“蔺”这个姓的发源地，就是“蔺”地。



秦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前期）

当年蔺相如的祖先做赵国大夫时，封地就是在“蔺”地，其后代的姓氏也是得于此。如果从魏、赵两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来看，我们也很好理解为什么“蔺”地是赵国的控制区。因为如果从“蔺”地东行，所对应的盆地就是赵国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太原盆地。赵人要想保证自己在太原盆地的优势地位，以及晋阳城的安全，“蔺”地所在的那部分吕梁山地，都是必须控制的。而魏国所控制的主要是与临汾盆地相对应的那部分吕梁山脉，也就是吕梁山脉的南部。

在魏国最为强盛的时期，魏人不仅在黄河以西跟秦人争夺河西地区、陕北高原；更试图在山西高原向北蚕食赵国所圈定的势力范围。太原盆地的南部和蔺地，都曾经失于魏国之手。在魏人看来，如果能够占据陕北高原和吕梁山脉中南部，就能够对河西之地和太原盆地造成战略压力。特别是沟通这两片山地的“孟门”一线，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话，就能够大大增强魏国的回旋余地了。问题是如果魏人想这样做的话，势必会在黄河两岸形成两线作战的局面。一方面要在黄河以西和秦人对决；另一方面又要在山西高原内部与赵国摩擦不断。而当年的晋国，之所以能够能够一直对秦国保有压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山西高原内部虽然也是纷争不断，但尚不至于影响它的对外政策，或者说能够统一对秦国给予压力。

实际上在战国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三家分晋的初期，三晋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共进退的蜜月期。大家不仅经常协同作战，也经常相互借道。魏国就曾经向赵国借道，灭了中山国。问题是魏国的战略有些定位不清，胃口太大，自始至终没有确定清楚，哪个区域才是战略扩张的方向。

为了更好的控制陕北高原，魏国除了在河西之地建立了“西河郡”这个军政机构以外，还单独将陕北高原的控制区单独分离出来，设立了“上郡”。关于魏国的上郡是否向北延伸到陕北高原的北部，甚至跨越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对接，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不过从魏国的地缘结构来看，魏国在陕北高原和吕梁山脉的扩张，都是以控制孟门渡口这条战略通道为目的。因此魏国希望在黄河以东从赵国手中抢夺“蔺”地的控制权；在陕北高原的扩张，也以将控制线越过孟门一线为战略目标。也就是说，陕北高原的北部以及鄂尔多斯高原并不是魏国感兴趣的地方。这一点在秦国将魏国赶出黄河以西地区之后的战略布局也可以看出。因为在从战略目标上来看，秦国和魏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通过控制孟门两岸的山地，能够给予赵国施加压力。

第三节 秦献公对魏国发起少梁之战

秦国对于魏国的反击，始于公元前 362 年。那时候魏国的第二代英主——魏武侯已经归天了，接替君位的，就是那个后来和齐国一起称王的“魏惠王”。这个时候，魏国对于四面作战的局面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而秦国此时的君主是秦孝公，如果从君主传承的角度来为秦国崛起划定一个起点的话，那么秦献公就是这个时代的开启者。

关于秦献公这个人的细节，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翻阅一下相关历史。比较有趣的是，当年秦献公之所以能够登上君位，正是因为有了魏国的支持。而魏国之所以这样做，则是因为想影响秦国的政局。这和当年秦国扶植重耳登上晋国君位时的想法如出一辙，连最终反戈一击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对于两位君主的选择，当然不能用一般的个人恩怨来看待。只能说，想通过控制某一个人，甚至一批代理人，来影响一个国家或者族群命运的想法，过于理想化。所谓精英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的主角，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够创造历史，而在于他们能够顺势而为。当年的晋文公重耳所顺的势，就是完成政权更迭（曲沃代翼）后的晋国对外扩张的势；而秦献公所顺的势，就是秦人誓死夺回河西之地的势。

为了能够完成秦人收复河西之地的计划，秦献公首先对秦国的地缘结构做出了重大调整。即将原来位于渭河平原西端的国都（雍城，现凤翔县南），迁到了泾、洛两水之间的“栎阳”。这种做法意味着秦人将战略重点从陇东、陇西两大高原上的戎人，转移到占据洛水以东地区的魏国身上了。换句话说，秦人已经不再满足于

在那些戎狄面前称老大了，他们需要集中力量挑战魏国这个“入侵者”了。而公元前 362 年，秦魏之间所进行的“少梁之战”，则正式拉开了秦国反击的序幕。前段时间在网上热播的《大秦帝国》，也正是从“少梁之战”开始的。

从大的背景来看，秦国之所以能够在秦献公在位的最后一年发起反攻（打完少梁之战，秦献公就去世了，继位的就是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除了秦献公对秦国内部进行了包括迁都等一系列的调整，积蓄了相当的力量之外，更是因为魏国的这种多线作战的局面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因为无论是魏国在华北平原，还是渭河平原所扩张的领土，都没有高大的山脉以为屏障，而是只能依靠河流作为与邻国的地缘平衡线。这种缺乏制高点的防线，理论上可以被多点突破（并且可预测性差），也势必需要分散大量的兵力进行线性防御（比例约占三分之一）。此消彼长，魏国能够集中起来与对手进行决战的人力、物力就会大受影响了。



秦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前期)

所以我们常说，最辉煌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只是大多数人在那个时候往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魏国这种四面为敌的做法，客观上为秦国的反击提供了机会。而秦人选择“少梁”作为切入点也是非常精准的，可以说是找到了魏国在河西地区的命门所在。

对于少梁城，我们并不应该感到陌生。在当年秦晋争霸的过程中，以其为中心的“梁国”就经常出现在两国博弈的舞台之上。而梁国后来也在秦穆公“收复”河西之地的过程中被秦国吞并了。前段时间有个成龙主演的电影叫《大兵小将》，里面的时代背景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而对战的两个国家，居然是“梁国”和“卫国”。且不说梁国在战国末期还有没有，卫国除了个虚名和一座城之外还有什么，单从地缘关系上来看，这两个国家即使是在春秋时期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只能说香港导演在为所编造的故事导入历史背景时，态度过于随意了。

先秦的“少梁”大致就是现在的陕西省韩城市。从地形图上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

韩城的位置正处在河东、河西、陕北三个地缘板块的交界处。背山、靠河，面对大平原，其地缘重要性不言而喻。秦人选择由河西之地北部切入，并沿陕北高原南麓攻击“少梁”，如果得手的话，既可以将魏国在黄河西岸的西河郡、上郡两个战略区一切为二，又有机会进而渡过黄河，攻击魏国的河东之地。

“少梁之战”并不是秦献公对魏国所做的第一次反击，四年前（公元前366年），秦军就曾经在河西之地的南线对魏国展开过一次大规模攻击，并且在两年之后（公元前364年），由南线攻入过魏国的河东之地，并在石门（运城市南）一战中斩首六万。

实际上当年秦晋争霸当中，秦国就经常选择南北两条攻击路线来与晋国博弈的。问题是，如果你只是这样的线性攻击，那么即使能够由洛水——河水一线打开一条战略通道，也势必会陷入晋（魏）国的三面包围之中。因此在大部分的时候，秦国即使攻击得手，还是会选择后撤回洛水以西。这种战术上的胜利，更多是对晋（魏）国展示秦国攻击力的一种方式，以压制晋（魏）国深入渗透渭河平原的欲望。

秦献公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对晋国所展开的这场“石门之战”和“少梁之战”，所起到的也正是这种战术作用。因为秦国在取得胜利，并俘获对方主帅之后，不得不再一次地退出了河东之地。在秦、魏双方的地缘实力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几场战役的胜利并不能迅速转化为战略优势。

第四节 秦国完成收复河西之地

如果说秦献公时代，秦、魏两国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的话，那么等到秦献公的继承者——秦孝公继位后，双方的实力对比就开始朝着有利于秦国的方向发展了。按照传统的历史观，秦国之所以能够在秦孝公时代扭转局势，是因为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这当然也是秦国兴盛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根本的原因。

因为战国时代本身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通过兼并小国和边缘民族逐渐壮大的诸侯们意识到，如果再延续周人所创建的层层分封制，那么他们所辛苦扩张的土地，同样会陷入一个分裂再分裂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周王室和晋国公室的结局，也一样会降临在这些诸侯的子孙身上。所以到了战国时期，将土地的控制权集中在公室手中，并将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自耕农，以利于平行化管理的模式，成为大势所趋。换句话说，秦国所进行的改革，其他的诸侯国也在进行。只不过由于秦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商鞅变法”才成为先秦变法最成功的案例。

从变法强国的角度来看，魏国是诸侯中的先行者。秦国所做的改变，更多的是在管理模式上与魏国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真正让秦人有机会夺回河西之地的原因，并不在于秦国增强了多少地缘实力，而在于魏国的地缘实力被削弱了。所谓“此

消彼长”，有时候胜利的天平倾斜，并不一定要等到自己的实力增强，因为你的对手一旦实力受损，也就等于你的相对实力增强了。

魏国的实力之所以削弱了，是因为他们除了在西线必须承受秦国越来越强的压力以外，还因为他们在东线的强势扩张不仅动了边缘大国——齐、楚两国的利益，就连三晋中的另外两个成员：赵、韩也颇有微词，并与之产生了尖锐的地缘矛盾。这期间，公元前354年，因魏国攻赵而引发的齐、魏“桂陵之战”；以及公元前341年，因魏国攻韩而引发的齐、魏“马陵之战”，就是这种地缘矛盾的爆发。

魏国在华北平原与山（崤山）东诸侯们纠缠不清，一方面迫使其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秦人在西线可是一直虎视眈眈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魏国在西线与秦国的对战当中，无法得到赵、韩两国的支援了。单从地缘平衡的角度看，黄河才是山西高原与渭河平原的地缘平衡线。也就是说，如果单纯比较双方的地缘潜力的话，秦人夺回河西之地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这一点，在当年秦穆公时代就已经验证过了。现在魏国虽然在山西高原并向西占据了河西之地，但却得不到赵、韩两国从侧后方的支援，甚至有可能被背后捅上一刀。就算齐国不发难，魏国也很难在西线有所作为。

很难说齐、秦两国在对魏国的战争中有没有进行过沟通。也许更多的是乘对方与魏国交战时，再落井下石吧。总之，齐国在东线施展著名的“围魏救赵”之策时（公元前354年，桂陵之战），秦孝公在西线也再一次攻击少梁得手。这一次，秦国最少在河西之地获得了两个稳定的据点：“少梁”和“元里”（现澄城县南）。8年前，秦献公攻击少梁得手后，又不得不退出去，很大程度是因为魏国得到了赵国的支援。而现在，被魏国围困在邯郸城的赵人，当然不会再去河西支援魏国了。为了同时应对东西两线的战争，魏国并没有选择与秦国进行决战，而是在被秦国所占据的“元里”、“少梁”的东、南侧，修筑了一道新的长城，以阻止秦人吞并整个河西之地。

当魏国决定以防守的姿态来应对秦国时，其实就已经意味着失败了。因为对河西之地势在必得的秦国，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等待魏国在东线耗费更多的人才和物力。更何况魏国的这道长城，相当于默认秦国打通了洛——河之间的战略通道。这样做的战略后果就是，魏国的上郡和西河郡被秦人切割开了。而秦人下一步的战略重点，就是在河西之地的南线将渭河与秦岭之间的那条通道打通。这条战略通道当年曾经是郑国为西周王室所扼守的东大门，即使是后来秦、晋两国在这里所建立的城邑，也还是以“郑”来命名。

秦人希望得到郑国故地，倒也还不是为了进一步占据崤函通道，以便入主中原。因为如果不能占据河东之地，就算得到整个河西之地，也无法控制崤函通道。秦国这样做的最大目的，是可以从三个方向包夹魏国龟缩在长城之内的“西河郡”。而随着魏国在东线战场的败退，秦国终于在公元前330年“收复”了河西之地。失去了河西之地的魏国，又在与赵国争夺蔺地的战争中，未能占据上风。魏国设立在陕

北高原的“上郡”，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对于魏国来说，收缩防线，固守河东之地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丢失西河郡两年之后，即公元前 328 年，魏国将上郡 15 城和平的交割给秦国，以期和秦国达成划河而治的局面。

其实魏国对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是否会继续图谋它的河东之地，心里也是没底的。毕竟自春秋以来，秦国曾经多次攻入过河东之地。只不过由于晋国和魏国的强大，秦人的这些攻击在达到了战术效果后，并没有长期据有。而现在，魏国已经能够感觉到自己独木难支了，或者说已经很难同时应付东西两线的地缘压力了。因此早在秦献公攻击少梁城的那一年（公元前 362 年），魏国就在中原腹地设立了东都“大梁”城，并对宋、楚展开了一系列蚕食战争。在公元前 339 年，马陵之战失败后，魏国正式将都城从运城盆地的安邑迁到大梁。

大梁城政治地位的提高，并不能说魏国就此放弃了对河东之地的经营以及保住河西之地的希望。但却明白无误地发出一个信号，即魏国已经将战略重点转向了东线，并希望在地缘形势更为复杂、合纵连横施展空间更大的华北平原打出一片新的天地。换句话说，就是一直在为向东还是向西而苦恼的魏国，已经彻底放弃吞并整个渭河平原的想法了。

第五节 秦国拓展新空间的方向

对于秦国来说，从魏国手中拿回了河西之地当然是一件可喜之事。但作为略带争议的春秋五霸之国和毫无争议的战国七雄，立国以来未能真正地进入中原争霸，一直是秦国的心结。也可以说能够入主中原，是每一个大国的梦想，秦国当然也不会例外。不过与晋人（三晋）数百年来地缘博弈，让秦人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从魏国手中夺取河东之地，那么就无法打通崤函通道。而秦人如果想从魏国手中夺取河东之地，就将要面临更大的困难了。

因为虽然魏国的四处征伐，将赵、韩两个兄弟之国都得罪了，但在国际争斗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赵、韩两国可以坐视魏国失去河西之地而不去救援，但如果秦人深入山西高原的话，为了保住各自的利益不受损害，三晋又会达成战略同盟，以共同应对崛起的秦国。而秦国如果想仅凭渭河平原和周边那几块高原的地缘潜力，和整个山西高原加上三晋在华北平原所拓展的疆土 PK 的话，并没有什么胜算。即使是挟占据河西之地的余威挺进河东，也无法长期占有。所以秦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拓展空间，这个空间必须是一个拥有大块平原的地理单元，其地缘潜力最起码要能够和三晋在华北平原所获得的领土相媲美。

对于渭河平原上的秦国来说，如果暂时不能进入河东和华北平原的话，那么秦人理论上的扩张方向就剩下北、西、南三个方向了。早在秦人进入周人的政治体系

之时，渭河平原的北面就是秦人一直关注的方向。不过秦人关注这个方向并非为了拓展新的生存空间，而是为了防御从陇东、陕北两大高原下来的戎狄侵扰渭河平原。这个战略任务，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只不过在西周时期，秦人这样做是为了王室，而现在则是为了自己。

如果秦人一定要往北走的话，也并非没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的地理单元以供选择。沿着黄河而分布的西套、后套、前套三个河套平原，就可以成为秦人的战略目标。只不过要想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取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这片干旱之地始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而相比之下，征服了山西高原北部的赵人，则更有机会顺势向西征服前套、后套平原。

向北走固然困难重重，但如果直接向南扩张的话，秦人更没有机会，因为渭河平原南面的秦岭，比之太行山、燕山更难逾越。这个纵深和体量都足够大的山脉，甚至成为中央之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直到现在，它还是动植物的天堂。根据一般规律，凡是适合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地区，也就是人类的禁区。如果有足够的毅力和需要，也并非不能在其中开辟道路；但想让秦岭本身为秦国的征战提供直接帮助，则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虽说北面的那几个高原和南面的秦岭不能为秦国提供太大的地缘潜力，但也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秦国所占据的渭河平原才能够成为让人羡慕的“四塞之地”。问题是身在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秦人的志向不可能只是自保了。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安全，而是耕地。只有拥有了大片的耕地，才能为秦国养育更多的人口，以支持秦国的东征。现在秦人只能把目光再次投向秦人的发源地——陇西高原（陇右）了。

在先秦和之后的历史中，陇西高原都是以渭河平原外围防御者的面目出现的。为了关中的安全，渭河平原甚至要经常性地向陇右地区输血。对于陇西高原的地缘潜力，秦人心里面比谁都清楚。如果想将它打造成为另一个渭河平原，无异于天方夜谭。

秦人之所以重新把目光投向陇西高原，是因为通过陇右可以绕过秦岭。而通过陇西高原，贴着秦岭的西沿向南一直走的话，可以到达一个比关中盆地（渭河平原）体量还要大的盆地——四川盆地。

第十八章 蜀国以川西平原为核心区

第一节 四川盆地的地理结构

并不是说每一个盆地型的地理单元都能够提供大片的耕地，并适合人类大规模的生存。不过秦人在思考是否要向四川盆地扩张时，倒并不会为这点而担心。因为在他们还生活在陇西高原时，就已经知道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存在一个富庶的，神话般的国度——蜀国。实际上，横亘在渭河平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障碍，除了秦岭之外还有一条“大巴山脉”。穿越这条山脉的难度，并不会比穿越秦岭低多少。不过秦人既然已经选择了西出陇山，绕道陇西高原，再南进四川盆地的路径，倒也不用横穿大巴山脉了。因为大巴山脉基本与秦岭平行，从陇东高原出发的秦人，既可以绕开秦岭的主脉，也可绕开大巴山脉的主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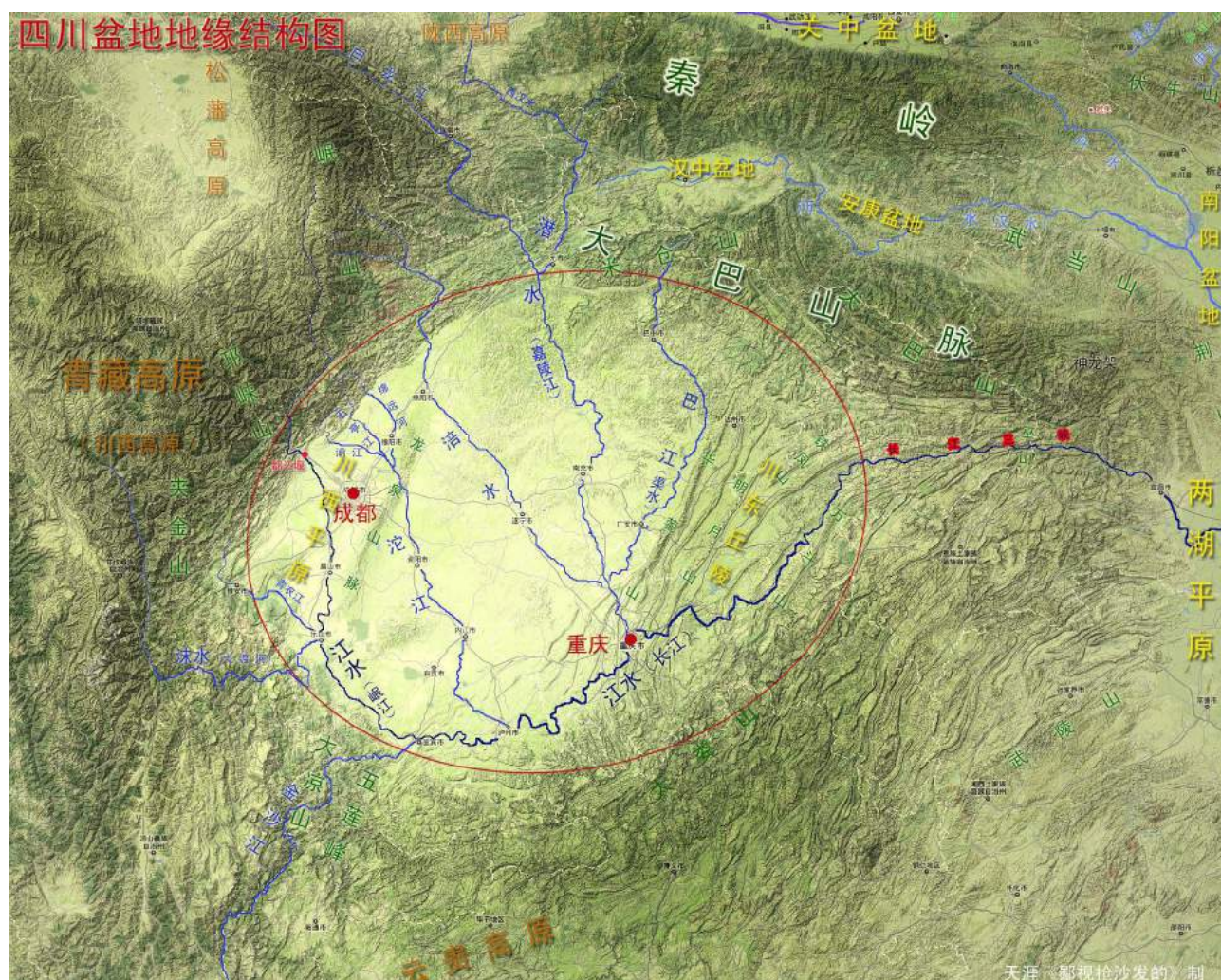
从战略的角度看，能够绕过秦岭、大巴山脉，固然是件可喜的事，但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在秦岭、大巴山脉的西侧就是由青藏高原向东延出来的山地，这些山地之间并没有给秦人留出一条宽阔平坦的战略通道。也就是说，如果秦人要进入四川盆地，还是不得不在山地的缝隙中寻找出路。而即使是秦人有办法打通这些“蜀道”，当他们进入四川盆地后也会发现，他们的对手并非只有“蜀国”。在这个体量庞大的盆地中，最起码还有一个和蜀国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国家——巴国。而四川盆地这两个竞争者之间的恩怨，其实在秦人立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巴、蜀之间爱恨交加的地缘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在重庆获得直辖市的身份后，巴蜀之间的地缘文化差异甚至从官方层面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要想了解巴、蜀两种地缘文化产生的前世今生，我们还是要从四川盆地的地理结构着手。如果从盆地的构造来看，四川盆地的整体形状应该还是比较完美的。比起黄土高原上的那些条状盆地，四川盆地有着近乎完美的轮廓。像这种接近于标准圆的地理单元，理论上的地缘中心应该是位于它的圆心位置附近，并以此为中心均匀的向外围辐射它的地缘影响力。

在四川盆地以外的人看来，整个四川盆地也的确像是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而这个文化圈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应该就是“麻辣”了。不过正如山东内部其实是可以分离出“齐”、“鲁”；江东可以有“吴”、“越”这样的亚文化圈一样，四川盆地内部也是有两种实力相当的地缘文化并存的。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整个四川盆地的地缘中心，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位于盆地中心，而是在东、西两侧各形成了一个地缘中心。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这两个地缘中心就是成都和重庆；而如果从地缘的角度来划分，这两个位于四川盆地的亚文化圈就是位于川西的“蜀”和位于川东的“巴”。至于为什么同一个盆地内部会有两种地缘文

化产生，当然还是跟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

在切割地缘板块时，山地的作用往往是最大的，然后才是水。就像齐鲁的分割线是泰沂山脉；越文化之所以与吴文化之间有区别，是因为杭州湾以南主体为浙闽丘陵，其地貌与太湖流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一样。巴蜀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正是由于所在位置的山地密度不同而形成的。如果从四川盆地的整体构造来看，这个盆地是被一系列的高大山脉所包围的。北面是与秦岭属于同一级别的大巴山脉（内部又可分为米仓山和大巴山两块）；西、南两面则与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对接。至于东面，大巴山脉和云贵高原延伸出来的那些山地，所形成的大片条状山地，不仅有效的合围了四川盆地，还让这一地区在近代史上成为著名的盛产土匪的区域。



四川盆地地缘结构图

相比于盆地边缘的这些高大山脉，四川盆地内部的山地丘陵，无论是从密度还是高度上来说，都要小得多。但这些分布在盆地之中的山地丘陵，已经足以让四川盆地产生出各具特点的地缘文化了。从空中俯视整个四川盆地，我们会发现盆地东、西两侧的地形有明显的区别。整个盆地的中、西部基本属于平原丘陵地区，其间错

落地分布着一些丘陵。其间最为明显的一处山地，就是呈南北走向的“龙泉山脉”。这条细长的山体，将四川盆地西端的平原从整个平原丘陵区切割出来。而这块位于盆地西侧，被龙泉山脉切割出来的地缘单元，被称之为“川西平原”。由于它的地缘中心是成都，因此也被称之为“成都平原”。当年也正是蜀文化的核心区；而在盆地的东部，地形明显就要复杂得多了。

如果说龙泉山脉在盆地的西侧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的话，那么在东部，与龙泉山脉形态和走势相类似的山体，就不止一条了。这些整体呈流苏状的山体，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大巴山和云贵高原之间，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它们的地理学名称叫做“川东丘陵”（或者“川东山地”），而当年巴人活动的核心地区就是在川东丘陵和大巴山区。

相比于其他丘陵区，川东丘陵的结构是比较独特的，基本都是由北至南的长条状山体组成，其中最西面的一条山地叫做“华蓥山”。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华蓥山”是四川盆地腹地平原丘陵区与山地区的分割线，而它的南端所指向的就是现在巴文化的地缘中心——重庆。对于重庆和华蓥山的地缘关系，我想大部分人是通过《红岩》和江姐的故事中知晓的。儿时一直感到扼腕的是，双枪老太婆的“华蓥山游击队”行动晚了一步，没能救出渣滓洞里的江姐和小萝卜头。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川西平原和川东丘陵分别是蜀、巴两国，或者说两种地缘文化活动的核心区。就“川东丘陵”的形态而言，更应该被称之为“川东山地”，更专业的名称则是“川东平行岭谷”。因为这些条状分布的山地，之间形成了很多条大落差的谷地，其相对落差甚至可以达到上千米。用丘陵来概括它的形态，的确有点委屈了。

相比于川东岭谷纵横的地理结构，川西平原可以说是标准的平原区了，所谓“天府之国”的美誉，其实指的就是这块平原。而川东和川西之间的川中地区，主体则是被低矮丘陵所覆盖，属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区。也正是由于巴蜀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截然不同，造就了现在成都文化和重庆文化之间的差别。至于这期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那些对两地女生都有过接触的男士应该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为什么川西平原能够诞生“蜀”文化，其实很好理解，农耕文明所最喜欢的地形就是这种大平原地区。不过在上古时期，平原地区往往并不一定当然地就成为人口密集区。因为那些制造冲积平原的河流并不会因为人类的到来，而当然地停止冲积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它们仍然会按照自己的轨迹，周期性地用洪水来对平原地区做一个平整工作。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哪个民族，要想在平原地区创造文明，都需要有一定的治水能力。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诞生蜀文化，并长期成为整个四川盆地的地缘中心，则是与蜀人的治水能力分不开的。只不过这笔功劳被长期记在秦人的头上罢了，至于这个中的缘由，在接下来的部分中都会一一解读的。

相比于蜀国的昌盛，巴国能够在先秦时期取得与蜀国对等的政治地位，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从地理形态上来看，川中的丘陵地带，应该比川东的这些岭谷山地，

更有条件孕育出新的地缘文化，最起码农业条件会更好些。那么到底巴国具有什么样的地缘优势，使得它能够在先秦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呢？我们在解读完蜀国之后也会揭晓答案的。一般而言，每一个知名的地缘板块，都会有一个反映其地缘特色的词组为我们所熟知。比如提到青藏高原，大家就会想到“世界屋脊”的高度；说起江南，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鱼米之乡”的场景。而我们所要解读的四川盆地，其地缘特点则被传神的概括为“巴山蜀水”。短短四个字，巴、蜀之地的地缘特点便跃然纸上了。的确，在“蜀”的地缘文化中，水所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而“巴”这个族群，山地民族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这并不代表山地对于蜀文化，河流对于巴文化就没有影响了，只不过是影响力大小不同罢了。

从河流的角度来看，整个四川盆地主要是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也叫南江河，先秦时期叫“巴江”）五条南北向的河流，加一条东西向从盆地南缘穿过的“长江”共同覆盖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5+1”结构之间的关系：一是涪江、嘉陵江、渠江这三江在未注入长江和切入川东岭谷之前就已经先行合流了（合流的位置就在华蓥山的东南角，这个点也因此被命名为“合川”），也就是说三江可以归为同一水系；另一个问题是，从长度而言，那条贴着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直达青藏高原的“金沙江”应该是长江的上游。但在两千多年前，先民们可没有技术和能力去探究谁才是长江的正源。在他们眼里，位于四川盆地西侧，发源于岷山之侧的“岷江”，才是长江之源。换句话说，“四渎”中的江水，是被认为从蜀地流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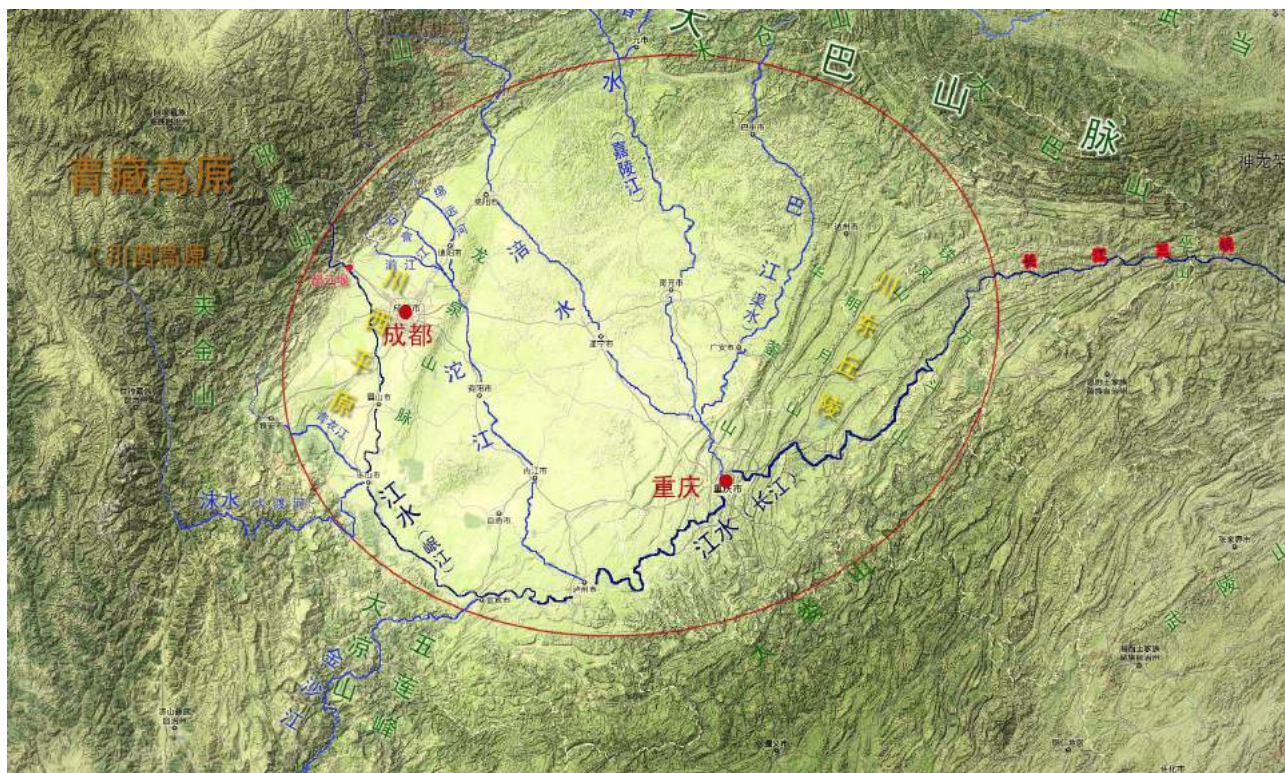
对于“江水”这个概念的认定，有助于我们理解成都平原与江汉平原，乃至江东平原的地缘关系。在古人看来，能够共饮一江水的族群，应当有更为密切的地缘关系。更何况同在一条大江的上、中、下游，江水本身就能够成为彼此间的联系纽带。这点在三国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二节 蜀人和秦人治理川西平原的水患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蜀人所控制的川西平原是由岷江和沱江两江冲积而成的。不过一般河流中，其大块平原主要分布在与其他河流或者海洋交汇处，这种两水交汇处往往会形成“三角洲”式的平原。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水流的运行方向不同，在相遇之后流速会变慢，河流中所带来的泥沙也就更容易沉积下来。但在观察岷江和沱江两水与长江相交处（宜宾和泸州），却并没有出现大块的平原区。相反，位于两江中流的川西地区，却成为让人羡慕的“天府之国”。要说川西之所以能够得到上天的青睐，最应该感谢的还是那条龙泉山。如果龙泉山座落在川东的话，也无非是为川东增加一条纵谷罢了。但它横亘在川西与川中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就大得多了。

由于龙泉山的存在，整个成都平原其实可以被看作一个盆地区的。因此从地理

学的角度看，成都平原有时也被叫做“成都盆地”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成都盆地的形态比现在更像盆地（至于有多久，专业的地质学家会告诉你的，总之是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海拔要比现在低得多。从川西高原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脉络分明的在盆地中流淌，而是首先在成都盆地中形成一个湖泊。当然，这些流入成都盆地的河水在经过最初的蓄水之后，还是会再经河道透过龙泉山脉的缝隙漫流入川中丘陵地带的。也就是说，并不能说来自高原的河水，当年就没能滋养川中大地。



四川盆地地缘结构图

不过有了龙泉山在中间一拦，对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地理结构还是造成了重大影响。因为那些从川西高原顺流而下的河流，所带来的大批泥沙甚至砾石，大部分都沉积到龙泉山以西的这个湖泊中了。随着湖底被逐渐淤高，川西的地理形态也逐渐由湖泊转为湿地，最后演变了沃野千里的平原。而从高原上下来的岷、沱两江，在龙泉山冲出一条水道后，能够留给川中的“干货”已经不多了。如果没有龙泉山的存在，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形应该会更趋于一致，并且在河流的两侧形成相对较宽的条状平原带。如果是那样的话，蜀国的地缘中心究竟在哪，那就不好说了。

虽说依靠自然的力量，川西成为四川盆地最有潜力的地区，但如果没有人类的改造，这种潜力并不会想当然的为人类所用。说得再清楚点，大自然的力量一般只是将湖泊或者山间岭谷填充为湿地状态就止步不前了。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河流的走向及分流洪水的话，这些淤积出来的平整土地，即使硬化了，也很容易在雨季到

来时变身为沼泽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在华北平原，还是在江汉平原、江东平原，都流传着先民治水的故事。而在人类还没有具备改造河流的能力之前，先民们会更喜欢生活在易于躲避水患的丘陵地区。也许在环保主义者看来，那些将湿地变身为农田的行为就是在破坏生态平衡，就是在犯罪。不过如果你把人类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并承认“人”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的话，就会感谢先民们所做的那些努力了。

长期以来，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功劳被记在了秦人身上。之所以会有这种理解，很大程度是拜司马迁所赐。因为他在《史记》中记录了，由秦国任命的蜀郡太守——李冰为成都平原打造了一套水利系统，而这套水利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都江堰”了。不过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史书中所记录的其实只能说是史官们所知道的事实，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放在以打造“都江堰”工程为代表的成都平原水利系统这件事上，秦人并非最大贡献者，或者说“天府之国”的形成并非源于秦人的到来。真正将成都平原变得千里沃野的还是蜀地的先民们。

之所以说秦人不是成都平原的最初改造者，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秦人之所以要绕过秦巴山脉进入四川盆地，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川西地区有机会改造成为又一个渭河平原，而是因为蜀人已经在此成功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也就是说，蜀人已经掌握了在成都平原上生存的技巧，并成功地将成都平原变身为农耕区了；另一个原因则是秦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善于治水的族群。如果成都平原只是一个待开发地区，秦人并不会有信心为成都平原设计出一整套水利系统。

秦人的不善治水，后来甚至被韩国所利用。在公元前 246 年，韩国人密谋让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帮助”秦国人改造关中地区的水利系统。这样做的目的，则为了让秦国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国内，从而迟滞秦国的东进。不过最终的结果是，“郑国渠”修好了，韩国也被灭了。事实上，秦人对成都平原的贡献，更多的只是在蜀人治理成都平原工作上的一个延续。就像不管哪个边缘民族入主中原后，都一样要将治理黄河作为头等大事处理一样。而就李冰的个人身份而言，很可能是蜀国遗民。即使的确是秦国派遣过来的官吏，为他出谋划策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应该是熟悉当地情况的蜀人。

由于蜀国长期偏安于西南，因此在正式的记录中很少能够看到蜀国的资料。不过幸运的是，现在的我们除了研究文史以外，还可以通过“考古”这种更为客观的方式来窥探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说到成都平原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当然要属“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了。三星堆所代表的蜀地文明，最远可以追溯到 5000 年前。也就是说，早在那个时期，蜀国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疏导成都平原的河流，将之逐步改造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了。

观察“三星堆”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它是位于岷江以南，属于沱江流域范围。沱江在四川盆地诸河流中，是一条非常奇特的河流。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其在龙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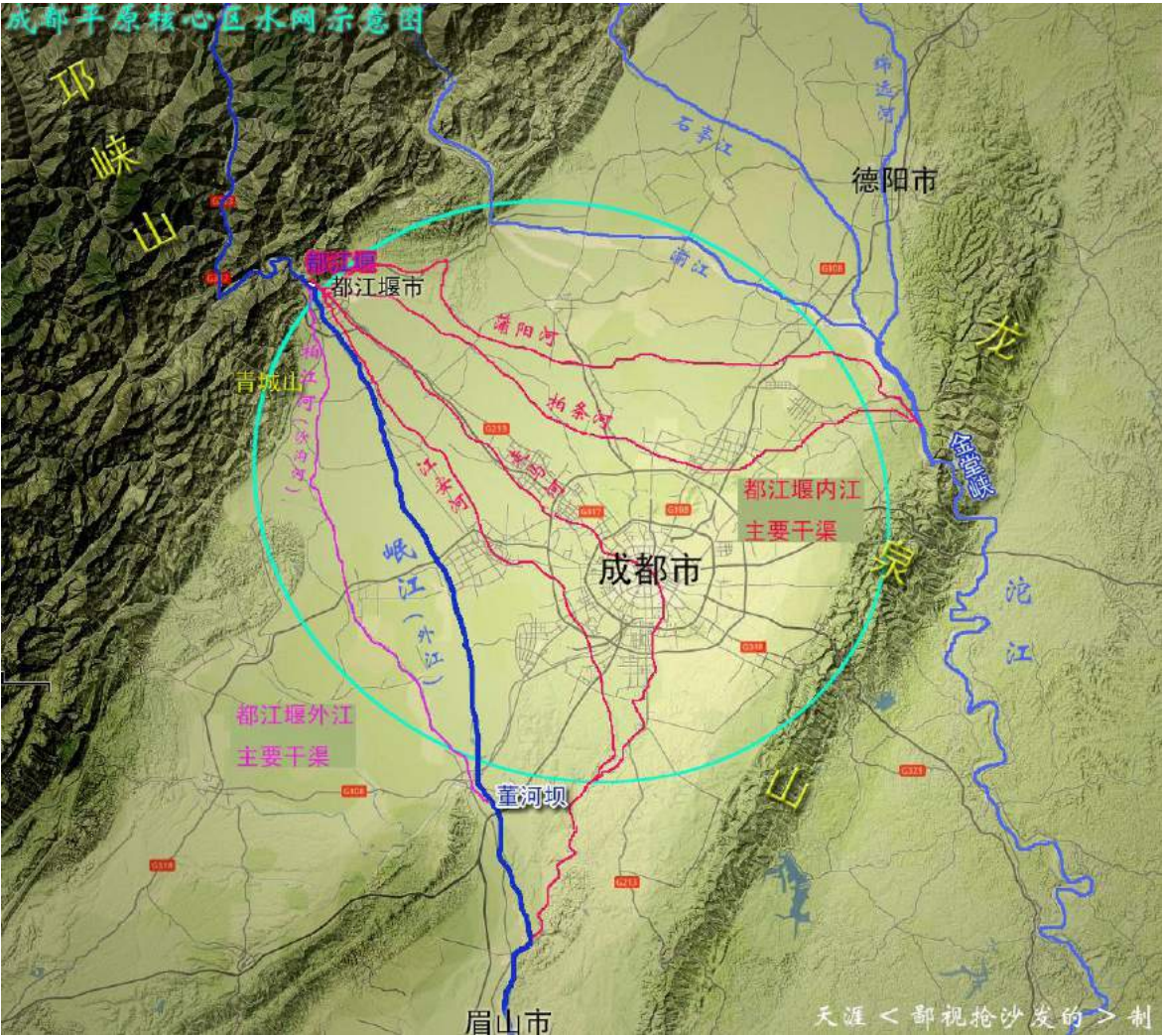
山以东部分为三条支流，分别是湍江、石亭江、绵远河（这条最长，被认定为正源）。一般而言，河流的上游在山地之中由几条支流汇集而成是常见的。但在进入平原区各自流淌一段距离之后，再合流为一股的情况就不多见了，这很大程度还是因为龙泉山脉的存在。在山脉之中，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龙泉山的存在，三条河流也许会各自独流入江了。

沱江上游的这三条支流，在成都平原北部所形成的这种天然扇状河道，不仅让沱江水能滋养更多的土地，也有利于分洪。当然，蜀人要想在此生存，还会在这三条支流的基础上，再引导出更多的细小沟渠，以让沱江水覆盖再多的角落。像沱江



古蜀国地缘结构图

这种自己构筑水利网的情况并不多见，也正是因为改造沱江流域的难度相对较小，古蜀人才最终选择先行进入成都平原的北部，并由此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三星堆”遗址。相比于“善解人意”的沱江上游，位于成都平原南部的“岷江”，也就是被古人认定为是“江水”上游的这条江，情况就要“正常”得多。这个“正常”并非是说岷江的形态更利于人类的生存，而是指它和绝大部分河流一样，从山地下来后就只有一条河道。并且和很多大江大河一样，流量很不稳定。



成都平原核心区水网示意图

在《古蜀国地缘结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岷江与沱江上游南支——湔江之间有一大片空白区，而成都市就是位于这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在尚未得到有效治理之前，岷江——湔江之间的这片区域，是一个旱涝不定的区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跟岷江的水量有很大关系。从现在的定位来看，岷江是长江上游第一大支流。而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岷江都是以长江上游正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无论是做主角，还是第一配角，岷江那巨大的水量都可见一斑。当川西高原暴雨成灾时，岷江上游的水量暴涨，就会漫过河岸将整个成都地区变成一片泽国；而当川西高原

进入少雨季节后，水量减少的岷江又会老老实实在河道中流淌，并从成都平原的下方穿越龙泉山去支援长江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蜀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来治理岷江的水患，并让岷江水为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一是想办法拓宽、加深岷江的河道，并在它两岸筑堤（就像治理黄河一样）。让它那巨大的水量，能够以固定的路线流入长江；另一方面，则可以从岷江两岸的河堤中，沿线构筑分流点，引出水渠，以覆盖成都平原上的农田。想到这两个方案，并不需要特别高的智商，因为这也是农耕民族治理水患的常见方法。只是这样做的话，固然有机会解决岷江的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让都江堰工程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标志性工程。也就是说，当年的人们有着更为巧妙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节 都江堰工程的结构和原理

首先我们来看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泥沙问题。应该说都江堰工程的自然条件要好很多，首先相比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水土保持要好很多，因此岷江水的含沙比例要小于其他黄河干支流；其实岷江在进入成都平原前后的落差很大，流速较快，因此泥水沉积的速度也慢得多。不过只要是河流，总是要携带泥沙的，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泥沙的排放问题，都江堰的下游灌溉水渠亦无法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润泽成都平原。而这一切，都与“都江堰”堰首工程的精妙设计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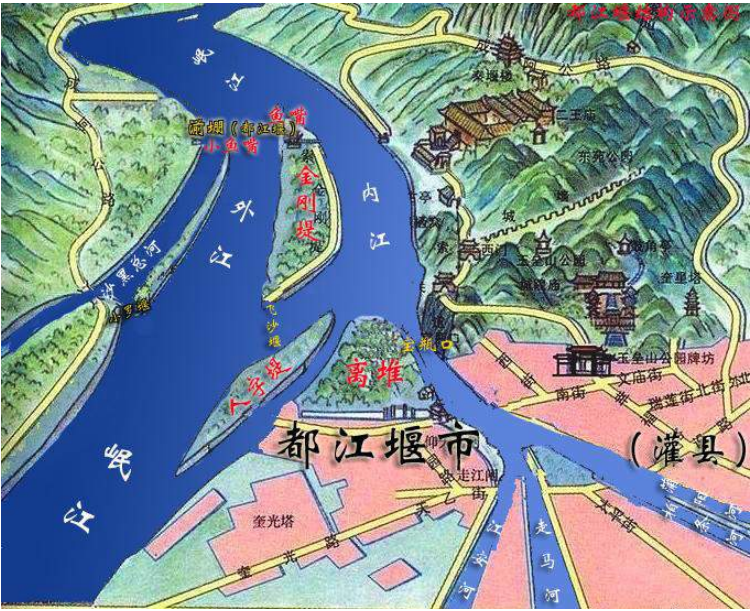
宝瓶口

如果仅仅是为了将部分的岷江水分流至成都平原腹地，那么在江水泄入平原之前，在河道的右侧打开一个缺口，并挖掘相应的引水渠就应该可以了。这项工程也的确已经做过了，在都江堰工程中，这个引水口叫做“宝瓶口”，而那块被分离出来，起着分水作用的山体，被称之为“离堆”。虽然在先秦的技术条件下，要想在山体之中切割出一个缺口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没有火药，用的是火烧后再浇水，逐层剥离岩石的方式），但这种开凿于石质山体之中的分水口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坚固耐用，其分水岭（这项工程中的“离堆”）不至于因为河水的冲刷而湮灭。

虽然离堆的开凿可以让成都平原有水可用，但在解决水的流量和泥沙沉降方面

还是存在问题。因此都江堰工程在离堆之北，又进行了一些辅助工程，而正是因为这些工程的修建，才真正使得都江堰工程成为千年工程。在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分水“鱼嘴”的修筑。所谓“鱼嘴”，其实也是一个分水口，一个比宝瓶口更早一步分水的“分水岭”。之所以要在“离堆”之北再修筑一个“鱼嘴”，就是因为希望岷江水在流入宝瓶口之时，就已经分配好水量，或者说保证流入成都平原腹地的江水，保持一个恒量。至于这个恒量是多少，惯于记录历史的华夏族（包括蜀人）会有准确的数据。按照过往的经验基本就是，枯水期水量的 60%；丰水期水量的 40%。



都江堰结构示意图



都江堰工程示意图

由于宝瓶口的宽度只有 20 米，宽度要远小于岷江的整体宽度，因此要让依靠这样一个小的引水口，将半数左右的岷江水引走，看似有些困难。不过即使我们只掌握基础的数学知识，也会知道，影响流量的实际是河道的横截面。而所谓的江面宽度，只是影响流量的一个数值而已。如果能让宝瓶口的进水，与仍旧依原路流入长江的江水，处在接近的数值，可以变通的方法就是将宝瓶口一侧的河道挖深（同时宝瓶口也要开凿得足够深），以增大引水面。也正因为如此，当年李冰才会想到利用离堆之北的沙洲，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分为内、外两江。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封闭沙洲东侧的内江（鱼嘴东侧筑临时围堰），然后以人力将内江河道挖深。由于沙洲本身并不十分稳定，因此在沙丘的东侧，靠近内江

一面，需要构筑一道长堤，以保证河道的稳定性，这道长堤现在被称之为“金刚堤”。

既然沙洲之北的“鱼嘴”已经取代了离堆，成为分水岭，那么它的稳定性也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它在承受正面水流的冲击）。问题是以沙洲本身的结构，是无

法和与天然形成的石质“离堆”相比的。现在的我们当然可以用打桩，并灌注钢筋混凝土的方式来建分水堰，但在整个古典时期，你并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建筑一条能够与地下岩石相连而足够牢固的“鱼嘴”。



都江堰鱼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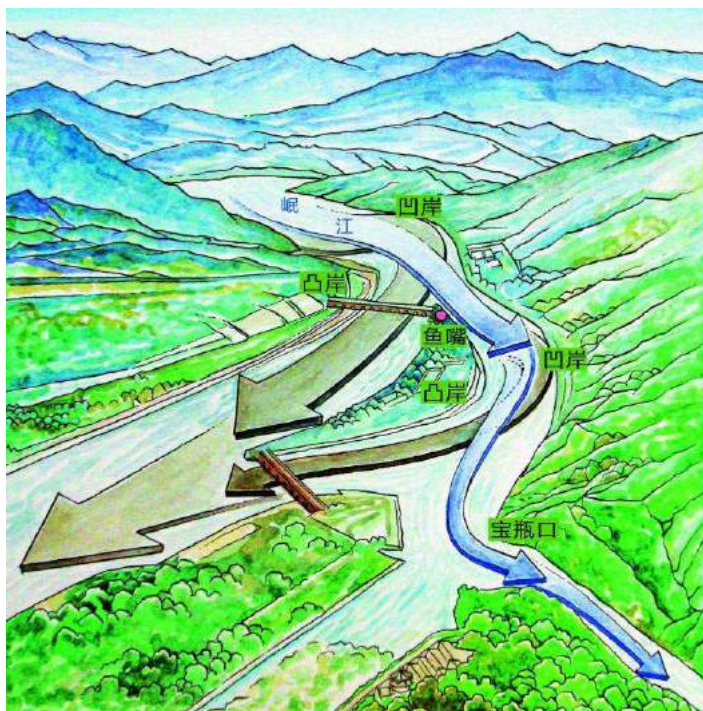
杓搓（竹笼装石）

可以肯定的是，李冰和蜀人当年肯定尝试过以石头直接加固沙洲的方法，但即使你能搬运来千斤巨石，在强大的水流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因此最终构筑“鱼嘴”的材料，是一种叫做“杓搓”的“复合”材料。说它复合，是因为杓搓是由竹子和石头组成的。简单点说，就是用大竹笼装满石块。用这种杓搓来构筑鱼嘴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增加材料单体的重量。收集小块的石头，并用竹笼包裹做成“杓搓”，比开采、运输同等质量的巨石要容易得多；二是杓搓之内的石头并不是一个整体，石缝之间可以分流掉部分水流，这样就减少了正面的压力，增加了鱼嘴的稳定性。

虽然用竹笼装石这种办法来构筑分水堰，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但它却保证了内江和都江堰工程的千年稳定。期间也并非没有各朝代的官员尝试用他们觉得更为可靠的方式，来做分水鱼嘴，比如元、明时期，就曾用铁铸的龟、牛来做这件事，只不过最终都被冲得不知所终了。用杓搓这个土办法，虽然难看点，也会有损坏。

虽然用竹笼装石这种办法来构筑分水堰，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但它却保证了内江和都江堰工程的千年稳定。期间也并非没有各朝代的官员尝试用他们觉得更为可靠的方式，来做分水鱼嘴，比如元、明时期，就曾用铁铸的龟、牛来做这件事，只不过最终都被冲得不知所终了。用杓搓这个土办法，虽然难看点，也会有损坏。

但即使是损坏了，由于材料的可塑性强，也很方便修补（为了保证这些“杓搓”能结合在一起，外面还会用木头交叉固定）。



都江堰水流和泥沙流向图



都江堰飞沙堰

现在由于混凝土技术的成熟，在鱼嘴已经见不过杓搓分水的情景了，据说为了“思古”，还弄了两只铁龟、铁牛放在前面点缀。不过在每年“岁修”内河河道时，杓搓仍然是用来临时截流内江水的材料。而之所以要“岁修”内河河道，就和我们将要说到泥沙沉积问题有关了。

当年蜀人和李冰在修筑都江堰工程时，应该没有想到他们深挖内河水道的做法，还解决了泥沙分流这个世界性难题。因为根据弯道水流的规律，当江水流至分水鱼嘴时，表层水流会流向地势较低的“内江”；而底层水流则流入了外江。因此，质量更重的沙石也大部分随之分流入了外江，并按照原路流入了长江。而内、外江河道纵深的不同，还很大程度解决了一个流量的问题。因为相比于窄而深的内江河道，外江河道就变得宽而浅了。由于二者几何截面的不同，水位越高，外江所流入的水流比例也就更大。从而形成了都江堰工程，枯水期 $4/6$ (内 / 外)，丰水期 $6/4$ (内 / 外) 分水的大致比例。

不过即使是内、外江的河道因为河道截面的不同，可以很大程度调整岷江水的分水比例，但在丰水期流入内江的水量，从整体上还是高于枯水期的，特别是在那种多少年一遇的洪水来临之时。通过内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还是会有显著提升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江水流入宝瓶口之前，再做一项工程，以在丰水期进行二次分流了。这就是都江堰工程的最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飞沙堰”。

所谓“飞沙堰”，就是在鱼嘴、金刚堤所在的沙洲之南，与离堆的接合处打开

一个缺口，并构筑一道堤堰（材料还是杓搓）¹。这道堤堰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有时会露出水面，有时却又低于水面。当内江水位较低的时候，它能够起到和金刚堤同等的作用，让内江水平稳的跨过宝瓶口；而当水量过大时，多余的江水又会从堰顶漫过去，回流到外江之中去。更为精妙的是，由于宝瓶口的宽度有限，内江水流到此时会先冲击宝瓶口东侧的崖壁，再向西形成旋流。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那些在鱼嘴没有被完全带入外江的沙石，就会被甩过二次分流的堰体，飞沙堰也因此而得名。

这项补充工程对于洪水季节的调水、调沙尤为重要，并且水流越大越急，排沙效果越好（离心力越大）。这点倒很像太极之中的“以柔克刚”，遇强则更强。当然，由于水流在宝瓶口收窄，还是会有部分泥沙在此沉积下来。不过依靠每年封闭内江的“岁修”，以足以用最小的代价，来保证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了。

第四节 川西高原和川中丘陵的地理特征

虽然都江堰工程对于川西平原的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究其根本，川西平原能够成为四川盆地的核心农业区，它本身的地理构造还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有着平整而又肥沃的土地（都是当年作为潟湖时带来的好处），加上岷、沱两江充沛的水量，纵有再好的构思，也很难让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也就是说，只要岷江水还能够保持现有的流量，成都人民应该还是能继续安享他们的太平日子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有人要想把整个青藏高原独立出去，成都人民应该是第一个提出反对的（想想雅鲁藏布江的水坝）。

不过上帝在打造地球的模样时，并不是对每一个地理单元都那么厚爱的。有时候一个地理单元的条件太好了，与之相邻的地理单元往往就没那么幸运了。成都平原上的居民固然能够凭借对河流的改造让自己过上小康生活，但位于成都平原西边缘那些山地之中的居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大的地理构造上来看，这些山地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东边缘。鉴于它们目前在行政上被划归四川所有，因此也可以单独被标注为“川西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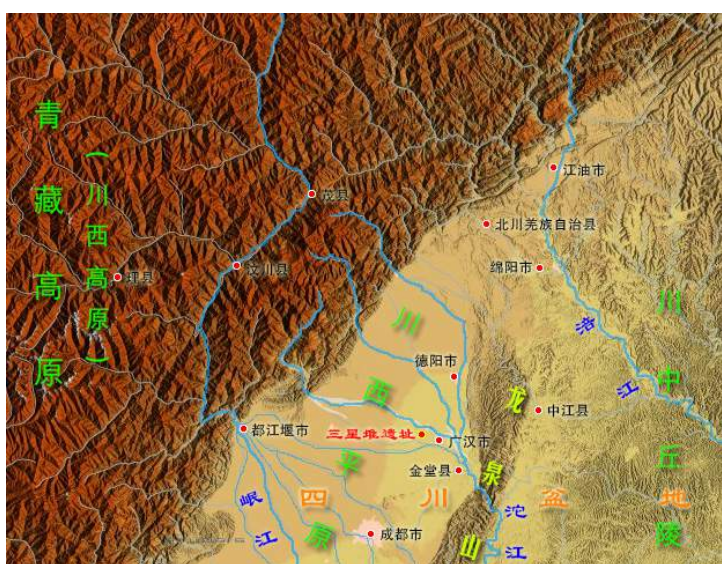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顺着岷、沱两江上溯到川西高原，就会发现沿着成都平原西侧有三个曾经让所有中国人为之牵挂的地名：汶川、茂县、北川。假使我们只是看平面地图，一定会发现这三个县离成都、德阳、绵阳这些川西平原之上的城市很近，近到让人觉得他们也应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而当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再看看地形图，相信大家就能够深刻理解当年救援工作的无奈了。也能够明白，为什么占据优势地位的汉族，能够容忍那些残存下来的羌人在这聚居。

对比于川西高原，川中丘陵的地势要显得平坦多了，不过与川西平原依靠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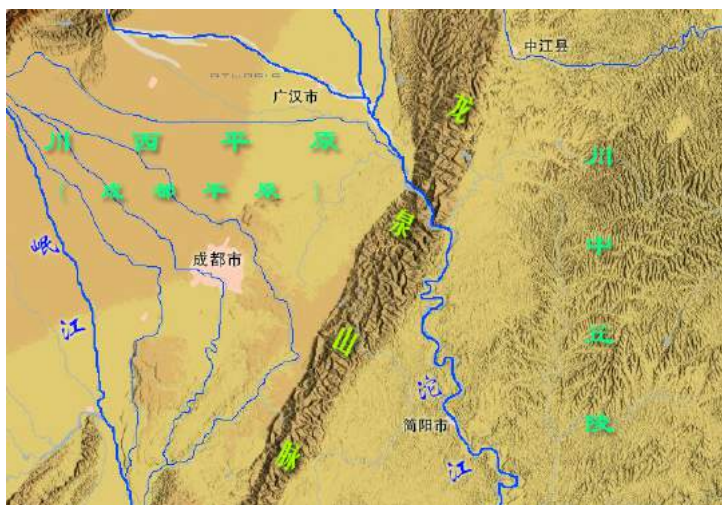
1 古时飞沙堰是用竹笼卵石堆砌的临时工程；如今已改用混凝土浇筑，以保一劳永逸的功效。



沱江（资阳境内）



川西平原地形图（一）



川西平原地形图（二）

成的“嘉陵江水系”所覆盖。

岷两江而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有所不同，川中地区并没有从沱江以及岷江之中得到太多的帮助。因为这两条穿越了川西平原的河流，在进入川中地区后（主要是沱江），会发现周围的地势突然变高了。虽然下游的地势变得更高了，但奔流而下的江水还是会遵循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否则它们也流不进长江。最终的结果就是，沱、岷两江的下游河道往往与两岸的地势有数十米的落差。换句话说，在人类可以用电能将水大幅度地抽高之前，整个古典时期，岷、沱两江的干流并无法为那些丘陵之间的土地提供农业用水。

虽然川中丘陵地区无法像川西平原那样，依靠岷、沱两江打造密集的农田灌溉系统，不过那些相间于丘陵之间的小块平原，乃至这些丘陵本身，也还是能够依靠其他的小型河流来开发的。对比于渭河平原北部的陕北、陇东高原，川中地区的农业条件就要强得多了。因此蜀人在开发川西平原后，很自然地开始越过龙泉山向东渗透了。那些与岷、沱两江一水相连的区域，自然是优先扩张的区域。不过岷、沱两江及其支流所覆盖的区域，并非四川盆地的全部。川中丘陵的东半部，以及川东地区则是由涪江、嘉陵江、巴江（渠江）所共同组

如果没有其他实力对等的地缘力量出现，已经开发出川西平原农业潜力的蜀人，应该有机会成为整个四川盆地的主人的。只是这种理想状态并没有出现，因为在大巴山和川东那些平行岭谷之间，生产方式奇特的巴人也已经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同样将扩张的目光伸向了川中地区。由此巴、蜀两国的地缘博弈，不可避免地在川中地区展开了。

第十九章 巴国以川东丘陵为核心区

第一节 山地和河流对巴人的重要性

如果说古蜀国这个国家，或者说古蜀人这个族群给我们的感觉是两个字——“神秘”，那么“巴”这个地缘概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三个字——“太神秘”了。因为“蜀”尚能在史书中留下“渔泉”、“杜宇”等介于历史和神话中的“人物”（现在理解，应该是族群名），甚至最后一个统治蜀地的族群“开明”，还能够留下君主的世系。这些信息虽然简单，但却能够让我们从中窥探出古蜀人的传承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特点。而“巴”能够留下来的资料就更简单了，简单到甚至没有神话或者英雄人物出现。这让习惯于从“人”的角度研究历史和搞文学创作的文人学者们感到无所适从。

不过，如果我们不是把目光锁定在“以人为本”的历史细节上，而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巴”这个地缘概念的话，还是能够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为它勾勒出一个轮廓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巴”这个地缘概念所主要覆盖的区域，属于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从大方向来看，可以认为“蜀”的核心区域在四川盆地的西部，而“巴”的核心区域，则在四川盆地的东部。两者中间的川中地区，则是双方进行地缘博弈的主战场。

这当然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划分。从地缘特征来看，“蜀”是属于一个平原属性的族群。如果不是出于人口压力或者战略需要，他们对于复杂的山地并没有什么兴趣。在蜀人的生活中，水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水不仅能够直接为他们提供食物来源，更能够让蜀地成为重要的农耕区。而与之相比，巴人对于山地则要适应得多了。进入到巴文化覆盖的区域，最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山”，正如现在大家一提到“重庆”，脑海中多半会跳出“山城”这个概念来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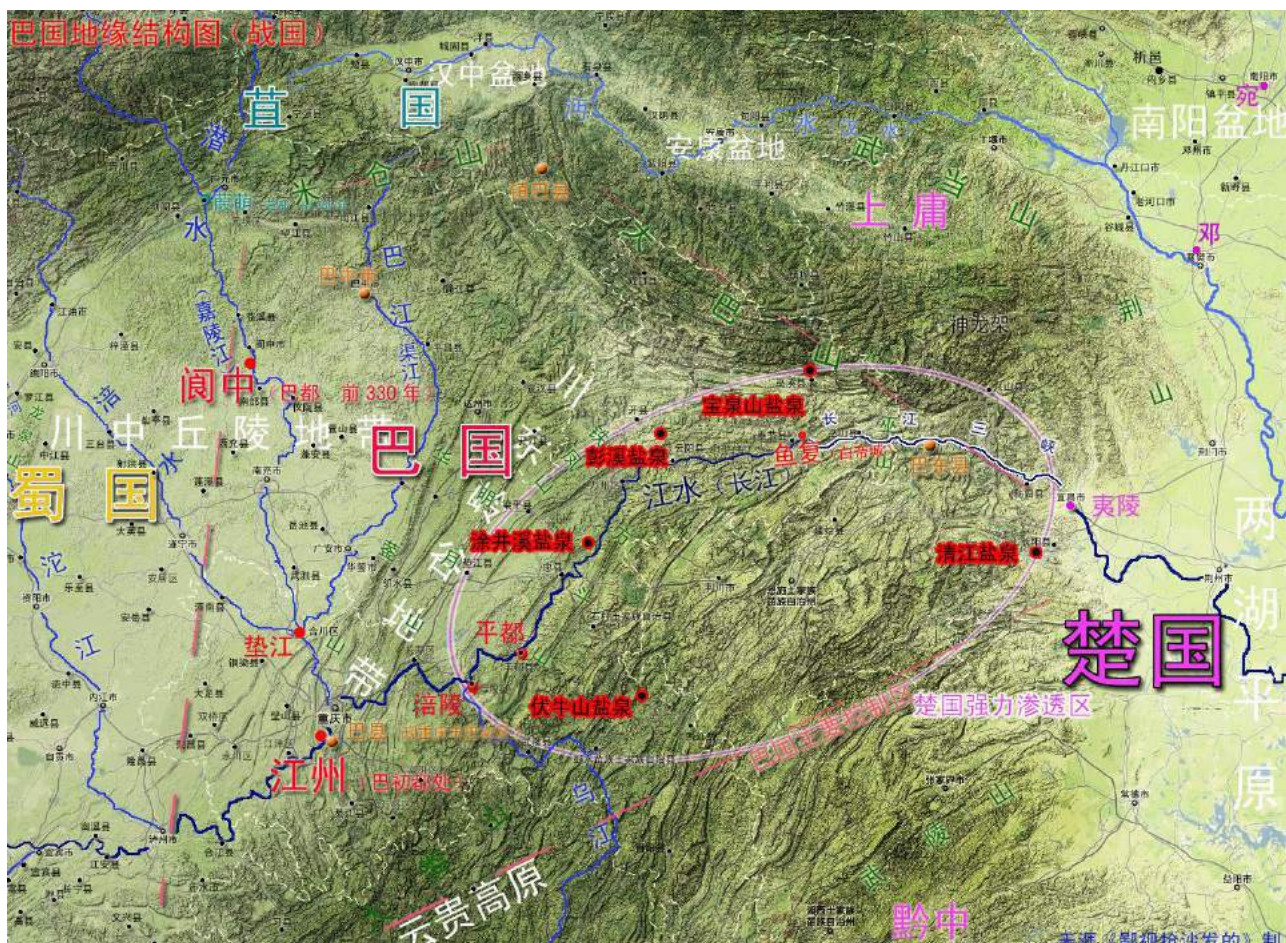
如果从地形图上观察，川东的那些“平行岭谷”的排列方式，总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横断山脉。不过与横断山脉相比，生活在川东的那些山地之间要舒适得多了。一则是因为川东的那些纵岭比之横断山脉的海拔要低得多（平均海拔低了三千多米，平均高差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川东在300—500米之间居多，横断山脉要两、三千米了）；二则是川东纵岭的密度较低（只是相对横断山脉），也就是说两条山脉之间的“岭谷”较宽。这种构造让那些流淌在谷地之间的河流能够在川东地区冲积出更多相对平坦的土地，从而容纳更多的人口。

习惯在山地之中生活的巴人，虽然对土地的开发能力远不及蜀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巴人的活动范围却是大于蜀人。不仅四川盆地东部的那些岭谷地带是巴人的活动区域，盆地边缘的那些海拔更高的山地，也都属于巴人的活跃区（包括大巴

山脉、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山地)。

虽然巴人活跃于山地之中，不过如果就此认定巴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山地民族，那就是一个误解了。事实上“水”在巴人的生存环境中，同样是非常显著的地缘特征。从族群发展的角度来看，“水”对于巴人的影响力，甚至还要高于山地。

其实巴人的这种山、水结合的地缘特征，我们可以从巴人所遗留下来的生存痕迹上看起来。如果说成都平原所出土的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物，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那些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青铜器，那么巴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就要简单得多了。那些高悬于三峡崖壁之上的“悬棺”，就是古巴人的杰作，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形制为“船棺”造型。事实上悬棺也好，船棺也罢，在整个长江及长江以南地区都有分布。包括东南丘陵地带，甚至越人的活动区域内也有发现。



巴国地缘结构图

至于巴、越两族，包括历史记载中的其他南方民族之间是否有更深层次的联系，也是专家们感兴趣的话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水资源丰富，在南方的很多山地民族中，“船”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以巴人为例，无论他们有多么习惯于山地生活，要想徒步穿行于山地之间，总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有了舟楫的帮助，巴人的活动范围就不仅仅是四川盆地东部的那些山地了。在历史的记载中，

巴人的对外战争也远多于蜀人。而史书中对于巴人的印象，也多是从他们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获取的。

因此在解读巴蜀的地缘结构时，我们并不能简单依照“巴山蜀水”的划分，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点上。就像蜀人再依赖水资源，也不能忽略山地对地缘格局的影响。如果要论哪座山对成都平原的影响最大，那条不为外人所熟悉的龙泉山倒是居功至伟。所以成都平原上的居民要想找个圣山祭祀下的话，青城山、峨眉山这些名山就没有龙泉山显得实际了。而如果我们要解读巴国的地缘结构，从河流分布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反而比研究山形走势更能摸准巴人分布的规律。

第二节 南宋在合川钓鱼城对抗蒙古人

我们在巴蜀部分开始之时就已经说过，整个四川盆地主要是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巴）江五条南北向的河流以及它们共同的归宿——长江所覆盖的。如果说位于盆地西半部的岷、沱两江流域，是蜀人的天下；那么位于盆地东半部的嘉陵江、巴江流域，则基本为巴人所覆盖了。至于说涪江，它流入四川盆地后的中游部分，是属于蜀人的渗透区，而涪江的下游部分，巴人则占据了地缘优势。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涪江、嘉陵江、巴江的“三叉戟”造型。

如果巴人想在四川盆地与蜀人平分天下的话，那么这个三江交汇之处就是他们必须控制的“制高点”。假使这个点被蜀人占，巴人即使还能够在四川盆地的边缘山地上活动，但在四川盆地的地缘文化中，就不可能取得与蜀人同等的影响力了。在先秦时期，合川叫做“垫江”（现在的垫江县不在这个位置了，合川现在成了重庆一个区），这样一个战略要点，无论是从军事还是商业的角度看，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因为它南面长江的地缘辐射力能够直达东海，相信合川比重庆（主城区）更有机会成为四川盆地东部的地缘中心。不过在巴人统治时期，合川也的确成为过巴国的政治中心。

而一千多年后，合川的战略地位又一次得到了体现。那时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通过远征云贵高原（大理国），对四川盆地形成了包夹之势。四川盆地边缘那些雄关险道，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终于被突破了。而地势相对平坦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丘陵都迅速为蒙古铁骑所覆盖。至于说蒙古人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穿越蒙古、黄土、青藏、云贵四大高原进击四川盆地，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成都平原的粮食，而是为了控制长江上游水道。只有控制了四川盆地，蒙古人才有可能在水上对南宋帝国占据地缘优势。换句话说就是蒙古人可以顺江而下，从侧面突破南宋的江淮防线。

从创造力和行军的难度来看，能够与蒙古人的灭宋线路相媲美的，也就是700多年之后，从井冈山出发的红色政权所进行的那场“战略转移”。虽然双方的突破



钓鱼城防御体系示意图（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



钓鱼城护国门

方向相悖，但都围着四川盆地的西、南边缘转了一圈（在这两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跟长征有关的地标，如“夹金山”、“大凉山”）。其过程之艰险，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们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按照一般规律，富庶的成都平原被攻破，也就意味着整个四川盆地失守了。但对于南宋帝国来说，他们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迟滞蒙古人的进攻，那就是想办法控制四川盆地的水道。控制这些水道一则可以让蒙古人顺江而下，进攻江淮地区的计划破产；二则也可以与南宋所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保持联系，并接受补给。如果要想控制四川盆地的主要水道，借助山势是很重要的。因此南宋残存在四川盆地的力量，在四川盆地各主要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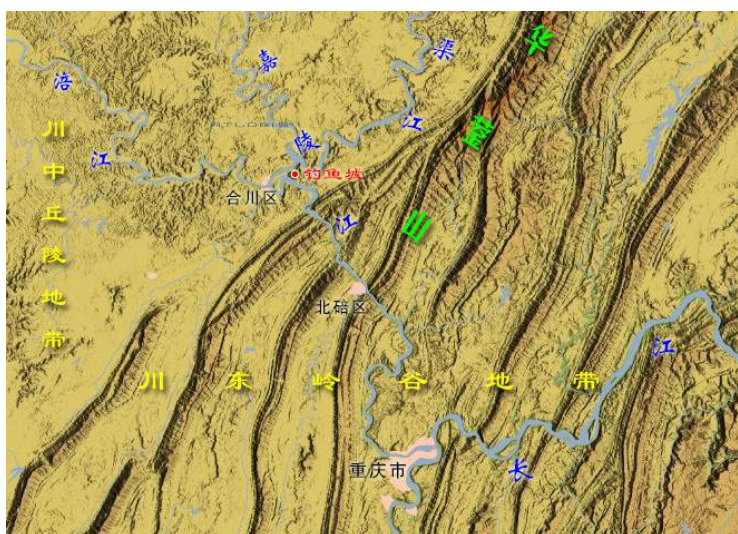
边上星罗棋布地构筑了许多山城，并互相支援以牵制蒙古人。这点倒很像当年高句丽人对抗隋唐帝国的战略。也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在占据了大部分的四川盆地之后，仍然不能马上展开他们的灭宋计划。南宋政权也因此又获得了二十多年的生机。

在南宋留存在四川盆地的据点当中，地理条件最好的就是三江合流之处的“合川”。在这个点上布置一个据点，既能够扼守川东水系的咽喉，又能够对南面的长江水道形成威慑。而南宋军民所选择的筑城地点，在后世也很出名，叫做“钓鱼山”，所筑之城叫做“钓鱼城”。关于钓鱼城，相信比较关注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华夏文明有些深厚感情的人应该都不陌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蒙古大汗蒙哥死在钓鱼城下，所以为南宋获得了二十多年的生存时间。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而蒙古人之所以在钓鱼城下失败，钓鱼城又之所以能够坚持三十多年，与川东地区的地理环境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是川东那依山傍水的地理条件，南宋在四川盆地的防御战也无法进行下去。

不过从地理位置来看，合川这个点也有它的不足，就是不能够直接控制长江水道。因此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巴国，还是现在，能够扼守嘉陵江、长江三角区的重庆，都是川东地区真正的地缘中心。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蒙古人在解决了长江沿线的其他据点之后，还是控制了长江水道（钓鱼城这座孤城已经没有出击的能力了）。而钓鱼城则一直坚持到崖山海战之后，以保全全城军民性命为条件终结了三十多年的防御战。这并不是川东地区唯一一次影响中央之国的地缘格局，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川东又一次有机会发挥它山、水相互依托的地理优势。



合川地区卫星图



合川地区周边地形图

而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川东的水上交通优势依然没有动摇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的发展，已经让攻防体系变得更加立体了。除了传统的水、陆两个防御面以外，来自天空的军事打击也成为重要的手段。与来自地面（水面）的威胁相比，空中打击所带来的威胁要显得更可怕，因为这种手段可以绕过你所布置的地面防线，直接攻击你的地缘中心。

因此富庶的成都平原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成为偏安政权在四川盆地的避难所。

而重庆则在沉寂了千年之后重新得到了发展的契机，并让巴文化又一次在政治层面上取得了与蜀文化同等的地位。

第三节 长江和嘉陵江在巴国的地位

从巴国重要城邑的分布位置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河流水道在巴国地缘结构中的重要性。在巴国的历史当中，除了重庆（古称江州）这个地缘中心以外，位于长江沿岸的平都（现在的丰都，以鬼文化著称）、涪陵（现在还叫涪陵，最出名的是榨菜）；以及位于嘉陵江中下游的阆中、合川都曾经阶段性地成为过巴国的政治中心（可以看做陪都）。

长江之所以在巴国的地缘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它能够连接成都平原、江汉平原甚至江东地区这些重要的地理单元。对于巴人来说，如果沿长江水道上下行，蜀国和楚国的核心区都在巴国的攻击范围之内（反过来也一样）。而嘉陵江之所以能够从殊途同归的涪、嘉、渠（巴）三江中脱颖而出，表面原因应该是因为嘉陵江的体量最大。这个体量包括它的长度和流量（在长江上游仅次于岷江），也正因为

如此，从水系的角度来划分的话，涪江和巴江也被视为嘉陵江的支流。不过对于古人来说，可没有太大兴趣去关心谁是干流，谁是支流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哪条江水对自己生存环境的作用更大，就更加重要。

从实际作用的角度来看，巴人选择用嘉陵江来配合长江标注自己的核心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与蜀国对抗的需要。如果巴国只是据守巴江一线，固然会更加安全（蜀人对于翻越那些平行岭谷没兴趣），但那就等于将整个川中地区拱手让给蜀人了。这样的话，巴人在四川盆地也就只能算是边缘民族了；另一方面则



巴国地缘结构图

是因为嘉陵江沿线是北出四川盆地的重要通道，如果顺着嘉陵江向北行走可以到达汉中盆地和陇西高原。也就是说，可以和汉水、渭水两大河流的上游对接。这种对接，即意味着巴蜀之人可以通过这个战略出口跳出四川盆地，同时也意味着危险，特别是当北方的地缘实力更为强大的时候。

对于整个四川盆地而言，在古典时期的地缘压力主要来自于北、东两个方向。在战国时期，从这两个方向对四川盆地造成地缘压力的则是秦、楚两国。从交通方式来看，在整个长江流域中，水路交通都会是第一选择。这不仅是因为船舶可以有更大的运量和不低于马车的速度，更是因为整个长江流域水网纵横，水量充足，河道也相对稳定，通过水路可以连通覆盖绝大部分的人口密集区。由于长江的航运条件较好，四川盆地的东线交通主要走的是水路，也就是说，巴、楚两国如果要进行博弈，长江水道的争夺会是博弈的焦点，这也就是巴人为什么要沿河流部署战略据点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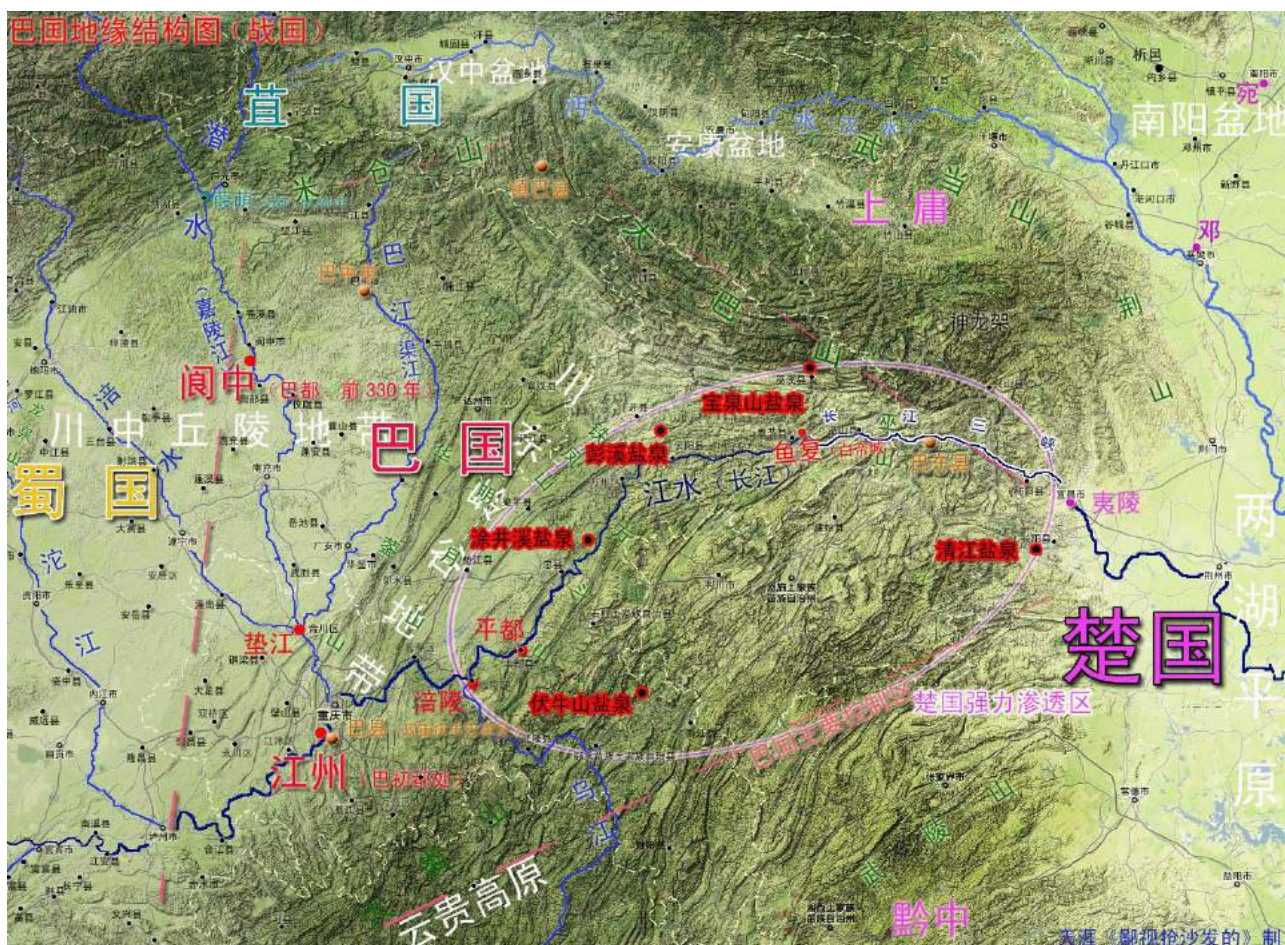
嘉陵江（四川境内）

相比长江水道的畅通，北线嘉陵江的航运条件就没那么好了。不要说位于四川盆地以外的上游河道，即使是从广元到重庆这段穿越川中丘陵地区的中游河道，通行性也是很差的（滩多水急）。其实嘉陵江的航运条件不好，对于四川盆地的地缘安全也有好处。因为在这个方向上，四川盆地是处于河流的下游（四川盆地在长江则是上游），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敌方顺江而下，快速突破四川盆地的外围防线。也正因为水路交通的不可行，北方势力如果想进入四川盆地的话，就不得不选择在那些植被茂盛，结构复杂的山地中开辟道路。这也让四川盆地在主要地理单元中，成为最接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理想状态。

由于沿河流两岸开辟道路，是最省时省力的选择（还可以提供淡水补给），因

此嘉陵江的水路虽然无法承担进出四川盆地的重任，但它本身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控制了它，也就等于控制了四川盆地的北方门户。就巴人而言，能够控制嘉陵江上游固然能为自己地缘安全加上一层保障，但相比而言，蜀人对于北方门户的得失要更为紧张。因为如果秦人沿江而下进入四川盆地后，并不只会继续沿着嘉陵江而下攻击巴人。

对于秦人和后来的绝大部分的入侵者而言，富庶的成都平原才是他们远征的真正目的。而相比于巴人在失去了秦岭、大巴山脉的庇护后，还能够得到川东那些岭谷的保护（钓鱼城就是一例），蜀人所能够倚仗的山势就要弱得多了（蒙古人进来后，只用了一个月，就占据了平原和丘陵地区）。



巴国地缘结构图

由于地缘重点的不同，巴人的主要防御对象是东线共饮一江水的楚人，而蜀人则在嘉陵江上游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对于整个四川盆地而言，北方防御的重点在于沿嘉陵江上游从山地进入川中丘陵的相接处（现在广元一带的位置）。在蜀国控制这个要地以后，开明王朝的第五世君主，甚至将自己的弟弟封建于此，并立国为“苴”（公元前 368 年）。从战略布局上来看，蜀人的这种做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将最重要的战略要点封建给自己最亲近的族人，并建立藩国，直到古典时期后期都

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不过血缘虽然是很重要的联系纽带，但并不是绝对安全的。特别是当你封建出去的属国发现自己能够拥有独立的能力时，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尾大不掉”。关于苴国是如何尾大不掉，蜀、巴、苴三国之间的博弈，又是如何影响整个四川盆地的地缘安全的，我们在后面会分析到。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巴国的地缘结构上来。

从地缘文化特征来看，山地和河流在巴人的文化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四川盆地东北边缘的大巴山脉、东南边缘的山地（云贵高原的延伸），以及嘉陵江流域中下游共同构成了一个大三角形区域。这个以山地为骨，河流为经脉的区域，成为巴人主要的势力范围（现在的重庆，也大致是这样一个三角形形状）。

鉴于华夏文明在地缘文化上的传承有序，当年巴人控制区的大致范围，也可以从现在一些带“巴”字的地名中窥探出些端倪来。在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包括边缘山地），我们可以找到镇巴县、巴中市、巴县（现在的重庆市巴南区，也就是当年巴人建都的地点）、巴东县这五个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乡村一级的更多）。将这五个点连接在一起，也可以连接出一个支撑巴国框架的大三角来。

第二十章 巴国和楚国争夺长江三峡和盐泉

第一节 巴国和楚国在鱼复和夷陵设军事据点

说到巴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地缘关系，大家很容易想到蜀国。同处一个盆地之中，巴蜀之间没有恩怨是不可能的。这点与燕赵、齐鲁、吴越、秦晋这些因地缘关系密切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缘概念如出一辙。如果不详加解读，很多人甚至很难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

只是，虽然巴蜀由于同在四川盆地而地缘关系紧密，但四川盆地毕竟不是一个全封闭的地理单元（像地理大发现之前的美洲那样）。大家除了要与对方争夺川中地区以外，还必须应对盆地之外的地缘力量。而对于巴人来说，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长江中游的楚人。

由于巴人带有浓厚的长江文化特征，他们与长江中游的楚国发生地缘博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从地缘实力上来看，巴国肯定是比不过沃野千里的楚国。不过在巴楚之间的博弈中，楚国其实并没有占据一边倒的优势，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巴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如果楚人试图从陆地进攻巴国的话，那么长江三峡南北的这些崇山峻岭就会成为巴人的天然屏障。即使是在过度开发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分割四川盆地与两湖之地的山岭中，看到“神农架”这个名字。不管这片原始森林里是否真的有野人，但它所起到的隔离作用是不用怀疑的。可以想见，在两千多年前，整个四川东部边缘的山体是处在什么样的开发状态。

楚人并非不熟悉山地生活。在进入江汉平原之前，他们也曾经在神农架东面的“荆山”之上披荆斩棘。问题是如果有得选择，绝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在环境更好的区域生存。而相比于西面这些让人望而却步的山地，东面的江汉、江淮流域有着大片的土地等着楚人去征服。即使是成为江淮的霸主，楚人也会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中原甚至整个华北平原之上。至于说，去碰巴人所占据的那些山地，已经习惯了农耕生活和平原作战的楚人，是很难提起兴趣的。当然，世事无绝对，因为这个世界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比如盐铁，如果为了它们，也许楚人并不介意在西线展开战争。

相比于楚人没有太强的欲望介入四川盆地，巴人反倒经常跑到四川盆地的外面去参与江汉甚至中原的地缘博弈。在当年楚国收拾周人的汉阳诸姬时，巴楚之间就曾经有过蜜月期，经常联手应对这些以华夏正统自居的诸侯。从地缘结构来看，巴人之所以能够有机会走出四川盆地，所倚仗的就是山、水对其地缘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山地生活赋予了巴人强悍的体魄与搏斗的技巧，加上山地的生存条件相对较差，让他们本身就更具有扩张的欲望（和高原游牧民族喜欢袭扰农耕区是一个道理）。

巴人的善战，早在武王伐纣时就已经为中央之国的各路诸侯们所熟知了（巴人当时也是伐纣联盟的一员）。对于楚人来说，能够有这样一个强悍的盟友来应对那些周人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而对于巴人来说，能够有机会到平原地区再试试水，为山地贫乏的物质生活做些补充，也是件不错的买卖。另一方面，占据长江的上游，也使得巴人相对于中游的江汉地区更有地缘优势，也更有顺江而下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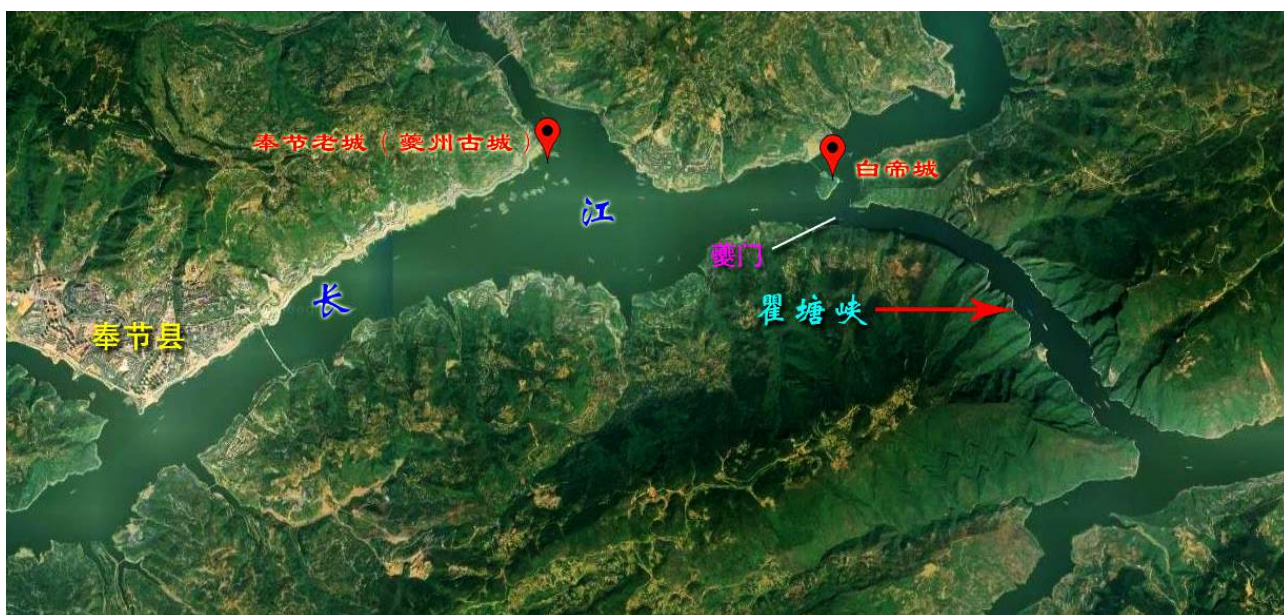
长江三峡示意图

尽管巴楚之间曾经有过蜜月期，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当楚人完全消化了南阳盆地和江汉地区后，巴人再想出来搞点物质，就直接触犯楚国的利益了。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盟友也只有反目成仇了。基于长江是双方之间的主要沟通渠道，因此巴、楚两国的博弈重点也就是长江上游和中游之间的区域。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标——“长江三峡”。

长江三峡这段峡谷西起重庆“奉节”，东至湖北“宜昌”，自西向东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条峡谷组成。这三条首尾相连的峡谷包夹而成的长江水道，所穿越的就是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山地。也就是说，如果你向西过了奉节县，就等于进入了川东平行纵谷地带；而向东过宜昌的话，江汉平原就会展现在你面前。从这个角度看，谁能够占据了长江三峡，谁就可以占据地缘优势。

在战国以前和大部分战国时代，巴人部族都是长江三峡的主人。这并不表示巴人的实力就比楚人强。因为如果楚国仅仅是出于防守的目的，而不是准备灭巴的话，并不一定要占据整个长江三峡。要知道，想彻底征服这些山地民族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能够一战而胜，但维护占领区的成本也会很高。当年吴国之所以没有灭越，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能够消除这些山地民族向平原地区渗透的能力和欲望，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因此对于楚人来说，最为安全和省力的方法是在三峡的出口之处，设置一个军事据点，并派重兵把守。让巴人无法顺江而下攻击江汉地区，就可以防

止巴人大规模的侵扰了。



白帝城及周边卫星图



白帝城（因部分古城淹没而成孤岛）

虽说楚人已经演变为了一个平原国家，但地处江水、汉水、淮水这几条大河之间，楚人的水上力量可以说是战国诸雄中最强大的。尽管逆流而上攻击巴人有些难度，但用来防守还是绰绰有余的，因此楚人并不是特别担心巴人的威胁。而反过来看巴人的上游优势，如果想在进攻中有所表现的话，就必须有足够的实力作支撑。也就是说有机会一战而大胜楚国，否则攻击失败的船队，

再想撤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楚国在柏举之战后，想顺江而下攻吴找回面子，就吃了这样的亏）。而相对于楚国的地缘实力，巴国显然也没有对抗的本钱（如果与蜀国联手，倒有点机会）。

楚人所选择的防御点在现在的宜昌，当时叫做夷陵，是楚国在西线的军事重镇。而夷陵以上，则是巴人的控制区。在整个三峡的线路上，除了东端夷陵这个点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据点当然就是西端的起点了。巴人在此所设置的军事重镇叫做“鱼复”。如果楚人越过夷陵，占据了整个长江三峡，那么封锁鱼复这个三峡的西大门，就可以让巴人的核心区不受损害。说到“鱼复”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应该不多，不过如



瞿塘峡

果提到它后来的另一个名字“白帝城”¹，相信不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白帝城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两件事，一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的“白帝城托孤”一节。其实刘备死前还是回到了成都，但兵败于东吴之后退守白帝城，以扼守川东之门户，却是事实。由此也可以想见，当年巴人会如何经营这个战略

要点。由于这个战略要点是川东门户，因此在后世也被叫做位“夔门”。又因为它位于三峡中的瞿塘峡西端，因此有时又贴上了“瞿塘关”的标签。至于现在嘛，则是归属重庆市奉节县所辖。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一些历史书中看到上述几个地缘标签的话，它们所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战略要点。

对于一些对历史不太感兴趣的人来说，如果脑海中有“白帝城”这个概念，多半是来自于李白的那首《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这首诗我们最起码可以得到两个地缘方面的信息：一是在古典时期，如果你想顺着峡谷开辟陆路通道，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二是走水路由三峡地区进入江汉平原是多么的便利（江陵就是荆州）。

假使楚人只是想阻止巴人的东进，守住三峡的东大门——“夷陵”这个点，的确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了。但后来楚国还是花费了很长时间，从巴人手中夺取了三峡地区，并突破“鱼复”继续向巴国的腹地渗透。至于楚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又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下节再分析。

第二节 楚国向长江三峡和周边山地渗透

说到巴蜀最后的结局，一般的印象是他们都被秦国所灭（公元前316年）。相信也有许多人，为楚国没能抢先一步征服巴蜀而扼腕。其实楚国并非没有向西渗透，也并非没有取得战果。如果从道路的通行性情况来看，由长江中游溯江而上进入四川盆地，并不会比由渭河流域经由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入川难度更大（一般而言，水道总比陆路更具有便捷性）。

1 奉节又称夔州、夔府。一直为扼守着瞿塘峡的西端出口。三峡大坝蓄水后，奉节县搬迁至老城西边。老城（夔州古城）大部淹没。而白帝山上的白帝城在淹没大部分山体后，由半岛状变成江中孤岛，夔门的气势亦下降。另外历史上刘备真正的托孤之地在奉节老城的永安宫，而非白帝城。

在秦以后的古典时期，帝国的官员们如果想入川，往往会选择先由陆路到达江汉平原，然后再沿长江溯江而上（从宜昌到重庆，大概一个多月的路程。反过来就更快了，要不李白也不会感叹“千里江陵一日还”）。当然，无论是选择北线的蜀道，还是东线的长江水道，巴蜀在防御上都有足够的地缘优势。因此决定楚、秦两国是否入川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攻击难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足够的利益。

秦人想得到巴蜀之地很好理解。一是需要成都平原的耕地，以支撑秦国规模越来越大的军事行动；二是要占据长江上游的地缘优势，从侧后方给最大的竞争对手——楚国以压力。而对于楚国来说，这两点理由都不能激起他们的征服欲。因为对于楚人来说，他们所扩张的区域比秦人要大得多，而且在方向上的选择也很多。两湖、江淮地区都有着大片水量充分、地势平坦的可开发土地。而即使是他们把战略目标选定为蜀国，占据四川盆地也不能够获得足够的地缘优势。因为整个四川盆地无论是从河流，还是山势的角度看，相对于黄土高原都还是处于仰攻状态。并不是说在这种状态下不能够有获胜的机会，但像春秋战国这种持久战形态，胜算是很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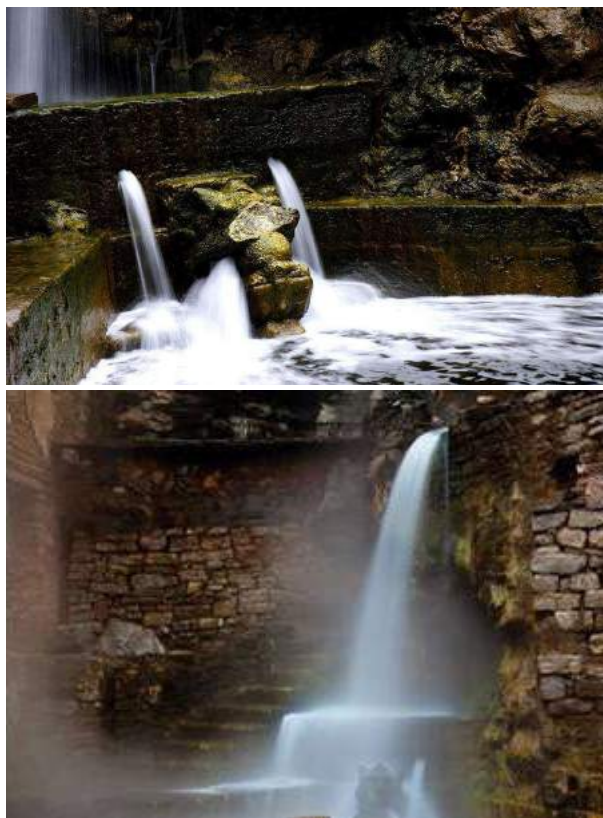
不过最终的结果是，楚人还是向西渗透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楚人并没有把终极目标锁定在地缘潜力更大的蜀地，他们甚至也没有打算彻底征服巴人（这项任务太艰巨了）。而能够引起楚人强烈兴趣的土地，居然是三峡地区。如果楚人准备灭蜀或者灭巴的话，控制三峡水道当然首先要做的。问题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楚人其实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这样做。

实际上楚国对三峡地区感兴趣的原因，并非只是为了控制水道，而是三峡两岸那些看似无用的山地。这片基本没有什么农业潜力的土地，似乎并不值得一个大国为它大动干戈。而依当时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楚人也不可能会有开发三峡地区的旅游业或者建个水坝之类的想法。那么，基于“无利不起早”的原则，三峡地区必然有吸引楚人的资源。事实也的确如此，三峡地区虽然没什么农业价值，但它对出产另一种生活必需品——盐。

如果以农业潜力大小来评判一个国家的影响力，那么完全身处山地之中的巴人显然是无法以正式的身份进入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的。即使是同样出身山地的越人，他们也是通过开发宁绍平原，并最终压倒吴国而获得整个太湖平原后，才有实力和资格与其他诸侯争雄的。而巴人在这其中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异类。他们并没有试图迁移到平原地区，但巴国在历史上的最终定位，并没有等同于那些戎狄部落，而是相当程度被认定为一个正式的国家。在中央之国的主要诸侯们纷纷自立为王后，巴国甚至也开始仿效称王。

巴人之所以成为一支让人无法忽视的地缘力量，除了他们彪悍的作风让人印象深刻外，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盐。说到盐这种生活必需品，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中国持续了上千年的食盐专卖制度了。这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即控制了食

盐就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的命脉。而实际情况是，食盐的专卖制度是基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设立的。简单点说，控制它就是为了钱。但这种控制，并不代表食盐真的是一种可以左右地缘格局的战略物资。这主要是因为比之粮食，食盐的需求量是很小的。另外食盐的产地也很多，很难从源头上将它完全控制起来。基于这两点，在中央之国陷入分裂时，即使某一个地缘板块内食盐无法自给，它也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多点获得补充。并不会因为缺盐，而让大家都变成白毛女（男）。



巫溪县宁厂镇盐泉

不过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如果你的控制区内有丰富的盐矿，也绝非一件坏事。最起码你可以从食盐贸易中获取大量的利润来增强自身的实力。这点在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齐国，提到它的地缘优势，其中就有食盐之利，谁叫海水是咸的呢。而如果盐只能通过海水中获得的话，那么能够凭借食盐获得额外利润的应该就只有齐、越这些沿海国家了。不过上天对内陆地区也是公平的，即使是没有沿海之利，有些地区也有机会从地下找到比海水含盐量更高的盐卤水。而这些可以打出盐卤水的盐井，在古典时期也被叫做“盐池”或者“盐泉”。如果哪个地区能够在自己境内找到这些盐卤水，那么它就有机会通过食盐贸易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地缘实力。

像所有的矿藏一样，地球上有多少储量是一回事，你能够探测并开采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从公元前的情况来看，秦岭以北的主要产盐地在运城盆地（解州盐池）。当年的晋国和后来的魏国，也因此而获得了额外的经济力量来扩张它们的势力范围。最起码秦国在占据河东之地前，还不得不长期从晋人手中购买食盐。在长江流域，当时最主要的产盐区就在三峡地区，也就是在巴人的控制区中。而巴人两侧的蜀、楚等国，则长期是巴人的固定客户。即使是在明清，帝国的统治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强制要求中央之国的大部分地区购买产自东部沿海的“淮盐”。巴盐仍然能够通过非官方的渠道供给周边地区（从这也可以看出，并无法从源头处控制食盐）。

巴国食盐贸易对象主要包括蜀、楚（甚至在秦晋交恶时也包括秦）等国，以及周边的边缘部族们。而巴国的水上优势，也进一步加强了巴人在这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巴国是在先秦时期的主要地缘板块中，唯一一个以

资源、商业立国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是以农业为本）。由于巴国与食盐的关系是那么的紧密，以至于长期以来，很多地区的人们谈到食盐时，总喜欢将之称为“盐巴”。

第三节 巴国控制区中分布的盐泉产地

在巴人所控制的区域中，最为重要的产盐地就是三峡北部，位于巫溪县境内的“宝泉山盐泉”。早在夏商时期，这里所出的“巫盐”就已经名扬天下了。巴人能够控制这块风水宝地，也是通过与其他山地部族以及楚人的不断博弈，才获得的成果。

在这里，有必要说说“巫”这个字。在三峡文化中，“巫”是很重要的文化标签，在三峡当中，有一处横跨峡谷两端的山体，被命名为“巫山”。而三峡地区的“巫溪”、“巫山”两县，更是将“巫”这个标签行政化了。从字面上理解，“巫”这个字，本身就包含有神秘主义色彩，而三峡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更为“巫”文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后世的文人骚客们在亲身体验过三峡的地理环境后，也不遗余力地通过文字为这种神秘主义添加上浪漫色彩，于是“巫山神女”、“巫山云雨”一类的文字不绝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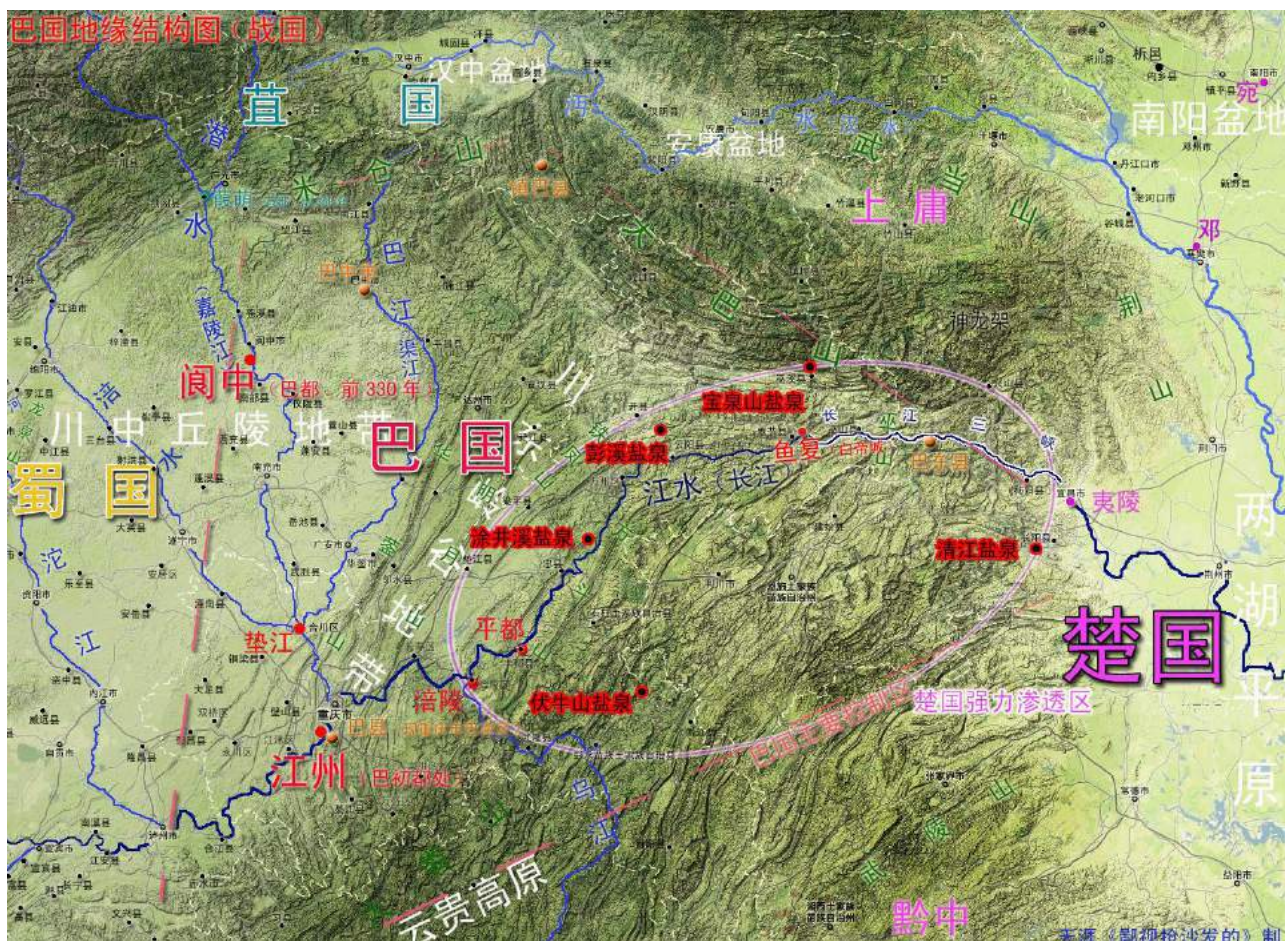
关于“巫”这个字，最初是由哪个族群运用在三峡地区的，文人们又是如何演绎的，并不是我们考证的方向。在这里将它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楚人在控制三峡地区后，在这里成立了一个郡一级的机构——“巫郡”，以此来巩固他们的胜利果实。不过三峡周边的巫盐虽然历史悠久，但是这里并非巴人控制区中唯一产盐的地区。而楚人在对巴国的渗透中，也并没有局限于仅仅控制三峡两岸。因为对于楚国来说，能够通过控制三峡地区达到食盐自给固然是西征的价值所在，但更为重要的是，楚国需要将所有的产盐区从巴人手中剥离。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尽管楚国的主要扩张方向在东线、北线。但它在西线需要有一个安宁的后方。对于像楚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周边的山地中有一些靠天吃饭（游牧、渔猎方式）的部落，并不会对其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像巴国这样，既有强大的战斗力，又能从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的山地民族（还有水上优势），其对楚国所造成的威胁，就不容小觑了。因此只有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占据所有盐泉，彻底打掉巴国的战争潜力，方能让楚国拥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说到四川盆地的盐，相信对中学地理还有印象的人，首先会想到自贡。自贡这个地方，有两个东西比较出名，一个是恐龙，另一个就是“盐”。在中国核心区的内陆地区，自贡算是最主要的盐产地了，也因此有“盐都”之称。如果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自贡一带位于沱、岷两江的下游，川中丘陵的南部，在战国时代亦属于巴、蜀势力相交的区域。虽然我们谈到了盐的重要性，但自贡一带并没有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这种结果相信会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因为从地缘位置来看，如果这里有这种丰富的盐卤资源，没有理由不成为巴、蜀竞相争夺的目标。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也很简单，自贡的盐卤资源当时还没有被发现。

我们前面也说了，在战国时期内陆的盐井多称为“盐池”或者“盐泉”。古人在用词方面是非常精准的，因为上古时期所能够被人类所利用的盐卤，都是随地下水自然溢出的，然后汇入河流（如三峡巫盐）或聚成盐水湖（如运城解池）。发现和利用这种类型的盐卤，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所以也最先被人类所利用。而自贡的盐卤资源则是在地下，需要钻井才能得到，开发的时间也就自然靠后。从逻辑的角度推断，自贡的地下盐卤资源，应该是在挖掘水井的过程中被发现的。虽然不能确定谁是最早的发现人，但可以确定的是，自贡的采盐历史，最早所能上溯到的朝代是东汉时期。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巴蜀之地还需要从那些山谷之中流淌的盐泉来获取食盐。



巴国地缘结构图

在巴人控制了巫盐之后(宝泉山盐泉),他们又在川东沿长江一线,相继找到了“彭溪”(重庆云阳县)、“涂井溪”(重庆忠县)等盐泉;在长江以南的四川盆地边缘山地中,又得到了伏牛山(重庆彭水县)、清江盐泉(湖北长阳县)。这些盐泉的开采利用,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巴人的经济实力。因此在当时,巴人的这种生存方式,被视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异类。

有了险峻的山势作为屏障，便利的水道以为外联，加上这天赐的盐矿资源，巴人能够在农业条件更好的蜀、楚两国之间生存下来，并成为左右长江流域地缘格局的重要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巴人的这些点状分布的盐矿资源，在给巴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因为它也让对手的目标更加明确。即如果你有办法从巴人手中夺取这些盐泉，那么巴国的衰弱也就在朝夕之间了。最终终结巴国财富神话的不是占据上游优势的蜀国，而是那个长江中游的霸主——楚国。

第四节 楚国溯江而上夺取巴国盐泉和城邑

楚人对于巴国控制区的渗透，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在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中，想要一战而成是很难的。楚国对于巴国的蚕食，有两个战略方向，一个就是由夷陵溯江而上，逐步拔除巴人在长江两岸的据点，进而向巴国的纵深渗透。其战略以控制长江水道和盐泉为目的；另一条攻击路线则在南线，也就是从现在的湖南（因在长江之南，古称“江南”地。后来的江南在当时是“江东”，三国时期还是这样划定的）向西，先控制湘西的那些山地，然后再逼近长江，最终让楚国的控制区连成一片。而楚国在控制了现在重庆、贵州、湖南交界的这片山地之后，也和在三峡地区一样，设立了一个郡级机构来管理，叫做“黔中郡”。

关于黔中的具体情况，我们以后在秦攻楚阶段会有具体解读（到时候还会顺带说下“夜郎国”）。现在的重点，还是在于楚国对于巴国核心地区究竟渗透到了什么程度。楚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向三峡地区渗透的，并不是十分确定，不过肯定要早于公元前340年。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个两千多年后仍然在影响我们生活的伟大人物——屈原在楚国诞生了。而屈原的出生地“秭归”就在三峡中的“西陵峡”边上。如果从夷陵出发，向三峡地区渗透，秭归应当是最先被楚国收入囊中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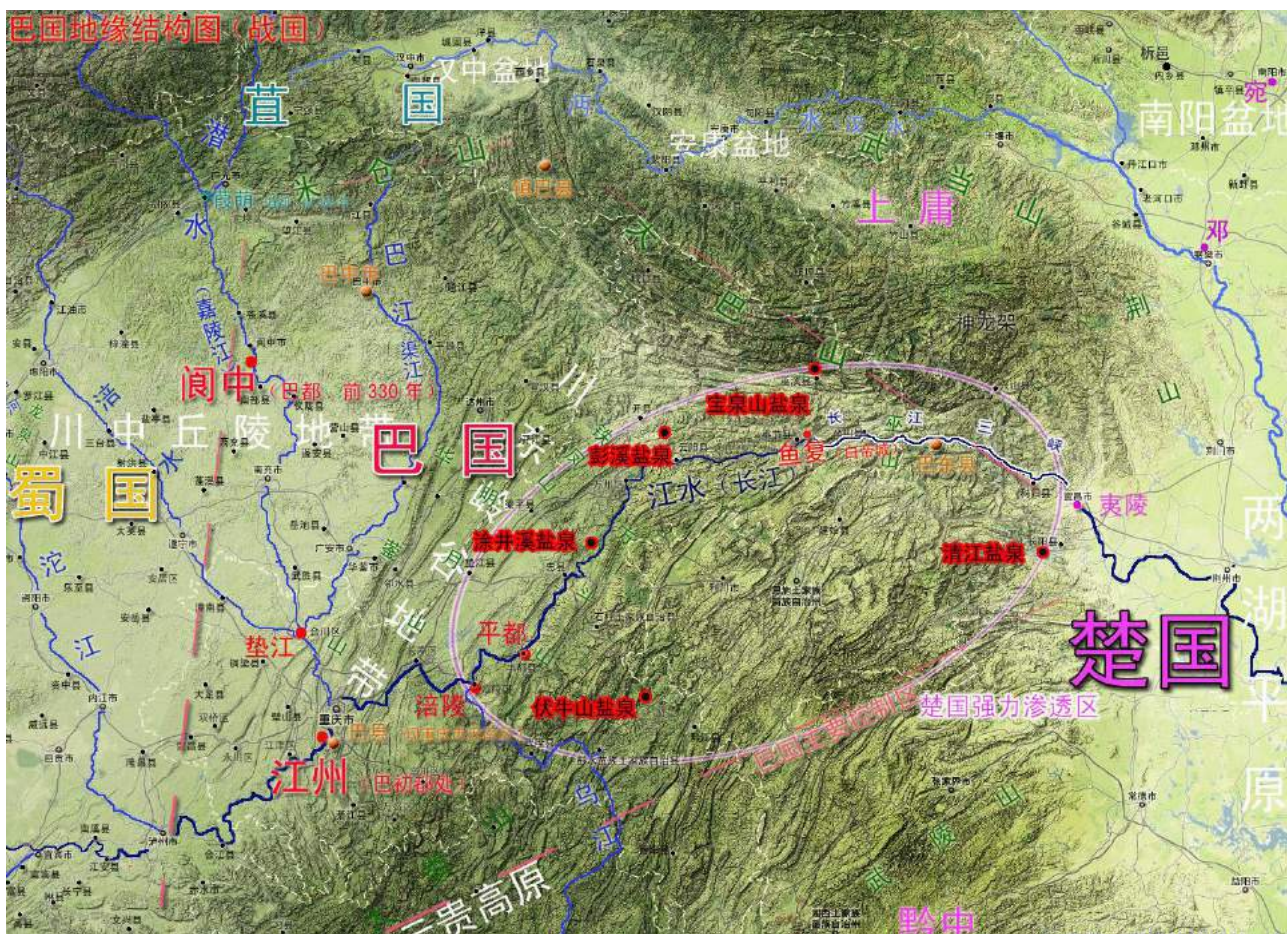
说到屈原，还有一个传说与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鱼复”有关。说的是屈原投汨罗江死后，江中有一条神鱼，感其忠义，带着屈原的尸体从汨罗江经洞庭湖进入长江，再溯江而上，想把他送回故土——秭归。结果不认识路，等到了三峡的西头（现在的奉节）才发现游过头了，结果又返身回游，最终把诗人的遗体送回了秭归。这个传说倒是很好地从逻辑上解读了“鱼复”之名的来历，不过听上去更像是后世附会之言。至于说“鱼复”之名，究竟是得自巴人，还是楚人，倒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知道这个点的战略地位就行了。

对于楚人来说，控制了鱼复也就相当于控制了整条三峡水道。而在此之后，除了沿两岸那些长江支流渗透入三峡地区的山地，并最终控制盐泉以外，楚人也并没有放弃继续向长江上游渗透的机会。因为如果想彻底控制巴国的产盐区，光控制三峡地区是不够的。最终楚国溯江而上的渗透，止步于一个叫做“涪陵”的据点。

涪陵作为一个地名，想来很多人不会陌生，特别是喜欢吃榨菜的人。在巴国控

制时期，涪陵除了是地缘中心——江州（重庆）在东线的最后一个江防据点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巴国历代君主的安葬地点。所谓涪陵的“陵”字，也正来源于此。不过这条防线，最终还是成为楚国进攻巴国核心区的桥头堡（命运和被魏国所占的宋国的“襄陵”何其相似）。

巴人之所以视涪陵为风水宝地，甚至一度将其作为政治中心，并非偶然。一个伴水而生的城邑，要想脱颖而出，超越其他的江岸城市，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你需要拥有双重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如果你处在两条江河的交汇处，你的机会就会比别人多。所交汇的支流体量越大，机会也就越大。就像江州（重庆）之所以能够成为巴人的地缘中心，也正因为它位于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而涪陵的地缘地位，则与另一条西南大河——乌江，紧密联系在一起。



巴国地缘结构图

乌江这个名字之所以出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楚霸王项羽。不过这位盖世英雄所自刎的地方，离我们现在所要说的乌江差着十万八千里（在吴越部分解读过）。真正让乌江之名能够长久的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应该还是当年红军长征突破乌江天险的故事。其实就我个人来说，一提到乌江，脑海中所立即浮现的印象还是与榨菜有关，这主要源于年少时有段时间，电视广告中铺天盖地的“涪陵榨菜，涪陵榨菜，

乌江牌”的广告语(是唱出来的)。以至于我现在买榨菜,还是会不自觉地去找乌江牌。

其实从红军抢渡乌江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乌江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割线。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条发源于贵州,由涪陵入江的河流,有一段河道现在就是重庆与贵州的分界线。当年巴人除了溯嘉陵江等北线支流而上,向四川盆地腹地渗透以外,南线的乌江流域也是巴人的扩张方向。即使是在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重庆在长江以南地区,向贵州、湖南之间伸出了一个突出部。而这个突出部,大部分就是由乌江下游水系所覆盖。追根溯源的话,重庆的现在的行政格局,还是当年巴人搭建的基础。

对于巴人来说,涪陵固然有其特殊的地位。丢失了它,不仅是面子问题(祖宗陵墓都丢了),也意味着巴国放弃了长江以南,乌江以东的势力范围。而楚国现在则可以以此将防线推进到乌江,将处长江以南的伏牛山盐泉稳稳地握在手中。丢失了涪陵,对巴人来说还意味着他们的国都——江州(重庆)现在直接暴露在楚人的攻击范围内了。一般来说,如果你和对方的实力在同一级别,甚至超过对方的话,将国都设在前线区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以抗外敌。而如果你的实力与对手相距甚远,那么很多国家就会选择退缩,以让自己的贵族们远离强大的对手。如果还能够保有那些流淌出白色财富的盐泉,相信强悍的巴人一定会和楚人死战到底的。但现在,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巴国,已经开始步入衰弱期了。他们命运,将要和那些经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边缘民族没有什么不同了。

最终,在楚国的步步紧逼之下,巴国选择了退却,将自己的国都迁至嘉陵江中游的“阆中”(公元前330年)。这也意味着巴国的经营重点由长江两岸变身为嘉陵江流域,并开始着力向川中地区渗透了。而这种战略转移又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和蜀国的地缘矛盾。至于楚人,他们在占据涪陵之后,暂时没有再向西渗透了。除了巴人的强烈抵抗之外(江州这个点丢了的话,巴人就只能上山打游击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已经进入战国第二阶段了。而这个时期的中原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楚国需要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向了。

由于巴国的实力已经被楚国严重削弱了,因此在后来秦国进军四川盆地的战役中,蜀国成为了主角。史书中往往只是顺便地交待了一下,蜀亡之后,巴国也同时被灭了。而如果不是因为楚国在巴国东线所施加的压力,巴人的抵抗是没有那么容易结束的(想想钓鱼城)。因此巴国可以说是在秦楚两国的夹击之下而亡的。

第二十一章 秦国攻灭巴蜀向四川盆地扩张

第一节 蜀国渗透至汉中盆地并封建苴国

秦人要想进入四川盆地，所要遇到的困难其实比楚人还大。最基本的问题是，楚国还有现在的长江水道可以利用，而秦国所将要使用的“蜀道”，行走起来却势如登天。这也是秦国那么多年来没有南征计划的根本原因。当然，路是人走出来的，如果秦人下定决心要入主四川盆地，他们也会寻找战术上的可能性。

最佳的方案，就是在四川盆地内部找到一个盟友，让它将秦军引入，以让战争在一开始时就在四川盆地腹地展开。这样的话，所谓天险也就不攻自破了。如果要想找这样一个第五纵队，似乎就只能在巴、蜀之间二选一了。不过最终帮助秦国解决问题，或者说制造机会的，并非巴、蜀两国，而是四川盆地内新兴的一股地缘力量——苴国。这个一度与巴、蜀两国上演四川盆地“三国演义”的小国，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四川盆地乃至中央之国命运的关键先生。

如果苴国仅仅是为蜀国看守门户，苴国也许并不会有挑战蜀国宗主权的想法和能力。不过在它立国之后，北面位于秦岭和大巴山脉之间的“汉中盆地”也被蜀国所控制了。关于汉中盆地的情况，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解读。这个位于几方势力交汇点上的地理单元，一直是几方势力争夺的焦点，秦人也曾经渗透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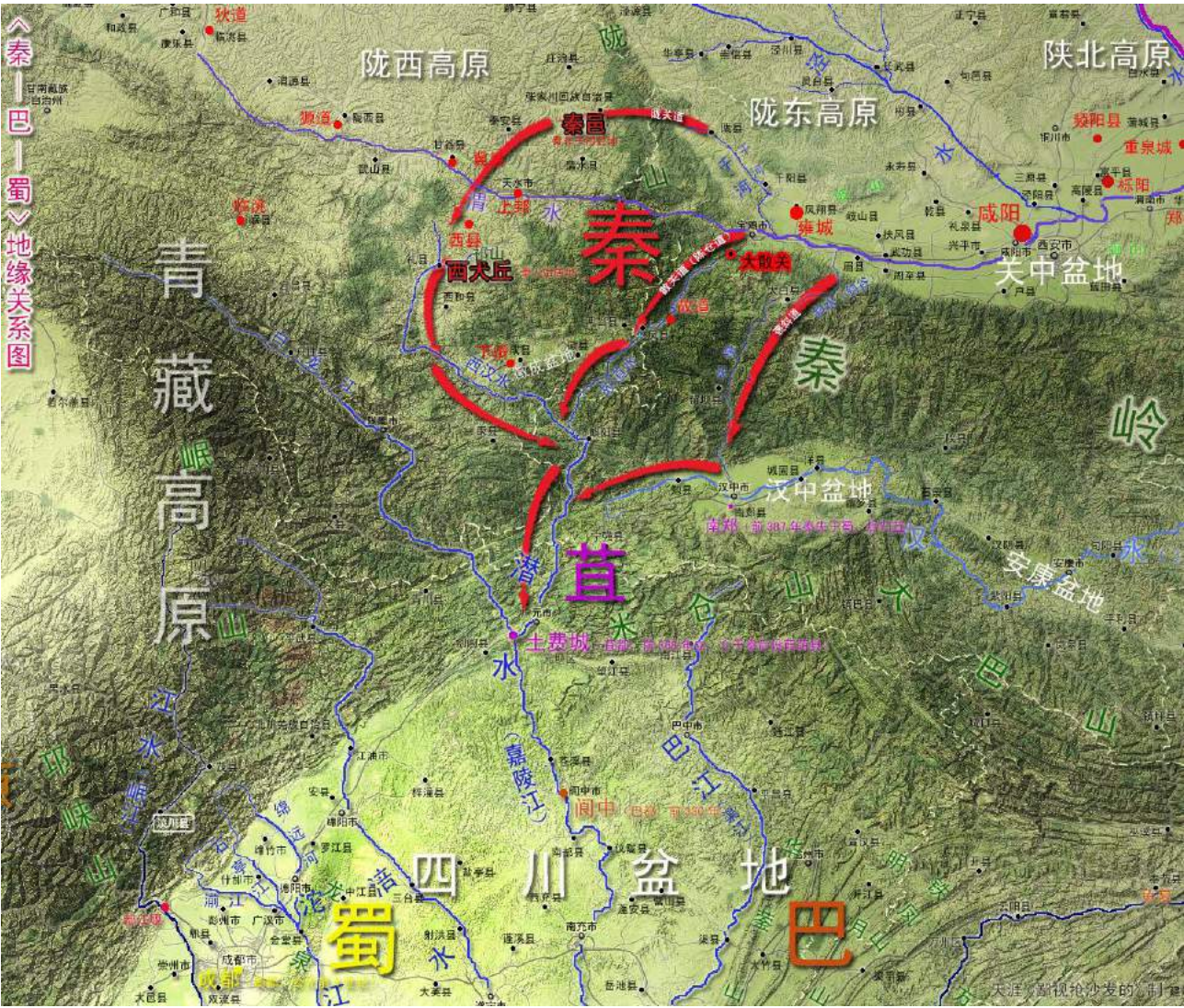
而蜀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上向北扩张，很大程度是因为秦人的战略重点在东线。因为这个时候，秦人与魏国在河西地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了，根本没有精力和兴趣跑到秦岭以南去争夺这块化外之地。问题是，无论蜀人封建出去的苴国在蜀人征服汉中盆地的过程中发挥了何等的作用，从地缘位置上来看，身处成都平原的蜀国贵族都无法直接控制汉中盆地。也就是说，汉中盆地成为苴国的控制区。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苴国的地缘实力。

说了有关“苴国”的情况，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很陌生。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四川盆地应该是由巴、蜀两分天下的，怎么又冒出来了个“苴国”。其实这个国家实际上是蜀国封建在四川盆地北部的一个藩属国，为的就是控制入川的蜀道。苴国最初封建的位置，是在现在的四川省广元市一带，国都叫做“土费城”（广元市西南昭化镇）。说“土费城”大家可能就更不熟悉了，不过后来秦人来了之后，在这里设置了四川盆地第一个县，这个县的名字就要著名得多了，叫做“葭萌”。如果还想起不来的话，可以回忆一下《三国演义》，里面张飞与马超大战的地方就是这。

如果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葭萌这个点正好位于嘉陵江上游两条支流的交汇处（支流的结构，后面会分析）。也就是说不管你从哪个方向来，如果想沿着嘉陵江进入四川盆地的话，“葭萌”都是一个节点。过了这一带以后，就可以进入四川盆地腹

地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葭萌与巴国的联系显然要比蜀国更为紧密。一则是它属于嘉陵江沿岸城市，与巴国一衣带水；二则是葭萌所处的地理环境还是属于山地，更适合巴人而不是蜀人生存。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蜀人正是从巴人手中夺取了这个战略要点，并设置了“苴国”这个藩国以为屏障的。而巴国之所以会丧失了这个门户，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要应对东线的楚国从长江水道所带来的压力。并且在楚国逐个夺取巴人的盐泉之后，巴人的整体实力也已经大不如前了。在这种情况下，将保卫四川盆地北方门户的重任“移交”给蜀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秦——巴——蜀地缘关系图

按照常理来说，蜀国在取得了嘉陵江上游的地缘优势后，应该顺嘉陵江而下，逐次攻击巴国的核心地区，直至江州（重庆）。问题是对于蜀国来说，这样做的收益太小。作为一个已经成功由渔猎转型为农耕民族的国家，能够出产更多粮食的低地才是蜀人所渴望的。而巴人在川东的那些山地，显然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也许巴人的盐可以让蜀人决心放手一搏，毕竟蜀国也要从巴人手上买盐，巴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好日子，也有蜀人做的贡献。不过那些盐泉所处的位置，让习惯了平原地区生活的蜀人想想都可能会头疼，就算占得了一时，在剽悍的巴人袭扰之下，也很难长期据有。更何况盐泉这块肥肉，已经被更为强大的楚国盯上了，再费力地攻击巴国，很可能为楚国做了嫁衣裳。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唇亡齿寒”这句成语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但如果巴国亡于楚的话，蜀人闭着眼睛也能想到下一个会是谁。

有鉴于此，蜀国在攻击入嘉陵江一线后，并没有再把注意力放在巴国身上（让巴人去和楚国纠缠好了），而是沿嘉陵江向北渗透，去寻找新的河谷平原去了。蜀人所寻找到的“新大陆”在秦岭和大巴山脉之间，如果从山脉的角度为之命名，可以称之为“秦巴谷地”；而如果从河流的角度关注它，则可以标注为“汉水谷地”。从大的地理结构来看，这条谷地的位置，是在渭河平原（关中盆地）与四川盆地之间，秦岭——大巴山脉（又可细分为米仓山和大巴山）就是这三个地理单元的分割线。

第二节 秦国渗透入汉中盆地获得据点

蜀人在北出“葭萌”之后，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顺着嘉陵江的西源“白龙江”上行；另一条则是沿着嘉陵江的东源北上（这一路现在也被认定是正源）。如果从两条路线所指向的地理单元来看，西线显然没有太大潜力。因为白龙江等于是沿着青藏高原的边缘上行（岷山东麓），走这条路线，沿途的地貌基本都是高山峡谷，整体的农业潜力甚至还不如川东。更为危险的是，白龙江本身的水量很大，就算你想开发白龙江那狭窄的谷地也是非常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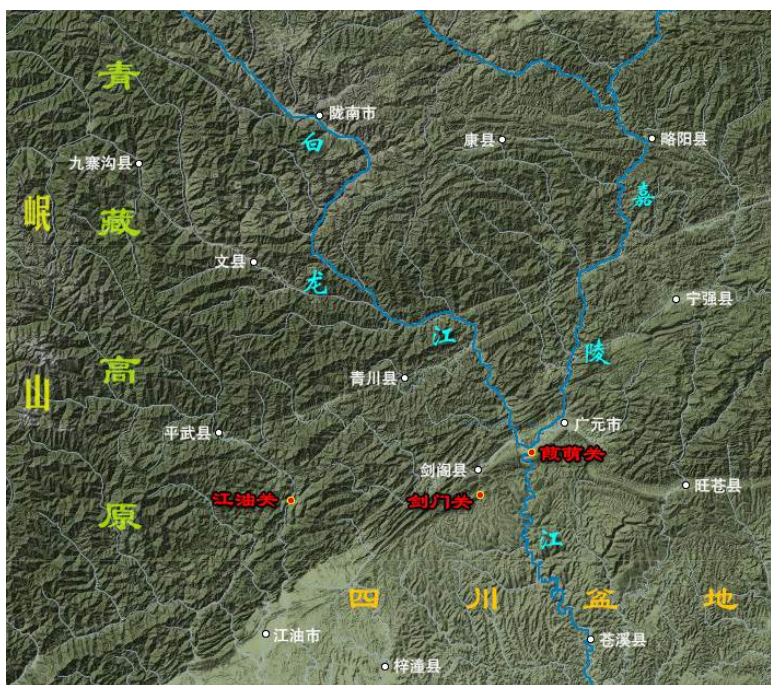
即使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危险也依然没有完全解除。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应当对“舟曲县”这个名字有印象。2010年8月7日22点，位于白龙江上游的舟曲县发生了特大泥石流，泥石流阻断了白龙江并形成堰塞湖。共计造成了1434人遇难，331人失踪。这次灾难的形成，固然与白龙江沿岸的过度开发、植被减少有关，但白龙江水系的水量和峡谷的落差可见一斑。对于先秦时期的人来说，还远没有到人口爆炸的程度，因此并没有必要冒险去开发这类地区。

白龙江河谷虽然本身没有太大开发潜力，不过沿着它一直往北走的话，倒也可以到达陇西高原的西南边缘。因为从地理结构上看，白龙江的上游河谷（舟曲以上），可以视作青藏高原与陇西高原（也相当于黄土高原，因为陇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的分割线。只是就算蜀人对陇西高原感兴趣，而且还敢对秦人的“祖地”下手，也没有必要走这条路线。因为相对更容易通行是嘉陵江东源，这条路线可以直插陇西高原的核心地区（高原东部）甚至关中盆地。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白龙江在历史上就没办法发挥战略性作用了。毕竟它也



甘肃白龙江



四川盆地北部地形图

能够提供一条可能选择的道路。因此为了保证陇西高原的安全，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国也还是在白龙江中游设立了一个县级行政单位——武都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陇南市。而武都在一千年之后的三国末期，有机会成为决定中央之国命运的关键地区。由秦人故地出发的魏国人邓艾，先到达了白龙江河谷，不过他和他的敢死队们并没有顺着河谷继续向南走，因为那样的话等于还是要面对四川盆地的北大门“葭萌关”¹。而这个天险，恰恰是魏军想要绕过的。

邓艾之所以能够奇袭蜀汉得手，就是因为他“不走平常路”的选择。因为他没有按常理选择顺河谷行军，而是由“武都”（陇南）渡过白龙江，翻山越岭绕过了蜀道天险，插到了正面防守的蜀军的背后。这条新开辟的小路，史称“阴平道”。不过这条道路的开发已经属于三国的的事了。我们还是

遵循历史的轨迹，来探究一下秦、蜀之间的沟通路径吧（可以提示一下，在武都也就是现在的陇南市下面，有一个“文县”，在当时叫做“阴平”，是阴平郡的郡治）。

从地理结构来看，无论是秦人想入主四川盆地，还是蜀国敢对陇西、关中有想法，他们都必须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即使沿嘉陵江东源能够开辟出道路，但这样长距离的连续翻越高山林密的秦、巴山脉，在古典时期也是很难做到的（从广元到天水或者宝鸡，差不多都接近四百公里了）。这样长的攻击路线，并且所倚仗的是中央之国核心区最难行走的道路，如果在中间没有一个有自给能力的地理单元

1 当时钟会被阻于剑门关上，葭萌关则位于嘉陵江与白龙江会合之处。

为秦、蜀之间的沟通作跳板，秦、蜀两国都很难对对方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这个跳板的任务，则当仁不让地落在了秦、巴山脉中间的这条谷地之上。

从地势来看，秦巴谷地所包夹的汉水流域，还是有一定纵深来淤积成平原的。而冲积出来的平原，虽然比不上关中和川西的规模，但也有相当的体量。只不过整条汉水谷地并不是一片连贯的平原区，其由西向东又可以分为汉中盆地、安康盆地等地理单元。而秦、蜀双方所关注的，主要是汉水谷地西端的“汉中盆地”。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中盆地在汉水谷地诸单元中体量最大，另一方面更因为它的位置贴近嘉陵江。无论是秦人还是蜀人，如果选定嘉陵江沿线为渗透路线的话，汉中盆地都可以作为中继站和攻击对方腹地的桥头堡。



汉水流域地缘结构图（战国）

对于位于秦岭以北，控制了陇西高原、关中盆地的秦人，以及位于大巴山脉以南，控制了四川盆地西半部的蜀人来说，渗透入秦巴谷地的机会是对等的。这个对等不仅仅在于双方到达汉中的直线距离差不多，更在于秦岭和大巴山脉这两条山高林密的山地，通行难度都非常大。因此汉中盆地也成为秦、蜀两国博弈的焦点地区。有时候位于川东的巴人也会参与进来，不过坐拥盐资源的他们，对于那些农耕民族视若珍宝的平原并没有太大兴趣。即使

是参与进来，也基本是打完了就走。

由于秦、巴山脉的阻隔，汉中盆地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并孕育出过本土的地缘力量。而在外部势力未介入之前，生存在汉中的族群叫做“褒”，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也就叫做褒国。看见这个“褒国”，大家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那个引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并间接导致西周灭亡的美女“褒姒”，就是由褒人所献（所以汉中的地缘标签，在史书中有时也被标注为“褒汉”）。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汉中盆地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地理单元。最起码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和秦岭以北地区有过密切的交流了。

由于关中地区在中央之国的优势地位，因此汉中盆地的褒国优先打通与关中的交通路线，并参与进周人的政治生活，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过这种相对密切的联系也存在着风险，因为既然褒人有办法穿越秦岭进入汉中盆地，那么反过来，关中的入想渗透入汉中盆地也同样可以沿着相同的线路反方向行走。虽然秦国最终还是成功的渗透入了汉中盆地，并将褒国灭掉了。但秦人并不是第一个由关中渗透入汉中的族群。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一支同属华夏的族群做过尝试了，他们就是周平王东迁后的一部分郑国遗民。



汉中盆地

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西周王室连同他的大多数嫡系诸侯们（如虢、郑）都不得不退出渭河平原，向东迁徙，这也就是著名的“平王东迁”。而东迁之后就进入了我们熟知的东周时代，或者说是“春秋”、“战国”时代。不过，在这些

东迁的族群中也有例外的。留下来收拾残局的秦人自不必说了，即使是郑、虢这两个最为亲近的诸侯国，也有一部分族人没有东迁。其中虢国（也就是西虢）有一部分人故土难离，留在了原地（陕西岐山、扶风一代），史称“小虢”。当然，小虢后来的命运也和那些关中的戎狄一样，被秦国所吞并。

而郑国除了公室带着大部分族人迁至“新郑”以外，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穿越秦岭，到达了汉中盆地。这部分南迁的郑人所定居的区域，就在现在的汉中市一带，史称“南郑”。郑人的这次尝试，无疑为华夏族的地缘扩张开拓了一条新的路线。也许在这些郑人看来，能够生出“祸国红颜”的地方，想来也不是个太难生存的地方。汉中盆地封闭的地理环境，让这部分南迁的郑人得以在远离政治漩涡的环境下，平安地渡过了整个春秋时期。不过既然郑人能够突破秦岭天险，那么在秦岭以北已经取得绝对优势的秦人，也自然也有机会向南突破了。

秦人渗透入汉中盆地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451 年，那时晋国的赵、魏、韩三家刚刚在第二次晋阳之战中联手灭掉了智氏（公元前 453 年），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我个人认为，这一年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春秋、战国分界线）。按照常理来说，面对一个分裂的大国，秦国应该有机会东进，从晋国的分裂中得到些好处的。不过晋国的这次分裂，其实并没有削弱它的整体实力。这主要是因为，晋国长期以来就

已经是处在内部分裂状态了，或者说几大家族早就各自自成体系在支撑晋国这个空壳子了。现在赵、魏、韩三家在内部博弈中胜出，并相互达成妥协，反而有助于“晋”的整体实力更上一层楼。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各自发展的“三晋”，在战国时代的整体实力也超出了春秋的晋国。而在共同的老冤家“秦国”面前，最起码在战国第一阶段，三晋之间还是能够紧密团结在一起的。

不管秦国在后来如何风光，在土地兼并成为潮流的战国时代（春秋时还是以间接控制为主），被三晋堵在关中的秦人，暂时还没有机会东进。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秦人决定跨越秦岭，向汉中盆地渗透。秦人所获得的第一个据点，就是南迁郑人的聚居地。至于征服的过程是采用战争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秦人在此所筑的城邑，还是足以让后人记住郑人在开拓汉中盆地上所做出的贡献的。这个新的秦国城邑叫做“南郑”（现在在汉中市西南还有南郑县，算是老名新县了）。

秦人的这次南进并不能算是全面征服，只能说是获得了一个据点。因为同样对汉中盆地感兴趣的，还有大巴山以南的巴、蜀两国。另外汉中盆地的本地部族，如褒国，都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凭借在山地中的生存优势，巴国在这部汉中“三国演义”中，初期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有一种说法是褒国是在战国中期被巴人所灭掉的，而不管褒国是被秦人还是巴人所灭，他们都没有成为汉中之主。巴国没有真正地控制汉中盆地，除了他们本身不事农耕，对于平原地区不太感兴趣以外，需要将大部分的精力西向应对楚人从长江方向所施加的压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而蜀国之所以没有在接下来的博弈中快速地占上风，很大程度是因为秦国当时的重点还在河西之地。与河西之地相比，汉中的得失是无足轻重的。和秦、巴两国需要分神应对来自西线的压力相比（还是战国前期最强的魏、楚两国），在成都平原偏安日久的蜀国，就显得游刃有余得多了。当蜀人能够控制北出四川盆地的嘉陵江河谷以后，他们最终成为汉中之主（公元前387年）。而之后所设立的“苴”国（公元前368年），其战略任务除了扼守四川盆地的北大门以外，更是为了帮助蜀人控制汉中盆地。

第三节 苴国联结巴国和秦国来对抗蜀国

在最开始提到苴国时，我们就说过了，从战略布局上来看，蜀人的这种做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将最重要的战略要点封建给自己最亲近的族人并建立藩国，直到古典时期后期，都是一种重要的控制手段。如果苴国的封建仅仅是为蜀国看守门户的话，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葭萌的位置处于山地之中，论地缘潜力是远远不能够和在成都平原的宗主国“蜀国”相比的。问题是苴国得到的不仅仅是葭萌，由于地缘结构的关系，身处成都平原的宗主国蜀国难以控制汉中盆地，因此新近夺

取的汉中盆地也被划归给了这个新封建的藩国，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苴国的实力。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虽然苴国的都城还是在山地之中的“土费城”，但他们也同时拥有了自己的战略后方。从后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汉中这个次一级的地缘板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诞生过多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能够同时掌控入川的通道，无疑更加增强了苴国的离心力。面对一个能够封关以自守的地缘板块，经受不住诱惑也是人之常情。在我们所熟知的三国故事中，与邓艾一起终结了蜀汉的钟会，就曾经有过同样的想法。

实际上对于苴国人来说，他们所想的并不仅仅是在汉中盆地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因为最初封建在苴国的国君，其身份是蜀王的弟弟，也就是说从血统上来看，苴国的君主同样有入主成都平原继承大统的资格。这种“小宗代大宗”的想法，在华夏诸侯中也被无数次实践过。只不过有的成功了，如晋国的“曲沃代翼”；有的失败了，如郑国的“郑伯克段于鄢”。

从苴国的实力来看，想凭借汉中盆地来与成都平原的大宗相对抗，还是很困难的。毕竟汉中盆地的农业潜力没有川西平原高，而且蜀国还控制了大片川中丘陵地带，且经营日久。因此苴国想到了联合四川盆地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巴国。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巴人之前应该也没有想到过，会联合一部分“蜀人”去攻打蜀国。在巴国强盛的时期，他们也许会不屑于和苴国联手，不过现在的巴国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在被楚国夺取掉所有的产盐地之后，巴人也需要从蜀国身上弥补损失了。

在国与国之间的持久战中，最终决定战争结果的还是双方的国力。而在这方面，新兴的苴国和衰弱中的巴国加在一起，也没有在与蜀国的博弈中占据优势；更何况在一个联盟当中，1+1的结果往往并不会等于2。不过从蜀国的角度来看，在与巴、苴两国的博弈当中，也并非没有重点。首先巴国所占据的那些山地，从来都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地方。无论是出于战略安全、政治需要还是地缘潜力的考虑，从苴国手中收回葭萌和汉中盆地，才是蜀国的战略目标。

苴国的贵族当然知道如果败于蜀国，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在与巴人的联合没有取得预想效果的时候，苴人将联盟的目标投向了北方。在秦岭的北面，曾经渗透入汉中的秦人，也许能够帮助苴人达成心愿。从苴国的角度看，他们当然不会没有考虑到引秦人进来的可能后果。所谓“无利不起早”、“请神容易送神难”，没有实际的利益，秦人是不可能出兵“帮助”这个边缘国家的。如果揣度当年苴国的打算，他们的想法应该是借助秦国的力量打败蜀国，然后将汉中盆地割让给秦国，自己入主成都平原，完成“小宗代大宗”的政权更迭。只不过苴国人毕竟不是秦国人，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还要看秦人是怎么想的。

在接到苴国的求救之后，秦国并没有马上决定出兵，而是在内部展开了一场究竟要不要南进的讨论。只不过秦人所讨论的南进方案并不是如苴人所愿的那样，帮

他们灭了蜀国，而是一个通吃的方案。对于强大的秦国来说，苴人的请援，是他们入主四川盆地，而不仅仅是占据汉中盆地的机会。因此秦人所犹豫的，是整个四川盆地的战略价值，以及所控制的难度。毕竟对于秦国来说，秦岭以南是被隔离在中央之国之外的化外之地。之前对于汉中盆地那次不成功的尝试，除了秦国志不在此，投入力量不够外，秦岭所起到的地缘分割作用太大，让汉中地区无法与渭河平原整合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更何况秦国现在已经将魏国赶出了河西之地，正在重拾他们的东进之梦。至于说这最终让秦人决定南征的因素是什么，秦人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路线进攻蜀国的，我们后面再分析。

第四节 秦国伐蜀与由陇西入蜀的通道

在古典时期，每一次地缘结构的调整，基本都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完成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中的体现。只不过相比于动物，人类更擅长于运用智慧和工具罢了。也正因为地缘结构的调整多是通过军事行动体现出来的，所以军事家们的作用往往更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从这个角度看，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也的确诞生了几位著名的军事家，他们所指挥的几次重大战役，直接帮助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央之国的任务。

在这些将领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身处战国末期的白起、王翦以外，还有一位将领对秦国的崛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将领叫做“司马错”。如果说白起、王翦战术能力出众，那么司马错却更应该被看作一位“战略家”了。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秦惠文王（秦孝公之子）在犹豫要不要伐蜀时，力排众议劝说秦王伐蜀。而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就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两位纵横家之一——张仪（还有一位是苏秦）。张仪的意见是秦国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传统的路线上，即挟收复河西之势穿越崤函通道攻击韩国，以达到入主中原的目的。

张仪的战略看似是比较安全的，毕竟这条路线是居于渭河平原的政治力量走出黄土高原的基本通道，当年的黄帝和周人也都是这样走出去的。问题是这样做有风险，秦人其实也是很清楚的。战略上的风险是：秦国还没有能够把三晋从山西高原南部赶出去的能力。秦国如果希望置韩国于死地的话，就有可能重新上演当年“崤之战”的那一幕；另一个对秦人不利的，则是政治上的风险。虽然三晋的内部已经产生分歧，但在面对秦国的进攻时，三晋很有可能又重新联合在一起，并且秦国试图入主中原的想法，也会引起山东（崤山以东）其他诸侯的不安，毕竟这块蛋糕原本没有秦国的份。

面对这个秦国外来户的强势进攻，其他诸侯很可能也会和三晋站在一起（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面对这两个因素，秦国即使能够在战役中取得战术胜利，也很难将之转化为战略成果，即很难在中原大规模地开疆扩土。与直接东进中原的方

案相比，司马错所提出的，先向南夺取巴、蜀之地（包括汉中），然后凭借汉江、长江的上游优势顺江而下，攻击六国中最为强大的楚国，就可以巧妙地规避这两个风险了。

首先，楚国本来就是游离在华夏诸侯体系之外的“蛮夷”之国。尽管大家相互已经打了几百年的交道，楚国也算得上是中央之国的正式成员了。但从文化认同上来看，最起码在周人的世系中，楚人是很难和那些华夏诸侯们找到共同语言的（为了和周人对着干，楚人认了黄帝的孙子“高阳”做祖先，真要这样，周人的祖先那时还不知在哪呢），更何况中原诸国大多数吃过楚国的亏。以楚国为率先攻击的目标，引发大规模联盟的机会是很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蜀国，或者说巴蜀。与攻击韩国会引发连锁反应相比，攻击这两个边缘地区的边缘国家，根本不会引起其他诸侯的关注。那些山东诸侯们至多也就是认为秦人又收服了几个边缘部落。

我们一直在说，高地对低地，上游对下游有地缘优势，而这个“地缘优势”是狭义的，即指“军事优势”。具体的优势是如何体现的，秦国在取得巴蜀之地后倒是有一个表述。当时秦王照会楚王，说到如果秦国的军队在丰水季节从上游出发，只需要四天时间就可以到达南阳盆地；而如果从长江上游出发的话，也只需要五天时间就可以进入江汉平原。这就是地缘优势的具体体现。当然，现代技术的发展，河流流向对于军事的影响力已经降低很多了。但是通过截流上游水源，对下游地区所形成的战略威胁，影响面要更大，并且不仅仅限于军事上。

司马错当时力主南征，所看中的也正是汉中盆地、四川盆地在汉江、长江的上水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盆地如果能够经营好的话，相当于再造一个渭河平原（渭河平原约3.4万平方公里；川西平原约2.3万平方公里；汉中的平原区接近1万平方公里）。这对于一直不能到华北平原去争夺土地的秦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单纯比较平原面积可能有些片面，但足以让我们从数量级上做出判断：如果秦国越过秦岭吞并了苴、蜀、巴三国的话，秦国的国力将会得到成倍的增长。

按说蜀地有这么大的潜力和军事价值，司马错之前的秦国政治家应该也有人能够看到的，当年入汉中经营“南郑”就是一次尝试。但如果秦人想经营秦岭以南地区的话，最大的问题还是通道问题。改革开放后，各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想富，先修路”。在地缘博弈中，也是这样的，没有合适的道路，地缘扩张就是一句空话。

说到秦国南征的道路，那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蜀道”了。从狭义的概念来看，蜀道指的是从葭萌（广元）到成都的道路，也就是从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到达成都平原腹地的道路；而从广义的划分来看，从渭河平原出发，一直到进入成都平原的道路，都可以归入“蜀道”的概念。如果从道路的前半段来看，摆在秦人面前入蜀通道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西出陇山，进入陇西高原，然后再南下穿越秦岭、大巴山脉的西端，最后进入四川盆地。

这第一条战略通道，很有可能是秦人所发现的第一条战略通道。因为当年秦人

正是由陇西高原兴起的。在陇西高原的渭河以南地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叫做“礼县”的县级行政单位。礼县一带，就是当年秦人的发源地“西犬丘”的所在地。而西犬丘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其能够连通渭河水系，在它的境内更有另一条重要的河流——西汉水。在古典时期，西汉水是一条非常重要和特别的河流，至于它特别在何处，我们后面会讲到。



嘉陵江上游地区示意图

从现在的水系结构上来看，西汉水与白龙江一样，都是属于嘉陵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汉水也是作为嘉陵江正源的面目在历史记载中的。不过在地缘结构里，是不是正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秦人如果从西犬丘或者说陇西高原出发的话，他们可以顺着西汉水——嘉陵江干流到达葭萌，然后进入四川盆地。

西犬丘位置的确定，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在礼县境内大堡子山，秦人第一祖陵“秦西垂陵园”的考古发现。不过这个位置的战略地位，其实在秦人之后的历史中，已经多次得到验证。

其中最为著名的那段历史，就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实际上蜀汉的北伐，真正出祁山的是两次）。所谓“祁山”所指向的位置，也正是西汉水源头以北的这片区域。换句话说，蜀汉和当年的秦人为了控制陇西高原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只不过大家的攻击线路正好相反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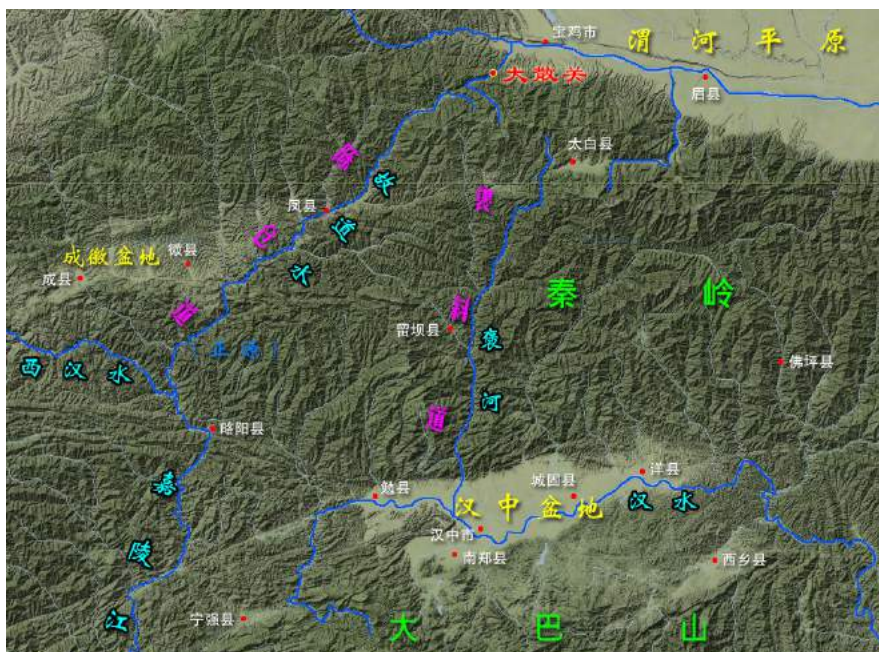
由秦人的祖地西犬丘出发，沿西汉水——嘉陵江一线攻击蜀国，固然是一种选择。但对于秦人来说，这条路线作为战术选择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秦国的核心区已经转到渭河平原了。也就是说如果秦人要由陇西高原发起进攻的话，就需要先调集人力、物资西向由陇关道（关陇古道）穿越陇山，然后转向南穿越秦岭、大巴山脉。这样做无疑会拉长战役的准备时间，并增加成本。当然，如果没有更为便捷的通道，这条战略通道也不失为一个选择。不过问题在于，秦人在这个方案之外，的确还有

更为便捷的道路可以绕过陇西高原，直线插入嘉陵江干流通道去。

第五节 关中地区可经由陈仓道入蜀

如果要论知名度，绕过陇西高原，直插入嘉陵江干流通道的这条战略通道，无疑是最知名的。由于它由渭河平原西端进入秦岭的关口叫做“大散关”，因此被叫做“散关道”；又由于渭河平原西端的主要城邑叫做“陈仓”（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设立的“陈仓县”，现在是“宝鸡市”的一个区），因此也被称作“陈仓道”。

与第一条战略通道一样，陈仓道也是利用了嘉陵江上游的一条支流进入嘉陵江通道的。在西出大散关后不久，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叫做“故道水”的河流。这条嘉陵江上游支流向西南方向前行，最终在现在的陕西省略阳县西北方向与西汉水合流成为嘉陵江干流。选择故道水的好处在于，线路更接近于直线，可以缩短行军时间。不过这样漫长（接近400公里）的山路（还是最难走的），如果中间没有战略基地提供支撑的话，战略风险会很大，补给的压力也会很大。



汉中盆地及周边地形图

好在秦人的这条快捷通道，中间并非没有可供落脚的跳板。秦岭的西端虽然不如东端那样分出那么多分支来，但中间也还是切割出了一条小型盆地，并将西秦岭分为上下两部分。而这个处在秦岭包夹之下的小型盆地，正位于故道水的西侧。由于现在这个盆地主要归属成、徽两县，因此也被标注为“成徽盆地”。

如果从长度和流量来看，故道水和西汉水、白龙江相比并没有优势。不过现在一般还是认定斜穿秦岭的这条故道水是嘉陵江正源，这种认定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是由关中入蜀最接近直线的通道（难度大家都差不多了，都够难走的），“大散关”也因此无可争议地位列“关中四塞”。在唐以前，这条横穿秦岭、大巴山脉的大河，是以西汉水作为正源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之后才有嘉陵江之名，并以故道水为正源。

而故道水之所以能够成为嘉陵江的正源，是因为华夏政权并不总是能够保有对

陇西高原的控制权。鉴于于陇西长时间处于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边缘，加之以故道水为指向的“散关道”是直接连接关中、蜀地的通道，因此故道水在三条源流之中虽然是体量最小的源头，但被习惯性地认定为嘉陵江正源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故道水”之名也被湮没了，反而是白龙江、西汉水之名能够出现在现在的地图上。



故道水（凤县嘉陵江）

在文化争夺战愈演愈烈的今天，嘉陵江的源头也出现了争议。最起码甘肃的专家学者希望能够依据客观数据，将白龙江确定为嘉陵江的源头。如果最终“正名”的话，应该对当地的旅游业会有所影响，不过在具体的基础建设中，谁是“正源”并不重要，由关中通往成都的“宝成铁路”，还是沿着散关道修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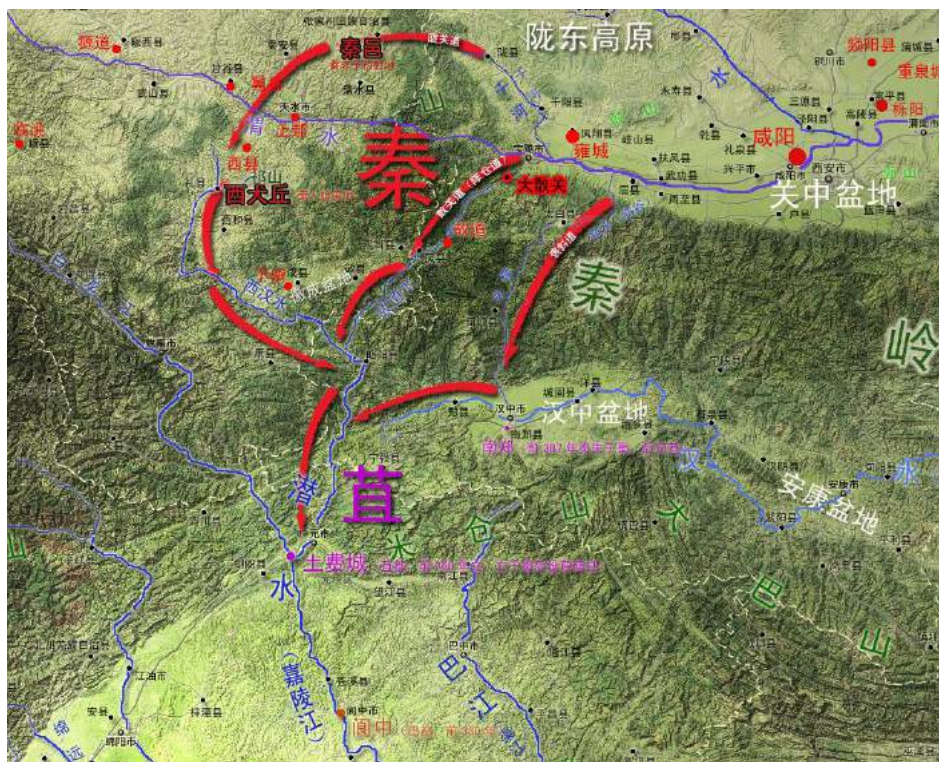
第六节 汉中盆地的重要性与褒斜道的路线

虽然西汉水、故道水通道是连通秦、蜀两地的重要通道，但如果秦、蜀两地不是处在同一政权统治下，它们往往并不会成为优先选择的战略通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汉中盆地的存在。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你是沿西汉水由陇西高原出发，还是沿故道水由渭河平原出发，在两条道路相汇之后，都要从汉中盆地的西侧通过，然后再穿越大巴山脉进入四川盆地。也就是说，如果汉中盆地掌握在你的对手手上，那么无论你是由蜀入秦，还是由秦入蜀，行走在这条脆弱的蜀道之时，都没有安全保障。

事实上，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以汉中盆地为战略基地，控制秦——蜀通道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不能将汉中盆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嘉陵江沿线的那些据点、驿站也同样会失于敌手。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战略还是战术的角度看，想绕过汉中盆地直接沟通秦和蜀，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国时期，魏、蜀两国都要在掌控汉中之后，才能对对方发起攻击。

如果想从关中地区进入汉中盆地，有一种方案是沿西汉水或故道水南行，然后在合流之后，东向转入汉中盆地。仔细观察地图，我们会发现，南北向的嘉陵江其实和汉水的源头离得很近，并且当中有一条现成的峡谷可以利用。也就是说，由嘉陵江通道进入汉水谷地并不会太难。其实就西汉水与汉水的地理关系，在历史记载

中是很混乱的。在早期，西汉水和汉水经常会被认定为一条河流。也就是说西汉水南流之后，并没有注入四川盆地，而是东向与汉水的干流相通。而如果一直是保持这种结构的话，那么白龙江的“正源”地位，倒也不用争了。至于说为什么西汉水后来会与嘉陵江合流，地理上的解释是因为地震改道。



秦——巴——蜀地缘关系图

从西汉水的得名上来看，西汉水在早期曾经是汉江的源头，还是很有可能的。也正因为如此，位于现在汉江上游谷地的“汉中盆地”，才会被标注为“汉中”，而不是“汉源”。不过西汉水的前世是否真是汉水的一部分，并不重要。因为从地理关系上来看，入川的嘉陵江和最终流进江汉平原的汉水，都可以

指向西汉水源头处的“西犬丘”。也就是说，从地缘关系上来说，居于陇西高原的族群在南迁时，沿着嘉陵江入川的机会和沿着汉水入汉水谷地，直至江汉平原的机会是对等的。

既然汉中盆地对于秦、蜀两国来说，有这么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国家都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进入汉中的。如果让蜀人来走的话，他们所选的路线会是由“葭萌”切入嘉陵江通道，然后再北上到达汉水的西侧，再东向进入汉中盆地。这条整体呈“西南——东北”向的路线，虽然略有弯折，但整体上还算得上是一条直道，没有让蜀人走太多的冤枉路。

如果说蜀人在选择进入汉中盆地的道路时，不需要做太多选择的话，那么秦人在做同样的事情时，就要费点周章了。要是秦国的地缘中心还在陇西高原，那么沿西汉水东向切入汉中盆地，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问题是，现在秦人的核心区已经在渭河平原了。让驻扎在陇西高原的军队从侧翼对汉中盆地施加压力，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以这个方向为主攻方向，向汉中盆地渗透的话，秦人在由渭河平原调配资源时，就需要花费成倍的成本了。而秦人即使依靠更为强大的实力得到了汉

中盆地的控制权,但要想将影响力由关中辐射入汉中,就算是由故道水转入汉中盆地,也还是不得不在险峻的山路上绕上个圈子,这显然会直接影响秦人对于汉中盆地的控制力。

有鉴于此,在秦岭腹地开辟出直接沟通关中、汉中的道路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尽管依据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要想在秦岭腹地开辟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在整个古典时期,秦岭的腹地也是被开辟出了多条道路。而最先被利用的,也是通行条件最好的就是“褒斜道”。



秦岭栈道

我们说了“褒斜道”在几条秦岭小道中算是通行条件较好的,其实这个较好,也只是相对而言(主要还是因为直接指向汉中,所以维护得较好)。这些穿行于秦岭之中的河流,根本没有在河道两旁冲出足够的河谷让人通行。为此,沿着河道旁边的峭壁开凿孔洞,插入支架,然后再铺上木板通行,成为唯一的选择,这也就是所谓“栈道”。

在连通秦、蜀两地的“蜀道”中,“栈道”也是经常被迫使用的交通形式。而开凿于“褒斜道”中的栈道,则是属于标志性的栈道,也很有可能是最早使用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如果进入战争时期,防守的一方要想阻止对方的进攻,只需要将栈道烧毁,就可以起到迟滞对方进攻的目的了(诸葛亮北伐退兵时,就经常这样做)。

鉴于由陈仓道攻击汉中盆地的成本较高,也容易遇到逐级抵抗的情况。因此军事家们往往更倾向于使用能够直接插入汉中腹地的“褒斜道”。只是要想走这条捷径的话,你得首先保证有路可走,即“栈道”没有被毁。这也正是为什么刘邦当年要修栈道的原因。当然,如果你在对方知晓进攻意图的情况下,即使有能力修复栈道,对方在出口处也很容易截击成功,让你功败垂成。所以汉军当时“明修栈道”是虚,绕个圈子“暗度陈仓”才是实。

基于刚才的分析,如果在战争开始时再临时修建道路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在秦国攻蜀的过程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似乎可以解释秦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秦国为了打通攻蜀的道路,弄了几头石牛,然后传言石牛

能粪金，并告知蜀国要送给蜀王。而为了接受这几个宝贝，蜀国派人修筑了通往秦国的道路，因此蜀道也被叫做“金牛道”。

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说了，在秦人决定攻蜀之前，沟通关中、陇西——汉中、蜀地的道路就已经存在了，并不存在到了攻蜀之前，再计诱蜀人修路的情况。从逻辑上看，如果秦、蜀之间一直没有可供通行的道路，那么秦人也就无法向蜀人传递消息，更谈不上计划攻蜀了。不过鉴于蜀道非常容易被破坏掉，因此蜀国在占据汉中之后，封闭了褒斜道（其他两道要想封闭也不难），以防秦人的渗透也是很有可能的（蜀人还没有力量继续向关中渗透，封关以自守是正常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秦人计诱蜀人重新修通道路，也是符合逻辑的。

只是即使是秦人计诱蜀人修通了包括褒斜道在内的蜀道，他们的军事行动也只能对汉中盆地起作用。因为无论他们突袭汉中盆地的行动有多么突然，蜀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如在“葭萌”这个点上封关以自守，保住川西平原的核心区，不受秦人侵扰。这样的话，秦人所收获的就只是汉中盆地了，再想图谋四川盆地的话，就要面对持久战了。

第七节 秦军入川攻灭苴巴蜀三国

秦人越过秦岭，灭掉巴、蜀，并将汉中盆地、四川盆地收入囊中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在公元前 316 年就完成了。能够这么迅速地完成任务，当然要感谢那个占据汉中盆地，并建都“土费城”的苴国了。引狼入室的“苴国”不仅害得自己亡国，也连累了巴、蜀两国同时亡于秦人之手。而秦人对于苴国的“感谢”，就是将苴都土费城“升级”为四川盆地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单位。

有了“苴国”的背叛，蜀国的迅速土崩瓦解是可想而知的。失去了天险保护的川西平原，再也无力阻挡北方来敌的进攻了（在后来的诸多案例中，这个时候成都平原上的政权，往往都已经在心理上崩溃了）。而身处山地的巴国，理论上应该可以抵抗更长时间的。不过这个时候的巴国，在楚人的攻击下，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实力远强于巴、蜀，又通过征服苴、蜀两国占据了上水优势的秦人，乘势攻入阆中、江州几个巴人的重要据点并不算难事（后来南宋之所以能在钓鱼城这些山城中抵抗一些时间，是因为还能通过水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补给）。在这些重要城邑丧失于秦人之手后，即使有部分巴人退入山地之中，但作为一个国家，巴国也可以被宣告亡国了。

说到这里，可以再提下“巴”这个特殊的国家。巴国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生存方式。这种以资源 + 区位立国的方式，很像现在中东的那些产油国。一旦这些资源被掠夺或者被找到替代品，崩溃往往是在一瞬间。在以农业立国的东亚古典社会，巴国这种不事农耕，依靠控制食盐所获得财富而强大的生存方式，

本来就被视为异类。而巴人异常强悍（山地所赋予的性格）的战斗力的，又经常凭借区位优势介入核心区的地缘博弈，更让那些正统诸侯（包括楚国）们感到不平。

因此对于“巴”文化，也流传下来一些负面的评价。其中最为知名的评价就是“下里巴人”，以用来评价巴人音乐的不入流。演变到现在，已经衍生出“乡巴佬”一类的，带有强烈贬义的词汇了。而与“下里巴人”所对应的成语：“阳春白雪”所代指的音乐，则相传是源于两个出身“高贵”的诸侯国——晋国或齐国。在形容对“巴”人的评价当中，还有一个典故是用来形容巴人野心的，那就是“巴蛇吞象”。这个典故演化到现在，则变成了“贪心不足蛇吞象”。就“巴”这个字的字形而言，也很有可能是源于蛇的形象（应该是蟒蛇）。

举出“下里巴人”和“巴蛇吞象”的典故，并非是在贬损巴文化。相反，作为中华文明中为数不多的异类，巴文化为我们呈现出了不同的生存样本。巴国的兴亡也可以为我们处理当代的地缘政治提供历史经验（包括那些资源性城市在资源耗尽时，如何思考转型的问题）。

关于秦、巴、蜀之间的地缘关系，以及“苴”的战略地位，相信通过这部分的解读，大家已经比较清楚了。不过在征服巴蜀之后，秦国的崛起之路还远未走完，下一步他们就要面临更为强大的对手——楚国了。在秦人征服巴蜀的过程中，有很多朋友心里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时候楚人在做什么。如果说楚国在长江一线受阻于巴国，未能渗透入四川盆地腹地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与楚国核心区——“江汉平原”一水相连的“汉中盆地”，为什么楚国也未能抢在秦人之前染指呢？这个问题的解答，就要放在下一部分了。到时候我们会对整个汉水流域的地缘结构作一个全面解读。

第二十二章 秦国和楚国争夺汉水谷地

第一节 汉水谷地的地理结构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汉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族名，来源于汉水。更由于这条以“汉”为名的河流能够将黄河——长江流域连接在一起，从地缘结构上促使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融合，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汉族”。也正因为如此，“华夏族”这个文化概念可以说是黄河文明所造就的，但“汉”文明则是由黄河、长江文明融合而成的。

如果要探究“华夏”——“汉”的转变过程，那么这个转变主要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汉朝则是最终成型）。黄河文明的代表“秦”与长江文明的代表“楚”之间的博弈，就是这两大文明博弈、融合的典型案列。我们现在所要解读的“汉水谷地”，则是这两个诸侯国争夺的重点区域。

关于汉水，我们在春秋阶段解读楚国的时候，已经部分解读过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所解读的主要是汉水的下游，也就是进入平原之后的那部分。这部分汉水连同长江所形成的江汉地区，成为楚国的核心地区。而我们现在所要解读的，主要是汉水在山地之中的中上游部分。这部分河流（包括支流）所覆盖的区域，可以统称为“汉水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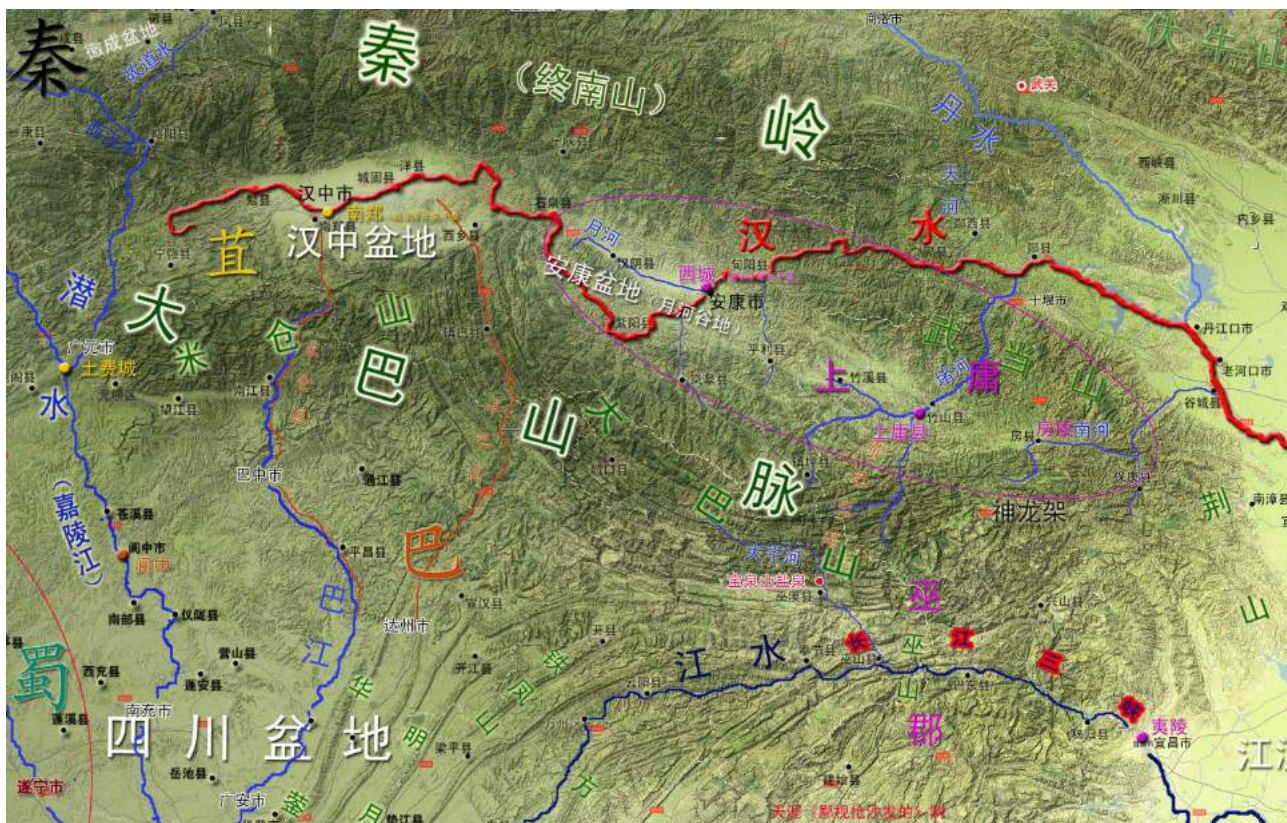
从现行的行政区划来看，由西向东，从汉中盆地西端的“宁强县”（陕西）至汉、丹两水（江）交汇的丹江口市（湖北）之间的汉水流域，都包含在“汉水谷地”这个地理概念之中。不过如果我们将“汉水谷地”的概念收得再窄一点，即谷地是否主要由“汉江干流”冲积而成这个标准来定义“汉水谷地”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大家会发现，只有位于汉水上游地区的“汉中盆地”才符合这个标准。也就是说，汉水横穿了“汉中盆地”这个地缘板块，并为之带来了汉水谷地中面积最广，农业条件最好的河谷平原地区。

至于汉中盆地以东的汉水中游地区，人类主要活动于汉水的诸多支流两侧。这些支流两侧冲积平原的体量，较之汉中盆地，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因此大家一提到秦岭、大巴山脉中的汉水谷地，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汉中”这个地缘板块，甚至将之视为汉水谷地的全部。事实上汉水中游的地缘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地理结构的关系，在春秋之前，这些山地之间也存在着许多边缘部落。只不过到了战国时期，位于汉水下游的楚国，经过长时间的渗透，控制了汉水中下游地区，并最终在此与南下的秦国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我们先从整体上来看汉水谷地的结构。所谓“谷地”，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两山之间的区域。由于地势的问题，这些谷地中通常都有大小不一的河流（溪

水)。如果形成这些谷地的纵深够宽，一般情况下，就能够冲积出一定规模的平原带，那么在地理概念上，我们就可以将这类谷地用“盆地”来定义了。基于农业生产的特点，这些地理条件较好的低地区，通常也是人口聚集区，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如果从空中俯瞰汉水中上游流域，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即从汉中盆地往东，整条低地带并非伴随着汉水干流而生成的。而是整体向南产生了偏移，从整体上和汉水呈“人”字型排列。这种偏移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整个汉水中游地区的争夺重点，并非在汉水两侧，而是汉水那些支流两侧的谷地。



汉水流域地缘结构图（战国）

说到汉水谷地的低地地带南偏，其实也并不十分准确。最起码在汉中盆地的东侧，那个在汉水谷地中的排名仅次于汉中盆地的“安康盆地”（目前的核心行政区为安康市），其主体位置就在汉水的北侧。假使我们不清晰地把汉水标示出来，很容易认为安康盆地也是由汉水冲积而成的。因为从位置形状以及走向来看，它和汉中盆地很是相似。只是汉水在从汉中盆地流出后，其实向南拐了个接近90度的大弯，从安康盆地南面滑过。而目前滋养安康盆地的，主要是一条叫做“月河”的汉水支流。

不过汉水也并非完全没有顾及安康盆地的感受。那个90度的大弯从安康盆地的南面滑过后，最终又从安康盆地的东端向北穿出。而月河与汉水相交的那个点，自然也就成了整个盆地的地缘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安康市所在地。汉水为什么会有这种怪异的走向，要让专业的地理学家去解释了。从地缘上来看，汉水的这种走法，

造成了三个后果：一是让汉中盆地与安康盆地的地缘联系性降低了。也就是说，无论是最初的褒国，还是后来的苴国，在占据汉中盆地后，如果想沿汉水顺流而下渗透到安康盆地去，还需要多费些周章；第二个后果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条低地带，自安康盆地以东，就只能分布在汉水以南的区域中了。而这也意味着安康盆地与汉水以南的那些人口密集区，被汉水分割开了。这让安康盆地与东部汉水谷地的联系，也显得不那么紧密，或者说安康在地缘上更显孤独。最后一个影响，即正是因为这种地缘上的孤独感，使得在历史上，这个地理条件仅次于汉中盆地的地缘板块，在先秦时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印记。或者说就是，安康盆地没有想当然地成为汉水中游地区的地缘中心。

假使汉水以北地区也存在着相对密集的低地带，安康盆地的地缘地位应该也还是会有所提高。因为你是否强大，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地理结构有多好，更要取决于你能够影响多少相邻的地缘板块。关于这点，北美大陆在地理大发现前后截然相反的命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航海技术的发展，美洲对于这个星球主体文化的贡献几乎为零。而当北美可以透过海洋来影响全世界时，被激发的地缘潜力，甚至让北美的核心区成为新的世界中心。

实际上，安康盆地以东的汉水中游地区（干流两侧），都没有成为人口密集区，究其根本是因为这里被神仙看中了（分布有武当山等众多山脉）。由于汉水的走向没有与秦巴谷地完全吻合，因此武当山与大巴山脉所合围的这条低地带，其实是由汉水以南的一些支流来滋养的。这也造成了秦巴谷地的东段，县一级的行政单元都在汉水以南的情况。

第二节 楚国灭掉庸国后设立上庸县

观察地形图，我们会在武当山以南地区自西向东找到平利、竹溪、竹山、房县、保康，五个县级行政区。而每一个行政区都对应着一条源于大巴山脉，向北注入汉水的河流。将它们连接起来，就可以大致画出一条与武当山平行的直线来。对于这五个行政区以外的人来说，应该会对它们的名字感到很陌生。的确，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由于武当山所代表的秦岭与神农架所代表的大巴山脉（神农架位于大巴山脉的东端）在最东部相接，整个秦巴谷地的东部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封闭起来了。而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看似不太重要的地缘板块单独列出来，除了因为它是汉水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外，更是因为这个地缘板块生成了中华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标签——“庸”。我们一直说，先秦时期对中央之国的文化传承有重要的源头作用。很多我们现在所用来代指某种文化的汉字，在当时都可以指向一个国家（族群），而“庸”这个字，在当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叫做“庸国”。

说到“庸”这个国家，历史就很久远了，当年武王伐纣时，它就和巴、蜀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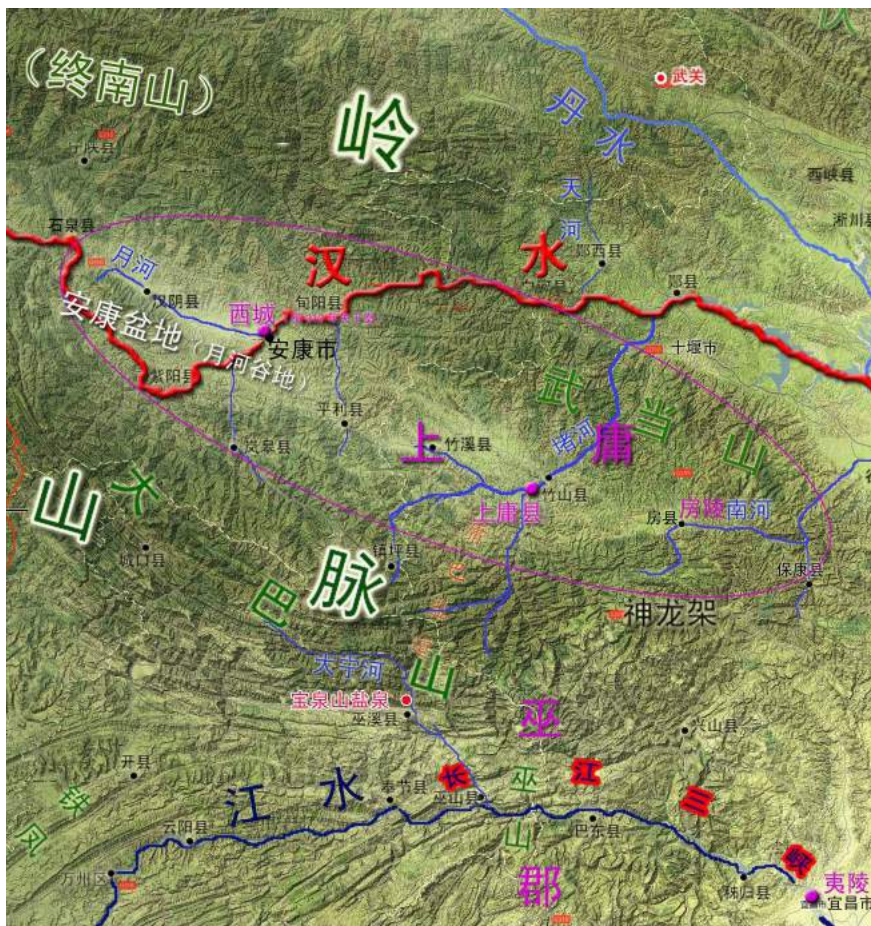
成为会盟的八百诸侯之一。虽说八百诸侯之数肯定是虚指，但当时的地缘分割得厉害，有几百个所谓的“诸侯国”也很正常。而能够见诸于史料的，也大都是有些体量的，最起码能够在一个地缘板块中占据主导地位。至于说庸国的主要控制区，就是秦巴谷地的东部，汉江以南的这个区域。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关于“庸”字的成语典故，多以贬义居多，比如“庸人自扰”、“平庸”、“中庸”之类。在大家的感觉中，“庸”这个字，即使不算贬义，也意指平凡。而从当年庸国的地缘结构来看，他们倒也可以过上一种相对平静的日子。只不过，虽然从地理结构上看，庸国属地的封闭性很好，但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封闭的地理单元，就像蜀道再难，也能够被开通一样。庸国存在之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多有交往。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庸国处在秦、巴、楚三股地缘势力的中间。这种夹心层的位置，也注定他的命运会与这三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当年随周人伐纣的时候，庸国的实力还要强于巴国（位列西土八国之首）；而那时的楚人，还远没有后来巨无霸般的体量。生活在山地之中的庸人，凭借上水优势，也经常向东袭扰汉水下游地区，成为楚人的心头之患。如果从大的地缘格局上来看，位于楚国西部的庸、巴两国，依靠山地所形成的防御体系，以及上水的进攻优势，都是悬在楚国西部的两个不稳定因素。应对这类边缘民族，除了武力征服以外，在文化上贬低它们的价值，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就像赵人编排出“中山狼”的故事，将“中山”这个文化标签与忘恩负义的做法联系在一起一样。“巴”、“庸”两字后来的文化定位，也与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楚国后来的发展速度，我们都很清楚。以庸国的体量而言，他们在春秋之时还是成为了楚国的附庸。不过正像后来唐人所比喻的那样，“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曾经在中原大显身手的“庸国”还是没能耐住性子，庸人联合了周边的山地民族向楚国发起了挑战。假使庸国一直安于现状，也许庸国会像很多其他的山地附庸国一样，直至土地兼并日趋白热化的战国时期才被宗主国完全吞并（比如义渠国），而现在，庸国的国运被提前终结了。楚人灭庸之事，发生在公元前611年，这年正是春秋时期楚国最强大的君王——楚庄王执政的第三年。这位以“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而青史留名的楚王，正是用“灭庸之战”来开启了他的霸业。

楚国在灭庸之后，在庸人所控制的秦巴谷地中设立了“上庸县”这个行政单位。我们现在一提到“郡”、“县”二字，一般总会认为这是中央集权的一种表现方式，这二级行政机构所辖的区域，也应该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核心区。事实上这种概念的形成，来源于统一之后的秦朝。而在先秦时期，郡、县这两个行政单位都是设立在刚刚开拓的边缘地区，并多以中央直属的形式来加强管理的。只不过秦、赵、燕等北方诸侯喜欢用“郡”来标注这些新征服的土地，而楚国则首先创立了县制。也正因为如此，春秋时期的郡、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隶属关系，用起来也比较随意（有时也会出现县管郡的情况）。楚人所立上庸县的治所，就是庸国国都的所在，具体

位置在现在竹山县的西南。从地缘位置来看，竹山在我们刚才所排定的汉（水）南“秦巴谷地”的五个县级单位之中（现在的县级单位），正好居于中间位置。不过这并不是竹山成为上庸地缘中心的根本原因，因为要想成为地缘中心，你必须要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仅仅依靠一个几何中心的位置是远远不够的。



汉水流域地缘结构图（战国）

竹山一带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庸之地的地缘中心，是因为它所傍生的那条汉江支流——堵河，有着异于其他几条汉水南岸支流的地缘优势。从流量上来看，堵河倒是汉江水系的第一大支流。不过从冲积平原的体量上来看，堵河之侧的竹山并没有优势。支撑它成为“上庸”地缘中心的力量，来源于一条盐道——“庸巴盐道”。如果我们沿着堵河的诸多支流上行的话，就会发现与其他汉水南岸支流一样，它们都发源于大巴山脉的北麓。如果再观察得仔细

一点，会发现，堵河的西源来自大巴山的东端；而它的东源，则来自神农架的西端（米仓山、大巴山、神农架组成了大巴山脉）。

当我们把视线越过大巴山脉的分水岭，向南移动的话，马上就会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巫溪（县）。在之前分析巴国时，“巫溪”之名已经出现过了。能够吸引我们目光的，并非这个现在的县级单位，而是在县城北部，大巴山脉南麓的“宝泉山盐泉”。宝泉山盐泉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大宁盐场”。前者之名得于山，后者之名源于水，这个“水”就是大宁河。这条发源于大巴山南麓的河流，最终南向流入了长江，而盐泉所产之盐，部分也经由大宁河——长江水道向长江流域销售。

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盐道”，在巴盐行销的历史中，有着诸多路线让巴盐行销到周边地区。其中有一条路线，就是沿大宁河北上，然后翻越大巴山的分水岭再经由堵河水系，辐射到汉水流域。由于这条路线的难点主要在前半段（特别是翻越

分水岭这段），在进入堵河水系后，就可以借助水力，很快地运销至汉水流域，特别是汉水下游地区。因此一直到清朝，运销至汉水下游地区的巴盐，都有相当一部分是经由这条线路运出的。

由于这条盐道连接的是庸、巴两地，因此也被称之为“庸巴盐道”。而因为堵河上游的支流众多（支流还会有支流，包括其他河流也是这样，只能把地缘位置比较重要的部分标出），盐道具体的路径也有多条。只不过这些路线随着河流的走向最终都在一个点上汇合了，也就是庸国国都，楚人的“上庸县”县治所在的那个点。作为巴盐入汉江下游的集散地，竹山在“庸”这个地缘板块中居于中心位置，也就不足为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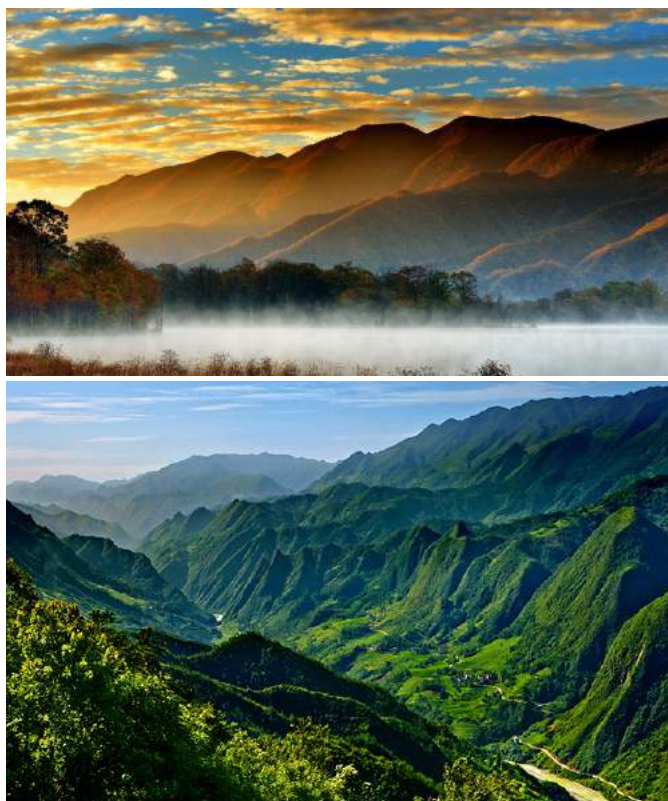


庸巴盐道

在堵河上游那些支流所指向的区域中，能够最终开辟出盐道的，主要是在西部靠近大巴山东麓的地区。至于东部，那些支流源头处的神农架地区，至今仍然为原始森林所覆盖。当我们沿着堵河东源向北探寻盐路时，会看到一个熟悉的地名——镇坪县。大巴山、神农架的地理分割，也让它们在现在分属于陕西、湖北两省。而作为陕西省位置最靠东南的县级行政单位，镇坪县所辖的区域也正是大巴山的东段。

镇坪之出名，相信最起码在网络上已经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镇坪也是当年“庸巴盐道”中间的重要转运点。至于有没有华南虎嘛……我相信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前，大巴山中还是有老虎存在的。只不过现在要想再找到的话，就有点难度了。也许大巴山的华南虎可以向东换个山头，跑到湖北境内的神农架去。不过神农架地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炒作对象——野人。在华南虎还被视为“害兽”之时，神农架的“野人”就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有了这个“镇山之宝”，神农架方面当然不会屑于搞出什么“周老虎”来。（注：神农架目前所划定的行政区域很特别，叫做“神农架林区”，是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域）。

不管华南虎和野人是否真实存在，所谓无风不起浪，就算是编故事，也是要有



神农架（上）与大巴山（下）

本钱的。而大巴山和神农架山高林密的地理环境，无疑为“周老虎”¹和“野人”的诞生提供了生存环境。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技术水平不高的古典时期，如果没有“盐”这个重要生活物资作支撑。大巴山脉南北的地缘价值将大打折扣。在理解庸、巴这种边缘“国家”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国家概念来套，甚至也不能用周人所建立的封建制来看待。这些所谓的国家，更多只是一些部落联盟。只是依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而赋予不同的地缘标签罢了。

在庸国被灭之前，庸人除了自己控制秦巴谷地的东段以外，那些生活在秦巴山脉东部山地的部族，也多依附于他们。而位于大巴山以南的巫溪

附近的盐泉也处在庸人的控制之中。为了应对庸国的反叛，楚人联合了川东的巴国和秦岭北部的秦国，共同来应对这起危机。而在这场战争之后，巴人所获得的地缘利益，就是“宝泉山盐泉”。而楚人则将秦、巴山脉中的庸人故地收为己有。从此，大巴山成为楚、巴两国的地缘分割线。一直到战国中期，楚国从巴国手中夺取了三峡地区，并设立了“巫郡”。楚国才算是彻底解决了西部的威胁。其实说楚国解决了西部威胁，只能说是那些山地民族，不再成为威胁了。但在此之后楚国真正的噩梦才算真正开始。因为比庸、巴两族更为强大的秦人来了。

第三节 秦国控制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

秦人与楚人，就像是一对冤家。相比于那些正统的华夏诸侯，这对冤家的出身都有些异类。不过也正是这两个异类，最终成就了中华第一帝国（秦、汉两朝）。如果从地缘关系上来看，秦人主要是活动于隶属黄河流域的渭水一带；而楚人的核心区，则是在长江的重要支流——汉水一带，二者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地缘冲突。只是秦楚两国在经历过重新洗牌的春秋无义战之后，都存活到了战国时代。而为了能

1 指华南虎事件，2007年陕西林业厅公布猎人周正龙用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拍摄的华南虎照，在网上引发对照片的真实性质疑。后被证实利用年画的老虎像造假，相关责任人亦被相应处罚。

让自己更加强大,和其他诸侯一样,秦楚两国都没有墨守在自己所熟悉的地理环境中。

其中最先发力的楚国,早在春秋之时楚国就已经开始进入河、济流域参与中原争霸了;而一直被晋人封堵在渭河流域的秦人,到了战国中后期也开始另辟蹊径南征巴蜀,以占据长江流域的上水优势。当秦人占据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后,也就意味着他们和楚人不可避免地正面交锋了。虽说秦人占据四川盆地的军事目的很明确,就是想依靠长江上游的上水优势,直接攻击楚人在江汉平原的核心区。但像巴蜀这样的体量和历史,秦人即使能够在一年之内完全军事征服,也还需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化掉四川盆地。也正因为如此,秦人在入主蜀地后,也没有立即终结蜀王的统治,而是将他先降为“侯”,以稳定蜀地的局势。当然,这种做法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这位由“蜀王”降格而成的“蜀侯”,最终还是以“谋反”的罪名被解决掉了。

虽然蜀地需要时间消化,暂时无法在长江上对楚国发起进攻,但并不代表秦人就此会停止他们前进的脚步。除了长江以外,秦国还获得了汉水的地缘优势,这使得秦人有机会沿汉水向楚人施加压力。如果汉水像秦人所熟悉的渭水那样,两岸的平原地区一直贯穿到下游地区,那么秦人在南征巴蜀时,很可能需要先与楚人对决,才有机会南下。问题是汉水并没有从秦巴峡谷的中间线穿过,而是在东出汉中盆地后,穿插于大巴山脉和秦岭之中。这事实上将整个秦巴谷地切割成了三大块:一块就是西面地理条件最好的汉中盆地;另一块则是位于中间,地处汉水之北的“安康盆地”;而最后一块,则是那些由汉水南支(流)所滋养的东“秦巴谷地”,也就是楚国的“上庸”之地。

由于秦巴谷地的这种特殊结构,使得无论是楚人自下往上渗透,还是秦人自上往下攻击,都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而这其中,位居中间位置的“安康盆地”则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在秦人占据汉中盆地之前,楚国在汉水一线向西所扩张的极限就是在“安康盆地”。也许楚人应该更进一步进占汉中盆地。不过在研究过地缘格局后,我们会发现,楚人在秦巴谷地的这条突出部已经很深入了。再加上山地的阻隔和下水的劣势,楚人每前进一步都是很困难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反的方向,江淮地区的地缘潜力要远大于汉中盆地,并且还有上水优势。两边一比,楚国把重点投入到东线也就情有可原了。

事实上楚人应该还是很想渗透入汉中盆地的。只是当他们渗透到安康盆地时,汉中盆地已经被蜀国所占据,后来经历过“苴”时代,最终被秦人所收。也正因为如此,秦人如果想顺汉江而下,最先与楚国发生碰撞的,就是在安康盆地。由于安康盆地的位置相当于楚国的最西端了。因此楚国在此所设立的据点也被称之为“西城”(就是现在的安康市)。而为了控制这个盆地,并进一步向上游地区渗透,楚人又在此设立了“汉中郡”。而在秦人占据汉中盆地后,他们和楚人有同样的想法,即进一步向汉水流域的其他地缘板块渗透。这其中最先被秦人看中的,自然就是与

一尾一头，也真实地反映出双方对于汉中博弈的不同态度。秦人究竟在哪条传统线路上，对楚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是我们下一部分的解读重点。

第二十三章 秦国和楚国在丹江通道的博弈

第一节 秦楚两国因商於之地关系交恶

秦楚之间的传统沟通路线，我们在吴楚“柏举之战”中已经有过交待。由于这条路线有部分沿丹水（丹江）而行的，因此可称之为“丹江通道”。而古人对这条重要战略通道的叫法也有很多种，如“商於道”、“商山道”、“蓝田道”、“武关道”等，这些不同的名称所指向的都是同一路线，即东南方向穿越秦岭，连接关中平原与南阳盆地的战略通道。而每一种叫法，都代表着这条通道上的一个战略要点，在我们解读完这部分内容后，相信大家对这些战略要点的分布也都会有概念了。

说到秦楚对“丹江通道”的争夺，就要牵出一位战国名人来了，这位名人就是用“连横”之策，破解六国“合纵”之盟的张仪。当秦国从魏国手中收复河西之地后，秦军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继续东进，一方面渡河进入山西高原，攻击魏国的河东之地；另一方面则透过崤函通道，在中原之地攻城略地。秦国的强大攻势，促使山（崤山）东诸国需要联起手来，以共同应对秦人的东进。在划分阵营后，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就是公元前318年，诸国联手的第一次“合纵攻秦”之战。而秦国迎战联军的地点则是在函谷关，在此之前秦国刚刚从魏国手中夺取了陕地的控制权，并在函谷筑关以自守。

从战术的角度看，秦国在第一次与六国联军交手中取得了完胜（斩首8万有余）。不过这并不代表秦国就有了以一敌六的能力。因为虽然这次合纵攻秦的同盟，有魏、韩、赵、楚、燕五国（齐暂作壁上观），但实际上与秦军在函谷关接战的还是三晋军队，楚、燕两国由于暂时没有与秦国有地缘矛盾（即使秦军攻入中原，损害的也主要是三晋的利益），因此只是做了个战略姿态，并没有实际行动。

不管是一以敌六，还是一以敌三，秦国在函谷关大战中的胜利，都足以让山东诸国胆寒，也因此让秦人东进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而在这时，就秦国的战略方向而言，秦国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这两种声音在秦取巴蜀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前一种意见的代表就是张仪，其基本观点就是挟函谷关大胜之威，直取洛阳盆地，然后入主中原；后一种观点则是司马错的先灭巴蜀，再图楚国。应该说，后来秦国的战略是综合了这两种意见，即在灭掉巴蜀对楚国取得地缘优势后，转过头去继续透过崤函通道向中原渗透。

秦国试图通过崤函通道这条传统路线直取中原的想法，暂且不论正不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秦国在对三晋的军事对抗中，已经取得了心理优势和扩张了领土，可山东诸国中实力最强的楚国，却还没有与秦国正面对抗过。即使秦国在函谷关大战后旋即吞并巴蜀（前316年），也没有损害到楚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纯军事的角度看,秦国也有必要与楚军直接展开一场战役,以在战场上打击对方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秦国在东、南两线咄咄逼人的做法,已经让楚国深深地感到了秦国的战略威胁(占了巴蜀之后,秦人对楚国形成战略威胁的攻击路线,甚至要多于“三晋”)。所以秦国即使不寻机主动攻击楚国,楚国也需要对秦国的扩张行为作出反应了。

虽然秦楚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不过和大部分战争开启之前的情况一样,政治家们总是试图在军事行动之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不能解决问题,也希望为日后的军事对抗多争取些战略资源。这次为秦国出面的,仍然是那位纵横家——张仪。而他在施展外交手段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重要的地缘板块——商於之地,以此作为筹码。

说到“商於之地”,就不得不牵出两位重要的战国人物来,一位就是为秦国行变法之事的法家代表——商鞅;另一位就是为秦国施展连横之策的纵横家——张仪。商鞅和“商於之地”的关系,从他传世的这个名字里就可以看得出。实际上商鞅最早是叫“卫鞅”的,因为他来自那个以出产人才著称的不倒翁国家——卫国。而之所以被世人改称为商鞅,是因为他有功于秦国,被封在“商”地,而这个“商”地,就是“商於之地”。至于说张仪之所以和“商於之地”扯上关系,是因为他用这块地来忽悠了楚国。

简单点说,就是用这块本属于秦国的土地,来换取楚国在政治上倒向秦国。因为当时的楚国和山东半岛的齐国结成了同盟。从地缘战略上来看,这倒是符合远交近攻的策略。齐楚联盟能够形成,还有一个地缘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这两个国家都是边缘国家,和秦国一样也需要向中原渗透。在这种情况下,齐、楚两个大国结成的同盟,理论上比与三晋之间所结成的同盟要稳固得多。而同样图谋中原的秦国,显然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张仪对当时的楚怀王承诺,如果楚国与齐国断交,就割让“商於之地”给楚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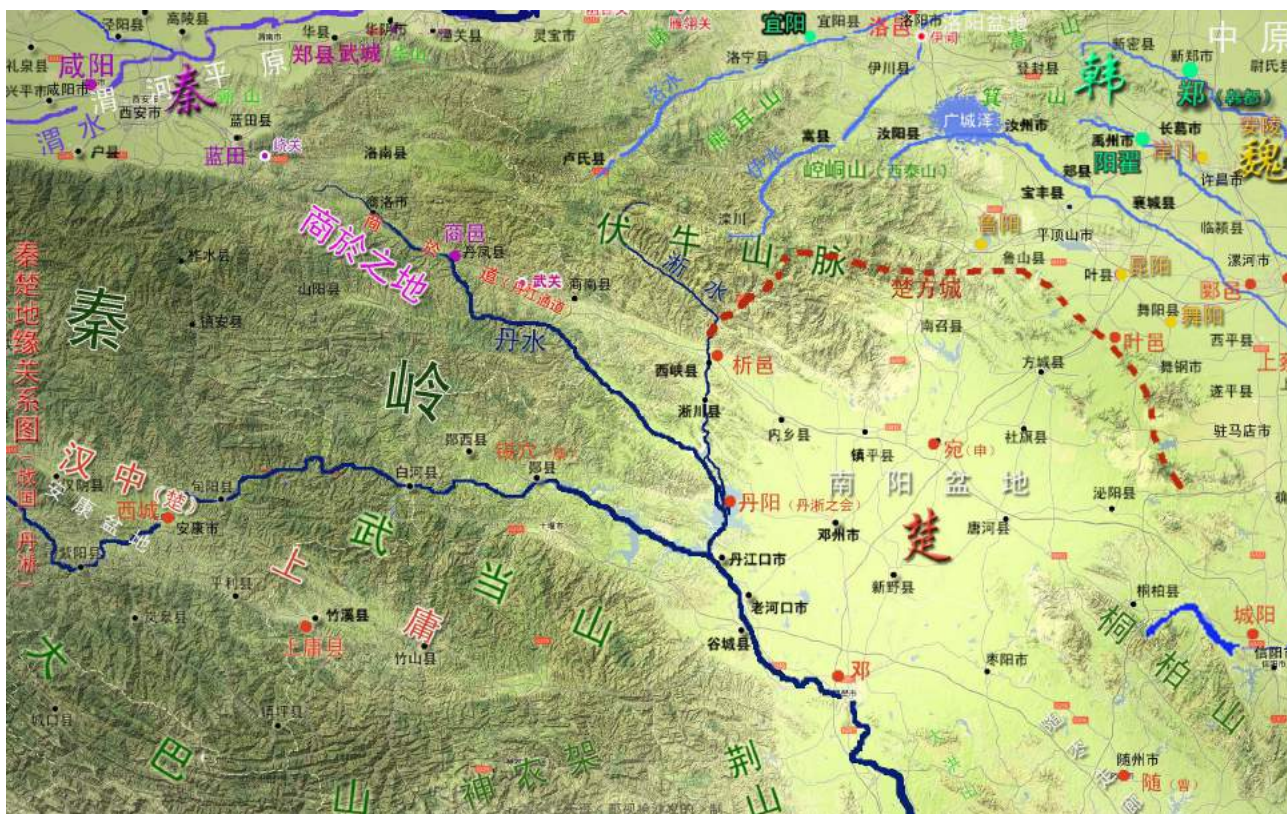
后来的结果是楚、齐断交之后,张仪并没有如约交出六百里“商於之地”,而是改口称承诺的只是方圆六里的土地(让我想到现在某些商家的做法)。秦楚两国由此围绕“商於之地”,引发了一系列的战争,并直接导致了楚国的衰弱。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地缘板块,能够左右秦楚两国的战略格局。

第二节 秦楚在丹江通道建立的城邑关卡

如果从地理结构上来看,所谓的“商於之地”,其核心区是在“丹江通道”的上半段。这段为秦国所控制的战略通道,称得上是真正的“丹江通道”。因为丹水从它的中间穿过,所冲积而成的河谷,也被称作“商丹盆地”。从目前的行政架构来看,盆地主要是由西端的“商洛市”和东端的“丹凤县”所辖(盆地名也来源于此)。而

卫鞅所受封的“商邑”也正是在现在的“丹凤县”，这也是秦国在这条方向上的最后一个城邑。

如果从地形图上看，商丹盆地的宽度不算很宽，特别是与它的长度相比，因此很容易被人忽略。要是与关中或者南阳这种大盆地相比，商丹盆地当然算不上什么重点地区了。不过在秦岭腹地山高谷深的地形中，有这么一条狭窄而勉强够得上盆地的土地，还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它还位于连接关中——南阳两个重要地理单元的战略通道上。这样一个可以有自给能力的区域无论归属了谁，都意味着他掌握了丹江通道的控制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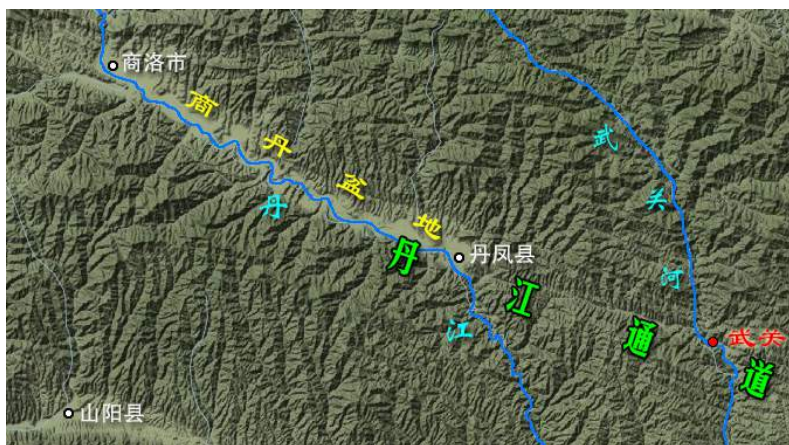


秦楚地缘关系图（战国·丹浙）

虽然说商邑是秦国在丹江通道上的最后一个战略据点，但它并不是秦国在这个方向的边境所在，或者说它还不是处在秦楚之间的分割线上。丹水在流经商邑之后，就向南拐了个弯，然后也像秦岭中的诸多河谷那样，行走在悬崖峭壁之间了。如果没有别的路径可以选择的话，秦楚之间的这条大动脉，应该也还是要依靠栈道来打通了。不过从商邑东行，顺着丹水原来的方向一直向东南方向延伸，有一条现成的谷地可以通行，并直达南阳盆地。也许在最早的时候，这条直线穿越秦岭的谷地，是丹水的故道。可能丹水开始的时候，就是走这样的直线。但不管怎么说，所谓的“丹江通道”，最终还是直线连接了秦、楚两国。

在商邑的东南面，丹江通道的最窄处，为了防御楚国，秦人在此构筑了一道关

卡叫做“武关”，由于关卡边上的山体叫做“少习山”，因此在春秋之时，这道关卡也被叫做“少习关”。对于秦国来说，武关就是它的西南门户和丹江通道上防御楚国的最前线。由于在“关中四塞”中，丹江通道在关中平原的出入口中是离秦都“咸阳”最近的，因此武关和“商”地对于秦国来说，有着重要的缓冲作用。



商丹盆地示意图



丹凤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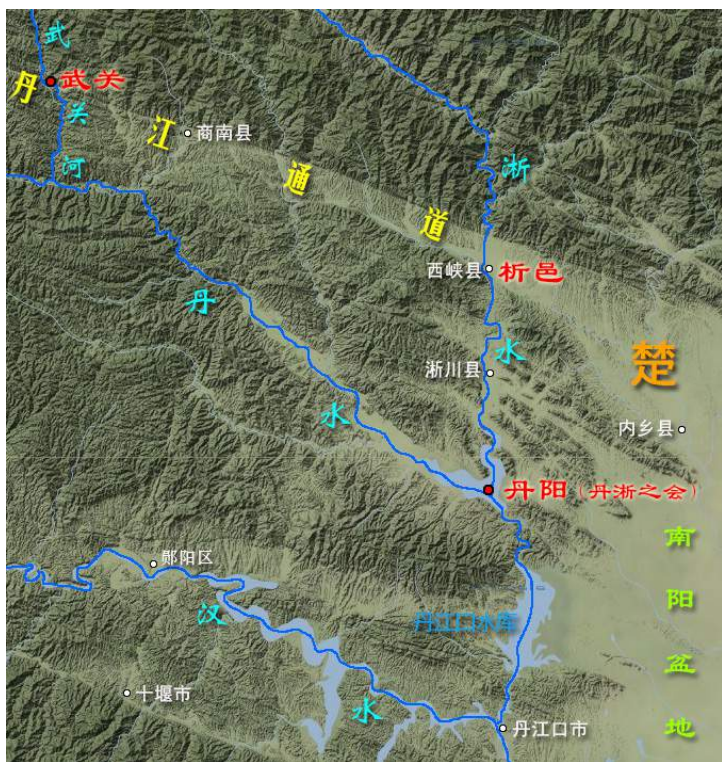
门户大开了。

因为秦国在这条通道的入口处，丹水源头之西的山谷之中还有一道关卡，叫做“峽关”，作为秦人在秦岭之中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峽关”所在地，在行政上则归于“蓝田”所辖（现在的蓝田县）。而蓝田一方面是秦人进入丹江通道之前的最后一个战略基地；另一方面在敌人攻占整条丹江通道后，蓝田也是秦人在关中平原上的最前沿防线。失去了这个战略要点的话，咸阳基本就只能依托渭水展开抵抗了。正是因为商於之地以西，秦国还有一道防线，所以楚国才轻信了张仪的承诺。否则拿自己核心区的安全出来交换的话，是无法让楚人相信秦国诚意的。如果说由于武关的分割，秦国算是占据了丹江通道的上半段，那么占据整条通道下半段的楚国，又有什么样的战略布局呢？

整个丹江通道实际上是一条由西北至东南延伸的一系列断陷盆地所组成的。而这断陷带又为不同的河流所利用，横穿商丹盆地的那段丹水只是其中一部分罢了。

按道理来说，这样一个重要的缓冲地，秦国是很难拿来和楚国交换的。即使秦人作出这样的承诺，应该也很难取信于楚国的。不过对于秦国来说，如果能让楚国动心的话，只能拿出与秦楚交界的土地来。真要是在陇西划块地给楚国，是没人会相信秦国的诚意的。也许在刚刚征服的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中划块土地给楚国，也是个办法。只是对于它们，秦人还需要时间来消化，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区域现在拿出去交换，楚人未必愿意。其实虽然商於之地之于秦国有重要的缓冲作用，但也并不意味着失去了它，秦国就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是沿着这条盆地帯前行的，在整条通道上有多条由北向南穿越谷地的河流。武关的所在地，就有这样一条纵向切割的“武关河”。有河流为依托，加上这里为整条通道的最窄处，秦人所立的武关的确有着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这点从商鞅的遭遇上就可以看出来，当年商鞅在新君继位后，遭到守旧贵族的反攻倒算，不得不从自己的封地南逃。但武关已经被封，无法绕行的商鞅只能回到秦国束手就擒。



楚国在丹江通道城邑图

不同，楚国的析邑却是将这两项任务合二为一了。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相对开阔的土地能够有一定自给能力外，有一条由北向南，纵向切割通道的河流——淅水，是析邑能够承担关卡任务的重要原因。比之武关河，发源于伏牛山脉西北方向的淅水，在先秦时期的名气和作用要大得多。

淅水现在的名字叫做“淅河”或者“淅川”，现在的流量只能算是一条小河了，不过在上古时期它的水量可是很大的。依托这样一条河流，楚国西北方向的战略安全，还是很有保证的。不过淅水的地缘作用，并不只是体现在丹江通道的防御上。这条南流入丹水的河流，在穿越西峡盆地后，又到达了一个新的盆地“淅川盆地”。在行政上，这个盆地则是由河南省淅川县所覆盖。和西峡盆地一样，淅川盆地也有恐龙蛋，只不过数量没那么多罢了（已发现）。至于说以后会不会挖出更多来，那是古生物学家感兴趣的事。我们只关心文明产生之后的事情。

从地缘价值来说，淅川盆地在两千多年前和现在都要高于扼守丹江通道的西峡

如果说秦国控制“丹江通道”的战略基地是商邑的话，那么楚国所对应的城邑就是析邑了。析邑的位置也就在现在的河南省西峡县边上，这一带位于丹江通道的出口，地势已经逐渐开阔起来了。与商邑对应“商丹盆地”一样，析邑也对应了一个盆地——“西峡盆地”。人类并不是第一个利用西峡盆地的生物，在几千万年前的白垩纪，这里曾经是恐龙的乐园。至今，西峡地区出土的恐龙蛋化石，除了让相关研究者兴奋不已外，也让走私分子又多了一条生财之道。

与秦国的商邑承担战略支援任务，武关承担战术阻击任务不

盆地。两千多年前，淅川盆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是淅水与丹水交汇之处的“丹淅之会”。这样一个依山傍水，既有水上交通优势，又有高地（可避水患）的地点，是聚居和建城的好地点。而最早发现并利用“丹淅之会”地理优势的族群就是楚人。楚人最早受到周王室册封为“子爵”国时，就是以此为地缘中心，并立都“丹阳”。

不过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感觉受到侮辱的楚人，开始沿着丹水、汉江南迁，先是附于汉江通道西侧的“荆山”，进而在与庸、巴等族的博弈中，夺取了江汉平原作为根基。从战略角度看，楚人的这种南迁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不过在周人看来，楚人的这种做法，也无疑让他们脱离了周人体系，自愿融于蛮夷之地。好在楚人并不忌讳这种身份，反而在政治上以此为依据自立为王，期望与周王室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南迁之后的楚人，是否放弃了继续经营“丹淅之会”，不是十分确定。因为为了应对楚国的威胁，周人沿汉水东北侧布置了汉阳诸姬，以及“申”这样的亲信戎人部落。这一时期的楚国，大体上是以汉水为平衡线与汉阳诸姬展开对抗。而从地理格局上来看，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都是周人的势力范围。不过对于战国时期的楚人来说，是否曾经放弃过“丹阳”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时整个汉阳诸姬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整个南阳盆地——江汉平原，都已经成为楚国的核心区。

丹淅之会也好，丹阳也罢，现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因为这个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南水北调”的源头工程“丹江口水库”所覆盖，正在为北京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至于两千多年前，丹阳城真正成为秦楚地缘博弈的焦点，则是在公元前312年。刚刚被张仪用“商於之地”忽悠了的楚国，决定与秦国一战，以挽回失去的面子。其实从秦楚之间的地缘关系来看，这场战争早晚得来，因为南下巴、蜀的秦国，从接触面来看，与楚国的潜在地缘矛盾，甚至已经超出了与三晋之间的博弈。张仪的背信弃义，只是充当了导火索罢了。

第三节 秦楚爆发丹阳之战和蓝田之战

既然秦国敢“忽悠”楚国，当然也就充分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因此最先取得胜利的并不是恼羞成怒的楚国，而是占据地理优势的秦国。在这次攻击中，秦人并没有直接攻击楚国的西北重镇“析邑”，而是在行进到淅水时，向南顺江而下攻击丹淅之会的“丹阳”地区。秦国选择在丹阳与楚国决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利用丹水由商邑顺水而下为前线运送补给（丹水的航道情况不算好，无法进行水战，但轻舟还是可以通行的）。在秦国既做好充足准备，又掌握了地理优势的情况下，楚国在丹阳之战中落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丹阳之战中取胜的秦军并没有占据丹阳，而是撤回了武关以西。因为这种绕过对方边境重镇，进入对方腹地的攻击方法，很难将战术胜利转化为实际的领土。

可以预想，失败后的楚国一定会发起反击，而如果楚国重新集结兵力由析邑出击切断秦军的回国路线的话，那么孤军深入的秦军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回去了。不过在这次对楚作战中，秦国在土地上也并非一无所获。在另一条战线——秦巴谷地上，秦军倒是取得了新的进展。以汉中盆地为基地的秦军，向东顺势拿下了楚国的汉中郡——安康盆地，并将楚国的西部重镇“西城”，转变为秦国的“西城县”，归入秦国的汉中郡。这种既有良好防御性，又能与自己本土接壤的独立地理单元，秦人在得到后当然没有放弃的理由了。

从结果来看，在丹水、汉水两线作战的楚国，不仅让秦军斩首八万，还丢失了汉中之地（安康盆地）。但从整体的地缘结构和实力来看，楚国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楚国依然还是战国数一数二的大国。无论是出于复仇，还是出于让秦国不敢再轻易攻击自己的目的，楚国都需要再次用战争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于是在丹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秦楚之间规模更大的“蓝田之战”爆发了。

在丹阳之战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秦军在没有夺取楚国扼守“丹江通道”出口的重镇“析邑”时，就沿丹、淅两水攻击丹淅之会的“丹阳”，在战略上是很冒险的，获胜之后回撤亦属必然（和中印战争的形式类似）。按照正常的军事思维，楚国在受此重创后（被斩首八万，被俘的贵族、将领有70多个），应当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但事实上，一直在黄土高原与三晋博弈的秦国，显然低估了楚国的实力。这个在春秋之时就已经成为江淮之主的巨无霸国家，拥有的家底是非常厚的。

在丹阳之战刚刚结束，秦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国就集结了全国的大部分军队（号称“倾国之兵”），沿丹江通道向秦国发起了反攻。这一次，该秦人感受到巨大压力了。楚国的这次倾力出击，使得秦国的武关和商邑迅速被攻破了。在秦国控制下的那部分“丹江通道”，也就是商於之地陷于楚军之后，整个渭河平原就将展现在了楚人面前了。而现在，秦人还能够依托地形建立起两道防线。一是在秦岭北麓与平原之间过渡的丘陵地区阻击楚军；如果阻击失败的话，那么就只能依托渭河阻止楚国攻击咸阳了。当日选择将都城建在渭水之北时，秦人应该没有考虑到攻击会从南而至（只是暂时还要顾及一下周王室的面子），没想到最终却让他们在面对楚人攻击时，有了一定的缓冲之地。

对于秦人来说，他们当然不会放弃渭水之南的这块风水宝地。要知道，当年周人选择将都城镐京建在此处，后世的汉、唐帝国又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可不会都看走了眼。从地形上看，这块王者之地，北依渭水，南靠终南山（秦岭中段），而它的东侧还有一个突出部——骊山。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箕”型宝地，如果让楚人得去的话，那么将又会是一个“河西之地”。因此秦国决定在楚军西出秦岭，穿出商於之地后就展开决战。

秦楚决战的地点叫做“蓝田”，这个名气直到现在也没有变过。不过在我国的

印象中，在我们所接受的中学教育中，蓝田应该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这片丘陵之地上发现了在 100 多万年前，处在旧石器时代的直立人——蓝田人的化石。包括北京人、蓝田人在内的这些原始人类的发现，着实让当时的人们兴奋了一把，似乎就此可以验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不过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些原始人类与现代的中国人并没有继承关系。即使是最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很少再将之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了（未经验证的消息，朝鲜半岛还有人在做类似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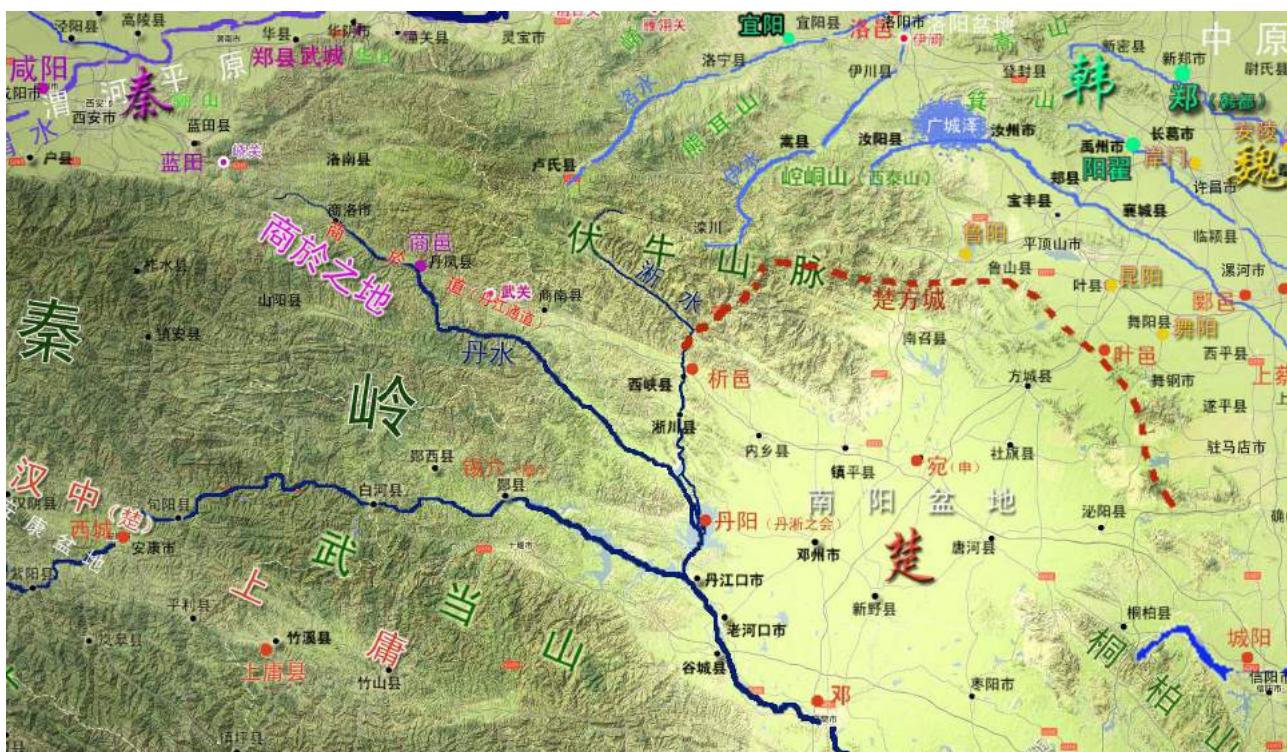


秦楚地缘关系图（战国·丹浙）

相比于与我们生活毫无关系的“蓝田人”而言，蓝田玉倒是很有可能走进我们生活的。要说秦岭南北倒也是玉石的重要产地。不光北麓的蓝田有玉，南麓的南阳盆地边缘也有玉（南阳玉），而这些“美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采了。按说这与我们所说的秦、楚相争没有太大关系，不过玉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多了解一点也无妨。像那块著名的“和氏璧”，就曾经搅动战国政局，并引出一幕幕经典故事。现在和氏璧也被两地的一些“专家”考证为蓝田玉或者南阳玉所制。只是根据记载，卞和得玉的地方，是在武当山之南的“荆山”，似乎并不关这两个地方的事。

其实如果让我来看，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有两件事：一是卞和为什么不自己想办法把玉取出，直接献给楚王，抑或先后砍掉他两条腿的那两位楚王，为什么不找个玉工把他锯开再下结论（技术上并非难事）；二是后来的秦始皇，又是怎么把这个中间有洞的玉“璧”，改造成一块方方正正的“玺”。这些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就像史书中那些自相矛盾，错漏百出的记载一样。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抽丝剥茧般地找出有用的、符合客观事实的信息，以尽可能地还原历史。

从地缘格局来看，楚人的这次反攻应该还是没有与秦国在渭河平原展开长期争夺的想法。毕竟要想横穿秦岭与秦人展开拉锯战的话，楚国并没有魏国在河西之地的地缘优势（魏国只隔了一条河）。当然，楚国这次举倾国之兵，也并非在土地上无所图。按照楚人的想法，即使不能打到咸阳给予秦国以重创，也可以将张仪所许下的“商於之地”控制在手中。这样的话，加上三峡的“巫郡”，秦巴谷地的“上庸”，楚国在自己的后方就有了充足的缓冲之地（这也是楚国对商於之地动心的原因）。而从防御的角度看，楚国的这种想法也并非不切实际。



秦楚地缘关系图（战国·丹浙）

在丹江通道的西北部，商丹盆地与蓝田之间，还有一个关口——峽关。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峽关就曾经成为著名的战场。而现在，如果楚国要退一步的话，亦可以峽关为隘，以商丹盆地为支撑，将丹江中上游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楚国迫切得到商於之地的想法，自然是符合楚国的战略利益的。不过对比秦楚之间的地缘形势，我们就会发现，和秦人只需应对来自东部的压力相比，在秦岭南北开辟新战场的楚国，已经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之前秦、楚两国相安无事时，楚国其实也和秦国一样，将注意力放在东线。而现在，秦国的后方并没有体制内的诸侯国。那些生活在高地之上的边缘民族，在秦人恩威并施的管理下，并没有对秦国的后方造成太大威胁。

假使楚人要与秦人决战的话，那他们首先应当与中原争霸的两个老冤家韩、魏达成和解。这样的话，才能够集中注意力对付秦国这个强大的对手。问题是，这一次秦国的“连横”之策又起作用了。韩、魏两国决定站在秦国这一边，趁火打劫这

个老冤家。在他们看来，如果秦国就此将注意力完全转向楚国的话，那么秦人对山西高原甚至中原的兴趣也许就会减低了，毕竟战争资源是有限的。不管韩、魏两国的这种想法是否真的符合两国的利益，现实的情况是，趁着楚国大部分的兵力在蓝田与秦军决战，魏、韩两国联军突破了楚国的“方城”，长驱直入南阳盆地，甚至夺取了通往江汉平原的汉江通道入口——邓邑（相当于现在的襄阳）。在后方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楚军所能做的只能是后撤，将韩、魏两国赶出南阳盆地。而楚国梦寐以求的“商於之地”又重新回到了秦国手中。

经历过蓝田之战后，秦国也意识到了楚国的强大。要想灭掉这样一个大国，秦国首先要做的，还是依照司马错所制定的战略，先消化掉巴蜀之后，再由长江顺江而下，直取楚国在江汉平原的地缘中心。当然，暂时不对楚国有大动作，并不代表双方今后就不会有摩擦，也不代表秦国就此安静下来“闭关修炼”了。对于势头正盛的秦国来说，如果不以楚国为主要攻击对象的话，那么三晋的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了。

第四节 秦国与楚国和解后攻击韩国

为了防止楚国重新与其他山东诸侯联合（特别是齐国），让自己也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秦国决定将“汉中之地”交给楚国。当然这个汉中之地，只是在丹阳之战时从楚国手中夺取的楚“汉中”，也就是安康盆地。而秦国所据有的汉中盆地，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交给楚国的。其实安康盆地这个“秦头楚尾”的地缘板块，由于自身的封闭性，在秦楚相争中，有点像是鸡肋。楚国占据了它，不代表就对汉中盆地取得了地缘优势；而秦国得到了它，无论从陆地还是水路出击，想顺势拿下楚国的上庸之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汉中、安康、上庸这三个地缘板块，都有山地分割，各自独立）。

这点从楚国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楚人在秦国归还“汉中”之地示好之后，甚至提出可以不要这块土地，而只要那位忽悠了他们的张仪入楚（不过，后来张仪又一次忽悠成功，成为楚国的座上宾）。大家现在看秦楚相争，应该有秦国占尽地理优势，压制住了楚国的感觉。那么楚国有没有可能反制秦国，将地缘优势反转到自己一边呢？在过往的历史中，并没有史家做过类似思考，但实际上楚国也的确做过这样的尝试。下一步，我们就会在地缘上分析楚国是怎么设计他们的反制战略的。

其实说完了秦、楚博弈，秦统一天下的进程差不多就完成一半了。再等到秦国在上党高地完胜赵国，即使是当时的六国之人，也大都清楚秦国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因此后面的部分不会说得特别细，毕竟涉及的地理单元都已解读过了。相信喜欢历史的人，应该可以将之作为参考，结合史书自己理出思路了。关于蓝田之战，究竟是楚胜还是秦胜，一直有些争议。鉴于秦国是最终的胜利者，并且还搞了个“焚

书坑儒”的“壮举”，因此史书中很少见到秦军吃大败仗，即使是败了，伤亡的数字也是语焉不详。其实倒也怪不得秦人护短，哪怕是在现在，政治家们也还是这样做。

实际上蓝田之战到底胜负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楚国取得了战术胜利，在魏、韩两国抄了后路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撤了回来；而就算是秦军在蓝田击溃了楚军，“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秦军的损失也小不了（蓝田之战就是属于“语焉不详”之类的，不像丹阳之战，大大方方地列出了杀敌八万的数字）。经过丹阳、蓝田两战之后，秦楚之间因为休养生息也要停上一阵子了。不过可疑的是，秦国居然把刚吃进去的那块“汉中”之地给吐了出来，以向楚国示好。

这让人感觉到，似乎是楚国取得了战略优势。不过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来看，大战之后的秦、楚实力天平，应当还是向秦国倾斜了。占据地理优势的秦国，即使是暂时不想与楚国正面为敌，也不需要“割地”以求和（楚国不会再有兵力和机会攻入关中了），这其中一定有别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秦国的年表，就很容易找到秦国“割地求和”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在公元前311年，指挥丹阳、蓝田之战的秦惠文王死了。

作为秦国第一个称王的君主，秦惠文王虽然在即位之时就杀了商鞅（当年商鞅曾经刑罚还是太子的惠文王），但他在位之时不仅从魏国手中夺回了河西之地，还南收巴蜀，将秦国的地缘实力扩张了一倍，成为战国第一强国。虽然说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并不会单单由于政权更迭而发生质变，但从微观的角度看，也是需要一点时间调整的。君位更迭的稳定与否，其实是与内部结构的成熟与否息息相关的。春秋之时之所以会发生那么多血腥的君位争夺战，很大程度是因为条块分割的“封建”制，让各级贵族们大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和独立的经济区。

而到了战国时期，“集权”式的管理已经开始逐渐取代周人所建立的“封建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出现争夺君位的情况，甚至流血冲突，一般在上层就可以解决掉了（最多宫廷政变）。类似“曲沃代翼”那种一打几十年的情况是很难再出现的了。这次秦国的君位更迭，也没有出现什么突发事件，太子荡顺利即位，史称“秦武王”。

秦武王继位后，摆在秦国面前的仍然是两个选择，要么在河、济流域挤压“三晋”的生存空间；要么在江、汉方向继续攻击楚国。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是为了秦国能够最终扩张至中原。至于说齐、燕两国，暂时和秦国没有地缘冲突，重点在于用政治手段说服他们不要加入反秦的合纵联盟。至于说秦国会怎么选，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攻击楚国的计划被暂时搁置了。既然楚国没事了，那么倒霉的就该是三晋了。而这次秦国的战术目标，并不是继续深入河东之地，将魏国逐渐挤压出山西高原，而是透过崤函通道攻击韩国。

从秦国的角度看，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攻击韩国。因为十年前，五国合纵攻秦的“函谷关”大战（前318年）虽然以秦军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但大胜之后的秦国，无论是出于防御的角度，还是向东渗透的目的，都应该将防线继续向东推进了。而如果

秦人沿崤函通道东进的话，首先进入他们视线的就是韩国旧都“宜阳”城。攻取宜阳城，对秦国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将崤函通道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可以有机会“问鼎”于王室。

以韩国的实力，宜阳之战（前 308 年）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韩国选择将宜阳定为都城，并非没有想过秦人的威胁。但那时候崤函通道中的枢纽——陕地，还在魏国的控制之下（甚至河西还是魏国的），宜阳城的韩国贵族们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而现在，韩国这个曾经的都城已经处于对秦作战的第一线了。也许韩国人现在在后悔，为什么几年前楚国倾全国之力在蓝田与秦国决战时没有站在楚国一边，反而背后捅了楚人一刀。占领了宜阳城之后，洛阳盆地也就不设防地摆在秦人面前了。实际上攻取宜阳，挟洛阳盆地中的“王室”以令天下诸侯的计划，早在 8 年前的宫廷辩论中就已经由张仪提出过了。只不过那时候，司马错的平蜀计划被优先安排了。

第五节 秦武王在洛邑举鼎时身亡

从战略的角度看，三晋和楚国都是秦国前行道上必须扫除的障碍。至于说要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倒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现在的周天子，其影响力已经可以基本被无视了。之所以还能够在洛阳盆地留着一口气，主要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个出头鸟。有没有用另说，但如果谁敢把他给灭了，那还是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谁要真的想这样做，除非他已经具备以一敌六，一统天下的实力了。而这个实力，韩国显然是不具备的，因此尽管他在洛阳盆地内也蚕食了不少土地，但王室的核心区也还是不敢碰的；至于秦国，若干年后他们当然是有这个实力的。只是现在去做，还为时尚早。秦国与三晋、楚国、齐国这三大地缘集团之间的实力对比，还没有拉开档次。

说到“周”王室，不得不感慨一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曾经的天下共主已经只剩下个虚名和为数不多的土地了，但即使是落魄如此，王室在洛阳盆地的那点土地居然也闹起了分裂（公元前 367 年），分裂的结果就是在洛阳盆地中出现了两个以周为名的公国。一个以旧都洛邑为中心，被称为“西周”；另一个则在洛阳盆地的东北角，靠近虎牢的“巩”邑（位于现在的郑州巩义市），被称之为“东周”。而那位徒有虚名的“周天子”，则仍旧生存在洛邑中，由西周国公“庇护”。

对于天下诸侯来说，两个“周”国都是王家血脉（东、西二周的君主，也是王室成员），打谁都有政治风险，也没有什么利益，因此二周并存的格局也就保存下来了。对于已经攻下宜阳城的秦武王来说，虽然暂时没有动吞并二周的念头，但秦国的实力已经居于天下诸侯之首，放在春秋时期，就是当仁不让的霸主了。在这种情况下，上西周王城去“拜会”一下天子，为自己的江湖地位正正名也不算过分。

不过秦武王到了王城之后的举动，却不仅仅是“正名”那么简单了。因为他做了一件和当年楚庄王类似的事件，就是对那九个代表天下共主地位的“鼎”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秦武王这次做得比楚庄王还要过分，他把“鼎”给举了起来。在历史记载中，秦武王举鼎是为了和下面的臣子比力气。但从政治的层面看，他的这个举动，显然是为了向天下诸侯传达秦国入主中原的决心。可惜的是，秦武王有些高估自己的力气了，结果用力过猛，两目出血，胫骨折断，当晚就气绝身死了。秦武王之死，放在历史中是属于突发事件，对于秦国的影响就是，秦国又需要再花几年时间来做内部调整了（对于我个人的影响就是——绝不送儿子去练举重）。

在这段日子里，秦国不再是战国地缘舞台的主角。少了秦国的参与，那些闲不住的诸侯们又开始相互攻伐了。而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国家的地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楚国。因为这个江淮的霸主灭掉了他的老对手——越国，并由此一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淮河两岸，成为当之无愧的“南霸天”。

第二十四章 楚国攻灭越国引发的影响

第一节 楚国应形势变化而吞并越国

楚国吞并越国是在公元前306年，也就是那个力大无比的秦武王归天的第二年。从时间上看，楚国似乎是抓住了一个机会一蹴而就的。但事实上，灭亡一个国家哪有这么简单。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楚国早在蓝田之战后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越国在吞并吴国以后，之所以长期游离在中央之国地缘舞台边缘，很大程度是因为越国自己内部矛盾重重，对入主中原并没有太多想法。而在结构上与越国地缘矛盾最深的齐、楚两国，当年在对吴作战中均有过切肤之痛，现在对于新的江东之主——越国，也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毕竟进入战国以后，中原的博弈越来越白热化，特别是魏国的势头正盛，齐、楚两国都需要在中原地区投入更大的精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过当历史进入战国第二阶段后，魏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也就已经结束了。根据形势结成不同的同盟，以应对纷杂的国际形势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而在这种合纵连横的形式之下，偏安东南的越国也被牵扯进来了。从地缘格局上来看，共饮一江水的越国和齐、楚两国存在结构性的地缘矛盾，这点在当年吴王阖闾时代就已经验证过了。因此越国选择联合的对象是三晋中的老大——魏国。而已经将中原作为扩张重点的魏国（国都都迁过来了），在东线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齐、楚两国。有越国在他们后面捣乱，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魏、越两国达成战略联盟，倒是和当年的晋、吴两国遥相呼应颇为相似（甚至说不上谁找谁，更多的是一拍即合）。只能说在地缘格局没有变动的情况下，谁处在那个位置，这出戏都是这样唱的。只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许有一天，魏、越两国也会爆发激烈的地缘矛盾，就像当年的晋、吴“黄池争霸”那样。但前提是有一方能够把齐、楚两国打服了，并和对方的控制区直接接壤。

可惜的是，历史再也无法上演“黄池争霸”那一幕了，因为楚国决定打破这种平衡了。从战术上来看，急于进入中原分一杯羹的越国，似乎是战争的“始作俑者”。因为有了魏国这个同盟，越国首先将攻击目标锁定为齐国。越国人作出这项决定很难说不是受了魏国的引导。因为在齐、魏“马陵之战”后，齐国俨然已经成为山东诸国的最强者。而为了牵制齐国，越国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对于越国来说，先向北还是先向西，并不存在必然的优先顺序。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很大程度要看决策者的决心，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就像当年吴国决定先搞掂楚国，就是受了伍子胥的影响一样。而这次，齐国人也施展外交手段，让越国人相信，应该先攻击楚国，统一江淮流域再图中原。从战略上来看，这种选择也说不上错误，不过齐国人这样做，

显然是在祸水西移。

越国所挑起的攻楚之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公元前 330 年）。而获胜之后的楚国也开始重新正视这个老对手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如果不是越国的“低调”，也许在勾践时代，楚、越之间的 PK 就已经开始了。而真正让楚国动了灭越想法的原因，是因为秦国的南进。秦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巴蜀，并随即展开了攻楚的“丹阳之战”，让一直醉心于中原争霸的楚国，真实的感受到了西线的压力。虽然蓝田之战后，秦楚两国达成了和解，但谁都知道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因为在秦国占据了汉、江两水的上游之后，秦、楚之间的地缘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从楚国的角度来看，从秦国手中夺取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当然是解决秦、楚之间问题的一个方向，不过当年有个巴国在中间横着，就已经让楚国头痛了上百年，现有对手换成了强大的秦国，再想入主川中，显然更是难于上青天。

另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也向下游地区扩张。这看起来是一个逃避问题的方案，但也是一个合乎实际的补偿方案。就像魏国在黄河中游的河西、河东之地受到秦国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转而将重点放在下游的中原一样。楚国选择将下游的江东地区作为拓展对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并不能说楚国就一定觉得自己会丧失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这两个核心地区，但在你的对手得到了新的土地，实力有了质的飞跃时，你如果想在对抗中保持平衡，也应该有类似的战略规划，否则自身的衰败就不可避免了。为了吞并越国，楚国从与秦国达成和解的那一天起（公元前 311 年）就开始做准备了。除了必要的军事准备外（人员、物资），情报收集工作也是楚人的工作重点。也正因为准备充分，楚国在公元前 306 年的攻越之战才能一战而成，占领了越国所据的淮河下游地区和江东之地。而越国之所以会败得这么快，跟他自身结构的不成熟也有着很大关系。

在吴越春秋部分中我们就说过了，吞吴之后的越国，自勾践之后就陷入了内部纷争。长期偏居东南所造成的政治不成熟，使得越国得到吴国土地迅速坐大后，也旋即陷入了内部分裂的境地。那些王室子弟们除了争夺王位之外，更是拥兵自重，将整个国家分割成为若干块（和蒙古帝国的情况很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春秋时期，倒也不算劣势。因为春秋之时各国的情况也基本都是这样，由层层封建的领主所构成的。但现在已经是战国了，在各主要诸侯国纷纷将权力和土地集中在公室手中时，越国的这种落后制度只能让他们在地缘博弈中未战先衰。

对于越国是否亡于楚国，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因为楚国在占据了江东平原之后，并没有越过钱塘江继续攻击回到祖地的越人。楚人之所以没这样做，和当年的吴国一样，因为没有足够的把握和越人展开山地战。真那样做的话，楚国势必要牵扯大量的精力在东南方向，这和他们的初衷显然是不符的。从这个角度看，你也可以认为越国没有亡。

不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我们的确也可以认为越国已经亡了。因为放弃钱塘

江以北土地的越国,实际上已经退出了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恢复为一个边缘民族了。而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越国原来的内部分裂也已经公开化了。当年的外越之地分裂出了瓯越国,而南面的闽江流域,又分裂出了闽越国。这些所谓的王国,更为热衷的是内部斗争,对于夺回“失地”并不感兴趣。相反,为了在彼此的争斗中占据上风,他们都认可楚国的宗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楚国当然也就用不着对越人赶尽杀绝了。

纵观越人的历史,他们能够进入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舞台,其实算是个异数。因为从地缘实力上来说,占据江东平原的吴人,更有资格代表长江下游地区争霸中原。而越人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一方面保存并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海洋优势),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向吴人学习,让自己的向农耕民族靠拢。两千多年前的这种转变,让越人的地缘属性中整合了山地、平原、海洋三种特征,并一直延续了下来。即使在今天浙江省的行政区划中,也能够看出这种混合气质。相比之下,同样依山靠水而兴起的巴人,地缘属性就显得单一多了。能够控制西南地区的食盐供应,固然让巴人过上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好日子,但也使得他们学习更先进生产方式(农业)的动力不足。而这种单纯依靠资源生存的模式,其所面临的危机之大,在现在的世界里也仍然能够找到鲜活的例子。

第二节 三楚的概念和划分范围

在将越人赶回钱塘江以南后,楚国终于统一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就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概念“三楚”也浮出了水面。由于楚国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所包含的地缘板块也多,因此它的地缘文化也不尽相同。“三楚”之说就是对楚文化覆盖的地区,所做的一个粗线条的划分。

所谓的三楚,指的是:西楚、南楚,以及东楚。西楚算是楚国的基本盘,包括楚国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泗水流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北省以及安徽省的中北部。而南楚,而包括长江以南的长江中游地区,按现有的行政区划就是湖南、江西两省。从扩张顺序来看,楚国是先据西楚之地,然后向南楚地区渗透。而东楚地区,实际上就是楚国新征服的“吴越之地”。由于楚国征服这一区域的时间过晚,并且从地缘结构上看,江东及淮河下游地区,更具有独立性。因此在后来的文化概念中,发源于本土的“吴”文化还是成为这一地区,特别是江东地区的文化标签。

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东楚地区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江苏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江苏省的西北部——徐州地区(当时叫彭城),在历史上并不属于东楚地区。因为这个重要的战略要点,一直是宋、楚、齐等国在中原争霸的焦点。吴、越两国对徐州地区的控制时间也很短。后来,楚国也是在齐国灭宋,并被燕国攻击之后,顺势得到了彭城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带领江东子弟反秦的项羽,在据彭城之后才会自称“西楚霸王”而不是“东楚霸王”。

在划定三楚这个地缘概念时，有两个板块的问题需要特别交待一下，一个是南阳盆地，另一个则是淮河上游地区。从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南阳盆地和淮河上游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划入了河南省，也就是被认定为中原文化的覆盖区。而在先秦时期，这两个区域长期是属于西楚板块的，这种情况是有地缘和历史原因的。从地缘上来看，无论是谁入主中原后，对于江汉平原的地缘潜力都不得不正视。因此在进行行政区划时，都不愿意江汉平原有机会和南阳盆地以及淮河上游地区合为一体。



三楚地缘结构示意图

将这两个区域直接控制在中原政权手中，就可以控制江汉平原进入中原的两大出口：方城夏道和信阳通道。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先这样做的就是周人。当年周人为了防止日益强大的楚人向中原渗透，曾经在汉水以北（实际上是东北），以及淮河上游地区部署了一系列的嫡系诸侯（主要是姬姓诸侯，也包括姜姓等亲信诸侯）。这些诸侯主要包括南阳盆地的申国，随枣走廊的随国，淮河上游的息国，方城夏道东侧的蔡、沈等国。这些为了防御楚人而设立的诸侯国，也都可以统一在“汉阳诸姬”这个地缘集团中。而这些曾经被华夏诸侯所控制的地区，在一些“正统”的文人看来，

是不能被划分入蛮夷之地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河南省的南部甚至已经伸到了淮河以南，直至将整个桐柏山脉外侧封死（当年淮河以南的“蒋国”，可是将周公的一个儿子封建过去的。可以看到，现在河南省向淮河上游伸出的这个角，就是当年华夏诸侯所覆盖的区域，而这个角以外的区域，就没有姬姓诸侯了）。

至于说南阳盆地，其实最早也不能全算是周人的控制区。因为最开始楚人所据的丹阳，甚至还在汉水以北的“丹淅之会”，都是在南阳盆地。虽然后来楚人迁至汉水之南，但南阳盆地的西南部（现在的襄阳）也仍然是在楚人的控制中。而周人则在汉水之阳沿着随枣走廊一直渗透到江汉平原的东部，也就是云梦泽的北部。所以，周、楚之间最开始的地缘分割，并不能算是以大洪山为分割点、各据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的形式，而是以汉水这条对角线，斜向分割的。只不过在后来，楚人将汉阳诸姬的势力完全挤出了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相比于地缘政治上的劣势（毕竟中原是中央之国的中心），楚文化在地缘结构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毕竟南阳盆地也是属于汉水下游水系所覆盖的区域。

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豫、鄂两省实际上各凭优势在南阳盆地都获得了一定份额，只不过河南占据了主要区域。而湖北之所以能够分得南阳盆地的西南角，主要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因为无论是谁，在占据江汉平原后，如果不能进一步北控方城夏道，将南阳盆地纳入势力范围的话，那么最起码也要将防线北移到汉江通道和随枣走廊的北部，才能充分保证江汉平原的地缘安全。这种地缘博弈而产生的结果，在三国阶段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三节 楚国在垂沙之战败于韩魏和齐国

楚国在吞并越国之后，或者说占据了越人的吴国故地后，秦国那边的君位更替也进行完了。毕竟秦王这个位置只要空出来，马上就会有人补进的，历史并不为因为死了个秦武王而停滞不前。相比于短命的秦武王，继承秦国大统的新君（武王的弟弟）——秦昭襄王可是一位长寿的君王，足足在秦王的位子上呆了 57 年（公元前 306 年——公元前 251 年）。而秦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就是由他所创立的。可以说在他之后，无论是谁继承了秦国的王位，只需要保证自己的健康，以及能够稍微的长寿点，就能够收到胜利的果实了。

只不过这位秦昭襄王的命实在是太长了，长到把他的太子也熬得差不多了，其继位成为“秦孝文王”后不到一年也随他而去了（想到英国的查尔斯了，等的时间也够长）。再接下来的那位秦庄襄王就比较出名了，因为据说他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顶“绿帽子”，而疑似给他戴绿帽子的就是那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商人——吕不韦。当然，这项绿帽子到底是不是真戴上了还很难说，虽然这个说法，在这个

名叫“异人”的秦王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传了。但不管怎么说，吕不韦做了笔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买卖，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这位“异人”兄到底是不是因为“绿帽”而“被驾崩”的，也是大家所感兴趣的。只是在这里是无法考证出个结果来的。反正他的确是只做了3年多秦王，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就上位摘桃子了。

正因为如此，秦国统一天下的“精华”部分，并不是在秦始皇时代，而是在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秦昭襄王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我们战国部分的压轴大戏。秦昭襄王继位之后，和他的父兄一样，面临是继续向东以三晋为攻击对象，还是东南以楚国为突破口的问题。如果按照之前和楚国达成和解的方案，下一步重点应当还是三晋。不过楚国在东面吞并了越国，让秦国感到了一丝不安。地缘实力增强的楚国，很有可能会主动打破秦、楚之间业已达成的平衡，而这一切是秦国所暂时不愿意看到的。

正当秦国还在重新评估秦、楚关系时，中原地区却展开了一场新的混战。一方是正春风得意的楚国，而另一方则是魏、韩、齐的合纵联军。出现这种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楚国在江、淮下游的开疆拓土，虽然对秦国构成了间接的威胁，但对于中原争霸的主力：魏、韩、齐三国所构成的威胁则要直接得多。为了不让楚国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消化新得到的“东楚”，三国联军选择了南阳盆地作为攻击的对象。在攻入方城夏道之后，双方在宛邑（南阳市）东南方向的“垂沙”展开了决战（唐河县西南）。

垂沙之战最终以楚国的失败而告终。在战国这种群雄并立的格局之下，灭掉一个二流国家，取得一块有潜质的地缘板块，固然能够让自己的地缘潜力发生质的飞跃。但你这样做的时候，也意味着打破了旧有的平衡，随之受到其他诸侯的联合攻击，也就不可避免了。像之前秦国吞并巴蜀及之后齐国吃掉宋国，都碰到类似的情况。只不过秦国所渗透入的四川盆地，相对来说不那么敏感。而秦国所据之地，无论新旧，又都有极强的防御力，因此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融合新并进来的土地。

而相比之下，东方的这些诸侯国就很难有这样的优势了。当他们通过兼并其他国家而扩张领土时，也意味着必须分散出相当一部分力量来单纯地承担被动防守的任务。而无论是在出于稳定新占土地的内部结构，还是在防线长度的问题上，在开放的平原地区做这种兼并，其维护成本都要高于吞并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楚国在垂沙之战的失败，其实根源也正在于此，要消化那么大块“东楚”地区，必定牵扯掉楚国很大一部分兵力。

楚国在垂沙的失败，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先是楚国的内部出现了问题，按照“正统”的解读是，爆发了“农民起义”，或者说依当时所处的时代（春秋末期），应该是被定义为“奴隶起义”。而按照传统的说法，则是有“盗匪”造反了。这个搞乱楚国内部的“大盗”叫做“庄跻”，在历史上很有名，和另一个叫做“跖”在大盗齐名（在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盗跖”也被认定为奴隶起义军首领）。

这倒有点像《水浒传》中的宋江、方腊两雄并立的情况。而与《水浒传》中的情节颇为相似的是，庄硚最后也被楚国招安了，并在我们随后的章节中发挥的新的作用。

不管庄硚后来怎么做，他的这次“起义”算是从内部捅了楚国一刀，楚国暂时性地陷入了内部分裂的状态。其实楚国本身的管理架构就是比较松散的，对于很多被征服地区，还是采用“因其俗”的方法让他们自治。加上如此广阔的疆土和复杂的民族成分，阶段性地出现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在魏、韩、齐三国联军和庄硚的内外夹攻之下，楚国的地缘安全受到了严峻考验。在这种时候，如果楚国想寻找外援的话，秦国是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邻国。就像当年吴、楚柏举之战时的情况一样。不过这时候的秦国，已经不太愿意做雪中送炭的事了，实力增强的秦国，正希望削弱楚国这个最大的对手。因此秦国随后在公元前 300 年、298 年对楚国展开了两次攻击。攻击的方向也是南阳盆地，而选择的攻击线路，仍然是丹江通道。

秦国这次的趁火打劫，让他们得到了楚国析邑所辖的 15 座城邑。而与南阳盆地地缘关系最为密切的韩国，乘楚国内忧外患之机，占据了南阳盆地的地缘中心宛邑（现在的南阳市）。从此，南阳盆地再也不是楚国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成为多国角逐的竞技场。而南阳盆地变成“四战之地”，也足以抵消楚国获得“东楚”地区所带来的实力增长。不过以韩国的实力，想把手伸那么长，注定是要以悲剧收场。公元前 291 年，秦人又从韩国手中夺取了宛邑。自此，秦楚两国地缘博弈的主战场，由丹江通道，转移到了南阳盆地。地缘平衡的天平，进一步向秦国倾斜了。

秦国在将对楚作战的防线推至南阳盆地后，并没有进一步与楚国展开对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崤函通道、洛阳盆地、中原地区又一次成为秦国的战略重点。因为秦人知道，如果他们死盯楚国 PK 的话，只会让东线的三晋得到喘息之机。即使秦人想停下来，三晋也不会太平的。更何况就算秦国想灭楚的话，即使现在已经占据了整个南阳盆地，但楚国也可以据大洪山两侧以自守，以保证自己在江汉平原核心区的战略安全（收缩防线后的楚国，防守的宽度和难度反而能够减小。守汉江通道和随枣走廊的难度，要比守方城夏道的难度低得多）。要想彻底解决楚国的问题，还是需要从巴蜀着手，早日将四川盆地消化为熟地，以顺江而下直接攻击楚国在江汉平原的核心区。

第二十五章 楚国向武陵山区扩张

第一节 武陵山区的地理结构

从地缘格局上来看，无论是秦攻楚，还是楚攻秦，连接渭河平原——南阳盆地的丹江通道都是唯一的选择。而现在，占据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的秦国，又多了汉水、江水两条战略通道可以对楚国施加战略压力。不过丹、汉、江三水并不是秦、楚之间地缘博弈舞台的全部。

从我们前面解读过的楚国的地缘结构来看，上述三水所对应的攻击方向，其实攻击的都是楚国的核心区——西楚地区。而楚国长期经营的南楚地区，以及新拓展的东楚地区并没有承受直接的压力。拥有这样的战略纵深，即使你能够将楚国的核心区基本打垮，也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够获得最终胜利。这样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由苏联演绎过了。因此从战略的角度看，秦国如果要以灭楚为目标，还可以考虑下，有没有机会在楚国的另外两大地缘板块中开辟第二战场。

从位置上来看，让地处西北的秦国去直接攻击地处东南的东楚地区，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秦国想在这个方向给楚国压力，与那个东方大国“齐国”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为现实。而相比东楚地区，在与“西楚地区”南北排列的“南楚地区”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倒还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当然是源于秦国已经占据了四川盆地。如果秦人想以四川盆地为基地，向东攻击南楚地区，那么现在的湖南省就是他们的攻击方向。

只不过无论秦人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攻击路线，他们都要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湖南西部的那一大片山地，攻击到南楚地区的地缘核心——洞庭湖平原。这片山地虽然没有秦岭那么高，但覆盖的面积和地形的复杂程度却比秦岭地区还要高。而在此经营日久的楚人，已经预先在这片山地中设置了一个边郡——黔中郡，以抵御来自西面的威胁。至于说这片山地的地理学名称，则是叫做“武陵山区”。

我们先来看看“武陵山区”的地理结构吧。从位置上来看，这片山地位于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洞庭湖平原以及江南丘陵的西端山脉“雪峰山”之间。而从形态上来看，武陵山区是属于典型的“褶皱山”。这种有如皱纹，呈弧状一波一波的层叠成片的山体，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属于难啃的硬骨头。川东的那片护佑了巴国的“平行岭谷”，也是属于褶皱山地形。而与武陵山区相比，川东的那些平行岭谷，无论是从高度还是密度上看，都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不过从褶皱的形态上来看，川东显得太明显）。其实如果从地理关系上来看，与武陵山区隔长江相望的“川东平行岭谷”，也可以被看作武陵山区的外延。只不过像大部分山地一样，海拔和密度渐低的外围地区，生存环境要好于核心地区罢了。

要想从这么一大片褶皱山地中寻找交通通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过好在那些无孔不入的河流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通过寻找这些穿行于武陵山区腹地与边缘的河流和它们的运行轨迹，我们不仅能够找到通行于其中的通道，更能够知道那些重要的战略据点应该如何设置。我们先将武陵山区所涉及的主要河流罗列出来，它们分别是长江、乌江、清江、澧水、沅水五条河流。其中乌江的中下游河道（也就是南北向的那段），可以被看作武陵山区与云贵高原的地理分割线（乌江东侧的支流也覆盖了武陵山区的西部）；而涪陵——宜昌的这段长江河道，则可视作武陵山区与大巴山区的分界线。至于滋养武陵山区腹地（东部）的任务，就主要由清江、澧水、沅水三条东西向流淌的河流，以及它们的诸多支流承担了。



楚·黔中郡地缘结构图

从形态上来看，清江、澧水、沅水似乎应当归属于同一地缘板块，但在大部分时候，清江和澧、沅两水却有着不同的归属。这种结果，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所直接的归

属有着本质差别。尽管在这三条河流中，清江的长度是最短的，但它却是离长江最近，且直接注入长江的。而澧、沅两水要想汇入长江，还需要先到湘江里去中转一下。也就是说，要是像人类社会一样划分辈分的话，清江的辈分要比澧、沅两水高。

尽管为河流划分“辈分”，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这种差别，却可以真实的影响地缘结构。因为沅、澧两水以及其他的湘江支流，会因为湘江而很自然地结合为一个地缘板块。而如果楚人希望征服清江流域的话，却并不需要经由湘江中转，所以清江流域和湘江流域完全可以当成两个独立的地缘板块来经营。当然，由于清江流域处在武陵山区之中，加之流程较短，没有足够的空间形成大型的冲积平原，因此以其为基础所设立的行政单位，并无法与湘江流域取得平级的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它以一个独立单元的面目与周边的其他地理单元相结合。在两千多年前，楚人就将其与三峡北部地区结合在一起，共同设立了“巫郡”这个行政单位。



湖北清江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将三峡南北地区统一在一个行政单位之下，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这个战略要地。就像如果台湾海峡两岸能够归属于同一国防圈的话，美国的舰队要想再从中间穿行，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对于楚人来说，将三峡南北统一交由巫郡管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江北的支流“大宁河”与江南的支流“清江”，都是重要的产盐基地。

两河沿线的“宝泉山盐泉”和“清江盐泉”，都曾经是巴人的重要基地和财富源泉。

不管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还是出于控制“盐”这项重要的战略物资，楚国都有必要把三峡南北地区置于王国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说将巫郡所辖的地理单元直接由江汉平原来管辖。由于在两千多年中，江汉平原一直是两湖地区的地缘中心，因此这种地缘结构也一直保持到现在。如果你去观察湖南、湖北两省的行政区划，就会发现湖北省不仅在长江以北的大巴山区管辖了大片山地（还包括“上庸”之地），在长江以南的巫郡旧地——清江流域也依然由西楚的嫡系继承者“湖北省”所控制。

去除掉“清江流域”这块据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地理单元，剩余的武陵山区基本就是楚国黔中郡的管辖之地了。之所以要在黔中郡之前强调“楚国”二字，是因为秦国在从楚国手中夺取巫郡和黔中郡之后，将它们合二为一，成立了新的“黔中郡”

（统一后，又做过调整）。对于志在天下的秦人来说，他们有机会将一些条块分割的地理单元，从全局的角度作一个划分。正如后来的秦“汉中郡”，亦将楚国的“上庸”也包含进去了，成为覆盖整个汉水中游地区（如果把西汉水视作上游的话）而名副其实的“汉中郡”一样。

第二节 楚国与武陵山区部族的关系

如果单看行政地图，我们一定会感叹黔中郡所覆盖区域之大。这片横跨了渝、鄂、黔、湘四省（市）的土地，从体量上来看，甚至超出了两湖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面积。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即黔中郡在楚国最起码是一个地缘副中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如此复杂的山地之中，可供利用的土地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真正能够供农耕民族利用，并聚集一定数量人口的，只能是大型河流两侧较为宽广的河谷地区，特别是两河交汇的三角洲。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较小的河流和山地之上就没有人类生存了，只不过那里往往是边缘民族的天下了。并不是说，楚国或者后来统一之后的中央政权，就不能够统治这类复杂的山地，但在具体的控制方法上，往往需要以间接控制为主。这种情况，直到上个世纪前半叶仍然没有太大改变。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在武陵山区中找到诸多民族自治的行政单位，也能够非常多的影视剧中看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剿匪故事。

应该说，本身就“蛮夷”自居的楚人在处理边缘民族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得法的。并没有试图将他们完全融为一体，但控制主要的河流和交通线还是必需的。其实如果从增强地缘实力的角度来看，楚国并没有特别的必要向武陵山区扩张。征服这片山区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比征服巴蜀或者吴越之地要低得多。不过很多时候，边郡的设立并非是因为那里有利益，而是因为防御的需要。这样一片山地，楚国固然看不上眼，却仍然生存有不少的边缘部族。尽管这些边缘部族的体量都不大，但楚人不去收服他们，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为患楚国。

从亲缘关系上来看，这些边缘部族与楚国的死对头——巴国都存在着很深的亲缘关系。当巴人顺长江而下袭扰楚国的江汉平原时，他们的这些亲缘部族也往往会听从巴国的召唤，顺着澧、沅等汇入湘江的河流，袭扰楚国的后花园——洞庭湖平原。对于占据上水优势的巴族和他们的朋友来说，这种袭扰会有很强的突然性和破坏性。而巴国控制武陵山区的山地民族，靠的也不仅仅是相似的出身背景，巴人所控制的“盐”，才是他们能够成为“武林盟主”真正的法宝。可以想见，如果武陵山区的山地民族不和巴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多么的“无味”。不过最先拥有有这种“权力”的也并不只有巴人。最起码在他们之前，庸人就曾经做到过这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庸人才自觉有能力挑战楚国的宗主地位，并最终被灭）。

对于楚人来说，要想彻底解决西线的安全问题，除了把缓冲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的上庸、巫郡两地控制在手中外，将防线沿澧、沅两水推进至武陵山区腹地，为洞庭湖平原构筑缓冲之地，也就十分有必要了。而从地缘关系上来看，楚人设立巫郡和黔中郡的时间并不会相差太久。因为失去了三峡南北的盐泉，巴人也就没有了控制武陵山地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楚国要想控制武陵山区，并不需要经过大规模的战争。那些山地之中的蛮夷部落，并不会太介意换一个宗主。前提是这个新的宗主不要过于干涉他们的内务，而这点正是楚人的管理特点。

第三节 武陵山区澧沅资三水的特点

武陵山区的地理结构复杂，用“千山万岭，峰峦叠嶂”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这片山区的腹地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当今社会，这些险山峻岭却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为当地的居民创造财富，那就是旅游业。闻名中外的“张家界”风景区，正是位于武陵山主脉。正是由于武陵山区的山势险峻，张家界的一些山峰也成为电影《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的地质原型。《阿凡达》的导演并不是第一个看中武陵山区地理特质的人，最起码当地人相信，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就是在武陵山区。而在目前“桃花源”归属的争夺战中，武陵山区内也存在数个竞争者。对于我们来说，到底谁才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已经不重要了，能够透过这场文化争夺战，感受到武陵山区在古典时期的封闭性就可以了。

对于古典时期的人来说，要想穿行于武陵山区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像人口迁徙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会受制于当地的地理条件。这点亦可以从2010年通车的“宜万铁路”（湖北宜昌到重庆万州）中得到验证，这条通行于武陵山区北部（清江与长江之间）的铁路，被媒体称之为“世界上最难修的铁路”。这条铁路的修建时间也创造了一个记录，达到了一百年。最初是由詹天佑于1909年开始修筑的（当时叫川汉铁路）。不过这位在小学课本中以解决难题而著称的铁路工程师，当时仅仅修了20多公里就修不下去了。

有鉴于武陵山区的通行难度，楚人如果想向西渗透入四川盆地的话，长江水道基本就是唯一选择了。而如果楚人的视野再开拓一点，准备向四川盆地南部的云贵高原渗透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也就是在武陵山区以南，寻找一条足够长的黄金水道，以为之指示方向。最终楚人还是找到了这条水道，它就是沅水。

说到沅水，就不得不提一下“三湘四水”这个经常代指湖南地区的地缘概念了。所谓三湘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四水究竟是哪四条河流还是可以明确的。它们就是南北穿越整个湖南省的长江支流——湘江，和它西侧的澧、沅、资三条河流。由于湘江的位置是靠近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因此整个洞庭湖平原大

部分是位于湘江以西，并与它西侧的这三条支流下游冲积而成。而这三条河流的走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战略地位也有轻重之分。



张家界风景区



宜万铁路

位置最北的澧水，其中上游所流经的区域，是武陵山区腹地。所以，这条河流对于楚人来说战略意义不大。位于澧水中上游核心区的“张家界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凭借旅游资源获得地级市的行政地位。而在历史上，澧水流域似乎总是与“隐居”二字有关。最早有可能隐居于此的，是汉水流域上庸之地的庸国遗民。在被楚国灭国之后，部分庸人南迁至此，史称“下庸”。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在澧水边上找到一条叫做“大庸溪”的支流。据一些专家考证，这些庸人也成了现在土家族的源流之一。其实张家界市本来是叫“大庸市”的，不过一方面“庸”这个字，现在已经有贬义了。另一方面张家界风景区的名声在外，为了充分利用这个资源，

所以才在 1994 年改的名。如果从营销的角度看，无疑是成功的，只是割断了它的历史源流。

除了庸人以来，隐居于武陵山区澧水之侧的历史人物还有一些历史名人，比如传说中的上古仙人“赤松子”；纵横家的创始人“鬼谷子”；兴汉名臣“张良”等。就连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疑似在此（澧水又名“武陵江”）。无论这些传说是真是假，都可以看出，隐藏在武陵山区的澧水，对于楚国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



楚·黔中郡地缘结构图

除了澧水以外，另一条湘江的重要支流——资水，所指向的是雪峰山以南的南岭。如果楚人决心开发岭南的话，这条线路也许会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不过现在楚人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西北方向，开发岭南的重任，还是等秦始皇来担当吧。在战国时期，湘、资两水的上游地区，也就是南岭一带，所活跃的主要是百越族的一支——南越。

这些与浙闽丘陵的越人存在亲缘关系的越人，可以说是在楚人的势力范围内，但楚人并没有兴趣和必要去直接控制这些地区。

现在该我们的主角“沅水”出场了。如果从长度来看，沅水无疑是三条湘江支流中最长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它可以直指贵州高原的腹地。由于沅水横穿了湘、贵两地，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大家都有权利为自己境内的那段江水命名。只不过到了现代，地缘实力最强的下游地区所命名的那段江名，往往成了整条江的江名（山脉也是这样，最高或者最有名的那段，也会成为整体山脉的地理名称）。

而沅水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溯江而上，将要走出湖南境内时，它的上游河道变成了两股进入了贵州境内。北源被命名为“舞阳河”，南源被称之为“清水江”。不过无论楚人沿哪条支流前行，所指向的区域都不会有太大差别（黔东南自治州一带）。从地理结构上看，沅水能够流那么长，是因为它位于武陵山脉主脉与雪峰山之间。由于武陵山区按照山脉的形态来划分的话，可以划为北、中、南三支，主脉是沅水北侧的南支（贵州境内的佛教圣地“梵净山”是主峰）；而雪峰山又是江南丘陵的西边缘山脉，因此沅水河谷正好是位于武陵山区与江南丘陵两大地缘板块的接缝处。虽然沅水河谷的南北纵深没有湘江两侧那么宽，不足以形成大型的冲积平原，但相比于其他两江，沿岸开发一些中型的战略据点的空间还是较为充分的。

在整体沅江中上游地区中，无论是从生存空间，还是战略重要性上来看，舞阳河、清水江两水合流的区域都是沅水的枢纽地区。目前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湘西重镇“怀化”市。在战国时期，这里也是楚国黔中郡的重要据点，很有可能也是楚国在西南直接控制区最后一个重要支撑点（再远的地方，就是通过间接控制了）。如果大家对旅游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个战略要点的西北侧，武陵山脉南麓找到一个叫“凤凰”的地方，在这座“边城”出现那起让人心痛的有警务人员参与而导致的少女跳楼案之前¹，它一直是以一个非常浪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1 2010年9月4日，湖南省凤凰县一酒店发生一起少女（16岁）跳楼死亡事件，随后引发网络热议。在案件侦破后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包括有一名交警和一名协警在内。

第二十六章 楚国向云贵高原扩张

第一节 楚国重点经营云南高原

武陵山区的情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从地理结构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潜力的地缘板块，更多时间只是被视为洞庭湖平原与西部各地缘板块的缓冲地。而被武陵山区隔离在西部的地缘板块中，除了巴、蜀之地的四川盆地以外，就是云贵高原了。这节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注意力一直在东线的楚人，要对云贵高原另眼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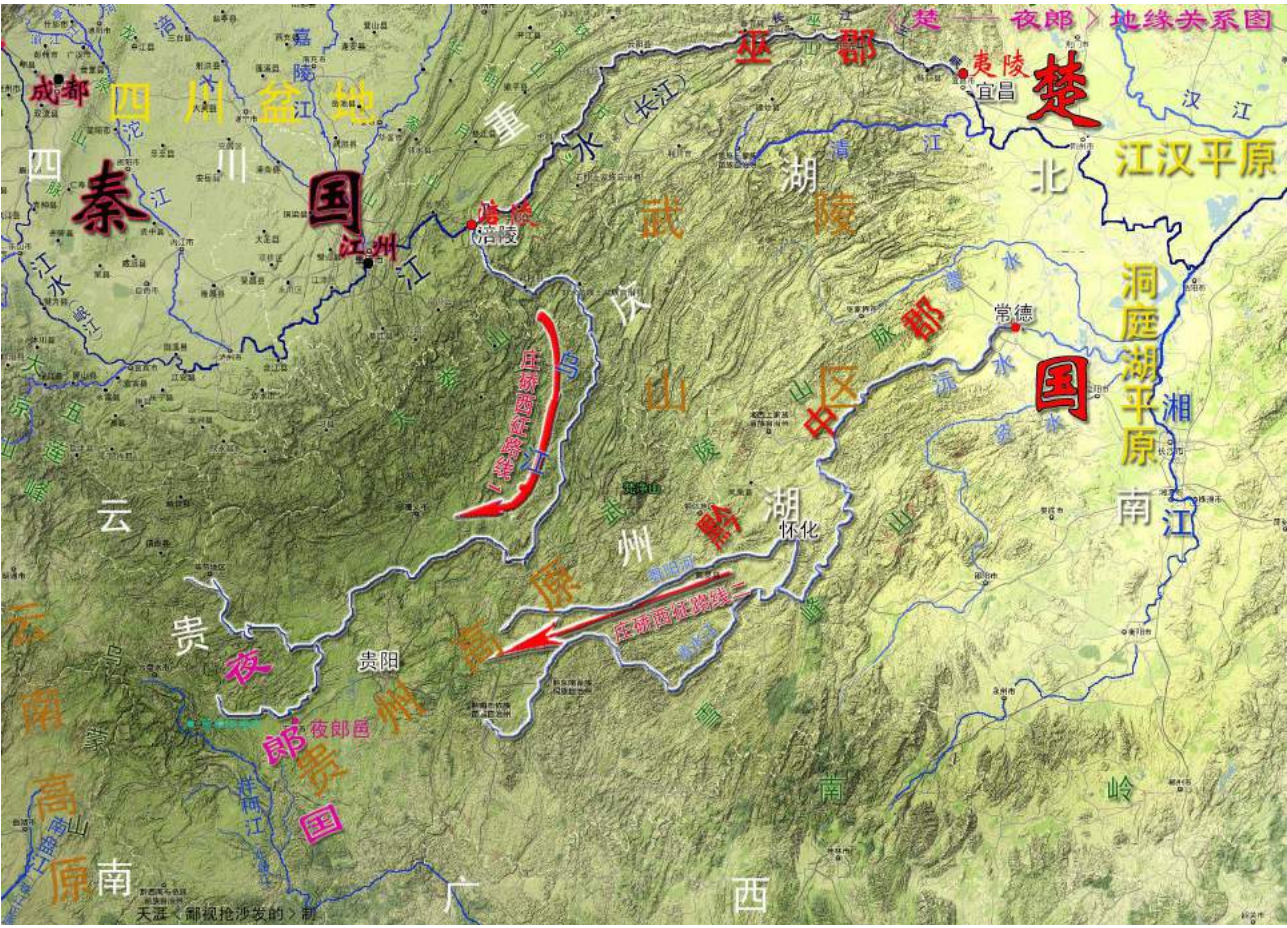
对于楚国来说，试图穿越武陵山区去控制云贵高原，似乎有点操之过急。开发这种边缘地区的任务，更应该由一个解决了内部问题的大一统王朝来完成。就楚国所处的时代而言，东线才是他们所应当关注的方向。当然，这并不代表楚人的影响力就没有到达云贵高原。毕竟楚国在长江以南地区经营日久，即使是出于纯粹的商业交换的目的，那些南蛮之地的部落们也并不介意给予楚国以足够的尊重。

问题是，楚国有没有必要去直接控制云贵高原。如果秦人没有占据四川盆地的话，那么楚人的确没有十分的必要去图谋云贵高原。但现在秦国已经向南占据了汉中、四川两大盆地，对楚国形成了绝对的地缘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云贵高原就成了楚国唯一的战略翻盘机会。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秦国所占据的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四川盆地，都可以算得上是四塞之地。楚人无论从丹江、汉江还是长江通道攻击秦国，实际上都只能形成单线进攻的态势。

由于楚国的地理劣势，即使是秦、楚之间实力相当，胜算也是掌握在秦人一边的。如果中原诸国，特别是三晋肯和楚人协同作战，从崤函通道一线同时对秦国施加压力的话，那么秦国在两线作战的时候，倒还是有可能露出破绽的。只不过山东诸国虽然屡屡合纵攻秦，但从来就没有真的齐心协力过。除了大家与秦国地缘矛盾有大小之别，导致出力不同以外，秦人对六国所施展的“连横”之策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后来三国时期，曹操每每听到对手又寻来了新的盟军便知道胜算会在自己一边了。既然这些潜在的盟友都靠不住，那么楚国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应付秦国了。如果一定要追求两线出击的表面效果，楚人倒也可以做到。即从丹江、汉江、长江三个方位，任选两线甚至三线同时攻击秦国。只不过我们之前也说了，楚国在这三个方向上都没有地理优势，更何况就算强行展开攻击，也算不上是两路包夹的战术，因为所攻击的是相互独立的地理单元。

如果要想真正实现两线攻击的战术，并让楚国最少在一条攻击路线上占据地理优势，以和秦国达成战略均势的话，楚人只有想办法在云贵高原开辟第二战场，才有可能翻盘成功。从地理结构上来看，云贵高原的地势比四川盆地高，如果在此建立战略基地，并寻找一条由高原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作为攻击路线的话，那么楚人

就可以对四川盆地占据一定的地理优势了。从战术的角度看，楚人在云贵高原建立战略基地后，除了由南向北向四川盆地的秦人发动攻击外，还可以由涪陵溯江而上，攻击秦人所占据的巴国故地。以共同对四川盆地形成包夹之势，并最终从秦人手中夺取巴蜀之地。如果四川盆地在秦、楚之间易手的话，那么秦、楚之间的战略形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到那时，也许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所定立的战略计划，就有机会提前实践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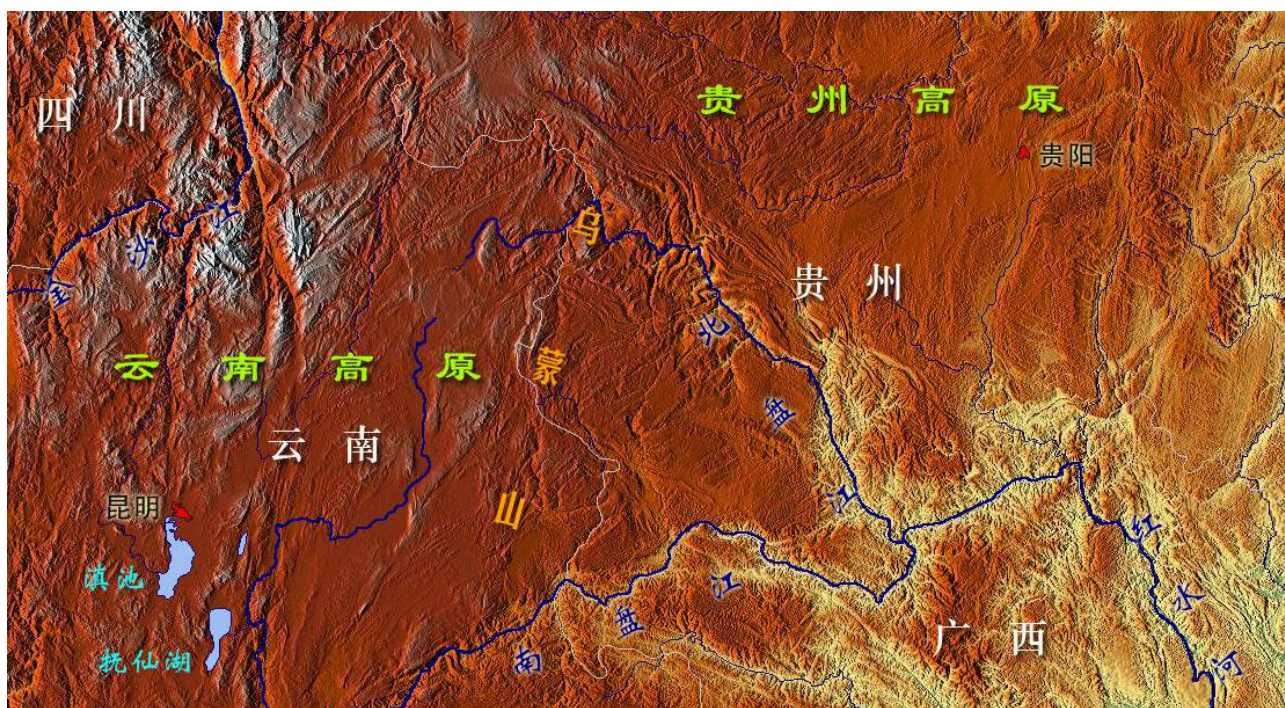


楚——夜郎国地缘关系图

如果楚人决心在云贵高原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那么选址也是一个大问题。即楚人如果准备经营云贵高原的话，应该把地缘核心放在哪里。从地理格局来看，楚人首先要考虑的是，究竟是把战略基地放在贵州高原还是云南高原。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这片地处四川盆地南面的高原，一直是以“云贵高原”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对于其中“云”、“贵”二字的理解，也无非是因为它地跨云贵两省，因此各取一字，以示公平罢了。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云贵高原的确是由云南、贵州两个相接的高原所组成的，尽管从大局上来看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但二者的地理结构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云贵高原最终

成为这两个省的主体，而不是合为一体。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楚人似乎应该选择贵州高原作为经营重点。这主要考虑到贵州高原处在云贵高原东部，靠近武陵山区（武陵山区其实是贵州高原的延伸）。楚国如果以此为基地的话，离洞庭湖平原的核心区会更近，更易于相互呼应。不过如果考虑到楚国向西渗透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对四川盆地的秦人，尤其是那个富庶的粮仓——成都平原构成战略压力的话，贵州高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贵州和云南高原地形图

贵州高原不适合做攻击四川盆地的战略基地，首先是因为它的相对位置。由于贵州高原的位置在东，即使楚国在此能够经营好，并找到合适的攻击线路，他们攻击路线所指向的区域也会是当年巴人所占据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而在这些山地中纠缠的话，时间就会站在秦人一边了；其次从攻击路线的具体选择上来看，楚人如果想从贵州高原上发起攻击，那条水系覆盖了贵州大部分土地的“乌江”，是最有可能的选择。

不过问题是，虽然沿乌江发起攻击有上水优势，但当楚军沿乌江顺流而下到达长江时，会发现他们还是没有突破秦人的防线。因为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涪陵，已经是楚国对抗秦人的桥头堡了。花费这么大力气绕个圈子去增援涪陵的楚军，并没有任何必要。除了在攻击方向和路线上，贵州高原不符合楚人的战略需求外，贵州高原本身的地理结构，也使得它很难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地缘板块。尽管从平均海拔上来看，贵州高原比云南高原还低些，但具体到地形上，贵州高原的生存环境却大不如云南高原。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高原的生存环境似乎都不容乐观，并且应该没有太大差别。但事实上，高原之称，只是因为它的相对海拔较高。但高原之上的相对地形，却有着千差万别。云南、贵州两大高原之间，就存在着很大差别。简单的说，就是云南高原的地势要相对平缓得多，高原之上多分布些低缓丘陵，而这些丘陵之间则是大大小小的盆地（有一千多个），这些盆地有的成了湖泊，有的则成了气候宜人的农业区。

而贵州高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片高原上，山势的起伏较大，由于河流切割的力度大，造成峡谷众多、相对落差明显，所以也被称之为“贵州山原”。正因为如此，贵州地区才有“地无三尺平”之说，整体条件并不比武陵山区好多少。这种地形条件，甚至影响了贵州地区的小气候环境，通俗地说就是“天无三日晴”。

当然，贵州高原上也并非没有地势较平的地区，但从整体的面积来看，与云南高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以至于后来的两千多年间，云南地区一直是云贵高原的核心区域。这种由于地理结构所造成的地缘潜力差别，在上个世纪军阀割据的年代中亦有体现，比如云南军阀的能量和影响力就要远高于贵州。

第二节 楚国渗透云贵高原的意图和时机

既然进军云贵高原，是楚人战略翻盘的唯一机会，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楚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这项战略任务的。应该说，如果楚人愿意的话，他们早在春秋之时就可以开展这项工作。不幸的是，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对于四川盆地以及云贵高原都没有足够的兴趣。无论是出于占领的难度，还是从地缘潜力来看，楚人都没有理由不选择向华北平原扩张。如果不是西线的庸、巴两国对楚国核心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掌握了“盐”这项重要生活物资的话，上庸、巫郡、黔中地区直到战国后期，楚人可能都不会考虑去直接控制，更何况云贵高原了。

让楚人真正觉得有必要开发云贵高原的战略事件，是秦人对于四川盆地的渗透。而直接的起因，则是楚国在秦国和韩、魏的夹攻下，丧失了对南阳盆地的完全控制权。为了重新与秦国达成地缘均势，像大多数政治家一样，楚人也曾经幻想用政治手段来与秦人达成和解。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楚人又一次被忽悠了。那位曾经带领楚军在丹阳、蓝田与秦军决战的楚怀王，在武关与秦昭襄王谈判时，被秦人扣留了。

从外交上来看，秦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将自己置于不义之地。不过秦人既然已经决定与天下为敌，并且自觉有这样的实力了，做出这样的事情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只是，暂且不论秦国的这种做法对不对，实力终究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那种在自身实力尚且处在半瓶子水阶段（甚至只有一个瓶底），就叫嚷着要打破一切国际规则，与整个世界为敌的想法，如果只是在网络之上YY一下，最多不过是博人一笑；但要是庙堂之上的人也犯了这种幼稚病，那对国家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了。最近也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试图以“人民”战争的形式（义和团），向整个西方开战的大清帝国。

不过和后来试图以行刺秦始皇，而索回燕国被占领土的燕太子“丹”一样，秦人也过于高估了政治领导人对于地缘博弈的影响力。扣押了楚怀王的秦国，并没有如愿的获得楚国所割让的土地，四年以后（公元前 296 年），这位悲剧性的楚王客死于秦国。有着深厚文人气质的史家们，相信秦人没有达到目的，是由于“楚怀王”的坚贞不屈。但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原因却是，楚怀王只是楚国的政治代表，他个人的生死并不会影响楚国的实际利益。而如果用土地来交换的话，将势必会影响到楚国的地缘结构和整体利益。

因此在楚怀王被扣期间，他的太子很快就成为新的楚王，秦楚之间的对决依然要靠实力来解决。其实纵观历史，成功以领袖人物的生死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案例是非常少的，无论你是用绑架还是刺杀的方式。如果被威胁的一方实力占优，那我们总能在历史中，马上看到一个比他更“英明”的领袖人物出现（也包括意外死亡的情况，比如那位短命的秦武王）；而如果情况恰恰相反的话，那么往往他的继任者会被怀疑个人能力不足，造成前者的生死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假象。

不管楚怀王这张牌有没有用处，秦国连横中原诸国渗透入了南阳盆地却是事实。感觉到自己核心区岌岌可危的楚人，真正需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战略对策了。并不十分清楚，到底是谁具体做出了西出云贵，侧击巴蜀的决定，但实际的执行者却还是有史可查的。这个人就是曾经导致楚国内乱，后来又被“招安”的庄旂。

华夏文明开发云贵高原一般被认定为是始自“庄旂入滇”事件，不过却少有人关注这背后的战略意义。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很可疑，在正面战场的形势如此危急之时，却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远征一块蛮夷之地，这其中必有深意。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大都是被动的。如果不是为了缓解正面的地缘压力，这个地球上最为纯粹的农耕文明，是不愿意远离自己熟悉的土地的。就像后来的汉朝之所以向西域渗透，就是为了缓解匈奴从蒙古高原所施加的压力一样。这次庄旂受命向云贵高原渗透，其战略意义也正是为了缓解秦国的正面压力。

不过有了好的想法，也要有好的时机。如果正面战场正处在胶着状态，楚国是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种战略扩张的。幸运的是，无论是秦国还是其他诸侯国，都并没有把楚国当成共同且唯一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博弈仍在进行中。对于秦国来说，在对楚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后，是时候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原了。而这个时候，被秦国夺取河西之地，并在河东也快被挤压得无立身之地的魏国，已经不是秦国的主要目标了。

现在从实力上来说，对秦国威胁最大的是山东半岛的齐国。在秦国和三晋、楚国打得不亦乐乎时，齐国这个东方大国却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除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控制的核心区域以外，齐国在对鲁、莒两个地缘天敌的博弈中，也取得了决定

性胜利。而现在，齐国在中原地区的两个传统对手魏（晋）、楚两国的地缘实力都受到了结构性的损失。如果齐国再不出来有所作为的话，就显得太没想法了。

齐国究竟是怎么做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过专门的章节描述过了。简单点说就是齐国把占据中原腹地半壁江山的“宋国”给灭了（公元前 286 年），随后便成了众矢之的，被燕国合纵其他诸侯打得半残（公元前 284 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秦国的注意力也自然的集中在中原腹地了。秦人甚至在这轮博弈中得到了以“陶邑”为中心，邳、济相交的那块飞地。而楚国也借“救”齐之名，又一次地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了沂沭河谷（莒国本来就是楚国灭的，只不过后来被更占地缘优势的齐国夺了去）。

尽管楚国在东线又一次扩张了土地，但在面对楚国最强大的对手——秦国时，楚国的地缘劣势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借着这次中原大乱，楚国开始着手在云南高原开辟第二战场。尽管从战略意图和战略时机的选择上来看，楚国的决策应该说还是正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不管贵州高原作为一个地缘板块，是否适合楚人作为进攻四川盆地的基地，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楚人如果想从两湖平原进入云南高原，还是得从贵州高原经过。而此时的贵州高原却并非是无主之地，在它之上已经有了一个蛮夷之国——夜郎国。

第三节 楚国进入贵州高原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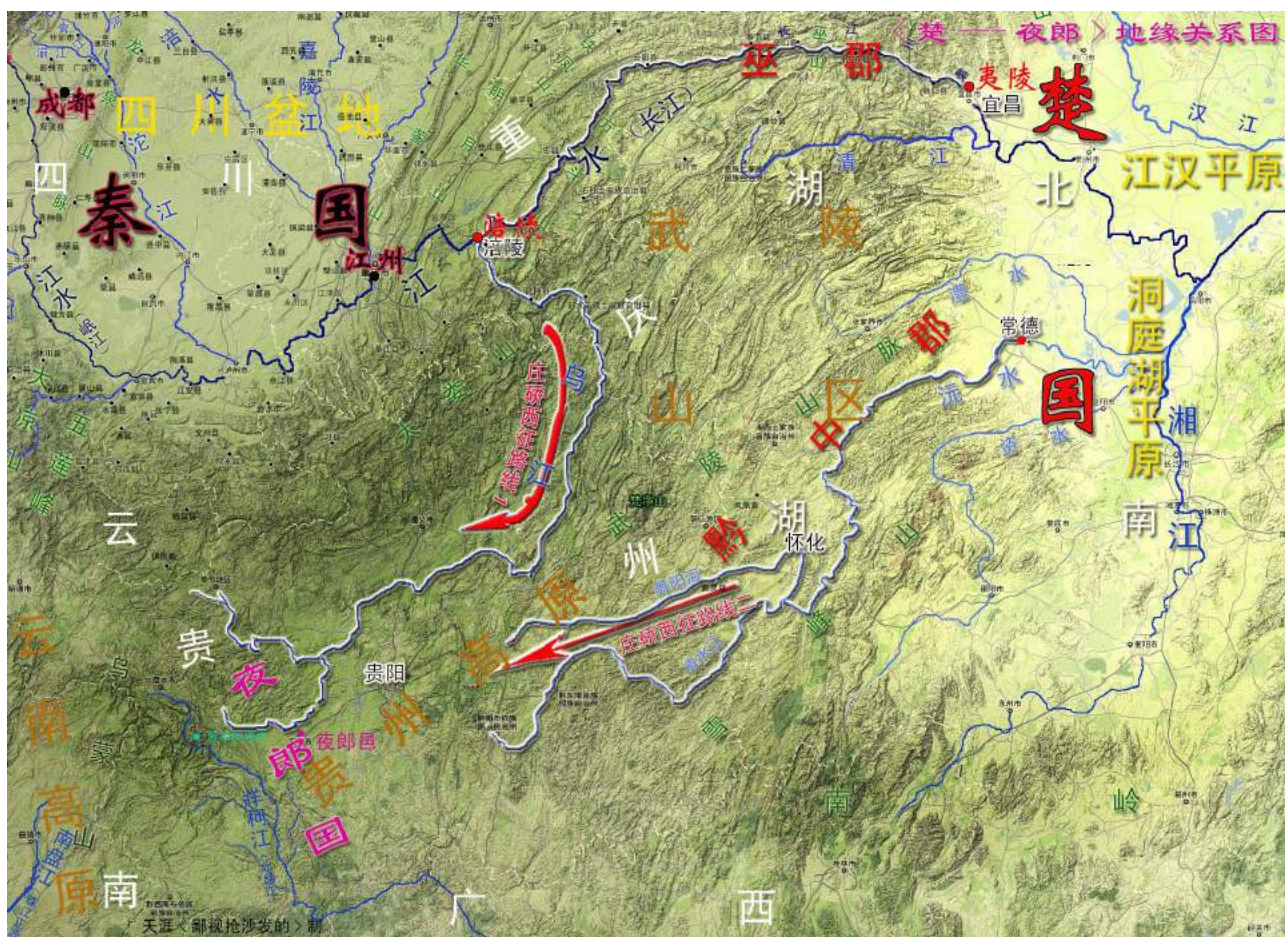
夜郎国在中国文化的知名度不可谓不高，以至于现在被一些热衷于炒作概念的地方官员和媒体，捧为中国历史上“神秘的三大古国”之一（另外两个是大理国和楼兰）。其实就影响力和文化来说，夜郎在中国古典时期并没有出众之处，知名度之所以高，都是因为“夜郎自大”这句成语的广泛运用。尽管这句成语带有明显的贬义，但在旅游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连西门庆故里都可以争得头破血流，把夜郎这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地缘概念炒红也算不上出格。

尽管夜郎国的出名是在汉朝，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地缘集团，夜郎就已经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了，其势力范围大致也就是在贵州高原。无论是世居于长江流域的楚、巴、夜郎等族，还是后来进入的秦人，要想在这些山地丘陵中展开军事行动，河流和船舶都是必须依靠的运输工具。因此在考察长江流域地区的地缘结构时，河流走向都是问题的关键。

从这点上来看，当年沿四川盆地边缘进行长征的红军，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得到这些河流的帮助（大河之侧的城市都是对手控制的重点），反而要不断地横渡这些由云贵高原北向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而在横渡这些河流之后，那些与河流走向平行的山脉也同样会成为红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由于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最终在陕北高原，因此这项切割运动也包括了四川盆地西侧的青藏高原（这

部分高原又被称作“川西高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关于长征的描述中，才会看到乌江、赤水、大渡河、金沙江、娄山关（大娄山）、乌蒙山、夹金山、岷山、松潘（草地）……这些沿四川盆地而生的地理特征。

在历史上，真正以战略转移为目的，做过类似切割运动的，就是南征大理国的蒙古人了。而蒙古人的战略目的和楚人一样，都是希望在云南高原开辟入川的第二战场。只不过与楚人不同的是，蒙古人的第一战场是在北部的大巴山一线，也就是秦人入川的方位。不管后来的蒙古人和红色政权，克服了多大的困难来达到战略目的，两千多年前的楚人倒是不用这么辛苦，因为他们最起码可以依靠水路走完进入贵州高原腹地的这段路，而所要对抗的主要是水流的反方向运动罢了（因为楚人是由低地向高地渗透）。从两湖平原绕过艰险的武陵山区进入贵州高原腹地的话，楚人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就是由江汉平原出发，经夷陵（宜昌）过三峡，溯江而上。在到达楚国的边城——涪陵之后转折向南进入乌江，然后再溯乌江而上直到乌江源头处。而另一条路线，则是由洞庭湖平原出发，溯沅水而上，向西直插贵州高原腹地。现在我们需要对乌江和沅水的情况作一个解读。



楚——夜郎国地缘关系图

首先来看看乌江。乌江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和长征联系在一起的。当

年红军长征时曾经强渡乌江，占据了乌江西岸的贵州城市——遵义。而在遵义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也被认定为是红色政权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然，很多朋友脑海中的乌江，可能还会和两千多年前的“西楚霸王”项羽联系在一起，不过我们在伍子胥入吴一节中已经解读过了，那个“乌江”其实是江东的一个渡口。从现在的行政划分上来看，乌江的下游是在现在的重庆市境内，其中有一段还是重庆与贵州的省界。这一段的走向大致是西北——东南走向，由涪陵汇入长江的；而完全在贵州境内的中上游地区，则在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东北——西南走向。而这种走向，也为楚国进入贵州腹地提供了便利。

沿乌江水道而上，应该是楚人最有可能选择的路线，因为乌江的中下游河道，横穿了整个贵州高原，直到云贵两大高原的地理分割线——乌蒙山（乌江发源于乌蒙山东麓，也因此而得名）。从地理结构上看，贵州高原的山脉的基本走向是由西向东，然后一直延伸到洞庭湖平原（延伸部分就是武陵山区），而云南高原则正好相左，自乌蒙山起，基本都是南北走向的格局。如果楚人沿乌江到达乌蒙山东麓，意味着他们已经穿越了整个贵州高原，下一步就是思考怎样翻越乌蒙山进入云南高原腹地了。

也许当年的庄筭并没有选择沅水作为行军路线，毕竟沿乌江而上，可以走得更远，直抵云南高原东侧，但沅水河谷无疑是连接湖南地区与云贵高原及四川盆地的重要战略通道。而这条战略通道在洞庭湖平原的出口——常德，也享有了“黔川咽喉，云贵门户”的名誉。这片位于武陵山区东侧，沅水之滨，半是丘陵半平原的土地，当年也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常德会战）。如果日本控制了它，不仅能够控制住洞庭湖平原，还能够对云贵高原构成压力，以支援在云南缅甸一线作战的日军。而如果重庆方面守住了它，则可保西南半壁江山无恙。从这点来看，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历史中，即使城头变幻了再多的大王旗，基本的地缘结构仍然没有太大变化。

不过楚人有可能通过沅水向贵州高原渗透，反过来，占据贵州高原的夜郎国，也可能通过沅水向东渗透。并且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如果他们东进的话，会比楚人快得多（有上水优势）。当然，以夜郎为代表的西南边缘部族（史称“西南夷”），渗透入平原地区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毕竟在这些区域，掌握更先进生产方式的楚人和后来的华夏政权，拥有绝对优势。但在这些农耕民族处于弱势时，这些山地民族还是有机会向东扩张他们的控制区的。而后来在秦国短暂的统一中国之后，中央之国又陷入了一场新的内乱之中。之前由各诸侯国，以及伟大而又强势的始皇帝所开拓的诸多边缘地区，也重新归于土著民族。

这种情况直到华夏民族的另一个伟大君主——汉武帝出现才得到改变（也可以说是“收复失地”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汉朝作为华夏政权的代表，重新出现在贵州高原时，已经重新控制了贵州高原，甚至沿沅水渗透至怀化以西的武陵山区的“夜郎国”，才会有“自大”之说。而在又一次征服云贵高原后，汉朝所设

立的夜郎县，也因此并不在贵州高原，而是在武陵山区的怀化西侧的“新晃县”。如果这个古“夜郎县”后来被划给了贵州，也许贵州就能够独享这个“神秘古国”所带来的“名人效应”了。不过很可惜，在地缘上更为强势的湖南，最终得到了这个突出部（如果把湖南地区看作一个人的侧面头像，新晃就相当于鼻尖）。于是，随着新晃开始用“夜郎文化”来打旅游牌后，贵州与湖南之间的一场文化战也展开了。

事实上，不管夜郎古国的覆盖范围是否曾经到达沅江中游地区，但它的核心区肯定是在贵州高原的西部，即乌蒙山东麓。而征服夜郎国，对于西征的楚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接下来，如果他们想再进入云贵高原的话，就需要弃舟登岸，重新选择路线了。至于说夜郎国核心区域的地结构，以及他们又如何为楚人进入云南高原提供支撑的，就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内容了。

第四节 夜郎国核心区的区位优势

贵州高原的基本地势，我们在之前已经交待过了，基本属于“地无三尺平”的山原地貌。也正是由于这些山地的切割，使得贵州地区事实上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地理单元。这种地理上的分割，也造就了贵州地区现在多民族分布的状态。

其实从源流上来看，很多民族都有共同的祖先，只不过分隔的时间一长，自然也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缘文化。在两千多年前，贵州高原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我们认定夜郎国是贵州高原上最为重要的“国家”，但实际上，在贵州高原上，这种边缘部落性质的“国家”还有很多。即使夜郎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扩展到了湘黔边界，成为“大夜郎国”，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松散的（后来中原政权来管理，也只能任命原有的部族首领为“土司”，作间接管理）。夜郎的地位，更像是武侠小说中各门各派所竞争出的武林盟主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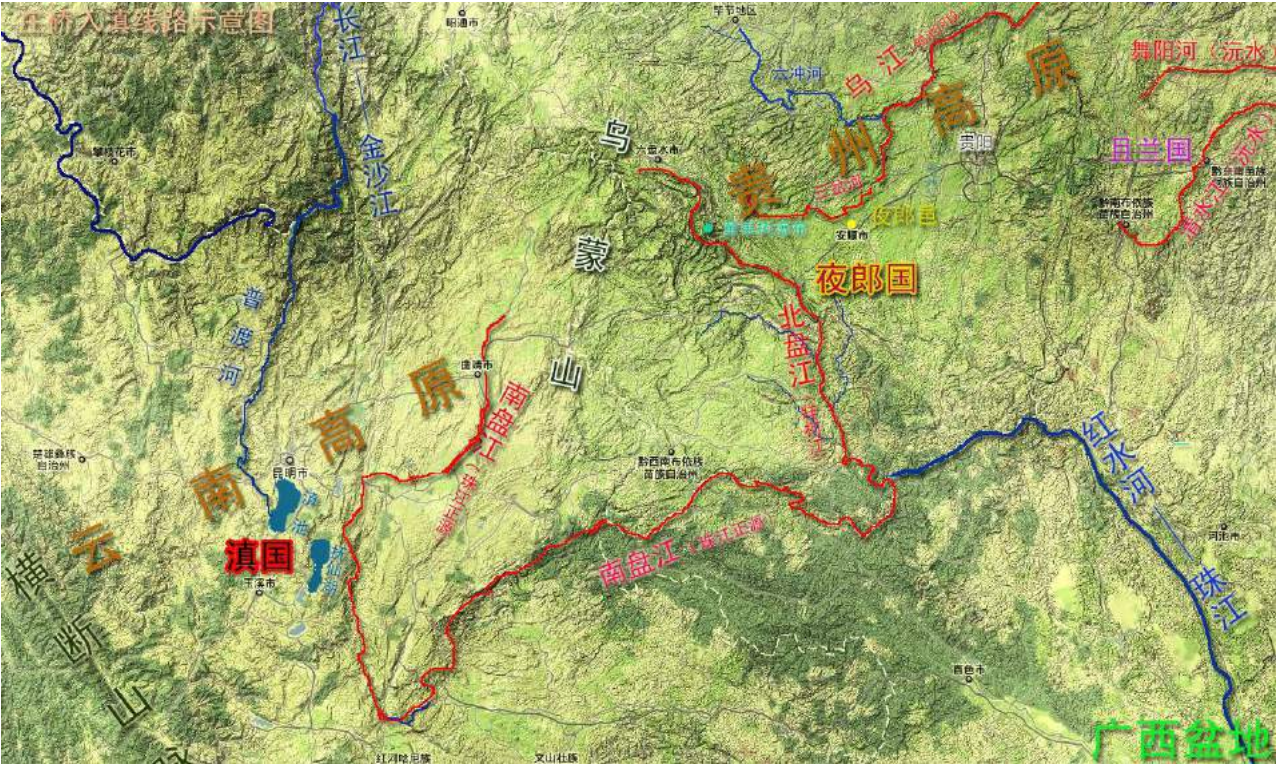
不过即使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没有可能直接控制整个贵州地区，但它所直接控制的核心区，其地缘条件却一定是贵州高原中最好的。这个地缘条件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所控制的地理单元内，适合开发的山间盆地、河谷，面积相对较大；第二，能够控制沟通其他地理单元的交通线。

如果说到贵州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那应该算是中部了。从现有的行政规划来看，也就是贵阳——安顺一带。这一区域也是贵州高原的核心区域，高原形态发育较成熟，也可以再被细划为“黔中高原”。尽管海拔要比东、南部高，但内部的相对海拔较低，低山、丘陵、坝子（盆地）密布，和整体呈现高原形态的云南高原类似。而先秦时期，夜郎国的政治中心——夜郎邑，也正是在现在的安顺一带。

其实让大家在地形图上来寻找“黔中高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整个高原山地纵横，分割严重，很难直观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不过最起码可以从现有的行政级别上看出些端倪来。处在这片核心区东北部的贵阳市，现在就是贵州的省会。

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贵州的政治中心，很大程度是因为贵阳所在的“坝子”是体量最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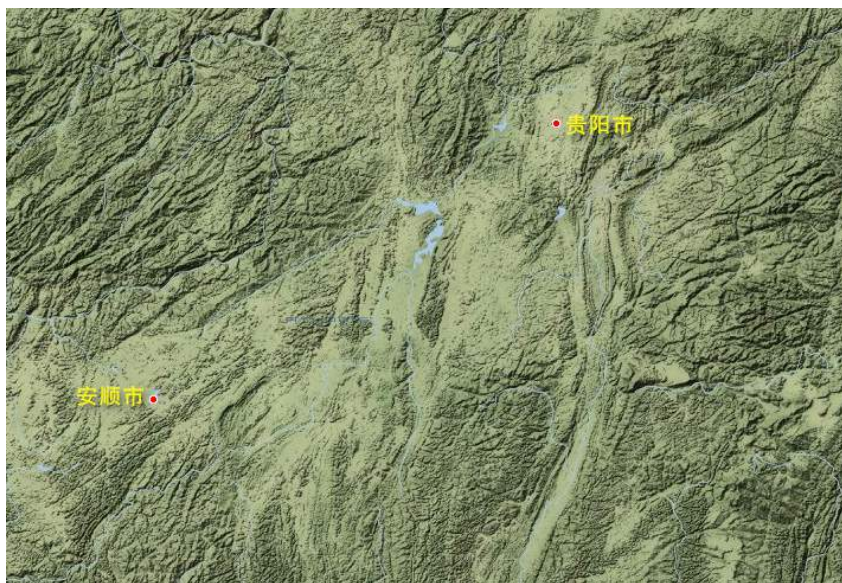
从流域覆盖的角度看，夜郎国所经营的这块高原核心区，是被乌江上游水系所覆盖。这也就意味着，夜郎人可以通过乌江水道向四川盆地乃至其他长江流域的地区相沟通。只不过，乌江在贵州境内所流经的范围很广，仅凭这点并无法确立夜郎国的交通优势。因此，在夜郎国的核心区内，出现了另一条重要的河流——北盘江。在两千多年前，这条江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牂牁江”。



庄硯入滇线路示意图

北盘江是贵州境内一条与众不同的河流，之所以说它与众不同，首先是因为它的流向。和其他河流或向东或向北的流向不同，它是由北向南，沿着乌蒙山东麓的山地向南流的；另一个不同点，则是因为北盘江的属性。因为另外几条重要河流，包括乌江、沅江，都是属于长江水系，而北盘江则是属于珠江水系。它在将云贵高原的水资源汇入珠江，穿越岭南，送入南海的同时，也为贵州高原打通了另一条战略通道。

正是由于北盘江有着沟通岭南的重要作用，后来汉武帝的使者所见到的夜郎王，也正是在北盘江一带。而“牂牁”二字，后来也成为一郡级行政区域的名称，并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代表贵州地区的地缘标签。由于贵州的地缘封闭性，相信很多人对这条江感到陌生，不过如果提到另一个名字“黄果树瀑布”，相信没听说过的就是少数了。这个被称作“贵州第一胜景”，亚洲最大的瀑布，正是在北盘江上游（不



贵阳和安顺位置图

是干流，是支流上）。

能够控制地理条件最好的“黔中高原”，又能够通过乌江、北盘江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夜郎国最终成为贵州地区的主要地缘力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对于夜郎来说，如果想真正控制整个贵州地区，他们最起码还要将势力范围向东扩展到沅水上游，以获得沟通洞庭湖平原的机会。

而在战国时期，这一区域先是被一个叫做“且兰”的部族所占据。且兰国的具体覆盖区域，就是在沅水的两大源头：舞阳河、清水河上游一带（核心区靠近清水河，现在黔东南自治州一带）。支持庄筭是沿沅水西进的史料认定，楚军是先灭了“且兰国”，占据了沅水上游地区后，再向西将北盘江——乌江上游之间的夜郎国打败。

无论庄筭是沿哪条路线前进，如果想要控制贵州高原的话，盘踞在沅水、乌江、北盘江的土著们，都会是征服的对象。至于说是先灭谁，已经不重要了。而不管是夜郎还是且兰，都不是楚国这次远征的目标，他们只有渗透到云南高原，找到梦寐以求的战略基地后，这次远征的战略目的才算达到。而现在，横亘在楚人面前的乌蒙山就是他们必须挑战的目标了。

第五节 庄筭率楚军进入云南滇池一带

我们首先来看看云南高原的地缘中心在哪里。之前我们交待过，在云南高原上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坝子”。如果进入云南高原只是小股寻找耕地的农民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让他们定居的坝子（前提是土著居民不反对，或者你能够让他们“不反对”），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移民点。问题是楚人需要的是一个有较强自给能力，并且能够帮助他们攻击四川盆地的战略基地，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耕地的问题了。

鉴于西南地区的地理特点，水路仍然是楚人所必须倚仗的交通路径。因此这个战略基地应该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能够通向金沙江。尽管云贵高原北部的金沙江直到近代才被确认为是长江干流的一段，但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来说，知道它能够与“江水”相连是没有问题的。很幸运的是，在乌蒙山的西南角，就有一块合适的

区域符合楚国的战略需求。即使是在一般比例尺的地图上，我们也很容易找到这个区域。因为在这个区域内有两个大型的淡水湖，一个叫“滇池”，另一个叫做“抚仙湖”。

有了在平原地区的农业经验，楚人知道，在这样的大湖边上，除了有肥沃的土地外，还能够从水中获得更多的食物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楚人需要由水路向四川盆地发起攻击，有这样两个天然的湖泊作为水军基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后来的中原政权要南征时，往往还要再费力挖个大池子练兵）。在云南高原上，除了相邻的滇池与抚仙湖外，还有一个体量相当的湖泊——洱海。只不过这个后来成为大理国地缘中心的湖泊，位于云南高原的西侧，横断山脉的边缘。与之相比，位于云南高原的东侧的滇池——抚仙湖一带，显然更符合楚人的需要。



庄侨入滇线路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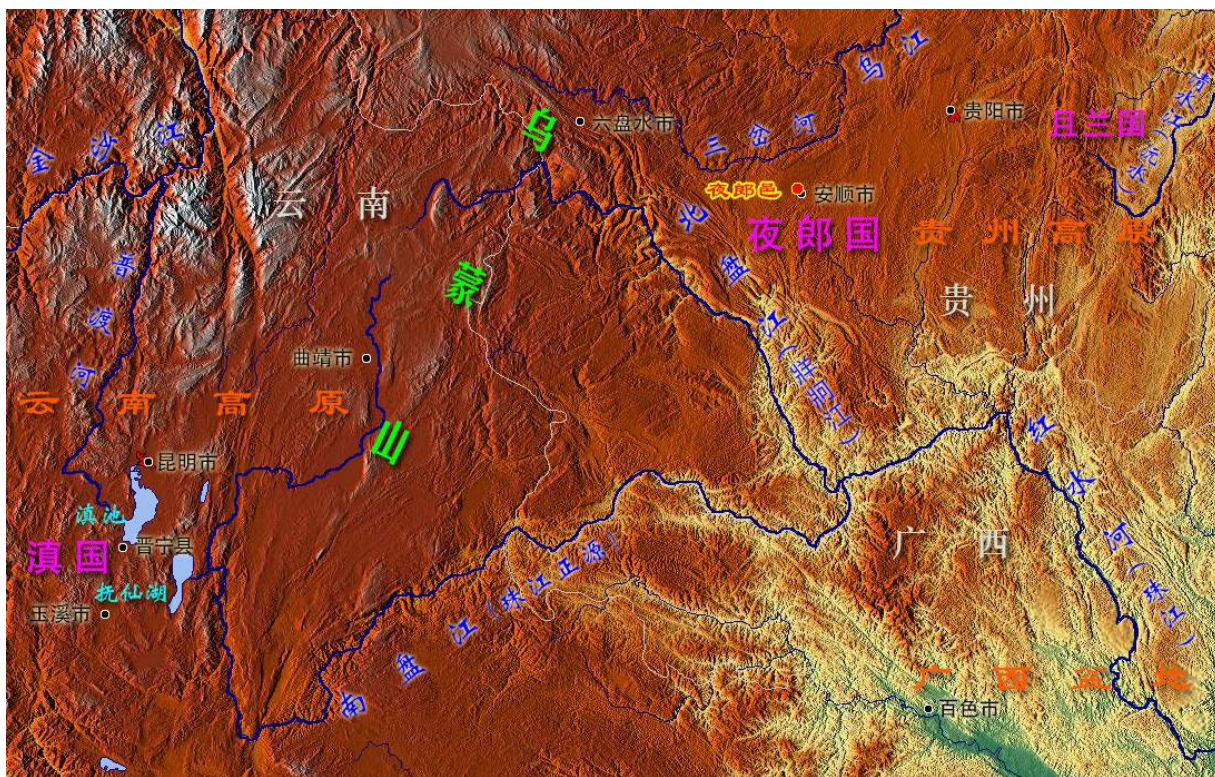
条件，当然也不会是无人区了。和贵州高原那些土地、交通条件俱好的区域一样，这里也生活着一群以“滇”为名的土著居民。如果我们认定“夜郎”的组织形式可以够得上“国”的标准的话，那么滇族所覆盖的这个地缘板块，也就可以称之为“滇国”了。

假如不考虑行军的难度，让我们为庄侨选定一条进军路线的话，那么在征服夜

楚人最终在云南高原选定的地缘中心，在滇池的南侧（现在云南晋宁）。之所以选择在滇池附近扎根，是因为滇池的西侧有一条河流——“普渡河”向北直通金沙江。楚人在滇池周边经营成熟后，就可以沿滇池——普渡河——金沙江，一路顺水而下，在现在的四川省宜宾市一带进入岷江——长江水道。然后或溯岷江而上，直取蜀地（川西平原）；或向东顺江而下，与涪陵方向的楚军一起合击“江州”（重庆），将川东的巴国故地尽收囊中。无论采用哪种方案，楚人都可以攻入四川盆地内部，彻底扭转自己在长江一线的地缘劣势。

事实上滇池一带，现在也是云南省的地缘中心。只不过后来的中心城市，移向滇池以北的昆明罢了。在两千多年前，在庄侨所带领的楚军没有到来之前，像滇池一带这么好的地理

郎国，并在“夜郎邑”一带修整完毕后的楚军，可以选择溯北盘江而上，跨越乌蒙山进入云南高原。然后他们会在乌蒙山的西麓，发现一条与北盘江位置相对应的南盘江。而沿着这条江南下，就可以到达抚仙湖的东侧，进而征服滇池地区。问题是这样走的话，需要穿越海拔两千米的乌蒙山。尽管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山地并不应该成为行军的障碍，正如两千多年后，处在“战略转移”中的红色政权就曾经在乌蒙山区穿行一样（并且还要与敌军周旋）。但与红军当时所面临的情况相比，楚人显然属于占据军事优势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更合适，更轻松的交通方式，由贵州高原西入云南高原。对于楚人和其他古典时期的人来说，这种交通方式当然指的就是水路了。



云贵高原形势图（战国）

单从乌蒙山东西两侧的“南盘江”、“北盘江”两江的名称来看，它们之间应当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否则没有理由会让两条分属不同地理单元的河流取这种关联名称。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南、北两条“盘江”都是属于珠江水系。说得再清楚点，就是南、北盘江都是属于珠江的源头。只不过长度更长的南盘江，后来被认定为是珠江的正源，而北盘江则被定位为珠江的一条支流罢了。

南盘江在由乌蒙山西麓向南流经抚仙湖（东侧）后，向东北方向作了一个转折，从南面绕过乌蒙山区，插到贵州高原的南边缘，然后与北盘江会合，继续东流一段距离后（这段河道也是贵州与广西的省界），最终转向东南方向，去滋润岭南的两广地区了。由于珠江最初只是这条南方大河下游河段（广东境内）的名称，因此南

北盘江会合之后的这段中游河段，被当地人命名为“红水河”。

其实如果楚人是为了寻找开发潜力更大的地缘板块的话，他们在征调了夜郎国在北盘江的船只后，也可以顺江直下，直接进入红水河。因为他们马上会发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地势远低于云贵高原的地理单元——广西盆地。如果楚人愿意的话，他们还可以顺江而下，直到更有开发潜力、临海的珠江三角洲。问题是



北盘江



南盘江

楚人此行并非为了土地，而是为了在战略上合围秦人所占据的四川盆地。因此这条攻击路线和那一大片有诱惑力的土地，只有留待统一后的中央之国去开拓了（汉武帝当时沟通夜郎国，就是听说可以由北盘江向南沿水路攻取岭南的南越国）。

从行军的难度来看，由北盘江南下的路程是顺流而下，而进入南盘江后，就需要溯江而上了。不过对于楚人来说，他们在进入贵州高原时，已经这样逆流而上走了数倍于此的路程。如果沿江是被秦国或者巴国这样的强劲对手所控制的话，楚人这种由下而上的行军方式，当然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不过现在的情况却是，楚国以一个超级大国的身份，活动在边缘地区，所承受的攻击压力自然要小很多。比之顺流而下的攻击行动，所损失的无非是更多的时间罢了。

无论庄旂所带领的楚军，是选择由陆路翻越乌蒙山，还是由水路经北盘江转进南盘江，然后进入滇池——抚仙湖地区。他们最终还是凭借强大的实力征服了土著“滇国”。至此楚人决心在四川盆地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半。

剩下的就应当是好好经营一下滇池这片战略基地，然后向四川盆地的秦人发起反击。不过，楚人固然有他们的战略规划，秦人却并不会坐视楚人从容的完成他

们的战略部署。

在庄硪为楚国开辟滇池这个战略基地后，中原那场以齐国吞宋，然后燕国合纵攻齐为主线的战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在这场战事中都收获颇丰的秦、楚两国，又一次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

第二十七章 秦国攻取黔中郡后交换楚国土地

第一节 秦国从三条线路攻楚的难度对比

要说秦、楚两国在诸国伐齐的这次中原大战期间，倒也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公元前 285 年，两国的君主在宛邑相会，并用和亲的方式暂时性地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矛盾。两年之后，代表秦国的秦昭襄王与代表楚国的楚顷襄王又举行过两次友好会晤，共商中原大计。看起来，似乎这段蜜月期应该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了。不过秦国之所以愿意在占据了地缘优势的情况下和楚国议和，都是因为东方的齐国刚刚把宋国给吞并了（公元前 286 年）。大家都急着去打这只出头鸟，以免齐国一家独大。

在一个多极的国际社会，情况就是这样，谁的实力一下子膨胀，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攻击。之前楚国吞并了越国之后，以齐国为主的中原诸国就曾经这样针对过楚国。现在楚国有机会巩固自己在东楚的新领土，甚至将防线继续向北推进，当然乐得对齐国落井下石了。而秦国也十分清楚，目前还不到完全能够应对两线作战的局面。当秦人想主攻一个方向时，能不能稳住另一个方向的手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秦、楚实现和解，的确也给双方带来了丰厚的利益。楚国不仅收回了之前被宋国所侵占的“淮北地”（淮河至彭城，也就是现在的徐州一线），还从齐国得到了五都之一的“莒”邑。而秦国所得到的“陶邑”一带的飞地，也让他们在中原腹地真实的拥有了一个桥头堡。从地缘实力上来看，大家都有所增强（楚国得到的实惠还更多）。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楚国重新燃起了攻秦的雄心。除了打算合纵其他诸侯两线攻击秦国以外，甚至打算入主洛阳盆地，一举灭掉周王室，以完成当年楚庄王未尽的“问鼎”事业。

不过，在权衡再三后，楚国还是放弃了这种想法。毕竟在秦国渗透入南阳盆地后，楚国对秦的优势对比，甚至还不如丹阳、蓝田之战时。就在楚国在为是否主动挑起对秦战争而思虑再三时，秦国那边也正在考虑新的战略计划了。毕竟现在的齐国在燕国的攻击下，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仅剩两城在支撑），无论能不能缓过这口气来，楚国都重新取代齐国，成为秦国的主要对手。对于秦国来说，他们需要想到新的办法，以重新削弱楚国刚刚得到补充的地缘实力。

如果按照传统的攻击路线来看，已经在南阳盆地站住脚跟的秦国，应该向南，由大洪山两侧的“汉江通道”和“随枣走廊”攻击楚国所据守的江汉平原。但问题是，这条防线并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防御面较窄，有利于楚人的防守。这一点，在之后的历史中无数次被验证了。另一个原因是，楚国并没有完全退出南阳盆地，如果秦人想沿汉水而下，直取郢都的话，并没有地缘上的优

势（秦、楚当时在南阳盆地是如何分割的，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大致可以参考现在湖北与河南在这一带的省界；后来的三国时期，刘表与曹操也大致达成过这样的均势）。

除掉楚国在南阳盆地的汉水之阳还有防线待秦人突破外，楚国在汉水中游所控制的上庸之地，也是楚国可以继续掌握汉水主动权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秦人试图南进的话，除了正面突破以外，还必须想办法应对从上庸之地沿汉水出击的楚军。因此，假如秦国想由北至南解决楚国的问题的话，那么他们首先要完全控制南阳盆地。而控制南阳盆地的关键，又在于能不能完全控制秦巴峡谷的汉水中游地区。

既然上庸之地成为关键先生，那么秦人所应该选择的方案就是由汉中盆地出兵，沿汉水而下逐次取得安康盆地，以及上庸一线的那些分布在汉水之南的楚国据点。不能说秦国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早在丹阳之战时，秦国就曾经从楚国手中夺取了“安康盆地”（蓝田之战后，又“还”给了楚国）。问题是，尽管占据了汉中盆地的秦国拥有上水优势，但他们如果想顺江而下，将整个秦巴谷地收入囊中时，却不会有想象之中那么顺利。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汉水出汉中盆地后，各河谷盆地并非沿汉水两岸分布，而是分布在支流两侧（包括安康盆地的主体也是）。

这也就意味着，楚国的那些重要据点其实都离汉水有一段距离。顺水而下的秦军，需要不断地改变航向，逐次拔除这些据点。而如果秦国想学太平洋战争后期的美国那样，来个“蛙跳战术”，选择性地攻击汉水一线的楚国城邑的话，也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与后来日军所占据的那些岛屿不同，这些小型河谷盆地都并非纯粹的军事基地，而是有自给能力的战略基地。秦军真敢这那样做的话，非但不能困死秦巴谷地的楚人，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楚军的包围之中（顺水而下固然攻得快，但想往回跑可就难了）。

正因为攻击上庸一带的秦巴谷地（可称之为“上庸谷地”），很可能会让秦国陷入一场没有胜算的拉锯战，因此秦国并没有选择在这一线发起攻击。也可以说，秦国放弃了在南阳盆地与楚国进行决战的机会。不过，自从秦国得到的巴蜀之地后，秦、楚之间地缘博弈的战场，就已经不仅仅限于南阳盆地了。

相比南阳盆地这条困难重重的战线，由四川盆地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楚国在江汉平原的都城——“郢”都的计划更为诱人。这种“中心开花”的战术如果成功的话，再辅以北线的进攻，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都会很快落入秦人的手中。而这个时候的上庸谷地，等于已经陷入了秦国的战略包围之中，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二节 秦军溯乌江而上攻取楚国黔中郡

既然从四川盆地出发，沿长江而下的攻楚方案最为现实，那么秦人就立即开始着手准备了。其实 30 多年前，秦人之所以选择南吞巴蜀，也就是为了能够在长江一

线开辟攻楚的第二战场。现在只不过开始实践当初的战略构思罢了。而这次攻楚之战的领导者，正是当年力主南进的司马错。最终，司马错由陇西高原出发，沿西汉水、嘉陵江通道进入四川盆地。然后再征招了巴、蜀本地兵员 10 万（在水战方面，秦人并不占优势；和后来曹操用荆州水军的情况相似），粮食 600 万斛，浩浩荡荡地沿长江向楚国进发。



楚·黔中郡地缘结构图

在做足了军事和物资准备后，秦国并不出人意料地攻取了楚国在川东的边邑——涪陵。在攻占了这块因巴国王陵而得名的城邑之后，秦人如果想攻入江汉平原的话，还需要逐次攻破涪陵以东直至夷陵（宜昌）的楚国江防城邑。这其中就包括那段艰险无比的“长江三峡”。也许掌握了上水优势，又拥有强大人力物资保障的秦军，能够比当年逆水攻击巴国的楚人做得更好，也更快。但攻击涪陵得手后的司马错，却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转而选择了一条看似南辕北辙的攻击路线——乌江。也就

是说秦军主力并没有再顺长江而下，而是和由此转进云贵高原的庄硤一样，先选择溯乌江而上的行军路线。

说到秦国对于蜀地的经营，司马错应该是首功。当年（公元前 316 年）在朝堂之上与张仪辩论，并率军南征巴蜀后，司马错的后半生也注定和四川盆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其实这也正是战略家和战术家之间的区别。如果说战术家的作用是在执行层面上，即按照要求“把事情做对”，那么战略家的重点则在于，一开始就“做对的事情”。如何确立正确方向，及之后的实施步骤才是这类人所关心的。

至于说是否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毕竟消化掉一个地缘板块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为了能够让蜀地彻底为秦国所用，司马错后来又曾经两次入蜀平叛。当时间指向公元前 280 年时，司马错终于有机会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实现他以巴蜀为基地，开辟攻楚第二战场的战略构思。只不过司马错所带领的秦军，在攻取楚国在长江一线的桥头堡“涪陵”后，并没有再顺江而下，而是转而溯乌江而上。

计划了 30 多年的攻楚行动之所以会做出这种调整，主要是因为秦军并没有把握一战而攻破楚军的三峡防线，也就是楚国所设置的“巫郡”。纵观历史，这段天险无论掌握在四川盆地还是江汉平原手中，都会增强一方自身的防御力。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发倾国之兵，试图夺回被吴国所袭取的江汉平原，也未能完全顺江而下攻入江汉平原，而是在三峡出口处的“夷陵”（宜昌）与吴军决战，并大败而归。而胜利之后的吴军，也没有把握突破蜀国在三峡水道西端所设立的防线，所以没有乘胜追击。

既然顺江而下的攻楚方案存在很大风险，那么转而向南溯乌江而上，拔除楚国在沿线的据点，然后在接近沅水之时弃船登岸，转而攻击楚国在沅水一线的据点，最终将楚国的黔中郡变为秦国的边郡，就成为另一种选择了。选择这个方案，肯定要比顺长江而下的方案，在行军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可能遇到的抵抗却是最低的，因为无论楚国是否决定先发制人，他们也还没有天真到会认为能够与秦国长久和平下去。所以楚国的防御重点和军队主力，都在长江、汉水一线；至于说为南楚之地提供缓冲的黔中郡，并不是重点防御的区域。因为按照正常的思维，楚人是很难想到秦国会溯乌江而上，去攻击自己的大后方。

也许楚国也应该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毕竟庄硤刚刚使用过这条路线去远征云贵高原。而现在，秦国也这样做，自然有他们的想法。从战略上来看，如果秦国夺取了黔中郡，那么就意味着长江以南的南楚地区，特别是洞庭湖平原，将很快陷于秦军之手。而楚国在江汉平原的核心区，将要面临北（汉水）、西（长江）、南（湘江）三个方向的压力。即使楚国集合全部力量保住江汉平原不失，秦国也可以断续东进，将包括赣江流域（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楚地区作为渗透方向。这样的话，楚国的地缘实力必将大受损失，陷于三面包围之中的江汉平原，失守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如果司马错愿意的话，他也可以沿乌江继续西进，去追击庄硚所率领的远征军。不过这样做的话，即使能够取胜，也无非是打消了楚国在云贵高原建立基地以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并没有实际损害到楚国的地缘实力。而现在，袭取黔中郡却可以收到一石二鸟之功。一方面割裂了庄硚远征军与楚国本部之间的联系，使其成为孤军；另一方面就是借机图谋长江以南的南楚地区了。

最终，依靠充足的战略准备和强大的军队，以及出其不意的战术，秦国攻取了乌江——沅水一线隶属楚黔中郡各个城邑。让楚人不得不想办法思考在后院灭火的方案。而在占据黔中郡之后，秦国却也并没有打算长期据有。毕竟从地缘结构上来看，秦人这种孤军深入的状态，很难长久。如果楚国决心倾力夺回涪陵的话，那么成为孤军的就不是庄硚，而是没有退路的司马错了。不过秦国既然已经在南线取得了大胜，就没有理由空着手回去了。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用所攻占的黔中郡去换取另一块与秦国地缘关系密切的地缘板块。

第三节 秦国交换楚国上庸和汉北地

在秦国袭取楚国的黔中郡之后，楚国所面临的形势就十分危险了。本身秦国就已经由北至南，在丹、汉、江三水对楚国占据了地缘优势，现在连自己大后方的沅水中游地区，也被秦人成功渗透。这对于刚刚在东线取得重大进展，正准备重振雄风的楚国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打击。现在的楚国，所考虑的重点已经不是从云贵高原北上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不拔掉秦人插入的这颗钉子，庄硚在云贵高原取得再大的成果，也不能为楚国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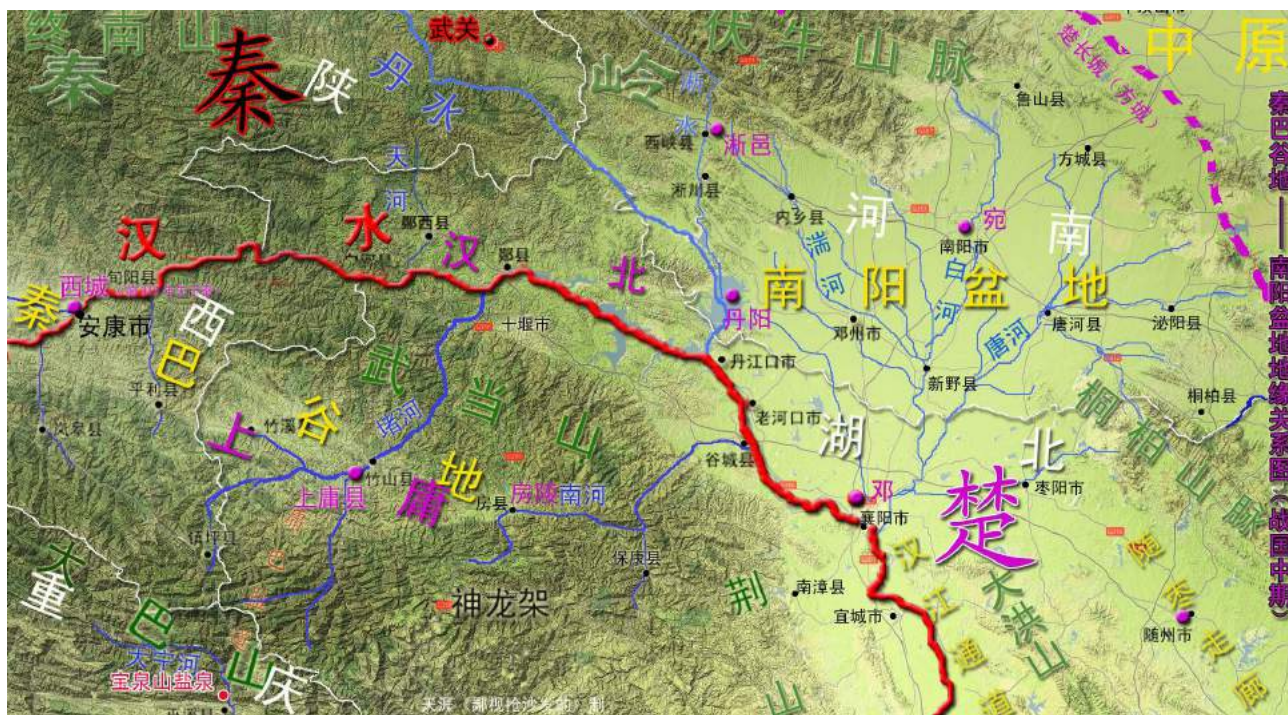
不过秦国毕竟还没有一战而解决楚国的实力。既然是局部战争，按照一般规律，打到一定阶段以后，双方还是要坐在谈判桌上交换筹码的。只不过这一次双方的筹码，原来都是楚国的控制区罢了。秦国提出的条件是用楚国北线的“上庸”、“汉北”两块土地，换回“黔中”。从秦国的角度来看，上庸之地一直是他们所渴望的。相比于黔中这个突出部而言（相对于秦国），如果秦国得到了上庸之地，就可以和汉中、商於两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楚国所控制的汉水下游地区形成绝对的优势。

而对于楚国来说，并非不知道失去了上庸之地，就意味着他们对秦国再无反击之力。但早在黔中之战之前，秦国就已经通过控制析、宛两邑，渗透入了南阳盆地北部。从战略形态上来看，楚国在秦巴谷地的控制区，事实上也成为危险的突出部。如果秦国倾全力攻取扼守汉水通道（荆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邓邑（现在的襄阳市以北，位于汉水以北）的话，那么不仅意味着楚国将彻底被挤出南阳盆地，处在三面包围的上庸之地能不能留在楚国版图内，就很成问题了（理论上还可以通过大巴山与神农架之间的庸巴盐道与巫郡相通，但道路艰险，所能够提供的支撑有限）。

在地缘博弈中，情况就是这样，当你占据优势时，你深入对方防线的突出部就

会成为你进攻的筹码；而如果情况正好相反时，这块突出部却很可能成为一块让你“食之无肉，弃之不舍”的鸡肋。要维系它的话，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甚至影响到其他地缘板块的稳定（资源是有限的，厚此就将薄彼）；要放弃的话，就代表着你将放弃地缘平衡，转而进入全面防御的状态。要是楚国还能够将秦人阻击在武关或者析邑以西时，楚国应当是不会考虑用上庸来交换的。但现在，即使秦国没有去抄楚国的后路（攻入楚国黔中郡），楚国能否重新夺回南阳盆地的控制权，也要画上一个问号。

不管怎么说，处于被动状态的楚国现在必须作一个选择，尽管无论怎么选，局势都不会对楚国有利。最终为了避免陷入秦国的三面包围之中，楚国还是决定用上庸换回了黔中。这实际上也等于放弃了收复整个南阳盆地的可能性。那个扼守汉江通道的邓邑，成为楚国对抗秦国的前沿。



秦巴谷地——南阳盆地地缘关系图（战国中期）

说到这里，还有两个地缘上的疑问需要解读一下。一个就是，除了位于秦巴谷地东部的“上庸”以外，秦国还向楚国索要了另一个地理单元——“汉北地”，这块汉北地究竟是个什么概念，秦人又为什么要把它和上庸捆绑在一起；另一个问题则是，分割南阳盆地的是大洪山，它的两侧与荆山、桐柏山形成了两条战略通道：一条是西侧由邓邑所扼守的汉江通道；另一条则是在东侧，也就是当年主要由随国所据守的随枣走廊，那么为什么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楚两国，还是后来的诸多朝代，都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汉江通道一线，以至于汉水两岸的襄、樊两城（也就是现在的襄阳市）的名气要远大于东面的枣阳、随州两城？后一个问题我们在后面

白起攻楚之战中再给出答案。现在先说下汉北地。

说到“汉北地”，我们就得再说说汉水这条河流了。从流经区域来看，汉水实际上是把秦巴谷地、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三大地缘板块串联了起来。当然，由于秦巴谷地本身并没有和汉水河谷完全贴合在一起，所以情况比较复杂，又可以划出汉中、安康、上庸三个地缘板块来。如果秦人想从已经占据的南阳盆地北部向南攻击楚国的话，他们的攻击路线是很清晰的，无非是层层推进至大洪山一线，然后占据汉江通道或随枣走廊，最后攻入江汉平原。而如果秦人想在控制了整条秦巴谷地后，顺汉水而下，由南阳盆地西侧滑过，直取汉江通道的话，却还得打通前进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那就是“汉北地”。从名字上来看，“汉北”这个地理单元的位置，肯定是位于汉水以北的。就像有些历史学家也将楚国的“江南”地，定位于三峡以南的清江流域一样。虽然这个地缘标签，更应该是泛指楚国在长江以南的控制区。但最起码在大致方位上，不会有出入。

而具体到汉北地的时候，很多人会将之与“汉阳诸姬”这个概念中的“汉阳”对等起来。认为楚国所交换出去的是汉水右岸的所有土地。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楚国这笔买卖也亏得太大了。连随枣走廊，甚至一部分江汉平原都交给了秦国了，等于是把秦人迎到了都城门口。其实楚国这次随同上庸一起交出去的“汉北地”，是一块真正的位于汉水之北的土地。由于它的特殊位置，秦国如果没有得到它的话，也就不能将自己在南阳盆地的控制区与上庸之地连成一片。而楚国在失去了上庸之地后，再留着这块土地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也正因为如此，这次交换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说了这么说，这块“汉北”之地究竟在哪呢？其实我们从现在的行政区划上，也很容易找到它的大致范围的。如果我们在地形图上划出省界来，会发现汉水向东穿过秦岭与武当山之间的缺口后，并没有马上流入南阳盆地。而是继续在武当山以北，秦岭以南的山地中穿行了一段距离，然后在现在的丹江口水库一带（丹江口市）进入平原地区。而在流出山地之后，汉水就开始转向南（偏东）经由南阳盆地、汉江通道进入江汉平原。这片位于秦岭与汉水之间的土地，目前归属于湖北省管辖。

就像湖北省的地理结构中，包含有三峡以南的清江流域的那片武陵山区，是为了保证江汉平原在依托长江构筑防御体系时有足够的地缘优势一样。控制汉水以北，秦岭以南的这片山地丘陵区，也是为了保证上庸之地、南阳盆地不被割裂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楚国还是秦国，在考虑上庸之地与南阳盆地的归属问题时，都必须把这块现在主要包含了郧西、郧县两县的“汉北地”，作捆绑处理。由于汉北地虽然体量很小，却具有一定的地缘独立性和自身的战略价值，因此虽然无法孕育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但在春秋之前方国林立的时代，却也有机会出现属于自己的“国家”。

当时这个国家叫做“麇国”，只不过由于它悲剧性的位置和有限的地缘潜力，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麇国都是位于汉水以南的“庸国”的附庸。以堵河盆地为核心（竹县）的庸人，可以很方便地顺堵河而下，在进入汉水之后直接渡江将影响力辐射至江对岸的“麇国”。而这个影响力可能是武力威胁，也可能是庸人所控制的巫盐（当时还不能称之为“巴盐”）。由于“麇国”的这种枢纽位置，当楚国决心溯汉水而上去征服汉水中游地区时，它自然也成为最早的牺牲品。只不过现在，它必须以“汉北”这个地缘标签和“上庸”一起交付给秦国了。至于说楚国这种“剜肉补疮”的做法，是否能够暂时性地为他们带来和平，就是我们后面分析的内容了。而前面我们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汉江通道一直是南入江汉平原的攻击重点，我们也会在后面会有说明。

可以说现在的楚国，无论是失去黔中，还是用上庸、汉北地将之交换回来，都不可避免的转入战略防守阶段了。有人可能会对楚国的这种交换感到不解，认为楚国应该放手一搏，在北线与秦军绝不死战，而不是轻易地将秦巴谷地的控制权交换给秦国。其实楚国这样做也实属无奈，虽然从表面上看，秦军似乎只是在黔中取得了突破，但实际上，掌握了战略优势的秦国为了配合黔中的战事，在多条战线上都对楚国展开了攻击。而上庸一线的楚国控制区，也无疑受到了来自汉中盆地的压力。

秦国如果要在短时间内攻取整个上庸，难度还是很大的。但把当年“退还”给楚国的“西城”邑（安康）夺回来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后来的交换中，这块楚国的“汉中”之地被忽视了）。你甚至搞不清秦军的主攻方向是哪里，因为从战术上来看，秦国在黔中一线投入的力量肯定是最大的。但从后来的战略结果来看，秦军此次攻楚所图的应该还是汉水中游地区。这也就是秦国的优势所在，占据了地缘优势的他们，在强大实力的支撑下，可以随时将任意一个攻击点变成主攻方向（想起李云龙攻击平安县城了，包括中印之间在陆地上也有类似情况）。而处在下风的楚国，则必须在任何一个秦国可能突破的点上保持高度警惕。

第四节 庄筭远征军无法完成入川目标

现在我们要交待一下庄筭这支被楚国寄予厚望的远征军了。在楚国志得意满甚至准备主动攻击秦国时（公元前 281 年），他们的远征显然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现在，谁还会在意这支远征军呢？也正因为如此，无法再从楚国得到支持的庄筭，一如后来的赵佗一样，选择了自立为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滇国”第一任君王（之前的土著滇国，还是带有部落性质的）。当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华夏文明的一次成功扩张。但实际上，如果不能够持续得到华夏核心区文化补给的话，数代之后，这些远涉云贵高原的楚人就会完全融入当地文化中（东南亚的类似情况就不少）。

在古典时期，庄筭的这种行为会被很多饱读诗书之人视为“背叛”，并认为如

果他们肯从侧后方包抄攻入“黔中”的秦军，可能会让形势为之一变。但这样一支刚刚征服一块蛮夷之地的军队，在没有站住脚跟的情况下，即使有着一片爱国之心，也很难对秦军构成威胁。事实上，即使秦国不进攻黔中切断庄筭远征军与楚地的联系，庄筭也不大可能有什么作为。这首先是因为要想将一块新的地理单元整合好，并为之所用，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比如秦国从入主四川盆地到以之为基地攻击楚国，就花了 36 年时间（公元前 316 年——公元前 280 年）。这还是在蜀地有着良好的农业基础，并留下相对成熟的政治组织结构的情况下（政治组织结构越成熟，征服之后的整合工作越容易进行）。而面对在华夏文明眼中近乎蛮荒的云贵高原，楚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



金沙江



金沙江老君滩

即使是从纯粹的军事地理角度看，如果楚国远征军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云南高原中转，由滇池一带向北攻入四川盆地的话，也很难马上做到（就像汉尼拔奇迹般的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攻打罗马帝国一样）。因为虽然理论上金沙江可以为楚国所用，让楚军顺水而下直取川中。但在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的金沙江中航行的难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由于峡谷中的地质情况不稳定，几千年来，金沙江中经常会形成一处处险滩，并成为航行的障碍。就像楚军在战略规划中可能用到的普渡河——金沙江口附近，就在上个世纪初，由于山体崩塌形成了有世界滩王之称的“老君滩”，直到现在还是金沙江航运开发的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在有史记载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金沙江航线都没有被官方所开发。

当然，航线没有得到开发，地质原因只是一方面，云贵高原在古典时期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与核心区缺乏大宗物资交流才是主因。同样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宜宾至宜昌之间，包含三峡在内的长江）航道，就因为

四川盆地的战略地位显赫而很早得到了开发。而金沙江下游航道真正得到重视，并得到官方开发的时间是在清初。之所以在沉寂千年之后得到开发，是因为云南的铜矿可以支撑清帝国捉襟见肘的财政（由于明朝的矿山因聚集了大批劳动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因此清帝国曾经禁止开采内地的矿山）。

基于上述原因，无论两千多年前金沙江的河道情况是否好于现在，楚国要想利用金沙江作为攻秦的路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开辟成熟的航道。而从陆地上攻击四川盆地，也是另一种选择。不过要想在云贵高原中打通一条入川的道路，其难度并不比在嘉陵江一线修筑“蜀道”要容易多少。由于四川盆地封闭的地理结构，事实上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如果楚国能够在秦人入蜀之前，就想到从云贵高原开辟攻蜀的战场，那么他们还是很有可能开发和利用当地土著用之沟通川中的小路，绕过让人头疼的巴国攻取川西的蜀地，进而将整个四川盆地变成楚国的后方。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安逸生活在成都平原的“蜀人”，一旦敌人突然出现在面前，心理防线往往会迅速崩溃（心理上太信任蜀道天险的结果）。只不过对于现在的楚国来说，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做这些事情了。并且现在就算他们能够进入四川盆地，在拥有强大腹地并在蜀地经营日久的秦国面前，有多少胜算也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想想汉尼拔的下场）。

而为了彻底断绝来自云贵高原的威胁，三十多年后，即将开创华夏帝国时代的嬴政让那位主导了都江堰工程的蜀守李冰，从岷江、金沙江交汇处的宜宾修筑了通往滇池的官路（当然，这个时候的楚国已经没有力量从任何方向威胁秦国了）。只不过这条南方“蜀道”，在宽度上只及帝国通用标准的十分之一（秦驰道的标准为50尺宽），因此也被称之为“五尺道”¹。

1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劼）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劼）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劼）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颉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僮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西南夷列传》

第二十八章 白起率秦军攻占楚国核心区

第一节 秦军从汉江通道攻入江汉平原

现在我们知道，楚国为了保证大后方的安全，放弃了整个汉水中游地区。虽然这种交换让楚国失去了反击秦国的可能性，但一般情况下，这种交换总能换得短暂和平的。如果在中央之国这片土地上博弈的只有秦、楚两国的话，那么我相信，楚国应该清楚这种交换实际上只是在“饮鸩止渴”，在战略上楚国的败局已定。与其这样坐以待毙，倒还真不如放手一搏。不过问题是，历史所指向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在这片地缘博弈的舞台上，还有另外五个处于同一级别的诸侯国。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就变得很微妙了。

从楚国的角度来看，如果与秦国死拼到底，两败俱伤的话，即使自己能够勉强将地缘平衡线拉回至武关一线，那几个坐山观虎斗的国家也会是最终的获益者。更为致命的是，在秦国的连横政策下，他们很可能还会从背后捅自己一刀，就像韩、魏两国在蓝田之战时所做的那样。与其这样，倒不如退守汉江通道和随枣走廊。一则可以收缩自己的防守面，不至于腹背受敌；二则可以让秦国感觉到楚国已不对它构成威胁，使秦国再次将入主中原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如果这种想法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就可能是楚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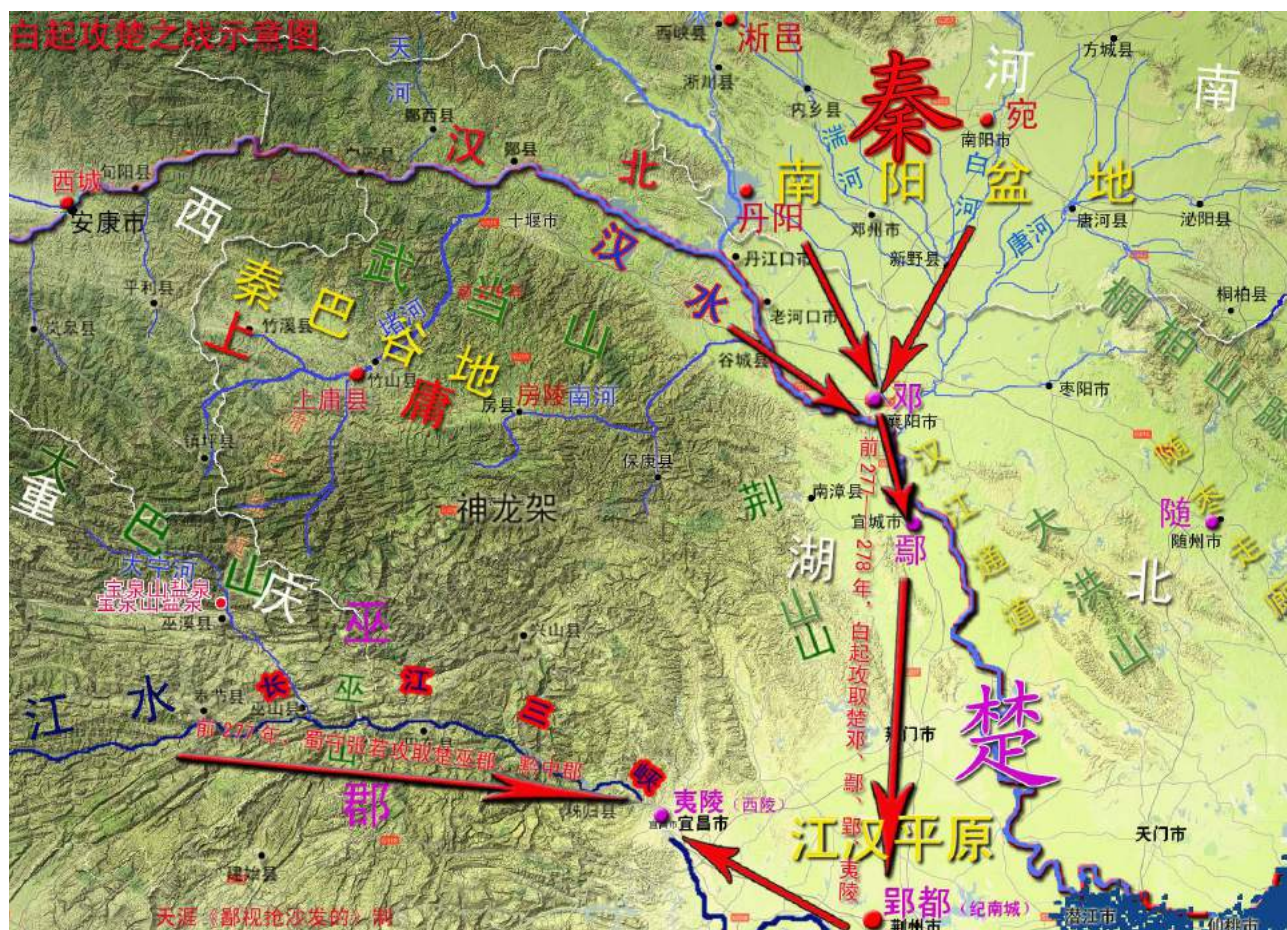
虽说楚国由此会丧失秦巴谷地和南阳盆地的控制权，但由于之前已经吞并了越国，并从齐国身上割下了不少肉，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经营的话，楚国的整体实力并不会比丹阳之战前有太大差别。等到秦国在中原卷入拉锯战之后，楚国合纵连横的空间就出来了，不排除有机会翻盘的可能性。要是一切都按照楚国所设想的发展，也许历史对于楚国的这次交换行为，就会是正面评价了。但问题是，楚国明显低估了秦国的战略眼光和决心。因为在这次交换完成之后，秦国根本没有给楚国以喘息之机，就马上发起了总攻。而这次攻楚的主力，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安君白起。而白起所开辟的攻楚战场，就是在楚国已经优势全失的汉水一线。

说起来，秦国做得也的确够狠，两边刚刚完成交换，就发动了新的攻击（公元前 279 年）。不过从秦国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倒是十分正确的。因为秦国其实也清楚楚国是怎么想的，更知道如果不顺势攻破楚国的地缘中心——江汉平原，把楚国打残，楚国仍旧会是秦国的心腹大患。而在这一年，作为另一个大国的齐国，正由田单的火牛阵为突破口，开始了复国之路。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齐国又有可能成为秦国的主要对手了。但实际上，齐国的地缘潜力已经被彻底削弱了。这次的反击，恰恰可以避免一个巨无霸型的“燕国”出现，成为秦国新的竞争对手。

既然东方暂时没有更紧迫的任务，那么“宜将剩勇追穷寇”，把楚国彻底打成

一个二流国家，对秦国来说就更有意义了。刚刚自认为获得喘息机会的楚国，应该没有想到秦国会那么快“背信弃义”地发动新一轮攻势。更为致命的是，现在的秦国，完全可以水陆并进地向由南阳盆地向南攻击楚国了。而楚国扼守汉江通道的大门——邓邑，首先被白起攻破。

说到这里，就得解读一下我们前面留下的一个疑问了，那就是为什么汉江通道一直是由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平原的主要通道。其实我们只要把南阳盆地中的河流标示出来，就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了。从水系的归属上来看，南阳盆地中的河流都是归属于汉江水系，无论它是发源于东侧的桐柏山，还是北侧的伏牛山，抑或是由秦岭主脉中下来的丹水，这些河流从整体上呈现一个“忘”字形覆盖了整个南阳盆地。而众河归一的这个交汇处，就是在如今襄阳市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攻击像楚国这样一个具有水上优势的国家，那么在你渗透入南阳盆地后，势必要以其为基地，开始建立你的水上力量，然后水陆并进，由汉水而下，直入江汉平原腹地。



白起攻楚之战示意图

而如果你想走随枣走廊这条路线的话，就不能利用你的上水优势了。虽然随枣走廊中间也有南北向直通长江的河流。但如果你以南阳盆地为基地的话，却并不能让自己的水上力量顺势攻入随枣走廊。更为重要的是，江汉平原的地缘中心是在汉

水以西（楚国的郢都，在现在的荆州市）。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很大程度是因为江汉平原的东侧，最早的时候大部分为云梦泽所覆盖，地理结构的稳定性和开拓的空间都不及西部大。直到云梦泽逐渐消失，江、汉两水相交的这个点，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市，才真正成为江汉平原的地缘中心（正在随枣走廊的南面）。

对于白起所带领的秦军来说，现在是完全占据了地理优势。无论他们是从秦国的本部由丹水而下，还是由上庸出发，沿汉水而下；又或者是由南阳盆地的北部中心——宛（南阳市）调动军队，都可以借助水势，攻击楚国的北部边邑——邓。由于邓邑的位置是在汉水之阳，因此顺汉水而下的秦军，实际上是抄了楚军的后路（这也就是上庸的重要性所在）。楚国汉江通道的入口被打开，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而攻击邓邑得手的秦军，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顺汉水而下，直取江汉平原的楚都——郢。楚军唯一可以再与秦军决战的地点，就是在汉江通道之中了。

在这里，楚国设置了另一个重要的城邑——鄢（现在的宜城一带）。当年楚国被吴军攻入郢都之后，正是退守到这一带，以抵抗吴军的进攻，并保住南阳盆地这个大后方。只不过现在的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秦国由北向南的攻击，使得汉江通道成为最先受到攻击的地理单元。而据有上水优势的秦国所发起的攻势，显然要比当年的吴国猛烈得多。因此“鄢”邑和汉江通道，也很快失守了。到了这一步，完全暴露在秦军面前的郢都，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节 秦军攻占两湖平原及巫郡和黔中郡

白起从起兵之日到攻破郢都，前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公元前 279——公元前 278 年）。郢都的失守给楚国带来的后果，不仅意味着整个江汉平原的沦陷，也意味着湘江流域的南楚地区核心区——洞庭湖平原，也很快会被秦国攻入。当你已经陈兵于长江之北时，也就意味着所谓的长江天险，为双方所共有了。即使是在江东地区，实际上也是无法单纯的据长江以自守的（所以有“守江必守淮”之说）。

郢都的陷落还对中华文化史造成了另一个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休息权。那就是在得知都城被秦军攻破后，屈原投江了。自从秦、楚两国开始正面博弈后，这位被后世定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楚国贵族，就一直郁郁不得志，多次由于与楚王的意见相左而被流放。

而他最后被流放的地方，就是在楚国的“江南地”，也就是洞庭湖流域。因此屈原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汨罗江，也是一条湘江的支流。只不过与澧、沅、资这三条主要支流有所不同的是，这条河流是在湘江的东侧，发源于湘、赣之交的山地中。屈原的死究竟与端午节的形成有没有关系，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就像有的国家一定要厘清关系，当成自己的节日去申遗一样，这些自有民俗专家们去打口水仗。我们还是来看看，白起又取得了哪些战果。

白起在攻入郢都后，除在东渡汉水，攻取汉水以东，大别山以西的江汉平原，以及南渡长江，收服洞庭湖平原外，还有一块硬骨头需要啃。那就是一直阻挡秦国以巴蜀为基地东征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不过在攻占了两湖平原后，这片主要由巫山、武陵山构成的土地，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价值。尽管有一些楚国的残余势力退入了清江流域，试图做最后的抵抗。

现在的秦国，已经可以从东西两面合围楚国这两个西部边郡了。为了将问题彻底地解决，白起在破郢之后，顺势西进，攻破了楚国扼守三峡东大门的“夷陵”。由于夷陵还是历代楚王的归葬之处，因此也被楚人称之为“西陵”。不过“杀人放火”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白起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杀人王，并没有放过楚国的这些先王，而是一把火烧掉了这些陵墓。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年楚国也夺取了巴人王陵所在地“涪陵”，并由此将巴国变成了一个三流国家。

如果仅仅是攻取了夷陵，白起要想在短时间内清除掉巫山和武陵山区的楚国抵抗力量，显然还是很困难的。不过这个时候的秦国，可以从四川盆地出发，与占据两湖地区的白起遥相呼应，合力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三年前司马错这样做时，相当于做了个战术动作，让楚国的后院着了把火，然后全身而退。而现在秦国再这样做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为了彻底解除楚国的威胁，秦军这次不仅沿乌江而上，转进沅水流域攻击楚国的黔中郡，还分兵顺江而下，直取巫郡。

只不过这次领军出川的，已经不是司马错了，而是蜀郡的太守张若（公元前277年）。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司马错的结局，但考虑到他的年龄，相信在上次南征黔中之后，即使还留有一口气在，也无力再领军出征了。最终，在东、西两线的夹击之下，巫郡和黔中郡都成为秦军的战利品。而获胜之后的秦国也开始了整合工作。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被合二为一成为秦国的“黔中郡”。而南阳盆地，则以宛邑为中心，划为了“南阳郡”。

第三节 楚国迁都寿春后进行战略调整

在秦、楚之间的这轮博弈中，楚国的损失是巨大的，西楚和南楚的核心区都归属了秦国。如果从地理形态上来看，相当于北起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南至大别山脉、罗霄山脉的这条分水岭，成为秦、楚之间新的地缘分割线。也就是说，楚国领土中最为精华的板块都被秦国占据了。现在的楚国只能把目光投向东方了。

由于郢都已失，楚国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地缘中心，以重整旗鼓。最初，位于中原腹地的陈国故都（河南省淮阳县）成为楚国的新都。问题是，对于现在的楚国来说，“陈”这个地方，太靠近中原这块是非之地了。即使是秦国已经觉得楚国没有威胁，从而转进中原的话，把都城设在这里，也很容易让楚国又陷入一场危机。将都城迁入江东平原，以吴越故都——吴都（苏州）为新的政治中心，也不失为一个稳妥的

方案。但如果这样做的话，也就意味着楚国将彻底偏安于东南，沦落为一个三流国家了。在这样的调整之后，楚国在江淮所保有的土地，以及刚刚从齐国夺取来的沂沐河谷，能不能保得住就很成问题了。

因此后来楚国将东迁之后的新都，定在了寿春（安徽淮南市西南）。定在这个点上，一是因为寿春之侧的淮河是楚国国土的南北轴。而寿春这个点，与东西两端的楚国边境（桐柏山、东海）也都距离相当，符合地理中心的要求。虽然说国都的选择并不一定要是地理中心。但对于大半国土无险可依，而国土面积仍然够大的楚国来说，一定要让自己的地缘中心在各个方向都有足够的缓冲之地。

现在的楚国，从地缘结构上看，已经和强盛时期的吴国很类似了。基于这样的地缘格局，如果再强行去蹚中原这池浑水，显然是不理智的。因此在后来的历史当中，楚国基本上退居二线，以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将楚国彻底变成二流国家的秦国，也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三晋身上了。只不过最初与秦国 PK 的，是以魏、韩两国为主，而现在，赵国成为三晋的主力 and 秦国的最大障碍。

当然，楚国也并非没有一点作为，虽然不能再去中原做出头鸟了，但溜边沉底的功夫还是要下的。在江、汉、湘、沅之地尽收秦国之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 276 年），楚国集合了他们在东楚地区的军事力量（国家大的好处），溯江而上对秦国发起了反攻。在洞庭湖平原夺回了 15 座城邑（湘江以东），并以之为边郡。只不过这个突出部，主要作用是作为防止秦国迅速顺江而下重新切割楚国的缓冲地。要想重新恢复秦、楚两国的地缘平衡，已经不可能了。

楚国在后来的历史中，所做的另一个反弹之举，就是把鲁国给灭了（公元前 256 年）。作为一个加强版的“吴国”，沿泗水而上，向泰沂山脉渗透，成为楚国新的战略重点。只是灭掉这个只剩一口气的国家，并不会给楚国打上一针强心剂，等待他们的是同样的命运。

第二十九章 秦国在中原进行越地进攻

第一节 秦国以中心开花战术在中原扩张

从秦国的角度看，楚国无疑已经不会被视作同一级别的竞争对手了。按照秦国两线作战的原则，在东南战线趋于稳定后，应该到再沿黄河一线向中原渗透了。当然，如果秦国非要一鼓作气把楚国给吞并了，也可以来个“宜将剩勇追穷寇”。只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疆土面积来看，楚国仍然是数一数二的国家。并且从文化属性来看，即使秦国有能力一口气将这些与黄河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吃下去，能不能消化掉还是一个大问题。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那位吞并六国的始皇帝死后，楚地的那些遗民们最终成为帝国终结者（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是楚人）。而从地缘战略上看，如果秦国一定要和这个巨无霸死磕到底的话，那么它东线战场的对手就有机可乘了。在这个问题上，二战时期的德国应该是最有同感的。

其实在攻击楚国时，秦国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在中原布局了。除了继续向东挤压韩、魏两国的空间以外，秦国甚至在荷、济之交处获得了一块以陶邑为中心的飞地。能够取得这种突破性进展，无疑要感谢齐国。要不是这个东方大国一心想坐大而吞并了宋国，做了出头鸟，秦国也没有机会大跃进似地插入中原核心区。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这次合纵攻齐的行动中，除了韩国以外，各大国都有不少收获。齐国还没来得及焐热的宋国国土自不必说，成为众国瓜分的对象，就连齐国原有的控制区也损失了不少。因此秦国如果想在中原有所作为的话，所面临的形势并不见得比齐国当出头鸟之前要好。

不过现在的秦国，势头实在是太盛了。可以说，自从收复河西之地以来就没有吃过大败仗，现在又在中原得到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作前进基地，还解决了楚国在东南方面的威胁，在战略上就难免会有轻敌冒进之举了。如果要用四个字来概括秦国此时的战术，那就是“中心开花”，即希望以陶邑为核心向四周强力扩张，通过蚕食魏、齐等国在中原、河济平原的土地，让秦国成为中原霸主。另一方面则从秦国核心区，以及南阳盆地向东渗透，最终与秦国在陶邑的飞地连成一片，成为新的天下共主。

要说秦国这样想，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就像现在很多急于扩张的大城市一样，或新设或兼并周边小城镇，设立卫星城，然后多点同时扩张，最后连成一片，以实现成为超大型“国际都市”的梦想。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这种战略也还是能够找到成功案例的。不过在大多数时候，这种战略都有操之过急之嫌，尤其是在你的扩张需要面对整体实力不低于你的对手时。所谓“酒要一口一口地喝，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后来秦国也就是在这种大跃进的战

略下，把陶邑这个“蛋”给扯掉了。

秦国“中心开花”的战术究竟有没有成效，我们暂且不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秦国从核心区向东渗透的步伐不能停止，否则那块“飞地”也难有作为。而无论秦国想按照传统路线由崤函通道，经洛阳盆地东入中原；还是先将魏、韩两国在河东之地的残余力量肃清，然后再经由太行、王屋两山之间的“轵道”，经韩国的“南阳”之地入主中原，然后与陶邑这块飞地会师，此时韩、魏两国都是秦国的主要对手。

如果单独面对两国中的一国，甚至是两国联手，秦国都能够占据上风。但问题是，占据了上风并不代表你就有绝对的实力将他们吞并。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东进意图明显而又实力超群的秦国，山东诸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尽力阻止秦国向东渗透。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在第一线抗秦时，往往能够得到其他诸侯的支援（最起码后顾之忧较之前要少了）。而在这些潜在的战略盟友中，赵国是韩、魏两国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秦国在战国第三阶段最大的对手。

第二节 赵国成为秦国主要对手的原因

赵国成为秦国的主要对手，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从地缘关系上来看，同属三晋的魏、韩、赵三国本来就存在着紧密的地缘关系，并且国土都与秦国相接（只不过处在边缘的赵国，暂时没有成为博弈焦点）。虽然三国之间由于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也经常发生摩擦，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秦国时，往往能够互相协助；二是从实力上来看，我们之前说了，在枪打齐国这只出头鸟时，各大国基本都有所收获。但与战国中前期的地缘实力相对比，地缘实力有了质的飞跃的，只有赵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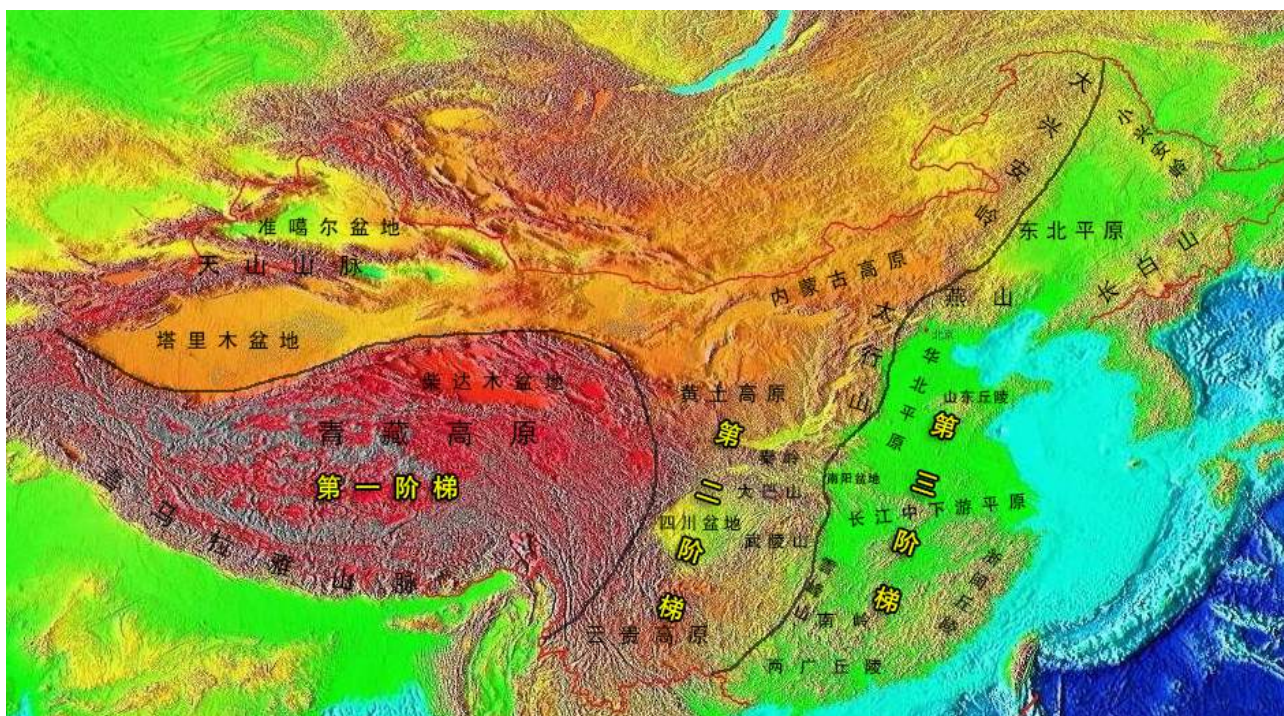
齐国自不必说了，虽然用了几头牛把燕人给赶了出去，但已经元气大伤，实际控制区已经较鼎盛时期大为收缩了；而楚国虽然从齐、宋两国身上得到了莒地、彭城，甚至在之前还吞并了越国，但这些土地从质量上来看，根本无法弥补西部核心区尽失于秦的损失。而战国初期最强者的魏国，所面临的情况其实和楚国一样。虽然在中原腹地的东侧站稳了脚跟，甚至得到了宋国故土的大多数。但河东、河西之地尽失，使得魏国由一个超级大国变身成为二流国家。至于说韩国，他们在战国时期的最大收获，就是吞并了郑国，在中原腹地的西侧站稳了脚跟。不过即使他们还能够保住在洛阳盆地、上党高地，以及“南阳”之地的控制区，韩国的体量和质量也是七国中最差的一等。更何况在秦国的强力打压下，韩国在洛阳盆地已经没有控制权了。

除了上述四国，能够比战国中前期日子好过的，就是远离中原战场，在北方拓荒的燕、赵两国了。燕国的成就，主要是穿越燕山山脉，向西、北方向拓地千里，得到了五个边郡。而在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内，燕国更多的是坐了一次过山车，从差一点吞并山东半岛，到基本再退回到燕南长城一线，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与燕国相比，赵国所增长的地缘实力就要大上许多了。首先由于在分家之时，

赵国将太原盆地以北的山西高原作为主要拓展方向，并且在河北平原扩张时所选择的位置，也在韩、魏之北，因此在秦国强大的攻势之下，有韩、魏两国以为缓冲的赵国，主要控制区并没有遭受多少损失。而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国不但在大同盆地以北拓展了代、雁门、云中三个边郡（足以与燕国的“塞上五郡”相比），还吞并了中山国这个二流强国。这些成就，都使得赵国的地缘实力获得了质的飞跃。而在这次合纵攻齐的行动中，赵国除了将齐国从河北平原挤压出去外，还渗透进了河济平原，将自己的控制区向东南方向扩张了不少。

按说赵国扩张了这么多土地，尤其是还灭掉了中山国这个二流强国，应该也会成为出头鸟，被大家群殴的。但由于赵国的扩张方向远离了中原这个地缘漩涡，所以诸国合力攻赵的动力不足，赵国也因此没有受到太大干扰。一直将三晋视为主要敌人的秦国，在赵国吞并中山国之后，倒是很想联合齐国等国去剪赵国的羊毛，但后来齐国根据自己的地缘位置，还是把主要的攻击目标放在了燕国和宋国身上，后面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所以赵国得以从容的消化那些新吞并的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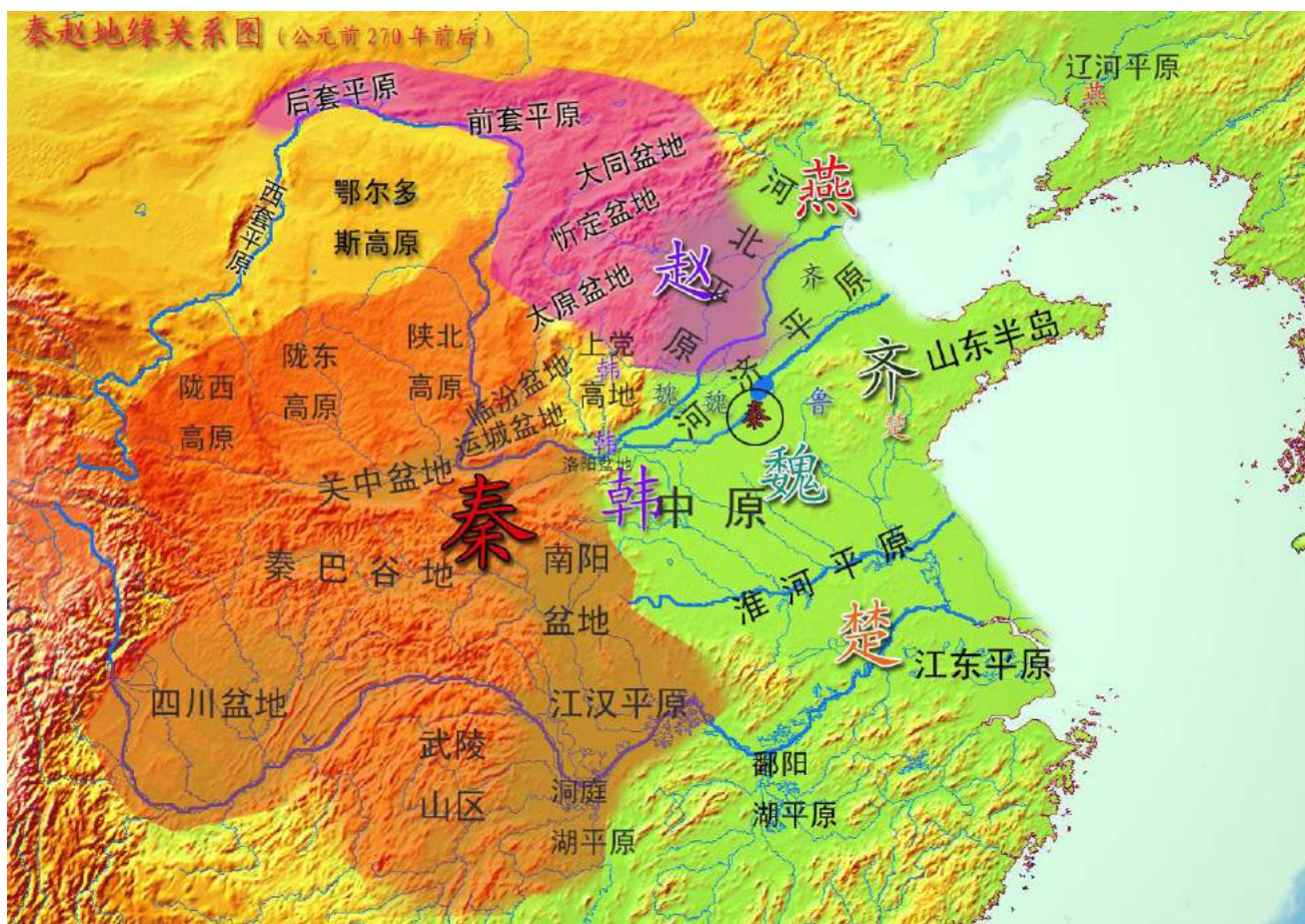


中国三阶梯地形图

赵国隶属三晋集团，并与秦国在疆土上有直接的接触，以及它的整体实力发生了质变，都是影响秦国对赵政策的重要因素。但如果从扩张的角度来看，秦国对于中原腹地的兴趣，要远大于赵国所占据的那些边缘地区。问题是秦国即使能够在黄河下游地区撕开一条战略通道，也将面临赵、魏、韩三国从南北两侧所同时施加的压力，就算是取得了战术胜利，也无法占据一条稳定的战略通道，将济、荷之交的那块飞地和秦国的核心区连接起来。

而在这当中，地跨太行山两侧，控制了河北平原中部大片土地的赵国，所起的战略作用就尤为重要了。这样的话，秦国要是想先解决掉韩、魏两国，就不得不考虑暂时将赵国归为自己的同盟。不过在先秦无数次上演的“唇亡齿寒”故事，让心存顾忌的赵国很难成为秦国的同盟。在这种情况下，秦国需要在东北方向开辟一个对赵国的“第三战场”，以期像对待东南方向的楚国那样，彻底让赵国失去威胁秦国的能力。

如果从地缘结构来看，秦国也很有必要对赵国动手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地形可以分为三个阶梯，而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是覆盖于第二、三阶梯之上的。这第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就是太行山、秦巴山脉东端、武陵山区。要是秦国能够彻底控制第二阶梯上的诸地理单元，它将对其他六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成为新的天下共主也就没什么疑问了。



秦赵地缘关系图（公元前 270 年左右）

从南线来看，秦国不仅已经吞并了位列第二阶梯的四川盆地、秦巴谷地、武陵山区，还成功地控制了第三阶梯中的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如果秦国面对的对手仅仅是楚国的话，那么他们已经可以思考统一之后的诸多问题了。在中线，陇西高原——关中盆地——崤函通道——洛阳盆地，相当于是中国第二阶梯地形的

南北轴线。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秦国已经可以控制这条中轴线了。即使是洛阳盆地中还存在着东、西两周两个名存实亡的王室代表，但已经不影响秦国由这个方向自由地进出中原了。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秦国通过对魏国的战争，已经渗透进了山西高原，并取得了临汾、运城盆地的主控权。但在这条北线上面，秦人还有两块硬骨头需要啃掉，才能够完全拥有整个中央之国的高地优势。而这些剩下的部分，一部分就是被赵国控制的太原、忻定、大同三盆地，以及北部的河套平原；而另一部分，则是韩国重点经营的上党高地。如果按照步步为营的战略，秦国应当或北或东的以河东的临汾、运城盆地为基地，将主要的力量放在解决上党高地或太原以北诸地理单元的问题上。

至于说到底是先把兵锋指向山西高原北部的赵国，还是东部的韩国，倒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两块硬骨头都要啃掉。啃掉了他们，赵国在河北平原的东部领土，甚至整个三晋，都将完全暴露在秦国面前。秦国完全可以同时对中原腹地和河北平原发起攻击，让三晋和其他诸侯再也没有机会合纵抗秦了。

依照刚才的设想，秦国无疑还要花费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够将赵、韩两国挤出山西高原。毕竟赵、韩两国所占据的，都是封闭性很不错的地理单元。不过现在的秦国，已经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并没有采取这种保守的，步步为营的战略，而是希望在运用“斩首”的战术，一战而解决赵国的问题。至于说秦国有没有成功，则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方向了。

第三节 秦国进攻太原盆地和中原

有人希望我画出一张这一时期的战国地图。其实如果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这种图是无法画出来的。毕竟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已经很少了。即使是现存资料，也是矛盾重重。不过如果从大的地缘格局上来看，我们还是能够清晰描绘出当时的地缘形势的。这就需要在地图上先标示出各主要地理单元的名称，然后再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出各个国家都分别控制了哪些地理单元。依照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观察出各国的地缘位置，以及在中央之国接下来的地缘博弈中，将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从秦国的战略来看，其数百年来关注重点一直是山西高原。对于挡在秦人东进路线之上的“晋”人，秦国也是一直耿耿于怀，无论他们是一个还是三个。如果不是因为东南方的楚国实在是过于强大，已经直接威胁到秦国核心区安全的话，秦人倒是很乐意最后再和这些“蛮夷”决战的。事实上直到大家都从齐国身上得到好处后，秦人的本意也还是先对付三晋的。当时的秦国，已经在包括临汾、运城两盆地的河东之地取得了绝对优势（魏、韩两国仅在东侧还有些许据点）。而在太原盆地以北盘踞的赵国，就成为秦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了。

正因为如此，乘着赵国还在谋划如何从齐国身上割更多肉时，那位赵国的天敌——白起，就连续对赵国发动了三次攻击（公元前 282——公元前 280 年）。在这几次攻击中，赵国在吕梁山区和太原盆地南部的“蔺”（柳林孟门镇）、“离石”（吕梁市）、“兹氏”（汾阳县）、“祁”（祁县）等城邑相继陷落。这些古地名可能会让你感到陌生，但如果我们在地形图上去观察它们，就会发现这些城邑的丧失，意味在秦国不仅由西至东打通了由陕北高原进入吕梁山区，进而渗透入太原盆地的通道；也意味着秦国已经实际渗透入了赵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太原盆地。

尽管赵国的旧都“晋阳”，因为在太原盆地的北部，暂时还没有直接受到秦军的侵扰；但最起码在太原盆地能够两线出击的秦人，已经和赵国形成了地缘平衡，而这就足以让身在邯郸城的赵国王室感到寝食难安了。之所以说秦国在太原盆地与赵国所达成的是一种平衡状态，而不是优势状态，是因为秦人如果想全面控制太原盆地的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赵国在太原盆地北部的控制区可以从北、东两个方向，得到忻定盆地，以及河北平原的支撑（前提是在上党高地的交通线要通畅）外，魏国在河东之地残存的据点，以及韩国在上党高地的优势地位，都掣肘着秦国的北伐工作。如果秦人倾力攻击赵国晋阳城的话，那么在这场可以预见的持久战中（晋阳的坚固已经有过诸多战例了），魏、韩两国随时可能对秦人的侧后方展开攻击。

当然，如果秦人想先把重点放在东线，即解决掉以上党高地为核心的魏、韩控制区（山西高原上）时，赵国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秦人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不然统一天下的也不会是秦国了。但在当时，秦人暂时还来不及有进一步的想。因为在齐、越两国身上收获颇丰的楚国，又开始重新威胁秦国的东南防线了。于是伴随着庄 入滇、司马错攻黔中、白起入郢等一系列的秦楚军事博弈，秦人战略重心暂时向东南方向转移了。只不过在把楚国打残之后，秦人又开始思考解决三晋的问题了。

如果按照正常的顺序，秦国肯定应该先把山西高原解决掉，然后再想入主中原的事。但问题是，陶邑这块飞地的取得，让秦人迷上了越地而攻的扩张方式。这不仅体现在秦国总想着能够假道韩、魏，从齐国身上得到更多的土地；也意味着相比韩、魏两国在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油水不多的土地，秦国对这两国在华北平原上的土地，显然兴趣要浓厚得多。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秦国对于横亘在东进道路上的韩国，反而没有再施加更大的压力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韩国这个国家能够位列战国七雄实在有些勉强。无论从战略纵深，还是地理位置来看，怎么看都不像有长命相。但就是这样一个处在夹缝中的国家，却坚持到了最后。

能够做到这点，很大程度要感谢韩国人的头脑灵活。当初在“分家”时，韩国的重点就在于掌握东、西战略通道。无论是当初在黄土高原上占尽优势的魏国，还是现在如日中天的秦国，如果想顺畅的进出华北平原，都必须从韩国所控制的上党高地、轵关陁（王屋山与中条山之间的缺口），以及洛阳盆地经过。如果你只是想

有通过权的话，韩国人是很愿意提供帮助，甚至成为战时同盟，去狐假虎威一回；而如果你想干脆把韩国灭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韩国的说客们又会让他们的诸侯们知道，如果作为第一道防线的韩国撑不住的话，那么无论是处在强盛期的魏国，还是现在如狼似虎的秦国，都会让他们马上尝到“唇亡齿寒”的味道。

正是凭借这种左右逢源的技巧，韩国才能够坚持到了最后。韩国这种圆滑的处世态度，倒也很符合秦国现在的战略需要。最起码他们可以很顺畅地通过韩国控制的轹关或者虎牢关，进行他们的越地进攻战略。当然，韩国对于秦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他们所做的只是事大而已，就像当年他们紧跟魏国一样。而作出这种调整，也是在几次合纵攻秦后，所收获的血的教训（最多一次，韩国被秦军斩首 24 万。尽管数字未必可信，但韩国对秦国的心理阴影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以陶邑为支撑点，加上韩国的配合，秦国的军事优势得以在中原地区充分发挥，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其中就包括公元前 273 年，对赵、魏联军所进行的“华阳之战”（在韩都“新郑”北）。但现在的问题是，尽管秦国在东方的军事行动似乎战无不胜，但缺乏足够的地缘支撑（韩国可以借道，但不可能全力为秦国提供后勤保障），使得他们后劲不足，经常在胜利后，还是必须退出被攻占的城邑。也就是说，秦国很难将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成果。

如果没有陶邑这块飞地，也许秦人会考虑改变他们的战术了。但现在有了这块“鸡肋”，让秦人就此退出中原争霸的行列，去搞步步为营的推进战略，确实让人心有不甘。也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左右下，秦人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即放弃白起在吕梁山区和太原盆地所扩张的赵国城邑，去交换赵、魏联盟在河北平原同等数量的土地。

第四节 秦国与赵国交换土地出现意外

其实就春秋、战国时代而言，两国易地是常有的事，包括先用军力偷袭到对方腹地，占领对方重要城邑甚至都城，然后再让对方拿地来换的情况也很多。只不过这些易地方案，基本都是为了能够获得与自己本土相连、易于控制的，或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土地。像秦国这种放弃能够与自己本土相连的土地，而去交换隔了其他国家（韩国）的土地（飞地），的确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味道。不过看看秦国在中原东部所苦心经营的那块飞地（陶邑），我们就能清楚秦国的用意了。

对于强大的对手纷纷衰弱（魏、齐、楚），而自己的地缘实力却与日俱增的秦人来说，他们太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两线作战的能力了。被晋人隔绝在关中盆地长达数百年的经历，也让秦人对华北平原的渴望，要比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都要强烈。也正因为这样，秦人决心继续执行他们“越地而攻”的中心开花战术。后来的事实证明，秦国这种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战略是错误的。而书写史书的人，往往将之归结于陶邑领主，即那位在秦国权倾一时的“魏冉”。认为他当初带领秦军参与合纵

攻齐，甚至后来为了扩张陶邑的控制区，不断地在东方征战（特别针对齐国），是出于私心，为的是陶邑的财富。

关于这点，我只能说是角度问题。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史观，任何一件成功或者失败的事件，都应该由某个具体参与者接受掌声或者承担责任。魏冉并不是第一个这样被定性的人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依然可以继续让杨家兄妹来承担引发“安史之乱”的罪责；或者继续感叹，要是秦桧的母亲当年的人生出现一点误差的话，那么南宋就可以直捣黄龙了。鉴于类似的从某个人物人性角度分析历史进程的事情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因此我们还是从国家战略和地缘博弈的角度，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解读。

实际上秦国这次希望得到的土地，并不在陶邑一带，而是在中原的西部，河北平原的南部，也就是魏国的河间之地一带。而且这次交易，更应该是一次连环交易，即赵国会和其他区域补偿魏国（赵国虽然和魏国已经结成了紧密联盟，魏国却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土地去帮赵国换地）。至于赵国与魏国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并不是问题的重点。关键在于通过这次交换方案，我们可以看出秦国很希望在河北平原的南部，获得一块新的飞地。

在此之前，秦人已经通过战争逼迫魏国交出了他们所控制的部分“南阳”之地。如果能够交易成功的话，那么秦国将在河北平原南部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地缘板块。这块新的飞地，对于陶邑与秦国本土（包括河东之地了）之间的关系，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之前，鉴于陶邑的位置过于偏东，驻守该地的秦军与从河东之地东征的秦军，往往各自为战，难以形成互动的局面。假如交易成功的话，秦人下一步要做的就会是把魏国完全挤出河北平原，将当年卫国所控制的商王国的王畿之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当然，设置这样一个突入对手腹地的飞地，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接应秦国的全面东进。

而如果想要让河北平原的这块飞地与秦国所控制的河东之地相接，秦国所需要面对的主要对手，就剩下那个已经被自己打服的韩国了。秦国甚至可能在把魏国彻底赶到黄河以南之前，就先攻取韩国在轹关陁（比如武遂）和南阳之地（如“野王”）的城邑，以重复当年晋文公东进的战略。让秦国在河东之地的控制区与河北平原南部的飞地合为一体。其实在此之前，秦国就曾经攻取过这些战略通道上的韩国城邑。只不过秦人不想在韩国身上花费太多的功夫，在韩人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后，又把它们退还给韩国了。如果秦国在河北平原获得了支撑点的话，那么让这些间接为秦所用的战略通道归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就显得有必要了。

基于上述原因，秦国愿意拿白起所攻取的赵国在山西高原之上的土地，去换取河北平原的支撑点，也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事情最终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步骤进行，秦国的这次交换，也许还会被后人视作“奇谋”。而即使是从保守的战略来评估，秦国将目标锁定在河北平原的南部，也比一下子把点布在陶邑要务实得多，也更有

机会在短期之内与秦国在太行山以西的控制区连成一片。问题是，历史并没有给秦国实现他们打造另一个“陶邑”的机会，因为赵国反悔了。

如果是在双方交割土地之前，赵国反悔的话，对秦国来说倒也不算损失。只不过这次秦国相当于被赵国忽悠了一次，赵国是在秦军撤出藺、离石、祁等被占领土后再反悔的。也就是说，赵国收了秦国交回的土地，却没有交换过去土地，这种做法无疑让秦国非常恼火。其实大家倒也不必为秦国受骗而感到愤愤不平，这种不守信用的事情，秦人做的也不少。对于俨然已成为诸侯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秦国来说，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赵国会来这一手。

正如在完璧归赵的典故中（公元前 283 年），藺相如在让随从带着和氏璧潜逃回赵国后对秦王所说的那番话一样，秦强赵弱，赵国在得到了秦国所交付的十五座城邑后，怎么敢不把和氏璧奉上呢（“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从完璧归赵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因为秦国的强大，赵国以及其他诸侯不敢在平等的外交活动中欺骗秦国的概念，已经成为当时共识。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和氏璧因为藺相如的巧妙应对而没有入秦，甚至成为白起攻赵的导火索。但秦国对于自己优势地位的迷信，反而因为白起攻赵的成功而得到了强化。所以秦国这次被赵国“骗回”了失地，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在此之后，无论是出于打击赵国这个最大战略对手的需要，还是为了秦国的面子，秦赵之间的战争都不可避免的爆发了。而由于这次是秦赵两国的直接 PK，双方的博弈战场自然也就选择在秦赵两国领土相接的山西高原之上了。按照常规的攻击方案，作为报复方的秦国，所能够选择的攻击路线，和十几年前白起攻赵的路线并不会有区别。一是由陕北高原向东渡过黄河，攻击吕梁山区腹地的藺地、离石，以控制东入太原盆地的通道；二是由河东之地向北，攻击兹氏、祁等城邑，重新让赵国退守到太原盆地北部。

问题是，既然赵国敢忽悠秦国，就意味着赵人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事实上自失地之后，为了收复失地，保住赵国在山西高原的半壁江山，赵国已经做了十年的准备。而重新控制住黄河渡口，以及全部的太原盆地，更让赵国的防守形势大为好转。秦人要想再一次突破赵国的防线，难度将大大增加。也正是因为权衡了正面攻赵的难度，所以秦国重新制定了一条攻击路线。就此，一场打破秦军不可战胜神话的秦赵“阙与之战”爆发了。

第三十章 秦国与赵国爆发阙与之战

第一节 秦国意图切断赵国的交通线

发生在秦赵之间的“阙与之战”（公元前270年），知名度远比不上后来发生的秦赵“长平之战”。不过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却非常重大，因为它就此改变了秦国东进的整体战略，至于秦国是怎么调整他战略的，我们在战后就会知晓了。虽然“阙与之战”与“长平之战”的名气不能相比，但战役的主战场，却都是发生在上党这块高地上。只不过前者以赵国的胜利而告终；后者以秦国的惨胜而结束。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由于赵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且已经将防线恢复至地理分割线上，秦国再想从西、南两面攻破赵国的防线已经很困难了。而如果秦国想打破这种地缘平衡的话，就必须另辟蹊径，重新再选择一个攻击面，以让赵国的防线承受更大的压力。不过从赵国的情况看，由于灭掉了中山国，赵国在山西高原上的国土与在华北平原的控制区已经全面对接，其轮廓已渐趋丰满。

从表面看，秦国已经很难对赵国的某一块国土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特别是赵国视为根本的太原盆地，赵国自立国之初，就已经通过控制上党高地西北部的山地，让其与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华北平原的领土相接。要想将之孤立出来，似乎并不太容易。好在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即使没有我们现在这样技术支持，心里也十分清楚，无论是魏国、韩国，还是赵国，他们在山西高原上的国土与在华北平原的扩展区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十分脆弱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都是因为那条南北纵横切割了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太行山脉的存在。而无论是秦赵两国，还是现在的我们，要想穿越这条“天下之脊”，都必须仰仗那几条被概括成“太行八陉”的孔道。换句话说，如果秦国能够想办法切断太原盆地与河北平原之间的交通线，那么他们就可以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同时对以晋阳为核心的，赵国所控制的太原盆地形成包夹之势。而如果赵国在这种防御压力陡增，必须分兵防守的情况下，让秦国又一次从陕北高原渡河攻入吕梁山区腹地，控制了藁、离石等邑，那么秦国很快就可以从不守承诺的赵人那里，拿回他们本不该那么容易失去的战利品了。

无论秦国是准备从战略的高度，抱着打持久战的心态来切断晋阳与邯郸之间的交通线；还是抱着战术的目的，希望借此一战反攻倒算成功，秦人都必须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上党高地”之上了。要知道，尽管三晋在这块高地上的地缘形态错综复杂，但这里始终是晋国和三晋的自留地，无论是秦国还是其他诸侯都没有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这片山地之上过。而这块高地的情况，我们在三家分晋的章节中已经作过具体分析了。这块整体呈椭圆形的高地，腹地主要由漳、沁、丹三水所覆盖。而这

三条河流所形成的水系，所冲积出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个盆地（谷地），分别是长治盆地、晋城盆地、沁水谷地。当然，这三个河谷盆地的地缘潜力，肯定无法与华北平原以及山西高原的其他盆地相比了。但如果你想成为整个上党高地的控制者，这三个战略基地却是必须控制的。其中尤其以体量最大，并且直接控制太行山通道入口的长治、晋城两盆地最为重要。

虽然在三家分晋之初，魏、韩、赵三国在上党高地上都有不少城邑。但经过长时间的战略调整，赵、魏两国都有了更好的扩张方向，反倒是空间和潜力最小的韩国，将上党高地作为了经营的重点。也正是因为战略重点的不同，韩国逐渐通过交换等手段控制了长治盆地、晋城盆地、沁水谷地这三个河谷盆地，成为上党高地的主人。当然，韩国控制了这块地缘潜力不大，但战略位置重要的高地，势必会加剧魏、赵两国领土的分割状态，影响他们的战略安全，因此韩国通常是会积极保证两个兄弟之国的通行权的。除非正好韩国和魏、赵两国处在战争状态。而对于“阨与之战”之前的赵国来说，不幸的是，他与韩国正处在战争状态。

其实我们如果去了解一下三年前，发生在韩国境内的“华阳之战”的背景，就不应该为韩、赵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而感到奇怪了。因为华阳之战的起因，就是因为魏赵联合攻韩，而韩国向秦国求援而发生的。按道理来说，韩国应该和魏、赵两国捆绑在一起，共同应对秦国的。最开始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即使时间再往前推两年，秦国围攻魏都大梁时，韩国也还派军救援过，只不过那次战役等待韩国的又是一场惨败。事实上，自从魏国连续丧失了河西、河东之地的控制权之后，韩国就被逼推到了抗秦的第一线。这种情况，显然是地缘实力最弱的韩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开始，韩国还寄希望于与魏、赵两国以及其他山东诸侯合纵攻秦，以遏制秦国东进的步伐。但在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后，韩国已经不再对抵抗秦国抱有幻想了。随之而来的改变就是，尽量向秦国示好，并且让秦国无障碍地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施展他们越地攻击的战略。

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三夹板的位置上，韩国也不大敢完全倒向一边，经常要在两边游走，以为自己获得最大的生存空间。问题是这种两面示好的玩法，做起来总是如履薄冰。经常是秦国看韩国不听话了，就教训韩国一下，打下他几个城邑，然后韩国赶紧表示愿意做秦国的小弟，秦国再把地退回给韩国；而另一方面，魏、赵等国发现韩国有“叛变”的迹象，将祸水东移的话，也会联合起来教训一下这个小兄弟，让他认清形势。有鉴于此，韩国的事大之道，也就只能根据战争的结果而调整了。

在华阳之战之后，由于秦国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韩国自然站队到秦国那边了。因此在秦国准备对赵国发动报复性攻击时，他们其实并不担忧韩国会影响秦军的行动，甚至可以要求韩国与秦军协同作战。只不过鉴于韩国的尴尬身份，韩国在这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就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差不多了。

既然韩国已经站队到了秦国那边，并且已经控制了上党高地的核心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秦国已经可以很顺利地从上党高地发起攻击，并且切断太原盆地与河北平原之间的战略通道呢？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韩国虽然控制了上党高地的核心区，但赵国始终能够保有一条完全属于自己连接晋阳——邯郸的东西交通线，而切断这条交通线，就是秦国最先要做的事情。

第二节 秦军进攻赵国交通要地阙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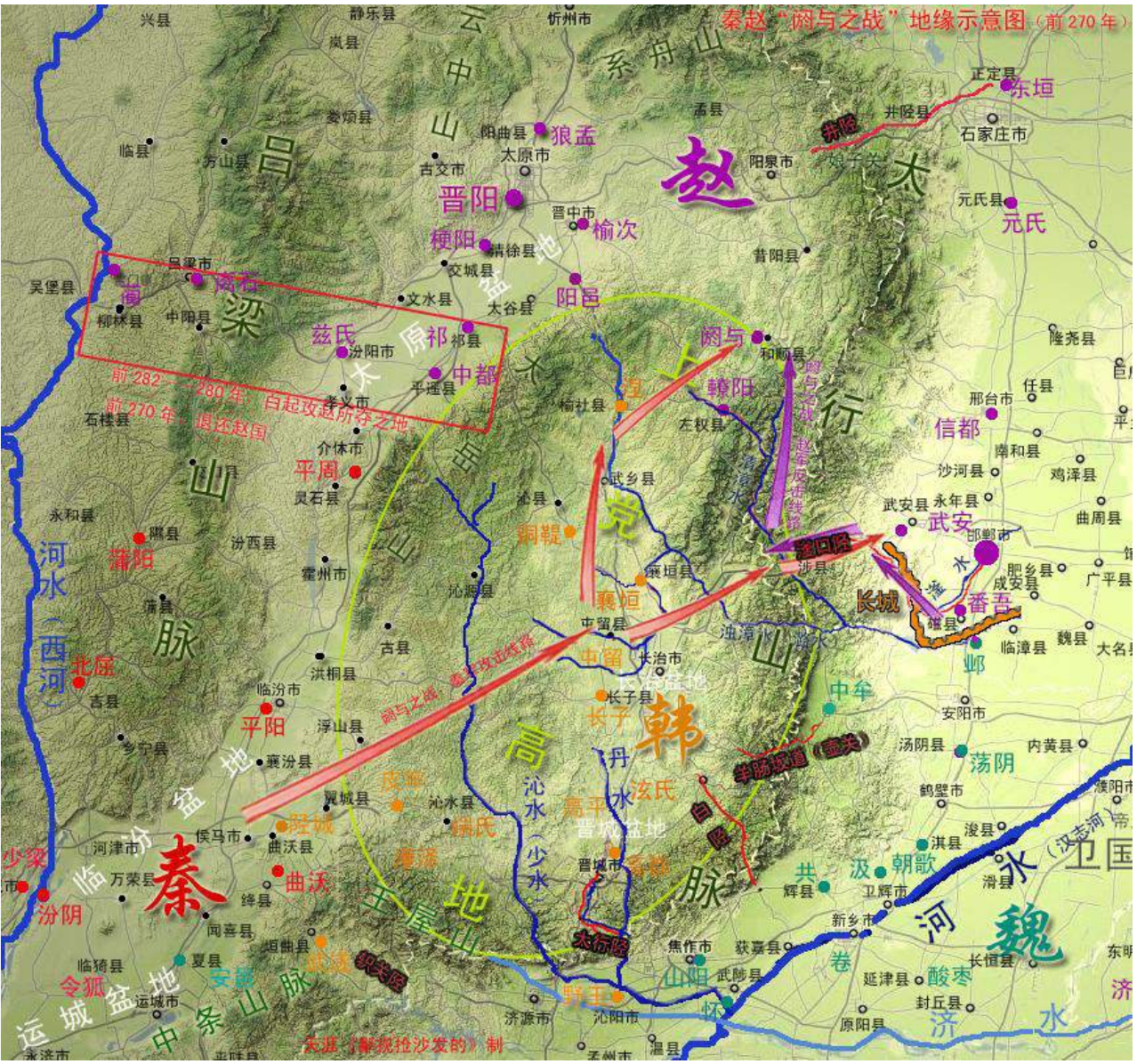
在分析上党高地的地缘结构时，我们其实已经对赵国的这条交通线作过交待了。如果从穿越太行山孔道的角度来归类的话，那么赵人想从太原盆地穿越上党高地直达都城邯郸的话，无疑他们所选择的通道会是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滏口陉和那条贯穿太行山脉的漳水相邻。如果在低比例尺的地图上把它标示出来，很可能被误认为是沿漳水前行的。但事实由于太行山脉中的漳水峡谷太过艰险，因此并没有成为天然的道路。

滏口陉穿越太行山的位置其实是在漳水以北，利用了太行山脉中的天然横谷。在跨越了浊、清两条漳水之后，再进入太行山东麓的。不过在进入太行山东麓之后，按照惯例还需要走过一片丘陵区才会到达真正的平原带（华北平原）。而在这片丘陵区中有一条南北向的丘陵叫做滏山（今石鼓山）。当我们从山西高原走出太行山后，需要向南做个转折，然后再向东从一个叫做“滏口”的山口处穿越滏山，然后再折向北，沿着发源于滏山的一条叫做滏水的河流行进到邯郸城。一般情况下，我们着眼点是在大的地缘结构上，这么细致的描述一条路陉的走向，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不过滏口陉的地理结构，却与我们后面要分析到的“阙与之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需要做个详细交待。

如果从大的地缘格局来看，无论是从河东的临汾盆地，还是从太原盆地，想直线到达邯郸城的话，都应该先选择合适的道路行进到长治盆地，然后再从这个上党高地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向东进入滏口陉。在赵国控制长治盆地，或者他们与控制长治盆地的韩国关系良好时，他们完全可以由太原盆地南向进入上党高地，然后再沿浊漳水的北源向南行走一段距离后，再经由长治盆地这个中继站进入滏口陉。虽然从行进路线上来看，这并非是一条直线，但胜在路状相对较好，中间又有长治盆地提供补给。

问题是这条看似最合适的战略通道，已经由于韩国倒向秦国而被切断了。因此赵国用来连通滏口陉的道路，就要完全仰仗另一条交通线了，而这条交通线，则与漳水两源中的北支——清漳水密不可分。清漳水在早期，其实是独享漳水之名的，而那个时候作为漳水南支流的“浊漳水”被叫做“潞水”。从这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清漳水一线的地理结构是了然于心的，或者说很早就利用了清漳水的河谷

作为交通线。不过如果仔细观察清漳水的走向，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沿着上党高地东北部的边缘山地前行的，其绝大部分河道是处在太行山脉腹地。这种地理结构，无疑大大增加了通行的难度。



秦赵阨与之战地缘示意图

当然，这也有个好处，就是韩国人就算再想成为上党高地的控制者，也不会去费心进入清漳水流域（农业潜力太低），除非他们铁了心要和赵国人作对。而赵国则可以始终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交通线。当赵人沿着上党高地的北部边缘东行，在到达太行山主脉西麓时，他们可以有两个途径来进入太行山脉腹地的清漳水河谷。因为清漳水在北部其实还可以分为两源，既可以由北源进入谷地，也可以经由北源向南经由南源进入谷地。而这两个山口之处自然也就成为重要的战略据点，为了控制它们，赵人在此建立了“阨与”（现和顺县境内）、“轸阳”（现左权县）两个

城邑。理清了这些关系，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阨与”在这条交通线上的枢纽地位。

对于试图合围太原盆地的秦人来说，他们如果能够奔袭“阨与”得手的话，就可以切断赵国东西两都的直接联系，并从东线对太原盆地施加军事压力。而这个时候的晋阳城，理论上还可以直接向东，经由井陘到达河北北平原。由于中山国已经被赵国吞并，这一地区已经成为赵国的领土了。不过赵国在河北平原的主要力量都基本集中在邯郸一线，如果要向北绕这么一个圈子去支援太原盆地的话，势必要耗费成倍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真正能起到的支援作用有限。

更重要的是，如果秦国控制了阨与这个点，他们还可以继续向北去切断井陘与晋阳城之间的联系（攻击路线为和顺——昔阳——阳泉），并不需要走太多的山路。这样的话，太原盆地就会彻底陷入战略包围之中了。当然，如果秦国要这样做的话，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突出部过长。除了要有足够的军力迅速攻破阨与外，还要保证自己的后勤线不会受到控制上党高地腹地的韩国的攻击。否则秦军即使再强大，也不敢冒这个险的。至于韩国的态度，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不管他是否真心愿意作秦国的小弟，在这次战役中也必须和秦国站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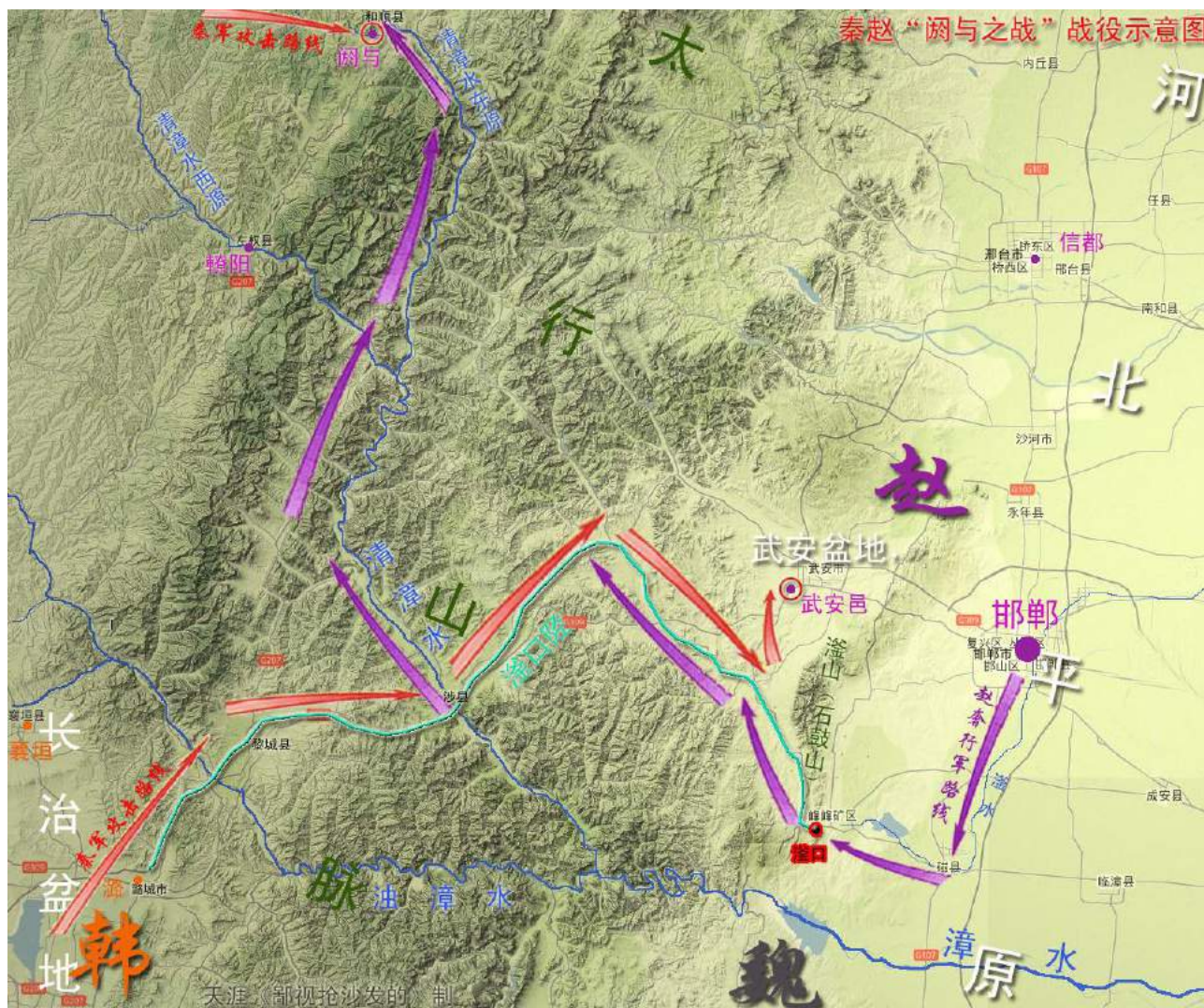
秦国攻击阨与的行动，其实是很出乎赵国意料的。毕竟这条战略交通线，之前一直是非常安全的。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赵国也就必须想办法予以支援了（鉴于地缘潜力有限，这样一个据点不会有太多的兵力驻守）。从地缘格局上来看，赵国可以选择从太原盆地抽调兵力去驰援阨与；也可以从邯郸西入滏口，再经由清漳水河谷北上救援阨与。不过秦国这次的突袭行动，并不是一次孤立的军事行动，他们的实际上已经在西、南两个方向同时对太原盆地施加了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被秦军围困的阨与守军，所能够指望的援军就只能是邯郸方向了（赵国真要是从太原盆地分兵去救阨与的话，那么等于正中秦军的下怀）。

现在摆在赵国面前的问题就是，究竟要不要去救援阨与。由于清漳河河谷道路之艰险，赵国人并没有把握在经过一次艰苦行军后解阨与城之围。毕竟秦军的战力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又收服了韩国这个战略盟友。赵国军队如果通行在清漳河河谷的话，反而要面临孤军深入的形势了。正当赵国人还在思考要不要救援阨与之时，不愿意给赵国思考时间的秦国又展开一次了新的攻击行动。而这一次的攻击，让邯郸城的赵国贵族们不得不马上做出决断了。

第三节 赵军在武安邑被攻后驰援阨与

秦国新的军事行动，是针对赵国的“武安”邑。这个以“武安”为名的城邑，虽然貌似应该是秦国“武安君”白起的封地，但其实这个赵国城邑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白起得到这个荣誉称号只是因为他的卓越战功，而并非因封地而得名。实际上，作为赵都邯郸西面重要的军镇，武安邑所起的作用，是以武拱卫都城的意思。

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从一条高大山脉中穿过，在进入到平原地区之前，总还是要经过一片过渡的丘陵区的。而这片丘陵区之间往往会包含一些小型的盆地区，作为到达平原地区之前的前站。如果这些盆地能够被平原地区所控制，那往往就是平原地区的缓冲区。像井陉盆地、林州盆地，都是位于太行山脉东麓，具有类似战略价值的盆地。而武安邑（现在的武安市）所处的武安盆地，也同属此类。分割武安盆地与华北平原的那条南北向的丘陵带，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滏山”。在经过滏山南端的滏口之后，东出山西高原的人就可以沿滏水北上到达邯郸了。



秦赵阏与之战战役示意图

由此可见，秦军攻击武安邑的战术目的，就是为了阻止邯郸城里的赵国机动部队驰援阏与。这次进攻甚至也不能称之为佯攻，因为如果能够同时攻下阏与和武安，秦国就很可能真的将攻击方向转向邯郸。对于军事家来说，能够直取对方的核心地区，总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一定要保证韩国稳定地站在秦国一边。不过秦国如果两战皆胜的话，惯于事大的韩国，更应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哥。

秦国进攻武安的军队，并不需要从阙与城下出发，再沿清漳水一线南下。已经收服了韩国这个小弟的秦人，完全可以从上党高地的核心区——长治盆地出发，横渡浊、清两漳水后到达武安盆地。当然，你不能指望韩国军队去执行攻击任务，就像德国人不能指望意大利人去主打任何一场战役一样。对于身份尴尬的韩国来说，他们其实也清楚如果赵魏两国被秦国所灭，自己绝对没有独活的可能性。如果双方能够保持力量平衡，对韩国来说是最有利的。

不管韩国人心里怎么想的，执行攻击任务的秦军倒也不用顾虑自己的后路为韩国所断。现在就要看赵国人是怎么想的了。如果他们想去救援阙与的话，除了要在艰险的山路中行军以外，还要面临如何绕过已经攻击至武安邑的秦军的问题。而如果赵国决定放弃阙与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以邯郸为中心，开始在邯郸西、南方向加强防御力量了，并且将与秦军决战的地点放在武安城下。

就在秦国那边已经进逼至武安城下时，赵国这边终于作出了决定，即由赵国名将赵奢率军出战秦军。不过出征的赵军，既没有想办法驰援阙与，也没有与秦军决战于武安城下，而是在向西南方向行进了数十里后（甚至还没有出滏口），就开始停下来构筑防线了。如果这真是赵军的意图，那他们无疑是选择了一个最保守的方案，即准备以邯郸为基地，与秦军展开拉锯战。

换句话说，在兵锋正盛的秦军面前，赵军已经没有了在野战中获胜的把握。想的只是据守邯郸城，以及沿漳水、滏水一线的赵南长城与秦军展开持久战。在当年被魏国攻入邯郸城后，赵国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来打造邯郸城南的防御体系。秦国要想在短时间内攻入邯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鉴于秦军和他们的核心区距离过远，战略补给线存在诸多变数，赵国的这种战术虽然保守，但也非没有拖垮秦军的可能。正是由于赵国据邯郸以自守的方案存在战术合理性，加之秦国过于相信自己的武力（否则也不敢搞“中心开花”战术了），因此秦军相信赵国已经没有了救援阙与，甚至武安的想法。所以武安城下的秦军，开始放心地攻击这座可以作为攻赵基地的城邑。

当然，赵王最终采纳赵奢的建议，也还是不愿意冒着新旧两都的交通线被从中切断的风险。毕竟那样的话，邯郸可能暂时不会有问题，但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能不能保得住就要打上问号了。赵奢为了让赵王同意他的方案，还留下了一句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豪言壮语——“狭路相逢勇者胜”。这种颇符合亮剑精神的战术其实也无所谓对错，成王败寇，如果赵奢失败了，那么他一定会被扣上轻敌冒进的帽子；但如果他成功了，那就可以一战成名，并将秦国赶回河东去（还可以让韩国重回三晋阵营）。对于赵奢来说，幸运的是，他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但对于赵国来说，这次战术上的胜利却为后来赵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不能说秦国最后能够打败赵国，一统天下就是因为某个人、某场战役胜败所决定的。不过如果具体到关键点上，战略战术还是需要由具体的人来执行的，那么这

个执行人，往往在文史中就要承担所谓的历史责任了。如果从名气来说，赵奢虽然位列战国名将，但他在中国文化中的知名度却不及他的儿子赵括。而这位赵括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全因为那场让赵国损失了四十万壮丁的“长平之战”和那句“纸上谈兵”的成语。熟知这个典故的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即使秦国施展了反间计，而赵国上下又为什么相信一个没有真正领军打过仗的赵括，能够指挥一场战国史上最大的战役？而这其中的因素，很大程度就是源于“阏与之战”。

赵括之所以在赵国享有知兵之名，并不是因为他只会和人在假定的战役中讨论兵法，而是因为他的确显示出很高的军事天赋，并且很早就跟随赵奢在军中。在赵奢东征齐国，西却秦军的战役中，赵括的那套兵法理论，都对赵奢的战术产生了影响。不能说赵奢的战术运用，就是由赵括所制定的，但最起码赵括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坚定了赵奢的决心。而随着赵奢的成名，赵括作为非正式参谋人员的作用也散播开了（即使是出于为子立威的心态，赵奢也会愿意为这种“传说”增加筹码）。所以说，即使赵括没有亲自领兵打仗过，但赵国上下却已经很自然的把赵奢的功劳记在了赵括的名下。至于阏与之战能够力克秦军，更是为赵括的传奇军事色彩，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正因为如此，当秦国派人在赵国散布秦军不怕廉颇，而只怕赵括时，赵国上下才会深信不疑。毕竟在那场消耗战（长平之战）中，赵国和秦国一样暂时都看不到取胜的希望，能够有一个有过大胜秦国经验的将领上阵，也许就有机会扭转战局。从战术的角度看，秦国之所以希望赵括出战，一方面是秦国希望赵国再来一次“亮剑”精神，打破相持的僵局（只有这样，才能布口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通过阏与之战，秦国已经知晓了赵括的战术特点（这点是很难改变的）。很难说这是赵括的错，因为这种战术特点很大程度也是由年龄所决定的，一个曾经亲身实践过“狭路相逢勇者胜”战术的年青将领，是很难与已过花甲之年的老将廉颇，实施同样的保守战术的。

有不同的战术特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战术已经被对手所熟知，并被利用。由此我们也可以说，阏与之战为赵家父子所积累的成功经验，最起码对赵括个人来说是一个悲剧，让他有机会为赵国的失败和那四十万亡灵承担责任。长平之战的战术细节和战略意义，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解读。现在我们要回到阏与之战本身，来具体解读一下战术细节。从秦军攻击武安和赵军驰援阏之的路线上，我们可以看到有部分是重叠的。这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秦军没有当道设伏，以阻击赵国有可能的出击。

对于这其中的原因，我们首先要将视线放在武安邑的地缘位置上。因为武安邑是属于一个护卫邯郸的战略基地，而非一个把守道路的关卡，为了更好地经营武安盆地，它的位置更靠近盆地的地理中心（现在武安县城西南）。如果邯郸城希望阻击来自上党高地的进攻的话，他们可以选择滏口作为第一道防线，而武安邑就可以作为外围阵地，侧击来犯之敌。因此，当秦国确信赵国没有出击滏口的想法时，他

们就把注意力放在攻击武安邑，而不是当道设伏之上。即使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远道而来的秦军也不希望自己的北侧有这样一个赵国的据点存在。更何况攻下了武安，秦国也就有了围攻邯郸的跳板。

利用秦军的误判，赵军得以由滏口出发，绕过武安城下的秦军，经过两天一夜的急行军，沿清漳水东源出太行山主脉，并在离阨与五十里处扎营。之所以没有一鼓作气攻至阨与城下，一方面是因为长途奔袭而来的赵军需要休整一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赵军需要提防从武安城下回援的秦军从后方袭击自己。虽然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话可以用来鼓舞士气，但对于一个真正的军事家来说，能够抢得地形优势才是获胜的关键。因此赵奢将军队驻扎在山西清漳水河谷的山口处，即使秦军尾随而来，也可以用相对较少的兵力将秦军阻挡在太行山脉腹地。

当然，阻击武安城而来的秦军，并非赵奢此行的目的，他们最终还是需要击溃阨与城下的秦军，才能够完成战役目标。而兵贵神速的赵军，能够这么快到达阨与城下，本身就给了攻城的秦军以极大的压力。更为致命的是，赵军随后还抢得了阨与城外的制高点。至此，秦军再想攻下阨与已经不可能了，败退只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赵国守住了阨与这个点，其意义并不仅限于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它直接改变了秦国东进的整体战略，而韩、魏两国在这盘棋中的定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四节 秦国在战后进行的战略调整

如果从象征意义上来看，阨与之战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场战争终结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促使秦国在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倒也不必过于抬高一场战役的历史作用，否则又会陷入了诸如如果某人的父母当年没有结合的话，那么是不是历史走向就会发生改变的怪圈中了。其实从战略的角度看，无论是秦军突袭阨与得手，还是赵军反袭失败，都不会改变秦赵两国的基本实力对比，也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在大家的实力都没有受到根本影响的情况下，即使秦军这一次在阨与遭到了失败，但完全还可以再卷土重来，并集合更多的兵力来争夺这个战略要点。而这样做的前提是，秦国依然认为他们之前的越地而攻，谁强就打谁的战略是正确的。问题是现在秦国已经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存在很大问题了。而阨与之战的失败，则相当于给秦国之前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战略，浇上了一盆冷水，让他们清醒的认识到，现在的战略格局是经过几百年的残酷竞争而形成的，在地缘分裂的格局已经十分稳定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步步为营的方式来解决。任何投机和冒进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在一个王朝刚刚崩溃时，地缘分裂格局尚未稳定时，出奇制胜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秦国之所以认清这点，是因为韩、魏两国在阨与之战中的态度，特别是韩国的

态度变化。在战役之初，我们知道韩国在表面上是站在秦国这一边的，否则秦国也不可能通过韩国所控制的上党高地腹地去攻击赵国。但这种合作并不符合韩国的地缘利益，无论秦国胜还是败，韩国人始终要担心秦国会不会顺手牵羊地把自己的上党郡给吞并了。假途伐虢的例子，在东周几百年的历史中，又不止发生过一次。惯于运用谋术来生存的韩国，更是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在这所谓的秦韩联盟中，韩国本来就扮演着一个出工不出力的角色。

而在赵国反击成功后，韩国更是重新回到了三晋阵营中，转而将秦军“请”出了上党高地。没有了韩国这个同盟，秦国就是想再越地攻赵也是不可能了。至于三晋中的另一个成员魏国，本来就和赵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事实上魏国人比赵国人更需要维系这个同盟，因为由始至终，魏国都是秦国的主要打击目标。如果不拉上赵国这个强援，魏国甚至很难和秦国正面交锋了（韩国人不能指望，他们会让道把祸水引过来）。为了策应赵国的反击行动，魏国人的主力被重新部署在河东之地的旧都安邑，以从侧后方威胁秦国在河东的战略安全。而在此之前，魏国实际上已经将经营的重点放在中原，并不对重回河东抱以太大希望了。

说到安邑以及魏国在河东之地的存在，其实也和秦国的战略有关。如果按照步步为营的方式，秦国本应该先将魏国在河东之地的据点全部扫清后，才逐次向东推进的。但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秦国在取得了河东的控制权后，相当于已经打通了向东的战略通道。不仅崤函通道上再也不会出现“崤之战”那样被人切断后路的情况，还可以利用轹关阨这条更便捷的战略通道，因此秦人后来的重点已经在中原之地了。为了在中原争霸，谁强就打谁成了一个主要的战略指导思想。魏、齐、楚、赵先后都成为秦国的重点打击对象。这种战略指导思想，也为魏、韩两国在河东留下了一定空间。

当秦国与这两国交恶时，这些据点无疑也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但当秦国把攻击目标定为其他国家时，那么秦人往往会按照当时的情况，选择性的将某些攻取的城邑交还给魏、韩两国，以让这两个国家（不一定是同时，如果要打魏国，就只需拉住韩国就行了）保证自己交通线的安全。而在白起攻赵的前一年（前 284 年），作为魏国在河东之地最为重要的据点——安邑，其实已经被那位战略家司马错所攻取了。只不过不能确定，是否是在赵国和秦国所达成的那次交换中，还给了魏国（从赵、魏联盟许诺给秦国的土地都是魏国的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之所以不能确定，是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魏国有可能在秦军攻赵时，重新夺回了安邑，并以此为据点向秦国施压。

如果魏国是用河间的土地换回河东之地的安邑，可能会让人觉得奇怪，秦国为什么这么希望在河北平原获得一个稳定的根据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而魏国又有什么理由来说服秦国交还这个城邑呢？其实要说理由，魏国要回安邑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因为安邑是魏国的旧都，而作为魏国曾经的都城（从分晋之前

算起，最少做了魏氏 220 多年的都城），安邑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魏国前代贵族（包括王室）的埋葬地。在重视祖先崇拜的中央之国，要回先人的归葬之地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即使秦国认为临汾盆地中北部的“平阳”（现在的临汾市境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因为是韩国的旧都，在韩国愿意臣服于秦国时，也还是多次将之交还给韩国的。当然，对于已经取得河东之地控制权的秦国来说，愿意作出这样一些“让步”，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据点会对自己造成太大的威胁，更认定它们都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毕竟这种“假途伐虢”的越地攻击之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攻击的先后顺序倒置。

正是基于韩国在阏与之战后又重归三晋阵营，而魏国又摆出与赵国联盟坚不可摧的态势，让秦国彻底明白了，它并没有可能仅仅依靠实力的排名，在三晋，甚至整个东方诸侯中自由的选择打击对象。还是需要依据地缘结构的特点，一步一步地将自己的战线向东推移。促使秦国作出这个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中原东部的那块飞地“陶邑”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实际上在取得陶邑这个支撑点后，被封于此的秦国重臣魏冉，已经向周边扩张了不少土地。但这种扩张，更多的是一种独立作战，并没有与秦国本部产生多少互动。这当然是由于这块飞地过于前置了，如果是在河北平原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种各自为战的情况下，飞地与母体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十分微妙了。如果飞地做得不好，就很容易被周边的国家所吞并；而如果它做得太好，由于主要是靠自身的力量发展，又会有很强的独立倾向。

特别是当这个远离本土的控制者，能够控制一块独立且有很强防御性的地缘板块时。当日乐毅攻齐失败，也就是受到了这种怀疑。其实也不能说这种怀疑就一定是用人不疑的原则出了问题，就像当年秦国吞并蜀国后，秦国派至蜀地的管理者，就曾经有过这样想法一样（被司马错给平了）。而那个曾经被蜀王委以重任的苴国，在得到汉中之地后也成为反叛者。

现在陶邑作为一块飞地，孤身在外，时间一长引发秦国本土的不安也属正常。既然依靠飞地“中心开花”的战术不尽如人意，越地进攻的效果又差强人意，秦国作出战略调整就在所难免了，而这次战略调整被总结为四个字——远交近攻。说穿了，秦国已经从之前的依据竞争对手的强弱来选择暂时性的盟友和攻击对象，转变为以地缘关系的远近来划分敌、友的方式。即与秦国本部在地理上没有接触的国家，会被当作长期的交好对象；而与秦国地理关系最近的国家，则被作为攻击的重点对象。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离秦国最远的齐国，成为秦国最需要争取的“盟友”，而与秦国最近的韩、魏两国，就又一次无可回避地成为秦国的重要攻击对象。

至于说陶邑，让秦国将之完全放弃是不可能的，毕竟也是花了不少工夫才得到的。只是陶邑再也不会再试图从齐国身上扩张领土了。而它的战略作用，也转变为以齐

国为后盾，威胁魏国的后方了。当然，秦国是不会再指望陶邑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了，能够牵扯掉魏国的部分精力，它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第三十一章 秦国与赵国爆发长平之战

第一节 秦国将上党高地列为主攻目标

我们在这里谈地缘板块的作用和重要性时，经常会让一些生活在次一级地缘板块的人，有“生不逢地”的感觉。其实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因为地缘板块的作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就像古典时期不受重视的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反而成为最重要的地缘板块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出生并生活的地理单元，并不一定就是你成就事业的地方。就像秦国的崛起，固然是与它的地缘位置和地缘战略有关，但制定和执行这些战略的人，却并不一定是秦国人。就像这次为秦国提出“远交近攻”之策的范雎，其实是秦国的宿敌——魏国人一样。而他在成为秦相之时所取代的对象——魏冉，本身也不是出身于秦国，而是楚国。因此研究地缘并不是为大家树立所谓的“地理决定论”，而是让大家明白环境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清楚人是可以选择环境的。

现在，秦国新的战略已经确定了。从战略上看，“远交”可以保证秦国正面的对手，很难再从他们的后方得到支援了。至于说那些所谓的盟国（主要是齐国）能不能与秦国共同包夹对手，倒无关大局。已经占据天下三分之一的秦国，有信心和实力在这场拉锯战中获胜。而从另一方面看，要想打击韩、魏这两个“近攻”对象，秦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始肃清韩、魏两国遗留在河东之地所残存的据点。事实上就像秦国当初把它们留下来时所想的那样，如果有需要的话，秦军可以很快地控制整个河东之地。因此在阼与之战失败，并制定出远交近攻的战略后（同一年，即公元前 270 年），略作休整的秦国很快就将韩、魏两国在河东之地的据点悉数肃清。

而下一步，横亘在河东之地与河北平原之间的“上党高地”，就成为秦国必须拿下的天王山了。而仅仅是从地理结构上看，秦国要想啃下这块硬骨头，其难度要远大于收服韩、魏两国在河东之地所残存的据点。至此，战国史上最著名，也最残酷的“长平之战”拉开了序幕。无论是出于征服三晋，还是统一整个中央之国的需要，上党高地都可以说是秦国需要啃掉的最后一块硬骨头。拿下了这块高地，整个三晋在华北平原的控制区，都在秦国的俯视之下了。到那个时候，对于掌握了地缘优势的秦国来说，怎么出牌就不用太顾忌三晋的反应了。

不过现在秦人还没办法想那么远，因为上党高地的控制权还在韩、赵两国手中。尤其是韩国控制了上党高地腹地的几个河谷盆地。如果秦国想在上党高地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这几个战略基地就势在必得了。至于赵国所控制的上党高地东北边缘的那片山地，如果秦国能够直接控制腹地的那几个盆地，特别是长治盆地的话，赵人还能像阼与之战时那么幸运吗？

从地理条件和位置来看，位置偏北的长治盆地无疑是秦国最需要夺取的战略要地。而韩国所设置的上党郡，以及后世上党郡的郡治也都是在这个盆地中（北部的襄垣，或者南部的长子）。更为重要的是，占据了长治盆地，也就等于对邯郸城构成了直接威胁。即使是秦军不去攻击邯郸，而依旧由崤函通道或轵关陁攻击韩、魏两国，赵国在自己侧翼完全暴露在秦军面前时，也不敢再倾力相救了。

尽管直取长治盆地的想法十分诱人，但秦人要想做到这点，却存在很大的难度。首先长治盆地处在上党高地的核心区，与秦人所控制的临汾盆地之间存在东西纵深将近 300 里的山地，其穿越的距离和难度，甚至要高于穿越太行山脉。也就是说，如果你从临汾盆地的东边缘行军至长治盆地的西边缘之前，并没有一个可供战略支撑的补给地。假如你只是像阚与之战那样，战术奇袭一个城邑的话（阚与之战还是里应外合），那么这两三百里的山路还是可以克服的。

但鉴于长治盆地的地缘潜力，以及韩国在此经营日久的情况，秦国如果直接攻击长治盆地的话，将会面临一场拉锯战。在这种情况下，这条艰险的补给线就显得非常脆弱了。就算对手不试图将其切断，秦军也要付出数倍于对手的力气，才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另一方面，如果秦军直接攻击长治盆地的话，那么韩国势必会得到赵国从太原盆地或者河北平原两个方向的支援。鉴于长治盆地在韩国地缘结构中的重要性，如果韩国人觉得自己守不住的话，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向赵国求援的。

既然直取长治盆地的方案，在战术上存在很大风险。那么对上党高地势在必得的秦人，就必须考虑先行攻取上党高地腹地的另外两个河谷盆地，即以阳城为中心的“沁水谷地”和以晋城为中心的“晋城盆地”，然后再图谋长治盆地及整个上党高地了。事实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即如果秦人取得了这两个南部战略基地，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通过政治、军事手段逼迫韩国放弃已成为飞地的长治盆地。

而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秦国从上党高地的南部着手，可以避开赵国的控制区（韩赵在长治盆地接壤，避免赵国支援韩国），直接对付实力较弱的韩国。除非韩国人一开始就让赵国的军队屯于长治盆地，否则秦人最起码比直接攻击长治盆地，更有机会在韩、赵两国协调好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之前攻取这两个战略基地。尽管从南线攻击上党高地有着诸多优势，但对于秦国来说仍然存在一个和北线作战同样的技术问题。那就是如果秦人想从临汾盆地直取沁河谷地的话，他们在山地中穿行的距离并不比攻击长治盆地要少。

也就是说，秦国仍然有可能会陷入一场补给艰难的拉锯战中。假如没有更好选择的话，无论难度再大，秦人也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谁让上党高地是秦国东进所必须拿下的天王山呢。不过现在，秦人有更好的战术路线可供选择，而这条战术路线的选择，还可以起到另一个有利于秦国的战略效果，那就是将整个韩国的上党郡变成一块飞地。而要想达到这样的战略、战术效果，秦国首先要控制一块心

仪已久的土地——南阳之地。

第二节 秦军进攻韩国南阳之地和上党郡

南阳之地我们在三家分晋的章节中已经交待过了，指的是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那片平原。由于先秦时诸侯分立的格局出现了数百年，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认定某一个地缘标签就只能哪个诸侯使用，因此我们在史书中经常会看到同一个标签被不同的国家使用；而同一个区域，又可能被不同的标签所覆盖。与河北平原有关的“南阳”、“河内”两个概念，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所标示的区域上出现了重叠。简单点说，“河内”这个概念，是当年周王室兴盛时就有了（黄河以南为河外，以北为河内）。由王室诸侯所控制的邢、卫两国，直到黄河的土地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地缘概念中。而现在，这片土地则被魏、赵两国所继承了。

至于这里所说的“南阳”，则是根据晋国的方位来确定的，或者说是包含在“河内”这个概念中。由于秦国根据自己的方位，所确定的南阳是在现在的“南阳盆地”，而一统天下的又是秦人，因此当年晋人所认定的南阳，也就被历史所湮没了。以至于今人在读史时有诸多误会（要是当年由三晋来统一天下，情况就不一样了）。

韩国在河北平原的土地，都是在“南阳”这个概念之中。当然，在三家分晋时，这块当年晋国的南边国土，魏国也分得了不少。不过韩国所得到的据点都比较有战略意义，除了能够控制軹关陘以外，更能够控制入上党高地的“太行陘”。而韩国在南阳之地的地缘核心，就是在沁、丹两水交汇处的“野王”（现在的沁阳）。当秦国决定改变战略，先收上党时，弱小的韩国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经过几次战役之后，随着“野王”邑最终陷于秦军之手，韩国的上党郡算是彻底被秦军切割出来，成为一块飞地了。

在“阨与之战”以前，秦人其实已经对魏、韩所占据的南阳之地进行过多次攻击，并攻取过不少城邑（后来都放弃了）。不过那时候秦人希望控制“南阳”之地的目的和现在就大有不同了。当时的秦国是希望在南阳之地获得一个稳定的基地，并以此为跳板向华北平原渗透。因此攻击的重点是实力较强的魏国。至于韩国，则是充当借路的角色。当然，如果真让秦人站稳了脚跟，韩国的下场无非也就是另一个“虞国”（假途伐虢的主角）。而现在，秦国进军“南阳”，是为了韩国的“上党郡”，因此魏国反而成为“远交”的对象，被定位为秦国的暂时盟友。

尽管山东诸国心里都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但面对强大的秦国，如果有机会躲在一边坐山观虎斗，而不是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决策者往往会出现犹豫。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最强大的个体，往往能够击破一个整体实力强于自己的松散联盟的原因。在秦国通过外交途径警告过魏国，并承诺将来会给魏国一点甜头的情况下（还是韩国的城邑），本该与韩国人并肩作战的魏国人犹豫了。而秦国要的就是这个犹

豫的态度，他们并不需要魏国来共同包夹这个已经被秦国打怕了的国家，只需要他们能够在这种犹豫中保持中立就可以了。

所谓“远交近攻”战略的精髓，就在于通过外交手段切断对手的后援，然后自己凭借自身的优势来攻击、渗透与自己地理相接的对手（所以小国是玩不起这个战略的）。并非是之前“合纵连横”阶段，依据实力对比的因素，几个诸侯联合起来群殴一个有机会脱颖而出的“出头鸟”。后者所图的，无非是此消彼长，让自己有成就“霸业”的机会；而前者，则是真正的在实施步步为营的地缘战略，为将来成就一统天下的“王业”所服务的。



秦攻韩南阳和上党示意图

现在，一贯希望左右逢源的韩国，在秦国的新战略面前，再也没有机会引祸水东移了。在失去了在南阳之地的控制区后，韩国人必须作出一个抉择，是凭借上党高地的地理优势与秦国进行持久战，还是放弃这块飞地，让魏国重新暴露在抗秦第一线上（如果上党归秦，秦国下一步肯定是要将整个河内之地收归己有了）。一般认为，韩国在丧失野王这个重要据点之后，就作出了放弃上党高地的决定。事实上韩国的上党郡还是进行过抵抗的。只不过上党高地虽然在地理结构上有很强的防御能力，但在地缘潜力上却很弱。或者说，如果得不到位处中原的核心区的支援，仅凭上党高地的资源，在面对秦国的倾力进攻时，是很难在持久战中取胜的。

而从行军的难度来看，秦军由野王出发，沿丹水而上入太行陉，攻击韩国所控制的晋城盆地（当时为“高都”邑所辖），其难度要远低于由河东之地，向东攻击

沁水谷地的“端氏”、“濩泽”两邑。有了以野王为核心的战略基地，秦军在太行陉一线的攻击会更有韧性，并且在与韩国的消耗战中占据优势。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已经控制了河东、南阳之地（韩国部分）的秦军，更可以兵分两路，同时对沁水谷地及丹水中上游的“晋城盆地”发动攻击。在这种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孤军的韩国上党郡守军即使再抵抗下去，也无非是多延缓一下失败的时间罢了。

秦军攻击上党高地的军事行动，很快取得了实质进展。由河东之地向东攻击的秦军，攻取了沁水岸边的“端氏”邑，获得了东入晋城盆地，南取沁水谷地（濩泽）的支撑点；而向北突破太行陉的秦军，也突入了晋城盆地的腹地，将韩国高都邑（现晋城一带）所控制的区域，变成了自己前进的跳板。也就是说，秦军在这一波进攻中，控制了沁水谷地的腹地（端氏以南），以及晋城盆地的南部地区。

如果按照大的地缘板块划分，势头正盛的秦人应该能够在这次攻击中占据整个晋城盆地。而韩国的上党郡守军，如果要继续抵抗的话，应当退至长治、晋城两盆地的分水岭处组织防线，以准备第二阶段的抵抗。问题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由于晋城盆地本身的地理结构就比较复杂，韩国人在退至晋城盆地的北部时，就已经可以依托地形部署他们的第二道防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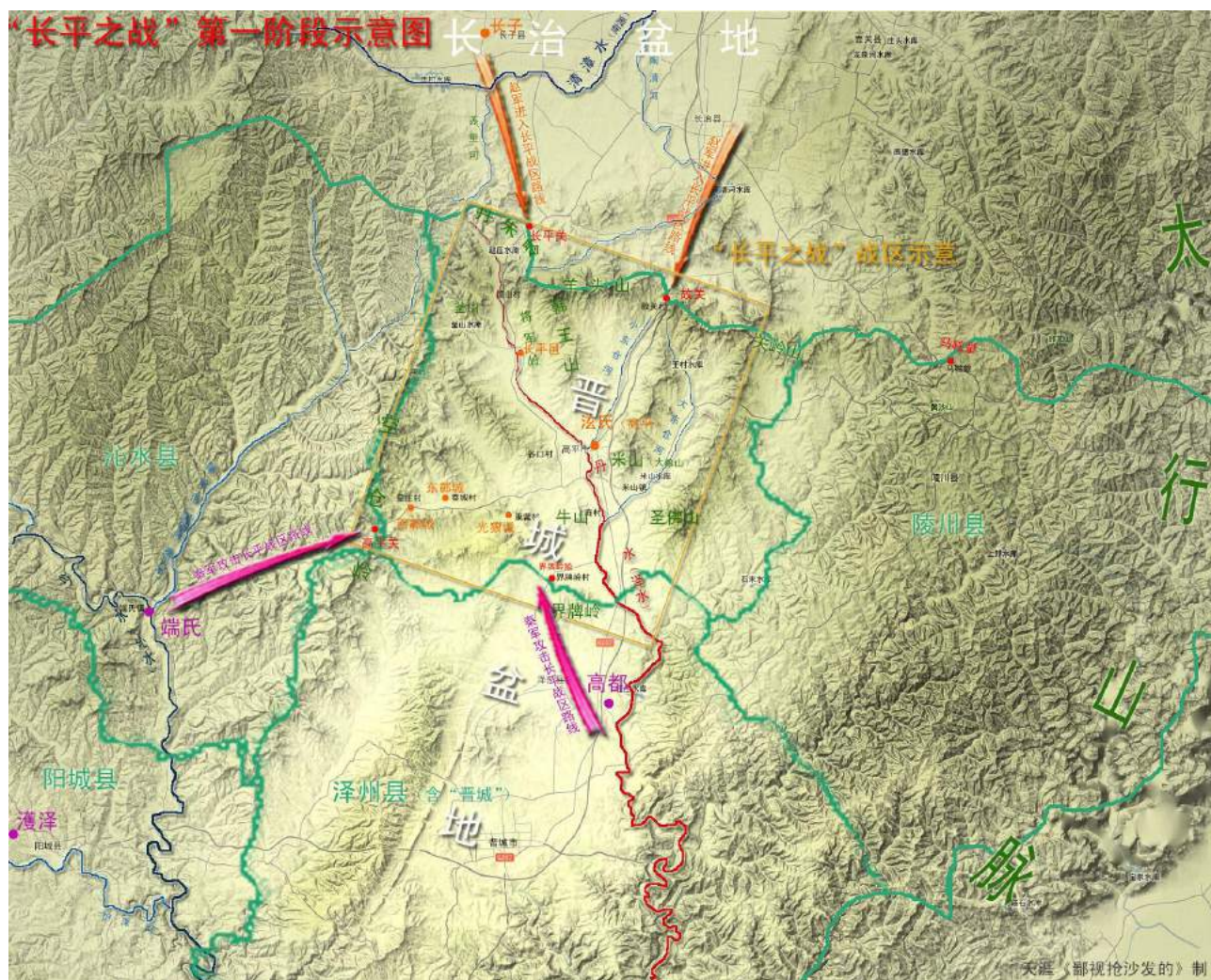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上党守军，所要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更多的则是要考虑政治归属的问题了。既然上党的军民不愿意成为秦国的臣民，而地处中原的韩国贵族们又决定“丢车保帅”，那么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能够接纳上党郡，并与秦国对抗的国家，就只有魏、赵两国了。如果上党军民将希望寄托在魏国身上，基本是没有可能的。要是魏国人肯出手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在南阳之地就与韩国人并肩作战了，那样的话，上党也不会这么快成为抗秦的第一线。更为重要的是，魏国已经丧失了山西高原的所有据点，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原诸侯。让他们为了上党这块没有地缘潜力的土地拼命，在战略上是没有可能的。

现在，唯一需要上党高地的，就剩下赵国了。上党高地对于赵国的重要性，在“阨与之战”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果上党高地，特别是它的核心区“长治盆地”归属了秦国，那么最受其害的就是赵国了。因此从战略上来看，赵国非常需要控制上党高地。但问题是，如果赵国决定接收韩国上党郡所剩余的土地的话，就势必会被推至抗秦的第一线。而面对秦国这个超级大国，做这个出头鸟的风险就可想而知了。

有鉴于此，赵国内部也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论。最终，被秦国切割东西国土，并直接威胁邯郸的危险，还是让赵国决定乘韩国的上党军民仍在晋城盆地的北部组织抵抗时，接收韩国的上党郡。自此，韩国在晋城盆地北部的“兹氏”邑（高平），成为赵国对抗秦国的第一线。而惨烈至极的秦赵“长平之战”，也就此圈定了主战场。至于这个主战场的地理结构如何，秦国为什么没有在赵军进入之前控制整个晋城盆地，下一节再分析。

第三节 战国时晋城盆地的地缘结构

说到晋城盆地的地理结构，其实整个盆地的发育状况并不算好。所谓不好，就是说它的腹地平原区还有不少山地丘陵切割，以至于整体结构有些凌乱，农业潜力也受到了不少影响。而有多条体量相当的河流（浊漳水的几个上游支流）呈伞状冲积而成的长治盆地，情况就要好上许多了。不过对于军事家来说，那些被丘陵切割的地区却是非常好的战场。一则是因为相对高度只有几百米的丘陵，还不至于艰险到人迹罕至；二是因为有了这些天然障碍物，加上纵横其间的河谷平原，为战术的演变，尤其是围歼战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围歼战——长平之战，也正是在“晋城盆地”这种错综复杂的地理条件下发生的。



长平之战第一阶段示意图

一般而言，越往河流的下游走，冲积平原的面积就会越大。这也很好理解，下游的水量较之上游会更大，所带来的泥沙数量也多，在历史的演变中，自然更有力量填平那些沟壑。当然特例也有，比如成都平原就是处在岷江的中游。不过丹水显

然不属于这种特例，它的下游和沁水、黄河等河流共同为华北平原的形成奉献了自己的力量。而在晋城盆地的丹水中游地区，所遵循的也是这个原则，即晋城盆地的南部地区，较之北部地区的地势更为平坦。换句话说，晋城盆地的南部，是整个盆地区的腹地。

如果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晋城盆地南部也成为整个上党高地南部的地缘核心。那个统管了晋城盆地，以及相对应的周边山地的“晋城市”，就位于它的中心位置。不过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移一点，南“晋城盆地”是被泽州所辖，只不过在它的中心划出了“晋城”这个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之后，泽州县事实上成为一个铜钱形的行政区了。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它所辖的诸多乡镇就会以区的形式成为“晋城市”的一部分。晋城也好，泽州也罢，都只是一个地缘标签罢了。刚才解释一番，也只是希望大家在观察这一地区的地缘结构时，不至于迷惑。从历史的角度看，泽州和晋城这两个名称，倒是经常交替成为这个地缘板块的代言人。不过在战国及至秦汉时期，这两个地名都还没有出现。在那个时候，它基本是以“高都”这个地缘标签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的。

当我们提到一个地缘标签的时候，它往往有两层的含义。一是从广义的角度看，它所管辖的区域；二是从狭义的角度认定，它的治所在哪里。高都这个地缘标签也是这种情况，它在战国时期的广义管辖范围究竟具体到哪为止，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从地理结构来看，它所管辖的核心区域，无疑是和现在的泽州县（包含晋城市）基本一致。在地理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某一个地缘板块所覆盖的区域，往往并不会做太多改变。在中国这个稳定的农业社会中，甚至经常会连前人所留下的地名一并继承了。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被征服的民族能够留给后人的，往往就只有以他们的语言为那片土地所命名的名称了。

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一个地缘板块的政治核心应该是在它的地理中心。要是清楚了平原与山地在地缘潜力上有质的差别时，也会认为平原区的腹地，会更应该是地缘中心（无论从农业，还是城市建设角度看，都有更大的空间）。但实际情况却并非都是如此，特别是在古典时期，由于军事和防范洪水的需要，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把城邑建筑在丘陵、平原相接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点能够控制进出这个地缘板块的战略通道时。像赵国的晋阳、邯郸二都，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来定位的。而战国时期的“高都”邑，也是这种情况。它的位置并不在现在位于腹地区的晋城市，而是在这个泽州盆地的东北角，临近丹水的地方。

对于高都邑的位置来说，如果有敌人从晋城盆地的北部沿丹水向南攻击时，高都邑可以第一时间将敌人阻击于腹地之外；而如果攻击是从南面而来时，高都邑也可以依托有利地形为盆地北部作一个缓冲，以让防御方有更多的时间构筑新防线。当年的韩国上党郡在太行陉失守之后，正是依托了高都邑对北上攻击的秦军，进行了第二次阻击。虽然包括高都邑在内的整个高都地区最终还是陷于秦军之手，但上

党军民的这次阻击也并非没有意义，最起码为廉颇所带领的赵国军队进入晋城盆地北部赢得了时间。



山西晋城市行政区

由于秦国占据了以高都为核心的晋城盆地南部，而赵国进驻了晋城盆地的北部，因此秦赵之间在上党高地的对决，不可避免地在晋城盆地展开了。只是由于秦攻赵守的态势，使得秦军所占据的高都地区，并没有成为战区。而赵军仓促进入的晋城

盆地北部地区，则成为双方百万大军的战场。对于这个战场，最为著名的地缘标签当然是“长平”了。不过“长平”其实在当时，并不是这个地缘板块唯一的代言人（是其中一部分）。

从盆地的发育情况来看，处在丹水上游的晋城盆地北部地区，显然没有南部地区要好。条状分布在河流两侧（包括丹水及其支流）的平原，在条状丘陵的分割下，呈现伞形结构。而这把“伞”的伞柄当然就是丹水河谷了。如果想为晋城盆地的北部找个地缘中心的话，那么大部分河谷所汇集的中心区域无疑是最合适的。而两千多年来，这个点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它的主人还是晋人时，它的名字叫做“兹氏”。而在后来的秦汉时期，它的名字则变更为“高平”，期间虽几经反复，但高平这个地缘标签还是笑到了现在。现在这个地缘中心和整个地理单元，都是被称之为“高平市”了。

从地理分割的角度看，高平市所代表的晋城盆地北部地区与泽州所代表的晋城盆地南部地区，是严格按照地理分割的标准来划分行政区域的。二者之间的行政分割点，就是在两个亚盆地地区的地理分割点上，这个分割点是一个丘陵，名叫“界牌岭”。如果秦人占据了高都邑之后，再想向北攻击的话，就必须从界牌岭两侧通过。而已经入驻高平地区的赵军，则需要在界牌岭两侧的隘口布防，以阻挡秦军的进攻。不过这个位于晋城盆地中部起到地缘分割的隘口——界牌岭隘，在中国的历史中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以至于后世的许多研究者都忽视了它的存在。

这也难怪，在进入帝国时代之后，这些曾经四分五裂，让先秦诸侯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地理单元，都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除了那些与边缘地区相邻的战略要点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以外，这些位于核心区内部的通道节点已经不太为人所

重视了。在晋城盆地乃至整个上党高地都没有太多机会露脸的情况下，这个位于盆地内部的小小隘口更不容易引人关注了。只是如果我们要解读长平之战的话，这个地理分割点就必须予以关注了。理解界牌岭的地缘分割作用，仅凭文字是不够的，好在大家可以从《长平之战第一阶段示意图》中得到直观的印象。一图胜千言，相信看过以后，大家就能够理解它的战略意义了。目前，这个小丘陵也是高平、泽州两地的分割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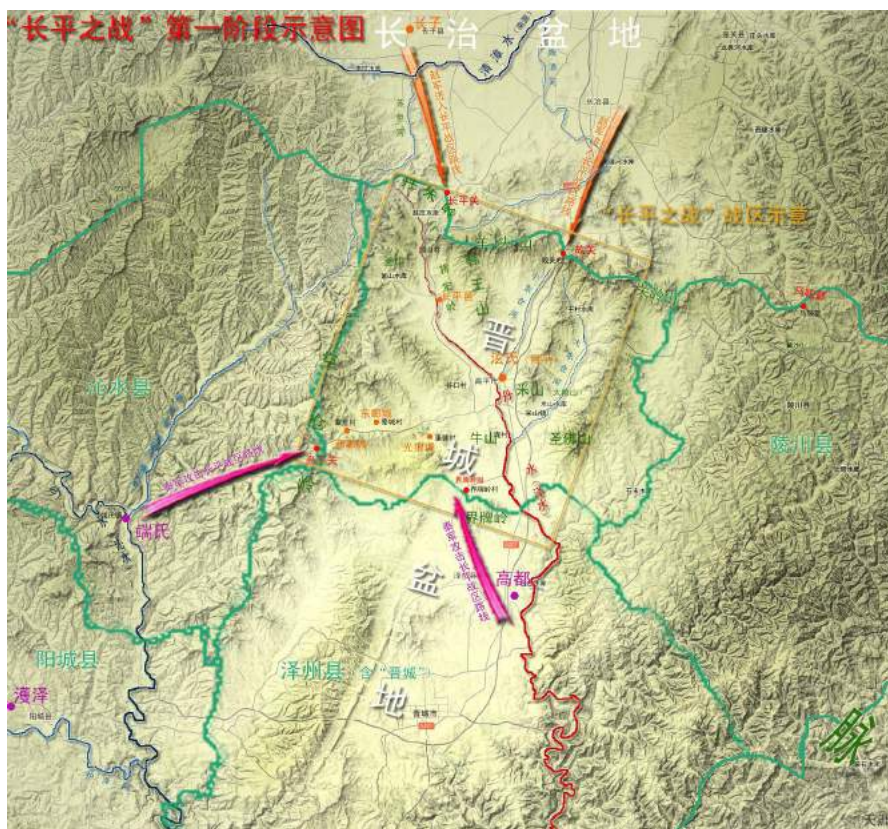
长平之战第一阶段示意图

第四节 秦军和赵军进入长平战区的战术通道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秦军攻击上党高地南部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南阳之地”向北进入晋城盆地南部的“高都”地区，以攻占其地缘核心“高都”邑为完成第一阶段战术任务。另一条攻击路线，则是由河东之地出发，向东攻占沁水河谷。而在沁水河谷之中，最具战略作用的，并非是南部处在河谷腹地区的“濩泽”邑（目前的阳城县城西北的泽城村），而是位置偏北的“端氏”邑（目前沁水县城东部的端

氏镇)。

端氏邑我们在三家分晋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了，在韩、赵两国分完了晋国公室最后那点土地后，晋国的末代君主就曾经被迁移到这里来供奉他的先祖。只不过这种“灭国不灭祀”的形式没走多久，晋国就“被”绝祀了。能够丢给没落公室的土地，通常都不会太好，也没有太多发展的空间。不过处在山地包围之中，沁水河畔的端氏，却是由河东进入晋城盆地的必经之路。而如果沿沁水纵向穿行于上党高地的话，端氏也是一个枢纽。也许正是有这种交通之便，三晋才会把故主安排在此。待在这样一个四方交汇之处，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穿行于此的新贵们看得一清二楚。



长平之战第一阶段示意图

通常并不会太顺利。因为你的敌人很有可能已经在山中地区布置下了重兵，以依托有利地形来对你进行阻击。端氏目前所属的沁水(县)地区与高平地区的行政分割线，是一条叫做“空仓岭”的南北向山岭。这条山岭，事实上也正是晋城盆地东北部的地理边界。无论是当年的秦人，还是现在的我们，想东入高平地区的话，空仓岭都是必经之路。而穿越这条山岭的山口，自然也曾经被军事家们视为重要的关隘。并不是十分清楚当时的三晋怎么称呼这个关口的，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个关口叫做“高平关”。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秦军进入高平地区，或者说长平战区的两条战术通道了。一条由端氏邑出发，向东经由高平关攻入高平地区；二是经由界牌岭两侧，向北发

三晋把晋国的末代君主安排在端氏，固然是为了控制。但对于秦国而言，端氏这个点，只是他们进攻晋城盆地北部的跳板。如果秦军想由沁水河谷的端氏占据晋城北部的丹水河谷的话，那么他们并不用为道路而发愁，因为在此经营日久的三晋，早已打通了这条山谷通道。问题是有路能走，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能够走到终点。按照一般规律，当你从山谷之中走出时，通常

动对高平的攻击。而当秦国准备这样做的时候，赵国的军队已经在廉颇的带领下，由邯郸经滏口径、长治盆地，穿越长治、晋城两盆地的分水岭进入高平地区了。如果秦军的攻击速度再快一点的话，也许两线进攻的他们，能够抢在赵军之前，先行攻至丹水的西岸，与赵军形成隔岸对垒的态势（这样就相当于占据了一半高平地区）。但在韩国军队的节节抵抗下，赵国还是抢先一步控制了整体呈矩形状的高平地区，并在高平关、界牌岭隘两个可能的突破口处，布置下了第一道防线。



晋城市丹河

虽然赵国军队抢先一步控制了整个晋城盆地北部地区（高平），但这并不代表赵国军队有信心能够阻挡住秦国军队。这一方面是因为当赵国决定接收韩国的上党郡时，秦国已经突破了沁水防线和太行隘，留给赵国军队构筑防线的的时间并不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秦国的军队实际上是从西、南两路展开进攻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赵国认定秦军的主力在哪个方向，他们都无法忽视另一个方向的威胁。

对于处于防御一方的赵军来说，他们所构筑的防御体系并不只会集中在高平关或者界牌岭这两个点上。事实上军事家们通常会沿着敌人可能的攻击路线分层次的布设堡垒，以互为犄角。由于中国历史对于战争的记载

往往是非常简练的，因此我们无法获知当年赵军的具体布阵情况。不过在高平关一线的攻击路线上，还是能够找到诸如光狼城，东、西郭城一类的赵垒故址的。尽管老成持重的廉颇对于仓促之间，将秦军完全封锁在高平地区以外并没有很大的信心，但赵军在这两个点上的抵抗也并非没有意义，这样做最起码可以让赵军有充足的时间来构筑一条甚至数条新的防线。而高平地区那错综复杂的地形，也为赵军的逐级抵抗提供了信心。

如果让我们为整体呈矩形形状的高平地区找一条中轴线的话，那么由高平关向东，或由界牌岭向北所拉出的直线都不适合承担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做纯粹的数学题，而是在为赵国军队找一条能够和秦国军队进行长久拉锯战的分割线。基于这个目的，那条西北——东南走向，对高平地区呈对角线切割的“丹水”，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赵国军队新的前沿阵地。



长平之战第二阶段示意图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赵军有充足的理由将防御的重点放在丹水以东地区（准确说是东北方位）。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高平地区的地缘核心——泫氏邑是在丹水的东侧，并不会让赵国丧失在高平地区的地缘优势。实际上在丹水以东，泫氏邑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城邑。当你顺着丹水河谷的东侧向北行进时，还会在河谷之中找到另一个城邑——长平邑（也就是赵国军队最后抵抗的地方）。之所以

要在泫氏之外，再设一个几乎具有同等重要性的长平邑，是因为由长治盆地直接进入晋城盆地的关隘有两个，道路自然也就有两条。仅靠一个泫氏邑，并不足以完全监控这两条道路。

如果我们在现在的地图上观察穿越长治——晋城两盆地分水岭的道路，会发现东西两条。而其中的东线，看似最为重要，因为不仅 207 国道由此穿越，沟通通长治、晋城两市的长晋高速，也是由此通过。在历史上这条路线也的确是最常用的官道，而军事家们在分水岭上所设立的关隘叫做“故关”（高平一面现在还有故关村，长治一面则有关头村）。也许在战国之时并没有故关之名，但它肯定会以一个战略要点的面目出现在长平之战中。

由故关穿越分水岭之后，并不会马上进入到丹水河谷，而是先会看到一条叫做“小

东仓河”的河流。而顺着“小东仓河”河谷向西南方向行进的话，你很快就能够到达小东仓河——丹水交汇之处，也能够看到高平地区最为重要的城邑“兹氏”邑了。不过小东仓河谷并非是唯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因为如果我们顺着丹水，上溯至它的源头处，也能够找到一条穿越分水岭进入长治盆地的隘口（源头东北方向）。这也正是在这段丹水河谷之中，需要再构筑一个长平邑的原因。

因为无论是秦军还是三晋自己，如果想走丹水河谷进入长治盆地的话，都不一定要在兹氏这个点上渡过丹水，然后再沿丹水东岸向北穿行到长治盆地。选择这条路线的人，完全可以先沿着丹水西岸行走，然后再到合适的时候渡河。既然用来管理丹水河谷（兹氏以北）的城邑叫做“长平邑”，那么穿越分水岭的隘口也就叫做“长平关”了。以长平邑为中心，从兹氏至长平关的这段丹水河谷，最终成为秦军围歼赵军的主战场。也正因为如此，这场战役后来最称之为“长平之战”。只不过我们所说的“长平战区”，基本等同于现在高平市的绝大部分辖区，并不仅指这一带。这也很好理解，要想把四十万大军赶到这样一个河谷地带围歼，如果没有更大范围的战区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想比较小东仓河谷和丹水河谷，哪条通道的使用频率更高，那么最常被选择的应该是东线的小东仓河谷了。一条河谷能够成为主要的通道，并非一定取决于河谷本身的通行难度。实际上在高平地区，各主要河谷两侧的平原都发育得不错，不仅能够提供通行的道路，更能够提供生存城邑、村庄的土地和耕地。按照我们的划分标准，包括小东仓河谷和丹水河谷，都算是有一定自给能力战略通道了（光能开辟道路的话，就是属于峡谷的范畴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哪条道路作为主要道路，就要取决于翻越分水岭的难度了。从这点上看，长平关所在的那段分水岭——丹朱岭要更高些，以至于现在是采取隧道的方式通过这段山岭。有一种说法，丹朱岭也好，丹水也罢，都是因为长平之战而得名。数十万人的鲜血，的确足以让后人联想到“丹”、“朱”二字。不过这些血在两千年前已经流干了，所余下的都是在田间地头经常发现的箭头、遗骨（但基本没有头骨）了。

第五节 赵军和秦军隔丹水构筑防线对垒

当赵军在秦军的两线攻击下，丧失了所有在丹水以西的据点后，也意味着丹水这条对角线，成为秦赵两国在长平战区的分割线。在秦国一面，空仓岭上的高平关和界牌岭两侧的隘口，都已经变身为自己的控制区了。而接下来秦军再想渡过丹水，攻击赵军的主力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赵军在丹水以西的逐级抵抗，让廉颇有了充足的时间来构筑自己的防线。而即将进入拉锯战的秦军，也开始在丹水西侧寻找有利地形，在高地上构筑自己的壁垒，

以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相比而言，秦人的工作量可能会少一点，因为被他们赶到丹水以东的赵军，原先已经在丹水西线的高地上构筑了一些工事。现在秦人只需要再把他们加固并改进一下，以让这些壁垒能够抗御从东而来的攻击。这点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天这条“秦垒”将要遭受赵国数十万大军的攻击。



长平之战第二阶段示意图

另一方面，将防线收缩回丹水以东的赵军，其主力也已经在丹水以东高地上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从赵军的防御任务来看，可以由北至南划分为三个防区，并对应三条河谷：一块就是北线通入长平关的丹水河谷。在这个防区内，长平邑是防御的核心；第二块则是中线由“兹氏”邑所控制的“小东仓河谷”，其主要任务

就是保证“小东仓河谷”的安全。并确保长平邑不至于腹背受敌。

看到“小东仓河谷”这个名字，我们自然会想到会不会还有一条“大东仓河”。没错，在小东仓河的南面，与之平行的位置上的确有一条“大东仓河”。而分割二者的那条山岭向北直指故关所在地，走势非常明显。不过这条山岭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它之上，我们可以找到以七佛山、官甲岭、米山（大粮山）等名称命名的山体。除了靠近泫氏一侧的“七佛山”是因寺庙而得名以外，“官甲岭”和“米山”据说都和当年的赵军有关。据说当年廉颇曾经在此驻军、屯粮，并与秦军相持。

而现在在大东仓河之侧，米山之下还有一个“米山镇”，是据守大东仓河谷的重要据点，也是当年廉颇在南线战区的桥头堡。“米山”之名据说是因为赵军曾经屯粮于此。另一种说法则是廉颇以黄沙代米屯于此，以示有足够的补充和秦军进行持久战。如果从战术的角度看，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点。无论如何，将自己的后勤基地放在这么靠近前线的地方都不是个好办法。在大、小东仓河的纵深处，这些粮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不过，不管米山是否真有赵军的粮草，这个扼守大东仓河谷的据点，都是赵军防御前线的重要一环。

依托丹水以东的山岭，以及长平、泫氏、米山三个战略据点，再依托丹水，大、小东仓河谷纵深所部署的赵军，赵国有了可以和秦军进行长期拉锯战的资本。而时间似乎也站在赵军一方，因为韩国在上党郡的资源（包括人员、物资）目前都已经归属了赵国。即使是从邯郸再调集后援，较之秦军，赵国的补给线也要更短，并且更安全。至于秦国嘛，他们如果想从自己的核心区——“关中平原”运送补给和预备队的话，就要花费成倍的力气了。更为不可预测的是，那些摄于秦军政治恐吓，而暂时没有动静的山东诸侯们，随时有可能站在赵国一边，特别是在秦军无法取胜的状况下（阨与之战，赵国就是用一场胜利让韩国重新站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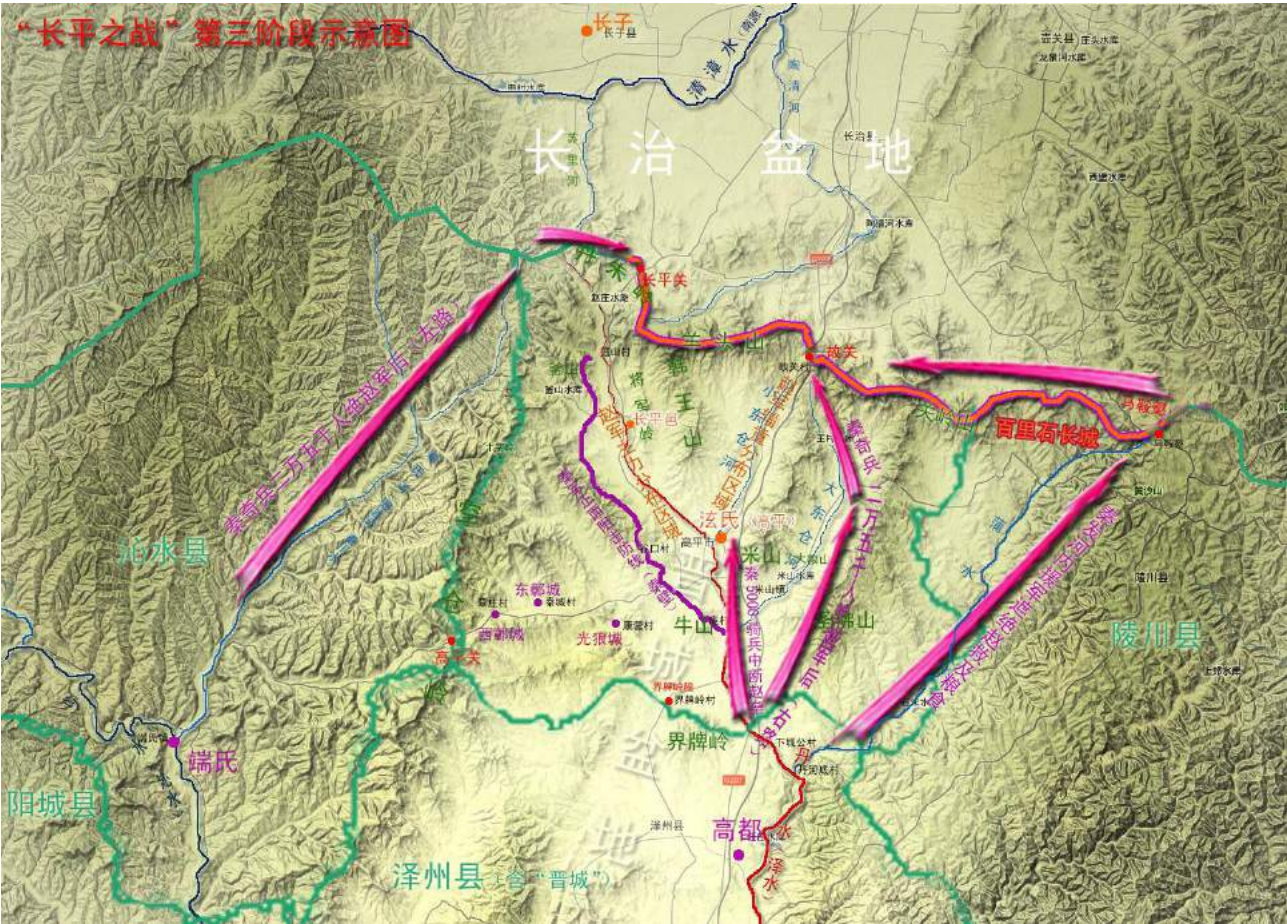
虽然赵国在防守上的优势很大，但如果要横渡丹水进行反攻的话，同样也没有太大胜算。最起码就双方在长平战区所占据的地理优势来看，可以算得上是平分秋色，作为进攻方总是要比防守方投入更多资源的。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廉颇希望和秦军进行持久战，以用时间来拖垮秦军了。而对于补给困难的秦国来说，他们则是非常希望能够快点结束这场战役。如果不是赵国横插一杠的话，已经被孤立的韩国上党郡本来是会很快归属秦国的，所以秦国一开始并没有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第六节 廉颇在分水岭上构筑百里石长城

在秦军持续的攻击中，赵国军队的丹水防线也并非没有被攻破的可能。作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廉颇当然也不会把宝全部押在一条防线上。正如赵军在丹水以西的抵抗，为丹水防线争取了时间一样。当丹水一线成为秦赵双方争夺的主战场时，赵军又在开始构筑他们的第三道防线了。而从防御的角度来看，这条构筑在上党、

晋城两盆地分水岭上的新防线——百里石长城，较前两条更为易守难攻。如果按照廉颇逐级抵抗的战术进行下去的话，秦军很可能在攻入长治盆地之前，就已经耗尽自己的耐心了。

事实上以晋城盆地北部，也就是高平地区的地形来说，并不适合再被切割为两个地缘板块。或者说高平地区整体的树状结构，并无法让秦赵之间，维系一条让双方都感觉到安全的战略平衡线。因此就这一次战役来说，高平地区更多的只是一个胶着的战区。对于双方来说，只有将对方完全挤出整个晋城盆地，才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相持阶段，并且在外交上达成妥协，直到一方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再一次发起攻击。



长平之战第三阶段示意图

如果从大的地缘格局来看，长治盆地和晋城盆地无疑都具有良好的封闭性，如果双方愿意的话，可以各占一个盆地，以两盆地之间的分水岭作为地缘分割线，暂时性地达成外交平衡。从这个角度看，赵国似乎占据了一定优势，因为赵军不仅已经控制了长治盆地，还将触角伸入了晋城盆地的东北部。不过从晋城盆地的整体形势来说，秦国无疑也有一定优势。在赵军到来之前所占据的高都地区，和从赵军手中夺取的丹水以西的高平地区，让秦军在上党高地上有了进行持久战的战略基地。

现在摆在赵国面前的无非有两条路，一条是倾全力将秦军逐出晋城盆地，甚至沁水谷地，真正成为上党之主；另一条就是继续与秦军在长平战区（高平地区）相持，跟秦国比拼国力，最终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前者就好比拳击比赛中的 KO 获胜，后者则比的是个点数。对于老成持重的廉颇来说，相对保守的第二方案自然是首选了。这并非是说廉颇一贯保守，只不过在面对秦国这样级别对手时，谁又有把握能一战定乾坤呢？

既然已经决定和秦国相持下去，那么作为一个审时度势的军事家，廉颇在长治、晋城两盆地之间的分水岭之上，再打造一条永久性的防线就十分有必要了。这样的话，即使赵军不得不退出整个长平战区，赵国也可以据险以自守，继续消耗秦国的耐心。在我们所做的诸多地缘分析中，“分水岭”是个经常出现的名词，并且经常成为两个地缘板块的分割线。在现实生活中，亦常常是两个行政单元的分界线。



福建水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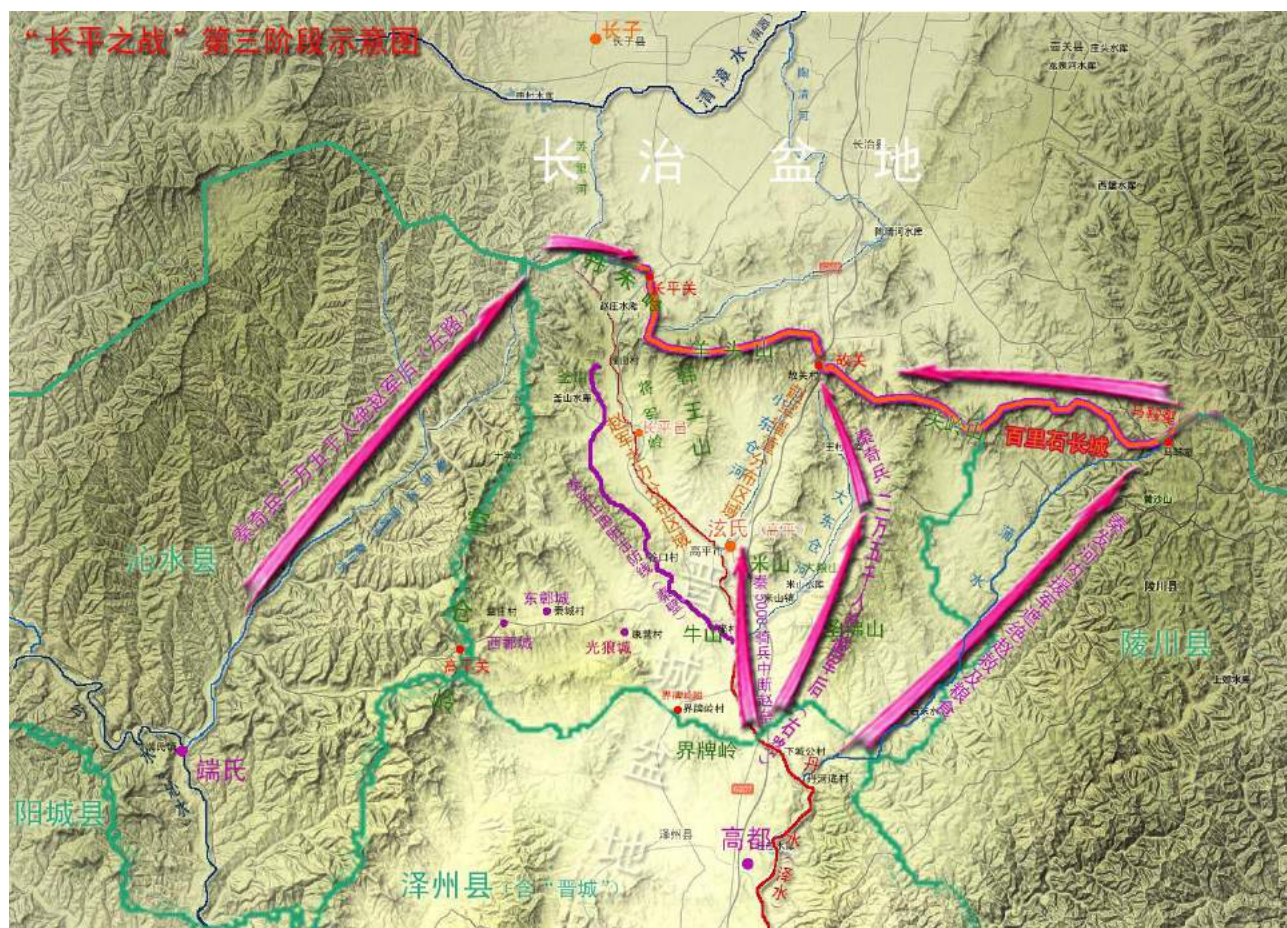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分水岭的两侧会归属于两个不同水系，而被同一水系覆盖的区域，之间的联系会相对密切，特别是在平原面积相对较大的盆地区。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现在，共饮一江（河）水的族群之间，无论是在交通（特别是水路），还是农业灌溉、防洪减灾上都会有更多的交集，在地缘文化上有共同性也就不足为怪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分水岭本身是据有一定高度和连续性的山体，本身就有着较强的分割能力，穿越分水岭的道路也是处在可控的范围内。除了阻碍分水岭两侧的交流以外，在战时更可以成为防御工事的有效依托。

很多人可能对浙江、福建，包括广东之间的省界划分感到疑惑，特别是不清楚福建的划分标准是什么。事实上这片看似密密麻麻的山地丘陵（东南丘陵）之间，也是遵循了一个分水岭原则来划分的，即处于中间的福建省，与浙南、粤东北地区不是处于同一水系。只不过由于福建的所包含的地区基本都是山地，它与南北两省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很难识别罢了。不过如果你花费点时间，将它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标示出来的话，就会很清晰地显露出一张完全属于福建，并延伸到省内各个角落的水网图来了。

对于我们现在所分析的长治、晋城两盆地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容易找到它们之

间分水岭的。这条横亘在长治、晋城两地区之间的分水岭，目前也是这两地区之间的行政分割线。只不过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居住于其下的村落，分别为自己主要活动区域内的那段山体标注了不同的名称，如丹朱岭、羊头山、关岭山等等。不过在历史上，这条分水岭也曾经被人称之为——“秦岭”。之所以会有过这样的称呼，是因为在长平之战中，它曾经为秦军所占据过，并成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天王山。

只是最初看到它的战略价值的，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廉颇。当赵军还在丹水一线与秦军胶着时，一条被后世称之为“百里石长城”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在这条分水岭上诞生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即使秦国能够突破丹水防线，占据泫氏、长平两邑，秦军也很有可能会在百里石长城之下与赵国签订和平协议。



长平之战第三阶段示意图

百里石长城之所以有这么强的防御力，首先是因为它构筑于连续的分水岭上，其所依托的地形本身就是强于长平战区那些互不相连的山体。而连接长治、晋城两大盆地的主要关隘：长平关和故关，也正在这条防线之上。也就是说，赵军只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两个战术入口之上，并依托百里石长城防止秦军寻找小路，打通新的突破口，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防御效果了；其次，这条分水岭本身也有利于以长治盆地为基础防守的赵军一方。因为相对来说，分水岭北侧的地势较缓，而南

侧的落差则较大，非常有利于防御由南侧发起的攻击。

有了百里石长城这碗酒垫底，赵国应当有足够的筹码和秦国打一场持久战了。毕竟相对赵军来说，秦国算是客军，并且韩国在上党郡的人力、物资都已经归属了赵国。秦国短时间内并无法在上党地区获得补给，即使秦军的补给线不会受到韩、魏两国的袭扰，在运输当中的消耗也是很惊人的。不过赵国虽然在运输成本上要低于秦国，但在整体的国力上却不如秦国。已经得到汉中、四川两大盆地，并且将楚国的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收为己用的秦国，其可以征调的粮食与人力，要超出赵国许多，因此在这场持久战中，赵国其实也打得很艰苦。

如果山东诸国肯给予赵国后勤支援的话，那么赵国还是有足够的信心和秦国耗下去的。但问题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在面对一个强大的集权体时，总是会让对方有更多的外交空间。赵国乃至整个山东诸国，在面对秦国时总不能取胜，其根源也正在于此。尽管大家都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在面对秦国谁出头，就攻击谁的威胁之下，坐山观虎斗般的“中立”便成为自然的选择。而对于赵人来说，即使他们有信心独力在战术上抵挡住秦国的进攻，但在清楚粮草不济（北方还要阻挡匈奴），而其他诸侯却不敢借粮的情况下，是否会比秦军更有耐心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既然秦、赵双方在补给上都存在着自己的困难，那么这场已经卷入了上百万军队的持久战，就很快要进入决战阶段了。于是乎，长平之战的主角：赵括和白起终于粉墨登场了。

第三十二章 秦军在长平之战中围歼赵军

第一节 赵军主动进攻丹水西岸的秦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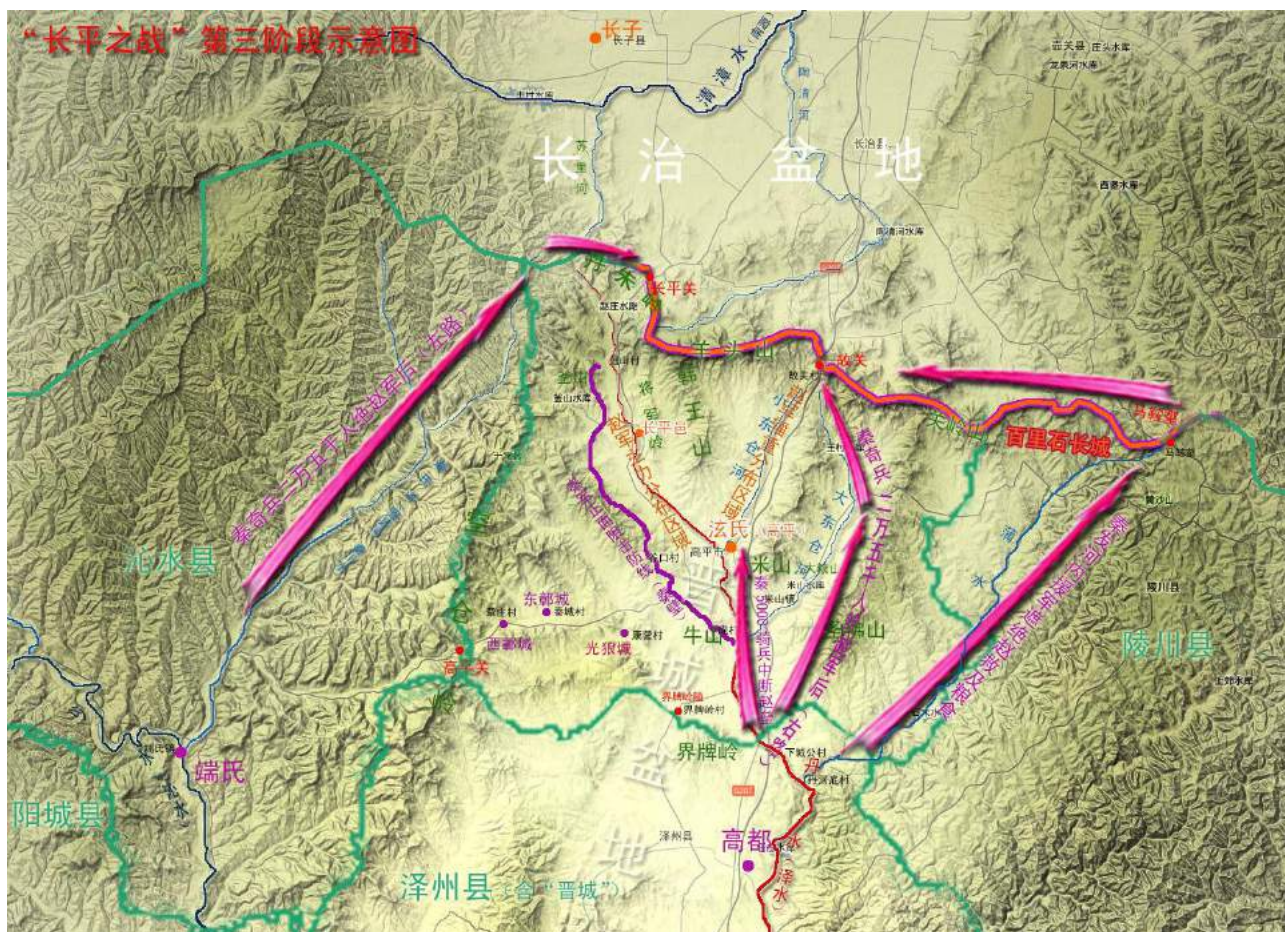
赵括和白起在这场战役中是如何当上赵、秦两军主帅的，我想对历史有些兴趣的人都已经很清楚了。只不过这件事的背景，其实并不像史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因一人之功过，而决定了数十万生灵的性命。事实上真正让赵国改变战术的，还是赵国的国力问题。实际上在后勤补给都存在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一个是有粮路远，一个是路近缺粮），秦、赵两国都有与对方进行决战，一战而定胜负的欲望。只不过作为客军的秦国，更加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因此也一直处在进攻状态。

只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廉颇所采取的保守战术，尽管秦军全力进攻丹水以西的赵军防线，并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特别是从赵军手中夺取了“大东仓河”河谷的控制权。但赵军仍然凭借泫氏、长平两邑，以及分布在丹水上游、小东仓河两侧的将军岭、韩王山、七佛山等山体与秦军进行拉锯。事实上对于赵军来说，只要能够保住丹水河谷（上游）和小东仓河河谷，就能够保证长平关、故关这两条战略通道的通畅，并由此从长治盆地甚至河北平原获得战略补给。退一万步讲，在赵军逐级抵抗的策略下，秦军即使千辛万苦地攻克了泫氏、长平两邑，要想再攻破“百里石长城”也是非常困难的。

有鉴于此，秦军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让赵军放弃这种保守战术，并主动出击，以在野战中迅速消耗掉赵军的有生力量。而这个时候的赵国，也已经被廉颇的保守战术拖得失了耐心。特别是连续丧失了丹水以西地区，以及大东仓河河谷后，让身处邯郸的赵王无法相信，赵军能够在这种节节败退的局面下，最终能够拖死秦军。这个时候的赵括，只是正好迎合了赵国这种决战的欲望。而秦国进行反间的意义则在于，既然一切都是在秦人的计划当中，那么秦国就有足够的时间抢先一步，将一场期待中的野战，进一步升级为伏击战（在战场上，让对手预先清楚你的战略意图，是非常危险的）。

要想让赵军相信自己能够取得决战的胜利，并将主要兵力调出自己的防线，仅仅靠隐藏自己的主帅是不够的。因此秦军最初在赵军的试探性进攻中假装落败，并由丹水以东的赵垒面前（长平——泫氏一线）退至丹水以西的秦垒之后。从赵军的进攻方向来看，他们其实可以有两个主攻方向，除了向西渡过丹水攻击秦军的正面防线外，还可以向南攻击大东仓河河谷，将秦军赶回到丹水以西去。不过从战略上来看，赵括把主攻方向定在西面也并没有错误，因为已经控制了丹水以西地区的秦军，其北线已经离长平关很近了。赵军非常希望将秦军赶出丹水上游地区，为长平关以及长平邑获得足够的缓冲区。

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控制了丹水河谷（上游），才有可能进一步向西攻破秦垒（否则攻占秦军据点后很容易成为突出部），夺回光狼城，东、西鄆城这些据点，并最终据高平关天险以对抗由端氏（沁水谷地）方向攻击而至的秦军。在消除了西线的压力后，赵军就可以集中主力再向南与高都地区的秦军进行决战了。而对于秦军来说，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赵军将主要兵力放在收复丹水河谷上（上游），因为料敌在先的秦军，已经在这里为赵军准备了一张大网。至于秦军是怎么来编织围歼赵军的大网的，后面会有分析。当赵军主动进攻后，很多人所期待的狭义上的“长平之战”，也就拉开了序幕。



长平之战第三阶段示意图

赵军将西线作为主攻方向，而不是急于收复大东仓河谷，并攻击秦军南线的前进基地——高都，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高平关所在的那道山岭是高平市和沁水县的分界线，也是丹水与沁水的分水岭，而现在它的名字叫做“空仓岭”。在当地的传说中，空仓岭之所以得名，是因为白起曾经在岭前故布疑阵，让赵军误以为秦军的粮草都屯于此。如果传说属实的话，赵军拼死希望攻破丹水以西的秦垒也就更加合乎情理了。不过即使传说不是真的，作为秦国的统帅，白起也足以让攻击中的赵军，认为西线才是秦军的薄弱环节。只是当赵军顺利地渡过丹水，追击至秦军依山而建

的壁垒前面时，他们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

对于秦军来说，能够与赵军决战于丹水河谷之中，固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秦军不需要面对赵军所构筑的防御工事，双方所比拼的就是纯粹的战力了。不过这种战法，并不能达到一战而定胜负的目的。即使是秦军在野战之中取得了胜利，也只会是一场击溃战。落败后的赵军会很快退回到他们在丹水东侧的壁垒后面去。如果这样的话，秦军仍然要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也正因为如此，白起所期待的并非是一场野战，而是一场能够最大程度杀伤赵国有生力量的围歼战。

第二节 秦军出奇兵突袭故关和长平关

当秦军准备打一场围歼战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构筑一个大的包围圈，以彻底切断赵军的退路。纵观长平战区的地形，控制了丹水以西地区，以及大东仓河河谷的秦军，无疑已经对赵军形成了一个“C”型包围圈。而要想把这个“C”型包围变为“O”型包围，占据那条横亘在长治、晋城两盆地之间的分水岭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控制了这条分水岭，并集重兵于长平关、故关两个隘口上，前突在长平战区的赵军后路自然也就被断绝了。只是这样一条重要的分水岭，是任何一个军事家都不会忽视的。那位赵军的前主帅廉颇，早已在此修筑了一条百里石长城，作为对抗秦军的核心防线。

如果赵军还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法，秦军要想绕到百里石长城去抄赵军的后路，基本是不可能的。作为赵军的核心防线，这条长城一直是作为准前线在进行布防的。一旦泺氏、长平两邑有失，赵军就会迅速将防御的重点放在这条长城上。在这种情况下，秦军即使找到了合适的路径突袭百里石长城，特别是长平关和故关，也无法获得胜利。不过现在赵军的战术，已经由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进攻了。在秦军诱使之下，赵军的主力已经从丹水以东，转而集结到了丹水以西的河谷之中，并对秦军西线的正面防御阵地展开了猛攻。

所谓此消彼长，之前在防御战中作为防御重心的百里石长城，已经暂时从赵军统帅的视野中消失了。而这种后方空虚的形势，也为秦军包抄赵军的后路提供了机会。现在秦军只需要找到合适的道路，能够避开赵军正面的防区，就有办法完成他们的合围计划了。

如果秦军想在丹水河谷上游或者小东仓河谷找到突破口，包抄赵军的后路显然是不现实的。赵军的主力正集结于此，那种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在乱军当中杀个七进七出的英雄人物，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也无法带领一支军队，突破对手的重重防线完成这样的任务。真要是能够从正面做这样的突破的话，赵军的主力也就基本被击溃了。之所以要提出这点，是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秦军曾经派出一支五千人的骑兵部队，溯小东仓河河谷而上，突袭了故关。事实上这支五千人的敢死

队确实存在（史记中有记载），并且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不过他们并没有突击到故关，也不是用来包抄赵军后路的。

对于秦军来说，他们所包抄的重点就是进入长平战区的两大隘口：长平关和故关。这使得秦军准备用来突袭的部队，也就是史书中所称的“奇兵”被分为两支，其总数约为两万五千人。对于奇袭两个据点来说，这个数量应该是足够了。而提供给这两支奇兵通行的道路，依然与河流分不开。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在人类尚没有足够的能力开山劈路之时，除了YY一下会有天神来帮忙搬山开路（像愚公移山的故事）之外，河流总是会帮助人类开辟出现成的道路的。如果有一天，你在原始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又没有办法向外救援的话，沿着河流前行是你逃脱险境的唯一机会。当然你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顺流行走，否则你发现各种野生动物的概率会远大于进入人类聚居区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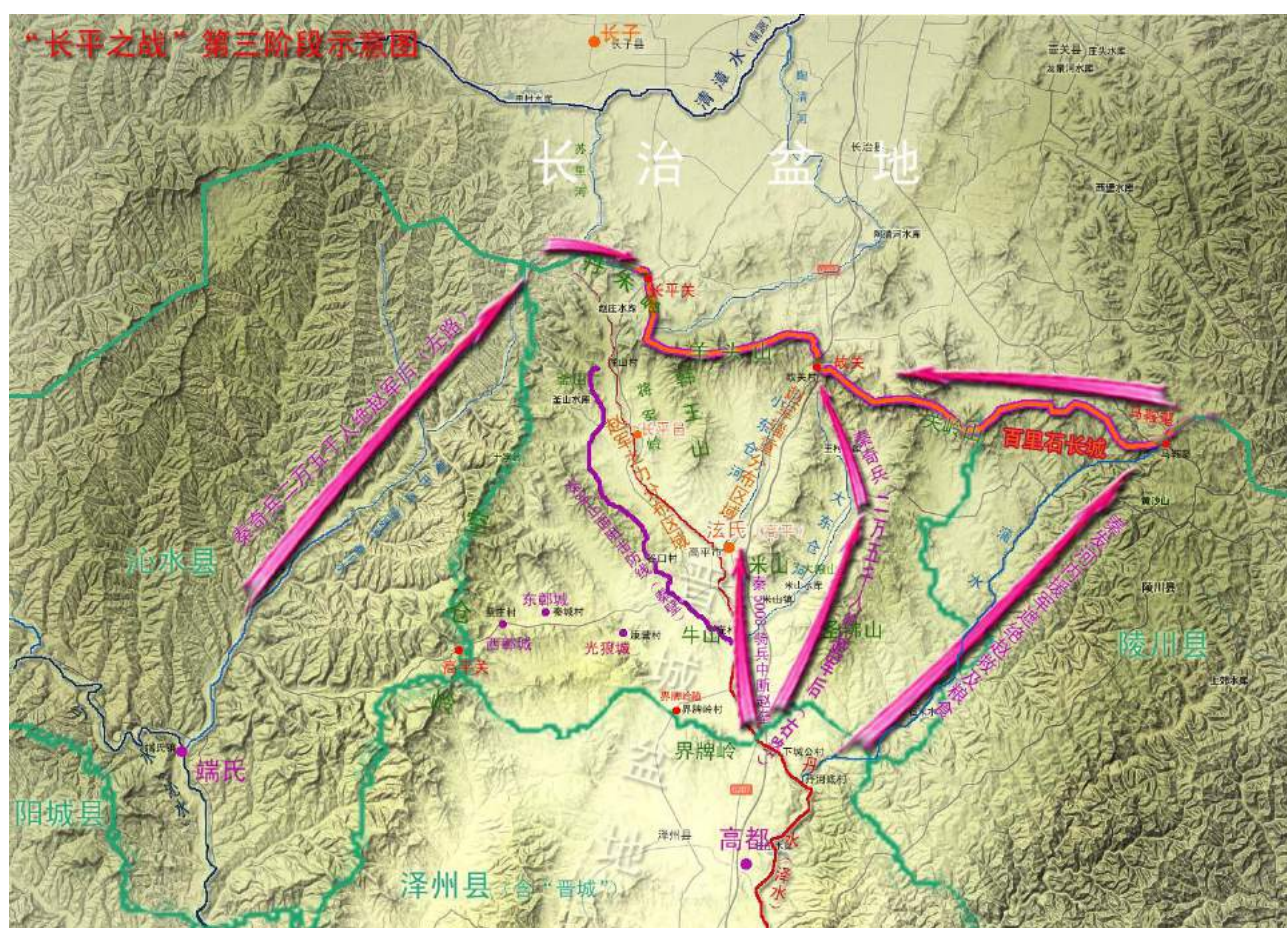
不过对于一支行进中的军队来说，顺流、逆流都无所谓，只要河流能够让他们更加接近既定的目的地就行了。而在秦军的这次突袭行动中，有两条河流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一条就是我们曾多次提到的“大东仓河”，另一条虽然没有在我们的视线中出现过，不过却和我们所知晓的另一个重要城邑“端氏邑”有关，它的名字就叫“端氏河”。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大东仓河的走向，会发现它的源头其实和小东仓河很接近，只是隔了一道分水岭（大粮山处在这条分水岭的南端），而小东仓河的源头即出于故关之南。即使仅从地图上观察，也很容易看出，如果沿大东仓河向北穿越分水岭的话，可以有机会直插故关之下，只不过由于小东仓河河谷直通故关，历来为官道所在，而大东仓河这条路线直至今天在一般的地图上也难觅踪迹（没有高等级公路）。

当然，如果赵军还是以丹水东侧的赵垒以及百里石长城作为防御重点，秦军即使有一支奇兵突破至关下，在小东仓河谷的赵军主力和布防于百里石长城的赵军的夹击下，也没有机会突破关城。不过现在赵军的主力已经集结到了丹水以东，而秦军在正面防线（秦垒）的拼死抵抗，足以让赵军认为这里才是双方决战的战场。正因为如此，秦军一万多人的突击部队才有机会截断小东仓河谷与长治盆地的交通线。

仅仅派遣一支奇兵袭取故关并不足以达成秦军切断赵军后路的战略目的，因此秦军在左路亦安排了一支同数量的奇兵，去攻取长平关，而这一次帮助秦军完成任务的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端氏河”了。所谓“端氏河”，顾名思义肯定是流经端氏邑了。事实上端氏邑的位置也正是在这条河流与沁水交汇之处。作为沁水的一条重要支流，它的源头处（东源）离长平关所在的“丹朱岭”非常接近。正是利用了端氏河的河谷通道，秦军才得以绕开赵军的主力，直插长平关下。需要说明的是，端氏河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秦川水”。和分割长治、晋城盆地的“秦岭”那样，都是因为在长平之战中为秦军取得最后的胜利立下“大功”而得名的。

第三节 秦军切断赵军的后勤补给线

虽然秦军依靠奇袭攻占了长平关和故关两个战略要点，切断了赵军与长治盆地的交通。但如果赵军集结于长平战区的主力回过头来攻击据守于此的秦军的话，这两个点上的秦军并不能坚持太久。要知道，现在被圈在长平战区的赵军已达 40 万之巨，即使这个数字有虚报成分，最起码也是十倍于秦军的抄底部队的。换句话说，秦军的左、右两路奇兵只是完成了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还需要配合其他的军事行动，秦军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长平之战第三阶段示意图

在被秦军截断后路之前，赵国长平战区的部队绝大多数是集结于长平关、泫氏邑、故关所围就的三角形区域中。而鉴于地形条件，这个三角形区域并非是均匀地分布着赵军，由丹水河谷（上游）与小东仓河谷所构成的“V”字形河谷平原，才是赵军的主要集结地。我们很容易发现，高平地区的地缘中心“泫氏”邑，正是位于这两条河谷的连接处，这也正是泫氏（现在的高平市）能够成为晋城盆地北部地缘中心的原因。

当赵军采取保守的防御战术时，赵军的主力部队实际上主要是集结于丹水以东

的（长平邑一线）丹水河谷，以及小东仓河河谷，加上百里石长城，构成了一个铁三角式的防区。由于做好了随时后撤至百里石长城一线的预案，赵军的预备队和辎重基地是被设定在百里石长城之后，也就是长治盆地之中。不过现在，赵括所执行的是攻击任务，因此原先的基于防御而部署的军队也作出了重大的调整。简单点说，就是无论是前线的主力部队（战兵），还是负责后勤辎重的部队都往前移了一个身位。主力部队被集中部署在丹水河谷，特别是丹水以西攻击秦垒的战场上；而后勤部队则相应的驻扎于小东仓河谷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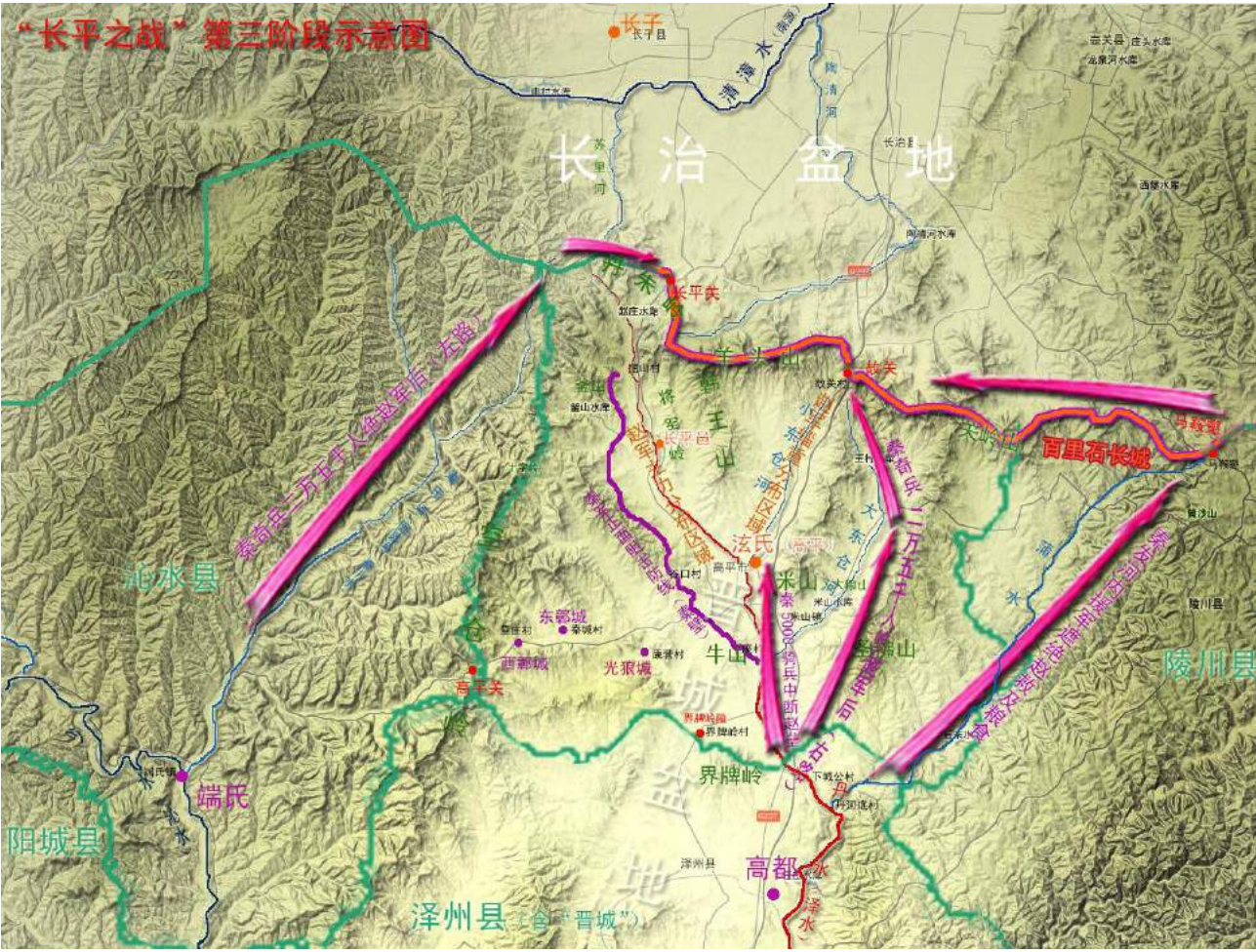
如果赵军执意要向西攻击秦军，他们的这种布局也无可厚非。只是料敌在先的秦军却也因此找到了赵军的七寸（软肋）所在，如果能够有一支精锐部队冲击赵军主力与后勤部队之间的结合部，那么就很有机会中断赵军，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赵军的前线部队有足够的战力，却没有粮食供给；而后勤部队亦没有足够的战斗力来保障辎重的安全。假如赵军还能够控制长平关、故关两个点的话，秦军的这种攻击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因为丹水河谷的主力部队以及小东仓河谷的辎重，都可以很快分别退至长平关和故关之后。这样的话，等于变相帮助赵军收缩了防线，一切又回到了廉颇所预定的防御计划中。而现在，秦军在突袭长平关、故关得手之后，马上实施中断赵军的计划，其战术价值就大大提升了。

为秦军执行这项战术任务的，是五千精锐骑兵。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秦国最为精锐的敢死之师。这支突击部队的任务并不是要攻击赵军重点经营的兹氏邑，而是只需要在小东仓河谷的南端找到一个点，突破赵军防线就可以了。当防线被撕开后，秦军的主力部队就会蜂拥而至，填满这个突破口。可以说，除了固守丹水以西秦垒的秦军外，秦军的机动部队绝大部分都会集结在兹氏邑周边，以防赵军主力向身后攻击，重新打通他们的补给线。

现在，秦军可以说对长平战区的赵军形成了两个包围圈。一个是以长平邑为中心，南至兹氏的丹水河谷；另一处则是兹氏至故关的小东仓河谷。在这两个包围圈中，主要作为后勤基地的小东仓河谷，基本不会有太大的抵抗力。只是截断赵军的秦军能够稳住阵脚后，这些辎重很快会落入秦军之手，而随后秦军会迅速填满小东仓河谷，以防赵军主力试图翻越丹水与小东仓河之间的分水岭：韩王山，重新打通故关通道（作为赵军防区的核心制高点，韩王山及其西面的附岭“将军岭”，都是赵军的控制区）。

虽然秦军已经切割包围了长平战区的赵军，并实际将赵军主力压缩在长平邑南北的这个狭长地带中，但秦军的这个包围圈也并非无懈可击。最大的风险在于秦军还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住百里石长城。一旦赵国倾留守于长治盆地的所有力量，包括从邯郸驰援而来的机动部队向南攻击的话，即使没有能力扭转战局，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也还是很有可能打通一个突破口，将被困的赵军营救出去。这个突破口可能是长平关、故关这样的既有通道，也可能是临时开辟的小路。预防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控制住百里石长城，并以此为依托阻击前来支援的赵军。

虽然百里石长城是由赵军所构筑，并且根据它的地势（南陡北缓）情况，用来防御南来之敌可以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而用来防御北方之敌，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不过对于秦军来说，最大的利好就是赵国除了据守在北方以防匈奴的边防军外，大部分的主力都已经被困在长平战区了。据守百里石长城和可能前来驰援的机动部队，数量都是有限的。问题是，现在秦国的主力也已经纠缠在长平战区（四十万人可不是那么好围的），抽调不出机动部队来占据那条长达百里的“长城”了。



长平之战第三阶段示意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左右两路包抄赵军后路的奇兵所选择的的路径情况，攻击长平关的秦军有机会绕到长平关后面，并奇袭得手；而攻击故关的秦军，则只能由关南发动攻击，并很容易陷入故关守军与驻扎于小东仓河谷的赵军两面夹击之中。其所起的战术作用主要是阻断赵国辎重部队经故关退入长治盆地的可能，并坚守到秦军主力中断赵军，合围赵国辎重部队为止。也就是说，故关这个点并没有被秦军得到。秦军也不能由此绕到百里石长城后面，去清除沿线的赵军。

要想迅速抢占长达百里的“百里石长城”，仅仅是由西端的长平关向东攻击前进是不够的。即使秦国能够想办法征调到足够的攻击部队，也未必能够抢在赵国援

军到来之前得手。并且作为赵军最有可能的突破口，长平关本身的防守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在赵国援军到来之前，留守于百里石长城之后的赵军就会想办法夺回这个点，为赵括所带领的赵国主力部队打通一条生路。究竟秦军是如何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并最终围歼赵军的，就是我们下一节分析的方向了。

第四节 秦军绕至马鞍壑并从南阳动员人力

既然由长平关出发，要想快速占领整条“百里石长城”难度很大，而故关实际上又没有被打通，因此秦军十分有必要再在东线找到一条类似于“端氏河”的河流，为他们指引方向，以绕过百里石长城的正面防线。很幸运的是，在晋城盆地东侧的山地之中，的确存在这样一条河流，而溯这条河流而上，秦军可以到达百里石里长城的东端，在那里有个在平常时期并不为人所重视的隘口：马鞍壑。

马鞍壑没有长平关和故关所在的隘口地缘位置重要，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后两个隘口直接沟通了上党高地腹地的两大盆地，其使用频率明显要高出许多。不过对于有“天下之脊”之称的上党高地来说，核心盆地的面积毕竟有限。围绕着核心盆地的那些山地，虽然地缘潜力偏低，但也并非全无价值。最起码这些山地和穿行于其中的河流、峡谷，可以提供一些通道，以让上党高地内部之间以及和外部的沟通，有更多的选择。像“阙与”所扼守的清漳水通道，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通道。它可以保证赵国在没有占据长治盆地的情况下，仍然有一条直接沟通晋阳和邯郸两都的快速通道。而“马鞍壑”所控制的道路，也是这样一条山地通道。有了它，秦军就有机会在晋城盆地东侧的太行山山地中行进，绕到百里石长城的后面去。

秦军在东线所借助的河流叫做“蒲水”，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它的完整形象了。由于环境的变化和人为的改造，它像上党高地的很多河流一样消失了。不过在地形图上，它千万年来所冲击出的河谷还是清晰可见的，并且有部分河道仍然长期或者季节性的有水流经过。蒲水注入丹水的地点，就在高都邑的东北方向，这里也是长平战役第一阶段，廉颇所构筑防线的最南端。而河流的源头处，就在分水岭（长治、晋城盆地）的东端，也就我们刚才所说的“马鞍壑”。

并不能说赵军没有注意到这条山地通道有可能为秦军所用，否则廉颇也不会把百里石长城一起延伸到此了。问题是现在赵军的主力已经被困在长城以南的长平战区，并且长平关、故关两个点都或已陷于秦军之手，或已面对秦军的兵临城下。赵军留守在长城之后为数不多的军事力量，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西线，以求被困的赵军能够重新打通这两条生死线（特别是长平关）。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是防御重点的马鞍壑，其还能有多少的防御力就可想而知了。

基于赵军已无力防守整条百里石防线，现在摆在秦军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沿蒲水而上快速通过马鞍壑，而是还有没有预备队可以覆盖住整条百里石长城

了。固然秦军现在所控制的国土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诸侯国，真要拼起人力资源来，赵国肯定是拼不过的。不过留给秦国的时间却并不多，因为无论出于何种角度，赵国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这40万的有生力量，邯郸方面也一定要倾其所有准备援军。

假如秦国要想抢在赵国之前，将组织起来的预备队部署在百里石长城一线，那么他们动员预备队的区域，离前线的距离就不能比邯郸更远。如果动作够快的话，在位于上党高地以西的河东地区抽调壮丁应该也是一个选择，毕竟秦军在河东的经营也有一段时间了。问题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其规模早已超出了双方之前的预想，为了能够占据优势，双方已经相继投入了数十万的军队，总数甚至已接近百万。也就是说，河东之地能够抽调的壮丁，其实早就投入了长平战区了。

既然貌似离战区最近的河东地区已经没有可调集的人力资源了（还要有足够的力量与太原盆地方向的赵军对峙，以防对手施展“围魏救赵”之策。而赵国在晋阳方向的兵力，基于同样的理由也不能抽调）。那么是不是秦国就必须从关中平原的秦国西部，甚至更远的汉中、南阳之地征调人力呢？答案当然否定的。因为在秦国的控制区中，还有一个离长平战区更近的区域没有进行过战争动员，这个地区就是以“野王”邑为中心的，与邯郸同属于“河内”这个地缘概念的韩国“南阳之地”。

事实上就这场战事开始时间而言，从秦国占领韩国的“南阳之地”，切断上党郡与韩国本核心区之间的联系就可以算起了。只不过事情闹得这么大，最后把赵国卷进来，并且演变成秦赵两国之间的大决战，在之前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对于这样一块刚刚到手的敌国土地，作为战胜国来说，用以战养战的方式，从中获得补给甚至保障后勤的民夫，当然是必需的。只是如果作为战士放在前线，却还言之尚早。最起码要等到秦国的行政机构全部到位，理清这块“生地”的社会结构，并用秦国的法令将之控制起来后，方可作为稳定的基地。

至于说要有对秦国的国家认同感，那最起码要等到有一代出生在秦国统治之下的青壮年成长起来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秦国在攻灭巴蜀之后，等待了三十多年才从蜀地抽调兵力发起对楚地攻击，而攻占南阳盆地、江汉平原后，没有再乘胜南追的根本原因。吃进来的东西，总是需要点时间来消化的。只是现在的秦国已经没时间等待韩国的“南阳之地”被消化为熟地了，秦人需要用非常的手段，迅速将这块土地上可以动员起来的壮丁动员起来，并马上投入到前线。

秦国的法令之严，在列国之中是出了名的，即使是王子、贵族也没有例外。这种高度条例化、集中化的社会结构，固然让秦国的生产、战斗效率大为提升，却也让其他诸侯国的普通百姓非常恐惧成为秦国的一员。韩国上党郡的军民之所以选择投奔了赵国，而不是依照韩王命令向秦国投降，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而现在，这些国籍刚刚由韩变成秦的“河内”之人，只要出征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从而步入有产阶级的行列，其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而秦国的这次“法外开恩”

的举动，亦足以证明秦国把最后的杀手锏也使出来了。

第五节 秦军坑杀突围失败且粮尽而降的赵军

可以肯定的是，秦国施展反间计，让赵括取代廉颇成为赵军主帅，并秘密调白起至前线时，就已经为这场最后的围歼战做好了预案（包括之前包抄、中断赵军的线路选择，以及河内的动员）。因此秦军才能在攻击和后勤的效率上快过赵国。

而面对秦国的这种高效率，赵军现在则陷入了死地。一方面由于百里石长城被秦国新动员的预备队所占据，切断了赵国援军与粮草补给部队的一切路线。另一方面，赵国在丹水河谷以及小东仓河河谷的四十万大军，也已经被一切两半，面临着有兵（战斗人员）无粮，有粮无兵的境地。当小东仓河的赵军辎重落入秦军之手后，赵军的主力就只能凭借最后的战斗力拼死向秦军的防线发动攻击，以期突破百里石防线，退入长治盆地。

也许有人无法理解赵军为什么不能够突破百里石长城。的确，按照常理，赵国在最后被合围之时，尚有四十万人之众，被围于丹水河谷的战斗人员也肯定超过十万。以如此强大的兵力，应该是能够在秦军的防线上撕破一个口子的（赵国的单兵战斗力，以及战术素养并不低于秦国）。按照孙子兵法的说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这种大包围的围歼战，如果不借助地形优势的话，需要有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才可以达到全歼的效果。即使是借助地形的优势，集结在长平战区的秦军也不会比赵军多多少。凭借秦军的战力，在野战中击溃赵军，甚至杀伤半数的赵军也并非不可能。但将四十万大军全数围歼，的确也是难以想象的。

秦军之所以能够做到，一方面还是因为长平战区的地形原因。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在秦国这个最后的包围圈中，赵军向南（高都地区）、向西（端氏地区）突围的意义都不大，这两个方向早在赵军进入长平战区之前就被秦军控制了，其纵深足以让赵军刚出龙潭又入虎穴。而向东由韩王山冲击小东仓河谷，打通故关通道，固然也是一种选择。问题是先行围歼了赵军辎重部队的秦军，已经填满了这个区域，特别是由“马鞍壑”包抄百里石长城的秦“河内援军”已经控制了包括故关在内的整条防线。赵军就算能够拼掉小东仓河的秦军，面对自己打造的这条“南陡北缓”的“长城”，也只能望城兴叹了。

唯一相对的薄弱点就是长平关了。突破了这个点，赵军就可以直接进入长治盆地，向北到达赵国所控制的“长子邑”（今长子县西）。不过，赵军能够看到这个点的重要性，秦军自然也看到了，在此布以重兵也是必然的，而赵国纵有数十万大军，由于战斗面的纵深问题，每次能够用来冲击长平关的兵力也是有限的，未必会比据守于此的秦军多（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

地形有利于秦军，固然是秦军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不过让数十万赵军完

全丧失战斗力的，还是粮食。如果没有补给的话，赵国纵有百万大军也无济于事。至于说赵军的前线补给困难，我们已经交待过了。在小东仓河谷皆已陷于秦军之后，丹水河谷的赵军主力随身所携带的军粮有多少，我们也无法得知具体的数字。不过可以参照的是，两千多年后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工业化时代的战争，其中所拥有后勤优势的一方将对手的攻势总结为“礼拜攻势”，这种经验使得美国在战争后期根本不用去和志愿军硬碰硬，只需静待他们随身所携带的补给耗尽，就可以轻易地夺回失去的阵地。

当年的秦军也正是这样守在防线之后，静待赵军耗尽他们最后的食物。而当赵军拼尽最后的力气实施突围时，等待他们的就将是闻名于天下的“秦弩”，以至于现在居住于此的农民在耕种时，还能够不时地挖出数量可观的箭头。不管赵军随身携带的军粮有没有比志愿军更多，在坚守了四十六天，将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完了之后（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赵军投降了。



长平之战

而作为赵军的主帅——赵括，则在最后一次突围中亲自上阵，并被秦军射杀。自此，长平之战结束。至于那四十万降卒（最后活着的应该没有这个数字了）的命运，无论是不是真的被活埋的（坑杀的异议古已有之），其命运都是一样的。而解决数量如此庞大的降卒，难度其实并不是太大。即使是让那些世界级的拳王饿上一周，你也能够轻易把他解决掉。由于秦军对于首级的渴望，我个人更相信他们会高效率

地用刀解决问题，而基于秦军同样有数十万的数量，这场屠杀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旷日持久而又意义重大的长平之战结束了。秦国也终于打垮了统一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劲敌，只是胜利之后的秦军并没有立即开启统一六国的进程。至于个中原因，则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方向。不过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数，在赵括死的那一年（前259年），赵都邯郸诞生了一个婴儿。尽管这个婴儿的身世成为千古之谜，但他成人后却成为六国的最后终结者，他就是“秦始皇”。

第三十三章 秦军围攻邯郸并被魏楚援军击退

第一节 赵国拒割让土地引起秦军进攻邯郸

按照一般的想法，秦国在长平之战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接下来就应该乘胜追击，一举攻入邯郸灭了赵国。事实上秦军确实也尝试这样做了，兵分两路的秦军，一路向晋阳出发，攻取了整个太原盆地；另一路则当然是以邯郸为目标了。不过在占据了靠近邯郸的卫城“武安”之后，秦国对于是否要继续扩大战果产生了犹豫。毕竟在战场之上，“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辩证关系是永远存在的。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长平之战”后，秦国本身也已经元气大伤。

即使是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军事家（战术）白起，也认为如果秦国再卷入一场大型攻坚战的话（基于邯郸城的坚固程度和重要性，这场战役所持续的时间肯定会超出长平之战），并没有取胜的把握，并且很有可能让坐山观虎斗的其他诸侯有机可乘。更大的问题是，秦国虽然占据了上党腹地的几大盆地，但在经过这场大战之后，上党腹地的农业潜力已大受影响（有劳动力和战斗力的人口在战争中基本都消耗掉了）。秦国要想控制上党高地，一方面还需要由腹地继续提供补给，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休养生息了。当然，比秦国损失更大的赵国，也同样需要时间来休整。在这种情况下，在秦赵双方，加上韩国之间达成停战协议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

对于作为战胜国的秦国来说，并没有理由无条件的和赵、韩两国达成停战协议。按照通常的外交准则，战败方会更渴望和平，因此也必须付出一定代价。而秦国所开出的条件就是，让韩国割让他们在河济平原之上的唯一据点“垣雍”邑（河南省原阳县西北），以作为秦国下一步向河济平原渗透的跳板；而赵国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更大了，秦国需要赵国拿出六座城邑，以为它的上党驻军提供补给。

从韩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根本没有和秦国谈判的资本，更何况就河济平原这个地理单元来说，韩国之所以在它的西端保有一个据点，无非是为了让地处中原的韩国本部，与河北平原的“南阳之地”结合得更紧密。现在韩国在黄河以北已无寸土了，这个突出部也失去了价值。所以秦国很顺利地拿到了“垣雍”，向陶邑这块飞地又跨出了一步。

不过赵国这边，“土地换和平”的计划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尽管赵国现在比秦国更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但他们也同样清楚，秦国是绝不可能就此罢休的，这种交换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此消彼长，结果反而会让秦国的攻击来得更快，更猛烈。既然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么赵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并做好了在邯郸城与秦国血战到底的准备。知晓这段历史的大多数人都很难理解，在经历过这么重大的损失之后，赵国居然还敢和秦国硬顶，难道赵国的战争潜力还没有被完全打

掉吗？

如果从战术的角度看，支撑赵国继续与秦国对抗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赵国也清楚，长平之战后的秦军其实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上党高地本身又暂时失去了补给能力，如果自己能支撑一段时间，秦军就可能会撤了；另一个原因，就是赵国对于邯郸城的防御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在当年被魏国攻破之后，痛定思痛的赵国对于邯郸城内外防线已经经营了数十年，要想攻破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除去战术因素，支撑赵国打下去的还有两个战略因素，一是赵国的领土和人口虽然在六国之中只是居中，但动员能力却是最强的。这主要是因为赵国多年以来，将北方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并且在赵武灵王之后实行“胡服骑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赵国，从地缘文化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半耕半牧的混合体了。在军事架构上，更与游牧民族相一致，即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亦进行以骑射为主的军事训练，如果要进行全国动员的话，可以迅速形成战斗力。当然，人力资源是有限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你的农业生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拖得时间太久，国力会大受影响。

在发出最后的动员令后，赵国仍然抱有希望的另一个战略因素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在外交上有所突破。谁都知道，赵国如果被灭的话，对于其他诸侯意味着什么。虽然秦国也在竭力通过外交途径（收买与恐吓）阻止外力介入秦赵之间的战争，但只要赵国仍在抵抗，就不排除有诸侯愿意出手相救，打破秦、赵之间的平衡。秦国显然没有预料到赵国的强硬态度，形势也变得有点骑虎难下了。

其实对于秦国来说，如果不去攻击邯郸，赵国也绝没有力量和想法“收复”上党高地甚至太原盆地。秦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稳固自己在上党高地及太原盆地的统治，为下一阶段的战事作好充足的准备。问题是，作为战胜国的秦国已经提出了自己认为合理的条件，如果就这样被赵国挡了回来而没有所动作的话，那么对秦国的负面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出于政治的考虑，秦国必须给赵国一个教训（也是做给其他诸侯看的），看看邯郸城是否还有足够的战力来阻挡秦军。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并非就一定是一个对战争极度渴望的好战分子，而是应当会审时度势，不打无把握之仗。从这个角度看，白起无疑是对得起“战神”这个称号的，这也是他能够取得常胜战绩的基本准则。虽然拒绝指挥邯郸之战的白起，最终因此而失势身死，但邯郸之战的结果却验证了他的军事判断力。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除了赵国自身原因外，外部的支援成了决定战局的关键。而帮助赵国力挽狂澜的就是战国史上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信陵君”。

第二节 信陵君和春申君领军解邯郸之围

略知战国史的人，应当都知晓“信陵君”这个人。而他在战国政治舞台的崛起，正是由于秦国这次的围攻邯郸之战（公元前 257 年）。其实无论是在长平之战，还

是现在的邯郸之战，秦国最为担心的都是关东其他诸侯加入到赵国阵营中，特别是双方处在胶着状态时。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变为现实，秦国在外交上可以说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致，而这其中的重点防范对象就是魏国了。

无论是身处当时的诸侯们，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十分清楚，如果赵国完蛋了，接下来倒霉的就一定是韩、魏两国了。只不过韩国这个二流诸侯，早已只能够凭借外交手段在夹缝中求生存，无论是敌是友在战略上作用都不大了，因此最有可能支援赵国的，就是魏国了。最后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当赵国向魏国求援，并挑明唇亡齿寒的道理时，魏王（魏安厘王）决定派出援军支援邯郸。

问题是，秦国也早已预料到魏国会有此举动，因此在赵国求援的同时，秦国的外交压力也被直接传达到了大梁城。秦人的意思很简单，谁出头我就打谁。在这种情况下，魏王又一次犹豫了，所派出去的十万援军在到达漳水南岸后便停滞不前。就像我们在马路中间看到一辆车迎面开来，而又无法判定它的行驶方向时，本能的反应就是止步不前，以根据对方的变化而变化（不信可以试试）。魏国的这种犹豫也是这样一种本能反应，魏王需要看看局势是如何发展的，以决定押宝的方向。

只是魏人可以又一次坐山观虎斗，被围困的赵人却等不下去了。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就算赵国能够凭借坚固的城防措施，以及全面动员所迅速组织起来的军队抵挡住秦军，他们也必将面临和长平赵军一样的命运，只不过这一次整个赵国都将面临无粮可食的境地了（劳动力基本都被从耕地转移到战场了）。所以对于赵国来说，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的赵国平原君向他的小舅子（平原君的妻子是信陵君的姐姐），即同样位列四公子之一的魏国“信陵君”求援，而后者也因此而上演了“窃符救赵”的惊人之举。

“窃符救赵”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经典了，所以细节也就不多加描述了，不太清楚的可以自行查找一下。从表面上看，信陵君是由于与平原君的姻亲关系而冒死救赵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之举。因为如果赵国有失的话，秦军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魏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当还没有事到临头时，总还是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时间能够改变一切。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有这样的弱点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如果是一个政治家，就不一样了，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决断力（管理者也是一样的）。魏王并非不知道秦国灭赵之后的后果，只不过较之信陵君而言，缺少一点决断力罢了。

从战术上来看，信陵君选择在这个时候救赵，时机也是很不错的。秦国自从攻击韩国“南阳之地”以后，就处在连续作战的状态，特别是在长平之战中自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消耗，因此这个时候和死守邯郸城的赵军里应外合，秦军很可能因此而溃败。既然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决定，而不是信陵君的义气之举，那么也应当有其他有远见的政治家或者诸侯国能够看到这点了。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楚国也同样看到了这点。

当然，按照外交规则，楚国也一定是在赵国的求援之下，才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而为赵国执行这项外交任务的，还是平原君。只不过说服楚王的关键人物，是平原君的一个门客“毛遂”。立下大功的毛遂，其自荐的故事也成就了一句尽人皆知的成语（毛遂自荐）。从楚国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非常想去捡这个便宜的，毕竟自郢都失守后，秦军气势如虹，楚国也一直没有机会反击。而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楚国当然不甘心就此沦为了一个看客。现在经过赵国以命相搏后，秦国的后劲明显有些不足了，对于楚国也说，也正是显示实力的好机会。

为楚国领命出击的也是同样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加上平原君、信陵君，战国四公子算是到齐了三个。而邯郸城下的秦军，对于魏楚联军的到来，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经历过那么多场胜利后，邯郸城下的秦军显然没有预料到，有谁在自己占据上风时，还敢去支持对手（“阙与之战”时，魏、韩两军是在赵军突袭得手后才见风使舵的）。特别是之前的魏国已经慑于秦国的外交恐吓，在秦赵边境裹足不前了，这更加让秦军有恃无恐执行他们的围攻计划了。

有了魏、楚两国的援军，邯郸之围算是被解了，赵国也由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这次战役所造成的军事及政治后果，却远没有结束。特别是魏国就此迎来了一次重新登上政治之巅的机会，虽然这只是一场濒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第三节 信陵君率魏楚联军追击秦军

秦军在邯郸城下的失败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战役的失败，事实上取胜之后的魏楚联军一直追击秦军至河东，甚至一度将秦军逼过黄河。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果，很大程度是因为围攻邯郸长达十七个月的秦军，所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有限了。而作为前进基地的上党高地，也已经十分空虚了。

并且作为攻击方的秦军，并不认为上党高地会受到来自东方的攻击（只有他打别人的份），因此也不可能像当日廉颇那样，精心构筑防线了。正因为如此，回撤的那部分秦军（除掉被歼和投降外），并没有凭借上党之险稳住阵脚，而是一直退到河东才组织起了像样的抵抗。虽然秦军回撤到河西之后，很快就发起了反击，并夺回了河东。不过能够替魏国在弃守河东数十年后，“光复”一次故土，信陵君的这次救赵之举，也算是大获全胜了。

其实让那不到十万的魏军去守住河东那么一大片土地，本身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魏国不追究信陵君斩将夺权之罪，为其提供支援，也不可能守得住河东（现在秦、魏的实力对比，与当日弃守河东时差距更大了）。因此信陵君在秦军发起反击后，就率领魏楚联军退了回去。不过有着山河之险的长治、晋城两盆地再放弃就没有必要了。虽说魏国在河东已经没有了利益，但鉴于占据韩国“南阳之地”的秦军，一直对魏国的那部分河内之地虎视眈眈，魏国也很有必要在位置相对应的上党高地上，

即“晋城盆地”据守一块缓冲地。以防止秦军再一次攻入上党高地，让自己陷入两面包围的境地。

至于说长治盆地，得失与否与魏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块区域的防守还是交给赵人去做吧。当然，如果魏国想把整个上党高地（腹地）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获救之后的赵国也绝不会想来分配战利品。只是现在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东征西讨的超级大国了，一场胜利并无法改变秦国一超独霸的战略格局。在这种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维指导下，将自己的防线拉长并不是个好主意。

也许有人认为信陵君的胜利与魏国无关，只是他的个人成就。事实上信陵君并没有背叛魏国，自始至终都是率领魏军进行援赵之役的。而在解了邯郸之围并收复上党之后，援赵的魏军，连同晋城盆地那块缓冲之地（高都）都被交还给了魏国。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信陵君个人选择了留驻邯郸。毕竟当日之举虽然于战略上没有问题，也为魏国重振了声威。但终究于君臣之义有失，如果不是愚忠到底的话，还是没有必要回去接受责罚的（后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自杀以全名节的情况就多了）。

虽说信陵军领军救赵是一种以下犯上的行为，但从结果来看，倒是帮助魏王下了决定，并不能算是置魏国的利益于不顾。因为魏王也并非看不到赵亡之后的后果，否则也不会置重兵于秦赵边境。如果让狗血一点的导演来写这段历史的话，也许会将魏王描述成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明知信陵君有救赵之心，而故意放任其窃符救赵。如果取胜了，自然是好事；如果败了的话，则可将责任推在信陵君身上，为对秦外交赢得空间。

虽然这种设想在正史、野史中都没有记载，但谁又能肯定魏王当时不是这样想的呢？所以深究历史人物的内心想法，其实是很难探究历史真相的（悲剧的是，现在的历史研究基本都是从这个角度着手）。对于我们来说，从当时的战略格局和结果上来分析，也许能更接近历史真相。不管怎么说，以魏军为主、楚军为辅的这次救赵行动是取得了成功。作了胜利方的魏、楚两国，即使自知无法真正实现大反攻，但在自己的后院威风一把还是可以的。

对于魏国来说，最让他坐立不安的就是秦国通过攻齐之役，所占据的那块飞地“陶邑”了。借着信陵君在前线的大胜，魏国顺势拔除了这颗钉子。至于说同为战胜国的楚国，他们当然也不会放弃这次重振国威的机会。在魏国拔除陶邑的同时，陶邑的东邻“鲁国”成为最新的牺牲品。当年东西纵横于中央之国南部的楚国，大有在东部以江东、泗淮流域为基础重新布局的架势。

第三十四章 信陵君率五国联军击退秦军

第一节 秦国进攻韩魏并灭亡东西两周

虽然在邯郸遭遇了重大失败，但秦国的国力摆在那，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东进的步伐。当然，再来啃一次上党高地这块硬骨头，暂时也没有这个能力了。现在从战略格局上来看，似乎又回到了秦攻上党之前的格局。不过仔细分析，秦国较之前还是前进了一大步，首先消灭了最大敌人赵国四十多万的有生力量，自此赵国再也无力独自抵抗秦国了；其次秦国在长平之战前，在河内所占据的那块基地（韩之南阳）还握在手中，因此秦国接下来仍旧以黄河两岸为主线，向三晋发起新一轮的攻击。

除了向北攻击魏国在河内的城邑以外（以实践谁出头就打谁的诺言），黄河以南的韩国同样没有偏安的机会。韩国在丧失了黄河以北的土地后，就只剩下河、济以南，紧邻洛阳盆地的那块郑国故地了。以秦国的实力而言，韩国想独自抵挡秦军的进攻基本是不可能的。依韩国过往的生存法则，他们是一定想要通过外交手段，或将祸水引给其他诸侯，或者想办法让秦国觉得自己的存在，更有利于秦国的扩张。只是这次韩国人还没急，就已经有人抢在前面出头了。不过这次挑头的却并非韩国的两个三晋兄弟，而是那个没落的王族——西周。

东、西两周之所以能够在洛阳盆地生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和韩国一样，从来不给过路的诸侯们增加阻力，甚至是极力讨好。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王室的余威，虽然其间不止一个诸侯（特别是秦、楚）曾经打过王室的主意，但考虑到政治风险都还是放弃了。不过现在的局势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秦国所图的显然已经不是霸业，而是“王”业了。如果再这样干等下去的话，韩亡之后，两周的灭亡也就在转瞬之间了。因此处在秦国东进最前沿的西周（都城洛邑）首先坐不住了，在当了那么多年的缩头乌龟后终于男人了一次，挑头联合各路诸侯出伊阙攻击秦军。

结果正应了那句老话“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各怀心事的联军很快就溃败了，强出头的西周也就此亡国（公元前 255 年），六年以后，同样也希望在濒死前一搏的东周（还只在谋划之中），也“享受”了同等待遇。而秦国在将象征天下权力的“九鼎”运回关中后，对于这个没落王族最后的致敬就是，遵循灭国不祀的古训，留给他们一小块封地以祭奠先人。

占据了整个洛阳盆地的秦国，开始沿着黄河两岸向东切割，不仅进一步压缩了韩国的空间，更直接进逼到魏都“大梁”之西。而魏国则不可避免地承受了最大的压力，以至于想把河内残余的据点都移交给赵国，让赵国在河北平原与秦国直接交锋，以缓解魏国正面的压力。而赵国这边，虽然邯郸城暂时没有再被围攻的危险了，但他们西面的国土核心“太原盆地”却在邯郸之围被解 8 年后（公元前 247 年），

陷于秦人之手了。

第二节 魏国决定领导诸国合纵抗秦

现在，面对拥有强大资源的秦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诸侯们再次联手，变被动防守为主动攻击，看看能不能把秦人突入华北平原的突出部给挤压回去，让崤函之险重新成为阻隔秦人东进的天险。理论上在秦国一支独大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诸侯都是没有实力和秦国单独 PK 的。秦国的实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土足够大，且粮食、人口潜力巨大的平原区最多，渭河平原、运城盆地、临汾盆地、洛阳盆地、太原盆地、川西平原、江汉平原、汉中盆地、洞庭湖平原……可以说，天下半数的产粮区都归属了秦国；二是秦国的“耕战”政策，是执行得最到位的。

就资源的利用率和权力的集中度来说，秦国都是最高的。也就是说，秦国本身就是一台高效率的战争机器。这点甚至后世的任何朝代都难以望其项背。只不过这种以“法家”思想为主导，高度集中的“耕战”体系，用来打天下固然可怕，但用来坐天下却是问题多多（弦绷得太紧了，容易断）。所以秦朝二世而亡，后来的汉帝国吸取教训，用儒、道两学来平衡社会结构，并由此建立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价值观。

既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对抗秦国，那么诸侯们唯一翻盘的可能性就是联合起来了。如果集中山东诸国的全部力量，还是可以从实力上压倒秦国的。就像长平之战中如果其他诸侯肯向赵国提供后勤补给的话，以赵国的战力和地形之便，完全可以在上党与秦国周旋到底，而不至于和秦国硬碰硬。只不过相比于高度集中的秦国，各怀心事的诸侯们虽然都意识到了联合的重要性，但秦国谁出头就先打谁的威胁，在大多数时候诸侯国都还是愿意看着别人去和秦国死拼。即使能够“合纵”抗秦，这种松散的联盟亦无法持久，往往一场战役之后，无论胜负都宣告解体了。

在秦国已经渗透到大梁西郊时，魏国终于有了国之将亡的感觉了。因为秦人这次是步步为营的将控制区延伸过来，而不是越地远征。如果让秦人站稳了脚跟，就算大梁城还能够坚持个三、五年，被攻破也是迟早的事。所以魏国决心做一回盟主，挑头合纵，以抗强秦。想合纵的话，首先要给你的合作伙伴以信心，或者说能够有一个统帅有过战胜秦军的经验。这个人选，当然非信陵君莫属了。虽然信陵君由于之前的犯上行为避祸于赵国，但并没有背叛魏国，他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安全保证罢了。现在的形势，魏国已经决心将国运交给信陵君去打理了，上任魏军以及联军主帅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魏国挑头的这次合纵联盟中，并没有集中全部的山东诸侯。同样被秦国直接打压的韩、赵两国的加入，自不在话下。而之前在解邯郸之围中，已经主动出击过的楚国，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至于说齐国，就有些问题了。自从秦国决心从

形势变化多样的“合纵连横”游戏中脱身，执行目标明确的“远交近攻”战略后，地处中央之国最东部的齐国就一直是秦国的战略盟友。秦国对于这个盟友的要求就是，并不一定需要你出手相助，但最起码要保持中立。而齐国也很满足于这种状态，尤其是秦国的那块飞地“陶”，从此再也不会以齐国为扩张方向了。从战略上来说，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缺乏远见的。只是面对纷杂的国际形势，能够“安全”的躲在后面静观形势之变，这种诱惑不是谁都能挡得住的。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赵国独自抗秦，还是魏国此次的合纵攻秦，齐国都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再说下燕国，他们则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当然最后燕国也参与了此次联盟。也许会有人感到奇怪，现在大家共同的敌人就是秦国，而从地缘格局上来看，秦国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和燕国发生正面冲突。难道是燕国的北部边境被东胡所攻破了？事实并非如此，燕国这次其实败于赵国之手，不过起因却还是因为秦国。这个世界上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却总是有。在坐山观虎斗，并得知赵国的四十万精锐尽陷于长平之后，燕国感到自己向南扩张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问题是燕国的动作还是有点慢（或者说观察的时间长了点），并不是在赵国新败于长平之时丢这块石头，而是在邯郸之围被解之后伐赵（公元前 251 年）。当然，这个时候的赵国仍然面对秦国的巨大压力和蚕食，但已经可以稳住阵脚了，因此燕国的这次南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燕国希望在赵国临死之前也分一杯羹也并不为过。毕竟秦国一旦灭了赵国，接下来就会与燕国发生直接的地缘冲突了。能够在此之前为自己多获取些缓冲之地，也算是务实的打算。只不过燕国对于形势的判断，还是不够精准。出击的时机不是最好（索性和秦军联手，倒也能达成目的）是一方面，对于赵国的战争潜力也存在误判。

要知道，赵国虽然在南线遭遇了惨败，但在北线还有数十万用于防御匈奴的军队。即使邯郸有失，赵国也还是有能力向北退却，以滹沱河为防线和秦国继续周旋下去。即使是这块中山国故地再失，赵国也还有机会退守“北三郡”（后来也的确如此）。也就是说，赵国并没有那么容易亡。这块石头除了引火烧身以外，并没有太大意义。即使赵国因为燕国下的这块石头而支撑不下去的话，难道面对更为强大的秦国，燕国就更加有机会了吗？

第三节 联军击败秦军并追至函谷关

除掉齐国这个并没有直接与秦国接壤的国家，现在信陵君可以统帅的只有五国联军了，也就是韩、赵、魏、楚、燕。也许有人会觉得遗憾，觉得少了齐国，联盟的力量会受到很大影响。其实并非如此，一个联盟的战力如何，与成员数量并非总是成正比的，与其吸收一些貌合神离的成员，不如将能够同仇敌忾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想想，如果有齐国这样的不坚定分子加入，那么无论是进攻或防守，齐国所负责的

那个方向，很有可能会被秦国通过政治手段攻破，从而导致整个军事行动失败。

现在的局面，无论是三晋，还是楚国，都与秦国的控制区大面积地接壤了（燕国除外，不过燕并不像齐国那样与秦国联盟，有暂时的安全保障），根本无法像齐国那样，还能抱着偏安的想法。而从五国相加的综合实力上来说，并不比秦国差，真能五国同心的话，赢面还是挺大的。在具体的战役中，统帅的个人威望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就像在这次合纵中，信陵君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用他曾经大胜秦军的经历来团结联军，使他们的战力能够发挥到最大。当日赵王用赵括也是看中了赵家曾经在阬与主动出击，大胜秦军的经历。不过那时的局面，并不适合赵军出击决战，更何况已经被秦军料敌在先，并进行相应的部署了。

而现在，从战略上来看，秦国虽然沿河、济两水，向东切割取得不了少战果，甚至已经蚕食到了中原腹地的大梁之西，但这也让秦国这个突出部暴露在三晋的战略包围之中。从防御的角度看，秦国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秦国能够继续通过外交手段离间三晋，集中力量攻击一国，那还是有绝对优势的。不过现在，对手们已经重新联合在一起了，并且联合得比以往更紧密。

最终的结果是，五国联军在黄河以南与秦军决战，并大败秦军。对于联盟一方来说，要的并不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他们需要的是秦国退守到大家都有安全感的战略平衡线，因此这次攻击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将秦国压缩至函谷关才算结束。也许乘胜追击，一举攻破函谷关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这就是四塞之地的优势所在。即使不能总是在攻击行动中得手，但在防御中却总是能够拖垮对手（打架也是这样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你的抗击打能力）。山东诸侯合纵攻秦，打到函谷关下也不是第一次了，结果基本都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也不例外。

相比集权管理的秦国来说，联盟在时间上并不占优势。或者说联盟的时间越长，之间出现裂痕或被离间的可能性就越大，除非这个联盟之中有一个成员有着绝对的实力和领导力。而现在，魏、赵、韩、楚、燕联盟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因此能够将秦国逐出华北平原，逼退至函谷关，也算是完成任务了。而在这次攻秦的同时，赵国在西线刚刚被秦国吞并的晋阳城，也乘势脱离了秦国的控制。从信陵君窃符救赵（公元前257年），到这次五国合纵击秦（公元前247年），魏国算是迎来了一个政治高潮。两次战役的胜利，似乎让魏国看到了中兴的迹象。但实际上，秦国的战略优势并没有受到影响。如果说信陵君被历史推到了前面，成为魏国乃至山东诸侯抵抗秦国的希望，那么接下来的秦国也将迎来一位战国的终结者：秦始皇。

魏国的这次小高潮，如果按照传统史学的观点，不如认为是“信陵君”个人的政治高峰。似乎是因为这个“英雄”的横空出世，一下子扭转了关东诸侯一味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过这个小高潮对于魏国来说，不如说是一次“回光返照”。在信陵君死后十八年（公元前225年），魏国终于还是亡于秦国之手了。这个时间顺序，让我们感觉到魏国的生死的确是系于信陵君一身，抑或信陵君如果活得长一点，魏

国的国运也能够长一些。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其实信陵君救赵成功的大背景我们已经交待过了，秦国刚刚打完了一场战国史上最为艰苦的消耗战，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本身就有些强弩之末的感觉了。秦国的政治家也并非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长平之战后，并没有立即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邯郸。如果不是后来秦、赵双方谈判破裂，秦军也不会这么快就打响邯郸战役。所以说，无论是现代战争，还是古典时期的国家对抗，最终打的都是一场后勤战。你的资源和补给能力能够决定你是否能在长期对抗中占据优势，这也就是所谓的“战略优势”。

第四节 韩国派人入秦修郑国渠

如果从国家潜力和制度上来看，秦国的战争恢复能力无疑是诸侯中最强的。不过秦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需要更高的效率，以快点结束中央之国的分裂局面。在诸多提高效率的方式中，有一种改变是最具战略眼光的，就是通过人力适当地改变地理环境，以提高生存质量和生产力，而这其中，“治水”又是最主要的方式。

当年的大禹治水，以及魏、赵、齐等国在黄河下游修建大坝的行为，都可以归为此类。而地处黄河中游的秦国，相比于华北平原的诸侯们，受到水患的几率相对较小。因此对于如何处理水利方面的问题，也缺乏足够的经验。不过这并不代表秦国就不需要和“水”打交道了。因为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你需要有一些辅助性的水利工程，以让那些流淌在天然河道中的水，均匀地覆盖在平原之上，为秦国的粮食生产作出贡献。在历史上，秦国分别在它的两大粮仓：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前者就是都江堰工程；而后者则是我们即将要解读的“郑国渠”。这两项工程对于秦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秦国的粮食产量保守的估计也就此翻了一倍。

如果我们把都江堰修筑的时间和郑国渠开建的时间，与信陵君两次战胜秦军的时间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其中的关联。这两项伟大工程的建设时间，恰恰都是在那两次战役之后的第二年。而秦国的战略重心也由在前线的攻城略地，转到了想办法提升自己的粮食产量，进而提升国力。可以说这是从长平之战中，所得到的另一个收获。正是通过长平之战，让秦国真正看到了后勤保障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如果不是粮食不足，赵国也不会贸然出击）。鉴于在今后的征服过程中，类似的大规模攻坚战还会有很多次，秦国需要事先作好充足的准备。所以，将人力物力投入到水利建设中，实属明智之举。

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都江堰工程的修筑，更多的是有蜀国当年打下的基础，以及利用了当地人才的原因。而关中“郑国渠”的修筑过程，就要曲折得多了。这项秦国国内的工程，甚至牵扯到了国际政治，并将韩国给卷了进来。而这一切，

都要从秦始皇登基（公元前 246 年）那年说起。想必大家都听过一句成语叫做“饮鸩止渴”。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每次看到这句成语时，就会想到韩国和郑国。注意了，这里所说的韩国，不是现在的“大韩民国”，而是两千多年前位列战国七雄的“韩国”；而这个郑国也不是曾经在春秋初期“小霸”过的郑国，而是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人。

就韩国的地缘条件来说，算是战国七雄中最差的，可以说稍不留神就被周边的大国吞并了。我至今记得年少时看过的一个电视剧中的情节，里面的韩王经常仰天长叹：韩国的天实在是太小了。其实韩国的天地小，只是一个问题，最关键的是它的位置实在是太居中了。正好处在秦人西出黄土高原的通道之上。因此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韩国人在外交之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致。而他们所想出的最为“强大”的招数，就是派遣水利专家“郑国”，去游说秦国修建一条连接泾、洛两水，能够灌溉关中平原东部的水渠。这项水利工程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郑国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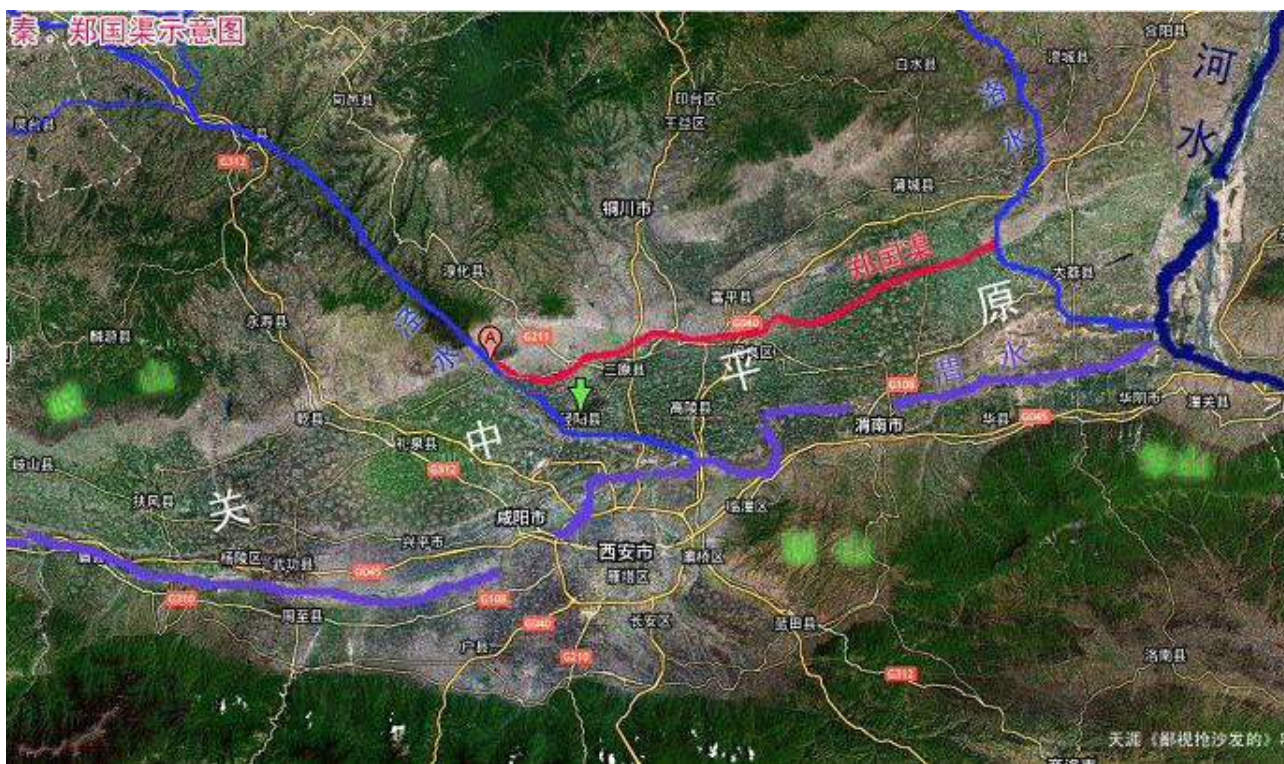
韩国人之所以会想到去帮助秦国解决农业问题，并非只是简单地向秦国示好。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资源总是有限的。韩国人所想的，就是用这一项耗日持久的大型工程拖住秦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让秦国暂时无力向东扩张。而对于现在的秦国来说，在经历过十多年的密集战争后，也的确耗费了大量的储备资源，需要将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提高农业效率上来了。郑国为关中平原设计的灌溉方案，无疑是非常有诱惑的。因为关中平原虽然有渭水东西穿越。但渭水的位置注定是在关中平原的最低处（否则那些支流也汇不进去），而整个关中平原，其实是由沿渭水两岸向南北延伸的大片阶梯状平原构成的，也就是所谓的“台地”（当地谓之“原”）。

这种地形使得水量最大，海拔最低的渭水，并不能够引水润泽整个关中平原。郑国所设计的方案是在渭水的两条支流——泾水和洛水之间，沿关中平原北缘的高地挖通一条干渠。相当于在此克隆一段“渭水”，截流一部分本该直接流入渭水的泾水，经由郑国渠，注入洛水（初时洛水直接流入黄河，后来黄河改道就成为渭水支流）。这样做的诱人之处在于，郑国渠的地势较高，可以沿干渠向南修筑支渠，依靠自然落差均匀的灌溉渭水以北，泾、洛两水之间的土地。而在丰水季节，郑国渠还可以起到一定分流的作用，降低渭河水泛滥的危险。

由于郑国渠能够让关中平原的水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进而提升粮食产量。正希望提高农业效率的秦国，自然也接受了郑国的建议，开始了这项工程。这一年正是秦始皇登基的那一年（公元前 246 年）。从韩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条疲秦之计，而从秦国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条提升国力的好方案。后世之人，大多认为韩国的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到最后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但站在韩国的角度看，这的确也为他们多获得了几年生机。因为以秦国当时的情况，如果要马上开启统一六国之战，难度还是很大的，毕竟需要时间来进行新的战力储备。不过如果秦国

要想灭掉现在的韩国，获得一个东进的支撑点还是很容易的。

也许韩国还能够指望在遭受秦国进攻时，得到其他诸侯，特别是三晋的支援。但现实情况是，在遭遇秦国这么多年的攻击后，韩国的资源（特别是人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消耗，控制区也已经被压缩掉了一半，很有可能在秦军的第一波进攻中就亡国了（韩国没有赵国那样的战略纵深，真要是国都被攻破，就等于完了）。不管怎么说，韩国这次“饮鸩止渴”的举动，最多也就是为韩国多争取了几年时间。而郑国渠的修建，却加速了秦国统一整个中央之国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秦国在发现郑国修渠的动机不良后，却仍然让他继续完成这项工程。用郑国当时为自己辩解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郑国渠示意图

最终，秦国花了十年时间修成了郑国渠（公元前 236 年），其所灌溉的区域，粮食产量也由此翻了数倍。而渠成之后的第三年（公元前 233 年）。已经感到将要面临灭顶之灾的韩王只能祭出最后的法宝，向秦国称臣，并将战国最为著名的法家——韩国贵族韩非（子）送到秦国，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影响秦国，给韩国留一口气。不过已经准备用中央集权的体制统一中央之国的秦始皇，显然并不会走当年周人的老路。三年之后（公元前 230 年），韩国成为秦国统一道路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第五节 郑国渠在后世的泥沙沉积问题

尽管郑国渠在秦国的统一之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但它的历史影响力和知名度却不如同一时期的“都江堰”工程。之所以会这样，倒不是因为二者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有大的分别，而在于二者在设计上的区别，决定了它们在后世的命运。

相比都江堰工程一直为成都平原服务至今，郑国渠的命运就要坎坷多了。因为所有的引水工程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泥沙的沉积问题。对于秦国的统一事业而言，泥沙对于引水还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到了 100 多年后，渠道的淤塞就十分严重了。以至于后世在郑国渠的基础上，或部分疏通原有渠道，或干脆另择路线重新开挖了诸如：白公渠（汉）、三白渠（唐）、丰利渠（宋）、王御史渠（元）、广惠渠（明）、通济渠（明）、龙洞渠（清）、泾惠渠（民国）。



泾惠渠

这并不能怪郑国当时的设计有问题，因为处理水利工程的泥沙沉积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包括三峡大坝在内的中国诸多水利工程也是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水电工程建设都处于停滞状态（环保部门强力反对）。事实上在天然河道中建筑大坝，比引水渠中的泥沙沉积问题更为严重。后者如果被淤塞了，最多也就是不用罢了，而前者除了会改变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外，更有可能加剧大坝上游地区的洪涝灾害。不过在中国日益增大的能源压力面前，这种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会显现出来的后果只能被暂时无视了。所能够寄希望的，就是在今后数十年中，能够找到足够丰富的替代能源，以逐渐减小水电大坝的使用率。

郑国渠之所以这么快消失，还在于它所引用的泾河水的含沙量极高。虽然这些泥沙没为泾水像“河水”那样冠上一个“黄”的标签，但当混浊的泾水注入含沙量较低的渭水时，“泾渭分明”这句使用频率颇高的成语也就诞生了；另一个原因则是西——东向而行的郑国渠，坡降又小，造成水流缓慢，泥沙的淤塞速度自然又加快了。

之所以说到郑国渠和都江堰，并提到现在的水电大坝，不仅是因为郑国渠和都

江堰工程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还因为它们之间的对比告诉了我们，人类可以利用自身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地理结构，以改善自身的地缘条件。但并不是每一项工程都能够长久地起到正面作用的，因此在做出决定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我们的所叙述的战国历史中，韩国已经在我的笔下先灭亡了。但在韩国这个龙套演员谢幕之前，濒死的诸侯们还曾经进行过一次联合反抗。这次的主角，并不是回光返照的魏国（魏国在信陵君死后，已经没有了机会了），而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赵国。接下来，我们将要将目光重新转移到秦、赵两国身上。

第三十五章 秦国击败五国联军后发兵攻赵

第一节 赵国挫败燕国入侵后领导诸国抗秦

从战略上看，秦国的优势已经是无可逆转了，其一国的实力足以同时应对两、三个国家的攻击。在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秦国也并没有停止东进的步伐。事实上对于秦国的百姓来说，战争是绝大部分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因为如果因军功而受爵的话，就可以使自己一家人马上步入有产阶级的行列。而为了长久保持这项制度的活力，因军功所受的爵位并不能世袭。看来秦人也知道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太多了，会削弱国家的竞争力。有鉴于此，秦人在战后的恢复期总是要比其他国家要短得多（个体的主动性强）。

作为秦国东进的正面对手，韩、魏二国自然是优先被攻击的。韩国当然就不值一提了，而魏国在信陵君病亡后（公元前 243 年），最后的希望也随之而去了。在秦国的强力攻击下，魏国在河北平原、河济平原节节败退，基本上也像韩国那样，被压缩到了济水以南，成为一个奄奄待毙的国家。按说这个时候，赵国应该要对这两个三晋兄弟施以援手了，否则唇亡齿寒，亡了韩、魏，赵国也没有独活的道理。不过这个时候的赵国，却在北线应对另一场战争，暂时还无暇顾及韩、魏的生死，因为燕国又一次对赵国发起了攻击。要说在秦国一统天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的现在，燕国的这种“内斗”的确让后世之人感到很不应该。不过这也就是人性的弱点，在火没有烧到自己眉毛时，总是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得多些。

从燕国的地缘位置来看，他们向北已经没有拓展空间了，除非燕人觉得蒙古高原或者东北平原能够种出粮食来。如果要向南拓展战略纵深的话，就只有打赵、齐两国的主意了。抛开实力不说，从目前的国际关系来看，攻击齐国在政治上风险会相对比较大，因为秦、齐两国已经结成了战略联盟。虽然这个战略联盟所达成的状态是一个折中方案，即齐国始终保持中立状态。但如果燕国主动攻击齐国的话，那么秦国在外交上势必会表态支持齐国了（派援军也是很有可能的）。这样的话，本身处在秦国攻击区外的燕国就等于引火烧身了。所以，如果燕国想扩张地盘，就只能打赵国的主意了。

从实力上来看，燕国比起赵国还是差了些的。不过这个时候的赵国已经成为抗秦的主力，在西线承受着巨大压力。在信陵君领导的那次合纵攻秦行动中，虽然暂时把秦国赶到了函谷关以西，但秦国随后就开始了报复行动，将战火重新燃烧到了中原腹地。而赵国在河北平原的利益虽然暂时还没受到太大影响，但借合纵攻秦的胜利重新收复的晋阳，也在第二年就重新被秦国所攻克（公元前 246 年）。同时，赵国在西北方向还要留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匈奴。

在这种形势下，燕人认为赵国不大可能有足够的机动力量，应对来自燕国的蚕食。另外在政治层面，即使燕国此举不是与秦国达成默契的表现，但最起码不会得罪这个超级大国。只是燕国还是低估了赵国的战斗力，这一次的攻赵之举和十年前那次落井下石的侵赵结果一样，又一次以大败而告终（公元前 242 年）。

虽说燕赵之间的胜负，于整个中央之国的地缘格局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但赵国这次大胜燕国，却让赵国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回头来帮助它的三晋兄弟了。很自然地，在东北战场取得大胜的赵国成为这次合纵（公元前 241 年，也是战国史上最后一次）联盟的主导者。而除了燕国这个刚被打残的“小兄弟”外，齐国照例维持着它的“中立”。其实上一次魏国（信陵君）组织的那次合纵攻秦中，燕国倒也参与了。所以这一次的合纵攻秦中没有燕、齐两国，不过卫国倒是加入这一次的合纵。

由赵、魏、韩、楚、卫组成的五国联军，在这最后一次反攻中，战术的运用倒还算比较成功。吸取了前几次合纵攻秦功败垂成的教训，这次的联军并没有选择崤函通道这条路线。而是由河东渡过黄河，直取关中平原。也就是说，秦军重点防御的函谷关被绕过了。以前晋、魏两国据有河东时，倒是经常渡河攻秦。不过自从三晋退出河东以后，这条攻击路线已经逐渐被人遗忘了。函谷关虽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但如果攻克了这个要点，秦国的东大门就等于被打开了。而由河东入秦的话，很可能在河东就会陷入一场拉锯战。

不过从赵国的角度看，和韩、魏，甚至楚国相比，他们对直接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崤函通道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如果让他们做组织者的话，最有可能的是由太原盆地出发，然后横穿吕梁山脉，由“藁”地渡河进入陕北高原，最后再南下攻击关中平原。问题是现在太原盆地和吕梁山脉都已经是秦国的控制区了。因此赵国所能想到的第二条攻击路线是，由上党高地突袭河东，攻击秦国。当然，所谓合纵攻秦，并不是说大家要集合在一起行动。当赵国由上党高地向河东发起冲击的同时，韩、魏、楚、卫四军可以由轹关陁向西攻击，最终双方在黄河西岸会师渡河。

第二节 联军攻入关中后在秦军反击下败退

从秦国方面来看，他们应该是没有想到诸侯们还敢反攻秦国，尤其是没有想到联军没有攻击大家都认定的“天王山”函谷关。因此在联军南北两路的攻击之下，措手不及的秦军退回了关中平原，而联军也破天荒地攻入了关中平原，并渡过洛水直逼咸阳。如果秦国是处在防御的一方，他们最少能够由河东、黄河、洛水布置三道防线，逐级抵抗，联军也基本没有机会攻击到咸阳东部。但问题是，秦军在战略上一直是处在攻击位置，重点布防的区域也是在崤函通道一线。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秦军在战术上都是在做攻击准备，根本没有想到会遇到如此强大的反攻，让联军一下子插到自己的大本营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在两千多年后的二战战场上，德、苏两国也同样上演了这一幕。从战略实力对比上来看，德国和苏联其实是处在同一数量级的。而苏联之所以在战争一开始兵败如山倒，被德军迅速攻击到自己的核心区，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在做着攻击的准备，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防线的构筑上。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差点被德国闪击得手。

如果说苏联最后能够耗死德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的战略纵深够大，资源够多（加上美国在物资上的支援）的话，那么秦国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五国联军攻击得越深入，反过来所要承受的压力就越大。最终秦军在现在西安市临潼区东北，一个叫“蕞”的地方（相当于咸阳的外围阵地），稳住了阵脚和联军展开了决战。和后来的苏德之战有所不同的是，秦国并没有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是将攻击的重点放在了联盟中最为薄弱的一环：楚军身上。

之所以选择将楚军作为突破口，是因为楚国是这个联盟中行军最远（客军中的客军），也是和黄土高原感情最弱的一员。无论是从战术上还是战略上看，楚军都是最有可能先打退堂鼓的。而这种“联军”与单一成分的军队相比，在组织结构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无法真正做到号令一致。一旦楚军被击溃，退出攻击序列，联盟中的其他成员也就无心再战了。最终，这场被后人称之为“蕞之战”的战国最后的合纵攻秦之战，还是以秦国的胜利而告终。而接下来，大撤退的就是五国联军了。所谓来得快，去得也快。秦军也很快重新恢复了之前的控制范围。经由这次战役，秦国意识到，赵国这个打不死的“小强”，仍然是他们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又一次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到了赵国身上。而这一次的赵国，不知道还有没有好运再逃出生天了。

在秦国的声威如此强大的时候，五国联军居然能够出其不意地攻到咸阳附近，不能不说在战术的运用上是很成功的。虽然从双方的战略对比来看，即使联军攻到咸阳城下，甚至攻克，也并不代表能够就此翻盘。因为秦国的战略纵深以及作为主军的优势，会在持久战中显露无疑，而这种合纵联军用来打一场战役还行，用来打持久战那就很容易被秦人各个击破了（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上）。不过对于军事家来，这次联军的功败垂成，确实会感到很遗憾。很自然的，大家会觉得如果联军的实力再强大点，就有可能一鼓作气地拿下咸阳了。

不能说这次五国联军没有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秦国巨大压力的时候（所有国家都与秦国大面积接壤了，包括卫国），像以前那种经常有国家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已经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为联军的失败找到一个责任承担者的话，那么那个一贯坐山观虎斗，置身于事外的齐国就很难辞其咎了。假如实力保存完好的齐国能够参战，并与五国同心的话，这根最后的稻草也许就能压垮秦国了（燕国就不指望了，刚被赵国打残，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次都不会参与）。历史永远是很难假设的，齐国真的加入的话，能否就此攻秦得手，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会引起争议。但对于当时的五国联军，尤其是赵国来说，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赵国对于齐国的怨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当日长平之战、邯郸之围时，赵国曾经多次向齐国求援、借粮，但齐国似乎很满意它的这种“中立国”身份，没有对赵国施予援手。当然，在齐国人看来，没有在背后帮秦国插上一刀就很不错了。只是历史上，这种想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想法，往往并不能如愿。这一次赵国借着统领五国联军的机会，就对齐国展开了报复性攻击，向东把齐国在黄河以北的据点“饶安”（今河北沧州盐山县东南）给攻下来了。虽然于齐国的核心区并没有什么损失（本来也没打算对齐全面开战，只是出一口气罢了），但却让赵国的领土第一次和海洋接壤了。虽然说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对于赵国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但如果将来有人说赵国从来跟海洋无缘的话，“赵粉”就可以用这条来反驳了。

五国联军之所以没有和齐国全面开战，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强秦在后。虽然大家恼怒齐国的短视，但还是不得不把重点放在西线。尤其是赵国，这次不可避免地成为秦国的攻击对象。

第三节 蒙骜和成蛟率秦军分兵进攻赵国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秦国去攻击上党，而没有选择由井陘入中山国故地，并由此线路迂回邯郸？这主要是因为秦国在长平之战、邯郸之围之前并没有控制以晋阳为核心的太原盆地，因此才会试图从三晋中最薄弱的韩国入手，先取上党，再攻邯郸。

现在情况就不同了，晋阳城已经被秦国所占据了（公元前 246 年）。秦国完全可以从晋阳出发，经由井陘攻击赵国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看，秦国也是非常有必要这样做的。因为失去晋阳的赵国，其防御重点，或者说主要兵力是分布在南北两线，即北线在代郡、雁门郡一带防御匈奴的边防军，以及在南线邯郸城拱卫中央的主力军。为了防止南、北赵军互为接应，秦军由井陘切入河北平原，并沿滹沱河布设防线，将赵国一切为二。无论是从长期分割赵国的战略上，还是一战而解决问题的战术上来说，这都是正确的选择。

当然，秦国这样做只会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只是这样单纯的孤军深入的话，很有可能会陷入赵国两面包围的境地。所以秦国的这次攻击，其实是两路出击，除了由晋阳出发，出井陘的这一路大军外，另一路则直接攻击长治盆地，并沿潞口径攻击邯郸城。从出击的方位来看，北路秦军实际上起的是一个“阻援”的作用，而南路秦军才是主攻的力量。秦国人很想看看，这次还会不会再有一个信陵君出现来创造“奇迹”了。

由于秦军这次攻赵是两路并进，因此很自然也会有两个统帅。领军由井陘出击赵国的是秦军最著名的军事家族：“蒙”氏家族的奠基人“蒙骜”。说起蒙骜来，可以说是白起死后，秦国在这一时期最为优秀的将领了。在他的带领下，秦军将魏、

韩两国压缩至济水以南，并攻取赵国的晋阳城。因此让他来承担攻赵的任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说到蒙氏家族，其实也并不是秦国土产的，蒙骜本人是来自于齐国。这也是战国一大特色了，人才能够充分流动，到他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去。而秦国的成功，从人的角度看，也正是重用了这些“客卿”。当然，对于这些人才来说，他们也正是看中了秦国的潜力，才会愿意为之效命。



赵——中山国地缘关系图

总是要大于“内战”的。也许是因为蒙家在军事上的建树，《寻秦记》、《古今大战秦俑情》、《神话》这类穿越剧中，在选择军事将领甚至主角时，总是会把目光放在蒙氏家族身上。

非常不幸的是，这一次攻击赵国，是蒙骜的最后一次出征。因为秦国的这次攻赵之举，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蒙骜也战败而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战术结果，并不是因为又出现了一个信陵君解救了赵国，而是因为秦国内部在战术协调上出现了问题。而出现问题，正是准备经由长治盆地，对邯郸执行主攻任务的南路秦军。这一路秦军的统帅并非一位名将，而是一位王族，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不过由于《寻秦记》的原因，许多人还是记住了他的名字，他就是秦王嬴政的弟弟成蛟。

在五国联军的那次大撤退之时，秦军实际上已经追击至长治盆地，并在长治盆地西边缘的“屯留”邑（现在县名也是这个）建立了据点。这相当于长治盆地作为一个完整的防御圈，已经被突破了。至于说在信陵君救赵之后，交给魏国以为缓冲

所以我常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人成长的地方，地缘位置是否重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成长之后的选择。蒙家在秦国最为成功的家族成员要算是蒙恬了，之所以会这样，倒不是蒙恬的战功就一定比他祖父更高，而是因为他在军事生涯的主要对手是匈奴。对于后来的中原王朝来说，这种“对外”战争的意义，

的，以高都为中心的晋城盆地，当时其实也已经被蒙骜所攻取了（公元前 248 年）。即使魏军借着这次五国合纵攻秦夺了回来，在大撤退中也没有力量保有了。

长治盆地的被渗入与晋城盆地的丢失，对于赵国在上党高地的防御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如果秦军这时集结重兵由此出击的话，赵军将不会再有条件 and 信心打一场新的“长平之战”，而是将兵力回防邯郸，据城以待援。而秦人对于再来一次邯郸之围，显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术准备。他们倒并不十分担心魏国再出一个信陵君来救赵。已经被压缩到济水以南的魏国即使有这个想法，也得先突破秦国在河北、河济平原的防御纵深。

秦国最担心的是北线赵军回援邯郸，如果邯郸城被围，而赵国又无法找到外援的话，那些用来防御匈奴，战力颇强的数十万赵军（大部分是骑兵），将会是赵国唯一的希望。虽然调回这些军队来解邯郸之围的话，意味着云中郡甚至雁门郡都有可能拱手让给匈奴，但相比于都城有失，这种丢车保帅之举也实属无奈。

虽然秦国在战术上布置得无可挑剔，但战场上的胜负并非只决定于某一方的实力是否更强，或者计划更为完美，否则大家只要兵棋演练一下就可以定出胜负了。在军事之外，还会有很多因素来影响一场战役的胜负。这其中，政治因素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外因。比之高度集权的秦国，山东六国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合纵攻秦之时，都会显出更多的政治空间，以让秦国施展外交手段分化瓦解，进而削弱对手的军事实力。相比之下，秦国似乎并没有这种问题，它的体制保证了整个国家都像是一台运作良好、精密的机器，在高效地运转。

不过这次的秦国的确出问题了，所出的问题倒也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王权之争。《寻秦记》中所描绘的成蛟，是以一个反叛者，或者说嬴政王位的竞争者面目出现的。至于说书中所写的诸多反叛情节，当然是艺术加工的多。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成蛟的确是跟嬴政存有二心。受命统帅主力部队的成蛟，并没有依计划与北路秦军同时出击，而是选择了原地观望。也许这位王弟是想拥兵自重，去争夺秦国的王位；又或是怕将来嬴政不会放过他这位王位竞争者，因此不愿意去攻击赵国。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在战国时期，由于政治斗争，王室成员转而他国甚至敌对国家的是非常普遍的，成蛟和嬴政一样都曾经在赵国为质，如果有事，赵国会是最好的避难所。

不管成蛟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这种犹豫都足够让本来承担阻援任务的北路秦军，遭到灭顶之灾（如果说成蛟和赵国私下有默契甚至协议，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赵国可以在不调动北线赵军的情况下，集结在河北平原的赵军，包夹孤军深入的北路秦军。而本来希望在滹沱河北岸构筑据点，阻击回援赵军的秦军，显然没有想到赵国的主力会从南面以他们为主攻方向攻击而来。在大败于赵军之后，残余的秦军退回了太原盆地，而领军的统帅蒙骜在回撤时，被熟悉地形的赵军伏击死于井陉之中。至于说成蛟，他唯一能做的选择，就只能到赵国去政治避难了。

虽然说秦军这次的攻赵之举，由于内部的政治斗争而告失败，但在秦国强大的战略优势面前，赵国仍然随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以预见的是，短则一两年，多则三五载，经过调整的秦国军队一定还会卷土再来。而秦、赵两国最后的 PK，也将引出战国四大名将的后两位：王翦、李牧。

第四节 王翦攻克阨与并将赵国势力逐出上党

关于秦军两路出击的路线，我想前面已经对太行八陉以及山西高原的解读够多了，应该不需要再做张图说明，大家也能清楚了。至于说屯留的位置，大家倒是可以在关于上党的地图中找一找，好更清晰的了解当时秦、赵两国的对阵情况。

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在一个组织结构成熟的国家，不会因为一个精英人物的陨落而改变历史轨迹。相比之下，在一个统一王朝刚刚分裂瓦解，群雄并起的时代，精英人物的成败和最终政治格局的形成，关联就相对较大了。这就好比企业管理中，有一个“坠机理论”来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熟。可以假定一下，它在领导者飞机失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如果马上会有新的领导者出现，并运转正常（甚至更好），那么这个企业的架构就是成熟的；反之，则非常危险。

不过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中，在已经发展成熟的地缘格局，这种危险的情况并不会出现。虽然我们在传统叙述历史的文字中，还是常常会为那些英雄人物命运而扼腕，甚至认为某一人的存在可以力挽狂澜。但事实是，无论是作为一国最高领导者的君主，还是统帅三军的将领，所能取得的成就还是和所在国的国力成正比的，而优秀的人才也是在按照良禽择木而栖的原则来顺势而为。就像吕不韦的那次投机一样，我们不能说是吕不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秦朝，而是他个人的生意头脑，让他有机会站在历史的浪尖上。

回到秦国的军事体系中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白起、蒙骜这两位战功卓著的将领，先后在军事舞台上谢幕，但秦国很快就有另一位优秀的将领填补了这个空缺。比较幸运的是，这颗新的将星最终帮助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他就是位列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王翦。王翦作为领军人物的开山之作，是在公元前 236 年攻破了赵国“阨与”。这一年，离上一次攻赵（公元前 240 年，成蛟叛秦，蒙骜身死那次）仅仅相隔了 4 年。这就是地缘实力的体现，即使赵国能够获得一次战役的胜利，也无法扩大战果，而秦国则有足够的资源来耗尽赵国的最后一滴血。

从战略上来看，秦军的这次出击还是选择了步步为营的做法，即还是先把赵国的势力从上党高地中清除出去。把这项功课做足的意义在于，秦国可以从三个方向对河北平原的赵国核心区同时发动快速攻击。即北线由太原盆地出井陉攻击滹沱河北地区；中线出长治盆地由潞口陉直取邯郸；南线则由从韩、魏两国手中夺取的河内之地，向北攻击赵国的南境（魏国已经把漳水以南残存的据点，如“邺”移交

给了赵国，自己完全退入中原）。秦国这样做，很大程度是因为两次攻入河北平原都以失败而告终。面对这个打不死的小强，在发动总攻击之前，最好还是让自己的战术空间更大些，而王翦现在就是在为全面攻赵做战略准备。

其实王翦这次不仅仅攻取了“阙与”，而是攻占了整个漳水中、上游地区。也就是说长治盆地，以及周边的山地已经尽数归秦了。只不过由于当年的“阙与之战”失败，让秦人印象深刻，因此攻克这个战略价值已经大打折扣的据点，在秦人的心目中反倒比取得整个长治盆地更有意义了（太原盆地都丢了，这条交通线的作用价值已经不大了，除非赵国还有能力反击）。

不管怎么说，赵国完全退出上党高地，预示着他们在河北平原的核心区已经无险可守了。战争下一步要怎么走，就要看秦国怎么玩了。面对秦国同时从三个方向发动进攻的可能，赵国所唯一能够指望的，就只有将北线用来防御匈奴的赵军调回邯郸加强防御了。这也是赵国所能够用来血拼的最后资源了，而统领这些援军的就是赵国最后的名将——李牧。

第三十六章 李牧二却秦军与赵国的灭亡

第一节 赵国调李牧边防军南下回援邯郸

在王翦为秦国攻占整个上党高地后的第二年，秦国又一次对赵国发起了攻击，这一次秦国看来是势在必得了。因为在王翦攻取上党的同时，另一路秦军也已经攻占了赵国在漳水以南的“邺”等据点。这些据点都是不久前退守中原的魏国移交给赵国的，赵国其实对守住他们也没有太大信心，只不过是略有缓冲作用罢了。

另外秦国之前已经攻取了整个西“河济平原”，并建制了“东郡”，如果不是为了暂时稳住齐国这个战略盟友的话，秦国乘势占据整个河济平原，将关东之地一切为二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现在这种局势，已经足以对赵国形成战略包围的态势了，并且现在的赵国已经不能够指望任何外援了。已经被压缩到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生死只在旦夕之间，并不对秦国造成威胁。至于赵国东、北方向的齐、燕两国，除非有一天秦国的战火烧到他们家门口，他们才会想到伸头，只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又能指望谁来和他们合纵抗秦呢？

有了前几次攻赵的教训，秦国这次倒没有直接经滏口陉东出上党，直取邯郸（城防太坚固了），而是先由南线扫清赵国的外围据点。一路秦军渡过漳水，攻取了赵国的边邑“平阳”；另一路秦军则出东郡，渡过黄河攻占了赵国的东部重镇“武城”。这样的话，赵国东、南边境的漳水、河水防线都被秦军撕破了一个口子。一切迹象都显示，秦国这一次是准备在赵国的南部展开决战了。不过战局的发展却并非如此，因为对赵国整体已经呈三面包围之势的秦国，可以选择的攻击点还有多个，到底以哪里为主攻方向，并不是由赵国决定的。

从战略的角度看，占据上党高地、河北平原（漳水以南部分）、河济平原的秦国，还需要在北线有所斩获，才能够对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在河北平原的核心区，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如果秦人愿意的话，他们大可以北出太原盆地，攻击赵国所占据的忻定盆地、大同盆地，甚至河套之地，然后沿着当年白狄入河北平原，建立中山国的路线进入河北平原，最终完成对赵国的战略包围。问题是这样做的话，秦国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单从地形上来看，赵国北境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盆地，足以让秦国陷入一场又一场的攻坚战（想想抗战时期，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遭遇），就算是秦国千辛万苦地将赵北三郡给打下来，反倒还要分出比例不小的兵力来防御蒙古高原的匈奴骑兵。

这样一算，倒不如留着赵国的这些北土来帮助整个中央之国去和匈奴博弈。不从赵北三郡着手，并不代表秦国就不能对赵国的核心区实行战略包围了，已经控制了太原盆地，并建制太原郡的秦国，可以选择从井陉东出太行，沿滹沱河一线切割

赵国，将之一分为二，如果赵国在北三郡的边防军因为防御匈奴而不能南下的话，那么东出井陉的秦军就可以顺势南下，与南、东二线的秦军，一起合围邯郸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方案，几年前蒙骜带领的秦军就准备这样干了，不过那次由于南路秦军（成蛟）因政治原因裹足不前，打乱了计划，致使赵国翻盘成功。这一次，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

公元前 234 年，秦国主力东出井陉，开始执行他们的合围计划了。而这一次，赵国唯一能够指望的援军，就只有他们在北三郡由李牧所统领的边防军了。虽然这样做，很可能意味着将赵国辛苦开拓的北部疆土让给匈奴，但相比于国家的生死存亡，赵国也顾不上这些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赵国在河北平原的农业区尽数失于秦，仅凭赵北三郡的地缘潜力，是无法供给那数十万边防军的。真要那样的话，就算赵国想偏安北部，估计也要由华入狄了，变身为游牧民族了。

在赵国决定调李牧大军南下之前，秦国在井陉一线的攻击可以说是进展顺利，滹沱河南面的赵国城邑：宜安、赤丽相继被攻克。并不能说秦国就没有想到赵国可能会“壮士断腕”、“丢车保帅”，调李牧大军回援，但秦国更相信自己的实力。实际上以秦国的战术来说，杀伤敌军的有生力量，比之攻城略地更为重要，因此这一次的攻赵之举，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围点打援。

秦军的意图是将赵北三郡的边防军调出山势艰险的晋北地区，并与之决战于平原之上。要是赵军不肯回援，那就顺势南下攻占邯郸。而对于赵国来说，战略上的劣势使得他们怎么选择都是在冒险（想想当年的德国，无论将重点放在东线还是西线，都同样有问题）。

在很多人的思维里，和草原游牧民族、森林渔猎民族的地缘博弈属于“外战”；而发生在中央之国核心区内，或者说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则属于“内战”。虽然说按照现有的观点来看，这些都应该属于“内战”的范畴，但中央之国为了解除这些边缘地区对核心区的威胁，的确做了两千多年的努力，因此在看历史时有这样的内、外之感也无可厚非。如果按照这样的内外标准划分的话，那么所谓“外战”的起点可以放在战国时期，而秦、赵、燕三国则是最早为中央之国进行“外战”的政治集团。

无论按照“内战”还是“外战”的标准来看，李牧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战术家。如果不是因为他成功的为赵国镇守雁门郡，抵御匈奴，赵国的其他名将也不可能倾力在南线与秦军搏杀。从大的方面来看，当年赵武灵王开启的军政改革“胡服骑射”，是赵国单兵素质居于诸侯前列，以及能够一直涌现出优秀战术家的有力保证。因此即使是在秦国战略优势已经无从逆转的情况下，赵国仍然成为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在战场上多次大胜秦军并转危为安。作为赵国最后的希望，李牧和他所率领的北地边防军这一次也没有让赵人失望。他们的这次回援在战术的运用仍然非常成功，击退了秦国这次的全面进攻。

第二节 李牧在宜安之战中击败秦军

我们知道，秦军出井陉之后，直接攻击区域是在滹沱河之南，在这里赵国布设有一系列的城邑。在赵国失去了太原盆地之后，滹沱河下游成为沟通赵国南北的必经之路。由于赵国的防御重点在南北两线，即云中、雁门的赵北长城，以及邯郸一带的赵南长城，秦军主力在滹沱河南岸并没有受到太大阻力，很快就攻克了宜安、赤丽两座城邑（今天石家庄东，藁城市西南）。如果秦军愿意的话，他们应该是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扩大战果，以滹沱河为依托，将赵国一分为二。

当年的中山国正是凭借有小黄河之称的滹沱河之险，和赵国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对抗。问题是，现在的秦军希望通过一场大决战快速消耗掉赵国的有生力量，并不愿意和赵国再耗下去了。因此秦军并没有试图沿滹沱河一带据渡口以设防，而是放李牧大军渡河，以图在野战中获胜。如果秦军一战而胜的话，那么无论是赵国的核心区，还是北三郡都不会再有像样的抵抗了。从战略上来看，这比将赵国的有生力量堵在滹沱河以北，逼迫赵国向北做战略撤退，然后再发起新的攻击要更合算（取滹沱河以南的赵国核心区算中策；一战而尽灭赵军主力算上策）。

对于希望与赵军主力（现在的主力就是南下的李牧大军了）决战的秦军来说，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为了保住核心区的安全，赵军主力开始由北三郡，经由飞狐陉南下河北平原了。不过秦军并没有很快等到他们期盼已久的总决战，因为回援的赵军并没有立即像秦军所设想的那样，迅速和秦国接战。而是一方面将主要兵力渡过滹沱河，与秦军对垒；另一方面却又沿滹沱河北线开始修筑壁垒，做出一副与秦军打持久战的样子。

在秦军看来，赵国这是又一次重复廉颇在上党的保守战术，即一方面在前线和秦军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却又在依托地形，打造一条可以长期据守的核心防线。这显然不是秦军所愿意看到的，如果赵军主力不回援的话，他们尽可以南下邯郸，与河内、河济的秦军合围邯郸。而现在赵军这种“回而不援”的架势，让秦军主力陷入了不尴不尬的境地，要么也摆开架势，和赵军在滹沱河一线打拉锯战；要么就想办法诱使赵军主力与之决战。

对于在战略上属于孤军深入的秦军来说，在滹沱河一线和赵国打持久战并不是个好想法。与长平之战相比，这一次秦军并没有稳定的后方，仅仅依靠井陉这条战略补给线来支撑战局是很危险的（长平之战的秦军，已经在西、南两个方向控制了端氏一线的沁水河谷，以及高都一线的南晋城盆地，在地理优势上足以和赵国平分秋色）。当日蒙骜之所以被赵军击败，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孤军深入，没有稳定的前进基地。因此秦军选择了后者，即想办法诱使赵军出营与之决战。

秦军想到的诱敌出战就是继续攻击赵国在滹沱河南岸的据点，也就是已经攻取的宜安、赤丽两邑之侧的肥累邑。从秦军的角度看，这依然是一个两手准备的战术，

如果赵军弃营而出救援肥累的话，那么就正合了秦军与赵军决战于野的打算。预先探查好赵军的出击路线，并选好合适的地形布设兵力，就很可能又是一次经典的围点打援之战；如果赵军仍然坚守不出的话，那么秦军就会顺势攻取肥累，并再继续在滹沱河以南地区攻城略地，扩大战果。现在就要看李牧是怎么选择的了。



李牧一却秦军之宜安之战示意图

也必然会由井陉方向增兵，并维系好补给线。不过现在，秦国东征的主力部队完全可以乘势扩大一下自己的防区，以让自己在将要到来的持久战中拥有更大的纵深（现在的纵深太小，不利于长期对抗）。

如果李牧真的准备像当日的廉颇那样，将主要精力放在打造数条防线，并做好持久战准备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另一场“长平之战”了。只是始终不敢主动出击的赵军，应该不会再给秦军机会包饺子了，时间也肯定会拉得更长。不过李牧作为战国最优秀的战术家之一，保守并不是他的性格。如果秦军仔细研究李牧大胜匈奴的战例，就会发现这位军事家的战术性格就是“扮猪吃虎”，即一方面以保守的姿态麻痹对方，让对手以为自己绝没有主动出击的胆量 and 能力；另一方面却在内部做好充足的准备，选择适当的时机突然反击，一战而解决问题。当日的匈奴（公元前 244 年）就是这样被李牧击败，以至于十几年不敢南侵的。那一次李牧扮猪扮了十几年才进行战略反击，而这一次的战术出击，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伪装了。

当秦军上下都相信李牧不可能主动出击的时候，李牧所率领的赵军终于出动了。

从表面上看，李牧又一次选择了保守战术。在秦军主力战于肥累之下（肥下）时，依然坚守不出。这让攻击肥累的秦军认定，赵军这次是吸取赵括轻敌冒进的教训，决定把保守的“乌龟”战术进行到底了。有鉴于此，秦军主力开始加紧了对肥累城的攻击，将佯攻变成为主攻。当然，即使秦军已经认定赵军准备打一场持久战，他们

不过他并没有像秦军预想的那样，选择去救援被围的肥累，而是出其不意的攻击了秦军的大本营。鉴于秦军主力早已运动到了肥累城下，蓄势已久的赵军很快就占据了秦军的大营，并俘获了秦军的全部辎重。可以想见，正在攻击肥累的秦军主力听到大营被攻击的消息，心情应该和当年在长平被秦军从中断开的赵括有得一比。无论是在什么时代，在战争中被敌人攻取后勤基地，或者中断补给线都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对于李牧来说，预料到秦军主力得知消息后会马上回援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和赵失肥累不同（无损赵军主力），秦军如果失去了随军携带的辎重，很快就会陷入混乱，赵括在无粮补充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持四十六天，秦军可不想去挑战这个纪录。况且秦军即使是想就此放弃这次攻击，回到太原盆地，也必须开始西撤了。既然这一次料敌在先的是赵军，那么赵军反过来打一次围点打援的经典之战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能够有足够的兵力与秦军展开决战，邯郸城里的赵军也已经秘密向北移动。

最终，两路出击的南、北两支赵军，对秦军主力所展开的钳形攻势取得了完美的战术效果，除掉秦军的主帅和部分亲随以外，余者皆陷于赵军之手。本来这种决战正是秦军所期待的，不过那是在秦军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而现在，准备充分的显然是赵军。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无粮之后的长平赵军那么“容易”就被秦军所“坑杀”，就不难理解失去了后勤补给的秦军，是怎么由下山猛虎变成一只纸老虎的。

不管战略形势如何，李牧的这次胜利无疑都为积弱已久的赵国打了一针强心剂。赵国上下甚至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军事天才身上。而赵王所能够给予李牧的最高荣誉，就是封李牧为赵国的“武安君”，最起码在赵人心目中，李牧的战绩足以和秦国的战神白起相媲美了。而秦国那边的震怒就可想而知了，一场势在必得的战役竟然落到完败的下场，这显然无法让未来的始皇帝平静地接受。对于赵国和李牧来说，秦国新一轮的攻击又将到来了。

最后说一下，秦国这次统军的将领叫“桓齮”，逃出赵军包围的他并没有选择回到秦国（只要想活命，都不会回去。为了惩罚这个败军之将，秦国甚至下以了“金千斤，邑万家”的重赏），而是向北逃到了燕国。从现在的国际关系来看，这也是他唯一能选择的避难地了。要是跑到齐国的话，齐国人是断然不会为他而得罪自己的“老朋友”的。至于说魏、韩、楚三国，就算他们有胆收留，桓齮也得有命穿越秦国所控制的河济平原（东郡所辖）。

按惯例，除了对历史特别有影响的人物外，我们一般是不会去特意点出他们名字的。之所以在这里指出这个绝大部分人都不知晓的名字，并非是就此看到也不知道发什么音的“桓齮”，而是因为他后来的历史中还是为他的避难国发挥过一次重要的作用，并因此而名垂青史。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叫“桓齮”，而是叫“樊於期”了。

第三节 李牧在番吾再次击败秦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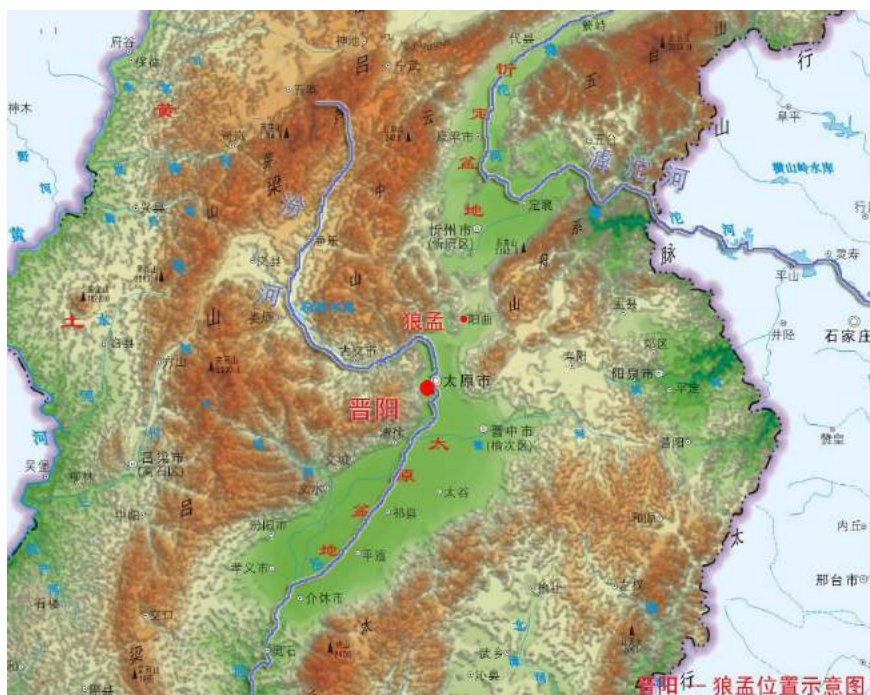
当赵国还沉浸在战胜秦国的喜悦中时，秦国又开始发动新一轮的攻势了。有时候我会为赵国感到悲哀，纵使他们因为胡服骑射而拥有最精锐的骑兵，最充分的动员，最优秀的战术家，但面对地缘实力超强的秦国，即使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战术胜利，又有什么用呢？就像当年的德国人一样，如果在战略格局上无法翻盘的话，面对无休止的消耗战，结果只能是走向死亡。

按照正常的攻击频率，秦国一般要重新准备个三五年后，才会发起新的攻击。不过这一次秦军卷土重来的速度比以往都要快。仅仅过了一年，邯郸城就又要再一次面对兵临城下的危险了（宜安之战终结于公元前 233 年，这一次是公元前 232 年）。跟以往一样，秦国这次又是两路出击，不过曾经两次出击的井陉并没有成为这次的攻击路线。这主要是因为，晋阳的北面出了点小问题。如果我们看地形图，会发现太原盆地的核心：晋阳城，是在盆地的北部。但晋阳（现在的太原）本身，还算不上太原盆地最北的城邑。在它的北部，太原、忻定两盆地分水岭之南，还有一个小型盆地以为缓冲。

当年赵国在此建制了一个叫做“狼孟”的城邑，作为晋阳的卫城（现在叫阳泉县），并作为整个太原盆地的北部屏障。本来包括晋阳、狼孟在内的太原盆地诸城邑，在公元前 247 年已经被蒙骜所攻取，但由于随后信陵君和魏国就组织了五国合纵攻秦，并取得了大胜，刚刚被秦国吞并的太原盆地又出现了反叛（毕竟是旧都所在，群众基础比较好）。以至于秦国在第二年不得不又发兵，重新攻占了一回晋阳城。不过在那次秦复拔晋阳之后，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狼孟是否也被秦军复夺。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当公元前 232 年，已经愤怒到极点的秦王嬴政准备再给赵国一个教训的时候，狼孟是在赵国手中的。

不管狼孟这个战略要点，是在信陵君大败秦国那次重新归了赵，还是这次乘李牧却秦之机反水投了赵。秦国都有理由担心，重拾信心的赵国很有可能由忻定盆地挥军南下，重新控制太原盆地。如果不是长平之战损失了那么多的有生力量，以至于李牧大军不得不回防邯郸。这本来应该是他们大胜匈奴，稳定北方边境后的正常攻击路线。而现在，秦国要做的就是消除这种可能性。即使秦人认为由太原盆地向北攻击的性价比太低，但最起码他们也要拔除掉狼孟这颗钉子，以让秦国新成立不久的“太原郡”拥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也正因为如此，秦国这一次并没有再选择由井陉出击了。

攻取狼孟，对于秦国来说只是在打一个补丁，秦人真正的注意力还是放在河北平原之上。这一次他们依然选择了邯郸作为主攻对象。本来上一次秦国就已经渡过漳水，突破了邯郸的外围防线（取平阳）。但由于当时给邯郸城施加压力是为了诱使李牧大军回防，并与之决战于野，消灭赵国最后的主力，邯郸一线并没有成为秦、



晋阳——狼孟位置示意图

赵双方决战的战场。这一次就不同了，急于报复的秦军，选择了最容易接近邯郸的路线，又一次渡过了漳水向邯郸进逼。

对于一个像邯郸城这么重要的都城来说，它的防御体系并不是仅仅建立在一道城墙之上。当年被魏国破城的教训，让赵国决心兴建长城来防御南犯之敌。事实上赵南长城最起码有两道，即魏、赵边境

的漳水北岸，以及邯郸城南侧的滏水一线。而在这两道长城之间，又分布着多个卫城（如平阳、番吾），以拱卫邯郸的安全。当秦军突破漳水防线后，被赵人寄予厚望的李牧并没有让秦军推进到邯郸城下，而是在邯郸以南，漳水以北的“番吾”（现磁县北）与秦军展开了决战，并击退了秦军的进攻，这也就是李牧二却秦军。

李牧能够二却秦军，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邯郸的整个防御体系足够坚固；二是李牧大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够强（又刚刚大胜过秦军）；三是秦国这次进攻的准备时间过短，无论是从后续兵力的调配，还是后勤补给上，准备得都不够充分。李牧的又一次胜利，让秦国冷静了下来。在赵国还拥有数十万生力军，并且城防坚固时候，充分的准备工作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秦国决心做足功课，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韩国给灭了。十几年前，韩国人曾经试图用郑国来实施疲秦之计，虽然秦国最终识破了韩国的阴谋，但郑国的“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的说法，让秦国暂时放过了韩国。现在“郑国渠”（约前 236 年成）已成，也该和韩国人算总账了。

如果说韩国人还想存一线生机的话，唯一的机会就是向其他诸侯，尤其是它的两个三晋兄弟求援。而就目前的情况看，也只有刚刚大败秦国的赵国可能有胆量有所反应了。不过从赵国的角度看，虽然他们完全有理由为第二次击败秦军而感到兴奋（实际意义不能跟第一次比，第一次是全歼秦军，这一次顶多算是击退秦军）。但秦国这么快就又对赵国发起了两线进攻，也让赵人还不至于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韩国的救世主。最终，在整个战国时期都没有真正雄起过的韩国，在将所有国土献出之后（公元前 231 年），还是逃脱不了完全灭亡的命运。公元前

230 年，末代韩王成为秦国的俘虏，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划上了句号。

相比之下，在河济平原苟活日久的卫国，要幸运多了。虽然秦国在卫国参与赵国所领导的最后的合纵之后，秦国随即就攻取了卫国最后的都城：濮阳（也就这个城了），并将之划入东郡。但还是遵循了灭国不灭祀的原则，将卫国国君降爵迁往“野王”（公元前 241 年）。这也让卫国成为唯一一个生存到秦二世的战国诸侯（也就是名义上的了）。虽然吞并韩国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但能够直接控制韩国的土地，足以让秦国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准备下一场战争。而这一次，李牧和赵国运气也已经到头了。

第四节 秦国趁赵国天灾之年出兵灭赵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李牧能够为赵国两却秦军，都是值得骄傲的战绩，特别是秦国现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问题是，这样的胜利却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让赵国变被动为主动。为了抵抗秦国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赵国已经随时处在战时体制之下了，即全部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都处在战备状态。这点倒和游牧民族有点像，他们的青壮年劳动力随时可以进入战备状态。

但与游牧民族相比，赵国的劣势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在生平和战备的转换速度非常快，或者说要战备集结的时候，并不影响生产的进行。而赵国的农业本性，要做到这点就很困难了；二是游牧民族无论是主动进攻，还是处在防守状态。一旦失败，就会很快运动到对方后勤难以为继的地方去。无论是军队的战术撤退，还是整个族群的战略转移（比如跑到漠北去），都不会有致命的影响。这也就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原政权对于这些马上民族所取得的胜利多是击溃战，并且总是不得不坐视他们休养生息后，又卷土重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放在赵国身上，就不适用了。即使知道秦人肯定还要卷土重来，除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点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自长平之战以来，连续 30 年的战争，已经极大地消耗了赵国的国力。无论是从人力还是物资（特别是粮食）上，赵国都快到无以为继的地步了。经过李牧两却秦军的战役之后，李牧所率领的北地精锐也受到了很大的消耗。在野战当中，“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道理谁都清楚，更何况你面对的是战斗力最强的秦军。因此，在公元前 229 年，秦国又一次的攻击到来之时，赵国上下都预感到这一次很难挺过去了。从秦国的角度来看，之所以选择这一年发起进攻，是因为对于秦国来说，三年已经足以将各项准备工作做好了。

对于秦国来说，把韩国灭掉，将它的国土和资源直接纳入高效运转的秦国管理体系中后，更加增强了它在河内地区的力量（让韩国作为仆从国协助进攻，与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意大利肯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并由德国人

择其精锐编入德国的战斗序列的话，意大利人在战场上也不会成为一个笑柄了）；而从赵国的角度来看，在秦国发起进攻的这一年他们也遇到了大麻烦，正好给秦国以可乘之机。因为赵国的国内由于天灾，陷入了大面积的饥荒。

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周期性的由于天灾而陷入困顿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在极度依赖土地产出的中央之国，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稳定的很重要标准，就是其在大灾之年，能否调集足够的资源来平稳度过艰难期。这一方面要靠平时的储备（所以中国人喜欢积累，存钱）；另一方面则需要有控制区进行区域调配。如果你的国土有足够纵深，一般而言，不会几个地缘板块同时受灾的。这也正是中央之国的地缘整合范围越做越大，最终把东亚大陆的农耕区基本都包括进去的重要原因。当年强大的魏国，就曾经这样做出过示范。每当它的河内之地遭遇灾荒时，就把河内之民转移到河东去就食；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这种做法在后世的“封建王朝”中也非常普遍。每当大灾来临，而中央政府又没有足够的储备予以救济时，就会允许农民自然流动（就是放他们去未受灾的地区“逃荒”），而这在平时是严格禁止的。我们经常会在一个国家或者王朝覆灭之时看到有大灾发生，并被一些文人视为上天的预警。但其实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天灾是否会发生，而是必要的救济手段失灵了。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权都无限重视救灾的力度和效率，并视之为政权稳定的基础（除非执政者已经无法掌控局面，统筹调配资源了）。

现在的赵国，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赵国已经没有储备来渡过灾年，人力资源的严重匮乏也加重了灾难的程度。并且以赵国现有的纵深来说，也没有足够的地理单元来互相救济。并不能说就是天灾灭了赵国，对于已经消耗赵国三十年的秦国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战术机会而已。如果需要的话，就算今年赵国无灾，也不能保证明年、后年不会有。即使赵国这次又能幸运地挺过去，那下一次，再下一次呢？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秦国的这次攻击路线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一路出井陉，直插滹沱河南岸。一路渡漳水，直取邯郸。之前的几次失败，并不能说秦国的这项战术有问题，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问题影响罢了。对于由王翦率领的北路秦军来说，他们的任务会比上次轻松很多。因为赵国已经再没有预备队从北线南援了。也就是说，王翦的任务就是，由北向南与由河内向北攻击的南路秦军合围邯郸。

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中，无数史家和他们以往所做的一样，又把双方的胜负归结于某个精英人物身上了。而这次让他们唏嘘不已的，就是李牧了。因为最终具体为赵国指挥作战的，并不是李牧。之所以这样，据秦人说，是他们又一次成功的运用了“反间计”，让赵王误以为李牧会叛赵投秦，因此杀之换将（反正后来的历史都是秦人“选择”的，他们在反间计的运用上，似乎总是很得心应手）。鉴于李牧目前对秦军保持全胜的战绩，这的确不得不让人猜测，如果李牧不死，赵国会不会又一次转运。

其实对于李牧个人来说，他的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他可以带着军人的荣誉，而不用去承担失败的后果，留存于后人的记忆当中。李牧生与死和赵国的国运究竟有多大关系，赵国曾经的国相司空马在秦军攻赵之时做出过预言：“赵将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杀武安君，不过半年。”也就是说，用了李牧，以他的军事能力，赵国可以支撑一年。不用的话，就是半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李牧的生死对于赵国的存亡，只有战术意义（军事上多对抗几个月而已），那么在战略上，赵国有没有办法做出调整，以得一线生机呢？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赵国最终没有运用这项战略罢了。后面再说这个战略是什么。

在战国时期对抗秦国最激烈的诸侯国——赵国，终于在秦国连续三十多年的打击下亡国了（公元前 228 年）。从秦、赵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这似乎是大势所趋。比较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在五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后的十几年中，秦国数次攻赵，直至赵亡，其他几个诸侯并没有施以援手，而是放任这个抵抗秦国的强硬派覆灭。

第五节 楚魏忙于争斗无暇援助赵国

对于赵国的灭亡，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施以援手。如果说齐、燕两国，因为暂时远离秦国而抱着侥幸心理坐山观虎斗（甚至落井下石），韩国因为国力和位置的问题，而试图以“术”谋国，而不是在军事上和秦国对抗（不能说韩国一直这样，当年也和魏国对秦国也打过几场硬仗）的话，那么和秦国土地大片接壤，并且有着不可调和的地缘矛盾的魏、楚两国又在做什么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秦国进攻赵国之际，魏、楚这两个本来的抗秦中坚正在对掐。当年楚国被秦国攻占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这些西楚乃至楚国的核心区后，便把经营的方向定位在了东楚的江、淮一线，并通过吞并越、鲁两国得到了补偿。而后来的魏国，在失去河西、河东，河内、河济几个地理单元后，不可避免的将中原之地作为了最后的根据地。通过得到宋国故地，魏国的综合实力仍然不算太差。本来与秦国有着共同仇恨的魏、楚两国应该是天然盟友，而一开始的情况也的确是这样。

在魏、赵两国组织的两次合纵攻秦中，楚国都是积极的参与者。问题是在这两次最后的战略反击失败后，无论是魏国还是楚国，都对战胜秦国，恢复故土不抱有任何期望了。楚国甚至在最后那次合纵攻秦失败后（公元前 241 年），立即将都城由中原之地的“陈”（河南淮阳），迁至淮河之滨的“寿春”（安徽寿县）。当魏、楚两国暂时不再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后，他们之间的地缘矛盾也就显露出来了。双方在淮河以北，尤其是当年的楚、宋交接之处，摩擦不断。要说这点，楚国的春申君倒是早就想到了，因此他在公元前 248 年就请求楚王将他在淮北的封地转换到了江东。

当然，那个时候的理由，是因为可能会在与齐国的博弈中成为战区。如果这个时候，秦国加紧对魏、楚两国的攻击，那么在共同的压力面前，两国之间的地缘矛盾应当还不会爆发。问题是这段时间，秦国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赵国，甚至连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灭掉的韩国都没有动（甚至还退了点南阳之地给魏国，以安抚这个骑墙派）。在这种情况下，魏、楚两国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发酵他们之前的矛盾了。

从秦国的角度来看，尽管已经是实力超群，但也绝不愿意诸侯们又有机会联合起来与之对抗。如果魏国能够在淮北和楚国纠缠，那对于准备一举灭赵的秦国来说是再有利不过的了。为了让这两个最有可能救赵的国家打起来，秦国的那些外交家们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让魏国相信秦国并没有打算灭魏，并认定自己的发展空间在东南方向以外，秦国甚至集合了四郡的资源来帮忙魏国攻楚（公元前235年）。你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政治交换，即魏国放弃援赵的打算，而秦国帮助魏国从楚国身上得到补偿。当日在长平之战时，秦国就是这样干的。那时候他们许给魏国的土地就是韩国在河济平原的部分。

魏国的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肯定是一种短视行为。但在面对秦国所抛出的胡萝卜和大棒面前，不是谁都能做到深谋远虑的。对于秦国来说，魏、楚之间究竟能打成什么样，并不是他所关心的。重要的是秦人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啃掉赵国这块硬骨头了。

第六节 赵国放弃退守滹沱河以北的方案

对于赵国来说，唯一的战略转机，就是在王翦攻赵之时进行战略收缩。主动把滹沱河以南的河北平原，也就是赵国最核心的地区让给秦国，然后以中山国和代国故地为核心重整山河，并由此而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提出这项战略的，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司马。说到这个司马，他本来也是服务于秦国的，不过在吕不韦的打压下感觉没有发展空间，才转而投赵的。对于赵国来说，有这样一个熟悉秦国内政的谋士来投，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如果得到以邯郸为中心，滹沱河以南的赵国国土。秦国的确很有可能就此将所攻击方向转向东南。因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赵国之所以成为秦国的眼中钉，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秦国东扩的道路上，担当阻秦急先锋的角色。假如赵国主动退出抗秦第一线，并由此而保住最后的本钱（李牧的北军主力），据滹沱河以自守。那么秦国在衡量性价比后，魏、楚，包括齐国都可能成为他们下一步的战略重点。

虽然我们一直很鄙视韩国那种以土地换和平，将祸水引向他国的做法。但对于已经处在抗秦第一线达三十年之久的赵国来说，他们的确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了。在这种时候，主动退出地缘博弈的中心区域，虽然是在战略收缩，但拥有忻定盆地、

大同盆地和中山国故地的赵国,最起码在地缘实力上不会输给燕国。还可以静观其变,以待时局变化。

可能有人会说,赵国应该可以采取两手打算,即先在邯郸一线作最后的抵抗,实在扛不住了,再退守滹沱河。这看上去,固然是个可进可退的方案,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秦军是由南北两路包夹邯郸。如果不是和秦国在外交上达成协议,赵国的部分军事力量可以向北突围成功,但要想完整的将赵国的政治体系以及人口,安全地转移到滹沱河以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如果赵国在邯郸城和秦国做最后的决战,在既无外援,也无内援的情况下,失败是必然的。而即使赵国能在最后的关头决心后撤,并且有机会突围成功。赵国残存的军事力量也已经消耗殆尽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据滹沱河以自守。秦军最起码会一鼓作气,将燕国以南的赵土(即河北平原部分)尽数拿下,才会暂时停止追击的步伐。



赵——燕——中山国地缘关系图

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司马马的这项计划虽然能够为赵国保存剩余的国力,并拥有相对完整的国土以自守。但不能让赵国扭转对秦国的劣势,所能争取的主要是时间了(起码不会做第二个被灭的国家)。而让赵人放弃自己经营已久的核心区,是非常艰难的(晋阳已经丢了,再丢了邯郸还是赵国吗?)。曾经多次站到悬崖边缘,而又转

危为安的赵国,决定再试一下运气。因此没有用李牧的赵国,还是选择了在邯郸城与秦国决战,并一战而亡。而为邯郸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赵国,再也没有机会、本钱和秦国谈划滹沱河而治的方案了。

赵亡之后所残存的力量,通过飞狐陉穿越太行山脉退入了以蔚县盆地为核心的“代郡”,并拥立了一个赵国宗室为王。不过从地缘的角度看,赵国已经亡了。就像后来的诸多案例一样,如果中原政权能够退到江、淮以南划江而治的话,那它还

能够因有半壁河山而被视为王朝的延续。而如果核心区尽失，只是在某个边缘地区残存抵抗力量的话，那么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算亡了。因此这个败退收缩至代郡的“赵国”，在历史上也被称之为“代国”了。

尽管比预期的时间稍微晚了点，但秦国终于除掉了赵国这个统一的最大障碍。至于说那个“代国”，秦国暂时并没有什么兴趣。真要是费力把它攻下来，还要分兵去对抗匈奴，战略上并没有好处。按照正常的思路，秦国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魏、楚两国了。至于说已经和秦国全面接壤的燕国，秦国当然也可以立即展开灭燕之战。只是灭燕与灭代都有同样的问题，即战略上好处不大，还得花费精力去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因此秦国还是倾向于先解决中原的事情（这并不代表不和燕国发生边境冲突，只是暂时不会决战）。

当然，这只是个顺序先后的问题。已经灭了韩、赵的秦国，一统天下的决定已经没有人能够怀疑了。也正因为如此，预感到大祸临头的燕人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们决定主动出击，以换得燕国的安全保障。只是燕国出击的手段，实在有些异类和理想主义。由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大剧“荆轲刺秦王”拉开了序幕。

第三十七章 秦国攻占燕国核心区和灭魏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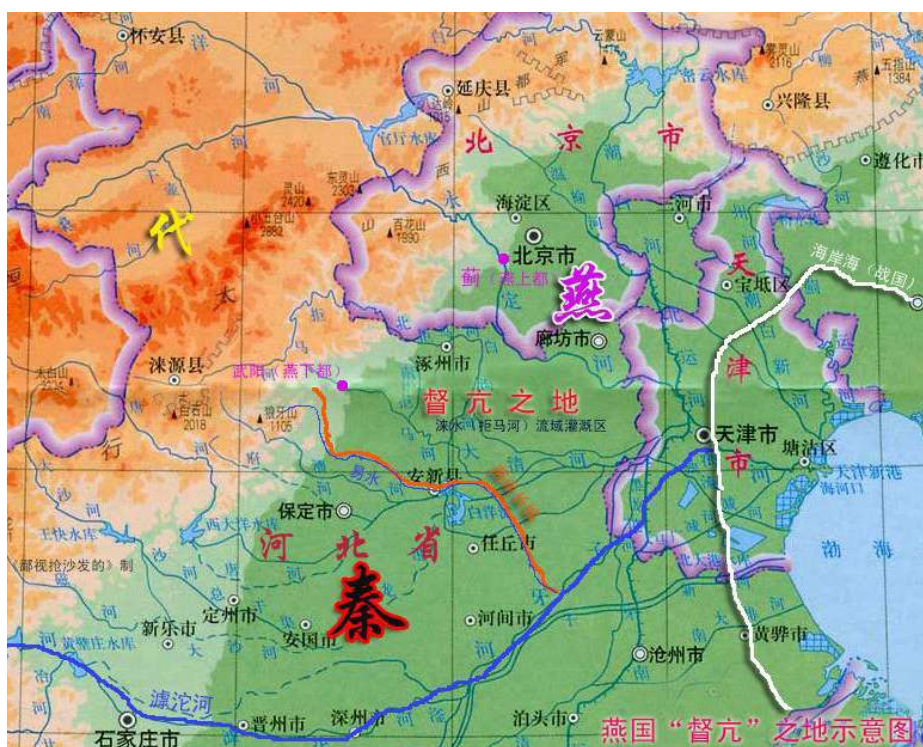
第一节 荆轲以桓齮首级和督亢之地为礼入秦

荆轲刺秦王故事的经典程度，在中国应该已经达到家喻户晓了。而这个故事的发生背景，正是由于王翦灭赵，秦国与燕国在河北平原开始划易水而治。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基本都活动于博弈舞台的边缘，并且从来没有被秦国主动攻击过的燕国，终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我们固然为赵国在第一线抗秦时，燕国不出手相助，反而落井下石的举动感到不耻，但现在再讨论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了，燕国需要在强秦面前找到自己的求生之法。

从军事对抗的角度来看，燕人毫无胜算。以燕国的地缘实力，他们甚至无法取得一次战术上的胜利，这点从燕国与赵国的两次战争就可以看出（这两次偷鸡不成蚀把米之举，还严重削弱了燕国的实力）。有鉴于此，燕人想到用“刺秦”这类“特种作战”来解决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从主动性来说，燕国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总还是比韩国那种坐以待毙，甚至想出所谓“疲敌”之策要值得称道。只不过如果当初燕国能够谨记唇亡齿寒的教训，想办法存赵以为缓冲的话，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被秦人叩关了。

也不能不说燕国就没有为抗秦做过准备，否则他们也不敢在秦国的重压之下收留“桓齮”。收留这样一个对秦军了如指掌的将领，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和秦国作战时能够做到知己知彼。不过燕国也不敢公然与秦国为敌，留用这个秦国悬重赏通缉的败军之将，因此“桓齮”在燕国就变身为“樊於期”了（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就有人争论，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只是以燕国和秦国的实力对比，不是有一个樊於期就能改变的。因此这位燕国曾经寄予厚望的前秦军统帅，用另一种方式报答了燕国收留之恩（也是为了私仇，其全家都被秦王所诛）。他的头（自愿献出的）和燕国的“督亢”之地，共同成为荆轲用来谋求觐见秦王的见面礼。

用“桓齮”的头来表达燕国的诚意，固然可以理解，那么“督亢”之地又是什么样的土地呢？我们知道，在东亚大陆，最好的土地是能够用来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而有条件做到这点的土地，一要平，二是有水，因此冲积平原往往是最有地缘潜力的区域。问题是冲积平原本身是由于河流冲积而成的，在人类决定利用它进行农业生产时，这个过程可能还在持续。换句话说，那些为你带来平整土地的河流，随时也可能将你的努力付之东流。因此在水利技术日趋成熟的战国时期，各国的主要农业区都开始兴修水利，以让河流在平原地区形成可控的灌溉网，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比如都江堰工程）。而燕国水利改造最为成功的农业区，就是“督亢”之地。



燕督亢之地示意图

既然优良的农业区都与水利工程的兴建密切相关，那么它势必也与最少一条河流有着直接关系，事实也的确如此。就“督亢”之地的范围具体有多大，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不过从水系的划分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窥探出它的大致区位的。就燕国的南部而言，它主要是由两条自西向东的河流（以及它们的支流），即南面的涿水（现拒马河）和北面的治水（现永定河）所覆盖。虽然说历经两千多年，这两大河流和它们支流的河道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体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现有的地图上来理解这两个流域的划分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当年燕国在河北平原的国土，目前是被北京、河北两地所分割的。而所谓的“督亢”之地，其实就是以涿水为水源改造的灌溉区（涿水下游曾经有个“督亢泽”作为天然水库，督亢之地也因此而得名），其目前主要归属于河北。而隶属于北京的那部分，其南部地区，则主要由北京人民的母亲河“永定河”负责滋润了。

现在的“督亢”之地，已经没有当初那么肥沃了。很大原因是因为它北边的这条“永定河”反复无常（所以以前也叫“无定河”）。就像与黄河齐名的淮河经常受到黄河影响一样，水量更大的永定河也经常变道，影响周边河流。而与黄河相比，永定河与之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更强的政治地位，为了维护其流域地缘中心的位置，不得不时常人为的牺牲周边河流的利益。

像现在永定河下游伸入河北境内的那段河道，就是后来人为改动的结果（金代），为的就是不让京师重地受水患之扰。也正因为如此，直接影响了督亢灌溉区的结构，致使起到调节水量作用的“督亢泽”消失，从而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资源出现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就现在的地缘结构而言，因曾经的燕都，即现在的首都而水资源受损的地区，已经不仅仅限于督亢之地，甚至河北省了，其影响的层面亦不仅仅是农业层面（工业用水、生活用水，都会在保障首都用水的原则下受限）。

第二节 秦国为报复荆轲刺秦攻燕并灭魏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客，荆轲最终并没有完成使命。其实如果荆轲仅仅是为了完成刺杀秦王的任务的话，已经无限接近秦王的他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对于燕国和太子丹来说，也很清楚，秦国的强大并非是因为秦国嬴政做了秦王，而是因为秦国的整体实力。杀了嬴政，除了让秦国内部陷入暂时的混乱以外，燕国依然没有机会翻盘。因此荆轲此行的目的，或者说上策，是挟持秦王，逼迫秦国退回关中平原，将侵占关东诸侯的土地退还给他们。这项任务看起来是多么的大公无私，让人感动。但其实也是燕国真正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只有让关东诸侯，特别是三晋恢复元气，才有可能为燕国做缓冲。这比挟持秦王，让他们直接割地给燕国要务实得多。

对于燕国来说，就算秦国决定把侵吞的赵国土地都“让”给燕国，也是独木难支。至于说如果荆轲真的挟持了秦王，秦国会不会真的用战略后撤来与之交换；荆轲和燕国又准备如何在技术上让秦国来做到这点，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基于当时的情况，秦国即使愿意作出交换，也最多只能是给予一个书面承诺，并将荆轲安全送出境内。问题是这种承诺在规则尚存的春秋之世，可能管用。在秦国已经准备打破一切规则，按照自己的意志洗牌时，能不能有用就很难说了。支撑太子丹作出这种理想主义举动的，很可能是当年蔺相如在渑池会上所获得的成功（逼秦王击缶）。问题是秦赵“渑池会”的过程和结果，更多的只是个面子之争。更恰恰证明了，威胁一个君主的安全，并不能够换来实际的利益。相似的案例在秦、楚之间也发生过。

秦国在丹阳、蓝田之战后，设计扣留楚怀王（前299年），希望楚国用土地来交换，也同样以失败而告终。要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如果荆轲第一时间就实施他的备选方案：刺杀秦王，那么他虽然无法改变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但却可以改变我们书面历史，甚至延迟几年秦国统一的步伐。不过现在，燕国的这次冒险只能让秦国改变计划，将燕国作为第三个攻灭对象了。

当荆轲刺秦失败的消息传到燕国后，燕国人的惶恐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对于这个结果，他们早该有心理准备。除非挟持秦王向关东诸侯退地的计划成功，否则即使是刺杀秦王成功，燕国也一定成为秦国的第一打击目标。因此这个时候的燕国，吸取了赵国的教训，即在王翦攻燕之时（公元前226年），略作抵抗，便将军队、人口、物资转移至燕山以北。以辽东郡为基地，燕山为屏障与秦国做最后的抵抗。

如果从战略上来看，燕国的这种做法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在燕南地区与秦军决战的话，将使主力消耗殆尽，结果只能是一战而亡。按照正常的情况，秦国在得到了燕山以南的燕国国土之后，应当会暂时放过燕国，而将目光转回到中原，就像他们之前也没有急于进行山地战，攻击代国一样。秦国现在并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这种鸡肋式的边缘地区上。另一个原因和不取代国也是一样的，打下了辽东，

意味着为中央之国防卫游牧民族入侵的任务，又要马上由秦国来承担了。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这次燕国的行刺之举太让秦国下不来台了。

如果不一举灭了燕国，秦国也没法给自己一个交待。所以秦国并没有停止对燕国的攻击，只不过由于有燕山之险，加之实力得以保存，秦国攻击辽东的计划并不算顺利。对于秦、燕之间的这种紧张局面，燕国人并不是唯一感到紧张的，最起码那个退守代郡，进入“后赵国”时代的“代国”和他们同样紧张。如果燕国还在，秦国自然会把注意力放在燕国身上，而如果燕国被吞并，代国的灭亡也就是旦夕之间的事了。因此代王“嘉”给燕王出了个主意，即将整个计划的组织者太子丹杀了，给秦国一个交待，以平息秦国的怒火（现在这种事也挺多的，不过一般先推出去的都是“临时工”或者“农民工”。实在不行了才会有两个够不上龙头铡级别的小吏出来顶缸）。

如果从表面效果来看，杀太子丹以阻秦的计划并没有达到效果，因为秦国依然维持了对燕国的攻击态度。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的秦国已经将主要攻击方向转回到中原，去解决魏、楚这两个国家了。否则以秦国的实力而言，虽然燕国的大部分实力得到保存，并且退入了辽东据险以自守。如果一定倾力攻击的话，燕国其实也撑不了多久的（最后在魏、楚亡国之后，秦国才回头收拾了燕国）。也正因为如此，在秦军攻入燕都，将燕王逼入辽东的第二年（公元前 225 年），秦国集中了优势兵力和资源对魏国发起了总攻，并一战而灭亡了魏国。

可能有人会觉得魏国灭亡的速度有点太快了，但在实际的战争中就是这样，占据优势的一方，其实是以加速度的形式扩大自己优势的。当秦国灭韩以后，它可以整合补充韩国的资源进攻赵国；而当它攻灭赵国后，又可以获得赵国的资源来灭燕。等到攻击魏国的时候，大半壁江山在手的秦国，已经不会给魏国任何机会了（可以参照解放战争的进程）。如果从最后的实力来看，魏国还是要强于燕国的。之所以死在燕国前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国土防御条件太差。

魏国现在所剩余的国土，基本都为平原地区，虽然农业条件良好，人口众多，但没有像燕山之于燕国那样的天然防线支撑。从攻击方向来看，魏都大梁已经暴露在抗秦的前线了。秦军的主攻方向，自然会是这个魏国的地缘中心；而从战术的角度看，在这次攻击之前，秦军也曾经在不同的时间段，多次进攻过城防坚固的魏都大梁城。这次之所以能够速胜，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水攻的方式。当日魏国用以改良内部地缘结构的“鸿沟”，成为秦军引黄河之水围灌大梁的现成渠道。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典故。在防御力方面，河流总是没有山地来得给力。

当魏国失守大梁后，一马平川的地形，让秦国很容易地就乘胜追击，占据了整个魏国。而从战略上来看，在秦国攻击魏国之时，唯一能够给魏国以援助的就是楚国了。不过之前在秦国的怂恿下，魏、楚两国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摩擦，这对本应

抱团取暖的难兄难弟，并没有再一次联合起来。也许是楚国也没有预料到魏国会亡得那么快，所以来不及反应。更大的可能，还是楚国出于自保的原因，没有出手救魏。毕竟楚国与秦国也大面积接壤，防守压力也很大。

特别是以秦国现在的实力，足以同时应对两场战争。如果楚国倾力救魏的话，外围同样缺少山地保护的楚国，很有可能会多点受到秦国的攻击。事实上在秦国攻取燕国核心区后，南下主力一开始攻击的并非是魏国，而是楚国（公元前 226 年）。秦国这样做，无疑是给楚国一个警告。也正是在这种患得患失的考虑中，魏国迅速被秦国吞并了。接下来，楚国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抗秦第一线。

第三十八章 秦国攻灭楚国和燕代齐三国

第一节 李信率秦军攻入楚国淮北

自从被秦国挤压到桐柏山——大别山以东之后，楚国就已经不再对争霸中原，甚至一统江湖有什么想法了。从楚国的角度来看，恢复其“蛮夷”本质，在中原诸侯暂时还看不上眼的江淮地区做它的“南霸天”，算是最现实的了。正是由于楚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东南，二等诸侯中的越、鲁两国才相继成为楚国的战利品。按说从整体实力上来看，西失东补的楚国还是很不错的。但现在的楚国有一个问题，就是防御力太差，不像当年在江汉地区时那样，拥有四塞之地的“核心区”。

也就是说，如果秦国决定以楚国为主攻方向的话，陆地上既失山地拱卫，水面上又无上水优势的楚国，是很容易被秦国突入腹地的。当然，对于秦国来说，在把楚国逼到东南后，再步步紧逼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依然拥有强大纵深的楚国，即使失去了战略反攻的能力，却也足以把秦国陷入一场持久战的泥潭中。而从地缘格局上来说，解决三晋始终是秦国东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正因为如此，秦、楚之间达成了一种暂时性的战略平衡。其间虽然也有冲突，包括楚国在沉寂已久后，也曾经参与救赵及魏、赵两国组织的最后两次合纵，但都没有成为抗秦的主力。或者说稍受打击，就重新收缩回去了。

不过现在，已经灭掉三晋，并且把燕国挤到辽东去的秦国，就只剩下楚、齐两个对手了。而齐国目前的角色还是秦国的战略盟友，对于这样一个一贯支持秦国，对自己没有威胁的“好朋友”，当然要放在最后招待了。所以楚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秦国下一步的打击目标。刚才也说了，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楚国就算不是四战之地，但在面对西北方向的秦国时，也没有什么可以依托的地形了。因此在秦国看来，吞并楚国的难度，肯定不会高于赵国这块硬骨头。更何况秦国现在已经吞并了三个半国家，实力更是上了一层楼。正是基于这种轻敌的想法，秦国在选择攻楚方案时，选取了一个耗费资源较少的方案，即由李信所提出的用 20 万大军灭楚。

这倒不是说秦国现在缺少人力物力资源，只是说既然认定能够花较小的代价就取得想要的结果，又何必多耗资源呢？更何况这几年秦国扩张的加速度有点快，短短几年时间就把韩、赵、魏国给灭了（燕国如果不是王室尚存，也算灭了）。这些刚被吞进去的土地，也都需要花费资源和精力来整合，特别是那些没落王族们并不会甘于就此成为秦国的臣民。在秦国攻楚的前一年，也就是灭魏的那一年（公元前 226 年），在新郑的前韩国贵族就发动了一场叛乱。尽管叛乱的韩国贵族们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有了这次教训，秦国并不敢就此认定吃进去的土地就马上能被消化了。

秦国的灭楚之战，在攻灭魏国之后就立即展开了。兵锋正盛的秦国，希望借着这股气势，一举荡平六国。不过就算楚国是一头待宰的年猪，秦国也需要想好从哪里下口。要知道，楚国现在还拥有淮北、淮南、泗上、江东、江南半壁（鄱阳湖平原和部分洞庭湖平原）等诸多板块。纵然拥有最强的实力，秦国也不可能全面开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的都城应该是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能够攻取对方的都城，无疑就相当于执行了一次斩首行动。



秦破楚之战示意图

不过与秦国当日无限接近三晋国都情况不同的是，预感到秦国威胁的楚国，已经先行一步将自己的都城，由淮河以北，位于中原腹地南部的“陈”（河南淮阳），迁移到淮河南岸的“寿春”（公元前 241 年）。这样的话，如果秦人以楚都寿春为攻击目标的话，他们首先就要在楚国所占据的淮北地区打开一条通道。按照这种地缘结构，除非楚国第一时间就决定战略撤退，否则秦、楚双方必然要在淮河以北地区先 PK 一番。虽然秦国可以从多个方向对楚国发动攻击，包括顺长江而下去抄楚国的后路。不过秦国还是决定集中兵力，由西向东推进，直到在淮北地区推进到寿春之北时，再南渡淮河，攻取楚国的都城。

如果我们依照淮河之北的那些重要支流（自西向东包括：汝、颍、渦、睢、泗），为淮北地区划分地理板块的话，我们会发现，由于秦国早已占据了南阳盆地，并在几年前吞并了韩国（公元前 230 年），秦国已经控制了汝水以西地区（实际是西南向，

因此这一地区也被称这为“汝南”），如果秦军想和寿春城隔淮河相望的话，他们最起码还需要把颍、汝之间的这一板块控制在手中。由于秦国已经灭了韩、魏两国，并且之前对楚国也进行过试探性攻击，因此汝、颍两水的中、上游地区，已经控制在秦国手中了。

而秦军如果想沿颍、汝两水攻击至淮河的话，他们可以选择从两个方向发起攻击。一是由韩、魏故都的新郑、大梁出发，经由已经被秦国所占据的鄢陵、陈（楚国曾经的都城，又叫“陈郢”）向南攻击，直至扫平颍、汝之间的楚军；还有一条可供李信选择的路线，就是由南阳盆地出发，经由“汝南”，渡汝水攻击楚国在汝水东北方向的据点。不管秦国选择以哪个方位做起点，李信所带领的二十万秦军，所要攻击的目标都没有变化。

楚国在淮河以北，颍水西南的平舆（河南省平舆县）、寝丘（河南沈丘县与安徽临泉县相交处）两个边邑，成为秦军的攻击目标（公元前225年）。而李信本人所负责的攻击点是平舆；至于寝丘（也可直接叫“寝”）则由李信的副将蒙恬负责。说起蒙恬和他的蒙氏家族来，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实要说军事世家，李信的家族也并不输给蒙家。与蒙家主要为秦国打天下不同，李家最著名的家族成员，是那位汉家江山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飞将军李广。至于说李广之子李陵的境遇，除了让人为之叹息之外，更直接促使了司马迁将毕生精力投之于《史记》。在李信和蒙恬为秦国执行攻楚重任时，他们应该还不会想到，自己或自己的家族在会为中央之国对与游牧民族的地缘博弈中，作出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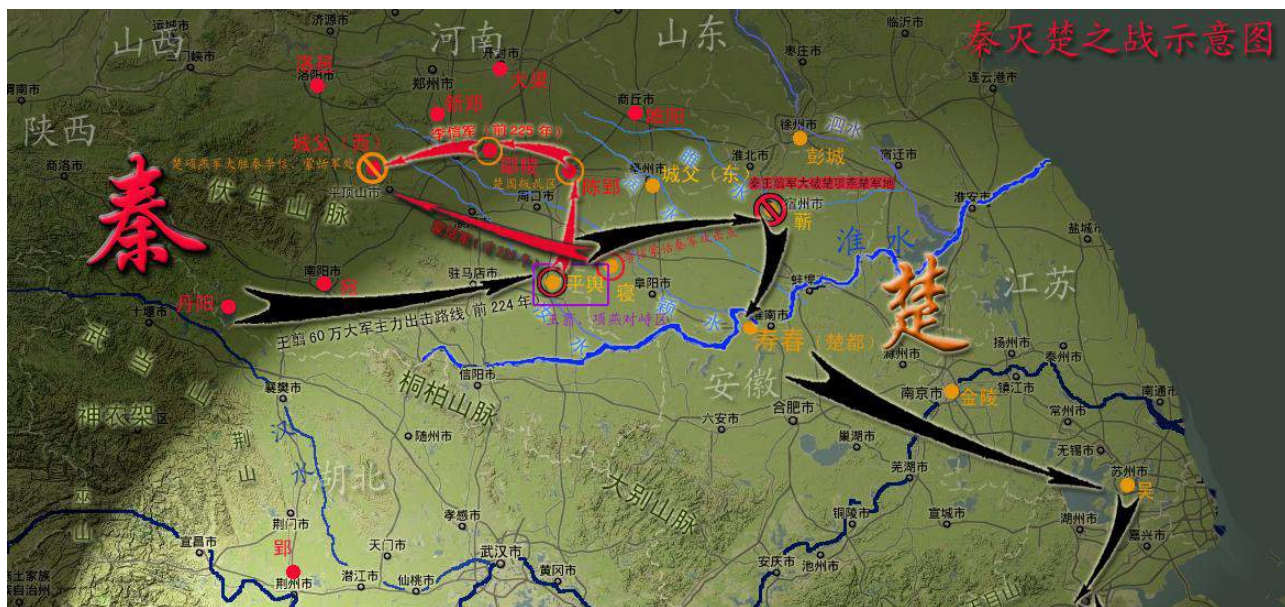
第二节 秦军从淮北上平叛时败于楚军

能够尽快攻入寿春，灭掉楚国才是最值得期待的战绩。而战事开始之时，一切也似乎朝着有利于秦军的方向发展，平舆和寝丘两个楚国在淮北的据点，被顺利的排除。如果要稳妥一点的话，李信可以带领大军渡过颍水，继续向涡、睢两水攻击前进，等到在淮北有足够的空间与秦国所占据的中原腹地连成一片的话，再转而渡过淮河，攻击淮、颍之交以南的“寿春”；而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话，也可以马上南渡淮河，直取寿春。

虽然有这样两个攻击方向供初战告捷的李信思考，但实际上他最终并没有在这两个方案中作出选择。因为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打扰了李信的攻击计划，并且让他最后的攻击路线，变得异常怪异。在攻占平舆、寝丘两邑之后，李信大军并没有再按照正常的程序向东，或者向南扩大战果，而是向北返回中原腹地，去攻击曾经的陈国国都，后来的楚都“陈”（河南淮阳），以及之前位于魏、楚博弈区的“鄢陵”（河南鄢陵县）。这一点比较奇怪，因为不管这两个城邑之前的归属如何，它们在李信攻楚以前，都已经是秦地无疑。而让李信不得不回师中原的原因，是因为这些

刚刚征服不久的土地发生了叛乱。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秦国最近的兼并速度过快，根本没有时间来消化新征服的土地。尤其在韩都新郑、魏都大梁、楚都“陈”郢（楚国定都的地方，都要加个“郢”字）所围就的这个区域，更是潜伏着不稳定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曾经的地缘中心，无论是从旧贵族的角度，还是普通民众的心中，成为一个新国家的臣民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年（公元前 226 年），新郑所爆发的那次叛乱就是一例。而时隔一年以后，曾经的楚都“陈”也开始复国运动了。



秦破楚之战示意图

根据历史所留存的蛛丝马迹来看，这次以楚人为首的叛乱，很有可能是由秦国曾经的国相“昌平君”所发起的。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位昌平君，是因为他为楚国公子的特殊身份。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为此感到奇怪，在人才流动极为频繁的战国，一个国家的精英人物为另一个国家服务是非常常见的。由于秦国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应对三晋，因此在南线缓和了和楚国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楚国的贵族有机会进入秦国上层（像那位在吕不韦投资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秦始皇的名义祖母“华阳夫人”就是楚人）。

而秦国让昌平君驻于“陈”，也是希望利用他楚国贵族的身份，为秦国整合这些新征服的楚地收拾人心。这种事情在现在的国际政治中也很常见，一旦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被推到前面控制地方的，往往就是那些服务于征服国的被征服国的精英人物。不过这一次秦国显然失算了，作为战国诸雄中与华夏地缘关系最为疏远的“楚人”，显然有更强的独立倾向。这种倾向直到后来以楚地的精英人物为主导，建立了“汉”帝国后才被完全消除。因此如果现在还有人对楚文化是否属于“华夏”体系尚存有疑虑的话，那么“汉”这个文化标签，无疑是由黄河、长江流域所共同

造就的。

楚地这种较强的离心力，以及楚在六国中最为广阔的战略纵深，都使得对其征服并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在王翦这类老成持重的将领看来，假使不能集中秦国的全部精锐（60万大军），是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现在只有20万军队的李信，就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并不愿意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而另一方面，陈、鄢两地的叛乱又必须前去摆平，否则中原有失，自己在淮北就等于孤军深入了。在这种情况下，李信带领秦军主力，回师平叛。而蒙恬则暂时留在原地，以观望事态的发展。

可以想见的是，当时的战况会非常激烈。因为相比于一般的叛乱，本来就作为“陈”邑主官的昌平君，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并得到楚地遗民的拥戴。只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秦人把所有与自己意志相左的书籍焚烧后，我们只能看到秦军攻陈邑、鄢陵的记录，并让人误以为是李信取得了胜利。而实际上，秦军的这次平叛以失败而告终。李信大军和驻守原地的蒙恬军被迫向西后撤，试图退入洛阳盆地。从方向上来看，这是攻击失败后的秦军，能够最快获得山地保护、稳住阵脚的回军路线了。可惜的是，楚军（包括楚军主力和昌平君的“反正”军队）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秦军。

在楚国最负盛名的军事家族“项”氏家族的成员——项燕率领之下，楚军在秦军后撤的三天三夜中一直如影随形。而无法甩掉楚军的李信大军（包括合军的蒙恬军），最终决定在将要退入洛阳盆地之前，与楚军决战（不然让楚军这样一直追击，有可能就要一直退到函谷关了。就像当日信陵君所组织的那次合纵之战一样）。双方的决战地点叫做“城父”邑（有两个城父邑，这个是西城父，在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位于汝水上游，也就是当年大禹所治“汝海”的所在地。在大禹开龙门导伊水入黄河之后，水位下降的汝海两侧，就成为进入洛阳盆地（经伊阙），或者直入南崕道（走宜阳）的通道。从地形上看，秦军已经可以有依托的山地构筑防御体系了。不过一直紧紧跟随的楚军，显然并没有给秦军以足够的时间来完善他们的防线，在楚军随即发起的进攻中，秦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归。

获胜之后的楚军并没有继续追击下去，毕竟战略优势在秦军那边。当日诸国合纵攻秦尚且无功而返，现在楚国孤军深入，更不会有什么机会了。这个时候对于楚国来说，最好的战略是退回汝水以东，稳定并收复以陈邑为中心的楚国的土地（包括之前被李信、蒙恬攻取的平舆、寝丘）。虽然这并不能解决秦强楚弱的战略格局，但最起码也可以为楚都——寿春在淮北重新获得缓冲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受到这场战国历史中，秦军所受到的最后一次重大失败所影响，刚刚被灭的韩、魏两国能够有所动作，并复国成功的话，楚国所面临的局势就会有利得多了。

说到项燕这次的胜利，虽然最终并没有改变楚国的命运，但却对以后的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当统一之后的秦帝国面临解体危险的时候，曾经在最后时刻大胜秦国的楚人，以及为之作出重要贡献的项氏家族，最终因为他们在楚国将灭时的出

色表现，成为反秦的中坚力量，并由此成就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的事情，到楚汉相争时会有详尽解读，现在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一下他这位祖父（项燕）的命运。尽管我们为楚军这次胜利后的战略形势做了种种假设，但强大的秦国却根本没有给楚国和其他试图复国的三晋贵族们以思考的时间。未来的始皇帝终于明白，需要倾尽全力才能战胜这个在战国后期，实力并未受到太大损害的楚国。曾经被嘲笑过于谨慎的王翦被重新推到了前台，而他也如愿得到了 60 万秦国大军。真正的灭楚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公元前 224 年）。

第三节 王翦率秦军在蕲地消灭楚军主力

说到王翦这位居“战国四大名将”之列的著名统帅，可以说是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大功臣了。这不仅在于他本人直接领导了诸多攻灭六国的决战，还在于他生了另一位名将“王贲”。除了那个相当于主动投降的韩国以外，其余的五个诸侯国都是在王氏父子的统帅下被攻灭的。只这一条，王翦在四大名将中就应该排序在首位。最起码，王翦有办法把他的军事天才传承下去。虽然大部分人都很反感“官二代”、“富二代”，但在军事领域，军事才能很多时候的确是通过家族传承下去的。至少我们在现在，已经看到有蒙、李、项、王等诸多军事家族诞生出多位优秀军事家，出现在我们面前。而配合王翦这次攻楚之役的，就是蒙氏家族的另一位成员“蒙武”（蒙骜之子，蒙恬之父）。

在李信、蒙恬两位年青将领轻敌冒进失败后，秦国希望用这两位老成持重的将领来统帅秦国的家底。而后面我们会看到，王翦的战术也的确非常稳健。秦国为王翦准备的 60 万大军，是秦国所能调动的所有精锐了。也可以说是从秦国所控制的各地缘板块集结而来的，比较悲剧的是，当年被秦国所占据的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楚地，在经过秦国 50 年的经营后，也已经成为秦国的熟地了。而在那些土地上所出生、长大的人，其身份认同已经变成秦国了。因此在秦国攻灭楚国的战争中，他们并没有像“陈”郢那些新近被秦征服的土地那样，有着强烈的离心力，而是反过来成为了秦国进攻楚国的重要基地与兵源地。以史为鉴，如果当年日本人不是那么急于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已经直接控制朝鲜半岛和台湾岛接近半个世纪的日本，会不会有机会改变东亚的地缘格局呢？

领军出征的王翦，首先要做的就是攻取被楚人收复的，以“陈”邑为核心的叛乱地区。在秦军强大兵力的攻击下，因李信之败而丢失的陈邑至平舆之间的诸多城邑，相继为秦军所克。而楚国在秦国把血本都拿出来的情况下，所能够做的也只能是从楚国各地调集所有能征集的军队至战区与秦军决战。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秦军接下来就会继续执行当日李信未完成的攻楚计划，并挺进寿春所在的淮南地区。从王翦

的角度看，他其实也非常想楚国把主力集结起来一战而解决问题。否则的话，本来就结构松散的楚国一旦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反而会增加秦军灭楚的难度。这是因为楚国松散的管理方式，其治下存在很多半自治的地区和部族。去逐点攻击这些为家园而战的地方武装，只会延长灭楚的时间。而如果战事拖延数年之久的话，这 60 万秦军的供给就很成问题了。

正因为如此，王翦在收复之前的失地之后，并没有急于向楚国的纵深进攻。而只是集结在平舆一带构筑防线，摆出一副随时进攻的态势，坐等楚军在自己面前集结。而面对王翦不急不慢的态度，楚人倒是可以借机集结兵力，准备与秦国的决战。不过在项燕将可以调集的兵力都集中到了秦军对面后，面对仍然闭营不出的秦军，就该楚军着急了。

一般情况下，属于攻击方的秦国应该算是客军，而作为主军的楚军则应该更能沉得住气。但事实上，灭了韩、魏，将燕国赶到辽东的秦国，已经对楚国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其与楚军对峙的区域，与秦国的控制区更是连成一片，并不存在补给困难的情况，也不用担心侧后方会有其他诸侯策应楚国。而楚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为了应对秦军在淮北的这 60 万大军，楚国也算是倾其所有，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了前线。如果大家只是一对一的公平对决，那么楚国只要咬住这 60 万秦军，秦国也不会有机动力量从其他点发起进攻的。问题是在楚国的东北方向，秦国还有齐国这样一个战略盟友。当秦、楚双方在淮北对决时，齐国也引兵南下，直指楚国所控制的泗水流域。也许齐人真的相信，秦国会和他们共享天下，因此在这最后的时刻也迫不及待的出来瓜分战利品了。这倒是和当年德、苏瓜分波兰的情况有点像。从外交层面上来看，这无疑是秦国的又一次胜利。气势如虹的秦人并不会真的指望齐人能帮上什么忙，就像德国国防军绝不会把宝押在意大利人身上一样。

王翦和他的军队要的只是齐国在东线给楚人造成一定的压力就可以了。因为这次王翦出击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一战而消灭楚国的主力，并就此灭掉楚国；而从战术角度来看，王翦所运用的则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战术。当所有人都认为秦军会乘胜追击（平叛之后）时，他选择了就地防守，休整军队；当项燕好不容易将楚国的精锐都集中到秦军对面，并希望与之决战时，他却闭营休士，依旧不紧不慢的蓄积力量；而到双方相持将近一年，顾虑后方空虚的楚军开始东撤之时，蓄势待发的秦军终于迎来了战机。和当日李信被打乱计划，不得不后撤，并由此被追击而来的楚国击败一样；同样被秦军打乱计划的项燕，也同样被迫在后撤当中仓促和追击而至的秦军接战。

双方决战的地点在睢水西南的“蕲”地。结合楚军的后撤方向，这个接战地点的选择，总是不由得让人想起“背水一战”这句成语。尽管为证明这种战术的有效性，文人们总是会举出很多成功的例子。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背水一战都是主动为之，也并非所有的背水一战都能激发军队的斗志，并取得胜利。这一次被迫后撤，

并被秦军紧追不舍的楚军，就是这样一个反面例子。无论他们是主动没有渡过睢水，还是没来得及就被秦军追上了，胜利都只能属于无论在兵力、战力还是气势上都占优的秦军。



秦破楚之战示意图

尽管秦军在“蕲”地一战而消灭了楚军的主力。但按照战场上的一般规律，除非是像“长平之战”那样预布口袋的围歼战，否则你是很难将对手全部消灭的，特别是对手中的统帅（当日李信、蒙恬也跑了）。这一次也不例外，在败于秦军之后，项燕和“反正”不久的“昌平君”也得以全身退入淮南。不过对于秦军来说，有几条漏网之鱼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值得再用几十万大军去追击。毕竟秦军这次来是为了灭楚，而不是为李信、蒙恬报仇。因此获胜之后的秦军，转而南渡淮河，直取楚都寿春。

第四节 秦军破寿春后追歼楚国残余势力

主力尽失于淮北的楚国，已经无力保护国都了。如果按照史记的标准，国都被攻破，国君被俘之时，这个国家就算被灭了。像赵国就是这种情况，虽然还有王族在代地称王，亦只能以“代国”之名见诸史册。而燕国就是另一种情况，虽然国都和核心区尽失，但燕王还能保全辽东之时，就不算亡国。至于说楚国，它的情况和赵国一样，在王翦破寿春，俘楚王之时就算被灭了。另一个和赵国类似的情况也出

现在了楚国，兵败退至淮南的项燕拥立曾经的楚公子，秦国相“昌平君”为新楚王。不过与步入后赵时代的“代国”命运有所不同的是，后楚时代并没有成为现实。王翦在入楚都之后，并未就此收兵，而是继续追击，直至占据楚国全境。

项燕和他新立的楚王之所以没有像代国那样得到喘息的机会，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在赵国残存力量所退入的“代郡”（蔚县盆地为核心），有太行山之险屏障，易守难攻。在这点上，楚国境内唯一能够据险以自守，而又不至于腹背受敌的就是“江东”了。楚国的残存力量也的确是退入江东（所以项羽成了“江东子弟”），试图据险以自守。问题是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就防御力本身来说，山地总是要强于河流的。特别是当一条河流成为分界线时，它所谓的天险也就为双方所共有的了。

而占据江北的王翦除了可以收集船只，寻找合适的点横渡长江，亦可以调动江汉平原的秦军水师，顺流而下攻击江东。在这种你只能单边防守，而对手可以两线出击的情况下，长江的所谓“天险”之说就不存在了。所以江东要想割据的话，不在江、淮之间弄块缓冲地是很难做到的（守江必守淮）。如果楚军的主力不在淮北与秦军决战，而是第一时间收缩至淮南，并将国都迁往江东平原的“吴”的话，那么秦国即使最后能灭掉楚国，也要多费很多周折。但现在，楚国已经没有机会进入“后楚”时代了。

第二个原因是在代国的东面还有燕国这个不是盟友，也成为盟友的难兄难弟，一方面互为犄角，另一方面吸引秦国的注意力。而除非齐国能够醒悟过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否则楚国非没有什么盟友，还会有一个落井下石的对手（现在就是这样的）；第三个让秦国暂时放过代国的原因，则是当时的秦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灭魏、燕、楚等国），并不愿意去啃这块食之无肉的硬骨头。而到了灭楚之时，除了那个还幻想着和秦国共治天下的齐国外，已经根本不存在任何威胁了。除了要继续清扫躲在边缘的燕、代残余力量以外，秦国并没有比灭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对于像楚国这样具有较强离心力，又有边缘文化优势的国家，让它留下一口气是很危险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

最后一个留代而灭楚的原因，是在代国的北部还有匈奴压境，秦国并不愿意在中原战事未结之时，去应付这些游牧民族。而楚国的战略后方，特别是东南丘陵地带，主要是越亡之后退回山地的越族所控制。当年越王勾践以东南山地为根本翻盘成功（灭吴），已是一个地缘博弈中的特例（所以才是传奇）。在后来的历史中，长江以南这些没有机动优势，且以定居为主的山地民族，也再也没有呈现过类似的辉煌。因此秦国即使把江东一并收归秦国，也不会担心会和越人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事实上这些越人部族在之前就已经成为楚国的藩属（既然不可能反攻江东平原，那么那些平原地区的物产就只能在政治和解的背景下，通过交换来获得了）。在秦人到来后，同样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也让秦国成为百越之主。

纵横于江淮，跨越整个两周时代的楚国，终于谢幕了。这个巨无霸曾经是除了

秦国以外，最被看好统一中央之国的诸侯。在周天子还能称得上是“天下共主”的时候，楚国就已经称王，并声称与周并列于天下了。而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在秦国占据巴蜀，并对楚国形成地缘优势后，在战略上就已经注定了今天的结果。不过楚国虽亡，楚人还在。当秦国意气风发地带领中央之国进入帝国时代后，希望将帝位传之万世的始皇帝应该没想到，他所做的这些努力，最终竟然都是为楚人作了嫁衣裳。并由此使得以黄河文明为主所孕育出的华夏文明，变身为黄河、长江文明同级复合而成的“汉”文明。

第五节 秦军攻灭燕代两国和齐国

吞并楚国之后的秦国，现在的手就只剩下燕、代、齐三国了。其实仗打到这份上，这三个国家都称不上是秦国的对手了。唯一有悬念的，就是谁会成为秦国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最终秦国还是选择了先把燕、代两国清剿掉。对于即将成为始皇帝的秦王来说，前无古人的成绩，使得他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帝国之中还存在这种裂土而治的诸侯。不久我们会看到，即将诞生的秦帝国，已经习惯于作为一部战争机器而存在了。统一先前为六国直接控制的地区，并不是帝国的终极目标。

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秦国留下燕、代两国，主要并不是基于对方在地形上有点防守优势，而是由于战略重点不在他们身上。当灭楚之后的秦国决定再一次以主力北伐时，偏安于辽东的燕国，与龟缩于代郡的代国相继毫无悬念地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公元前 222 年）。现在，就只剩下秦国的战略盟友“齐国”了。说到齐国在秦灭六国过程中的表现，已经在历史中被人无数次唾骂了。齐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固然是齐国安于现状而不愿出头的理由，但一直到楚国灭亡，齐国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最后的晚餐了。

如果一定要为这一切找个理由的话，那还真的只有从我们在这贴子中不常提到的“人性”二字作出解释了，毕竟地理单元是由人来控制的。虽然并不认为精英人物的想法会最终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但作为一个群体，人类社会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的行为特征的。在具体的博弈当中，这些行为特征或者说其中人性弱点的那部分，往往会成为战略战术的突破口。比如在秦灭六国过程中经常被用到的利用对方恐惧内部平衡被打破（尾大不掉）的心理而施展的“反间计”，就是成功的关键点。而具体到齐人的鸵鸟政策，也是人性的真实反映。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秦、齐两国时，齐国才真正的感到孤独。从秦国决心执行远交近攻的政策到现在已经有 40 多年了（公元前 268 年，即阼与之战后，由范雎提出并定为国策），齐国曾经有无数次机会改变他的鸵鸟政策。尽管改变战略的举动很可能在受到挫折之后，又重新回到坐视秦国攻伐的绥靖政策上来。毕竟在强秦重压之下，能够得到秦国的安全保证，是诸侯们的共同愿望。但如果齐国真的那样做过，

最起码可以延缓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或者说能让自己再增长几年国运。

悲剧的是最后一位齐王（齐王建），是古典时期少有的长寿君主，在位 44 年的他（公元前 264 年—公元前 221 年），有效地保证了齐国政策的一贯性，并且随着执政者年龄的增长，试图挑战秦国的想法会越来越淡。直到有一天，当秦军只剩下齐国这个猎物时，真正感受到死亡气息的齐人，才终于想到动员起来作最后的抵抗。



齐国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后期）

如果从防御的角度来看，齐国可以算得上是四塞之地。东部有大海护佑；西部和南部有泰沂、五莲山脉屏障，并依托山地构筑了齐长城以为防线；北部则有河、济以为天险。有四塞之地的地形，并不代表就不会被攻破了，只是防御条件好的话，相应能够坚持的时间应该会更长些。不过齐国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根本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便轻易让秦军攻到了临淄城下（公元前 221 年）。

如果单从战术角度来看，也不能说齐人没有做过最后的努力。被秦国三面包围的齐国，河济平原无疑是最容易被突破的方位。已经控制西河济平原的秦国，很可能把无险可依的东河济平原作为突破口，因此齐国人也自然把主力集结于此，准

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不过齐人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即当年燕人是从哪里攻入齐国的。而现在已经控制整个华北平原的秦人，并不排斥从战术上“山寨”一遍燕人的成功经历。更何况刚刚灭掉燕、代的秦军主力，并不需要绕什么路，就可以直达东河济平原的北面。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秦人攻齐时，河、济两水是否结冰。不过这也是北方河流的防御力要比南方小很多的重要原因。如果秦人是在等待河、济两水结冰之后，再迅速南下突破齐人重点防御方向，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忽视东河济平原北部的防御）。而一旦失去了河、济之险的保护，临淄城再作抵抗也是徒劳了。那位长寿的齐王最终再也没有机会延续他的在位纪录，率领臣民出城投降了。

虽说以最后的形势而言，齐国无论做什么样的战术部署，都无法挽回被灭国的命运。但和齐人保守的战略思想相比，数十年没有大战的齐军，战术素养也同样无法让人释怀。也正因为如此，战国当中，最后能够与秦国对战，并取得过重大战术胜利的殊荣，落到了楚人和项氏家族身上。虽然不能将后来楚系遗民成为反秦中坚一事（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为楚人）完全归功于此，但项燕最后的胜利，无疑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至此，秦国扫清了统一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之后 800 年，秦人开创了新的朝代“秦朝”，曾经的秦王也变身为了“秦始皇”。中国两千多年的所谓“封建史”（其实是“集权史”）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们不必为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感到惋惜，因为还会有无数的英雄出现在历史长河之中。而在之后的历史当中，尽管中央之国核心区内依然周期性的战乱不断，并仍旧在扩张当中，但主要的地缘矛盾，已经转变为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在经过楚汉相争阶段，汉帝国重新统一中央之国后，许多人所期待的“外战”即将开启。

都江堰工程的结构与原理

都江堰的设计理念，大家只要稍加用心，就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简单点说，广义的都江堰工程，指的是覆盖成都地区的，整套的水利系统。其基本设计理念就是在岷江水将从川西高原下来时，即开始分流。而分流出来的这部分江水，在切入成都平原核心区（岷江——湔江之间的区域）后，再行分流为四大干渠，即现在的：江安河、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这四条干渠呈“伞”状均匀的覆盖了成都平原核心区（然后再从这四大干渠中引出无数支线，全面覆盖成都地区）。其中江安河、走马河在滋润了成都地区后，在岷江即将进入川中丘陵地带之前，向南又回流到岷江干流了。而柏条河、蒲阳河，则继续向东，与沱江上游水系会合，出龙泉山中的“金堂峡”进入川中地区。

从设计理念上来看，选择从高原、平原的交界处先分流出一条总渠（内江），然后再在平原地区分层次的多级分流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是很讨巧的想法，比之在岷江沿线开出多个引水口，然后再东向铺设水网要省力的多，也更容易控制。如果从施工难度的角度看，选择在岷江进入平原地区后，再行分流会容易的多，不过我们最终看到的都江堰工程，是选择在岷江进入平原之前即行分流，也就是说你必须开山，才可能获得引水口。这样做当然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样辛苦在山地边缘开出的引水口，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结构稳定（平原地区的引水口，很容易被洪水冲得变形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都江堰引水工程的基本结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很大程度就是要感谢先人们这种迎难而上的做法。

从结构上看，在打通内江通道之时，离堆的作用相当于人字型结构的，内、外江的分水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年是在平原地区分流的话，那么这个分水岭就会是土质的平原，而即缺乏高度，又缺乏硬度的分水岭，是无法稳定的承担分水的作用的。与其长期花费人力物力来加高、加固这个分水岭，倒不如在山发边缘进行分流，切割出一块天然的石头山体，来承担这项千年任务。

一般认为切割离堆的工程，是在秦人到来后，由李冰来完成的。但实际上，这项工程应该是在秦人吞并巴蜀之前，就已经由蜀人完成了。不过李冰对都江堰工程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都江堰工程之所以能够这么完美，是经过很多代人不断的努力才得以完善的，李冰不是开启这项工程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对工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他为都江堰工程所作出的贡献，却是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关键。

李冰究竟为都江堰工程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由于蜀国为我们留下来的资料甚少，再加上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强势地位。因此蜀人在成都平原水患治理上，所作出的努力被长期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古蜀文化更多的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附属文明）。实际上我们之前也已经说过，秦人之所以看中蜀国，就是因为发现了成都平原的农业潜力。也就是说，最起码在秦人到来之前，蜀人已经由靠天吃饭的“渔猎文化”阶段，步入“农耕文明”阶段了。将定居地点迁入纯粹的平原地区，更意味着蜀人已经拥有一定的治水能力了（否则会呆在边缘的丘陵之上）。当然，希望通过控制河流，而获得稳定的耕地，并不代表你马上就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做到这点。正如中原地区治理了几千年的黄河，依然还不能说就降服了这条喜怒无常的

母亲河。

如果蜀人想开耕成都地区的土地，他们除了要思考如何规避洪水，还需要考虑如何从岷江之中引水，以让自己种下的庄稼有水可用。就水渠的开挖来说，工程量并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在岷江周期性的漫流成都平原的过程中，势必冲击出一些河道。而从逻辑上来看，深挖这些河道，并从当初洪水漫流而出的点上引水（可能是多点），会是蜀人所最先想到的。不过我们则才也说了，以岷江的水量而言，在平原地区开口做这种引水的事情，虽然能够保证农业用水，但却并不能保证引水工程结构的长期稳定。也无法保证成都地区不再受洪水的困扰。也正因为如此，蜀人才会想到开凿“离堆”，然后以离堆为起点，构筑成都地区的水利网。

蜀人开凿“离堆”的时间，应该是在古蜀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时期（约公元前666～前316年）。在此之前，蜀国一共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四个王朝。也可以说，蜀地是由这四个不同属性的部族，分阶段所控制的。而据传说，“开明王朝”的建立，正是因为他的开创者“鳖灵”成功的治理了成都平原的水患，才能够接受了杜宇王朝的“禅让”的。这个传说与“大禹”从舜帝手中接过“帝”位的故事是何其相似，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不过好在现在的考古发现，能够为古蜀国在成都平原的存在，提供有利的支持。根据历史记载，古蜀国在建国之后，先是在成都市南的双流县一带建都（现在双流比较知名的是国际机场），而后又向北迁移离岷江稍远的，现在的成都市境内。而在成都西郊发现的“金沙遗址”，足以证明这一带曾经是蜀人活动的中心。

其实如果我们认定，口口相传的传说，能够承载一定历史信息的话，那么对于蜀人治水，甚至开启都江堰工程，还有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信息，这个神话人物就是“二郎神”。对于这个神话人物，经过《封神榜》以及《西游记》、《宝莲灯》的演绎，已经产生了很多无用的信息。而我们的关注点，当然不是在它是否有七十二变，或者是否与孙猴子、沉香有过那一段恩怨上。在关于二郎神的原始传说中，我们所能够剥离出的有效信息有三个：一是名字，二是长相，三是故事的发源地（也就是他的籍贯）。

关于二郎神的籍贯，明确的指向是灌江口，现在的都江堰市，之前的名字就是“灌县”，这个“灌”字的得名，则与引水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在成都平原，关于二郎治水的传说已经最少有二千多年了，至今都江堰工程的边上，还有二郎庙。只不过由于历史上治水的功劳，都被寄予李冰名下，因此“二郎”也被想当然的认定为李冰的二儿子了（记得儿时看过一个电视剧，就是描述李冰父子治水的）。

如果不是二郎神留传下来的形象，与成都平原的最新的考古发现，有着内在的联系。也许“二郎”仍然没有机会摆脱李冰的阴影。对于二郎神形象中最重要的特征，我想只要是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有深刻影响，那就是他的第三只眼。而如果从摆放的角度来看，这只眼与另两只眼并不相同，是一只呈立状的“纵目”。对于为什么二郎的形象中有一只“纵目”，这只纵目最初的形象应该如何，一直以来并没有深入的研究。直到三星堆出土了另一种形式的，超出我们想象的“纵目”形象，才忽然让人有云开雾散的感觉。虽然不能十分明确，古蜀人为什么会打造出立体“纵目”形象的神像（面具），但平面纵目的二郎神，与古蜀文化，以及因治理岷江水患而受享烟火之间，从逻辑上来看，

是可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的。至于说立体的纵目形象，为什么演变为平面的纵目，倒也很好解释。因为口口相传的东西，由工匠们刻画出来，往往因为没有见过实物而有着让人啼笑皆非的误差。我就不止一次的看过，在某件古代艺术品上，以一头正中还长着一只弯角的水牛，配上一轮明月，以喻意“犀牛望月”的传说。

上述有关二郎神的推论，只是从文化传承的关系上，对古蜀人开启都江堰工程所作的猜想，并无法作为直接证据，写出来也只是让提供一个角度罢了。明天我们将分析李冰对都江堰工程所作的贡献。祝大家晚安！

今天我们还是把视线比二郎神身上转回到都江堰工程的结构上。要说都江堰这个名字，并不由古蜀人或者秦人命名的，大概到了宋代“都江堰”才成为这项伟大工程的标签，中间曾经换过好几次名字（先秦叫过“湔壩”）。从名字的变迁也可以看出，都江堰工程一直处在被使用状态。

当年古蜀国的“开明王朝”开凿了离堆，打通了成都平原的引水口（名叫“宝瓶口”）的确为都江堰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都江堰工程如果只是开了个山口引水，那也成不了治水的经典案例了。事实上蜀人在开凿离堆后，虽然能够为成都平原的核心区（成都地区）提供安全的灌溉用水，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流洪水。但还不能完全地解决问题。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原因有二：一是岷江和任何一条河流一样，水量存在周期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蜀人可以计算出自己的用水量，但却无法让岷江水按照蜀人的需要，稳定地引入那些分布在成都平原的干渠之中；另一个原因则是，尽管蜀人在打通宝瓶口时，很可能离堆与江水以东的山体之间，本来就有个有一定深度的豁口，并因此而减轻了不少的工程量（甚至因为这个豁口的存在，而激发了蜀人由此开凿引水口的灵感）。但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蜀人所开凿的宝瓶口，其河床高度还是会高于外江天然河道的河床高度。

这样的话，如果岷江处于枯水期的话，那么能够被引入成都地区的水就会变得很少，不足以满足农业生活用水；而如果岷江出现洪水的话，那么宝瓶口的高河床（相对），也还是不足以分流掉足够的洪水。要知道，岷江能够长期被定为长江的上游，其水量在四川盆地诸河流中是无出其右的（否则这个荣誉就可能归其他河流了）。更为致命的是，四川盆地的整体构造，并非遵循一般规律下的，西高东低，即山地—丘陵—平原，三段逐级下降的模式，而是由山地（还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山地）直接降到川西平原，然后再是川中的丘陵地区。这种地理构造形成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简单分析过了。

至于再专业的地质学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接着研究。对于我们来说，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由第一级直接过渡到第三级的地进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从高原流下来的岷江等于是从天而降地进入了川西平原（离堆的海拔要比成都高 273 米），如果是在枯水期，岷江水尚能在河道中老老实实地流淌。但丰水期的场景，大家就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在二楼拿着高压水龙头对着操场喷涌时的样子，跟那情形差不多。

所以说单靠打通一个宝瓶口，虽然能够为成都平原解决一定灌溉用水，和分流一定的洪水，但还是无法让成都平原安享太平。用现在水利专家经常用的一句话总结，也就是将成都平原的抗洪水能力，由“N 年一遇”提升到“NN 年一遇”。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则要等到秦人的到来，和李冰这个“治水专家”的出现了。

无论历史上都江堰工程的名字怎么变迁，这项伟大工程所突出的工程重点都是在一个“堰”字上（“棚”也是“堰”的意思）。而这“堰”字，字面的解释就是“挡水的堤坝”。用堤坝来治水，是历代治水工程中运用范围最广的技术。像华北平原的魏、赵、齐、燕等国，沿黄河等河流沿岸筑堤以防水患就是最常见的形式；而在长江下游，吴越两国也经常通过在海边或者湖边的滩涂地外围构筑堤坝（当地称之为“塘”），然后将其中的积水排出，加速土地的硬化来获取耕地。不过李冰和古蜀人对于“堰”的使用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这个“堰”即不是用来挡住洪水的，也不是用来造田的，而是用来调解内外江水量的。

我们刚才说了，宝瓶口的河床要高于外江的天然河床。如果要想调解进入内江引水干渠的水量，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双方的高度差或者宽度差，如果宝瓶口的宽度或者高度有所增加，那么引水量自然会增加，只不过依当年的技术条件，能在山体上打开一个缺口，已是千难万难了，再想进一步是基本没有可能性的。既然将宝瓶口再挖深挖宽的难度太大，那么就只有逆向思维，将外江口的河床垫高或者宽度缩窄。一旦外江口的河床被垫高，那么流入内江的水量也必定会增加。这种垫高，并不需要是永久性的，因为岷江水在不同季节的水量是不同的，如果要保证流入成都地区的水量保证稳定，那么外江口的河床高度也要有相应的变化。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现在，是很好解决的，现有技术让我们可以在外江口修筑一道多水道的水闸，然后通过控制水闸的高度或者数量，来控制内、外江水的分配量。事实上现在的都江堰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不过在古典时期，要想在这样的大河上面建造可控的水闸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李冰和古蜀人想到了一个非常讨巧的办法来解决内外江水分配的问题。那就是通过在外江口投放石块等填充物，垫高外江口的河床，也就是在离堆的西侧筑一道“堰”，以达到增加宝瓶口引水量的目的。这样做也并非没有难度，难度之一就是你需要掌握岷江水流的规律，以调解不同季节，“堰”的高度；另一个难点就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构筑这道“堰”，如果仅仅是向江中抛入石块泥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石块如果太小，丢进去会马上被水冲走；而大型石块，即使能够搬动，也很难凑齐足够的数量。

解决前一个问题，主要依靠的是经验积累，也就是通过观测纪录岷江的流量规律，以及成都地区的用水量，来设计“堰”在不同时期的高度。这点，在李冰到来之时，相信与岷江打过N年交道的蜀人，已经能够提供相对准确的资料了，而在后世之中，这些水文资料也在不断的修正之中。

经常会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华文明那么注重历史传承。其实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农业需要。因此作为依附土地程度最深的民族，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掌握能够影响土地收入的环境资料。而这些资料所包含的节气、水文、天象等数据，需要通过长时期的，不间断记录才能够获得。由此而产生的记录历史的习惯，和以氏族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传承关系，才得以有持续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自己实实在在的先人，所能够为我们做的，远比那些虚无缥缈的“神”更务实。而将继续这种传承关系，不仅能够让子孙持续享有这种积累所带来的好处，更可以满足自己自己的精神需要。因为每一个这样做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在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最低限度可以享受子孙祭祀的“神”（所以中国人更习惯于求祖宗保佑自己）。

相比于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更多的需要依靠当地的资源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其实和现在用来临时筑坝的方法很象。现在如果哪个大坝出现缺口的话，就会用麻袋或者编织袋装上泥

沙石块，来堵口。而在当时，“麻”一类的材料还是很珍贵的，做成袋子来筑堰实在有些奢侈，更何况以岷江的流量和流速，做个口袋装泥沙，丢进去也很难沉下去。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当地所盛产的竹子，编成大型竹笼，然后将石块装入，再投入外江口筑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材料易得；二是可以任意改变每一方筑堰材料的体积和质量，即能够让竹笼沉下去，又不至于大到无法搬运。还有一个好处则是，当进入枯水期后，需要降低“堰”的高度，以加大引水量时，有竹笼包裹的石块，也更方便从堰体上剥离，然后顺江而下冲入长江中。

用竹笼包裹石块筑堰，然后控制引水量，无疑是都江堰工程的精髓所在。这个讨巧的方法，再结合岷江水量的规律，足可以让整个都江堰引水工程，成为一个半自动的工程。即每年通过有限的几次调解堰体高度的工作，来使得成都平原从此不用为农业、生活用水而发愁。不过要想使得都江堰工程成为一个千年工程，并且使得维护工程的强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还是需要对上述方案做出细节上的改善的。其中有的，是在李冰的主导之下做到的；而有的，则是在后世的使用过程中被发现，并被修正的。

对于李冰来说，既然已经有了筑堰调解水量的方案，在解决完施工材料的问题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施工地点的问题。按道理来说，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即使离堆成为了内、外江的分水岭，那么离堆西侧的外江河道，也当然应该成为筑堰的地点了。只是当我们观察离堆与外汇西岸的距离时，就会了现这段江面其实是很宽的（目测距离为2500米左右）。要想在如此宽的河道中周期性的筑堰，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上天还是很关照李冰的，我们暂时无法知道开明王朝在开凿宝瓶口时，岷江之中是否有沙洲岛屿，但在李冰到来之后，在离堆的北侧，河道中央已经沉积出了一块竹叶状的沙洲，鉴于离堆的存在，岷江水道在此有所收缩，并由此而淤积下部分沙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这条竹叶状的沙洲却让筑堰的工程量，大大减少了。因为沙洲的存在，离堆以北的岷江河道已经被分割成为两部分了。而沙洲的北端，与岷江西岸的距离要远低于离堆与江岸的距离。换句话说，筑堰的地点被选在了沙洲北端的外江河道中。而这条沙洲则在事实上取代了离堆，成为了内外江的分水岭。

由于这条竹叶状的沙洲，看起来也很象一条“鱼”的形状，因此它北端筑堰的地点（东起点）被称之为“鱼嘴”。而对于后世的维修工程而言，加固沙洲的边缘，使其的形态不至发生变化也成为了重要的工程。这种用卵石加固边缘的行为，最终也让这条沙洲得到了“金刚堤”的名称。有了金刚堤和筑堰的技巧，李冰已经足以让成都平原获得均衡的用水了。根据计算，结合成都地区的用水量，这项工程在一般的丰水期，最低可以分流掉40%的岷江水量。除了保证成都地区的农业用水以外，也极大地减轻了岷江下游河道的压力，避免了水患的频繁发生。

不过，虽然李冰的治水工程，加上之前离堆的开凿，已经足以让成都地区安保百年（级数）的太平，并由此而支撑秦国的统一大业。但都江堰工程能够一直使用到现在，后世的蜀人，还需要再对这项工程作出改进。因为当你打开一扇窗时，进来的不仅有清风和阳光，还有可能有让人讨厌的蚊子和苍蝇。对于都江堰引水工程而言，这些讨厌的蚊蝇就是随河而来的泥沙（甚至石块）。

虽然那些从高原之上顺流而下的泥沙，在人类尚未出现之前，对成都平原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在都江堰的实际施工当中，提供了“金刚堤”这样的天然分水岭和支撑点。但当成都平原的

地质状况已经调整到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状态时，这些泥沙再随着内江而来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尽管比之那条以含沙量巨大而著称的母亲河“黄河”而言，岷江所含的泥沙量算小的了，只是凡事经不住积累，如果任由泥沙通过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那么李冰和秦人固然不会遇到大问题，但后来居住在成都平原的人们，终有一天需要正视这个问题的。也正因为此，都江堰工程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飞沙堰”诞生了。

相比于岷江干流（外江）而言，通过宝瓶口分流入成都地区的江水，流速则上小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过滤掉水中的沙石，久而久之势必会垫高河床，造成新的灾难。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定期对河道作清淤工作就很有必要了。不过相比于绝大部分的引水工程，都江堰工程则找到了个更加巧妙的方法，来分流大部分顺水而下的沙石，以减轻引水干渠的维护工作，这个方法就是在金刚堤的下半部，离堆的北端，西南方向切开了一个缺口（切口的下方成为了独立的沙洲，被重新命名为“人字堤”）。而这个缺口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流掉内江之中的沙石。

当内江水从金刚堤的东侧，倾泄而下时，相当于被离堆这块硬骨头二次分流了。其中成都平原所需要的农业用水，通过宝瓶口流入了那些干渠之中；而那些无用的沙石泥土，则通过金刚堤与人字堤之间的缺口，送回到了外江之中（外江的流量流速，足以将它们送到长江里去）。这件事看起来非常奇妙，所利用的就是离心力作用。至于这个离心力是怎么作用的，想信在物理学方面有所善长的朋友，能够给出专业的答案。简单的说，内江的弧度和离堆对内江水流的阻挡，都促使江水在这个新分水岭面前，有了一个顺时针的旋转，并把江水所夹带的那些私货从缺口处甩了出去。

当然，由于金刚堤与人字堤之间的这个缺口，宽度要大于宝瓶口，因此它在分流掉水中杂质的同时，也会损失掉大部分的内江水。这对于急需农业用水的成都地区来说，无异于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并倒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来也是要耗费一番心思的，不过有了在鱼嘴筑堰的经验，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要想控制离堆两侧的水流，还是要靠“堰”，即在金刚堤和人字堤中间，也用竹笼装着石块筑一道低于水平面的“堰”。而这道堰的高度，同样也是可以人工调解的，丰水期放的低点，枯水期垫得高些，对内江水量的调解也直到辅助作用。至于那些沙石，倒也不必担心，由于这个位置的旋流速度足够快，它们相当于是贴着水面飞到外江去的，因此这项新的工程被形象的称之为“飞沙堰”。

有了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再加上成都平原上那些均匀分布的水网。成都地区由此安享了二千多年天府之国的的美誉。而在通过都江堰工程，覆盖岷江——湔江之间的成都平原核心区后，蜀人对于川西平原南水两端的水网建设也在同时进行之中。在鱼嘴的西侧，后来依照同样的原理，又修建了一个小鱼嘴，以分流出一部分岷江水，与川西平原南部的河流，共同打造江右地区（岷江以西地区）的灌溉系统；而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水系，也与两条岷江引水干渠对接，互相调解水量。这事实上，也让整个川西平原的水利灌溉网联成了一片，并共同享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并非是在先秦全部完成的，但李冰和古蜀人为成都平原的引水工程，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得后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只需要作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可以了。

问：本来很期待楼主写都江堰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成都人，都江堰是我们的骄傲。不过我感觉楼主这一段，问题比较多哦。宝瓶口的深度，我有一次陪领导去都江堰的时候请了一个导游，据说有 20 多米深。当时在宝瓶口，导游让我们猜宝瓶口的深度，大家有猜 5 米的，又猜 10 米的，总之没有一个猜中的。当导游说出 20 多米的答案时，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这也就是说，上述关于由于宝瓶口深度比外江浅，因而引水量不足的推论论，是无法成立的。事实上，如果是抬高水位，那应该在外江之中横着修一道拦水堰，就像现在的各种大坝一样，而不是像鱼嘴这样，顺着江流的方向。

因此，尽管宝瓶口足够深，但是引水量不足的原因是在江的侧面，而非江的主流。从楼主给出的图就可以看出，假如没有鱼嘴的话，江水主流应该先冲击图中左上角的岷江西岸凹处，然后折向东边，到达东岸凹处，也就是现在的二王庙下面，再次折向西岸，正好将宝瓶口错过。修建鱼嘴，就可以使得江水主流流进内江。古谚说鱼嘴的功能：四六分水，二八排沙。就是说，一般枯水季节，由于对上述江水主流的控制，六成水进入内江，四成水进外江；洪水季节，由于外江宽于内江，因此比例正好倒过来。

江水到离堆后，再利用飞沙堰与宝瓶口的高度差，使得江水进入宝瓶口。而飞沙堰的高度，也有调节水量的作用。当洪水季节，洪水漫过飞沙堰，就使得多余的水不会进入宝瓶口。而谈到泥沙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飞沙堰的功劳。古谚说鱼嘴“二八排沙”。就是说，由于沙石较重，在水中倾向于走直线，而非像表层的江水走大 S，因此沙石的 8 成，都进入外江了。而进入内江的沙石，一部分沉积在内江中，一部分则通过飞沙堰排走。鱼嘴和飞沙堰都是永久性工程，只会加固重建，不存在楼主所说的动态调整高度。宝瓶口的岸边刻有水位，而飞沙堰的高度，固定为宝瓶口的 13 刻。解放后由于引水量增加，调整高了一些。

那每年要维护的是什么呢？就是内江河道。前面说到，沙石有一部分沉积在内江河道，因此都江堰每年都要冬修，疏浚内江。这时，会用楼主所说的竹笼将内江截流，然后清淤疏浚。到开春时，要举行放水节，重新放水。都江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工程依据的是水流力学的原理，顺势而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非人们拍脑袋都能够想象的利用水位高差。顺便说一句，古代宝瓶口洪水水位超过 16 刻，枯水水位低于多少刻（我记不清了），成都的官员就要撤职。四川巡抚丁宝桢，上任后就对都江堰进行了大修，结果赶上上游地震后堰塞湖溃决，引发了据说是岷江史上最大洪水，结果还是被免职。

再说一句，鄙视认为宝瓶口是开明王朝修建的，我猜测，可能是参考华阳国志中“鳖灵决玉垒山”的记载。不过在都江堰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李冰修建都江堰，主要的工程就是宝瓶口，用了八年时间方才成功，而鱼嘴、飞沙堰都是在反复测量设计后，工程量并不大。

答：刚才仔细研读了都江堰堰头工程的结构，的确是我写错了。都江堰工程的知识是来源于中学时代（是那时候得到的为数不多的，自觉有用的地理知识），记得当时还是地理课代表，老师花了整整一节课来讲授这部分内容，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自己还积极参与的讨论，也觉得很符合逻辑。正因为如此，在写这部分时也没有多加考虑，自己还觉得写得很顺，其实和老师一样犯了个大错误，

即把都江堰的无坝分水理解为“有坝分水”了。

这部分本来应该在秦收巴蜀以后写的，之所以提前了，主要是因为判定宝瓶口是先由古蜀人开凿的。这部分目前不会重写了，不过等到历史发展到李冰到任之后，还是会重写的。不仅是因为要弥补之前的错误，也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项伟大的工程。（顺便说下，内外江的含沙量不同，并非是因为简单的线路曲直因素）再次向您致谢！一个人不可能总不犯错的，重要的是有人能够随时帮助指出，这也是我喜欢论坛的原因。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这个帖子！